

从懵懂到“懵懂”

——聂树人文革回忆录（新版草稿）

2017.5.

历史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喜欢戏说。

千万双眼睛看得见：我们当年做的事，十年后能见人，百年后能见鬼，千年后能见史。

——作者志言

前言

(一)

自 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六本书：

- 1、《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 2、《“地质东方红”兴亡史》；
- 3、《三司与<首都红卫兵>》；
- 4、《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 5、《“一打三反”与“抓 516”亲历记》；
- 6、《“逮捕审查”与看守所记事》。

几年后，我又将“六本书”加以“精练”，并且，加上了我的“文革研究”，定名为《从懵懂到“懵懂”——聂树人文革回忆录》。

(二)

1941 年，我出生在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家庭。一出生，我就面临着“被饿死”的问题。稍大，在无助的求生中，我常以“受欺必反”的方式，回击他人对我的欺辱。由此，形成了我的心理本能：1+1，就等于 2——我只能用自己的双脚来趟自己的人生。

1949 年至 1966 年 6 月前，我被裂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感恩新政权带给我读书的机会；另一部分是，从本能出发，对“伟光正”有点质疑，差点被逐出校园。

文革开始后，我再次轻信了“伟光正”的说教，给党（组织）提了点极为善意的意见，以为这就是“靠拢组织”。可是，早已“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党组织或党员，视我为敌，先是被地质学院的党打成了“右派”，随后，又成了工作队党委“反干扰”的对象。当毛泽东指出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后，我懵懂地认为，只要工作队能给我们平反就行了。可是，人家不仅不给我（们）平反，还千方百计打击我们，认定我们就是“反革命”。形势迫使我们夺了他们的权。在这个过程中，我懵懂地成了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从朱成昭的“起伏”中，我明白了，在专制制度下当“官”，你首先得学会听话，你得学会当“奴”。我不愿意当奴，1967 年 7 月，我拒绝调往“中央文革宣传组”工作¹；1968 年底，我“打报告”调离学校，躲进了青海高原的山沟。在离开学校时，我自信我在文革中的清白。至少，我小心地遵循“公序良俗”，未犯大错，更没有干什么坏事。我曾深信，即使有敌对者，他对一个清白的人是无能为力的。

可是，“敌对者”的卑鄙和无耻，是难以想像的。刘少奇死后，我先是被“莫须有”地打成“5.16 上层骨干分子”，后又指责我“绑架周总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最后，青海省地质局定我为“三种人”。问根据，人家不说。后来传话给我：“这是薄一波定的”。

这些“莫须有”罪名，都是在文革被“彻底否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我仍然懵懂地认为，“彻底否定”不会久长，毛泽东的以打击“走资派”为核心的“继续革命理论”有长用²。为此，我写了六本“回忆录”。

近些年，社会上盛传什么“毛左”、“邓右”或左派、右派的划分，大都事涉对文革的评价。我又懵懂了，我一忽儿成了“左派”，一忽儿成了“右派”。至今，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派！

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文革？我对以前的观点重新进行了审视，试图跳出这些“纷争”和懵懂，于是，就又写出了这本“回忆录”。

读者可以发现，在这本回忆录中，我有了些新的看法。但是，我是不是真地看明白了？不一定！我因此而对后一个“懵懂”打上了引号。

(三)

¹1967 年 7 月，中央从全国选调四十多个“笔杆子”到中央媒体工作，我被调“中央文革宣传组”工作，到钓鱼台报到。我未奉调。

²戚本禹先生生前，曾让我好好研究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

近几十年间出版的文革回忆录，有官方出版社出版的，也有民间出版的；有在大陆出版的，也有在香港出版的。因种种原因，出版物中正、误皆有，有许多，难以为“史”。

我的前六本回忆录和这本回忆录的写作原则是：

- 1、在主观上，绝不编造事实或歪曲事实；
- 2、尽可能“言出有据”。如果无“据”，也力求有旁证。
- 3、本“回忆录”不可避免带有个人色彩，我力求“中性”。

在写作中，我不想伤及任何人，包括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论人家高兴不高兴，我都要尊重事实，还真实于历史。

聂树人
2017年5月

第一大部分 聂树人文革回忆录

第一编 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我的“造反派”探源

第1章 幼年时代

我的母亲

我的曾祖父聂自重是普通农民，只有房屋四间。土地有多少，我不知道。

祖父辈三个，共有8个儿子：

大爷聂有贵：儿子聂树生、聂致林、聂换林

二爷聂有成：儿子聂周才、聂致安、聂致理

三爷聂三寅：儿子聂树林、聂孝生

祖父辈的八个儿子分家，每户只能分到半间房和极为有限的土地。

我母亲姓张名荷英，生于1912年，出生于汉水南岸大江坝一窝坟村的一户张姓人家。四岁即以几升麦子和二斗高粱，成为汉水北岸聂有贵家的童养媳，十三岁即与其二儿子聂致林成婚。

母亲说，她的脚被缠过。但是，缠足前能做的许多事，缠足之后就做不成了或做不好了。这使她的公婆从犹豫变得迟疑，迟疑之后，就是放弃。

母亲19岁时（1930年）生育我哥哥聂宝全。

聂致林因遭户族人聂致顺（外号聂瞎子）及他的二大聂有成的诬陷，被抓进县大牢后，死亡。

我的父亲不回家

母亲与我的父亲成婚发生在1939年。我的父亲聂周才，是二爷二婆的大儿子，生于1914年。因为有二爷诬告聂致林的过节，我的母亲并不同意这门婚事。后来，几经说合，是父亲“上门”到我家的。当时，我的母亲和哥哥租住在距祖居不远的聂续生的一间房子里。

母亲嫁给我的父亲后，生了我。因此，就名份上说，我应是大爷的孙子；就血缘上说，我又是二爷的孙子。

我出生于1941年农历6月20日，母亲给我起的乳名叫“继宝”。

我出生时，父亲已不知去向。家里生活所有的，据我母亲说，只有几升苞谷和母亲自己晒制的一木箱干菜。

父母亲分居的时间大约有5~6年。据哥哥说，婚后父亲很勤快，地里收成也不错，母亲与哥哥很高兴。是年冬天地种上后，父亲即与母亲商量，要出门做小买卖。这是好事，母亲当然支持。父亲即将家里的棉花、母亲织的布等凑了一挑，与他人结伴而出。

可是，到了年关，父亲却夹着个扁担回来了！母亲从其它人的嘴里得知，父亲是因为赌，本利都输光了。

其实，父亲是个老实人，性格耿直。他至死都不知道，他面对的都是合伙骗人的赌棍。

对此，母亲很伤心，和他吵了好几天。

父亲自知理亏，也不说话。过后，又很勤快。搞到秋天，有了点积蓄，又说要出去做买卖，并向母亲表示，这一次一定要改过前非。

但是，旧习难改。过年时又挟个扁担空人回来了。据说，他不是没有挣下钱，而是又赌输了！

母亲气得没话可说，只对他说：“你出去，你走！”

父亲也觉得再无脸面，就走了。

在此后的几年中，父亲再没有回过家，直到1947年。

到1951年，我家仍租住在他人的房屋中。

在饥饿线上

为了活命，哥哥从七岁起，就去给穷亲戚（我的二姨）家放牛，混口饭吃。

为了活命，母亲不得不下地干活。1949年前，在我的家乡，很少有女人下地干活的。那时，我的母亲是村中经常在田地里干活的三四个妇女之一。

我们吃的很差，常常是一锅饭中，大部分是青菜，只有少量米粒，米粒都被菜染成了“青”色。

母亲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纺线织布。为了省油，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摸黑纺线到深夜。我是坐在母亲的腿上，听着纺车的嗡嗡声长大的。我也曾在凌晨，跑到旷野上去找母亲和哥哥（他们去了碾坊碾包谷，以做早饭），差点掉进池塘或被狼吃掉；我曾窜进深不可测的池塘里，差点淹死；我曾从狼的口边脱逃，九死一生。

长大一点了，五岁多，我成了一个天天拾柴禾的孩子。我拾得的柴禾可以供我们母子做饭的烧用。

我想有杆枪

1949年以前，年青人谁都怕当兵。他们被抓送上前线后，多是一去不回，死在战场。

我的哥哥14岁，即被送到县城学手艺。在1947年冬天，哥哥重感冒，从县城回家来养病。回到家又怕被兵贩子拉兵，母亲草草地给熬了点中药吃了，只住了半晚上，第二天凌晨就悄悄离家回城。走到七里店附近时，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保丁抓住了。保丁中，一个叫冰冰，是村东人。村东保丁抓村西人；反过来，村西保丁又抓村东人。得了钱，领了赏，大家分。

当母亲和我赶到冰冰家时，他们正在吃早饭。听说我母亲来了，好象是冰冰的女人假惺惺地说：“快给娃舀饭”。哥哥双手被反绑着，坐在一把椅子上，说：“我吃过了，肚里饱得很。不吃！”冰冰端着饭碗极力给母亲解释说，这事与他无关，是上峰让其它人抓的，送到他家里，叫给看管着。他实在也是没有办法……

母亲能说什么呢？只能和哥哥流眼泪。

我当时没有哭，我心里只有怒气。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有一支枪，就立即把这些王八狗子们嘣了，把哥哥救出来。

1949年洋县解放前夕，哥哥才从国民党部队中逃回了家。

家里生活有了转机

我父亲是1947年回家的。

父亲回家后，除种好自家的少量地外，还租种邻村袁成隆、袁双娃家的几亩田地。这两家人于前几年，去到佛坪县秦岭山区一个叫“四亩地”的地方谋生。父母亲没明没夜地干，在交完租子之后，还有一些剩余，我们的日子也开始好了起来。

1948年，一些消息灵通的富户在“高人”的指点下，贱价抛售田地，以便在“变天”之后，既不当地主，也不受损失。当时，大字不识一个、对国家的政局和大政方针一点都不了解的我的父母亲还以为自己能捡到便宜。于是，就东挪西借，加上自家的积蓄，买了两块地，一块地在门前，离我家很近；一块地在辕门观附近，离我家一里多路。

这两块地总面积约二亩多³。地的主人则远在十里路之外的东韩村。

第2章 “六陵渡现象”

“红军”来了

在1949年12月24日的前几天，我及村人们都听到从西边（汉中方向）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

此后，国民党兵向东、向南撤退。

1949年12月24日这一天的早晨，一队约三四十人的队伍打着一面红旗，从村子北边的“官路”上，由西向东，静悄悄地向县城方向开跋。村中的一些老人、小孩都站在屋后，冷漠地向三四百米外的队列张望。我站在观望的队列里，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不会失去什么。

若干年后的电影和教科书中，描写解放军进军各地时，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可是，在我的家乡，我没有看到那种荷浆提壶，挟道欢迎的场面。

我不知道的是，红军来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一些“贫农”被发展入党

“红军”从村北官路上过去不几天，以张铎为组长的三人工作队就进村了。我看到和知道的情况是，工作队员通过扎根串连，激励穷苦人起来与旧政权的当政者和追随者进行斗争。

³这两亩多地在土地改革时，曾由地主对我家进行了清退。

刚解放时，六陵渡村划属谢溢区，被定为乡，叫六陵渡乡。全乡被划为十几个村，我家所在的坡坡下和坡坡上 20 户人家被划为二村。第一任乡长张锋，只当了几个月就走了。其后任乡长姓郑，为智果寺后舍村人。不久，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郑乡长参加了志愿军，其继任者为我哥哥未来的岳父李文彬。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首任农会主席是四村的袁润泰，是我的大姨夫；副主席是一村的袁润昌。

在 1950 年工作队刚进村时，如我们二村的聂海成，四村的袁润泰，五村的李文彬，七村的张明山等，因为听工作队的话，积极工作，成为村干部，也成为村子里第一批发展的共产党党员。

在工作队及村干部的领导下，封建迷信及社会陋习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中大小神庙（包括小小的土地庙）中的泥塑、木雕神像都没有了，只残留下庙屋。有的古迹，如谢村镇街道上的石牌坊（实为贞节坊），如辕门观的神庙，都被视为封建迷信，被全部破坏（泥塑）或拆除……

抽大烟的、神婆神汉、算命先生、“二流子”等，被拉到大小会上批判、斗争；通奸的男女，只要被抓住，都要进行批斗，或游街示众……

昨日还是农民，今日，却成为了共产党员，成为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我后来曾怀疑，他们的小农经济思想，他们的自私自利，在一夜之间或几个月时间里，就能立马改变？

洋县的镇反运动

县域解放后的一两年内，我（约十岁）曾亲历（“围观”和“半围观”）过四次枪毙“国民党反动派”和“恶霸地主”的事件。

第一次发生在县城。

第二次发生在距离县城西约二十里地的东韩小学操场，枪毙的人有九个。其中一个是我村的“保队副”胡光金。

第三次发生在七眼泉村北，枪毙的有近二十个人。

第四次发生在镇江庵。

我没有亲身参加的镇反事件，就不得而知了。

六陵渡村的清算活动

1950 年，我在胡家庙上过一年学。学校不时会组织我们学生参加控诉、揭发、批判和斗争地主、流氓的大会。

被斗争的人中，有以前曾当过保长的王克忠，有当过保丁的赵明、何水源，还有其他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人。

斗争会开始后，被斗争的对象都要被弄到桌子上跪下，然后由事先安排好的受害者进行揭发、控诉。受害者说到痛苦处，常声泪俱下。在斗争王克忠时，有人拿了一把瓷碗渣，坚持要放在下跪的王克忠的膝盖下。由于工作队员不同意，没有放成。有时，愤怒的村人会一拥而上，揪住斗争对象脚踢拳打，常打得他们无处可躲。如不是工作队员的极力拦挡，肯定会被打死。

受到批斗的几个人，包括两个保丁，虽然曾对农民“张牙舞爪”过，清算活动过后，也都各回自己家里，老实务农去了。

村西的两户地主和一户富农

我家在村西。

在土地改革中，六陵渡村村西（四个自然村，不足百户）共定出两户地主，一户富农。

在两户地主中，一户是王家院的王克明，一户是先生家院的袁崇贤。

王克明，抗日战争时，为赴缅甸作战的远征军中的一员。他是如何当兵的，我不知道。抗战胜利后，他被遣散回到家乡，并带回了一个湖北籍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儿子王耀武。同时，还带回了小老婆的“陪嫁人”张货泉，一个十二三岁的半大小伙子。

除原来家中的田产外，王克明又利用遣散费购买了点田地，平时主要由自己和张货泉经营，只有到了收割季节才雇短工。

到土地改革时，张货泉已十六、七岁，被认为是王克明家的长工。

袁崇贤，其父亲是清朝末年的拔贡，曾任汉中府主管教育的官，人称先生。他有四个儿子，其他三个儿子（袁崇敬、袁崇恭、袁崇直）都有与我年龄相当的两个子女，每家四口人。而袁崇贤，却只有一个女儿，全家三口人。因为这“一人之差”，其他三个兄弟被定为中农，而他，却被定为地主。

定袁崇贤为地主，还有一个原因，他家收留有一个年青人，名叫徐旭。土改工作队认定，徐旭就是“长工”。袁崇贤让徐旭种地，自己则钻研医术，给人看病（以他的医术，只能给人看小病），时不时，也到地里干点活。他家只有三间房，土地改革中分出去一间。

这两户地主，似乎都没有“民愤”。

富农名袁正荣，乳名黑娃，外号“细密客”。他的老伴姓聂名义莲，是我们聂户的姑娘。自小，母亲就让我叫她“义莲姑”。这老两口及其独生儿子袁福顺夫妇，勤俭无比，没明没夜地干活。这情形，在六陵渡村西，人人都知道。袁正荣死后好多年，人们在谈起他时，都说他到谢村镇赶集，一泡尿都要“挟”三四里路，回来尿在自家的田地里。一家人省吃俭用，点滴积累，节俭下来的钱财都用于买田置地。不想解放了，土改定成了富农。

这三户地主、富农，可算得是村子中的能人、勤人。袁崇贤好像以前还当过保长，因为找不到劣迹，镇反运动中，没有动他。在土地改革中，两户地主家多余的土地、粮食和家具都被没收；富农（袁正荣）的地和家产当时没有动。可是，以后也不敢再“富”下去了。

地主和富农，后来都成了“阶级敌人”。

我家的阶级成分

土地改革时，我家只8分地，没有房屋，因受我二爷（中农）的直接影响，我家被定为“下中农”。

为解决我家的“无房问题”，工作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们先是想将老爷庙的前庭分给我家。不知何人提议，我家应由我的二爷分给房子。结果是，由我二爷“分给”我们一间祖屋。这样，二爷与二婆就没有地方住了，由工作队做主，住到聂户家庙中去。同时，二爷二婆还以分家的名义，分给我们两块地和一头牛。

二爷分给我们的房子是两个后半间，面积不足20平方米。门不得不开在屋后，还得在屋外的平地上搭建一个牛圈房，以便晚上和雨天拴牛。

在这样窄小、破旧的房子中，我家一直住了二十一年，直到1972年盖起新房。

干部贪腐的“六陵渡现象”

我的大姨夫名袁润泰，1950年时有四十多岁。他虽然识字不多，但是，与农村众多的文盲比起来，却也算得是个文化人。因此，被工作队看中，被选为六陵渡乡农会主席。

李文彬，是我哥哥的岳丈。李文彬的家境和为人也类似于袁润泰，原先在群众中就有一定威信，再加上工作队的器重，立马就成了乡村中的“人物”。在工作队队长不再兼任乡长时，李文彬就成了乡长。

1953年春天，他们却同时被逮捕了。几十年后，听我的同乡张文岐说，他们那时“犯事”的原因是，利用职权，将自家的土地“以多量少”和“以好充次”，地少了，地的等级低了，家里就可以占到点便宜。

他们的继任者是张明山（任党支部书记）、袁忠记（任村长）、胡志锐（任会计）。他们在相当长时期里，利用村里给辕门观粮站加工大米的机会，往大米中加水或掺砂子，以贪污多出来的粮食。1957年，被定为“坏分子”。

他们的继任者是焦正歧（新任书记）。他在1961年，因贪污而下台，也被戴上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

自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初，六陵渡村的三任领导，都“烂”掉了。

我把这称为“六陵渡现象”。

第3章农民失去了土地

中国是“半封建”？

以一个村子，可以看到全国。

到1949年时，六陵渡村的二百户农民，家家都有土地。我家最穷，没有房屋，却也有一点土地。

我曾祖聂自重的土地，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的土地，又分给了“儿子的儿子”。这么几经分家，大块地就变成了小块地，小块地就变成了更小的地块。我家在程家坡村北边，曾有一块不足10平方米的塘田。

我的二爷有十几块田地。在多数地块里，都长着一棵或两棵直径三、四十厘米的桑树。距汉水边不远处的一块地的地角（路边），长有一棵直径约40~50厘米的桑树。因有此树，村人们把那片地方称为“大桑树下”。

这说明，我的二爷经营这些地块的时间已经很久。

据说，几千年来，因为各种原因，中国人被大规模杀死过不下十余次。人口在某个地区的灭绝，土地必然荒芜，后来，又有其他人来种植。

显然，秦朝以前“诸侯分封”形成的“封建”制度，不可能越过秦朝的郡县制，而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中国农村，乃至全中国，其政治制度叫什么都可以探讨，但是，叫“半封建”制，显然是有问题的。

“杀富”难“济贫”

“杀富济贫”能致富？这，连工作队都不相信。最明显的例子是六陵渡四村的王水生一家。

1949年以前，四村的王水生家和我家一样，是村中有名的贫穷户。其实，他们的家道要比我家好许多。我家，母亲是个“活寡妇”，又带着两个孩子，还无房少地，得租居人下。王水生家不同，王水生有木匠手艺，时不时可以给人做木匠活，或做点小家具上街去卖。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两间小房，不必租居人下。土地经营得不好，但是，可以勉强度日。主要是这家两口子都不会算计，有了粮食有了钱，就胡吃乱花，没有了就饿肚子。一年到头，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

解放了，工作队和村干部先是给他们一些救济款，但不几天就坐吃山空了。

有了这个教训，再救济时，不给钱了，直接给粮食，给布匹。粮食是怎么吃的，不知道。但是，布匹的“去向”却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把布撕成几截，往腰里一围，往头上一裹，就算衣服。

许多人说，这种人真是“扶不起来的天子”。

中农袁文治的“没落”

农民如何致富？毛泽东一村干部给开的“药方”是走集体化道路。村干部说，这得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办集体农庄。但是，开始时，还不能办集体农庄，得办互助组。

1951年秋天，包括我家在内的六家人（其它人家有袁文治、孙存德、袁铭绅、袁正明和袁文琪）组建的互助组在六陵渡村首先成立。这个互助组的组长是袁文治，工作队和村人就称其为袁文治互助组。



袁文治（1974年摄）

袁文治，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父亲袁成隆是一个累弯了腰的农民。袁文治在青壮年时，因不愿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躲又不能躲——要从事家里的农业生产，只好忍痛剁掉了自己的右手食指（从上面的照片隐约可以看到）。显然，这是一个靠辛勤劳动才勉强积累到“中农”土地水平的人家。

互助组内，其它人家的情况也和袁文治家相类，只有我们家和袁正明家为下中农。

由于袁文治互助组六户人家的男人都年富力强（年龄20多岁至40岁），勤劳诚实，又有合作精神，故在联合起来的一年多时间里，生产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家家都增了产。

当时，工作队和村干部曾经在村里扶持成立过几个以新发展的共产党员为组长的“贫农组”。但是，他们只是干活在一起，却各想心事。而且，劳动能力有强有弱，一记工分就扯皮，互助不几天就不互助了，只留下了互助组的空名。

袁文治互助组是全乡、全区、全县的第一个互助组。故,作为组长的袁文治曾经在区上、县上“红火”过一阵子,拿回了不少奖状。乡上、区上、县上召开有关互助合作的会议,都请他参加,有时还让他介绍经验。可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他的“中农”身份是要隐去的。

县志记载:1951年冬,本县第一个互助组——贯溪乡金侯村侯东之互助组成立。

袁文治互助组早在1951年秋天就成立了。只因为这是个以中农为组长的互助组,对不上当时的宣传口径,不便于宣传,而被取消了“第一名”。

1953年10月,以袁文治互助组为基础,又成立了六陵渡村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比县志记载的黎明、溢水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成立时间(1954年2月24日、1954年7月22日)要早许多,两个社的社长侯东之等4人,还被选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⁴。可是,红光农业合作社却没有被“记录在案”。

到了1956年,六陵渡村与范坝村合并,联合成立“范坝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袁文治的“带头人”使命就完成了,他就从“政界”永远消失了。

农民都成了“社员”

高级农业社的成立,意味着中国“跑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与初级农业社不同的是,高级农业社是一次“均贫富”——农民入社的“股份”都不再提起,全体社员都只按劳动工分计酬。

高级社的成立,已经奠定了人民公社的建立基础。它只需要换上新的名字,重新组合一下,就成为事实。

1958年,洋县的谢村镇地区,成立的是谢村人民公社。它下辖六陵渡、范坝、谢村、东韩、智果五个生产大队。当时,六陵渡生产大队因为在最东边,被称为东风生产大队。

人民公社宣布成立后,为了体现“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农民手中的最后一块土地——自留地,也被没收归公。原先土地上的坟园被平掉,坟园中的树木被砍光。

从此,中国人再无恒产。无恒产的人,最终都得靠干部摆布。

靠干部,方能活着

失去土地,草芥不如

没有了土地,农民的衣食住行,只能靠干部。

干部强势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明显弱小了。有时,弱小到草芥、猪狗不如。

生产队的食堂,每顿饭就是一种花色,咸甜苦辣,软硬稀稠,都掌握在生产队长的手里。许多人弄不明白,这是吃的自己的饭,还是生产队干部乃至上级干部给施舍的饭?

“吃人家的饭得受人家的管”。生产队长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上工时,你要是走得慢了,或者来迟了一步,都会遭到队长的训斥或咒骂。你说有病,得请准了假才能歇工。生产队长要是说你装病呢?

生产队的干部特别横,张嘴就骂人,动不动就打人。被骂被打者状告无门。到公社、县上去告状,不仅得不到同情,还会遭到训斥。个别人还会“自投罗网”,被关上几天或几个月。

袁文贤遭打——他牵走了自己的牛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我家被划入第二生产队。袁文贤,是袁银娃的儿子。袁银娃死后,母亲改嫁,就留下了他与弟弟相依为命。此时,他的年龄约二十岁。一因不堪忍受生产队干部的欺辱,二因娶不起媳妇,想在北山(秦岭山区)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因此,他有时去了山里,有时又回到本村。这更使生产队干部生厌。

袁文贤还有一个不平:他与父母在土改后,辛苦劳动买来的一条耕牛,在合作化中被无偿地归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现在他去山里给人家当女婿,连一点见面礼都拿不出来。于是他想到了他家的牛。有一天晚上,他从生产队饲养室将那头牛牵走了。

一天晚饭后,我听父亲说,牛被追回来了,袁文贤也被五花大绑押送回来了。

父亲开会回来后说:干部们将袁文贤绑在树上,生产队长聂海成用刚从树上砍下的桑条抽打,一连打断了三根桑条。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袁文贤。

袁崇恭遭打——因为犟嘴

⁴见《洋县志》。

1959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开会，队长聂海成突然指责袁崇恭不上工，在家里干私活。

袁崇恭辩解说：“我感冒了，是请了假的。”

“有病还帮你老婆卷布？！”聂树轩说。

“这是轻活，搭个手么。”袁崇恭辩解。

“日你妈，你还敢犟嘴！”

大队党支部委员聂四德（聂海成的弟弟）对袁崇恭敢于与他二哥犟嘴很是不满，边说边趋身上前，噼噼啪啪就给了袁崇恭几个耳光。

此时，聂海成的堂弟聂树轩也冲上前去，准备拳脚相加。

袁崇恭的本家人赶快上前阻挡，对聂四德和聂树轩下话说：

“你们甭生气，别上火。”

袁崇恭再也不敢说话了。

坚持最久的农民——“单干户”

六陵渡村的“单干户”在十队，姓焦。无论干部如何动员，他就是不入社，既不入初级社，也不入高级社，更不入人民公社。因为当时政策的明面说法是“入社自愿”。

在共产党的高压政策下，单干户之所以能长期“单干”下去，是因为他们有“单干”的资本。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他们的儿子在1950、1951年先后参加了军，后来，都“战死”在朝鲜战场。单干户的门上就挂着两面“光荣烈属”的木牌。那老两口在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年龄约五十岁。

1950年后，能当兵的人家，都是贫下中农。

他们的女儿叫改琴，年龄与我相当。我在1951、1952年曾同她一起在辕门观一带放过牛。这个女孩在1956年前后，得病死去了。

原本子女双全的老人，突然失去了子女，悲痛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

对于其他人家说来，不入社，就是天大的事情，就是罪行。可是，对于“单干户”说来，谁能治他的罪！

这“单干户”在洋县可能就此一家，因此远近闻名。因为都称其为“单干户”，他们的姓名就被人“忽略”了。

单干着，自种着，自收着，自用着。比起其他入了社的人家来，自由自在多了，富裕多了，日子好过多了。

农民入了社，都改叫社员。“单干户”没有入社，仍然叫农民。

“单干户”一直没有入社，直到上世纪70年代去世。他们可能是中国最晚死的“农民”。

上世纪80年代初，“单干户”的一个儿子“复活”了，回家来了。据说，他在朝鲜战场并没有被打死，而是被俘虏了。他被遣送回国以后，就被安排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一直到1980年代。

第4章 小学、初中时代

坚持上三年级

1949年前，六陵渡村没有办过统一的村学。我的启蒙教育在坡坡上的老爷庙，教书先生是袁崇敬。我在这所学校只背完了一本《三字经》。

1950年，我在胡家庙读过一年书。后来，因为要放牛，就辍学了。

1952年底合作化，耕牛入社，我才有上学的机会。

1953年春节后开学时，我坚持上了三年级。

上小学时，每天是早晨不洗脸不吃饭就去上学；到约10点钟的时候，才放学回家吃早饭。下午放学的时间也与农村吃午饭时间同步，约在下午3~4点钟。吃过午饭，下午不上学，得参加农业劳动。专门的家庭作业时间是没有的，只能争分夺秒，利用一切可能，抽空作。为了做作业，有时会误了农活，就要挨父亲的训斥。晚上当然是可以做作业的，但我的窄小的家庭，没有摆放作业本的地方。而且，那时，无钱买灯油。这种情况，在我上小学、中学时都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家穷，冬天没有棉鞋棉裤，上身的棉衣也因为薄，常常冻得直打哆嗦。

初上三年级，我刻苦努力，终算没有落伍。期末考试，在60多个学生中，我得第21名。袁文杰老师在假期给学生们送通知时，对我母亲说：“聂树人学习努力，原本只能挑70斤的力气，却挑了100斤的担子，在全班得21名，不容易！”

考上了智果中学

当时的农民，以当干部、当工人，吃“官饭”为荣。我小学毕业后的出路有三：上初中，上师范，回家种地。回家种地不用选择，因为本来就是农民么！上初中，得要漫长的三年时间，得苦挣苦斗。不少人坚持不下去，退学了。

能尽早参加工作的途径只有一条——投考师范（实际是幼师）。可是，经过三天三夜，奔波300多里路，去西乡县，去城固县，最后又不得不回洋县。因为西乡县师范和城固县师范不招录外县学生。

最后，我们第二生产队的四个学生都考上了智果中学。

借灶做饭的时日

家穷，又因为本队人聂致庆的捣鬼，我没有考上助学金，没钱在学校上伙吃饭。

我不得不在校外人家借锅灶做饭。

由于学校只吃两顿饭，到早饭和晚饭放学时，农民已经吃过饭了，学生正好可以利用人家吃饭的空档借人家的锅做饭。

借灶的租用费是，一个月给人家一角钱，给人家水缸里挑满水。这样，每周星期天下午去学校时，我就得挑着柴草、粮食和蔬菜。放学后，就得立即去做饭的地方，生火煮饭。在煮饭的空档，赶紧去井里挑水。待水挑够了，就赶紧吃饭，洗锅。然后，再急急赶到学校上课。

现在想起那年月的艰苦来，真是头皮发麻。我实在不敢想象我是怎样一天又一天、一顿饭又一顿饭地挨过来的。

我成了批判对象

在1957年下半年，我遭到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挫折。

在反右斗争的余波中，一天下午上课前，我不知天高地厚，与其它一个同学在黑板上乱写乱画。当时，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漫画，下写“浮上水者的下场”。这画刚刚画完，就听有人喊“老师来了！”其他同学抢到黑板擦，将他画的画擦掉了，到我要擦时，已经来不及了。

老师进了教室后，看到了这幅漫画。

画面的大体样子我还记得：一个趾高气扬的人正在向悬崖陡壁的边缘走去，一个弯腰俯身、伸出长长舌头舔拭其屁股的人则紧随其后。从前面那个人只瞧天不瞧地的样子看，下一步，就要跌入万丈深渊……

漫画的针对性是显然的，马上就有人（如李天鼎同学）“对号入座”了。它既得罪了“积极分子”，也得罪了班、团的干部。

当时担任我班班主任的王俊明老师，因为上半年任三乙班班主任时，那个班“学生闹事”而受到牵连，他就成了惊弓之鸟，怕再犯政治错误。他立即召开班会，对我进行批判。

此后几十年间，我再没有画过一幅漫画，画技（如果可以妄称为画技的话）和激情肯定不如从前。我有时想，要是当时我的这幅漫画不被当作毒草批判，要是我坚持着画下去，或许，我后来会成为一个不算蹩脚的画家；当时，要是有人深追我画这幅漫画的动机，依据“反右斗争”的逻辑，我很可能被逐出校园。

不幸的是，我并没有从这次班会中吸取应有的教训。那时的我，对于从这年的上半年开始的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一点儿也不了解，根本不知道中国有50多万（有人说有100多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们的数以百万计的亲朋也因此而遭了殃。

到铁河去炼铁

据洋县县志记载：

10月11日，县委、县人委抽调3.8万多名农村青壮年劳力，组成“钢铁师”，开赴本县秧田、铁河人民公社及镇巴县“大炼钢铁”。至次年6月，炼烧结铁3.54万吨。因农村严重缺少劳力，造成粮食减产25%。

我也成了“钢铁师”的一员，与同学一起，奔赴铁河。我的父亲则远赴镇巴县鱼渡坝“炼铁”。

那时的洋县，没有一个内行。烧出铁渣，就认为是炼出了烧结铁。十几个人抬着铁渣，走上百里路，去向县委报喜。

为筑土高炉，我们挖土、挑运土、往高炉上送土、夯实，加班加点地苦干，干的都是重体力活。每天三顿饭，每顿4两米饭，一碗野菜汤，十几岁的娃娃，饥饿难耐。为了能填填虚空的肚子，大家不得不自己想点办法：在收工回驻地的时候，不走路，专门走山坡地。边走边捡吃的。可吃的东西有二，一是残留在黄豆地里的黄豆，二是残留在洋芋地里的洋芋。生黄豆粒吃在嘴里，初时觉得有一股

豆腥味。但是，吃惯了就不觉得了，还觉得另有一股香味。黄豆的营养好，但是，毕竟不多，一次能捡到二三十粒就算是大有收获。残留的洋芋在土面以下，好在，这时它们都有一个芽长出了地面，只要看到小小的洋芋叶子，用手往下一掏，保管会掏出一个洋芋来。残留的洋芋一般不大，直径约二三厘米。掏出来的洋芋不能马上吃，它上面粘有泥土，得洗净了才能入口。于是，我们就先将它们装在衣袋中，待走到水边时就立即洗净，急不可耐地放进口中“喀嚓”起来。这时的洋芋并不麻，淀粉也没有了，好象稍有一点甜味儿。有时候，经不住饿肚子的催促，从地里掏出来后，随便一擦，就送入嘴里。

最后，想炼铁也炼不成了，我们驻地所在的一面大山，我们刚到时，山坡上的树密密森森地，和原始森林差不多。但是，到我们离开时，山上的树被砍得一棵不剩，连两三厘米的小树也没有了，整座山已经变得光秃秃地。远处的山虽然还没有遭难，但要将那么多的树砍伐后运过来，困难就大了。

“余粮户”和“缺粮户”

在大炼钢铁时，听说家乡农村“吃饭不要钱”，可以放开肚皮吃。

1958年底，我从铁河回到家乡，农村确实是“吃饭不要钱”的集体食堂。但是，这食堂并不如人们所传的那样神奇，它按时开饭，赶不上这顿就只能等下顿。我原想，集体食堂里会对我这个从远道回来的饥肠辘辘的学生好好招待一顿，让我有一次饱胀的感觉。可是，我到了食堂，没有人问饥问饱，只有我的在生产队大场干活的母亲一看我回来，就急急忙忙和我一道回到家里，从一个黑墙洞里取出一个小陶罐，从里面倒出了仅有的一点粮食，给我做了一点稀饭，使我暂时不饿而已。

吃饭“不要钱”是事实，那是因为农民手里没有钱！包括土地、农具在内的农民的生产资料都入了人民公社，充了大公。“一大二公”的公社不给农民发工资，农民手里哪来的钱？连一厘一毫自留地都没有保留的农民，更谈不上去市场进行商品交换，而没有商品交换又哪来的钱？

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是万岁爷，他“腰包”里的钱也是从子民腰包里掏走的。因此，如同几千年来的事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即使齐声喊上一千句“万岁”，九扣八拜，说上一万句感谢的话，大救星、万岁爷既不会也不可能给全国的农民掏饭钱，把全国八亿农民大爷白白养活起来。农民在集体食堂吃饭的钱，最后还是要农民自己出，按工分计算，进行余缺找补。

由此，汉语的语汇中就出现了“余粮户”和“缺粮户”的新名词。所谓余粮户或缺粮户，并不是说，家里粮食有余或缺少，而是指一家人挣的劳动工分折算的钱，能不能抵消掉一家人吃饭的支出。二者相减后，如果有余钱，这家人就是“余粮户”，否则就是“缺粮户”。这缺的钱是要还的，不能赖账，一年一年往下扣，迟早要还清。

1958年底至1959年，生产队里还有一点家底，家民家里还有一点家底。因此，人们只是饥饿，还没有达到饥荒的程度。随着家底的消失，随着浮夸风越来越强的吹拂，绝大多数农民就到了油干捻尽的绝境。于是，1960年以后饿死人和浮肿就“水到渠成”。

初三班主任：永远有理

中考前夕，曾进行过两次志愿填报。头一次，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发生的，即只能按组织的号令填报：

第一志愿：高中；

第二志愿：师范；

第三志愿：中专。

对此，大家心里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谁愿意被人在“组织意见”栏中写上“不听党的话”、“不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之类的话呢？

这“志愿表”连同其它材料报上去后，县上却为难了：大家都这样填，录取工作怎么进行？

不知在何组织的干预下，我们终于有了第二次填报志愿的机会。如墨索里尼⁵一样，班主任赵中和老师是“永远有理”的。这一次，他说得仍然振振有词：过去的填报并没有错；现在，为了更好地响应党的号召，让组织有更多的挑选余地，可以按大家自己的想法填报志愿。于是，我的第一志愿就改成了西安地质学校，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现在已记不清了。其中，好象有“上海水产学校”。

⁵记得早年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有一句话：“墨索里尼，永远有理！”

在“愿意服从分配否”栏内，记得我填报的是“洋县二中”。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已填报的三个中专都不录取，就只有上高中一条路可走了。我的估计是，报高中的人少，报智果高中的人更少。万不得已，必须上高中的话，也不能到县城去上，路远为次因，花费大才是根本。最大的可能是，即使考上高中，我也不会上。



初中毕业时的照片

前排左起：王俊明老师、×××、李天鼎、王仁德、的云老师、赵黑女、庞菊屏、陈桂明、×××老师、龙明玉（？）、王文吉、史汉兴、陈树枝、赵中和老师。

第二排左起：×××老师、×××老师、马志远老师、张体贵老师、王洪文老师、庞维翰老师、张敬超老师（校长）、×××（副校长）、谢世德老师（副教导主任）、白××老师、×××老师、杨鸿文老师、×××老师、冯先知老师。

第三排左起：×××、罗庆德老师、袁慰老师、谭钢鉴老师、侯惟常、白振汉、聂茂荣、纪鸿业、张必胜、聂致庆、×××老师、宋继殷老师、岳忠生（工人）、谷天正老师。

第四排：杨建中、赵理成、全文屏、王若文、岳芝兰、刘菊娥、韩全娥、杨兰如、赵金荷、岳文芳、×××、陈文珍、冯锦仁、余文秀、方文玉。

第五排左起：×××、赵春理、王汉卿、×××、白英、王向华、陈复兴、潘兆中、聂树人、张文歧、解斌生、杜冰德、刘元福、荀耀旭。

（内缺孟义儒、王大新）



我在 1959 年初中毕业时的照片

（小学毕业时，曾照过一次标准相和全班同学的合照。但是，那“标准相”照片丢了。这是我现存的最早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我穿着老粗布衣服）

一道题，改变命运

我以全地区总分第一，数学全省第一，被录取到洋县二中。

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中考数学时的前一天傍晚，同班的王大新和我在一起复习《平面几何》。当我们复习到课本末页上的最后一道综合题时，两个人都难住了。这是一道证明题，我们利用所学，左证右证，就是证明不出来。去问教我们几何的宋继殷老师，他看了一会，也没解。他最后的意见是：“这种难题怪题，考试时一般不会出的。况且，课本上的题不会就照搬到考卷上的。”

可是，我不甘心。整本书上的题我都做下来了，唯独最后一道题做不出来，这不正常。即使考卷中没有这道题，我不会做，这也将是人生中的一大缺憾——说明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初中毕业生。

王大新离开了。我一个人坐在柏树下，在地上画图，反复剖析。大约半个小时后，脑子里突然有一道亮光闪过——需要作一条辅助线！天已经黑了，可是这条发光的辅助线却照耀着我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以大地为纸，做完了这道题。

晚上睡觉时，睡在双层床上面的王大新问我：

“那道题你解开了吗？”

“解开了。”

可是，无论我怎么讲解，他也没有听明白：那条辅助线应该怎么划？

“明天早晨再给我说吧。”

第二天早晨起来，洗脸，吃饭，进考场，大家都很紧张。对那道题，他没有问我，我也忘得一干二净。

那年，数学题特别多，在三张8k纸上，印得满满的。我从第一道题做起，一刻不停地做。做到最后一道题时，一字不差地赫然出现了那道题。我兴奋至极，不用思考就快速写上了求证的过程和结果。

当我想回过头来再检查一遍答题结果时，下场的铃声就刺耳地响了起来。

走出考场后，王大新后悔得直跺脚：“这真是命啊！”

不过，他还是考中了汉中卫校，毕业后分回洋县医院工作。

或许，就因为这道题，改变了我的人生：原来，我行！

这一结果也表明，诚实对待人生中每件事的重要性。全省教这门课的老师，全省的考生，应该都没有注意到这道题，使我这个农村考生得以拔得头筹。

村人们并不看重全省第一、全地区第一。考个全县第一就不简单了。于是，村里的孩子们见了我，跟在屁股后面直喊“全县第一！”

第5章 同全国的高中生竞争

进山打柴

一根打柴尖担，碾压着我，走完了小学、走完了初中，又走完了高中之路。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乡的农民不仅粮食不够吃，也缺柴烧。

为了能得到上学的资格，我必须拼命地劳动。我在小学和中学上学期间，最主要的劳动就是进南山打柴。

我第一次渡过汉水，进南山打柴，是在1953底，时年12岁。

从1955年底开始，我开始扛起尖担进山打柴。

冬天，温度低到摄氏零下几度，也得穿着单裤薄袄，光脚穿着草鞋，瑟瑟发抖地赶到渡口，过船，然后，向南山进发。衣着单薄，为的是担上柴担后，不要脱衣服，减轻负担。一双新布鞋，进一趟山就磨损许多。而草鞋是自己或家人利用闲暇时间编织的，穿上轻便。至于冷得直流清鼻涕，那就不能顾及了。

困难时期进山打柴，肚子也是吃不饱的，而且吃的大部分是糠菜饭。我带的干粮常是糠菜饼子和胡萝卜。单吃糠菜饼子是难以下咽的。在深山的山梁、山坡上不会有水。带上点煮熟的红萝卜，它既可以充饥，又能当糠菜饼下咽的“润滑剂”。这“滋味”，经历过的人，谁也不堪回顾；没有经历过的人，大概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糠菜饼子”，那是什么“糠”？它根本就不是米皮，而是碾了、磨了几遍的稻谷的硬壳子粉！

打柴，与打柴之后的疲劳，是经常的。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每逢我进山打柴，特别是进深山捡干柴，要钻刺架窝，要山上山下跑，手扎了刺，脚、腿、脸划破了……回到家里或赶到学校，晚上睡下，浑身就如瘫痪一般，伤口火辣辣地痛。这种状况一般要持续一两天至两三天。

然而，刚刚恢复过来，又得进山打柴了！

我只能咬紧牙关，不断地说着阿Q说过的和没有说过的话：“乌云过去就是晴天”、“困难可以克服”等等，来自我鼓励；用自己的双脚去一寸一寸地趟布满碎石和棘刺的道路。

在绝境中，我不能坐下来嚎啕！因为既没有人听这嚎啕，更没有会伸出援助之手。

我的非学习时间

除了给家里、给学校砍柴、担柴外，我还要从事其他许多劳动。例如，除正常假期外，中间还要放夏忙假、秋忙假，每次大约有半个月时间。此外，还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班上组织的劳动，还要参加学校每年一度的招生工作，参加省委号召的每人利用“八边地”至少种十棵菜、要经常管护，还要每周打扫卫生、争一次循环红旗，还要给学校打院墙，还要参加各种比赛，等等等。

每逢干旱或雨淋，我们学生就成了县委、公社动用的主力。比如，1960年9~10月，天下大雨，连续不断。水稻眼看要烂在田里，收不回来。县委、公社一号召，我们学生立即出动。我们冒雨打谷子，冒雨往生产队运输……一干就是一礼拜左右。

我依1961年5月16日至1962年5月11日的日记为据，统计出来的我的非学习时间：

1、给家、给学校担柴和劳动41天；放假（寒暑假、忙假，均为劳动时间）94天；参加学校公益性活动（包括常规的政治学习时间，一周至少半天）若干天。总计146.5天。

2、其它未进山担柴的星期天（如雨天）和其它节假日当在30天以上。

每周必有的和随机的政治活动时间，是雷打不动的。在政治第一的社会里，学生的学习始终是第二位的。

事实上，非学习时间要超过总时间的一半！

为了与命运抗争，在剩下的一百多天时间中，我就得拚命与时间赛跑。上课、吃饭、走路、入厕（上厕所也要看书），暗夜，都成了我学习的时间。

我的家离学校只有十几里路，不算远。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并没有闲着，书包里装着书本，要将一周里老师所讲过的课程复习一遍。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

为父母亲“省饭”

上高中后，我的助学金最高，每月4元。粮油关系也被转到学校，吃上了商品粮。因此，我才能在饥荒年代，挺过艰难。

半斤粮食的饭加上4分钱的菜，就是我们的一顿饭。一天两顿。极少能见到油，更谈不上肉。对于正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来说，营养和热量是绝对不够的，我的肚子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父母亲也知道这一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把好些的饭菜放到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做。家境好的学生或山区的学生，在到校时，都会带上些零食。

自1961年集体食堂解散之后，生产队分给社员的粮食很少，尽管“瓜菜代”着，“糠菜”吃着，也还是经常断顿，没有粮食下锅。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使父母亲吃上点粮食，我就在自己的饭食上动起脑筋来。每个星期天下午从家里走时，我都要带上一瓦罐野菜。每顿吃饭时，我就多吃菜，少吃饭，留下一疙瘩饭。怕上顿留下的饭放坏了，下顿饭时，我就吃掉上顿留下的，再留下新饭。这样，积累两天半，我就可以节余下一碗饭。到了星期三开晚饭时，我不吃那碗饭，将它倒在瓦罐中，全部带回家。回家后，母亲倒一碗米饭在菜锅中，好几天没有见到粮食的全家人就可以见到粮食了。

我急急地吃点饭，再带上母亲事先准备好的一瓦罐野菜，又急急地赶到学校里去。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要在田间小道上跑26里多路，还要吃一顿饭。那时候，老师管得严，上自习时都要点名，迟到了会受到批评。

从星期四开始，我又将上述过程重复一遍，在星期六下午回家时，再给家里带回一斤米的米饭。同时，因为星期天我们不在学校吃饭，还可以从大灶上秤回一斤大米。这样，家里人就能经常见到粮食了。

我的微薄的努力虽然不能解决家里人的饥饿难题，但是，在那多一口饭就可以活命的日子里，浮肿了的父亲没有被饿死，母亲和妹妹没有倒下，或许也与此有关。

为了能维持这一过程，父亲和妹妹就得天天去田野里挖野菜，使我的菜罐能及时装满。

吃长满腻虫的萝卜英子

为了充饥度命，我的父母早就在寻找能吃的东西：米糠、稗子、秕稻、藕筋、荸荠、玉米芯、红苕藤叶、干枯菜叶、萝卜缨子、蕨根、各种野菜及能下咽的野草、榆树皮……这其中的有些东西，过去是连猪都不吃的，现在却成了我们的活命物质。在初冬和冬季，一家人吃得最多的是晒干的和没有晒干的红、白萝卜缨子，荒地沟坎上的狗尾巴草。

“集体食堂”解散之后，生产队按人头给每家分了些许自留地。我家的自留地大约有两分多地，为了填饱肚子，父母亲就都种了菜。我家很少种白菜，而种萝卜可以既得萝卜又得萝卜英子。每到秋末收获时节，父母亲将萝卜挖出后，将英子切下，水洗后入锅烫一下，再搭在绳子上晾晒干，用绳捆起，挂在屋内高处保存待用。

那时候种庄稼不大用农药。因此，红、白萝卜英子上往往生有许多腻虫。简单地水洗和煮烫是不能去除的。萝卜英子在平常年份是用来喂猪的猪菜，现在却成了全家人的主食。不过，这种菜最好是炒着吃，不要泡汤。因为一泡汤，干死的腻虫就漂了起来，浮在汤面上，很煞风景。如果遇到这情况，我就闭着眼睛先喝干汤，然后再吃菜。

换林小大被饿死

1961年冬天，我的换林小大饿死了。

便秘，是那时中国的流行病。它如同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流行性感冒，席卷全国，以糠菜、树皮、观音土等为“主食”，是这种病的直接病因。病史学专著中好象并没有记录下如下的事实：60年代初，世界的中国一角曾爆发过一场空前绝后的便秘，波及人口略低于六亿五千万；这种“流行病”很严重，吃泄药难以治好，治这种病最有效手段是灌肠。

我的换林小大与我家只隔着一堵墙，他灌肠的事我知道。只是因为在星期天，我没有亲眼看到。在我的印象中，他在临死前，好象灌过几次肠。他的女人与他离婚后，他就带着大儿子黑娃一起过。为了给孩子多吃点粮食，他就不得多吃糠菜，于是，死神的黑手就伸向了他。

我们家之所以没有发生严重的便秘，是因为母亲在以碎糠为食时，在其中加了更多的菜蔬。

那时，村中新坟迭起，人们对死亡已经见怪不怪，对死人伤痛的神经已经麻木。

此时，我的父亲也浮肿了！我默祷死亡不要发生在他的身上。

火余照我读

我上的这个中学是一所被水田包围着的农村中学，交通不便。在我上中学的六年中，没见哪个教员骑过自行车。来自远方（比如关中）的教员，一学期回一次家；县城及附近的教员，与学生一样，一星期回一次家。有能耐的教员，大都留在了县城中学。

因此，教育质量不要说与大城市比，就是与县城中学比，也差了一大截。而且，越落后，政治活动越多。

为了不跌入深渊，我必须解决学习途中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和障碍。在农业劳动和政治运动之余，我就成了手不释卷的人。

多年中，我养成了一些“坏毛病”：上茅房，手不释卷；边吃饭，边看书。

在干活时，我的脑子中也在想着学习上的难题，或者“口中念念有词”——背诵俄语单词或课文。

人的一生只是一个“不断到达”的过程。几经思考和探索，我终于找到了利用暗夜读书的办法：晚饭后，坐在灶前，将三四根柴棍伸进灶内，灶内的火灰会将柴棍的头部点燃。我轮流着抽出柴棍，将柴棍头靠近书面，借着它的亮光看书、复习、思考。由于火余发出的光度有限，只有将火头凑近书本时，才能看清字迹。为了能使光亮强而持久，我就得不断地往火头上吹气。一根柴棍的火头不行了，我就把它再伸进灶内的灰烬中，把另一根抽出来。

暗夜中的这点火星，照亮了我的人生。尽管火星的微光之外就是黑暗，但是，我看到的，却光明灿烂。不管怎样，我都要竭力不让我考取大学的理想搁浅和褪色。

作文风波

洋县县志记载：

1960年11月，全县对大肉、蛋类、食糖、煤油实行控制供应。控制的对象首先是农村，农村供销社里不再给农民供应煤油。

市场不供应煤油，农民又没有一星半点植物油，到了晚上就只黑摸。因为看不见，干活就难免出错。一天晚上，父亲原本是要往锅里倒水的，却将水倒在了锅台外。他因此而发起牢骚：

“世道怎么变成了这样，连点灯的油都没有了！”

我们班上，一位叫陈树枝的同学就曾引述过社会上的一种说法：羊肉腥气牛肉绵，猪肉好吃没的钱。

这样一句二混子话，反映的是当时因物质匮乏而致的物价高涨的事实。那时，我就既不嫌羊肉腥气，也不嫌牛肉绵。那时，这两样东西，我是连见都见不到的。可是，这话立即引起了如李天鼎这类同学的大肆围攻，说陈树枝这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我们的大好形势”。看那架势，是绝不与陈树枝善罢甘休的。

语文课堂上，老师要求我们写作文要言之有物，不能编造。于是，我在写作文时，就想反映市场物质贫乏这一现实。但是，我不敢说社会制度不好，我的立意是，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正确对待，要艰苦奋斗，前途就会光明起来。

文章总得有个缘起，这缘起就是父亲发牢骚的话。为了不使这缘起刺激某些人的神经，我将父亲的原话改成了“嗨，没有油点灯，真气人！”

不想，就是这句话仍然引起了一场风波。

李天鼎立即召开团干部会议，说我居心不良、诬蔑大好形势，一定要严肃批判。他并组织人把我的作文用大字抄了下来，准备张贴出去。

这件事曾经成为班上的一件大事，只有我不知道。

然而，李天鼎的险恶用心并没有实现，那张抄好的“大字报”并没有贴出来。批判会后来也流产了。

这件事流产的具体原因我不知道。可以合理推想的惟一原因是，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及时制止。

若干天后，这事才传到我的耳朵中。那时候，语文教员是马志远老师。他对我说，他为此曾批评过李天鼎“不该小题大做”。

政治低分的原因

记得上高二时，一次期中考试，我的政治课考分只有 71 分。要不是我的其它课成绩好，我的总平均分数肯定会上升到 90 分以下。

以前，我的政治课考试成绩都在 80 多分~90 分以上。试想，我当时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千战的优等生，突然间不会应试了，在其它课程仍然保持高分的情况下，政治课成绩一下子下掉了一大截，岂不奇怪？这使我大惑不解。当时，我绝然想不到这与我向庞教导主任“请教”问题有关。

1961 年，因背叛地主家庭而入了党、当了我们中学教导主任的庞维翰老师，这年担任我们班的政治课教员。他在课堂上，号召我们要对党说实话，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可以直言不讳地提出来。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不要怕。说错了也不要紧，他一定给予回答。他回答不了的，可以向上反映，由上级给予回答。提错了也不要紧，保证不会打棍子，戴帽子——因为这是在帮助党。

以庞老师的共产党员干部身份，我对此言信以为真。我相信他说的话是代表党的，我们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对党说实话。

我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报纸和领导讲话中一直说“形势大好，形势越来越好”，可是，为什么老百姓却总是吃不饱，饿肚子，以至有的人饿死了？南山路上的那个饿殍⁶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焕林小大不久前饿死了，我的父亲因营养严重不良浮肿了，我的母亲及妹妹都饿得皮包骨头……

这算什么“形势大好”？

我想不通！于是，就在他第三次号召之后的课后，当他一个人站在他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侧思考的时候，我走了过去，向他提出了上述问题。

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回答得苍白无力，我心里很不服气，但又不能反驳。嘴里只好说：

“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一直到多少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真是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到了极点。这样的问题只要庞维翰老师“认起真来”，上纲上线，往档案里一装，打个漏网右派或反革命，或反动学生，那真是绰绰有余。至今，也不知道我是应该感谢这位政治教员，还是应该恨这位教员，他先是引导我们说真话，在我说了真话之后，虽然没有对我“认起真来”，但是，还是对我进行了惩罚。于是，就有了 71 分的政治课“考试成绩”，算是对我的警告。

大饥荒，大生育

⁶1960 年冬，我在去南山时，碰到一人饿死在路边。旁边，放着他的柴担。

当时统一的政策规定是，集体食堂一律按人头打饭。小孩吃得少，于是小孩多的人家，大人们就能相对吃得多些；而对于小伙子多、没有小孩的人家，大人们就吃得少了。

后来，为了调整一下这种口粮分配上的不公，以使能干活的青壮年人能稍微多吃一点，不至于饿死，在分配中就加进了劳动工分的因素：在总口粮比例中，人头占七，劳动工分占三。即使这样，与劳动工分的因素相比，人头因素所占比重也要高很多，并不能抑制人们多生孩子“多占口粮”的心理。

在农民的一切都被剥夺净尽的时代里，他们吃饱肚子或饿不死的惟一正道就是自家人互相调剂。但是，即使再聪明的人，既不能在一两年里“制造”出老人来，更不愿意“制造”出病弱的家人来。他们自我调剂的唯一途径就是多生小孩。

后来，不吃食堂了，人民公社社员的口粮仍然按人头分。这仍然是一个鼓励多生小孩的政策。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里，生产队里的粮食从种到收都是社员操劳的，但是，当粮食装进生产队的仓库（又称保管室）之后，社员们的作用就完成了，粮食的支配权就与社员无关了。在集体食堂里，锅里下多少米，由生产队长说了算；集体食堂解散后，社员们的口粮肯定是要分给的，民以食为天么！但是，分到农民手中的粮食经浮夸风的反复吹拂，七折八扣之后，就极为有限。具体到生产队，分给多少，什么时候分给，不仅由不得社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不得生产队干部们——得由生产大队的干部们说了算。生产大队干部们则还得听从公社的，县上的，以至省上的指示。

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人与人口的增长就攀上了关系。男人女人都辛勤耕耘，千方百计地想让女人的肚子大起来。于是，到了1963年就有了大收获，经济没有发展，人口却大丰收了。由此，就为我国人口一个世纪的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候，没有人批判马寅初，拼命想多生孩子的是农民自己。

“革命的观念”是“人多势众”，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杀了几千万中国人，也只不过杀了中国人的十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洋枪洋炮怕什么，我们造不出洋枪洋炮，但是我们造得出人，为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要多生些，多养些。被人家杀一批，又前赴后继多生出来另一批，让他们杀不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另一个观念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好办事！于是，中国的人口从1949年时所称的4万万5千万一下子翻了两三翻。

“反对‘三面红旗’”的共青团员

1959年秋上了高中后，又与李天鼎同班。他什么时候成了共青团员，什么时候当上了团支部书记，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只是到了1960年上半年时，我才突然发现了这个“秘密”。

他有他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上了高中后，学校很注重学习成绩，实行的是百分制。月考，期中、期终考，雷打不动。每次考试，我的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始终都是第一名，各科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

这使李天鼎很不舒服，除在背后大造我“走白专道路”的舆论外，继续寻找我的政治问题。因为有了初中受批判的教训，我的行事也很小心。

经历了“作文风波”之后，我曾经发誓，李天鼎当团支部书记，我就不写入团申请书。我要以我的行动表明，我这个“非团”青年要比他这个团员、团支部书记优秀好几倍。我除学习上继续努力外，各方面都拼命往前干，并尽可能与同学老师处理好关系，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大家选我当“三好学生”，选我当班上的体育干事。体育干事，除组织好班上同学的早操、课间操，课外活动。这既是个费时的事儿，也是个露脸的事儿。因为早操、课间操及其他课外活动，带队的都是体育干事。

在我的身边，我常常看到一些人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无情地不断否定自我，谦卑地“搜寻”自己的缺点，无中生有地痛骂自己，以至把自己编造为异类，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本性决定了我难以掉进这可怕的诱惑和陷阱中。我从来都认为，我上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取得做一个正直、有道德、有科学修养的人的资格，最后考上大学。我不会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放下学业，时时想着如何向组织“汇报思想”，更不会顺着团支部书记李天鼎的意思，时时看着他的脸色和动作，“举步维艰”地慢他半步或几步，以自己的“矮”衬托出他的高大和正确。

因此，我根本没有想到入团的问题。

到了高二下半年，班主任陆永德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我不便将我内心所想全盘托出，只是说，等以后再说。他似乎知道我的心思，对我说，有没有入团要求是你的问题，批准不批准是人家的问题。

我明白他的意思后，立即将以前的誓言作废，提笔写了起来。一个小时就写了几大页，每半个月就写一份。到了高三的时候，我的入团申请书不知道写了多少份。

其实，学生们追求“红”，追求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这种“政治身份”，是在执政党氛围的大环境中必然应该发生的事。因为有了这种身份，就有了进入执政者的行列的入场券。有了党、团员的身份，在其它一些方面，也可以得到明显的好处。

我的入团问题，后来引起团委书记高老师的注意。在高三第一学期期终各班上报校级优秀团员名单时，他曾问李天鼎：

“你们团支部为什么不评选聂树人为优秀团员？”

李天鼎的回答是：

“他还不是团员。”

“怎么，他还不是团员？他写过入团申请书吗？”

“写过。”

“你们讨论过吗？”

“没有。”

“为什么？”

“……”

团委书记亲自到班上找人了解有关我的情况。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我听他说：

“我们应该及时把够条件的学生吸收到团组织里来。在我们学校却有这样令人气愤的情况，有的同学一直表现良好，是班上的劳动红旗手，三好学生，班干部，入团申请书也写了一份又一份，码起来有半尺多厚。可班上的团支部就是不考虑和发展这样的同学入团，这是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我曾经期待的“天怒人怨”，在即将高中毕业时方才发生。但是，只引起了“天怒”，并没有引起“人怨”。“人怨”或者有，只因作为百姓的学生人微言轻，又不在其位，难谋其政。真正能起作用的，还是有职有权的顶头上司——团委书记。

后来（1962年5月11日，距高考还有两个月），团支部虽然一致通过了我入团，但是，李天鼎却迟迟不往团委报送材料。

一天，团委书记问我，你的入团问题解决了吗？我说支部会议早就讨论通过了。

又是在团委书记的关照下，团委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才批准了我的入团。并在会议之后，立即用一块小黑板公布了团委的这一决定。



1962年7月20日，高中毕业时全班同学与老师的合影

前排左起：庞菊屏、何文霞、傅素娥、罗汉玉、陈桂明、冯改玲、庞素玉、岳芝兰、罗素琴、陈永康、邓兆善

第二排左起：李德全老师、谭钢鉴老师、罗庆德老师、×××老师、谢世德老师、×××（副校长）、白明俊（主持工作副校长）、卢炎德（总务主任）、陆永德老师、张登发老师、杨鸿文老师、宋继殷老师、马志远老师

第三排左起：王俊明老师、方文玉、陈自强、梁德存、魏崇玉、傅乾德、朱自琦、杨德喜、史汉声、龙文海、李文柄

第四排左起：李中和、张宝杰、赵太善、聂树人、李天鼎、王乔娃、×××、高继明、王文吉、王汉卿、陈树枝

（缺纪建福）

更为不幸的是，在我的入团志愿书中，团支部书记李天鼎“郑重地”签写上了这样一句话“该同志在上初中时，曾反对三面红旗”。

报考北大，是我的第三志愿

当时，大学分为三大类（文科、理工科、农医科），各类学校的考试科目是不一样的。

与陆老师（班主任，外语教员）相商，第一张报考志愿表变成了如下的样子：

- 1、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测量与找矿专业；
- 2、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发动机系、现代物理系；
- 3、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 4、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金属及非金属地球物理勘探专业；
- 5、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勘探系；
- 6、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质专业；
- 7、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机械制造工艺及其设备专业；
- 8、天津大学机械制造工程系。

第二张表（略）。

现在，用行家的眼光看我填报的大学志愿顺序，没有一个人不摇头的。但是，这就是那时的我——一个对世间大事一窍不通的“社盲”。

穿着草鞋进西安

1962年8月28日早晨，告别了乡亲，由哥哥、继有表兄和父亲相送，我就起程了。走到辕门观，我让父亲返回。他转身的时候，在用手擦眼睛。

我和哥哥、表兄步行30多里路，涉过湑水河，方到达邻县城固县城。城固距汉中70里路，通汽车。我和送我的哥哥、表兄在到达汽车站前，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



赴京送行留念

（1962年8月28日，赴京时，哥哥聂保全、表兄袁春吉送行，在城固县照相馆的留影）

第二天一大早，坐的是大轿车，在沙土路面上颠簸300多里后，下午才到达阳平关火车站，然后，又排队买票，上火车。这都是我的第一次。

到达西安站后要将我持的慢车票“加快”。当我在火车站广场上排队等待“加快”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对着我所在的方向招手：

“过来，过来！”

我并不认识他，以为他是在招呼旁边的人。我用疑惑的眼光往旁边看了看，又回过头来看他。

他以为我在装傻，就生气地指着我说：

“看谁？叫你呢！”

当时，我对权势圈子里的规则一窍不通。猥琐，迷茫，怕官，在这原本不属于自己陌生的地盘上，就毫无遮拦地显现了出来。

那人约 40 多岁，一身便装，穿着普通，又没佩戴任何公务标志。如果以法制眼光来看待他，我当时完全可以不理会他，或者请他出示执法证件。但是，那时是 1962 年，对于我这个“进了大观园”的乡下人来说，只有服从的份儿。

我从地下提起我的那个土得掉渣儿的灰布提包和用一块用黑油布包着的被卷子，走到那人的面前。

“你到哪儿去？”

“北京。”

“北京？！”

……

“到北京去干什么？”

“上学。”

“上学？！”

他用带有数不清“问号”和“感叹号”的目光将我重又上下打量了一遍，问：

“有学生证吗？”

“没有。”

“没有学生证，你去上什么学？”

“我刚考上。”

“那你的录取通知书呢？”

我从贴身的衣兜里取出来，递了过去。

当他展看了录取通知书后，原先脸皮上紧缩的纹路立时改变了方向，双手将录取通知书还给我，并说：

“好，没事了！你装好，快排队去吧！”

他并要过来帮我拿包，我谢绝了。

当我又进入人群中时，看看自己的装束，再看看别人的装束，我才意识到，那人是把我当成“盲流”了。在这长长的队列里，只有我穿着草鞋，与其它人的皮鞋、布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仅我提着的那个土布提包“显眼”，用黑油布（由于长途跋涉，上面已沾着不少土）包着的被卷儿，再用草绳在中间一捆，也很“与众不同”——整个一个逃荒要饭的主儿，整体形象连“盲流”都不如！

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大约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一些农民迫于农村生活的艰难，逃离家乡，到城市和边远地区的工矿企业“打工”，其中的一部分人因为有亲友相助，被招了工；一部分人只能干临时工；大部分人则在东流西窜几次后，只好打道回家。由于这些人的行动主要靠民工间的言传，没有固定的方向，很像无头苍蝇瞎撞。于是就有了“盲流”的称呼。他们应当是新中国最早一代的打工者。

为了对付这些流民，1961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将那些没有开具介绍信而流入城市的农民收容起来遣送回原籍。为了贯彻这一政策，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收容遣送的大网，在“盲流”严重的地方，荷枪实弹的民兵对饿得走不动路的农民进行围追堵截……

踏着阶级斗争的旋律上大学

我是伴着阶级斗争的主旋律上的大学。

直到文革以前，我对国境以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我从经过严格审定的教科书和极为有限的书报杂志中和主席台上、讲台上得到的社会知识是：当今的中国人民与旧社会相比，无比幸福——过去生活在地狱里，现今生活地天堂上；当今的中国人民与国境以外的人相比，也同样是无比幸福的，国外的人，除少数资本家、剥削者外，绝大多数都在遭受苦难：吃不饱，穿不暖，住贫民窟，没有一点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大神们是无比伟大、英明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为此而感到幸福、自豪。以至有的人，常常为此激动得热泪盈眶。

1962 年 9 月 29 日，我们入大学还不到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就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会议于那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多次讲话。讲话中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党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因为有阶级斗争，所以才要服从，才要神化的权威，才要“六亲不认”。

史汉声成了“马汉声”

史汉声，家庭出身地主，在高中三年中一直担任我班劳动委员。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同学对他从来没有另眼相看过。但是，从其父母遭遇即可想到自己未来的他，从来都是心事重重的，对政治进步和学业格外看重。为了取得这“往前排”的资格，他得在政治进步上刻意认真，他先于我成了团员。但是，因为他在政治进步问题上消耗掉了过多的精力，学业上就难免沦为二流，高考落榜。

几十年后，我方从其村人的口中得知，他回到农村后，不要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连媳妇也找不上。超大龄过后，不得不入赘一马姓人家，改姓为马，称马汉声。

一个连“姓”都不得不改掉的人，过日子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潦倒大半生之后，他的儿子不堪在农村受辱，借打工之机在新疆扎下了根。花甲之年的“马汉声”，终于告别了心酸的故土，去新疆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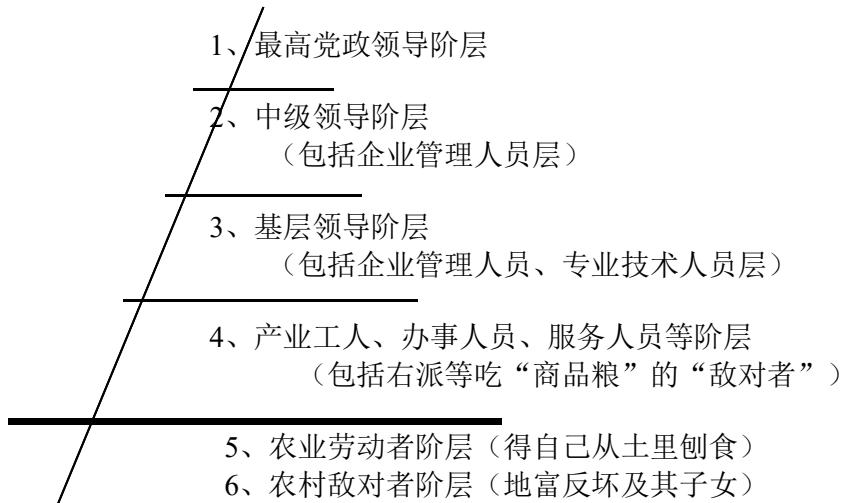
出身不好的同学如此，出身好的又如何？1974年，我从县城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我的高中同班魏崇玉。当时，他已经完全是一个农民了，他正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他的自行车的后架上分放着两个麻袋，据他说，里面装的是喂猪用的榆树叶子。他说，为了筹措给父亲看病的钱，他赶了二十多里路到县城里来想把它卖掉。可是，没有人问津，只好.....我的估计是，即使那两袋树叶子卖出手，也卖不了多少钱，顶多两三元。

他还说：“我们分别十几年了，你现在在天上，我是在地下。今天碰到你，很不好意思。我现在落拓到这个样子，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可是，没有办法。回到农村，“朝里”没人，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会有人赏识你，如同牛掉进了井里。一切的一切，与当年县委和学校领导说的，风马牛不相及，与我们当年想的有天壤之别.....”

第6章 大学生涯

我们年级没有一名党员

我在文革中，总结出的“权势金字塔”如下。



现在，入了大学的我，已经确定无疑地越过了“金字塔”下部那根决定中国大多数人命运的粗线，而站到了吃皇粮的人们之中。使命注定，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只要不出现意外，我还会“更上一层楼”，向塔腰再进一步。

大学五个班只配备一名政工干部，叫刘和林，其头衔为“政治辅导员”。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刘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参加革命，以干部身份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到地质学院搞政工工作。

在我们全年级 150 个学生中，没有一名共产党员”。在我的眼里，刘和林就是党！或者他就代表党。他做为我们年级的“星星之火”，必然要在我们这 150 个人的草原上“燎原”。他的喜怒哀乐，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那时的政治教育课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们大家都愿意做这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团委书记”安静中是我们班的常客

经常到我们班来做政治工作的人，不是刘和林，而是安静中，还有他的夫人朴长萱。

安静中，祖籍四川，时为北京地质学院的团委书记。他到我们班蹲点，可能与我们班四川同学多有关。我们班三十个学生，来自全国近二十个省。内中有四川籍的同学：陈政国、常健民、张天齐、袁长清四人。刚入大学时，陈政国是班的团支部书记。

安静中的讲话很有号召力。在谈到共产党的性质和人生追求时，安静中对我们说：“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她绝无私利可图。她的一切方针政策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我们最终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的，即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连同无产阶级在内。我们现在就要担负起消灭阶级的任务，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子弟都争取过来……”

他还说：“有人说一生就要三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一个解放军战士说，我只要一件：地球！”

“进步”，也算是一种事业。指望前程远大的人都围着眼前的显贵奔走钻营。因此，在刘和林、安静中这类“伯乐”周围，常有成群的积极分子。

安静中说，这就叫“向组织靠拢”。

11622 班没有“星火”，何谈“燎原”

不幸的是，在评定我班同学张正万（工人家庭出身）的助学金时（我当时是副班长，主管评定工作），由于刘和林的干预，后来，发生了张正万没饭吃的问题。我向刘和林反映，他说，他知道了。可是，到了第二个月，仍然没有解决。我向系里反映，刘和林认为，我这是在告他的状⁷。这样一来，就得罪了刘和林。随即，从如何正确对待工、农子弟上学问题，逐渐发展到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就在我班争论起来。争论没有明显的结果，却有明显的趋势。我（们）虽然取得了上风，却进一步得罪了刘和林。由此出现的情况是，到了 1966 年初，全年级五个班中，其他四个班发展的党员从 2 人至 7 人不等⁸，我们 11622 班却没有发展一个党员。

我班有同学说：“只要刘老师在，我的入党问题就解决不了”。⁹

或许，这应怪我，怎么能得罪政治辅导员呢？！

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得罪了政治辅导员，其他同学不一定得罪他啊？除我以外，其他二十九个人，都不够格吗？从“政治需要”出发，在三、四年时间里，至少也应该“燎原”一个、两个呀！

当时，刘和林一再指责出身好的同学“生活在‘红色保险箱’中”。

直到他 1965 年下半年离开学校，他都没有“强迫”自己，在 11622 班发展一名共产党员！

当时，我也曾将我的忧郁向团委书记安静中说起过，冀望他能主持公道，为我们入党，向刘和林说句话“公道话”。可是，他没有一点回应。

几十年来，我一直纳闷的是，我们班 31 个同学（后来增加一个留级生），就没有一个人够得上刘和林的“党员标准”？而 11623 班，就有七个人够他的标准？

⁷张正万家五口人，只有他父亲 40 几元（月）收入，人均不足 10 元。当时，张正万的母亲是临时工，每月有 15 元收入。我主张给张正万评定 12.5 元（刚够买饭票钱），刘和林主张给 8 元。几个月后，张正万母亲失去工作，家里给他的钱难以买回全月的饭票。

⁸刘文德（2016 年）根据文革中“东方红革委会社员登记表”的统计。

⁹聂树人，《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第 327 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 年。

四清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敌人

1964年春节过后，学校按照中央指示，组织我们去京郊房山县南尚乐生产大队参加三个多月的“四清”运动。

1965年10月初至1966年4月底，我们年级的学生作为地质部西北工作团的成员，去陕西参加过较长时间的“四清运动”。

我们都把四清运动当作是党对自己的考验。在这两次“四清”中，我们都是跟在教师、干部后面走的配角。在房山，农民的生活很艰苦，我们和农民一起，半饿半饱，还要搞重体力劳动。在陕西区测队，“运动对象”并不是队干部，而是分队级干部。先将干部“赶上楼去”，然后，由群众面对面揭发、背靠背揭发。然后由干部交代检查，最后“下楼”。我们睁大了眼睛，绷紧了弦，却没有发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更谈不上从领导班子中揪出一个或多个阶级敌人来。

我们都不过瘾。我们希望有一个类似于战争、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以显示我们对共产党的忠心。

在“四清运动”中，有极少数学生被工作队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好象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本人政治表现好，二是所在的工作队领导关心年青人的政治前途。如11623班的李玉昌，因为与工作团团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等在一起，邹的一句话，即使李玉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李玉昌说，他一上大学就交了入党申请书，刘和林考验了他三年多，他就是入不了党。而在工作队中，只考验了两个多月，就“具备”了入党资格。显然，要“制造”一个“特殊材料”，还不是当权者的一句话？！

不过，邹副部长也不喜欢不同意见。与李玉昌一起的我班同学孟繁华、殷惟侯等，因为在一次会议上，对邹家尤副部长的讲话提出了异议，发生了较激烈的争论。在我班的同学们看来，这应当是正常的工作之争，是为革命事业负责的表现。可是，好心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反而召来了其它工作队员的指责。他们说我班同学“不知天高地厚”、“目无领导”、“没有组织观念”……

有人会后对孟繁华说：“要是在几年前，像你们这样敢于对中央领导干部提意见的人，肯定要划为‘右派’的。”

第二篇 我在文革中

——校园文革：文革历程 1

第7章 我成了“右派”

“无产阶级”的党还存在吗？

1940年代以后的中国，曾经发生过两次“接收”。一次是1945年，国民党对日本占领区的接收，一次是1949年后，共产党对全中国（除台湾）的接收。这两次接收，都招致了腐败。国民党对腐败的斗争（以蒋经国上海反腐为代表）失败了，招致国民党政权败走大陆。

在1949年取得政权、发誓要让中国劳苦大众“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若干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虽然残酷地打倒了“反动势力”，却也使自己的无产阶级属性发生了根本改变：1949年10月1日以后，国家是他们的了；1956年以后，全国城乡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农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市民的“产业”为街道或国家所有，农民和市民都成了无产阶级。从此，国家，国家的一切，都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有了这一切，它还能是无产阶级？它还能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那么，它是什么呢？经历1957年的“反右斗争”，共产党已经成为“说一不二”的特权阶层。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中的勇敢分子或积极分子，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最底层的掌权者。由此，引致人们以“政治进步”为“荣”，纷纷要求入团入党。到1950年代末，掌权的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以要求入团、入党的“积极分子”为基础的“政权金字塔”。

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政权金字塔”的贪腐性，他先是搞了“四清”或“社教运动”，因为不解决问题，他又发动了文革。

文革失败后，大批企业主、“能人”（会搞钱的人），纷纷加入共产党。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还是穷人的党吗？

因此，文革运动中，“造反派”面对的名为共产党，实为特权阶层。

党委的“检查”，实为“控制”

1966年3月20日，我们结束了在陕西的“四清”工作，回到学校。此时，报刊上批判“海瑞”和“三家村”的文章天天都有。虽然，我们还不明白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含义，但是谁都明白，又一场政治运动已成山雨欲来之势。

1966年6月1日晚8时，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我，从中学到大学，从受到批判的“准反动学生”到受到表扬的“三好学生”，从“不听话的学生”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乐中，处处都受到“组织”的关怀，处处却潜伏着“反党”的威胁。一些人品低下的人，一旦有了党员的头衔，那人格也立马就高大起来！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也没有胆量发出“你们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的疑问。

中央新闻媒体在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加肯定的时候，没有一字提及这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后，立即遭到围攻的情况。我也就认为，以大字报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党中央提倡的，是共产党所鼓励的，是进步的表现，谁也不敢对此说三道四。

6月2日，北京地质学院。党员大会开过以后，马上就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大会内容是，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周守成代表党委作“检查”。

令人失望的是，周守成代表党委所作的检查和对下段运动的安排却与我们的预期相去甚远。名为检查却没有“检查”出一条具体的失误，反而划出了许多框框：“大字报要集体写，按单位写，不要个人写”。他强调“当前首先要集中十七级干部学习，给党委提意见，他们是知情人，然后由党委集中意见后给大家子弹，让大家批判”。他还对揭发、批判，加以种种限制，什么要分期分批，要“先上后下”，要“先外后内”等等。

由此，我的心里有了被愚弄的感觉。我原先并不认为地质学院党委有什么大问题，还没有将他们和“黑帮”联系过。经周守成这么一抗一掩，反倒认为有问题了。至少，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6月2日上午，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写一张大字报：《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

大字报写完之后，我还是心存疑虑，怕字里行间出现政治问题或其它漏洞，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辫子制造一场“文字狱”，就请和我住同宿舍的好友沙丁茂、孟繁华二位同学审阅。我同时说明，如果他们同意大字报的观点，它也可以作为我们三人共同的“作品”。他们看了后，愿意在大字报上签名。三人略一思索和商量，就在大字报的最后写下了“11622班聂沙华”的落款。

去食堂吃中午饭时，我们三个人顺便将大字报挂在本系食堂（那时是南饭厅）东侧的一根铁丝上——当时食堂的四面墙上已经贴满了内容相似的大字报，没有了我们的“下足”之地。

那么多大字报与我们的大字报相呼应，表明许多人和我们的看法相同。

我的乐观是天真的。已经将天下据为己有的特权阶层，早已不是“老三篇”中的共产党人。

高校没有发生“乱揪乱斗”

20年后，高皋、严家其（1986）对北京这一时期的形势是这样评述的：“在北大的带动下，北京的55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

几十年后，丁晓禾在《狂飚-红卫兵童话》一书中说：“在许多大学和中学校园内很快掀起了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不时发生乱揪乱斗的现象，党组织完全陷于被动和瘫痪。”

几十年后，李雪峰说：6月2日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拾。

上述说法完全不符合北京的情况，更不符合地质学院的情况。因为，地质学院虽然贴出了大量对党委检查表示不满的大字报，但是，根本没有发生“揪斗”党委成员和其它校系领导的任何行为。

据我所知，当时，北京各高校也与地质学院类似。因此，上述几本书的说法都不符合事实。即便在北大，在6月2日，党中央将北大校党委定为“反党集团”、“黑帮据点”，也并没有发生乱批乱斗的现象。对于地质学院党委，党中央或上级领导并没有定性或下结论，师生们岂可肆意为之？

因此，“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乱揪乱斗”，“党组织完全陷于被动和瘫痪”，“一发而不可收拾”，“掀起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这一切，只是作者的杜撰，是对几十年前各高校情况的极大歪曲。最有力的反驳证据是：如果各校“党组织完全陷于被动和瘫痪”，它如何能领导下文所述的“6.3 反扑”或镇压群众事件？

地质学院的“6.3 反扑事件”

“6. 3 反扑事件”是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序幕，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院的首次暴露。

6月3日早晨，我突然发现，校园内出现了另一种“一边倒”的形势，众多新贴出的大字报对昨日的大字报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围剿。从内容上看，这些大字报绝大多数都是为周守成的检查唱赞歌的。从大致相同的腔调上判断，这些大字报显然是“授意”之作，“奉旨而行”。

11621班的李玉昌同学（党员）参加了6月2日下午地质系党总支召开的会议。他说：

——在这次会议上，系党总支领导针对当天出现的矛头指向学院党委的大字报，给我们谈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情况，要求我们一定记取经验教训，在关键时刻一定要站在党一边，大是大非上不能糊涂……对于向党进攻的人，要提高警惕，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

——在系党总支的布置下，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们立即行动起来，写出了反击的大字报。当天傍晚和第二天早晨就贴了出去。从情况上判断，其它各系也召开了同样内容的会议。显然，这是学院党委统一布置下来的。

这一气势汹涌的围攻，被师生们称为“6·3 反扑事件”。

“6·3 反扑事件”是短命的。短命的原因并不在于“反扑”者的慈悲或觉悟，而在于共产党中央高层领导对“反扑”的“扼杀”：6月3日早饭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与首都报纸摘要”节目里，播出了当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消息：撤销彭真担任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派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公布了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一）派工作组到北大对文化革命进行领导；（二）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欢迎工作队进学院

1966年6月8日中午，由地质部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的带领下，开进了北京地质学院。当时，进驻地质学院的工作队员都是地质干校的学员，大约有三百人。他们来自各省（区）地质队，是省级地质局党委从各地质队选拔的工人共产党党员，多为军队转业兵。据说，对他们政治培训的方向是：地质队的“政治处主任”或地质分队的“政治指导员”（即党支部书记）。

6月8日上午，在得知工作队要进校的消息后，师生们按照学校的安排，都集中在学院东大门至办公楼的几百米马路两边。

当工作队一进入校门，掌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和“二踢脚”在天空中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喜庆的气氛比过年过节还要热烈。我们跳着、叫着，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

但是，工作队员们进校门时，都表情严肃，小跑着鱼贯入校，对我们的欢迎只是挥挥手而已。一方欢迎热烈，一方反应冷淡，热脸贴的是冷屁股。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从不同的渠道得知了这样的信息：

1966年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急忙召集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当前学校所出现的纷乱局面。会上大部分人认为，应当仿照北大的先例，派工作组。没有工作组不行。原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刘少奇为了“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以北京为样板向全国推广，他也主张派工作组。最后会议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所谓“纷乱局面”，当然是指6月2日以后各校师生对党委压制群众所表示出的不满情绪。但是，除北京大学党委外，其它院校的党委，还在当权，还在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纷乱局面”只是刘、邓的错误估计。

据崔清禾（地院勘探系三年级学生）说：

“工作队进校后的当天下午，就在大饭厅前贴‘热烈欢迎工作队进院’、‘欢迎工作队进院领导文化大革命’等大标语。那大标语是他们自己带来的。我觉得情况不对。这是什么事？自己欢迎自己？这不是造假嘛！应该是我们贴这样的大标语才对。我和徐家坤等四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去国务院西门接待站反映。回来后，不知道谁先给工作队汇报了，说我们去国务院反映情况了。我没有吭气。后来开会，工作队不点名地说，有人跑到国务院去反映情况，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汇报。”

我成了“右派”

6月8日晚上十点多，我和孟繁华、沙丁茂三个非党员学生被年级政治辅导员林秀伦老师召到11623班的一间宿舍（南五楼4层）中。记得，宿舍里还有其它班的四个同学。我们三个人就坐后，有点莫名其妙，被政治辅导员传唤使我们受宠若惊。入大学以来，我们还没有夜晚受政治辅导员单独召见过的待遇。因此，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林秀伦老师。林秀伦老师宣布开会后，就莫名其妙地检查了起来，这使我们都感到意外。他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在我们面前作检查？

他检查的大意是，他感到非常惭愧，平时一直要求大家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紧跟形势。可到了关键时候，自己就动摇了，对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决策不理解，落后了，做了对不起同学们的事情。他向我们赔礼道歉。

我实在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更令我不解的是，他竟然痛哭流泣，淌下了愧疚的眼泪。

他“检查”完了，还要我们谈看法。

我们三个人都瞪着不解的眼睛，莫名其妙！

这时，坐在一旁的其它班的学生将几张纸递到了我的手里。我一看，原来是抄录的“聂沙华”大字报的全文。几张纸都没有抄写满，笔迹也明显不相同，显然是几个学生所为。我立即意会到，这是年级党支部“收集整理”的，准备“秋后算账”的黑材料。

这时，我才意会到，坐在我旁边的其他班的四位学生的身份，他们应该都是共产党员，应该是“聂沙华”大字报的抄录者。

这时，我才明白了这次会议的宗旨——没想到我们写的一张大字报竟然受到如此“重视”和“礼遇”。

这时，我的脊柱里才大冒凉气。

原来，政治辅导员林秀伦，是“6.3反扑”的一个干将！原来，1162级的党支部，把忠于党的学生当成了敌人。

第8章 工作队要整高元贵

整高元贵是地质部的“上命”

高元贵，20世纪初出生于山东省，1936年，他在中国大学上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的建设工作。

1958年，调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

1965年，他的党委第一书记一职由王煥¹⁰取代，但是，他还担任院长。

我们1962年进院之后就听到一些老师说，高院长有抗上的“恶习”，地质部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何长工曾指责高元贵“三年不进我地质部的门”。如果高院长没有这个“恶习”，按照他的革命资历，当个部长或部长级以上干部是不成问题的。

毛泽东的文革是要“整党内走资派”，以何长工为书记的地质部党组却要借机整高元贵。地质学院的师生认为，高元贵为人正派，有知识；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聂克一幅“党阀”派头，在大会讲话，就“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啊……”一大串，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了个啥；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周守成工作成绩尚可，就是生活作风较烂，绯闻一大堆。工作队要“打‘高’保‘周、聂’”，地质学院的师生认为，高、周、聂有没有问题，结论在揭发之后。“是驴子是马”，要拉出来溜溜再说。干部政策中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师生原本就很反感。文革运动中再搞这一套，很不合时宜。

¹⁰原为解放军装甲兵大校。

“打‘高’保‘周、聂’”与反对“打‘高’保‘周、聂’”，构成了地质部工作队与地质学院师生的主要矛盾和斗争焦点。

高元贵“包庇反动学生”洪全？

“洪全问题”是专制政治环境中，神化教育的一个政治怪胎。它昭示出的“官场守则”是：不准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者有罪！

洪全，北京城区人，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65届毕业生。他是清朝皇族后代，年少时父母双亡，祖上给他和他的弟弟留下两座四合院。

洪全算得是要求进步的一个学生典型，他上中学时，就与弟弟商妥，将祖上留下的两座四合院全部捐给党和政府，自己和弟弟的生活用房算是租用，以示自己听党的话，要做一个无产者，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做一个共青团员，还想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决心。他也因此而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所谓的“洪全问题”，是指洪全的两句“反动言论”。

洪全的第一句“反动言论”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上大学后，晚上刚睡下，有人说，没有马列主义，就没有修正主义。洪全认为“正确”。因为，没有马列主义，还“修正”什么。他还进一步调侃：这样说来，马列主义万岁了，那么，修正主义也该万岁呀！

本来是句玩笑话，却被不良用心的人汇报给了政治辅导员邓兆伦以及陈安民。在“反右斗争”中得了好处的邓兆伦，以及陈安民，立即想到了自己的“进步”，并立即到洪全当年的中学去调查。这一调查，又发现了洪全的第二句“反动言论”：洪全要“猖狂地超过马、恩、列、斯、毛”。洪全在高中时曾以“共青团员”的身份“辅导”过初中学生。当初中生们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出质疑¹¹时，洪全说：马、恩、列、斯、毛是革命导师，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要向前发展的，如果到了顶峰，就不会再向前发展了。因此，“顶峰论”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从小就要树立雄心壮志，敢于革命，敢于创新，争取将来超过他们。

邓兆伦与陈安民等一起，上纲上线、加油添醋，上报系党总支、院党委，一定要将洪全定为“反动学生”。

但是，邓、陈二位政治辅导员却在时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高元贵面前碰了壁。高院长认为，洪全不是反动学生。

洪全因此没有被分配离校。

洪全对邓兆伦、陈安民等的行为原本就不服气。现在，文革运动来了，他们还要将这脏水泼到高院长的头上，更激起了他的义愤。这也正好给了他一个为自己辩解，向邓兆伦、陈安民之流反击的机会。他也贴出大字报，也在大字报席逢前大声辩解或与人辩论，不仅申明自己无辜，还赞扬高元贵的实事求是和长者胸怀。对于邓、陈二人，则从灵魂的龌龊和做人的无耻方面给以鞭挞。

高元贵被“停职反省”

工作队刚进院的一段时间里，继续执行“先外后内”、“先上后下”的方针，并着力将师生的注意力引导到高元贵的身上。

在工作队的“引导”下，针对高元贵的大字报逐渐多了起来。但是，从揭发出的问题中，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政治”，而注重于抓师生的业务学习，“少红多专”！但是，并没有足以打倒他的钢鞭材料。

6月14日，高元贵按照工作队的安排，在全院大会上作了检查。

工作队要整治高元贵，要保聂克¹²、周守成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因此，无论高元贵如何检查，都是“根本通不过”的。

1966年6月16日上午，全院大会。何长工及地质部的要员们都到了，压镇的是国务院工交办副主任李人林。会上，工作队领导不顾广大师生的意见，以高元贵“抗上”和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为由，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而对于师生意见大的周守成、聂克两位院领导，只是叫聂克作检查。

地质学院的师生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工作队名义上是“党中央、毛主席、新市委派来的”，实际贯彻的，却是地质部领导的意图，那就是何长工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路线。

¹¹质疑的要点是：到了顶峰了，那还能发展吗？

¹²党委副书记。

此时，师生们又想起了何长工对地质学院师生说过的话：“你们都是我何家兵！”

从此，师生们对工作队就从热烈欢迎、坚决支持，变为观望，变为敌对了。

“11622 评论组”直捣“黄龙”

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学生们在大字报上大都署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有的大字报是一个人写的，有的则是几个人写的。

以“战斗队”的名义写大字报发生在工作队进院后不久，即 6 月 10 日左右。同其它学校一样，地质学院许多战斗队的名子带有明显的“红色”印记，如“呐喊”、“同心干”、“反到底”、“匕首”、“打狗队”、“打鬼队”、“高旗无畏”、“揭竿而起”、11622 评论组……

这些战斗队的主要矛头都指向工作队。

在 6 月 10 日至 25 日，在同工作队的战斗中，我们 11622 班空前统一。我班不论谁写大字报，都以“11622 评论组”名义署名。

在这些大字报中，最主要的有三篇。

工作队的倒行逆施，使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地质部政治部主办的部党组机关刊物《思想战线》上。这是一种注明“内部发行”的半月刊，作为政治宣传教育的工具，它直接发到各教学班。在工作队进院后的那期刊物上，刊载有地质部党组关于地质部系统如何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提纲”及与其相类的指导性文章。工作队进学校以来的所作所为，正是以它为本的。于是，我提议，我们就从这里出手。

刚上大学时，我是班干部，后来进了系宣传组。至今，我也说不清我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我的出身，由于我的诚实，由于我敢做敢当，在 1966 年 6 月，大家对我的意见还是比较尊重的，愿意同我协调行动。

我将我的想法和班上同学一说，大家都表示赞同。我认为，《思想战线》是地质部党组意图的集中体现。于是，我将我理出的三个题目及其所应写的内容向大家提出。经大讨论通过后，确定了执笔人。记得，我写过一篇，另外两篇由其它同学写。大字报的题目已经忘记，只记得每篇的题目下都加了副题：“——评地质部《思想战线》”

每篇大字报末尾的署名都是“11622 评论组”。

大字报陆续写好了，第一篇贴出去了，第二篇贴出去了。当第三篇贴出去的时候，好象已经是“引蛇出洞”时期，薄一波批示即将公布的前两天。

后来我们才知道，《思想战线》上的“文章”算不上是地质部党组的“发明创造”，它主要是从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央八条”和刘少奇的讲话中“批发”下来的。因此，以“11622 评论组”署名的三篇文章在“不知不觉”中就把矛头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最高领导层，动摇了工作队镇压革命学生的依据和根本，这是我及我的同学们当时始料不及的。

由于我们的批判文章依据充分，说理透彻，直刺工作队的心窝，因此大字报显得有声有色，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它当然也引起了工作队、地质部领导及保皇派的特别愤怒。

我们希冀以讲道理的方式，使工作队醒悟。其实，这实实在在是书生气十足的表现。俗语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拿枪的人，以及拿枪的人背后的指挥者，有谁能听得懂道理？

邹家尤，武斗的始作俑者

十七级干部是中级干部的“底线”。当时，14~17 级，属中级干部，县团级。13 级及以上，属高级干部。16 级及以下，属普通干部或低级干部。

地质学院有多少十七级及以上干部，不得而知。当时工作队积极召集十七级及以上干部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大家揭发高元贵的问题。高元贵 1958 年就到地院工作，担任第一把手，得罪人是难免的；处事的失误是可能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落井下石，打击高元贵，却是许多人不愿为之的。

为逼迫十七级干部揭发高元贵，拥护工作队的个别人就有恃无恐起来，动手打人。因此，工作队编的《大字报选编》¹³中才有记载：“6 月 19 日，王煊堂对莫宣学说：‘原来还没有打人的现象，邹部长在十七级干部会上说打几下不要紧，晚上李武元就挨打了。戴高帽、打人现象至今未制止，我认为是工作队有意引导的。’”¹⁴

¹³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党委办公室编。记得有 11 期。都编写于 1966 年 6 月、7 月。

¹⁴地质学院工作队《大字报选编》，1966 年 6~7 月。

第9章 地院的“6·20事件”

“夺回文化大革命领导权”

运动进展到6月中旬，形成的局面是，除肉麻地吹捧工作队的大字报以外，谁也不敢对工作队提意见。谁提谁犯错误。因为，这“错误”，会立即被引申为“对党不满”，进而引申为“反党”。

6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中说：“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

我听了这篇社论的广播以后，真想大声说：这社论就是针对地质学院写的！

我们无意于“揭露”工作队，只是对工作队提了点意见。因此，不构成“反党”，更不构成“反中央”。

许多大字报和许多人的辩论观点逐渐趋于一致，邹家尤工作队已经不能领导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它成了阻碍师生前进的绊脚石。

我们国家只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的，只是长官意志。要将工作队的错误否定，惟一的途径就是向上级反映，去“上访”。

李贵等人的上访发生在6月19日半夜。

公布李贵等人上访消息的是一块黑板，那块黑板就立在大饭厅左前（东南方）的大字报席棚旁边，小树林西北角。当时，大饭厅前面的东西向道路的南边，即沿小广场的北缘，布置了一长排大字报席棚。黑板上贴着一张纸，上写：

李贵、李明哲等同志今日凌晨到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接待站反映工作队的问题，强烈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新的工作队来，夺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李贵王煊堂邓晋福等16人

6月20日

6月20日上午，李贵等人的上访行动成了地质学院人们议论和争论的中心。我先是去拜访问了岩石教研室，见到了郑伯让、李明哲及其它人，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回到了大饭厅前的广场上。这时，看到的是又一番景象，到处是一堆堆大辩论的人群。辩论的缘起都大同小异。

保皇派的论调是：“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对党有意见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当然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再往下“推”，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得同“右派”、“反革命”划等号了！因此，他们指责说，李贵、李明哲等人上访，是反革命行为！

造反派则针锋相对，认为李贵等人的上访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因此，坚决支持李贵等人的上访。

保皇派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几个人嘴巴说不过，就对持“革命行动”观点的同学推推搡搡起来。我看不惯，就插了进来，站到了那同学的前边，护着他。并指责那几个保皇派：

“有理不在言高，有理不在膀子硬。李贵的行动是不是革命行动，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他说了算。”

“那你说，谁说了算？”

于是，我和他们发生了争执，转移了视线……

单纯辩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到了他们理屈词穷的时候，他们或抓住你辩言中的某个漏洞，大做文章；或者借题发挥，将辩论引向他方。

在小广场东侧小树林边，保皇派将一个“右派分子”（名字我当时就不知道）弄到方桌（从饭厅里弄来）上站着，在批斗之余，大声发问，提出一些挑衅性、具有极大刺激性的问题：

“你认为什么人才对工作队有意见？”

“对工作队不满的人是不是对党不满？”

“反对工作队是不是反对党，是不是反革命行为？”

……

显然，他们是借此向广大师生头上泼污水。

他们还挑衅性地向右派分子发问：“你认为李贵上访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行动？”

“我不知道。”

“你不老实！‘不知道’就是反革命言论，就是为反革命行动叫好！”

于是，有人高呼：

“只话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打倒反革命黑帮！”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于这样的批斗和相关方式的辩论，谁都看得明白，这是项庄舞剑。你一张嘴，人家就会把你和“右派分子”绑在一起。因此，没有人接招。

与此同时，在大字报席棚上，学生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则铺天盖地。其中，也有安静中、岩石教研室的大字报。

安静中的大字报标题是《一定要把保皇党主将周守成及其一伙揪出来》，以打击周守成、聂克等，保护高元贵。

岩石教研室的大字报题名为《致全院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公开信》。

江祖如也写了一张《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批驳“我们要相信地质部工作组党委，要听地质部工作组党委的话”的同时，大声疾呼：“请中央和新市委重派工作组来领导我院文化革命”。

20日上午，李贵在大饭厅前说：“工作队只准我揭发高元贵的问题，不让我揭发周守成、聂克的材料。他们斗了不少辅导员，只斗小的，不斗大的，这是修正主义领导。”

王煊堂戳穿工作队的真面目

王煊堂在学九楼西侧发表的讲话中，详细介绍了他从怀疑到坚决拥护李贵上访的思想转变。他说：

“（6月）12号晚去支持清华大学，群众热情很高，形势又非常好。13号上午斗争刘普伦，在这以后大斗起码有13人，小斗不知有多少。群众义愤填膺，群众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完全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行动。同学们，同志们，多斗几个没关系，就象你们斗争我一样，我们是犯了错误，我们承认，我们是忠实执行了党委错误路线。你们斗争我，斗争宣传部做具体工作的熊淑娟，斗争辅导员，我们没有意见，这无可指责，指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斗争我们行不行，到底棋子在那里？斗争我，我没有意见，但是工作队应怎样对待，政策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群众热情起来后不加以正确引导？我们搞过四清的同志想一想，哪有这个搞法？同学们，你们要革命，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你们要学会斗争艺术。你们想想：我院‘17度防线’为什么攻不破，不能对所有17级干部都拉出来斗，这样使他们一天为了保护自己，负担很重，怎么能够更好的斗争。我们认为‘17度防线’中李武元、王良、王克昌他们是最了解情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善于斗争。

“同志们：我们认为我院党委宗派活动是很明显的，一派是以高元贵为首的资产阶级教授、右派及反动学生；一派是以聂克为首的王良、李武元；三派是周守成为首的。现在周、聂联合起来。我们要问，部党委工作队来后，许多会议都参加了，为什么前段运动冷冷清清？为什么高、聂、王和邹部长和地质部党委工作组的意见那么一致？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记得工作队×××找李贵谈话，他说，高的大字报可以贴，聂克的问题写成材料交给工作组。这是为什么？同志们，那天斗争聂克的晚上，高部长出点子、递眼色这又是为什么？

“现在部党委派来的工作队，不是执行新市委的精神，他们钻了新市委刚接管领导权，不熟悉情况的空子……李贵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床单补了又补……我们要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保护李贵……”

李贵家的补钉床单成了“6.20游行”的旗帜

依据李贵高级干部的身份，他应当是“坐天下”的既得利益者。当工作队矛头指向高元贵的时候，特别是指向广大师生的时候，他至少应该是旁观者，或者本来就应该站在工作队的一边。

但是，工作队“打‘高’保‘周、聂’”的方针政策却引起他的不满。他认为，打倒高元贵而保护周守成、聂克，是地质部领导借工作队之手，在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错误路线，是在搞宗派斗争。如此搞下去，是要搞乱地质学院的。由此，他认为，邹家尤工作队是不革命的。

他站出来了，不仅站出来了，而且，公开打出了否定邹家尤工作队的大旗。借用工作队拥护者的话说是，他“自己跳出来了！”

几位到李贵家访问的学生，从李贵家拿来一条有多个补钉的床单，站在桌子上，高举着，展示给大家。许多学生做梦也想不到，党的一个高级干部过的日子竟是这样的贫寒，与大家通常看到的高级干部们奢华的生活和颐指气使的“风度”形成鲜明对照。当时，我看了这床单就想，用聂克经常变换着穿的呢子大衣中的一件，不知可以买多少条新床单！

人们为地质学院有这样一个清正廉明的工农好干部而自豪，为他的不怕工作队打击而关心国家大事的英雄行为而感动。

由此，大饭厅前的广场辩论就改变了方向。人们在发问：邹家尤工作队为什么要打倒高元贵，而死保周守成、聂克？为什么不保、不支持李贵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的爱与恨为什么与广大师生如此不同？他们为什么不听师生的正确意见而要一意孤行？

于是，辩论会就变成了控诉会，揭发会，控诉学院某些领导压制排斥工农干部李贵的“罪行”，控诉工作队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帮派路线。

在群情激愤中，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去找邹家尤，要他回答我们的问题。

听众们一致表示赞成。

于是，自发的游行开始了。

从李贵家拿来的那块补钉床单终于变成了一面旗帜。学生们高举着它，不断高呼“坚决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要求党中央派新的工作队来领导地院的文化大革命！”等口号，从饭厅前的广场出发，开始了声讨和反对工作队的大游行。

当时，游行的路线是，从小广场向西，经西三楼北、水池北，至眷八楼西，往南，再往东，过游泳池，附中以东，沿马路往东，最后来到工作队驻地学 12 楼门口。沿途有许多同学自动加入到队伍里来。游行队伍延续一二百米，开始时有二三百人，后来，不断有人参加进来。此外，在游行队伍外跟着走的，看热闹的人也有许多。

自始至终跟着游行队伍走的我，除对外貌独特的周永璋（秃头）有印象外，对其它人都不认识。那个时候，除同班同学外，学生间来往很少，对外班以至外系同学很难有认识的机会。大多数的情况是只知其人（外貌）不知其名。从这个情况上说，这次游行谈不上如工作队和保皇派指责的那样，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游行队伍只能算是“乌合之众”——大家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我对游行队伍的组织者之一周永璋“有看法”，因此，在游行中并不积极。在周永璋上大学的两年多时间中，从宿舍到饭厅，从饭厅到宿舍，我经常可以见到他。虽然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知道他是比我低一年级的学生。此人年轻时就是个秃头，外貌特殊。为了掩盖秃头，即使是大热天，也经常戴着帽子。我虽然从未和他打过交道，但看他和其它学生说话时，总觉得带有一股酸味和奸商气。当时，在我的内心，我一直把他称为“流氓无产者”！因此，一直对他没有好印象。

我反对衣貌取人，但是，自己在实际上却又这样“取人”，真该诅咒自己！

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周永璋在文革前就是共产党员。

邹家尤被“请”到桌子上

推举谈判代表

当时，游行队伍行至工作的办公地学 12 楼，大家齐集楼门前，高呼口号，强烈要求工作队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出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回答问题。



学 12 楼的东门口（摄于 2008 年）

（1966 年时，楼门口有几棵白杨树。邹家尤就是在
这里被“请”到楼下，并被“请”到桌子上的）

开始，没有人理睬。大家呼了一阵口号后，一个工作队员才从楼里出来，要游行学生派出代表进楼去同邹家尤谈话。

大家想了想，派代表进去也是个办法，几百人拥进大楼，七嘴八舌也不好办。

在推举代表时，曾经费了一小点周折。因为参加游行的学生大都互不相识，只能根据刚才游行时表现的积极程度作为推举的唯一条件。另外，大家谁都没有同邹队长谈话的思想准备，要是当了代表，不知进去同邹家尤谈什么。再则，可以想到的是，一当了代表，必然成了“出头的椽子”，得有豁出去的思想准备。因此，出现了你推举我、我推举他，他又推举另一个人的现象。不过，最先的五六个被推举者还是当了勇敢分子，雄纠纠地走进了楼门。

我当时就站在学 12 楼东门外人群的圈子中间。只因为在游行时，我既没有组织队伍的行动，也没有带领大家喊口号的行动，不属于游行的领导人物，因此不受信任，没有人推举我。从另一角度说，人家认为我是工作队的“暗探”也说不定。

当时，共推选了六个人，有周永璋、蔡新平、庄一龙……

六个人进去后提出的主要要求就是要邹家尤出来回答群众的问题。因为邹家尤不出来，据蔡新平说，庄一龙还曾动手去抓邹家尤的衣领。

邹家尤颤颤惊惊爬到桌子上

大约几分钟或十多分钟后，邹家尤出来了，后面跟着方才进去请他的同学，也跟着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在邹家尤走出楼门时，我看到的情况是，他是自己走出来的。

当他在学生的搀扶下战战兢兢地往桌子（我现在已记不清，学 12 楼门前的那张方桌是原先就有的，还是有人临时搬来了一张）上爬时，腿脚发软，我真担心他会掉下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邹家尤手里挟着一支烟，不时把烟送到嘴上，以稳定情绪。可是，又因手和腿不断发抖，常常送不到嘴边。

此时，邹副部长往日那颐指气使的神气不见了踪影。

在此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能将一个大官如此这般地“请”出来过。在此以前，“为人民服务”以及“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才来“真格”的了。

我因此一直佩服着上楼去请邹家尤的几个同学的勇气和胆识。

向邹家尤提出五点要求

当邹家尤爬上桌子后，集会的群众就向邹家尤提问题，要邹家尤回答。大家一共向邹家尤提出了五条要求，其主要之点是：坚决要求中央重派工作队。

我清楚地记得，在“坚决要求中央派新的工作队来”的问题上，邹家尤对此的回答是：同学们，我们是党中央、北京新市委、地质部党组派来的，代表党领导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请大家相信我们。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有意见可以提出批评，我们表示欢迎……

在学 12 东门前的集会总共不到一个小时。

在集会结束，邹家尤已经回到楼上时，工人蔡文槐领着二十几个工人从南五楼方向跑来了。

人们觉得莫名其妙，工人来干什么？

蔡文槐说，他们要保卫邹部长的安全。

人们一笑：邹家尤有什么安全问题？

参加“6·20 游行”的有多少人？

参加“6·20 大游行”的地院师生究竟有多少人？确切的统计数字是永远不会有有的。

我的估计是，参加游行的人，顶多，也就一、二百人，聚集在学 12 楼前的人，最多也就一千多人。

我的印象是，学 12 楼前的那个十字路口都站满了人，比游行时的人数要多好几倍。

参加“6·20 大游行”的人们不能不知道自己可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风险。因此，参加的人不多。在 12 楼门前围观的人多，因为，当个围观者没有大的风险。

抗争的参加者都是学生、教员和普通干部。师生的行动更多地带有自发的色彩，既没有“地下司令部”（陶鲁笳、何长工语），更没有“后台老板”（薄一波语），完全是“一盘散沙”的民众的一次自发的意愿表达。

专制的当权者有一个坏脾气，一个两个人向他们反映问题，他们或者不理不睬，或者一脚踢门外；多人向他们反映问题，他们不能不理睬了，理睬的方式却是对“聚众闹事”者的追查和镇压，还说他们有“后台”。

地院“6·20 事件”震惊国内外

几十年来，妖魔化文革的人们，有“名校背景”的一些作家，对地质学院的“6·20 事件”不予提及。有的人企图以突出北大“6·18 事件”，将地质学院“6·20 事件”湮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列出专门一节“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对北京各高校的反工作队事件进行描述，但是，却对北京地质学院发生的震惊朝野的“6·20 事件”只字不提。

北京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中心。而地质学院“6·20 事件”的发生，如同原子弹爆炸，震动了京城上下，京城内外，使地质学院这所平民院校，从此逐渐成为北京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中心。

1966 年 6 月 20 日前后，北京发生的驱赶工作队事件，是一个普遍的浪潮。文革运动的群众性，与工作队抓右派的心态，必然发生激烈碰撞。正如《大事记》所记：

六二〇 革命风暴席卷北京市大中学校，前后几天时间里，三十九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赶。这是革命师生反工作组的大胆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它给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沉重的打击！

——6 月 20 日半夜 12 时，铁道学院革命师生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革命师生发扬革命首创精神，组成了临时领导机构革命师生委员会。6 月 23 日，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6·20”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6 月 23 日）北京邮电学院三百名革命师生到邮电部揪王子纲（邮电部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经过坚决斗争，王子纲只好滚出来，革命师生声声责问，王子纲张口结舌，昔日威风扫地以尽。

第 10 章引蛇出洞

钦差大臣李人林：工作队是革命的！

6 月 21 日早饭时，院广播台通知，上午 9 点召开全院大会。

会前十分钟左右，几辆黑色小轿车出现在大饭厅前的道路上，何长工等一走下车，立即受到保皇派的保护。在距会场入口几米的路径上，保皇派面对面排成两排，中间留出一条贵族通道。这些人一看到何长工，立即大鼓其掌，表示热烈欢迎，并高呼拥护工作队的口号。众多师生是“旁观者”，站在一旁，与这群人保持着一段距离。

当李人林、何长工等人走进会场时，都表情严肃，如临大敌。卫护的人不断把走道边上的人往旁边推，直到何长工等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坐。

诸多大员一齐出动，好几位部级干部齐集地质学院，这在地院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

“6·20 事件”发生后，工交政治部第一副主任陶鲁笳和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何长工的看法是，地质学院一定有个“地下司令部”。

李人林是工交政治部的副主任，他的看法与陶鲁笳当然一致。6月20日前他就在地院活动。

在李贵等人6月20日凌晨上访中，国务院接待站的答复是：“请工交党委派代表到地质学院了解情况。待了解清楚了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还用派人去了解吗？问李人林就行！

因此，到了6月21日，李人林就成了钦差大臣。他讲话的调子和邹家尤在学12楼前唱的一样，坚决维护党中央派工作队进驻地质学院的英明决策，说邹家尤工作队是奉党中央和新市委之命派来的，工作队有缺点可以批评，但是，一定要相信工作队，相信工作队是革命的，是代表党的。当然，李人林也忘不了为邹家尤工作队评功摆好……这些铺垫后面的“匕首”，就是地院有“少数人闹事”。

“少数人闹事”，他一刀子就将“6·20事件”捅向反革命的泥淖。他还说：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揪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并美其名曰：这是“反干扰”。

当然，“围攻邹部长”，“少数人闹事”之类的话，何长工、胥光义等人也都不会忘记在大会上说。

显然，李人林与何长工、胥光义等到地质学院来，不是主持公道，而是为邹家尤工作队保驾护航。

最后，何长工在大会上宣布，撤高元贵的职，勒令聂克停职反省。

家属小孩的“拥护工作队”游行

全院大会结束后的另一个“节目”是组织“拥护工作队”大游行——反击“6·20事件”的大游行。

但是，经过工作队队员和保皇派的精心筹划，只组织起了少数学生游行。大多数学生站在旁边笑。还没走多少步，就散伙了。

过了一会儿，保皇派又组织家属、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小孩子游行。记得，这个由家属、小孩组成的游行队伍稀稀拉拉地，好象从眷属区出发，游到大饭厅前，再游到办公楼前，后来不知去向。

文革运动中的保皇派

保皇派，“私”字当头

21世纪看得很清楚了，“走资派”，即以派工作队“救火”——镇压学生为出发点的特权阶层，是中国最大无良者。

次要无良者，主要是部分党员干部、党员教员，以及部分学生（党员学生和一部分入党“积极分子”）。

为了当好“积极分子”，山东那个叫张红兵的中学生，亲手将自己的母亲送上了刑场。

那时，中央从策略上考虑，将“保皇派”称为“保守派”，我也拥护。但是，我从内心里认为，他们大都是“私心”很重的人。也可以说，他们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1966年1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第一个以“红卫兵”名义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破‘私’立公”。

“破‘私’立公”，后来成为文革中的通行口号。

研究生：“左派”大本营之一

保皇派学生，以学生党员为骨干，包括“入党积极分子”中的部分人。那时的学生党员，都是从自愿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一旦入党，他们都认为，自己已经迈过人生的一大坎，成为当权者的预备队，成为与普通学生不一般的“特殊材料”——监督他人的“天然工具”。

地质学院的保皇派学生以研究生为代表。

研究生这股势力在薄一波批示后，在从22日至25日四个“阴谋”的日子里，表现得尤为活跃。这部分学生大都是党员或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德性：听党的话！

研究生是“天之骄子”，学生界的宝塔之巅。这部分人的阅历世故比本科生多，加之政治辅导员（赵碧媛）的精心栽培，做人之本丧失是更多，对政治斗争的诀窍更为了解。

积极拥护工作队的代表人物叫叶大元。此人在6月25日后，被工作队任命为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他们中也有沉默寡言者。在以言定罪的时代里，沉稳寡言不失为高明的生存之道。至少，良知没有泯灭。与部分激进的大学生比较起来，随着运动的发展，这“沉默”就成了金子。在薄一波批示公布之前，他们以“沉默”观望；薄一波批示公布之后，这“沉默”就放出了光芒。其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国家总理温家宝。

在学生党员中，还有另一部分人，如我班的袁长清。作为一个“人”，他一眼就看出工作队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问题；作为一个“驯服工具”，他又不得不服从组织。他们因此而在“人”与“工具”之间不断选择，显示出明显的“摇摆不定”。

工人：“左派”大本营之二

邹家尤工作队进地质学院后，培植和依靠的另一股基干力量是工人。

1957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此后，“工人”天然地就成了“右派”的“克星”。到了1966年6月，在工作队的唆使下，一些工人走到台前，一张口就“我们工人”如何如何，似乎“工人”一讲话，邹家尤就成了神仙，工作队所推行的一切就都打上了“无比正确”的印记，给工作队提意见的师生就“盖棺论定”成了“右派分子”。

学校里的工人算不得产业工人，他们主要从事的是与教学有关的辅助工作，如印刷工、机工、环卫工、水暖工、花工及其它勤杂工。社会分工决定了，他们居于从属的地位。从文化程度上说，绝大多数人很低，小学、初中毕业生占多数。从政治待遇上和工资级别说，他们显然不能与党政干部及教学部门的普通干部相比。

存在决定意识。在校工的心理上，始终有低人一等或几等的感觉。

工作队进院后，一方面利用了工人们的这一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也为了表示自己比前人更革命，要同院党委“划清界线”，于是就打出了依靠工人阶级的旗号。他们在工人队伍中说的最多的是，院党委以前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依靠学者教授治校，把工人阶级不放在眼里。工作队员对工人们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要彻底解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问题，工人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今后，工人阶级要在学校里当家作主。

这些话，哪能不在工人中引起震动。因此，一些工人立即对工作队感激涕零。

当时，在争相给工作队唱颂歌、挞伐造反派的人中，工人是一股重要力量。

在工作队的操控下，机工厂的郝电明、刘业钧等二十七人，曾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再评“六·二〇”事件——反革命夺权》。这份大字报是何人所写，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工作队员也给带头的工人如蔡文槐，预先封了官。附加的条件是，工人阶级应该听工作队的话。

政治教研室：“左派”大本营之三

保皇派教员、干部，多数人是1957年时的“反右英雄”。如地质系普地教研室的叶俊林、王宝瑜，前团委书记安静中、政治辅导员邓兆伦、陈安民、林秀伦等。他们对在师生中“抓右派”，特别积极。

在保皇派的教员中，最有组织的一股力量是政治教研室。

“引蛇出洞”的五天（21日~25日）

与工作队对阵的主要力量

学生。

1966年6月中旬至20日前后，给工作队提意见，或对工作队表示不满的师生，可划分为两大部分：学生、教员和一般干部。

学生，是写大字报的主力，是大辩论的主力。青春的活力，在这时，发挥到最大化。在这四、五天里，我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一直在观看大字报，在写大字报，在与工作队的拥护者进行辩论。我不知道前途如何，或者，再往前走一步，就会掉入陷阱。但是，我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即使是陷阱，我也愿意往下跳，愿意为真理而献身。

在工作队编的《大字报选编》中，记录的主要是工作队党委认为属“反党”、“反革命”性质的、教员干部们写的大字报或其摘录。而学生给工作队提意见，揭露工作队及地质部问题的大字报，一篇也没有入选。

我们当时高兴，后日写“文革回忆”时，却感到缺了一大块，遗憾！

2015年，我见到了隗合明同学的13本“记录本”。其上抄写的，多是当年学生写的大字报。可惜，它已被当作“废纸”卖出，后又被一个叫刘向南的记者得到。如果这些“笔记”能整理出版，将给地院文革大添光彩。

普通教员干部。

在与工作队的斗争中，最有异彩的教员-干部“团”有：全院，以李贵（王宣堂、付昭仁）的“李贵团”为主；团委，以安静中为主；地质系，以岩石教研室郑伯让为首的“岩石团”为主；探工系，以王大来、陆炎德为首的“探工团”为主。

这些“团”，或因属不同系，互不相熟，各自为战。或因互有芥蒂，如对安静中，认为他是高元贵的“红人”，他的保高，或有个人目的；如对李贵团，认为他是党委常委，处于学校高层，“高不可攀”，而互不来往。

安静中与我们 11622 班联系较密切，我班的殷惟侯、吉让寿、孙司权等很听他指挥。

这些教员干部，在工作队“引蛇出洞”中，表现坚决。比如郑伯让，他说：“我们告的是地质部的状，是和大头斗，我们都是地质系统的，也可能告准，也可能告不准，那今后多少年不得翻身，要有思想准备……我们要准备犯错误，开除党籍，准备斗争几个月，聂元梓斗争七个月才胜利。”6月 21 日，工交党委李（人林）主任明确提出“工作队是革命的”，有人要去找工作队认错，郑伯让说：“我不认为错，相反，经过今天上午的会，更认为我们是对的。”晚上在西一楼 107 与付昭仁等开秘密会议时扬言“我准备去劳改！”

据我的记忆，探工系有教员、干部不足百人，6月 21 日晚参加批判工作队会议的就有 27 人，给工作队贴大字报的，就有 47 人。

据《大字报选编》，探工系 6.22 晚会议上，还成立了“组织”：

时间：6月 22 日晚 9 点到 23 日 2 点

参加人：王大来、陆炎德，万光明、许高燕、宋翔雁、杨惠民等十五人。主持人：万光明

会议内容：

1. 成立黑组织

参谋：陆炎德、王大来

编委：许高燕、杨惠民、吴力文、胡耿寰、汤凤林.

编辑：宋翔雁、杨惠民、张大伦、谭义贤、黄家培

资料组：钱天宇、张国樑、唐振权

接待：宋翔雁、汤凤林

出版：张润生、柯火炉、刘大权

2. 确定斗争策略：要搞合法斗争，不搞非法活动。不参加自由论坛。

3. 建立黑制度：规定了学习、汇报、记录、接待等制度。

安静中指斥工作队

21 日，安静中在工作队召开的会议上说：

6月 8 号晚上十点，李武元叫我帮他写大字报，急忙推出高元贵，对他进行重点批判。王良说这是经地质部党委同意的，是王焕授意的。当时是在为聂克打掩护。

6月 12 号周守成在 17 级干部学习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我很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要动员大家批判高元贵。

6月 15 号晚上，周守成就写了高元贵的两张大字报……

总的说来，工作队值得怀疑。我为什么对工作队有怀疑呢？

①地质部党委对我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框框，矛头一开始就指向高元贵(高和部里闹过矛盾)。王焕说这是经邹副部长同意的。有舍高保聂的嫌疑。

②从 6 月 12 号以来，工作队一直在我院。如果说以前我院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向地质部请示产生的，那么这一段发生的问题就不能说没有请示了。发生这些问题又如何解释呢？高部长参加会议发言也很激动，与党委顶得很僵，双方都发火了，他是否也没受到部里的支持？党委后来的做法部里都是知道的。6月 3 号那天，何部长、邹副部长都来了，还宣布要加强工作队，为什么还会发生那些事情呢？

③工作队来了后是鼓励大家揭发还是阻碍大家揭发？依我来说，我揭发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我 17 号被同学揪出来回答问题，我当时的态度还是好的，是值得鼓励的。但工作队一直不理我，不找我谈话，把我看得和他们一样。我有话到哪讲去？为什么一再强调要相信工作队？

④工作队这两天的所作所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也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是牛鬼蛇神也跑不了。

⑤放手发动群众适不适合于工作队党委。让我念一段 16 号《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上几张大字报，他们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左派组织围攻，漫骂恐吓，横加罪名，进行政治陷害。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谁要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他们这样干的结果，恰恰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完全暴露了他们这些保皇党、反革命党的真面目，也就为他们的彻底垮台敲响了丧钟”。我不是说工作队就是黑帮。昨天的辩论会(按：指 6 月 20 日下午围攻工作队)给工作队起了暴露作用。说“六·二〇”事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事件，又出现了扣大帽子现象，不是摆事实、讲道理。昨天晚上工作队布置讨论谁是真左派，谁是假左派，是有意压制群众。同学们都不愿意讨论，教职员在工作队压制下都在老老实实地讨论。

今天上午胥光义副部长的报告，讲了很多含沙射影的话，说什么乌云遮不住太阳的，说反击工作队是扣帽子等，这是威吓群众。何部长报告中说，工作队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这是拿党纪压人。

⑥星期六(6月18号)周守成贴出揭发高元贵的大字报，工作队就决定星期一、二(6月20、21号)批判高元贵。看，配合得多好！

今天上午李主任讲话很不慎重，至少是没有全面了解情况，听了一面之词，就下结论。

《大字报选编》中，还选编了安静中的《质疑于工作队党委》的大字报底稿，向工作队提出了27个问题。

“薄一波批示”没有公布

据《大事记》：

(6月22日)地质学院一同学给薄一波打电话，反对李人林六月二十一日在地院的讲话。薄即刻写了一封简信，信中大讲：“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队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薄一波还在地院工作队整李贵同志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疑这个给薄一波打电话的同学的身份。当时，学校的每座宿舍楼一层，都有一部电话，可以随便打。问题是，薄一波的电话号码，这个同学怎么知道？邹家尤等可能知道，可他们(们)怎能将这一“机密”告诉学生？

我的看法是，这个学生是有特殊使命的。6月21日，何长工、李人林等镇压“右派师生”失败，他们就策划进一步措施，由更高一级的领导人出面。为使“薄一波的批示”出笼，就只能由工作队“导演”，由学生打电话。于是，就制造出了这出闹剧。

从1957年阔步走入1966年的“反右”英雄们，对于发生在1957年的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到《这是为什么？》期间的“阳谋”记忆犹新，他们遵照刘少奇主席“硬着头皮顶住”的指示，决定暂不公布薄副总理的御旨。也就是说，地质学院自6月22日始，就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广大师生驱入阶级敌人阵营的新阶段。

由此看来，工作队在此之前“反干扰”是出于“惯性”；在此之后的“反干扰”则完全是“别有用心”！

有了薄副总理批示的尚方宝剑，邹家尤当然是吃了“定心丸”。在这个新阶段里，工作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秘密召开积极分子(保皇派)会议，传达贯彻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批示。“薄一波批示”虽然没有亮出来，但是，他们让保皇派心里明白，工作队掌握着运动的“尚方宝剑”。他们要保皇派站稳立场，主动出击，挑起辩论，以便“引蛇出洞”，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于是，阳谋就变成了阴谋。

保皇派主动挑起辩论

在薄一波的“6·22批示”之前，邹家尤工作队害怕师生“鸣”、“放”；在薄一波的“6·22批示”之后，却希望师生“鸣”、“放”。为了能使更多的人“鸣”、“放”，保皇派就主动挑起辩论。饭厅、操场、宿舍，到处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战场。

他们“挑起辩论”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以大字报的形式挑起，另一种方式是以口头辩论的方式挑起。他们事先都选准了目标，有备而来。他们几个人一组，分工明确，有的人主动与持不同意见的师生挑起辩论，有的人则暗暗记下这些人的名字和说的话。挑起争端的对手我并不熟悉，我不认识人家，人家却“认识我”。他们一个人挑起辩论，其它几个人在一旁助阵。由于语言表达上的不严密性，他们常常会抓住我说话中的“漏洞”进行歪曲、夸大或无限上纲。

挑起辩论的那些人似乎并不在乎道义的失败，他们在乎的是政治上的资本。他们憧憬着明天的胜利！这世间不是以成败论英雄嘛？！脸皮子被人揭掉了，没关系！身上的擦羞布被人一层层地剥掉了，没关系！脊梁骨被人打断了，没关系！在他们看来，大概只有这样，才更加显得这些得了秘旨的人对组织的忠诚，他们便能从主子那里得到更多的奖赏。

那时候，许多同学白天晚上都在“战斗”，写大字报，看大字报，与不同意见者进行辩论。

在此期间，我就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我在看大字报，在写大字报，在与“保皇派”辩论……

探工系王大来等人的大字报

王大来等人的大字报1：《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

同志们：

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革命形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一大堆严重的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我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观察着，思考着，争论着。我们探工系部分同志，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十大问题，我们将它公布于众，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来讨论。使我们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站稳脚跟，清醒头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五月十三日王焕的报告，五月十八日赵承丰的报告和五月十四日宋硕的指示唱的是一个调子？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地质部究竟对我院下达了那些指示？为什么赵承丰的报告录音和记录稿匆忙收回？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工作组进院后（注：当指高治平工作组）还发生了“六·三”事件？“六·三”事件的幕后指使人究竟是谁？为什么六月三日何部长看了大字报后，对左派的围攻还照样继续？何部长对围攻究竟抱的什么态度？又作了些什么指示？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工作队处处掩护聂克和周守成？为什么在斗争聂克的会上（六月十六日晚）高治平（工作队副队长）如此保护聂克，如此害怕牵连到部里的问题？为什么原定二十日斗争聂克，工作队党委又匆忙决定改为批判高元贵？

第四个问题：

王焕是个什么人物？他和地质部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聂克为什么如此密切？他来地院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工作队死抱着王焕不放？

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至今十七级以上干部还很少揭发？是谁给十七级以上干部念了那些“紧箍咒”？为什么李贵同志揭发党内问题要豁出生命和二十年党龄？是谁给他的压力？给了些什么压力？

第六个问题。

为什么工作队不站出来领导革命群众？为什么工作队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是不是存心让革命群众混战一场，让牛鬼蛇神好溜之大吉？

第七个问题。

为什么工作队党委布置将矛头指向高元贵？为什么这和周守成、聂克、李武元等的步调如此一致？是不是工作队害怕把聂克等揪出来，就会暴露了地质部的大鬼？？？

第八个问题：

为什么李贵出来揭发问题，工作队怕得要死，还百般刁难？说李贵同志的揭发是个“大阴谋”，这是从哪儿来的？

第九个问题。

为什么六月二十日何部长在文化革命代表会上对群众意见如此激动？为什么二十日晚工作队党委要布置讨论真假左派问题？用意何在？

第十个问题：

综上所述，我院中的黑线究竟有多长？多黑？这条黑线又伸向何处？

全院革命的师生员工家属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王大来陆炎德等 24 人

六月二十一日

王大来等人大字报 2：《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

一一评六月二十一日所发生的事情

同志们：

六月二十一日所发生的事情，使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各派意见纷纷登台，对六月二十一日所发生的事情持什么现点，抱什么态度，成了区分真假革命的试金石。

我们认为，六月二十一日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股逆流，是一个大骗局，是一个阴谋，同时也是一次大出丑、大暴露。

我们见到我院左派力量没有被这个大骗局所蒙蔽，没有被这个大阴谋所吓倒。相反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挺身而出，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线，揭穿大骗局，粉碎大阴谋。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

现在一场更加猛烈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让革命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下面发表我们的意见，表明我们的态度。

大骗局

昨天的大会是个大骗局，

地质部党委迫于革命群众的压力，宣布高元贵撤职，聂克停职反省的决定是一个“舍车保帅”的大骗局。

为什么？请看以下理由：

何长工同志宣布高元贵第一条罪状是“非常傲慢，与地质部对立”，“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第二条罪状是“忠实执行了前市委修正主义的路线”。

这就是说，地质部党委对我院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高元贵的根子在前市委，和地质部丝毫无关。我院的文化大革命只要追出前市委的根子就行了，地质部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骗局，明眼人一眼就看穿了，地质学院的这些严重问题，怎么可能与部党委无关？王焕是地质部派来的，王焕来院近一年，我院的这条修正主义的黑线依然如故。这又将作何解释？

运动开展以来，工作队领导人是多么害怕揭露部里的问题。六月十六日斗争聂克的大会上，高治平和聂克眉来眼去的丑态众目共睹，当刚要接触部里的问题时，高治平慌忙将斗争会草草收场。这里面有什么鬼？

高元贵的撤职，是部党委耍的一个花招，其目的是为了牺牲车马，保住主帅。

大家还应注意，部党委在宣布决定时，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他们的罪状和错误的性质。根据大量揭发的材料，高元贵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而聂克是黑帮，是个党阀。可是胥部长的报告中仅仅把高元贵的错误说成是“不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连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都不敢说。

这又是一个大骗局，这是替黑帮分子打掩护，给他们留有余地，保护他们过关。说到底，是掩护我院黑帮的后台老板过关。

从昨天大会前后，高元贵、聂克仍然是神气十足，大摇大摆，脸带笑容。这不是足以说明了昨天的大会不是打击黑帮，而是保护黑帮。

同志们，大家要擦亮眼睛，识破这个大骗局，千万不要上当，

大阴谋

昨天的大会酝酿着一个大阴谋！

胥部长的讲话真是气势凶凶，使劲地给革命的群众运动泼冷水，是对革命左派进行反扑的序幕。有大量事实表明，一个更大的反扑阴谋正在策划和进行。

请看以下事实：

作为部党委领导的胥部长，在讲话中矢口不谈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支持，却气势凶凶地叫嚷什么“有人围攻邹部长”，“有人被坏人利用”，说什么“乌云总是遮不住天的”，把革命群众要求工作队领导解答问题，比作是对敌人下的最后通牒——“哀的美顿书”。并且还威胁群众说，要“明目张胆”地把名字写在大字报上。

我们要责问胥光义，你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你支持谁？你反对谁？你这是被革命群众运运吓破了胆。你的目的，就是要揪住左派不放，企图借口“被坏人利用”，“围攻工作队”这样一些吓人的帽子来把水搅浑，造成一片混乱，来一个更加疯狂的反扑，使“六·三”事件重演，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

我院的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革命的形势是大好的，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这是我院文化革命当前发展的主流。个别坏人混水摸鱼，乘机捣乱，也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决不是象胥部长说的那样，什么“围攻”啦，“被利用”啦，“乌云”啦，这是颠倒黑白，别有用心的。

昨天的大会还埋下了一颗炸弹，召开这次大会的真正目的，是把工交政治部李主任请来给工作队贴上一个“革命”的标签，以便堵住革命群众的口，不让大家揭发工作队的错误。（李主任刚从大庆回来，对我院运动的真实情况尚不了解。）他们巧妙的完成了这一步后，立即组织了家属、工人、机关干部和少数师生（少得可怜）的游行示威，其可谓“浩浩荡荡”。但却美中不足，游行队伍稀稀拉拉，游行队伍里喊出了“坚决拥护工作队党委的正确领导”，而地质部送来的大字报也发出号召，要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工作队周围”。在晚饭后的自发集会上，某些工作队员和工人喊出了“保卫工作队”的口号。

同志们！大家想一想，这些口号是十分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别有用心的，在这后面藏着一根“大棒子”，这就是“谁要是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反对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党”，因为工作队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是革命的。这根“大棒子”，“是一切牛鬼蛇神惯用的伎俩”，是打击左派的“法宝”。

同志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些天来，天天发生工人和学生的剧烈争论和摩擦？这里面有鬼，是和这个大阴谋密切相关的。

向革命左派的反扑已经有了信号，这就是某些工作队员（李延瑞等）对通讯社邓作禄等四人的围攻就是一例。

由于工作队这一系列的策划，打击了我院革命左派的威风，他们很多人感到压力很大；相反，却助长了牛鬼蛇神的气焰。他们却十分活跃，拍手称快。如聂克在宣布停职反省时的微笑；李武元参加拥护工作队的游行，王虹……等等，

这些都说明了什么？

一切革命左派要团结起来，不怕恫吓，不怕反扑，坚决粉碎这个大阴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中，把我们锻炼得更坚强。

大出五大暴露

六月二十一日是运动以来怪事、丑事最多的一天。现在大字报上已收集了几十件怪事和丑事。我们不妨举一、二例：

1. 堂堂地质部派来的声援队，却要打着“北京市工会”的旗号，来院以后又不敢露面登台，鬼鬼祟祟，这真是奇哉，怪哉！

今天的大会是部党委召开的，是谁找来这一伙不明真相的人物，来我院仅仅是声援我院的工人，那么我院的工人出了什么事啦？需要从地质部调人来声援。

其实，他们的目的，决不是声援革命左派来的，而是给工作队保驾来的。遗憾得很，革命群众眼睛亮，还没下车，就露了马脚，出了丑。

2. 昨天晚饭后，自发集会上，一名不承认是个“工作队员”的工作队员登台表演，挑拨工人和学生的关系，公开站出来冒充工人的身份说：“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坏人。”愤怒的革命群众揪住了这个家伙，盘问半天，才承认自己是工作队员，最后将他交给了工交部某同志。

一个工作队员干出这种丑事，是谁指使的？其用意何在？

这些丑事，大家已揭发了很多，我们不再赘述，但对这些丑事决不能一笑而过。这里面大有文章，我们一定把丑事的根子刨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

我们的态度

1. 撤销高元贵的职务，令聂克停职反省，我们完全拥护，这是我院革命左派斗出来的第一个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但这远远不够，我们强烈要求斗倒、批臭高元贵，坚决要求斗争聂克，坚决要求撤销周守成一切职务，把王焕从工作队党委驱逐出去。并且乘胜直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2. 有人设置大骗局，不让我们揭发地质部的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揭，一定要揪，只要黑线伸向地质部，我们就要穷追猛打。不管你职位有多高，权威多大，只要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绝饶不了你！我们希望一切知情人勇敢地站出来彻底揭发地质部的问题。

3. 现在有人要堵住我们的口，不让我们揭发工作队的错误，强迫我们承认工作队是革命的。不，我们决不听这一套。听其言而观其行，一系列事实，使我们不能相信我院工作队。我们希望就工作队是不是革命的这个问题，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用大字报形式展开讨论。对我院工作队如何评价，这是一个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让这场讨论继续下去，一直到工作队员正革命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正确领导运动为止。

4. 我们希望全院革命左派团结起来，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捣乱，破坏运动，也要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制造摩擦。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集中力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王大来、宋翔雁、许高燕等 46 人
六月二十二日

王大来等人的大字报 3：《我院黑线究竟伸向何方？》。

目前全院革命的左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与领导下，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好形势，地质部党委于 21 日匆匆忙忙宣布“撤消高元贵职务，令聂克停职反省”的决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让我们欢呼这一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现在高元贵还未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影响尚未消除，聂克还未斗争，周守成消遥法外，神秘人物王焕的面目尚未识破，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有待于全体革命左派大量揭发，乘胜追击，直捣黑线老巢。

不是现在有人口口声声，一再强调“高元贵十分傲慢，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难道我院长期以来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地质部党委没有关系吗？

一、我院的许多方针政策是直接受到地质部党委批示的。请看：

1. 在“1962 年我院工作方针任务”中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的颁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原来黑货“高教六十条”在我院推行是得到地质部党组批准的。这个条例的试行高教部原有批示，“高教六十条”是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试行的，其它学校的试行，必须经过所管部批准。为什么地质部党组要急于批准我院试行这一黑货。

2. 在“贯彻执行《高教六十条》1962 年规划”一文中谈到，在改变领导体制一节中说：“……院一级首先改组院委会。三月地质部已批准了我院院委会改组名单，进行任命……”原来我院“杂家院”院委会的形成是得到部批准的。

3. 地质部党组在我院第四届党代会的祝词中说“…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和部的领导下……”原来部党组是承认领导了我院的。那末我们要问：为什么现在要装上一副与我院只有经济关系的可怜相呢？这里有鬼！追！！（注：以上引自《北京地院十周年》1952—1962）

二、第四次党代会上，地质部党组的祝词说明了什么？

1. 部党组祝词，对我院 61 年前后，教育上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全盘肯定。

2. 祝词对我院今后的工作作了错误的指示，五条方针性的指示中连“毛泽东思想”五个字都没有，“阶级斗争”四个字都没有。而相反的却充塞着“必须贯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充分调动一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坚决执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为首的‘院委会’（实际上已成为杂家院）负责制。”这不是一条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相对抗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吗？

3. 整篇祝词中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仅在一处提到广大师生自觉的掀起学习主席著作的高潮。”但也只强调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提高思想水平。

4. 对我院向旧大学倒退大加赞扬，“……学校坚决贯彻了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加强了课堂教学……师生们钻研劲头很大，读书风气不断高涨，教学质量显然得到了提高。”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吗？（全文公布于后“奇文共欣赏”）

三、我院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计划。培养目标、教材原来都是在地质部直接领导和组织下进行修订的。

例如 1963 年 7 月在西颐馆召开的教育计划会议，集中了我院的“教授”“专家”“权威”，当时的卓副部长亲自主持，何部长与会并作指示。

1965 年教材会议，袁司长主持，明目张胆的提出了“先立后破未立不破”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提出教材编写“一瓶浆糊，一把剪子，以有为主”的修正主义路线。其它历次教育计划会议大都均在部直接领导下和组织下进行的。我们希望大家来揭发。

四、我院科研的“专家路线”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资产阶级科研方向，也有来自地质部的。

1. 十年科学技术研究规划，只请“教授”“专家”“权威”讨论制定。

2. 根据部党组在第四次党代会祝词中“以教学为主”的指示，我院在 1962 年科研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在选题上应注意结合教学需要，把理论研究放在首要地位。”

3. 地质部对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作了那些指示？王焕在 5 月 14 日党委会上说：“地质部的指示与市委（指旧市委）的精神完全一致。”与旧市委指示精神完全一致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呢？他们不敢拿出来，大家来追！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不禁要问，我院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究竟有多长，有多黑，它的根又伸向何处？黑帮分子聂克的根子又在那里？这要靠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用革命的大字报做战斗武器来揭深捣透。

革命的左派同志们，让我们紧紧的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乘胜追击，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王大来等 47 人
六月二十三日

这篇大字报是在陶世龙等人的指导下写出的。它名为揭发、批判高元贵，实则将矛头指向地质部。

政治教研室的“效忠信”与“革命小将”的反击

当时，在挑起辩论者中，最典型的是政治教研室。这些“理论家”在得知“薄一波批示”的“密旨”后，立即向工作队写“投名状”。他们以“公开信”的方式，向工作队表忠心。

针对政治教研室的“公开信”，岩石教研室叶德隆等22人随即写出大字报，予以反驳。此后，以黄平稳的《针锋相对、坚决反击，我们也来写封公开信——回敬给政治教研室》的大字报最为有名。

出自政治教研室“红秀才”之手的这份大字报，偷换概念，通过诡辩邪说，很有点迷惑人的味道，使不少对工作队有意见的师生对自己的观念产生了动摇。至少，使这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虽然不认为自己对工作队提意见有错，却又觉得这大字报中的歪理似有所本，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重新审视起来。

显然，要批驳这张大字报的歪理邪说，得有较高的思辨水平和文字功力。

时势在呼唤英雄。

在政治教研室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6月24日早晨，贴在北五楼北面广场东北角席棚上的一份批驳政治教研室大字报震动了全院，它高屋建瓴，论说有据、逻辑严密，思辨敏捷，条理清晰，笔锋犀利，将政治教员们为虎作伥、“卖身求荣”的嘴脸揭示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下子将这些“政治权威”打得落花流水。

而当大家看了这篇大字报的署名“11652 黄平稳”后，更是别有一番感慨。一个地质系一年级的学生，与政治教员们相比，只能算“乳臭未干”，“初出茅庐”。但是，他却把这些一贯高唱革命高调的政治说教者们驳得体无完肤，足见工作队搞得那一套不得人心，足见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的人格低下，道义没落。

师生们对这篇回肠荡气的大字报，无不拍手称快。人们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小将们挑战了！赞许的大字报贴满了席棚。

据说，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看了这篇大字报后，气得混身发抖。

反复播送的薄一波批示

6月25日12点半，正当吃午饭时，广播喇叭中突然传出了杀伐声：

现在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22日对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批示：“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薄一波的批示是反复播送的，总共播送了多少遍，估计当年没有人统计，现在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时候，大家正在吃饭，手里的饭碗顿时变得沉重起来，饭菜也失去了往日诱人的味道。往常熙熙攘攘的饭厅顿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

一听这广播，我立即愣住了。这哪里是广播，这简直是从天上往下扔炸弹，是往我们心窝里捅刀子。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前几天地质学院运动中发生的“引蛇出洞”的一切，原来，这真是一个“大阴谋”，是给我们这些自认为最忠实于共产党、毛主席的人设下的陷阱。想不到，薄一波、邹家尤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竟能这样对待我们这些跟共产党走的人！

这时，我才意会到，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事实、真理，在权势面前都会变得一文不值。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只有起诉，没有辩护！只有判决，不能上诉！

当“反党”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的时候，我才想起“反党”的要义。多少年来，我们天天想着说着“听党的话”，时刻都在做着“党的驯服工具”。从欢迎工作队进院起至今天，我们虽然给工作队提过意见，对运动中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出发点上说，从内心的愿望上说，我们都是力图正确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为搞好党的事业而奋斗的。

谁曾想，我们却成了“反党分子”。不容置疑的是，薄副总理已经将“反党分子”这“金印”刺在我们的脸上。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到了这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了由“反右模式”衍化出来的一个“次”原则：“一贯正确”与“反党”和“反党集团”只是钱币的两面。当权者对“批评”、“提意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但有人对他们提点“批评”或“意见”，神经立即就紧张起来。为了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他们就会立即动员起权势所能动员的一切手段和力量，对“批评”者或“提意见”者进行讨伐。

当我走到宿舍楼门口时，我坚定了信念，我们听党的话搞文化大革命，没有错！

勇敢的 11622！

《郑重公布 11622 评论组名单》

不少人说，11622 班是地质学院“斗争”的缩影。因为在文革前、文革初，我们班的同学间有矛盾，有摩擦，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窝里斗”。1967 年 4 月 3 日成立的地质学院革委会的 9 名常委中，我班就占了 2 名（聂树人、孟繁华）。在“地质东方红”一统天下的地质学院，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内部也有反对派——“蔡派”。两个“兵团”各有四名成员，共 8 个人。其中，11622 班就占了 3 人：殷惟侯、吉让寿、孙司权。

我经常在问自己，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说明了什么？

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植根于北京地质学院这座以劳动者子弟为主的“平民院校”中，如我这样的贫民子弟占有绝大的比例。在我的一生中，特别是青少年时代，老师、同学对我人品批评指责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个性太强”，“好争论”。从我们的祖辈到我们，一生都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奋斗。没有竭尽全力的奔波和奋斗，下一顿就可能要饿肚子。严酷的生存现实迫使形成了与达官贵人大相径庭的生存意识和社会意识。什么“中庸之道”，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什么圣人皇帝、伟大领袖，在生与死的抉择中，这些说教都会变得黯然失色。生存活动的无助性和“自主性”滋生了我不屈的个性，进取的个性，创新的个性。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个性集中起来，铸就了我成为“造反派”的个性。

“个性太强”不仅铸就了我及我们 11622 班独立思考的品质，也铸就了北京地质学院广大师生不屈的钢铁风骨。

不幸的是，在薄一波批示这把“尚方宝剑”即将初试锋芒的前一天，1966 年 6 月 24 上午，工作队和保皇派们还没有弄清“11622 评论组”这个极端可恶的“组织”的底细。因为我们班没有内奸——“班奸”，他们根本无法弄清 11622 班这个深洞里的“大毒蛇”究竟有几条，每条有多粗有多长。6 月 24 日上午，68 级的几个“积极分子”在饭厅贴出一张“大字报”，激“11622 评论组”道：“敢不敢把你们的名单公布出来？”

这张“引蛇出洞”的大字报我也看见了，一笑置之。

可是，当我回到南五楼 411 宿舍时，却看见常健民等同学已经在桌子上铺好了纸，吆喝着：

“谁是‘11622 评论组’的，请来签名。”

我一看，在《郑重公布 11622 评论组名单》的大标题下，已经有十几位同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笔迹看，都是自己的亲笔。但是，赫然于第一位的是“聂树人”三字，却是他人代笔的。对此，我当然不能，也不会有异议。我是“评论组”的主要组织者和执笔者之一，即使杀头，我也得挨第一刀。

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最后，全班 31 个人，有 27 个人在那张名单上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没有签名的有四人：工作队的拥护者张正万；对工作队态度不明朗的三人马文章、王天德、吴婉玲。这三位同学以前在党组织眼里有“不闻政治”之嫌。

下午，这张凝重的“大字报”就被常健民等同学贴在了南饭厅最显眼的地方。

我们班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业绩和事情，但我要说，这件事情是我们 11622 班班史中最闪亮最辉煌的一举。那时候，大家都明白，我们是在同地质部-工交口的大神们对峙，这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一顶“右派”帽子就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它随时都可能扣死我们。大家已经明显闻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是工作队胜利，还是我们胜利？我们的胜算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当时，对许多同学说来，如果不签名，不“自投罗网”，完全说得过去，至少，班上没有人去追究他们。如果形势翻了过去，除过我们两三个起草者外，谁都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但是，我的英雄的同班们没有畏缩，敢做敢当，挺起胸膛，壮烈地站到了历史的台前。在他们看来，过去没有将自己的大名签写在大字报的下面，以示“负责”，似乎是一种耻辱。大家坚信自己在为正义而战。胜也坦坦荡荡！败也坦坦荡荡！即便败了，与其被人在挤兑中屈辱地死去，不如大喊大叫着走向台前。

今天，我仍然怀着崇敬的心情，要对我同班同学们说一声：谢谢！无论这件事是大是小，是对是错，你们都是好样的。

难眠的午睡

在我们 11622 班，当薄一波副总理的批示公布之后，大家的心都沉了下来。中午饭后，一反往日的热烈，默默地回到宿舍后，都很快躺在床上想心事。三个宿舍都静悄悄地。

大家都午睡了，又都没有睡着。

此时，宿舍楼下，不断传来拥护工作队的口号声：“坚决拥护薄副总理批示！”“坚决拥护工作队的领导！”“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谁都想得到，这是保皇派正在庆祝他们的胜利。

他们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也懒得爬到窗口去看。

那些几年前在“反右”中得了实惠的一些人的教诲和现身说法，现在果然成了事实。过去，“反右英雄”们得到的一切，现在已经在某些（特别注明：不是全部）胜利者的眼前晃动。

秩序！秩序！这是孔老二儒道的本质，也是孔老二不为百姓尊奉却被称为王者封为“王”的原因。

秩序！秩序！这就是薄一波批示的本质。

这时，我只想大喊：连批评领导干部的权力都没有的人民，哪里还谈得上当家作主！哪里还谈得上人权或民主权利！

“众不敌寡”的“讨论”

浓云密布的 6 月 25 日下午，我们 11622 班遭遇了一次“众不敌寡”的场景。

下午午睡后，在我们班上蹲点，一直受到冷落、冷战的王姓工作队员，通知全班开会。

不用说，我们也知道要开会，也知道会议的内容。

会议开始后，王队员首先按照工作队领导的指示，将伟大的薄副总理的批示再宣读一遍，讲解一遍。接下来，问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再接下来是讨论。

没有人发言。在当时情况下，薄副总理的批示能讨论吗？敢讨论吗？薄一波批示就是真理，而这真理是不能讨论的。

不发言不行！王工作队员的要求是，全班同学必须人人表态。

我班的 31 名同学能有什么态度呢？在较长时间的冷场之后，记得首先是我班唯一的预备党员袁长清发言。他痛哭流涕地承认，他是在听了薄副总理的批示后，才翻然醒悟到自己错了，才意识到工作队是真正革命的，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党。这说明，自己在运动中站错了立场，已经滑进了阶级敌人的泥坑。他希望工作队能给自己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以便重新做人。

袁长清家庭出身好和有预备党员的身份，曾是我班工作队“扎根串连”的第一对象。但是，本底的品质加上全班正义的气氛很快就使他倒向我们一边，成为批评工作队错误的干将。他同我一样，没有想到薄副总理会做出如此荒唐的批示。但是，这毕竟是现实。为了保住自己的党籍，他只能检讨了，只能“郑重”地认错，痛哭流涕地表示坚决悔改，放弃“自我”。

我当时就对袁长清的这一表态表示非常理解。他自文革开始以来，几次动摇，都为党员这个头衔所累。按他以前在班上同学心目中的位置，加之他现在又成了执政党中的一员，在班上应该有最高的威信。但是，由于他忽左忽右，过分计较“党籍”的得失，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的威信也就大为降低。这一点，袁长清自己是清楚的。不要说革命者，就是世俗人，也不喜欢倒戈分子。

接着，全班其它同学也都陆续作了低调的发言。王队员这时一本正经地拿着笔，将每个人的发言要点不停地记录下来。显然，他在会后还得向上级汇报。

这表态首先应该看作是每个人对自己灵魂的一次审判。

总结我班表态的情况，对工作队，大体可分为拥护者、“不反对”的拥护者、认错者和不认错者四类。

拥护者

在薄一波“6.22 批示”公布前，张正万是站在工作队一边的看客。说他“站在工作队一边”，是因为，那段时间，他确实拥护工作队对高元贵进行讨伐。说他是“看客”，是因为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参与过一场辩论活动。

那么，张正万为什么拥护工作队讨伐高元贵呢？

事情还是出在张正万的助学金问题上。刘和林在张正万的助学金问题解决后，找张正万谈话说，他早就把这问题反映上去了，是高院长不理睬这件事。到工作队打击高元贵时，一向好打抱不平的张正万就成了“看客”。由于王队员和他住上下床，两个人又常常交换对运动、对高元贵的看法，所以，他就同工作队的关系近了起来。和班上的其他三个“逍遥派”对比，特别是和班上大部分激烈或较激烈反工作队的人相比，张正万就成了事实上的“保皇派”。

于是，在“反干扰”开始时，张正万就“高奏凯歌”了。

但是，在面对我们大家的时候，他肯定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因此，他只是到了会议的最后，才说了一句话：拥护薄副总理的批示。

“不反对即拥护”的“拥护者”

我班可划入“‘不反对’的‘拥护者’”行列的，有三位同学：马文章、王天德、吴婉玲。所谓“不反对”，指“不反对工作队”，相对于我们这些被认为“反对工作队”的人而言。要不是王队员一再说说明要人人“过关”，这三个人肯定像往常一样，是不会发言的。

由于我班“反对工作队”的人占绝大多数，于是，对工作队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拥护”的人，就被归入到“拥护者”之列。

据我的记忆，我的这三位同窗是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过的。因此，他们不能划入“入党积极分子”之列。

认错者

全班的“认错者”有五六位，除袁长清之外，有张绪龙、颜文瑞等。这几个人当然都是“11622评论组”的成员。因为大家都“自投罗网”地将自己的大名签写在那份“郑重公布”的“名单”上，公开表示过自己是“反对工作队者”中的一员，白纸黑字，这时想赖也赖不掉。

在这几位中，只有袁长清反对工作队的态度鲜明，行动积极。也只有他在薄一波批示公布之后，糟蹋自己深刻。

这几个同窗的“认错”、“检查”和“悔改”的表态，比起袁长清来就逊色多了，显得极为浮浅和“应付”。他们只是说：“我们拥护薄副总理的批示，我们错了，要检讨。”

不认错者

持“不认错”态度的同学约有二十位。大家的看法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都是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教导我们说：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我们对地质部领导和工作队领导提意见，是希望改进领导作风，以便领导大家做好各种工作，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热爱党的表现，不能视为反对党的领导。因此，有的人的表态是“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没有错。”有的人的表态是“对薄副总理的批示不理解。”总之，大家都认为自己没有错。

我的发言很简单：

“我觉得，自工作队进院以来，我自己没有什么过错。6月2日以来，我们不是一直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我们对工作队确实有意见，对地质部领导确实有意见，因为我们认为，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大家揭发领导的问题，不管是谁，都可以揭发。工作队不应该划框框，定调子，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们向工作队提批评意见，是爱护工作队的表现，是热爱党的表现，而绝对不是反党。是有功，而不是有错。因此，我对薄副总理的批示很不理解，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说。”

和我持同观点的同学的表态大同小异：

“我没有错！”

“我不认为自己错了！”

“我还没有意识到我错了！”

“我对薄副总理的批示很不理解！”

难产的“11622班文革领导小组”

人人对薄一波批示“表态”之后，下一步是成立班上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于班上拥护工作队者只有一人，张正万就成了当然的组长。按规定，副组长或组员得有两个人选。从我班的具体情况出发，这两个人当然得从三个没有反对工作队的人中选出。可是，王队员挑来挑去，只选中了一个马文章。他力促从27个人中挑选一个，最后确定的入选者是袁长清。

就袁长清个人说来，他也乐于当这个“组员”。如果以当时的政治形势定案，他的党籍肯定是保不住的。不过，按照常规，组织处理总要放在运动后期。什么时候才算后期，谁也说不上来。于是，袁长清就会有一个再表现的喘息时期。而如能当上“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身上就有了一层保护色。再加上班上的相对情况，他的党籍或许就能保住了。

地质学院“伪文革”的成立

6月25日，在各班成立的“文革领导小组”算是全院“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基层组织。此后，各系成立了系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最后成立的是院级。

院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我也不知道。据《东方红报》的文章：

院文革38个成员中，2名工作队员，15名学生，其余都是教职员。它既没有经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也没有以革命学生为主体，更恶劣的是它的成员全是清一色保工作队的，其中主将都是“六·三”事件中的保皇派，“反干扰”中的急先锋。工作队的座上客——大资本家出身的研究生指导员赵璧媛也当上了院文革的成员。

“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名叶大元，是研究生。副主任有几位，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名工人叫蔡文槐。

地质系的文革委员会是如何成立的，我不清楚。可能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资格参加选举。

我们从不承认“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合法性。因为：

一，没有通过全院师生的酝酿和推荐，没有通过大家的选举，完全是由工作队指定的；

二，它的成员都是由拥护工作队的人组成的，也就是说，是清一色的保皇派。因此，在我们的心目中，它只代表工作队，我们习称其为“伪文革”；

三，“伪文革”自成立之日起，协助邹家尤工作队对革命师生大批大斗大镇压，是工作队“反干扰”的前线打手。

第11章 反干扰？“不服！”

地质学院最黑暗的45天

“反干扰”概况

据《大事记》：（6月25日）地质学院工作队公布了薄一波的所谓“批示”作为上方宝剑，在“先扫清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斗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反工作队的干部要揪住不放”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干扰”运动，历时二十三天之久，十三名革命干部、教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七一庆祝党的伟大生日时，还召开大会斗争革命师生。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什么“反党干将”、“现行反革命”、“特务分子”等等，许多同志被整得吃不下，睡不着，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度摧残。有的同志被迫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通不过，必须承认是“主观上反党”。

1966年10月13日《东方红报》文章《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革命中两条路线的回顾与展望》：

“在‘反干扰’中，工作队用杀一儆百的手段，把带头反对工作队的干部教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辟大字报专栏进行围攻。召开几百人至上千人大会斗争，并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处理其中八人。他们之中，有人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被认为是‘通不过’，继续进行逼、供、信，‘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66年9月30日《首都红卫兵》以“地质学院的白色恐怖”为题，发表文章：

反干扰恶果统计表(学生中的)

被大字报点名者				被撤职停职者				被迫检查者	被整理材料者		
总数	红五类子弟		党团员	总数	红五类子弟		党团员				
	人数	比例	人数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19	115	52.5%	149	68%	66	53	80.3%	58	87.9%	435	125

注：仅统计68个班，每班按三十人算

在“反干扰运动”中，北京地质学院究竟有多少师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没有全面的确切的统计。

据我们11622班的情况，在“对工作队有意见者”中，“被迫检查者”的人只有很小部分，多数属“不认错者”——当然也不会检查，难以统计。

这些“又臭又硬的石头”肯定不限于我们班。由此可以看出，没有“检查”而被整的人还没有统计进来。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本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学习材料管理组”¹⁵编的《大字报选》，内中“选”了四篇“大字报”。最后一篇是由探工分会《反逆流》战斗队写的“大字报”。大字报在列举了“反干扰”的“丰功伟绩”后说：

为了打击广大革命师生、干部，工作队采用了极其卑劣和恶毒的手法。

一、歪曲受迫害人的出身历史和政治表现。如说一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志，“家是国民党窝”；把有的同志无中生有地说成是“小流氓”，“个人野心家”，对党有“刻骨仇恨”等，借以达到挑动同学仇恨这些革命教师、干部的目的。

二、分化瓦解，拉一批、打一批，力求全歼。如对“首恶分子”中的二人，工作队开小会“攻心”，开大会斗争。并对“知情人”和其它“骨干”以挽救为名，行政治贿赂（立“功”赎罪）之实，逼迫引诱他们“揭发”。

而七月二十六日，在工作队撤离前夕，还向院政治部、保卫科布置“内清十二条”的黑文件（由地质部保卫部发），对探工系革命师生、干部进行审查、排队，以便清洗。当时连劳改地点在宣化、五台等地均已确定。（黑体，是作者所加）

三、对同学施加压力，挑动学生斗干部。第一次斗争王××的大会开过后，因气氛“不足”，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卞固发雷霆，说：“没有阶级感情，没有阶级斗争观点”，强迫同学讨论改进办法。为此，一工作队员段××逼迫71632班一同学上台发言，并让他拿一个篮球当作王××同志的头，一边骂、一边练习发言。真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四、限制人身自由，剥夺政治权利。

当时被定为“反党”的同志，在“反干扰”时不准外出，有人盯梢，甚至洗澡均有人“陪同”。有人干脆不发出门证，连买日用品也要请假。有的十七级以上干部不让听党内文件传达，有的同志甚至被禁止参加党团活动。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残酷打击，白色恐怖笼罩全系，同志间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反干扰”前生气勃勃的局面完全消失了。

七月二十九日工作队宣布撤离后，反动路线通过保皇组织院文革、红卫兵、工人赤卫队等继续对革命干部、教师、学生进行迫害，工作队临走前公开宣称：“干部、教师的问题，待运动后期处理”，甚至在中央有关撤销工作队的指示下达后，工作队仍继续在探工系保留十二至十四人的材料组，工交党委张××公然锐：“干部的材料不准退”。

在这种情况下，“院政治部”在八月二日曾通过一个五百多人的大签名，对探工系一百八十多人贴出的彻底清算工作队执行的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进行大围剿。并且通过陪斗、抄家、骂“狗崽子”，甚至公开斗争被工作队打成“反党”的革命干部，来继续对探工系革命师生施加压力，进行政治迫害。

卡米尔·德穆兰曾经描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简单的注视、忧戚、同情、叹息、乃至沉默，差一点都变成罪行”。这也是地质学院“反干扰”时期的状况。

卞固：养你们不如养群狗！

从6月25日下午开始，我们班，以至整个地质学院，已经“没有了”不同意见，只有右派与左派之分。没有了欢跳，没有了歌唱，只有“反革命分子”的哭泣和“革命左派”的扬眉吐气。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6. 23报告”。

《大事记》对李雪峰报告的记载如下：

当此之际，正是北大、师大、地质、清华、人大等许多院校革命造反派反工作组风潮兴起，此起彼伏之时，刘邓司令部慌了手脚，李××（指李雪峰——作者注）同志为此在北京饭店召集市委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报告”。他把革命师生反工作组说成是“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制造了一个混蛋逻辑：“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他耸人听闻地说：“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这个报告是李雪峰同志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纲领。

6月下旬的某天，王工作队员通知我下午去教工食堂听报告。

教工食堂也是个可容纳千余人的大会议室。邹家尤工作队的副队长卞固向我们“传达”了李雪峰报告的内容，他边抽烟边传达。在我的记忆里，他说的话要比后来李雪峰自己回忆的内容严厉得多，给我留下了“杀气腾腾”的印象。他当时特别提到了在“广播台”工作的学生们的“不规行动”¹⁶。他说，广播电台是党的要害部门，这样的要害部门一定要掌握在左派手中，否则右派就要变天，纳吉就要上台！因此，工作队将这些人赶出了广播台。镇压的血腥味极为浓烈。或者，卞固在传达中也加进了刘少奇的一些讲话精神。

朱成昭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据他的回忆，卞固在这次的训话中，竟骂造反派学生：“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¹⁷

¹⁵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存在的时间约一个月，即1967年4-5月。

¹⁶ 正是这些学生于1966年6月中旬在广播台成立了“高旗无畏战斗队”。

¹⁷ 据宋永毅对朱成昭的采访。

盘点“左、中、右”

听完卞固报告，我们11622班的同学都有不祥的预感。在回宿舍的路上，自动聚集在教工之家东南侧水池的南岸。待到全班聚齐，才发觉情况不妙。我班共有31人，这次听报告的人却只有17、8个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凑集到下述情况：

第一批被通知听报告的人只有4个人，是拥护或未给工作队提过意见的四个人：张正万、马文章、王天德、吴婉玲，应视为左派。

第二批听报告的同学，原是与我们同观点的，因为“悔过自新快”、“检查深刻”，而被视为“中派”，有五六个人。其中的代表人物袁长清，还有张绪龙、颜文瑞等。

第三批，即我们这批人，都是如卞固副队长说的：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应视为右派。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可悲”的人——班上还有没有听李雪锋报告的三四个人，如封书凯、常健民等，他们都不是党团员。

针对对薄一波批示的态度，我们已被划在了“右”的行列。回想到刚才与“黑帮”聂克、周守成等坐在一起听报告的情形，想到自己从此将进入“五类分子”行列，心里就无限悲凉起来。

站在批斗台上的李贵

从6月25日开始的“反干扰”运动，地质学院有13名教员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全院大会批斗。

上述13名教员干部中，除李贵外，大都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其中，二十多岁的人，都是由共产党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留校工作不久的年青人。能留校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又红又专、百里挑一的好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可是，这些人在几天时间里，都突然间变成了反对自己党的“反党反革命分子”。

我曾被安排参加过两次在大饭厅举行的批斗李贵的全院大会。

批斗会与其它人的批斗会没有什么两样。当李贵被工作队的打手们以喷气式押上主席台时，会场里自然是拳头林立，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可是向党表忠心的关键时刻：忠不忠，看行动。对于我们这些人说来，不仅看你对阶级敌人恨不恨，斗得狠不狠，更要看你对“同伙”能不能划清界线，能不能“六亲不认”。

我坐在饭厅的后面，离主席台远远地。我挤在人堆里，尽量缩着头，为自己参加这样的大会而羞愧，为自己不得不参加这样的大会而愤怒。但是，既然不得不来，就不得不有所表现，以免引火烧身。在大家都高举拳头呼喊口号时，我不得不举起握不拢的拳头，嘴巴或许动了动，但是，绝对发不出一点儿声音。

上到台上的批斗者个个都“义愤填膺”，指责李贵是“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凶恶的阶级敌人”。

不时有人向李贵发问：

“你为什么要反对工作队？”

“你知不知道工作队是毛主席党中央、新市委派来的？”

“谁指使你反对工作队？”

“你们的反革命集团叫什么名号？”

“你的反革命同伙还有哪些人？”

“你们的反革命黑后台是谁？”

“你们的反革命纲领是什么？”

在暴力之下，李贵只能弯腰低头，蔡文槐还时不时地走上前，不是从背后给上一闷拳，就是用劲将他的头再往下按一按！时不时，还要对着李贵的小腿踢上一脚，要他两腿并拢。

我看不到李贵的脚前有多湿，只看见他脸上的汗珠在不断地往下滴答着。

李贵不屈。他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装聋作哑，胡说八道。比如在问他谁是他的黑后台时，他回答说：

“李庚尧。”

“李庚尧对你是怎么说的？”

“记不清了。”

“你什么时候见过李庚尧？”

“5月份。”

台下一片轰笑。

谁都知道，李庚尧只不过是个挂名的连党委委员都不是的副院长，长期养病。名义上分管教学辅助工作，其直管下属却是党内职务比自己高的党委常委、教辅处处长李贵。

“你态度不老实！”蔡文槐义愤填膺，一个推搡几乎把李贵搡倒。

李贵在台上遭受宰杀，如同寒光闪闪的刀子一刀又一刀地刺进了我的心窝里。

台上台下呼喊的口号除了“打倒李贵”外，更多的是“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党！”“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工作队就砸烂谁的狗头！”

“李贵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大来向党请罪”

批斗王大来的会我没有参加过，但是，王大来写的“请罪大字报”我却看到过两三份。

可能的情况是，如袁长清一样，反工作队“态度坚决”的王大来也为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身份所累，不得不被迫向工作队表示悔过。记得，“反干扰”开始后，王大来贴出的第一份大字报题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大来向党认罪书》，第二份大字报题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大来向党请罪书》。从“认罪”到“请罪”，顺理成章！

单是看这题目，就知道他已被迫认为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接下来的事情只能是查根源，找问题，上纲上线，自己给自己脸上糊屎，自己给自己罗织罪状。结束语必然是，希望工作队能谅解他，能感念他认罪态度好而能免于将他当敌人对待，免于或减轻对他的处罚。

我的看法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认罪”和“请罪”中，糟蹋自己可以，糟蹋别人不可以。只要不失民族气节，只要不损害他人，自残自饿，那是自己的自由和选择。

文革以后，王大来就消失了，很少与地质学院昔日的造反派来往。他是彻底转变了看法呢，还是为自己的检查而悔恨呢？

据说，2009年，他因心脏病过世了！

无奈的陶世龙老师

陶世龙老师是地质学院的元老级人物，勤于进取，多才多艺。文革前，曾写过不少科普读物，为在全国普及地学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爱才的高元贵的重要助手和“红人”。在文革初期，在工作队“打‘高’保‘周、聂’”的方针政策下，陶世龙就必然要受到“横扫”。有人以“杂家”的罪名对他进行“修理”，有人似是而非地将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

硬骨头江祖如

江祖如原是地质系三年级的政治辅导员。由于他态度鲜明地支持李贵等人的上访行动，支持学生对工作队提意见，而被工作队列为“反党分子”，遭到大会小会多次批斗。

七月中旬一天的下午，不是开饭时间，不知何因，我进了南饭厅，发现这里正在召开批斗会。批斗对象就是江祖如。我以前对江老师并不熟悉，只知其名，不识其人。这一次，才算“名‘副’其实”，将名字与人“叠置”在一起了。只是，“叠置”的场合有些蹊跷。

批斗会场设在饭厅北头，主席台是一张条桌，“观众”座南面北，江老师并不站在会场正中，而是站在东侧，面向“观众”。

江老师是个硬骨头，他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昭张着人生的坦荡。批斗者都是他的学生，有没有老师或干部，我没有注意。我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人念批判稿，而是向他发问：说过什么话，开过什么会之类。还不时有人领呼口号。其中针对江祖如的口号有：

“江祖如必须低头认罪！”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反对工作队的人没有好下场！”

江老师对提问的回答很简单，不是“不知道”，就是“没有”。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进而对那些强加于自己头上的罪名予以驳斥。

这又使我沉闷的心情为之一振。我在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样的场面。我能不能也像江老师那样大义凛然呢！

学生对老师，抑或老师对老师，如此地残酷无情，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在那里停留了两三分钟，就赶快离开了。

其它班同学对“反干扰”的抵制

对“反干扰”采取抵制的远不止我们11622班。

李玉昌¹⁸:那时，我是我们班“文革小组”的组长。工作队给我们开列的批斗对象有郑平安和另一个同学。我采取的抵制办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对工作队员说，11623班没有适于批斗的对象。又因为我与邹家尤有特殊关系，工作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因此，郑平安等同学就逃过了被批斗的一劫。

陈宝堂¹⁹:工作队进学校后，我对他们的工作有意见，但反对不积极。在成立班的文革领导小组时，由于同学们的推举，我成了班上的“文革小组”成员之一。崔清和，一因反工作队积极，二因家庭出身于“小业主”，工作队就把他列为首先批斗的对象。我认为工作队有错误，为什么不能提批评意见？一提批评意见，就说人家反党，荒唐！而且，要学生批学生，我不能做这种事，坚决不干！因此，工作队就对我有意见了，

后来，我与工作队还是闹翻了，闹翻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一张大字报引起的。我们年级政治辅导员高广立、李荫增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因为反对工作队，工作队的人就要大家揭发他们。一天，有同学在工作队的主使下写了张大字报要我们签名。我没看内容，稀里糊涂就先签上了我的名字。但是，一看内容我不干了。原来这篇大字报是“敦促”我们这些文革前的班干部（我当时是副班长）揭发两位辅导员的。大字报上也点了我的名。其意是说，我当年也是两位辅导员的“黑干将”。我想，这不是捉弄人么！你们“敦促”他人揭发，是你们自己的事。但是，你要我在“敦促”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大字报上签名，就不对了。

说心里话，我本来就对工作队这样整人有看法。因此，就借此与那个同学和工作队员干起仗来。

永远的11622

“不能批斗聂树人！”

我是“11622评论组”的组织者和三篇“评论”文章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在工作队看来，我是班上“最反动”的一个，理应是首批批斗对象。

但是，批斗我的会议却始终开不起来。

要批斗我，先得在班上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里形成一致意见。但是，令工作队极度失望的是，“11622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三个成员的一致意见是“不同意”！

张正万，文革前是我的铁哥儿们，执着而倔强。他一听工作队要批斗我，立即就是一连串的“不行！不行！”他对工队员和系工作组的领导说：“聂树人反工作队是反错了。但是，要批斗他，我不同意！我了解他，他出身好，一贯要求进步，这次错误只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对认识问题，只能教育，不能批斗！”

张正万之所以有如此大义凛然的表态，那是因为他和我一样，有在自我奋斗中形成的独立人格——从来都不在乎伯乐的好恶，从来都不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还因为，他并不看重“文革组长”这顶“官帽”和由此可能形成的“进步”资本。所以，他可以以健康、正直的心态看待一切。这看法或许有片面性，但是，它首先是自己的看法，是不为风头潮流左右、绝不顾及伯乐脸上阴晴圆缺的独立见解！有了这种独立的人格，有了这种健康的心态，就有了平等待人的自尊和自重，就有了说真话的勇气。

领导小组成员袁长清本是我们的同类，他和张正万一样，不会成为工作队整人的帮凶。

从工人家庭走出来的马文章，当然也不会拧着劲儿与张正万唱反调。对于借政治运动整人那一套，他压根儿就反感。

班上文革领导小组的这种态度，使工作队及王队员为难了。

在通常情况下，工作队完全可以以组织的名义撤换“文革组长”，“踢开”班上的“文革领导小组”。但是，在11622班，踢开了他们，谁又比他们更合适？

“聂树人你也溜不掉！”

为了消灭11622“白色据点”，为了对我这个“右派”加以打击，工作队领导曾经颇费心思，企图从外部对我们班施加压力。他们在地质系三年级（68级）找到了几个愿意“为虎作伥”的学生，写

¹⁸我的同级11623班学生，后在河南省区调队工作，任党委书记。

¹⁹勘探系三年级学生，“红色尖兵”负责人，毕业后，在青海省地质局工作。

出了两三篇讨伐我的大字报。因为他们对我、对我班情况不大了解，篇幅都不长。其中，有一篇大字报的题目是《聂树人，你也溜不掉！》算是其中的杰作。这张大字报历数我“上窜下跳”，“极力反对”工作队的“罪行”，只是“帽子”多，罪名吓人，具体内容却并不很多。

他们的那几份大字报如同几粒微尘落进一潭死水中，在11622班没有激起一丝涟漪。班上的“文革领导小组”连工作队的账都不买，还会在乎其它年级几个学生的鸹噪！

工作队何尝不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但是，11622班没有可以利用的“班奸”，没有从“堡垒”内部发动攻击的人，也就谈不上“里应外合”！

他们既没有多数可用，也没有少数可用。

我们11622班的同学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可以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可以和你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我尊重你的人权，坚决不出卖你，坚决不告发你，不把你往“百分之五”的火坑中推！

多年来，我一直在内心里高喊：11622班万岁！

第12章 毛泽东支持，与权贵的肉搏

7.18.邹家尤的“假检查”

7月18日晚，工作队突然通知全院开大会，邹家尤以“总结和动员”为名，“破例地作了一点羞羞答答的自我批评，根本未触及‘反干扰’的错误实质，仍然大言不惭地说‘反干扰’是必要的。”

无独有偶，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也在7月18日晚，作过类似的检查。据说，弄得北大师生莫名其妙——在轰轰烈烈地搞了一个多月“反干扰”之后，他突然检查了，要立地成佛了，岂非咄咄怪事！

邹家尤和张承先检查的具体时间又是“晚上”，大有“开夜车”，“加班加点”之态。这不能不使人有所联想和判断：突然检查好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另有心隐。

后来知道的情况是，7月18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并对工作队加以否定。

于是，刘少奇等立马往下布置退缩，可又不敢说得明白。

据《大事记》记载，只是因为诚心不足，张承先的检查“没有能骗得了北京大学的革命造反派”。邹家尤的检查同样没有骗得了地质学院的师生。

这也难怪，如果这些“一贯正确”的人有主动检查错误的习惯，何至于要“开夜车”检查。

《东方红报》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还说：

“他们转移斗争矛头，一反常态地要立即掀起一个新的揭发院党委的大字报高潮。这样一方面使广大群众不去批判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他们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又可以倒打一耙，谁要再揪工作队的问题，那就会被扣上‘破坏运动’的帽子。”

“他们毁灭罪证，借留学生要来院为名，将‘反干扰’期间的大字报全部拆除刷净，将整理的所谓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字报选编1~6期全部收回。以应付上级的突然检查，防止被错斗的群众起来翻案。”

7.26.工作队的“真用心”

其实，工作队决不死心。“反干扰”的惯性使然，七月二十六日，他们还向院政治部、保卫科布置“内清十二条”的黑文件（由地质部保卫部发），对革命师生、干部进行审查、排队，以便清洗。当时连送“右派”师生去劳动改造的地点都选好、确定了：在宣化、五台等地。

7.27.对“恐怖校园”的“爆破”

朱成昭等向工作队开炮

直到7月27日上午，地质学院的师生对中央上层发生的争斗还一无所知。

7月27日早上，水文系学生朱成昭等在大饭厅前的大字报席棚上贴出了一份声讨工作队的大字报，只有几条。头一条就是“彻底清算工作队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此外，好像还有“工作队的矛头错了！”其它几条记不清了。这张大字报显然是草草写就的，每条“错误”的后面都没有正文内容，属标语口号式，总字数不过百余字。

但是，不因为字数少，工作队和保皇派就能容忍。由于“反干扰”的进行，二十多天来，校园里已经没有了“杂音”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石激起千重浪”，贴出不久，围攻者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般地压了过来。据统计，围攻的大字报有750多张（份）。

这些大字报在给工作队大唱赞歌，大喊“保卫党”的同时，大叫“右派又出笼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这一切，构成了地质学院7月27日上午的“主旋律”。

这说明，不仅造反派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况，连保皇派也不明白。

“反干扰”后所形成的政治气氛是，连咳嗽的声音都得掂量大小。不要说给工作队贴大字报，就是对保皇派飞去一个怒眼，也会立即被指责为“对党不满”。

具备“斗胆”的朱成昭等人因为这张近百字的大字报，而成为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这 750 多张大字报是对英雄之举的非难，显示出“敌对者”与“英雄”之间的距离极短。

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的情况是，朱成昭的弟弟（朱成华）在北京大学上学，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活动的情况和消息很快就传到朱成昭的耳朵中。朱成昭和郑文卿等同学一起，于 25 日、26 日到北大聆听了万人辩论大会的情况。在得知了中央最高层的最新动向后，他们于 27 凌晨急急赶回学校，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写出了那张大字报，打响了地质学院讨伐工作队的第一炮。

聂树人：十三个教员干部是革命的！

在朱成昭等人的大字报遭到 750 张大字报的围攻中，我也“英雄”了一回，于当日午后贴出了一张题目为《李贵等十三名教员干部是革命的！》的大字报。

我的这张大字报的草稿早在十几天前就写好了，只是没有胆量抄好。从 1966 年 6 月下旬到 7 月中旬，我愤愤不平的是，工作队不揭发，不批判走资派，却竭力在全院批斗 13 名教员干部，竭力把全院师生分为左、中、右，并组织“左派学生”对十三名教员、干部和众多的“右派学生”进行批斗、批判和声讨。在我看来，正是这些批斗、批判对象才是敢于说实话，一贯忠于国家、忠于共产党的有为之士。

在这篇大字报中，我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地质学院的镇压活动造成的是“白色恐怖”。

我之所以将大字报的题目定为《李贵等十三名教员干部是革命的！》那就是在向高天厚土宣告，与十三名教员干部持同样观点的师生都是革命的！在我看来，只要给十三名教员干部平了反，就等于否定了工作队的“反干扰”，就等于否定了工作队！

因为文稿太长，我请班上陈正国、孙司权、沙丁茂等三个同学帮我抄写。当时，学院内仍笼罩着浓浓的白色恐怖气氛，对我的请求他们都脸露难色。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我对他们说：“如果出了问题，坐牢杀头我一个人兜着，保证不牵连大家！”相处三年多，同学们了解我的为人。而且大家心里也都憋足了气，二话未说，关起门，就帮我抄了起来。记得近 20 张大字报，一个上午就抄写完毕。

吃午饭时，我一个人提着浆糊桶，把我的大字报贴在大饭厅前那排大字报席棚的西端（靠近南饭厅，即现在的餐饮中心附近）。

7.29. 向“神”宣战的大会

据《大事记》：

7 月 29 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 7 月 28 日（撤销工作队）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工作组长）的官。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都讲了话。

这次大会，我事前就不知道。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级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显然有着一种“透明”和“一竿子插到底”的考虑，反映了毛泽东急于扭转局面的心态。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参加这次大会的“积极分子”绝大多数是“反干扰”的积极分子，是保皇派。

撤消工作队，这一举措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反潮流的。它的影响深远巨大，它第一次动摇了执政党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党的大人物终于从神变回了人。至少，人们开始认识到，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誉和他誉的那一群人，也会有人犯错误。深入思考下去，原来共产党上层（中层下层就更不用说了）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如常人一样，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也有争论，也有勾心斗角，也有“你死我活”。

刘少奇是中国政坛上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大神。他及其他中央大神都是“一贯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的。一个月前，薄一波的一个批示，即陷数以万计、十万计的师生于右派的泥潭！那原因就因为，他是党中央神庙里的一个并不特别大的神！如果工作队当时将刘少奇的讲话和批示公开，地质学院和北京高校“反干扰”的残酷程度不知还要惨烈多少倍！

因为他们“都讲了话”，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就都被“还原”成了人。

事实上，1966 年，是中国一切大神，一切权威威风扫地的年代。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7·29 大会”最后揭下了中央所有大神“一贯正确”的面纱。

“高旗无畏”第二次占领广播台

在邹家尤工作队撤离地质学院之前，最有影响力的战斗队是“高旗无畏战斗队”。这个战斗队是在院广播台工作的十几位同学于1966年6月20日前几天成立的。当时，在学院广播台工作的学生刘万恩、刘梅、黄瑞华、郁秀荣、李智民、钱萍、卢光瑞等，通过广播发表声明，宣布成立“高旗无畏战斗队”。

高旗无畏战斗队一成立，就第一次占领广播台，同工作队展开了搏斗。

6月25日，他们被赶出了广播台。6月下旬，工作队副队长卞固在“教工之家”传达李雪峰报告时，就严厉谴责过“高旗无畏战斗队”，说他们“占领了电台”，“夺了共产党的权，夺了无产阶级的权”。

7月底，“高旗无畏”战斗队第二次占领广播台。他们宣布，脱离院文革领导，加入到批判工作队错误路线的行列中来。在当时的地质学院，在当时的北京市乃至全中国，这实在是一件重大事件。当时，全院的大权还掌握在工作队及其拥护者“伪文革”的手里，可是，广播台却易手了！工作队的天好象塌了一大半。

显然，“高旗无畏”的造反，舆论工具的倒戈，对宣布撤离而实际并未撤离的工作队和顽固执行工作队错误路线的“伪文革”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正在酝酿成立“东方红战斗大队”的造反派师生员工，对“高旗无畏”战斗队的造反义举欢欣鼓舞，大家长久郁积于心中的冤气、怨气，终于有了一个高声发泄的渠道。

我的“孤军奋战”

从7月27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我就豁出去了。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此举失败，横竖，“右派”是当定了，与其让人宰割而死，还不如高喊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来的痛快！因此，在此后的十几天里，我又连续写出了多份揭发、声讨、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

那些日子，如同6月20日前后一样，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又成了我的一切。有时，一天一篇，有时，两天一篇，有时，一天两篇。为了加快速度，我一般不打草稿，边想边写。桌前一站，毛笔一握，几张，十几张，有时二十几张全开大纸上，就出现了洋洋洒洒数千字……

为了不连累我的同班，我这时写大字报都是孤军奋战，自己写，自己贴，只署我一个人的名字。

到了8月初，随着讨伐、控诉工作队罪行的大字报的逐渐增多，在我贴出两三份大字报后，我已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师生们先是从大字报上知道了我的名字，后是在我贴大字报时，又具体认识了我这个人。当我再贴大字报时，就有素不相识的同学来帮忙了，有的人帮我刷浆糊，有的人站在高凳子上往席棚上贴，我只需要指挥，不要贴乱就行了。

此后，随着中共最高领导层对文革态度的逐渐明朗化，声讨、控诉工作队迫害革命师生错误和罪行的大字报就成了地院大字报的主流。8月8日，《十六条》公布以后，地质学院揭发、控诉工作队的大字报急剧增多，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毫不过分。因为大字报席棚面积有限，有时，刚贴上的大字报浆糊还没有干，就会被后来者贴盖上了。因此，许多新贴的大字报不仅注明贴出日期，还特别贴上一个“保留×天”的字片。就这样，有的作者还不放心，会有人守在大字报旁边。

1966年8月，到北京，到地质学院串连、看大字报的师生很多。高峰时，每一个大字报席棚前都围满了人。

一些大字报因为时效性（针对性），贴晚了就会失去作用，因此，一些作者不得不将大字报贴在大字报席棚前的马路上。我曾在马路上这样干过两次。这样的大字报寿命很短，往往只能保留半天，就会被踩踏成泥。

李雪峰成立“八办”，继续顽抗

撤销工作队的正式决定是北京新市委在7月28日作出的。可是，早在7月25日，工作队的派出者和组织者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部署撤退的“善后”工作了：在正式传达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指示”的之前，李雪峰、陶鲁笳就要求工作组撤走前必须做好三件事：

- (1) 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
- (2) 成立临时院党委；
- (3) 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陶鲁笳（原在国务院工交口协助薄一波工作）临时被调往新市委，任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陶鲁笳上任后，立即成立了八个办公室，分管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抽调原工作队人员到办公室工作。无疑，这意味着“控制”和“指导”运动的“工作队体系”的建立。这些原工作队人员，

都经过严格挑选，堪称“反干扰”干将。比如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组组长杜万荣于8月初从学校撤离后，即被加封为北京新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指挥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谭力夫文革”和其它院校的“伪文革”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李雪峰、陶鲁笳要求办的这三件事，显然也不是李雪峰、陶鲁笳个人的心血来潮。至少，将陶鲁笳调到新市委工作这样的人事变动，不是李雪峰和陶鲁笳所能决定的，也不是薄一波所能决定的。只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才有这样的权力。

工作队移权“伪文革”

7月29日，新市委宣布，工作队撤销。可是，留了个尾巴：工作组还不能马上走，要留校“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

我在初次听到这消息时，很为欢欣鼓舞。但是，仔细分析，他们并没有走的意思。因为何时撤出，没有规定最后期限。他们还要等一等，还要看一看。如果刘少奇打败了毛泽东，那他们就“永远”也不会撤出了。这就给工作队巩固其“反干扰”成果，建立、巩固、完善“不走的工作队”（“伪文革”），即“第二工作队”争得了必要的时间。

在地质学院，根本就不存在“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的气氛和机制。此前，在“反干扰”期间，工作队不仅建立了“不走的工作队”——“伪文革”，还处处将它推到运动第一线，使它得到了锻炼。此时，“造反派”被打爬在地上，还没有站起来，还没有发言权，上上下下都是保皇派当权。

在这种情况下，由谁出面“组织整训”？

正如探工系大字报《从探工系“反干扰”看“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中所揭发的，甚至在中央有关撤销工作队的指示下达后，工作队仍继续在探工系保留十二至十四人的材料组；工作队还公开宣称：“干部、教师的问题，待运动后期处理”。工交党委的张××公然说：“干部的材料不准退”。

为了使“反干扰”永不刹车，邹家尤工作队利用撤而未离的半个多月时间，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能明显感知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组织保皇派为工作队大唱赞歌；

第二个方面是进一步充实加强“文化革命委员会”（“伪文革”），主要是帮助“伪文革”组织和成立“斗批改兵团”和“地质学院红卫兵”；

第三方面是由“伪文革”独立出面，继续进行“反干扰”，对造反派大加挞伐。其中的一个活动是将“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说成是造反派的“黑后台”，而对之大批大斗。

在这期间，按照邹家尤的指示，“伪文革”停止批斗十三个教员干部，全院的运动转入“斗黑帮”阶段。

为了培养“伪文革”独立工作的能力，邹家尤等工作队领导逐渐放松、放长了拉在他们手中的操纵线。“伪文革”为表明自己不负领导栽培，极力以残暴的方式对待教员、干部，以渲染自己的“革命性”。

“伪文革”以院政治部名义，在八月二日曾通过一份五百多人签名的大字报，对探工系一百八十多人签名的彻底清算工作队执行的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进行大围剿。他们还通过陪斗、抄家、骂“狗崽子”，甚至公开斗争被工作队打成“反党”的革命干部，来继续对探工系革命师生施加压力，进行政治迫害。

第13章 东方红公社成立

东方红战斗大队时期

东方红战斗大队成立

以朱成昭为首的一些人的串连活动始于7月底8月初。最初的活动地点在教四楼。



教4楼西端
(东方红战斗大队在这里成立)

朱成昭，这个出身于高干家庭的调干学生，同清华附中那些“老红卫兵”一样，不仅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胆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工农子弟所不具备的广泛的社会联系面和高层信息来源。因此，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早期的风云人物，不仅贴出了地质学院反工作队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被公推为“东方红战斗大队”的第一把手。

庄一龙：最初，我们只是在教4楼的教室楼梯夹墙间秘密聚会。很快，公开支持反工作队观点的人多了起来，有几十个骨干分子。因此，就公开把教4楼一个教室作为联络点，人员也很快增加到几百人。

工作队在“反干扰”中，大力追查“黑会”、“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行动，在大家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现在，要建立一个与“伪文革”对抗的组织，这无异于进一步“打开党禁”，要将天捅个大窟窿。

东方红战斗大队的成立大会是在“教工之家”，即教职工食堂举行的。参加的人有200~300人。

接着，在晚上8点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十六条公布，东方红战斗大队的队员们又冒着大雨游行，庆祝这一重要文件的公布。

庄一龙：东方红战斗大队成立后，没有公章。当时，就用长方形肥皂刻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大队”作为标记。肥皂图章仅使用了3天。随后，去商店刻了个同样的木头章。我记得，9月，我第一次去串联时，还使用这个简单的木头章。

朱成昭，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战斗

正当朱成昭等酝酿成立一个全院性群众组织的时候，地质学院来了一个“看大字报”的女军人。从营房到普通高校，中间隔着一段不算短的“距离”，一个有“闲暇”看大字报的军人出现在大字报的席棚前，这本身就不同寻常。而且这军人还是个女的，年轻，20多岁，圆润的脸蛋上戴着一幅精制的眼镜，聪慧漂亮，引人注目。她是否与一些师生交谈过，我不得而知，但是，几天后，她直接找到教四楼，征求朱成昭及其它人对“形势”的意见、看法和打算。她的一身军人装束，一开始就解除了大家对她的警惕。那时候，假冒身份，特别是假冒军人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她自称自己是“中央工作人员”，具体的工作部门和职务她都没有说，我们也不便进一步追问。

那个时候，我们是无缘接近中央的，我们都很想知道中国最高层对这场运动的看法。因此，对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中央工作人员”，只有百分之百的相信。

不几天后，我们就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她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女儿李讷。

在21世纪，“东方红”的人是如何具体知道李讷的“身份”的，众说纷纭。我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一定时候，她肯定要将她的身份“亮”出来。试想，她的父亲派她到高校了解情况，干预高校的运动，不亮明身份，如何干预？在她对北京高校情况普遍了解的基础上，选择了地质学院，造反了朱成昭。这时，她就会将她的身份“亮”出来。反过来说，人家不愿意“亮”，你再问，又有何用？

那时候，我们只是隐隐约约感到党中央上层出现了裂纹。但是，对这裂纹的宽窄和深度并不清楚。那时，我们还不可能把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同李讷的到来联系起来，更不可能明确理会到这件事的深层意义——毛泽东把这叫“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女儿对女儿”。我只是想到，李讷的“暗访”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是毛主席不便自己亲自出面，而派他的女儿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回去后向他汇报。我还没有估计到，派自己的女儿出来了解情况，表明，毛泽东对他身边的人员，已经不大信任。

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证明，李讷和其母江青的行动，绝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单是她们的特殊身份，就决定了她们的行动和言论的影响力——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女儿和我们这些“右派”、“反革命”站在一起，这意义非同寻常。

朱成昭与李讷的联系，从此建立。从此，以朱成昭为核心的“地质东方红”的斗争，就处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

我不想进“东方红”核心组

在“东方红战斗大队”筹备串连之初，朱成昭曾派其它学生找过我两次，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共同筹建“东方红战斗大队”。我对他的回答是，我可以作为发起人，但是不参加核心组。我的承诺是，我不会再组织起另一个群众组织与他的组织并立；我只愿做“11622 东方红战斗队”的队长，服从大队的领导。

我那时对权势看得很轻。

一些革命家在提起“造反派”时，马上就神经质地将这个名称与“野心家”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大谬不实。我拒绝的主要原因有五：

一是，怀疑自己的领导能力，认为自己从来就不是一块做官的料。

二是，在潜意识里，对做官者的霸道、非人道，党情胜于亲情、常情（据说这叫“政治”），极为反感。小学和初中时，一茬茬坏村官给我留下的坏印象，初中时因“漫画”而遭批判，高中时因“作文”而几乎险入“另册”，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的“艰难”，进入大学后当“驯服工具”的艰难和伯乐（政治辅导员等）对我的不屑，都使我对官场没有好感。我宁愿自己当老百姓入“另册”，也不愿为了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干有违良心的事情。

三是，“不结盟”，以免在“再来一次”运动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排除交代“反革命黑会”及“黑后台”之类的没完没了的麻烦。那时，我对中央上层的斗争并不了解，心有余悸，总认为薄一波、邹家尤们随时都会反扑过来，掐断我们的喉管。我知道，我的“反工作队”的所有活动都已被人家记录在案，迟早会被送上批斗台或“断头台”。为了不牵累别人，我抱定了单枪匹马地同工作队及其继任者作战。

四是，不想因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而被人“翻烧饼”。结党结派必营私，其实质只有一个：利益的争夺。我能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已经心满意足，别无他求。

我绝没有在这里“标榜”自己的任何意图。我唯一的用意是想表明，说我们是“野心家”、“想当官”、“想捞好处”之类的那些臆断和指责是何等的荒唐。

工作队撤离地院

邹家尤检查：继续“排除干扰”

《大事记》：八月十二日晚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全院师生作了仅仅四十二分钟的“检查”，极力回避要害，顿时激起了东方红战士和广大师生的愤懑，顿时响起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但何长工、邹家尤置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在“工人赤卫队”戒备森严的重重护卫之下，逃之夭夭。会后，“东方红”战斗队自行组织揭发批判工作队的大会，伪院文革野蛮地拆除了广播器。

8月12日晚上，工作队在大饭厅（礼堂）召开了一次邹家尤检查大会。因为会议主题有吸引力，全院师生都参加了。为了能听得真切些，我提前到了大饭厅，坐在距主席台只有几米远的位置上。

邹家尤的“检查”脱不开一般的检查程序，先是总结工作，然后是罗列工作队的成绩及“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其主要内容包括他们进院以后，“带领全院师生”，“排除干扰”，批斗了多少“牛鬼蛇神”，批斗了多少“反动学术权威”，写了多少“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开了多少次批斗会……

谁都知道，邹家尤“检查”中说的“排除干扰”的含义。这表明，邹家尤们仍然坚持“反干扰”的立场。他虽然声称：反工作队不能说是反党，并向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学生赔礼道歉，给他们“平

反”，但是，他并没有批判工作队“扎根串连”，组织、支持保皇派打击造反派的罪行。因此，邹家尤“检查”后半部分“存在问题”一条的内容就成了“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不紧，对中央领导指示的精神理解不深”，“对阶级斗争抓得不力”……

我越听，心里越寒。如果邹家尤对“党中央”的部署了解得更深些，抓“右派”更有力些，我们还有活路吗？而且，《十六条》（8月8日公布）墨迹未干，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8月12日公布）言犹在耳，邹家尤就敢于公开对抗党中央的决议，继续坚持“排除干扰”的立场，他们还服不服从共产党中央的领导？

妖魔化文革的人们一直说“造反派”“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从上述邹家尤的“检查”中，人们能看出这一点吗？

邹家尤的“检查”尚未完毕，会场上就发出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这呼声中也有我的声音。在邹家尤检查临近尾声时，大家就开始齐声高喊“通不过”。在他“检查”完毕后，我立即站在凳子上大呼：

“工作队的检查是个大阴谋！邹家尤不是在检查，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强烈要求工作队重新作深刻检查，邹家尤必须给我们彻底平反！”

此时，坐在主席台边的学生，有人跳上台去，站在麦克风前，义愤填膺地揭发批判邹家尤工作队的倒行逆施和镇压师生的严重罪行。只因“伪文革”的破坏（拆除了广播器）而无法进行下去。

何长工在邹家尤检查时和检查结束后，没有说一句话。这至少说明，他是同意邹家尤检查的。

随后我才知道，原来，邹家尤并不是自己想检查，并不是自己想要走，而是不得不检查，不得不走——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领导层排序的下降，不仅表明他们“反干扰”路线的失败，也表明他们至少在近期已无卷土重来的希望。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才有了吴德的检查²⁰，也才使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中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欢送革命的工作队员，邹家尤留下！”

1966年10月13日出版的《东方红报》是如此描述工作队撤出情景的：

八月十三日下午四点钟，伪院文革组织欢送工作队。披红戴花，载歌载舞，乐器齐鸣，热闹非凡。“向革命的工作队致敬！”“工作队本来是革命的，检查以后更革命”等各种颂扬邹家尤和工作队的横幅标语琳琅满目。东方红战斗队写的“工作队属于第三类”等标语牌横遭指责以致撕毁。同一天撕毁了“东方红”队旗，打伤了“东方红”同学，捣毁了“东方红”队部。工作队在一片群众斗群众的喧哗声中心安理得，若无其事，在人墙之中，南辕北辙，又犯了一次“方向路线”错误²¹。

晚上在（原）政治部某些人的策划下，打手们又涌向播音室，用暴力夺取了电台，“高旗无畏”被迫发表“以团结为重暂时退出广播电台”的声明。院文革得意通知：接管了通讯社……

工作队党委精心策划和导演了这一系列践踏十六条，逃避批判斗争和夺权的丑戏，严重地破坏了我院文化大革命。在此后，他们更加阴险地、变本加厉地使用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对抗和破坏十六条的鬼把戏，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负隅顽抗，死不悔改。

我是在偶然中发现工作队撤离的。当时（8月13日下午四点左右），我好象是在走出南五楼时发现这一情况的。我向东望去，看见学12楼工作队驻地前及往东的马路上有一股不见首尾的人流，有的人还举着标语牌之类。我觉得奇怪，就跑了过去。到了学12楼前，看到学生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欢送革命的工作队员！”“邹家尤留下！”“邹家尤后会有期！”等。这时，我才知道工作队正撤离学校，但是，已经看不见工作队员的影子。我估计，他们刚刚离开。在从学12楼到校门口这几百米路段，挤满了学生。从情况判断，正发生着反工作队的人要前进，保工作队的人要阻挡的大搏斗。

事后我从其它同学嘴里听说，为使工作队体面地撤出，事前，工作队与“伪文革”曾进行过精心的准备和筹划。最重要的准备是，他们组织了一帮身强体壮的工人来“维持秩序”。“造反派”学生在发现了工作队要撤离的情况后，立即自发地奔赴学12楼前。此时，在学12楼前，正在上演一出“红军撤离苏区”式的闹剧——保工作队的“伪文革”及其拥护者正在给工作队开欢送会。会上还扭秧歌。据说，有一个女学生在会上“痛哭流泣”地向工作队表示“感激”和“致敬”，差一点跪在邹家尤的面前称“爸爸”。他们说：“工作队本来是革命的，检查以后更革命！”

²⁰据《大事记》：8月12日，吴德代表新市委检查了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会上传达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通知》，宣布“于最近两三天内，工作组的全体人员全部撤出。”

²¹工作队出东校门，本来应该往南走。可是，为防“东方红”堵截，往北绕道而行。

面对这一情况，被工作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们觉得自己对工作队撤离也应该有所表示。于是，大家又各自为战，草草地作了点“准备”——在纸板或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上标语口号……

“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来“欢送”工作队，这可算得是“今古奇观”。不知道社会学家们如何来解释中国的这种特色。

工作队出得东校门，立即就上了等待在那里的大轿车。可是，他们不敢按正常路线沿学院路南去，去地质部或去地质干校，而是向北开走了。这就是上文《大事记》中所说的，“在人墙之中，南辕北辙，又犯了一次‘方向路线’错误”的由来。

其他院校，在工作队撤出时，也发生了同地质学院大体一样的事情。

——8月13日，清华工作组不明不白地撤走。坚持要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同志，要求叶林等工作组负责人留下，听取群众的批判，而伪临筹却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工作组，甚至肉麻地称呼“最最敬爱的叶林同志”，并要王光美、叶林等留下当“联络员”。

其它，如北京外语学院，北京邮电学院，轻工业学院等无不如此。

——8月14日，（北航）执行了50多天错误路线的赵如璋上台作了12分钟的“检查”。而后，伪院文革急忙开始“斗黑帮”。

这就是经过半个月“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后，工作队给师生的答卷！
我被关进了保卫科

“伪文革”及其领导下的“保皇派”按照事先确定的程序，在欢送会结束后，立即护送工作队离校。而因为有时间差，草草集拢起来的“造反派”们则是“乌合之众”，少数人赶在了撤离队伍的前头，绝大多数人则被“断后”的保工作队的欢送者们阻挡在队伍的后边。

有这么一帮“反革命”跟在正在撤离的工作队队伍的后面，而且高举着标语牌，高呼着令邹家尤们肠子痛的口号，还拚命要往前挤，显然有失体统。于是，“伪文革”先期准备的打手（主要是膀大腰粗的工人）就出动了。他们先是横在马路上不让“欢送”的队伍通过，但是“造反派”不甘示弱，一拥而过，前赴后继。打手们阻挡不住，就冲进人群中去夺那些令他们十分反感的标语牌。

这时候我正好赶到，看到了我班同学常键民，他高举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用红色粉笔写着“欢送革命的工作队员，邹家尤留下！”两个工人正欲从他手中夺下标语牌，由于他个子小，眼看就要失手。我立即冲上去护卫，并拚命推阻。我边推阻，边大声对工人们说：

“你们要认清形势，不要同学生为敌！”

“你们的敌人不是学生！”

“工作队滚蛋了，你们不要再为工作队卖命了！”

当时，还有一些人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护卫和“宣传鼓动”下，不少工人的阻挡行动不起劲了。要不然，我们这些书生，哪里是身强力壮的工人们的对手。标语牌没有被夺走，“欢送”者的队伍在小乱中保持着自发的队形仍然在继续前进。这使在现场指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感到很不愉快。大概他们看我最不顺眼，就另派了几个“铁杆”工人，冲进队伍里，专门对付我。他们当然不敢在人厅广众之下打我，几个人用力把我从“欢送”者的人群里拉出来拖走。我被他们拖过大操场，拖过马路，拖进设在北五楼东头一层的“保卫科”，关了起来。一路上我不断地挣扎，大声抗议，却无济于事。



学 10 楼（北五楼）的东头，当年学校保卫科之所在
(1966 年 8 月 13 日，我即被关在这里)

那时，学校里绝大多数人还不大认识我，未到“欢送”现场的人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一些人还认为我是坏人哩！

我被关在一间房子里。我喊，我打门，却无济于事。过了约 10 分钟，听到外面没有了动静，我将门一拉，它居然开了，楼道里和其它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估计是工作队已经乘车离去，“推阻”的任务已经完成，负责“保卫工作”的打手们心虚，很快就“不辞而别”了。当我从里面出来时，看到“保卫科”的门口已聚集了一些人。一些人大概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看到我出来后，有人想找绑架我的人论理，但是，却又找不到人。

事后，我才知道，当我被关在“保卫科”时，“伪文革”正指挥保皇派打手“捣毁”“东方红队部”，撕毁“东方红大旗”，打伤东方红战士。

“高旗无畏”被赶出广播台

捣毁“东方红战斗大队”队部的事我没有看到，但是，傍晚时，由“伪文革”一手操纵的工人赤卫队以暴力强占广播台的事我却看到了一部分，“听”到了大部分。



学 10 楼（北五楼）西头北面
(当年，院广播台位于此楼西头一层。
其北边当时有一砖砌的垃圾仓)

我们上大学后，学院广播台一直设立于北五楼一楼西段。进入广播室的楼道口有一扇坚固的木门，门扇中间有一根粗粗的大铁闩，可以从里面闩上、锁上。有这一扇门作屏障，再加上十几个人守卫，要冲开这一道门是不大容易的。

在此之前，“高旗无畏”战斗队已经意识到广播台将是“伪文革”反扑的一个前沿，因此，早就加强防护，严阵以待。

但是，书生毕竟是书生，哪里是膀大腰圆的工人的对手。8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在“伪文革”策划和指挥下，一伙身强力壮的工人向广播台发起了冲击。那扇大门很快就被挤破。“高旗无畏”的战士们在护门不成的情况下，挤拥在一起，在楼道组成一道厚厚的人墙，阻止工人们再往里冲。但是，工人们并不把柔弱的学生放在眼里，他们对学生们拳打脚踢，下死力气，把一个又一个学生从人堆里拉出来，扔到楼外。由于楼道狭窄，我们在外面的学生根本无法进去增援。最后，他们终于将“高旗无畏”战斗队的成员一一撕扭而出。由于争斗异常激烈，守卫的学生全部被打伤、撕伤，有的学生血流满面。

保皇派占领广播台以后，出力最大的工人个个志高气扬，以为给“伪文革”立下了莫大之功。在北五楼西端北侧，我看到印刷厂的一个工人满头大汗地从一楼窗口跳了出来，长出一口气，向广播台方向看了一眼，洋洋得意地蹲在围护垃圾的矮墙上，点起一支香烟猛吸。

“东方红”队部被捣毁，广播台被抢占，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被撕毁……同6月25日播送薄一波批示一样，在工作队刚刚撤离的8月13日，地质学院又一次笼罩在血腥之中。

为给“东方红”战士打气，我写了一篇大字报《红旗永不倒，烈火炼真金！》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这张大字报贴在北五楼前最醒目的大字报席棚上。

保皇派“斗批改兵团”成立

“一斗、二批、三改”或简称“斗、批、改”，是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即《十六条》）中规定的重要内容。为迎合其中的“斗、批、改”内容，为了同8月8日下午刚成立的“地质东方红战斗大队”对抗，8月9日，“伪文革”即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并挂出牌子。“兵团司令”是研究生班的商锡钧。

在此之前，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传开以后，为了赶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时髦，工作队和“伪文革”将保皇派中的“红五类”组织起来，在8月中旬，率先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可悲的是，无论是叫“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还是叫“斗批改兵团”，都掩盖不掉它们是北京高校中保工作队最铁杆的队伍的真面目。

站在“伪文革”后面，并操纵它的，就是地质部党组，就是地质学院原党委书记王焕。

“东方红公社”初期

“东方红”公社宣言

《大事记》记载：

（8月17日）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了，它是由原东方红战斗大队等联合组成的一支有千余革命闯将的突击队。它抵制了反动血统论，正确地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了一切革命同志，组成了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军！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世称“地质东方红”，成立于1966年8月17日。

8月8日，东方红战斗大队成立。

“八·九”大反扑，教育了我们，必须组织起来。短短的五天时间就建立起五十多个战斗队，宣布脱离院文革委员会，自己闹革命。

“八·一三”大反扑，表明了“伪文革”的强大和顽劣。又进一步教育了我们，光组织小型的战斗队，力量太小、太分散，难以打胜仗，还必须联合起来。

于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就应运而生了。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为了彻底完成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主要任务，经“东方红”战斗大队，《红勘联》，《红物联》，《红普联》，《红水联》、《探工战斗联队》、附中“东方红”支队、《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革命造反队》等革命学生组织的民主协商，联合成立“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公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以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作为纲领，以毛主席的话和党中央的指示作为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

“东方红”公社是以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革命的党团员为领导核心。“东方红”公社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实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东方红”公社充分发扬民主，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彻底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东方红”公社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革命左派，依靠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依靠革命的党团员，彻底孤立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经过斗争，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95%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充分揭露他们，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彻底完成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防止帝修进行颠覆阴谋和实行“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是关系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前途的斗争。因此，马马虎虎、模棱两可、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改良主义的作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高度的革命热情，以彻底革命的精神、严肃的科学态度投入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目前这种阻力在我院还是很顽固的，很强大的，因此“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有敢想、敢说、敢问、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敢字第一，破字当头，做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坚决抵制、批判、斗争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就是暴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造反。造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的最可宝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不革命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现在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封建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

在今后的斗争中，“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自觉地、积极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谦虚谨慎，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革命坚持真理，为革命修正错误，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觉悟，增长才干，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充分利用大字报这种新式武器，进行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逼、供、信，反对以力服人，要用文斗，反对武斗。”东方红”公社认为，“六·二〇”好得很！“反干扰”糟得很！以邹家尤同志为首的原工作队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我院有极深的影响，严重阻碍了我院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了党中央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严重威胁着我院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根本任务的完成。当前关于工作队向题的大辩论，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目前的大辩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

“东方红”公社认为，前我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工作队一手包办产生的，而且一直贯彻着工作队的压制民主，打击革命派的错误路线，已经不能代表我院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意志，已成了我院文化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宣布脱离原院文革的领导。另外，在筹委会成立以前，原院文革委员会只能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不同意见的双方充分讨论，协商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均由原院文革委员会负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1966年8月17日

从《东方红公社宣言》可以看出，“东方红公社”是各系学生组织民主协商、联合成立起来的，是大联合的产物。

研究生班曾经是工作队“反干扰”依靠的主要对象。在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以钱新为首的一些学生也造反了，成立了“革命造反队”。

当时，“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革命造反队”人数不多，与各系的联合体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毕竟是一路“诸侯”，且在全院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成了全院大联合的对象。

吴鉴：东方红公社刚成立时，只有800多人，我记的很清楚。那时，800多人在高校中算是最强大的队伍。

公社的组织机制是：院“总部”——系“分会”——年级或班“战斗队”。跨班的年级战斗队不普遍，最著名的有勘探系三年级的“红色尖兵”战斗队，探矿工程系三年级的“赤卫兵”战斗队。

即使到了东方红公社成立时，“右派-反革命”虽然转变成了“造反派”，但是，师生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作好夺权和掌权的准备。因此，《宣言》在宣告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为“过去时”，宣布它“已成了我院文化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宣布脱离原院文革的领导”后，又不得不表示：“在筹委会成立以前，原院文革委员会只能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东方红公社”的发展壮大

“东方红公社”是在“血统论”甚嚣尘上时，成立和发展壮大的。它不分出身，只要你承认《东方红公社宣言》的精神，你就可以加入。

东方红公社成立后，先后成立的各种组织都集中体现在“联”的组织上。黄振群、胡轩魁、王大来、刘文德等干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干联”；贾振远、江祖如等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教联”；在家属中，以李贵夫人为首，成立了“红眷联”；后来小学生中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小兵”。这些群众组织都隶属于“地质东方红公社”之下。

当时，大学里的教员、干部多数不是“红五类”出身，年纪大的教师又多有较为复杂的经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工作队进校后的“反干扰”，保皇派学生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黑帮”的批斗，使他们成为惊弓之鸟或运动对象。他们中，有的人（如政治教研室的一些教员）投靠了工作队，希望自己能在又一场“反右斗争”中立新功；多数人则只能小心翼翼地“走着看”或度日如年。他们对工作队和保皇派对自己和同类的伤害深恶痛绝。

由于“东方红公社”执行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革命的队伍就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教员干部大都站到了“东方红”一边。在她成立两个月之后，“伪文革”和“斗批改兵团”就最后土崩瓦解，地质学院成了“东方红”的“一统天下”。在北京的高校中，地质学院是最早由一个“群众组织”掌权的学校。

师生凑钱买“广播”

“高旗无畏”被迫离开广播台后，“造反派”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哑巴”。此时，大家更感宣传工具的重要。在现代社会里，没有了舆论工具，就等于没有了真理，就等于没有了公正，就等于没有了存在，就等于没有了一切！

怎么办？

将广播台反夺回来，那又得动用武力，弄不好，会发生武斗。根本问题是，以武力夺回广播台，那时的“东方红”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五大三粗的工人都依附于“伪文革”的旗下，拳对拳、脚对脚的争夺，“地质东方红”哪一个学生都不是这些“巨无霸”的对手。

那时候，“老红卫兵”虽然对“反动学术权威”、“三名三高”、“五类分子”和“黑五类”大动武力；“反干扰”中，保皇派虽然对造反派大批大斗；在“8·13事件”中，工人虽然对“东方红总部”和“高旗无畏”战士拚命撕拉，以至动手动脚，但是，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武斗，更不可能形成有规模的“武斗事件”。

“地质东方红”有一个永远的自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历史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只要给我们以平等，我们就会胜利。出于这样的自信，“地质东方红”的师生们决定自力更生筹建一个广播台。

朱德瑜：当时，学院的财务掌握在老保手中。大家就弄了一个捐款箱，请大家捐。老师们很积极，但是大家都穷，最多的捐10元。拿捐来的钱去买材料。“高旗无畏”也从院广播台里面弄了些材料出来，修理一下。当时在马路上装了两个大喇叭，因为声音小，只能等学院的大广播停了，才能播。但是，咱们的播音员水平高，外地来京串联的人听广播少，一听，还误以为是中央台在广播。广播的内容又是他们喜欢听的，影响很大。

当时，只有两个大喇叭，架设在学院中心地带——办公楼（学九楼）东边十字路口的白杨树上。因为喇叭少，虽然不能形成声音的网络，但是，它设置在中心地带的这个点上。更重要的，在人们的心中，这个“东方红广播台”的声音并不比“保皇派”控制的“院广播台”的声音弱。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它的声音更为强大，因为真理在它这一边。

记得，当“东方红广播台”第一次广播时，大家心情极为激动，排着队，齐集十字路口，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凝听。

“斗批改兵团”的“斗批抄”

“斗批改兵团”的一个主要业绩是抄家。据可查材料，他们共查抄了104家。

被查抄的主要人员及被查抄财物（据地院革委会接管小组实物接管时数字）如下：

1 冯**：

各种衣物、料子、皮、毛、丝绒、绸缎、毡毯等共21箱。

存款187713.00元，公债445元，现金（约）1203.99元，粮票208斤，工业卷220张，相机4架，手表18块，金锭29个，金镯7个，金链币1个，金币10个，戒指17个及各种杂物15筐箱。

2 袁**：

各种衣物、皮、毛、丝绒、绸缎等共27箱。

存款5873.05元，公债195元，现金628.59元，粮票133斤，工业卷61.8张，各种表9块，及各种古今书籍、字画古物及杂物共13箱。

3 杨:**

各种衣物、皮毛、丝绒、绸缎等共 13 箱。

存款 16110 元，手表 5 块，金链 2 条，金条 1 根，项链 1 个，金镯一个，及各种杂物 8 箱。

4 张**

各种衣物 3 箱，杂物 3 箱及家具。

存款 8000 元，公债 58 元，现金 5250 元，金镯一个，粮票 310 斤，金怀表 1 块，金币 5 个，表链 1 个项链 1 个。

5 王**

存款 17818.20 元，公债 710 元，现金 519 元，粮票 56 斤，工业卷 75.4 张，相机 1 架，手表 3 块，戒指 7 个。

6 张**

各种衣物 3 箱，及其它杂物。

存款 900 元，公债 191 元，相机 1 架，手表 2 块，戒指 1 个，耳环 1 对。

7 许 (水文系 63 级学生许**之父，资本家)**

各种衣物、皮毛、丝绸等，共 27 箱包，及各种家具、杂物。

存款 3860 元，公债 27 元，现金 700 元，粮票 6 斤，工业卷 83.5 张，手、怀表 13 块，金条 3 根，金镯 3 个，金锭 3 个，戒指 4 个，耳环 8 个，金链 1 条。

8 王**

存款 19322.23 元，现金 973.70 元，戒指 1 个，工业卷 14.4 张，及少量衣物家具等。

9 周*

存款 2430.94 元，公债 245 元，及少量衣物杂物等。

10 苏**

各种衣物 6 箱及杂物。

存款 4900 元，公债 308 元，粮票 100 斤，工业卷 149 张，相机 1 架，手、怀表 6 块，戒指 9 个，镯 1 个，金币 1 个，大洋 34 块。

11 袁**

各种衣物 4 箱。

存款 3279.34 元，公债 150 元，现金 550 元，工业卷 113.8 张，手表 1 块，小金器 20 件。

12 马**

存款 500 元，公债 607 元，现金 60 元，手表 1 块，工业卷 56.9 张，及少量衣物\杂物及书籍。

13 薛**

存款 900 元，公债 93 元，现金 785 元，粮票 136 斤，工业卷 56.7 张，及杂物。

14 乔**

衣物 3 箱及杂物。

15 刘**

存款 1770 元，公债 110 元，戒指 1 个，表 1 块，少量衣物，放大机 1 架，及书籍、相册等。

16 赵**

存款 511.78 元，现金 530 元，杂物。

17 光**

存款 802.67 元，及杂物。

18 张**

存款 1035.50 元，及家具。

19 郝**

存款 2800 元。

20 池**

现金 1261 元。²²

(其余从略)

“地质东方红”的学生从来没有参与过“破四旧”、“造反”等活动。

张作光：我是被人押着去天津抄家的，是红卫兵把我押去的。红卫兵，就是“斗批改”那个红卫兵。工作队反干扰时，七、八月份，“斗批改”红卫兵成立起来，当时，首先在班级里打击出身不好的学生。他们抄我的家，因为天津距北京最近。当我被押到天津时，正赶上我父亲厂里的人也来抄家。

²³

²²原始材料提供者为孙宝信，15621 班学生。

²³张作光同学，其家在天津，其父 1949 年前在一家企业有资产，1956 年公私合营时，其企业作价入股，在合作企业中占有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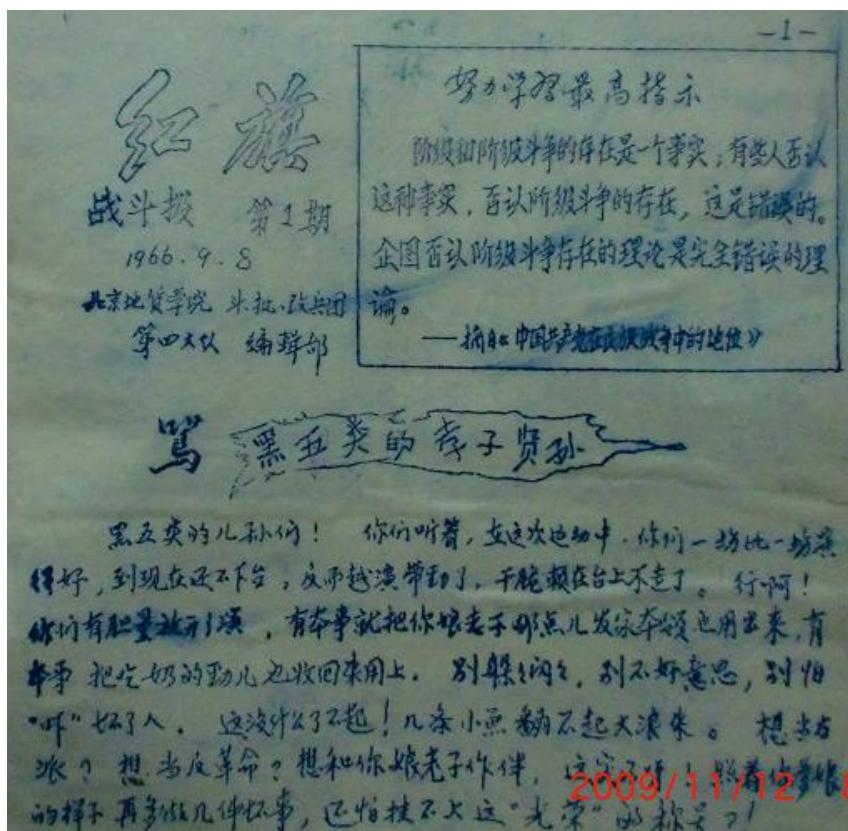
曹敏久：当时，“斗批改兵团”在大操场主席台前，焚烧从图书馆抄出的所谓“四旧”书，烧得很多，烈焰滚滚。是晚上烧的。我第二天即写大字报，表示反对。我还引用鲁迅先生的“华德焚书论”的精神，认为，你把书都烧了，还批判什么？

保皇派红卫兵是这样骂人的

出版于1966年9月8日的《骂“黑五类的孝子贤孙”》，是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张晓山写的，刊于其“第四大队编辑部”编印的《红旗》战斗报第1期。这篇“骂”文是在大学生保皇派红卫兵跟着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纵欲之后，借骂“黑五类”而对造反派的一通“臭骂”。骂得“痛快”，骂得“淋漓尽致”，骂得比中学生有水平，堪称文革叫骂的典范。

请读者注意，在张晓山的这个叫骂中，只有一句实话：“现在，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犯了错误。”在1966年8、9月份，连如此铁杆的保皇派都不得不承认工作队犯了错误！可是，到了几年、十几年之后，控诉文革、妖魔化文革的人就不承认了，比如《回首文革》的作者之一王年一之类。

为了使读者了解叫骂真相，我将从宫宝军同志处搜集来的该文全文引述如下。



刊登“骂文”的保皇派期刊

骂“黑五类的孝子贤孙”

黑五类的儿孙们！你们听着，在这次运动中，你们一场比一场演得好，到现在还不下台，反而越演越带劲了，干脆赖在台上不走了。行啊！你们有胆量放开了演，有本事就把你娘老子那点儿发家本领也用出来，有本事，把吃奶的劲儿也收回来用上。别躲躲闪闪，别不好意思，别怕“吓”坏了人。这没什么了不起！几条小鱼翻不起大浪来。想当右派？想当反革命？想和你老子作伴，这容易呀！照着你爹娘的样子再多做几件事，还怕挂不上这“光荣”的称号？！

现在，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犯了错误。你他妈高兴什么？有什么可高兴的？！平时一个一个的吊儿郎当，屁事不问，这会儿挑工作队的毛病，忘了吃，忘了喝，昼夜加班连轴转。歪曲夸大，捏造漫骂，推搡，殴打……一句话，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老革命于死地而后快。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红卫兵去抄你们的家，你们不哼不哈，连屁也不放一个，都成了活菩萨。我们抄出了变天账，抄出了血衣……你们他妈的对娘老子半个字都舍不得讲。你们见到娘老子要变天，为什么反而成了哑巴？！表面上有时也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表示“高兴”，对娘老子也装出“愤怒”、“难过”的样子来。“高兴”，为什么笑不出声来？“愤怒”，为什么不冲上去骂他、揍他？“难过”，为什么掉不出眼泪？他妈的，装傻！！

平时回家，“爹呀”、“妈呀”、“奶奶呀”叫得比谁都亲。这回，红卫兵把你们家搞乱了一点儿，就大叫什么“运作简单”啦！又是什么“太过分”啦！又是什么“低级造反”啦！

可是，一回到学校，搞起工作队来，搞起老革命干部来，就大叫“抓活老虎”，大叫这是“高水平造反”……你们是屁也放出来了，话也讲出来了，劲头也使出来了，开口一个“黑帮”，闭口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你们恨谁？爱谁？难道还不很清楚吗！

你们要把老革命都打成“黑帮”来解心头之恨，是吗？！老实告诉你们！有毛主席领导，在中国这块天底下，没那么多“黑帮”！谁要是造谣、生事、起哄、捣乱，查出来依法惩办，没啥客气的！！

你们骂老革命是“刽子手”，凭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力？说穿了没别的，是从你娘老子那里学来的。这些老革命过去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地和你娘老子干，夺他们的权，专了他们的政，现在红卫兵又不客气地抄了你们的家，“抢”了你们的钱。

“以后也没‘外汇’了，也当不了小姐了，做不了少爷了，也摆不了阔气了，还要自食其力……另外，最可恨的是还要加紧改造思想。”一句话，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于是你们心里火了，憋不住了，要骂人了，你们骂吧！没啥了不起。这样的“刽子手”，咱爹娘双双都是，而且是三四十年的老“刽子手”。咱这个当儿子的，早下定了决心，不管怎么样，也要当一辈子这样的刽子手。狗崽子们！怎么样？有胆量，就来较量。

另外，再告诉你们一句，不老老实实改造思想，对你们决不客气！不好过是吗？告诉你！有共产党。有毛主席，有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不老实，日子没法好过！！谁叫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要大骂“刽子手”，要翻这个案，老实告诉你们，要翻到地下翻去，那里“人”多着呢！没什么好说的。

“工作队流毒无穷”。

什么他妈的流毒、流毒、流毒，一口一个叫得山响。要揭发就揭发，要批判就批判，少来这一套！干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在这里干了几十天就是“流毒无穷”，你他妈的在大黑染缸里染了二十好几年，就那么干净？觉悟就那么高？我看你们还是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身上流出来的尽是些什么货色吧！

毛主席说，群众是英雄。你们便立刻一拍胸脯大叫：“群众是英雄，要向我们学习！”

呸！恬不知耻！！你们拚着命放毒气，把人都熏坏了，不少人上了当，中了毒，你们还没够？还要放？还要流？！再要放，给我滚到茅坑里去放！没啥好听的给你们说。

“我们的革命热情最高”！

什么他妈的革命热情！你是革谁的命的革命热情？平时一抽空就往家里跑，“爹呀”、“妈呀”叫得那么亲热。20多年了，也没听你们讲要革他妈的命，写个思想汇报，“要划清界限，消除影响”，心还跳个不停，先怕被爹娘看见了，“使他老人家不愉快，破坏了家庭团结”。

现在搞老革命干部，心不跳，脸不红，栽赃诬蔑，大言不惭，什么缺德的事儿都干出来了。这称哪一号的革命热情？！呸！这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热情。老实告诉你们，反革命热情和革命热情，差之一字，意离千里。混不到一块，差远了。

要想用反革命热情加上几句声嘶力竭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就变成革命热情吗？告诉你们，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天底下还没这么便宜的事！！！

“群众运动没有过分问题”。

你们倒算是哪一路的群众！太阳在天上着，有种的，站出来照一照，看一看自己倒算个啥东西。

没有过分问题吗？对你们黑五类的孝子贤孙，有过分问题！有！！就是有！！！我们这里盯着你，你搞过了分，对你不客气！

说什么“你们没权力和我们说理”，放狗屁！要不是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还要动手揍你们这群胡作非为的王八羔子呢！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你他妈革谁的命，你无罪？你造谁的反，你有“理”？可恶！贼头贼脑，老抽掉阶级内容谈问题，又把彭真那套拿出来啦？不成，此路不通！

告诉你们，造反有理，不是说，造了反，就一定有理。造反是有阶级性的。谁他妈的忘了这一条，不是混蛋就是糊涂虫！

整天你们“造反”、“造反”，喊得震天响，你们到底揪出了几个真正的黑帮？！揭发批判了多少反动思想？！正经事一件没干，还洋洋自得，把“造反”篱你们的仓库——私有化了。真他妈的不要脸！告诉你们，不要视为至宝，生怕别人抢走这两个字。我们红卫兵的造反是无产阶级的造反，是高水平的造反，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今天造，明天还造，跟着毛主席，造一辈子资产阶级的反。

“你们不要抓‘稻草’”。

抓什么“稻草”？你们本来就是稻草扎的，岂有不抓之理？！我们昨天抓，今天抓，明天还是要抓，要大抓特抓，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要把“稻草”一根一根抽个精光，把你们丑恶的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新花招。你靠得不是你爹娘那点坑、蒙、拐、骗、造谣生事的本事吗？咱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何愁战你不胜？！

一句话，只许右派放毒，不准左派消毒，这是不折不扣的混蛋逻辑，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逻辑。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咱红卫兵挂着这个牌子是干啥的？没二话，就是捍卫毛泽东主义！就是捍卫真理！就是推翻混蛋逻辑！就是要抓“稻草”！看见有人存心捣乱，不闻不问，叫啥红卫兵？

“你们别骂人”。

别骂人？说句老实话，我还没骂够呢！且不说你娘老子解放前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穷光蛋”不离口，文明棍不离手。且不说你们以前学你爹的样子左一个笨蛋，右一个“穷鬼”骂个不停，就是这次运动中，你们骂人还骂得少吗？

你们造谣，你们骂“黑帮”，我们出来客客气气讲几句实在话，你们就立刻歇斯底里大发作，咬牙切齿，破口大骂，什么保皇派啦！什么“蠢驴”啦！什么“奴隶主义”啦！什么“昔日拚命保皇头破血流，今朝赤膊上阵一命呜呼”啦！……乱七八糟，想骂什么就骂什么，怎么解气就怎么骂，围攻现象还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

老革命犯了错误，你们皆大欢喜，笑逐颜开，奔走相告，日夜不眠。搞点“小资料”，几个人一凑，念一念，笑得前俯后仰，真是不亦乐乎。他妈的，这是什么感情？！

动不动，把老干部拉出来指着鼻子骂“黑帮”，“斗倒斗臭斗烂”、“撤职罢官”、“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有的更是大打出手。这些混账事都是那（哪）些王八蛋干的？！到如今，我们不指名骂几个“他妈的”，骂几个“混蛋”，你们就火了？就不乐意了？你他妈的火什么！这对你是够客气的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岂有此理！

黑五类儿孙，听着，今后若还是为非作歹，我们不但要骂，还要坚决镇压！

“你们搞唯成分论”。

少放狗屁！我们红卫兵向来是第一有成分，第二是不唯成分。你们在黑染缸里光了二十好几年，自己还觉得挺白，挺革命。我们多看你们几眼，帮你们擦擦身上的黑灰，还犯法？见鬼！

这叫关心！这叫无产阶级对你们关心的具体表现。还不习惯这种关心吗？没关系，好好学习毛选，会习惯的。习惯就自然了，自然就不难受了，学习工农兵，认真改造思想。

“量体裁衣”，看了你们的成分，仔细地耐心地观察了你们近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就谈对你们的看法，就是这么回事！

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黑五类儿孙们，心里没鬼，没做缺德事，骂的就不是你（当然听一听有益无害，提高警惕嘛！）做了坏事的，更要好好听着，并且马上改正，早不改，晚也得改。晚改不如早改。如果早也不改，晚也不改，那以后是有账算的。这一点尽管放心，没错！红卫兵说话是算数的。

要说我们这是“划框框”，“定调子”，“打击革命热情”，我们说，这个“框框”是非划不可，这个“调子”是非定不行，这个“热情”不打还了得！至于你们发下来的大帽子，还是戴到你们自己头上更合适一些。

上面讲了一堆话，没别的意思，就是一个内容，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鬼见愁！！

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张晓山

1966.9.6.

读者从这篇“骂”文中，肯定还会意会到其它许多事，许多道理。

第 14 章 炮打司令部——进地质部 (8.23.)

找地质部说理去

应该得了李讷的首肯

工作队撤销了。但是，它的派出单位没有撤销。地质部的领导人，经过十几年的“历练”，早已失去接受批评的能力，当然也就失去了认错和检查错误的习惯。他们继续指挥“伪文革”反干扰，以图为工作队开脱罪责。

如果将保皇派当成真正的敌人，那正好上了何长工等人的当。“东方红公社”的决策是，进军地质部，揪邹家尤回地院算账。

进军地质部，这在当时的中国，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地质部，作为国家机关，在老百姓眼里，那就是中央，就是天！

捅天，得有比天还大的胆量！得不怕被打成“反革命”。

在“进军地质部”这个重大问题上，朱成昭肯定与李讷说过。我的看法是，有了李讷（毛泽东）的首肯，才有了“一进地质部”。

顺应了毛泽东-党中央的需要

在此之前，8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一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指出：

“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同期《红旗》杂志还重新登载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增添了以下带黑线的字句：“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就在“东方红公社”战士第一次进军地质部的前一天晚八点半和当天，即1966年8月22日晚和23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社论说：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

广大革命学生起来闹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是件大好事。他们贴大字报，是好事，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好事。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他们敢于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本单位党委和上级党委的错误，正好可以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至于那些死顽固，死不悔改的，垮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

这话就像进军地质部的动员令。

这篇社论中的话是 1949 年以来，特别是 1957 年以来无人敢说的话。多年来的荒唐逻辑被这段话揭穿了本质！社论的发表使那些多年来以“老子就是党”，“反我即反党”的人，立即从“特殊材料”还原成了普通人，这当然会使他们觉得很难堪，很丢面子，很不舒服，使以“党”自居的人顿时失去了“理论基础”。“右派”，“反右”，其内涵原来就这么简单。

绝不要低估这篇社论的伟大意义！它使我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

进军地质部

据《大事记》记载：

8月23日，地院“东方红公社”派遣了一千多名战士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工作组长邹家尤回地院听取意见，作深刻检查。可是地质部党委无视革命师生的呼声，违背中央指示，拒不交出邹家尤，并且煽动群众斗群众。东方红战士忍无可忍，果断地进行静坐绝食斗争，向镇压地院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邹家尤、何长工示威，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示威。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斗争的结果，迫使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有名的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当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参加“地质东方红”的教员干部没有一个人参加。

因为我们一无所有，连制作标语牌的能力都没有。除少数学生手中举着要求工作队回校“作检查”的小小的用写大字报的纸剪制的三角形标语旗外，大多数人都赤手空拳。

经过两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地质部机关大院。

“地质东方红”进军地质部，批判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共进行过 4 次，故将这头一次称为“一进地质部”。换句话说，我们头一次进军地质部时，还没有想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或者说，如果第一次解决了问题，后面的几次就是不必要的了。

绝食抗争，出于无奈

我们进到地质部大院后，大家先是排好队，站在地质部大院的办公楼门口，等待地质部党组对我们要求的答复。但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静后，累了。有人坐下了，其它一些站累了的学生也坐下了，后来大家都坐下了。好在，地质部大院是水泥地，而且正值夏季，坐在地上也不觉得凉，坐着总比站着舒服。

“东方红”总部领导与地质部领导“交涉”的结果是明确的：要求被拒绝——连接待的人都找不着。不仅被拒绝，而且地质部领导对千余名师生的到来置若罔闻，连派一个秘书之类的人出来说明一下“拒绝”的理由都没有。大家只能坐着等待。

这就是后来称为的“静坐示威”。

附带澄清，我们静坐的地点不在“地质部门口”——地质部门口正对西四的阜城门内大街，1000多人“静坐”在大街上，肯定会阻塞交通的。我们静坐的地点是在地质部大院内的办公楼前。那座办公大楼有几个出入口，都在楼的南面。我们的到来和静坐，并没有影响到办公楼任何人的出入，更不会影响到过路的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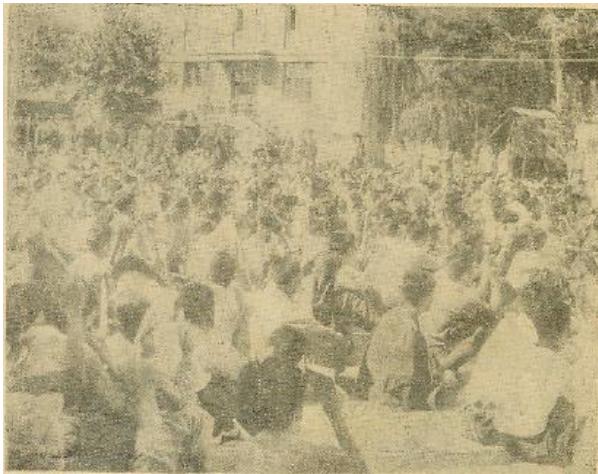
已经到了吃饭时间。总部决定，各系统计人数，派代表回学校与食堂联系送午饭的事情。代表地质系回校联系午饭的是我。为了争取时间，我和其它系的代表坐公共汽车回到学校。我与其它两个地质系学生直接去了大饭厅。但是，没有谈妥。

其它各系的交涉情况也和我一样：“不行！”

显然，不给我们饭吃，是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统一安排。

我们只得又返回了地质部大院。

总部的头儿们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所能做出的决定只有一个：“绝食！”



一进地质部时的静坐绝食现场
(1966年8月23日在地质部大院)

静坐绝食持续到下午，又持续到晚上。

地质学院数千名师生在地质部大院静坐绝食的消息使京城震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还没有这么多胆大包天的人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示威。在掌权者看来，真是无法无天！

“老红卫兵”的暴行

“维权”的本能驱使地质部领导“召唤”来一大群正在北京大街上“破四旧”的中学生“红卫兵”。他们中，有没有当日下午在国子监孔庙大院焚烧“四旧”，对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白芸生等三十多人进行现场批斗，剃“阴阳头”，挂“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往一些人头上泼墨汁的英雄，不得而知。他们一到地质部大院，就对我们这些静坐者进行围攻、漫骂、挑衅和驱赶。

这些“好汉”的到来，立时使地质部大院充满了杀气。

在“红二代”眼里，不戴红袖标的人不是阶级敌人，至少，也是不革命的，都在“滚他妈的蛋”者之列。

但是，与大学生较量，中学生毕竟还嫩了些。我们的方针是：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不理睬他们。因此，他们只能站在我们的静坐圈之外，用嘴巴或通过地质部的高音喇叭对“地质东方红”的“狗崽子”、“反革命”进行“声讨”和谩骂。

他们之中，叫得最响的人是个女中学生，叫藏丽曼。她十五六岁，个子不高，胖乎乎地，剪着齐耳短发。我至今还记得，她通过地质部大院的高音喇叭对我们说：

“我在‘破四旧’中路过地质部大院，看到有这么多人公然在国家机关大院里闹事，干扰国家领导人办公，真是不可想象……”这位十几岁的中学生一再指责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受人蒙蔽”，“奉劝”大家要立即猛醒，“回头是岸”！……

看来，这些“好汉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学习过《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或者，他们有更权威的信息渠道，对党报党刊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此时，他们对刘少奇有关“反干扰”的话却牢记在心。早在我们向地质部进军的一个月前，刘少奇就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问题的看法，并得出结论：

工作组有三种类型，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好的……

这就是“老红卫兵”说的“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地质部工作队是第一类”的根据。

我们都不去理睬他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为了不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坐在外圈，并且都挤得紧紧地，扎着辫子的女同学则都被让到圈子的中心部位，使挑衅者只能在圈外“发威”，却无法也不敢有越规之举。

传来了中央指示

到了8月24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从办公大楼东边门洞里走出来一个身份不明的年青干部，他对第一个碰到的学生说：待会儿，中央首长要接见你们，你们的人到这个大楼门口集合。

中央首长要接见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每个人的耳朵中。

东方红总部负责人和骨干都齐集在东边那个楼门洞口，准备听取传达，我当时站在前排。

一会儿，“中央首长”出来了。那个年青干部对着我们说：现在，请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同志向你们传达中央指示。

陶鲁笳好象不敢走到办公楼外，直接面对学生大众，而是站在门洞口。似乎，一旦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可以立即退回楼内，以免遭不测。

陶鲁笳似乎很谨慎，手里拿着一张小字条。他是看着小字条，一字一句地念出“中央指示”的：

1、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师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意见。

3、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显然，这是一次胜利，胜利者不仅是“地质东方红”，更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庶民！

——至少，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第一次把国家党政机关的部长级干部，毫无争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人民心目中的大神，从高高在上的神位上“请”了下来。无论他们情愿不情愿，他们都得走到“拳击台”上来，没有了警车开道，没有了卫护的军人，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附庸，赤手空拳地、平等地、面对面地与我们“较量”！

——至少，自1957年以来形成的“一言堂”的“高楼大厦”开始从楼顶掉砖掉瓦了。以前，当权者对平民百姓的话或意见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对不中听的，反感的，只要他们一句话，就叫你倒霉一辈子。现在，平民百姓在形式上可以同这些大神们面对面地、平等地对话了，可以向他们提批评意见了！

听取了传达后，“地质东方红”总部决定立即收兵回校，准备晚上的斗争。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东方红》战士敢革命、敢造反、敢捣何家店，八月二十三日晨千余名《东方红》战士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直奔地质部。不怕烈日晒，不怕饿断肠，围攻谩骂，把我们百炼成钢。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斗争，胜利归来了。东方初晓，红光万道，《东方红》战士迎着东方曙光，高唱“东方红”。毛主席啊，毛主席！任凭狂风巨浪，我们永远跟着您！

照片补充说明：

8月24日早晨，步行回校后的学生集合在大操场上，面向东方，高唱“东方红”。前景为教五楼（主楼）

“8.24大辩论”——地质学院成了文革中心

何长工等的无奈

8月24日傍晚，参加“东方红公社”的师生与参加“斗批改兵团”的师生分坐在大操场露天主席台前。我们“东方红”的学生是坐在偏北的位置上，而“斗批改兵团”的学生的坐位中间偏南。

没有人统计过双方的人数。我的估计是，坐在大操场上的双方的人数大体相当，而开始时，坐在保皇派一边的人数比“地质东方红”的人数要多些。

那时候，从人数比例上说，“地质东方红”还是少数派，公开的东方红战士只有一千多人。中间派还在观望中。

“大辩论”还没有开始，结果就已经有了。谁都知道，“大辩论”其所以能够举行，原本就是“一进地质部”的结果，是“东方红公社”的胜利。因此，一部分“中间派”已经不愿意同保皇派为伍了。

在外围，在地质学院两派的后面和侧面，站满了无数外校外地的师生。

这天晚上，地质学院大操场就成为北京乃至全中国众目关注的地方。这一场斗争的成败不仅关乎着地质学院众多师生的前途和命运，也关乎着北京以至全国众多师生的前途和命运。从广义上说，也关乎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晚上8点左右，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等地质部领导人，在陶鲁笳的陪同下，灰溜溜地走上了主席台。

按照“伪文革”事先安排，保皇派这时像文革前那样，立即鼓起掌来。但是，“东方红公社”这一边却无动于衷，站在场外的人也无动于衷。这使保皇派的“孤掌”显得尴尬。遭此打击，初起的掌声很快就沉寂了下去。

何长工，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老前辈”，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就与毛泽东在一起战斗。我在上中学时，曾在书报上看到过他的名字。那时候，共产党的元勋们都是天上的一颗颗明星，而我则是穷乡僻壤中仰望星空的一个穷学生。对我来说，他们都远不可及，高不可攀。上大学以后，何长工作为主管地质学院的地质部的最高领导人，曾数次来学院给师生们作报告。他是我最早亲眼见到的，距我最近的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和中央级领导人。他作报告不用稿子，而是信口讲来。讲到激动处，讲到他不满意的事情，他会双手高举起来骂娘。他骂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王八旦思想”。

当何部长一脸不高兴地走上主席台时，我的思绪才回到现实中。从他脸上的阴云我看出了他的“失宠”。当他在地质学院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坐时，我已经明白，他不是来骂邹家尤“王八蛋”的，也不是来与“何家兵”拉家常的。“老毛”好像对他这个同乡有点不满意，“小周”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弄得他不三不四地，显得很尴尬。自己是原告还是被告？是领导还是被领导？是听检查还是要做检查？是……总之，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系列的问号和叹号。

保皇派破坏大会

“8·24大辩论”是陶鲁笳主持的。

陶鲁笳，这位不久前还在薄一波治下的国务院工交口的大员，曾是刘少奇、薄一波推行“反干扰”恶政的要员。工作队被毛泽东否定和下令撤销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北京新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陶鲁笳貌似公正，却让地质学院“伪文革”来主持会议，说明他是站在保皇派一边的。

由“伪文革”主持会议，“地质东方红”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于是，“地质东方红”的代表就冲上台去，夺过话筒宣布：“伪文革”不能代表全院革命师生，无权主持大会。

被指派主持会议的“伪文革”成员以正统自居，认为自己是当然的会议主持者，把持着话筒坚决不放。接着，双方又有人冲上台去，你推我搡，抢夺话筒。

对此，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等地质部领导一直无动于衷。他们在看热闹！

对此，陶鲁笳无动于衷。

此时，我心里油然生出一个理念：他们这才叫真正的“坐山观虎斗”！

眼看双方要打起来了，陶鲁笳才不得不出面制止。

后来，经过反复而艰苦斗争，陶鲁笳才不得不收回主持权，并决定会议发言一对一。

我们都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不要说一对一，就是一对十，我们一个人就可以驳倒他们十个人，只要给我们一个平等发言的机会就行。

辩论会开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造反派的贾振远老师（据宫宝军日记记录）。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痛斥邹家尤工作队镇压师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地质学院实行白色恐怖的罪行。这使何长工等地质部领导和陶鲁笳等脸上发白，使“伪文革”一保皇派坐立不安。

接着，是保皇派的毛炎超发言。毛炎超对工作队大唱赞歌，一个多月来，他们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斗了多少黑帮，写了多少批三家村的文章，斗了多少右派，抄了多少家，写了多少大字报，还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反复强调刘少奇的话：大部分工作队是好的，比较好的，对工作队的不信任就是对党的不信任；反对工作队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这完全是为工作队的“反干扰”评功摆好，唱赞歌。不仅如此，他们继续在上纲上线，继续坚持薄一波和工作队“反右斗争”的老一套理论和实践，指责造反派“反对工作队”，“揪住工作队不放”。从他的发言中，我还体味出了另一个意图：他们力求扭转会议的主旨，要将“听取师生批评意见”的会议改为向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领导汇报工作队“丰功伟绩”的汇报会，改为给工作队唱赞歌的“演唱会”。

接下来，秩序就有些乱了，因为，又该造反派发言了。

对此，保皇派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容忍造反派的这种揭发和批判继续进行下去，那就会把他们身上脸上最后一层摭羞布揭去，会将他们主子自1957年以来一贯镇压民众的嘴脸暴露无遗。因此，他们以辩驳为由，多次冲上台去，多次打断我方同学的揭发和批判。我方同学不理他们的阻挠，坚持揭发批判，他们就几个人一拥而上抢夺话筒，并对我方同学推推搡搡。

“地质东方红”同学也不示弱，也有人冲上台去，与他们对着干。

谁拿着话筒，谁就有发言权。在大操场上，在人山人海中，没有麦克风，即使嗓门再洪亮的人，话音也传不了多远。

话筒被抢走了，我方同学就站在主席台上，放大嗓门，继续揭发。

有理不在言高，我方在台上的同学始终保持着理智的状态，坚持摆事实，坚持讲道理，坚持以理服人。

“老红卫兵”的拙劣表演

8月24日晚上，被保派请来地质学院助阵的中学生，看到大学生保皇派顶不住了，就自己跳上主席台，想在大学的讲坛上也当一回好汉。他们之中，有那个昨日指责大学生受蒙蔽的女中学生藏丽蔓。

“好汉”上台，表现得更为赤裸。他们以自己受毛泽东直接支持的特殊身份，不再在工作队的功与过上做文章了，他们又在地质学院的大操场上推销他们的“血统论”了。

他们首先指责“地质东方红”成分不纯，是“黑五类”组织，里面混进了不少坏人，包括许多妄图翻天复辟的“黑五类子女”。他们虽然没有给“地质东方红”贴上“反革命组织”、“黑五类组织”之类的标签，但是，从他们近乎于歇斯底里的怒斥声中，人们不难感觉到腾腾的杀伐气息。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东吹西吹的山风旋涡，遇到比它坚硬千百倍的山岩，只能碰得“灰飞烟灭”。

台上，戴红袖标的中学生向蔡新平发问：

“你是什么出身？”

“革干！”蔡新平大声说。

贵族中学生转向台下发问：

“你们‘地质东方红’里有多少‘黑五类’？”

没有人回答。

“‘地质东方红’里的‘红五类’，都给我站起来！”

大家端坐着，纹丝不动，没有一个人理睬。

他们咒骂“东方红公社”为“东方黑”，企图把它打成“反革命集团”。

特别要说明的是，8月24日晚至8月25日凌晨，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等地质部领导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连站都没有站，更谈不上有人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或搞“喷气式”。

由于“东方红”战士坚持原则，据理力争，面对下流的咒骂，歇斯底里地呐喊，巍然不动，表现了革命者的高姿态、高风格。从而粉碎了各方面的猖狂进攻，获得了来自各院校师生的称赞。

会议以“不了”而“了之”。

地质学院成为北京文革的中心

哀莫大于道义的失败。连保皇派中的一些有志之士也看清了形势。会后，有许多人当场宣布：

“从现在起，我郑重宣布：脱离‘斗批改’，要求参加‘东方红’！”

他们当场摘下戴在臂上的“红卫兵”袖标，扔在地上。

对此，“东方红”战士们当然表示欢迎，立即将自己胸前写有“东方红”三字的“红布条”胸章摘下来，戴在“起义者”的胸前。

外地来京的一些旁观者也当场宣布：

“通过这次大会，我了解了你们。我不是地质学院的学生，但是，我希望参加你们‘东方红公社’！”

于是，他们也戴上了“东方红”胸章。

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所言：“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地质东方红”进军地质部，“炮打司令部”，第一次在北京，在全国，有组织地高举起向“一言堂”公开宣战的旗帜，这更加引人注目，更具号角意义。

这次辩论会，全国人都在关注。

我的分析是，在主席台下的人丛中，一定会有“中央要员”或其代表存在。他们在密切地观察着两个司令部在这个小台子上的肉搏。

辩论会后，“北航红旗”、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等学生组织，仿效“地质东方红”，纷纷进军工作队的派出部门“炮打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的劲风很快吹遍了九州大地。

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由于以朱成昭为首的“地质东方红”对资反路线的坚决斗争，使地质学院成为北京文革的中心。

“造反派红卫兵”出世

“老红卫兵”的罪恶

1966年8月1日，急于建立文革队伍的毛泽东，在大中学校“造反派”正从地上爬起、还未站立起来的情况下，即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口头上）的“造反行为”给予支持。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个以“革干”、“革军”子女为主导的组织，它宣扬的“血统论”，它的保爹保妈行为，明显表现出它的保守性和反文革性。

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中学生红卫兵当时很为“红火”过一阵子。他们臂戴红袖标，手扬宽皮带，高叫“血统论”，主要在他们所谓的“红八月”里，“破四旧”、抄家、造反、杀人……无恶不作，干尽了坏事。他们的罪行，社会上另有揭露，此不累述。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整个中国社会对“红卫兵”敢怒而不敢言。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被迫诞生

“东方红战斗大队”成立于1966年的8月8日，“东方红公社”成立于8月17日，均晚于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的时间）。就“东方红”这名称说，根本没有沾“红卫兵”的半点“光彩”。我们毕竟已经跨进了大学的门坎，有了更多的人生磨练。因此，没有人会回过头去重历人生幼稚路，将木棍当钢枪，将竹片当刀剑，在胳膊上戴一个红布圈就认为自己革命了。因此，在开初时，我们谁都不把“红卫兵”当一回事，视戴在中学生胳膊上的“红袖标”为“小儿科”。

因为有毛泽东复信的“黄马褂”，“红卫兵”才敢到处横行，才敢对我们进行百般阻挠和打击，文革的腥风血雨才有了“响亮”的开头。

有人甚至将文革运动称为“红卫兵运动”。

因为有毛泽东复信的“黄马褂”，我们无法取缔红卫兵！我们只能“以毒攻毒”。8·24大辩论的“成果”之一，使“地质东方红”战士意识到，既然我们不能取缔“红卫兵”，我们就要组织自己的红卫兵，以“红卫兵”对抗“红卫兵”！

“地质东方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下旬。它当然不能与“红卫兵”同流合污。为了与之区别，我们在“红卫兵”三字之前加上了“毛泽东主义”的“前缀”。²⁴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始终坚持着与“红卫兵”划清界线。表现在红袖标上，“红卫兵”三字较大，其上方的“毛泽东主义（思想）”或“首都第三司令部”的字号较小。

曹敏久：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之后，发红袖标。伏庆是家族出身小土地出租，不是“红五类”。但是，我也给他发了。只要你拥护东方红的观点，我就给你发。

第15章 炮打司令部——二进地质部（9.5.）

²⁴后来，因为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有异议，我们就把“毛泽东主义”改成了“毛泽东思想”。

最艰难的进击

何长工、邹家尤的刁恶

据《大事记》：

(9月5日)地院东力红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千多战士再展英姿，浩浩荡荡地开进地质部，决心要揪回邹家尤听取革命师生的批判。但是，邹家尤却拒不回到东方红战士中听取意见。何长工还威胁说：“我死了，你们东方红要负责。”并开动一切造谣机器，说什么东方红“威胁首长安全”、“何长工休克了两次”、东方红“抢走了国家机密”等等……

这期间，邹家尤悄悄溜回地院，坐镇十五天，挂着听取意见的牌子，策划于密室，制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对革命群众进行分化瓦解，企图孤立“东方红公社”，并还无耻地把九月十三日要邹家尤返地质部，到东方红公社去听取意见的正当要求，说成是绑架殴打邹家尤的“反革命暴徒行动”，不惜工本，印发几十万份造谣传单，开出专车发于全市，流至全国，以求在社会上搞臭东方红。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东方红》战士把最高指示印在脑子里，熔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
我《东方红》战士在二进地质部时，反党分子何长工调来了上千名西纠，进行围攻和诬蔑，但我自岿然不动，不啻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图为《东方红》战士，集体刻苦学习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二进地质部时，东方红战士读毛主席语录

二进地质部，千余人的队伍聚集在地质部大院里，何长工、邹家尤等不能不知道。如果他们有爱民之心，能想民之想，这一进以至二进地质部原本是不该发生的。如果他们真有解决问题、改过自新的诚意，又何必从7月拖延到9月！在“地质东方红”学生“二进地质部”后，邹家尤用不着“去了地院”；即使“去了地院”，并没有去了火星、天王星或河外星系，二十几里路，步行两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回来；坐上进口车（那时，如邹家尤这类副部级高干，都有专门的进口坐驾）用不了半个小时，也可以坐回来。何止在半个月时间里，同“地质东方红”学生“捉迷藏”？

1966年10月13日出版的《东方红报》对“二进地质部”的艰苦斗争记述如下：

狡猾的邹家尤闻讯后却暗暗潜回地院，加紧了对“东方红公社”的反革命反扑。他们组织了内外两条战线的反扑。在外线造谣诽谤，诬蔑中伤，分化瓦解，企图拖垮“东方红公社”；在内线恐吓威胁，残酷打击，梦想一举摧毁毛泽东主义红教联和毛泽东主义红干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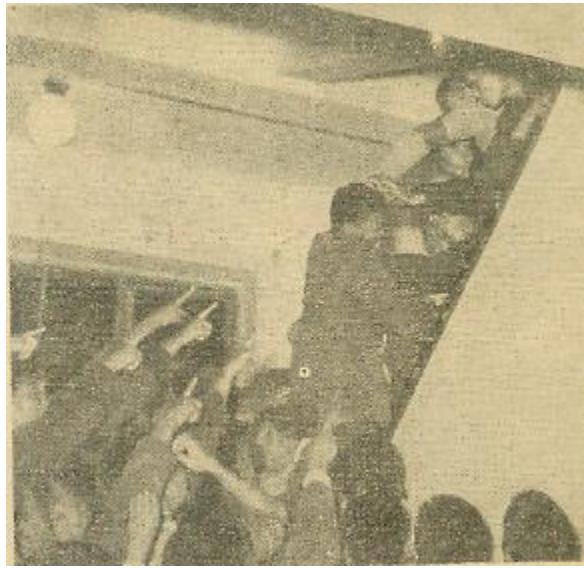
地质部的亲信，我院党委书记王焕亲自出马，制造白色恐怖，把他们（指高元贵等——作者注）说成是“东方红的后台”，诬蔑东方红“是为了给高元贵翻案”，“方向是错误的”，还利用学生写什么“急电寻人”，《撕开“平等”的遮羞布》等各种攻击性的大字报，扬言“十·一以前要整垮东方红”，当时真是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这场反革命反扑中，何长工坐镇地质部党委，调兵遣将，坐山观虎斗。邹家尤深居我院暗中指挥，一手牵着院文革，一手抓住“斗批改战斗兵团”，挂听取意见之名，行反革命布署之实。王焕及工作队“御林军”中的干将充当单线联络员和担负一些出头露面的工作。形成地质部党委，邹家尤为前工作队党委及其“御林军”三线一体、上中下三结合的组织机构，共同执行践踏十六条、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力求垂死挣扎，挽救自己，破坏文化大革命。

“整造反派”的“黑材料”一直保存着

何长工、邹家尤当然不会承认他们整了师生的黑材料，更不会承认他们保存了师生的黑材料，以备日后“秋后算账”。

一些学生就在地质部大楼里寻找黑材料。



“东方红”战士与保皇派进行殊死搏斗

何长工、邹家尤等保存黑材料的最佳地点当然是档案室。这里是机密之地，“闲人免进”。工作队整的造反派的黑材料，往档案室里一放，就成了“国家机密”。如果造反派不顾这禁令，强行进入，那无疑会构成重大政治问题！

读者在近几十年出版的著作中不时可以看到对“造反派”“抢档案”的指责，一些人为“党和国家机密”的“遗失”而“痛心疾首”，“呼天呛地”，大骂造反派“无法无天”。

对于被工作队整了黑材料的造反派来说，让工作队及其派出者交出整自己的黑材料，意义重大。这至少可以打消后日被人“秋后算账”的顾虑。

但是，“东方红”从来没有抢过档案！所谓“抢档案”，这是保皇派往造反派头上栽赃！恰恰是，工作队整了造反派的黑材料，东藏西躲，存入档案室，倒是真的。

《大事记》记载了10月17、18日发生的如下两件事，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使造反派对这些“老一辈”保持警惕：

10月17日，何长工与陶鲁笳商妥，向工交党委办公室转移地质学院的黑材料。是日，何长工送来一皮箱黑材料，交给陶的秘书。

《大事记》作者对此的评价是：顽固对抗军委紧急指示。

善良的人们一定要问，《大事记》中所载的10月17日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大事记》指责何长工等顽固地对抗党中央要销毁黑材料的指示，是否冤枉了好人？

这一转移“黑材料”事件发生在“三进”和“四进”地质部期间。即使“三进”时，“地质东方红”“绑架”了何长工等，也没有将“黑材料”弄出来。何长工等坚持同师生对立，将“黑材料”从地质部转移到薄一波、陶鲁笳的工交政治部，以便“秋后算账”，是他们的无耻本质。

这些“黑材料”直到1980年代“清查三种人”时，仍然保存着，仍然在使用和发挥作用。

蔡新平：当年，他们整我们的黑材料根本就没有销毁……整我的材料主要是当时²⁵在市委党校时，我写的自我批评。档案材料是他们从武汉（地质大学）复印过来的。

他们对我说：“你看，这上面写了你们二进地质部时的情形。”

我说：“你看清楚了，我写的标题是《我为什么反对二进地质部》。”

当时，我之所以那样写，是因为革委会有一条，说蔡新平反对“二进地质部”。

他们说：“你写了，说二进地质部是革命行动，你还不是大闹地质部？”

我说：“你们看我的标题。周恩来同志有一句话，说二进地质部是革命行动。”

我还说：“这是我当年写的，还不知道今天要审查我，肯定不是写给今天你们看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写了我为什么反对二进地质部了，你们怎么还说我大闹地质部？”

我一看复印材料的页码已经编到641页了，好几铁皮柜子的材料，全部都是从武汉复印回来的，不是从北京这边来的。当时，中央不是要求销毁全部黑材料？实际是一点都没有销毁。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所里审查我的人和我关系挺好，审查过后对我说：老蔡，当时审查你，花了6000多元外调费，光复印费就花了800多元。他说，从武汉打包托运，有三大包——你们想，这得有多少材料复印回来！——我问都是啥玩意儿？他说，有你们写的大字报，有你的讲话，人家作了记录。——我后来知道了，我们有很多讲话、大字报都有人抄，从工作队起，反工作队的大字报，工作队都派人抄了下

²⁵1968年3月。

来。——里面，还有你们大闹地质部时你们的讲话录音。地质部的张金生后来对我们很好，他说，那录音带都是盒式的，后来存到我们档案室时，都转成了盒带。这些东西，我们档案室全有，都从武汉连磁带一并复制过来了。他说，你的东西多啦！你将来写回忆录，可找他们要。你们写的大字报，他们都有。

与“西纠”的肉搏

据《大事记》记载：

九月七日，他们调来了“宪兵团”——西纠，凶神恶煞地把东方红的队伍重重包围，以保护“老干部”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头发，皮带抽，砖头砸，并抓去了八名东方红战士，进行毒打、关押达二十小时之久。

《动态报》以“揪住邹家尤，炮轰地质部，火烧何长工”为题，对“西纠”的暴行记述如下：

地质部党委利用不明真相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围攻谩骂“东方红”同学，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甚至皮带、砖头、煤块、木棍都成了他们行凶的武器。他们还限制了“东方红公社”同学的人身自由。并且捏造了“东方红公社”“绑架”张以诚的“事件”。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九月十三日请邹家尤到“东方红公社”听取意见的正当要求说成是绑架殴打邹家尤的“反革命暴徒行动”，印发数以几十万计的造谣传单，开动专车散发于全市、以至全国，制造社会舆论。

何长工-邹家尤难以调动地院的保皇派为其保驾（因为地院的保皇派已经觉悟，不跟他们走了），他们能调动的校外力量，仍然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这时已经“发展”成为“纠察队”。

《东方红报》以《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为题，揭露“西纠”的罪行：

地质部事件简介

八、九月间，地院“东方红”战士高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旗，四进地质部，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为首的大小牛鬼蛇神勾结利用西城纠察队，镇压“东方红”。

九月六日早上，各校西纠队员奉“总部”命令先后来到地质部。西纠一进地质部就封锁了主楼南门，利用何长工等人提供的广播室大肆广播镇压革命群众的保皇文章，向地院“东方红”施加压力，并增派“宪兵”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包围在楼前院内，连上厕所、看病都要受到刁难。

地质部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何长工、邹家尤、胥光义一手操纵的。何长工这个反党老手曾假惺惺地说，“我们过去流血流汗打江山，现在他们（指地院东方红）还没有接班就来专我们的政了。”胥光义说：“地质学院是何部长一手辛辛苦苦地搞起来的。”西纠则说：“何长工是跟毛主席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还“保证”邹家尤没问题，造谣说：“中央发给了他们一个给予保护的证件。”

西纠刚一到，何长工就如见到了救命恩人，多次接见，亲自指挥。这些“宪兵”一见老首长如此“受气”，不禁“阶级感情”大起，口里大骂“狗崽子”、“混蛋”，拳打脚踢，气势汹汹，分关把守，对“东方红”战士大打出手，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人保驾。他们爱谁，恨谁不是很鲜明吗？！

地院“东方红”当时虽处于少数，但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保皇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西纠拼命保皇，地院“东方红”一反到底，斗争非常激烈。西纠后台之一许明怕露出马脚，急忙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她的宠儿，命令他们撤退，直至第三天，西纠才灰溜溜地撤走了。

地质部事件终于以革命造反派的胜利告终。

“促生产”成了大棒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何长工及其追随者以为捞到了救命稻草，立即加以利用。

据《大事记》：

（在9月6日调来西纠）挑起武斗的同时，他们又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攻势。粗暴地歪曲“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的精神，一天广播几十遍，大叫大嚷：东方红违背了中央精神，不在本学院搞文化革命、影响部机关的生产，攻击东方红“影响了他们斗黑帮。”他们制造了法西斯的“九·七事件”，然后又加以歪曲，反咬一口，写了《严正的联名抗议书》，以及所谓的揭发控诉书等等，到处张贴，散发全市。

事实上，《人民日报》的笔杆子并没有给何长工们留下什么救命稻草。因为，“外边人”不得“干预”的单位是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事业单位、服务行业以及农村，并没有写出国家机关单位。更重要的是，地质部之于地质学院，地质学院众多的“右派—反革命”师生之于何长工、邹家尤，是算不得“外边人”的，至少，在“反干扰”时，薄一波、李人林、何长工、邹家尤从来都没有把地质学院看作“外边人”。从法理上说，何长工与邹家尤等在地质学院干了那么多坏事，屁股一拍走了。现在，学生们追到家门口寻找公道，他们却说是“外边人”，这不是太不讲理了吗？

早在6月份，工作队进地质学院时“停课闹革命”，他们讲过“促生产”吗？在“反干扰”中，他们讲过“促生产”吗？在工作队撤而不离学校时，他们讲过“促生产”吗？如果他们真有仁爱之心，真有知错即改之心，何长工、邹家尤就不至于在8月12日晚，在阵阵“通不过”的呼声中，“置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在‘工人赤卫队’戒备森严的重重护卫之下，逃之夭夭”……无奈的师生在“拦轿”喊冤不成的情况下，不得不“一进”、“二进”地质部。这时，他们的“革命”观念突然淡薄了起来，“生产”观念突然浓厚了起来，而且，“促生产”又成了他们手中的大棒，振振有词、

昂昂有理地朝千余名学生打来。这时，“秀才们”遇见的何止是兵，简直是比无赖和强盗还可恶千百倍的恶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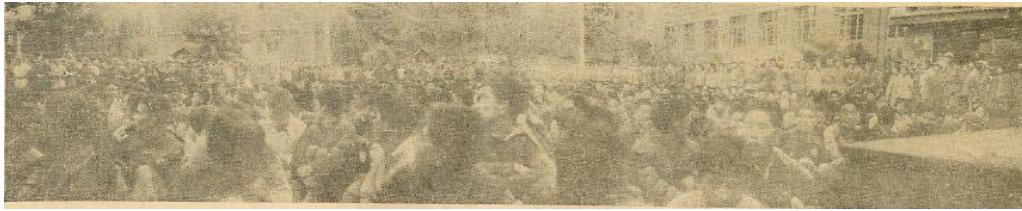
绝食抗争

据《大事记》：

当他们上述的阴谋都失败后，最后，九月十四日起，他们挑动食堂工人，三天不给东方红战士送饭，然而饥饿算得了什么？东方红战士照样学毛选出早操，还召开了生气勃勃、充满革命造反精神的联欢会。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友，北航红旗、北工大东方红等在斗争艰苦的时刻，给地院东方红小将送去《毛主席语录》，棉衣和食物。

《动态报》以“揪住邹家尤，炮轰地质部，火烧何长工”为题，对此记述如下：

他们控制了广播台，整天大骂“东方红公社”，企图分化瓦解“东方红公社”。最后竟然煽动工人大三天不给“东方红公社”同学送饭吃，企图饿死他们，对青年身心健康实行野蛮的摧残。还教幼儿园小儿童唱：“东方红，脸皮厚，原子弹打不透……”的歌谣。在那个严峻的时刻，东方红战士红心连红心，团结得象一个人。他们忍饥受寒，毫无怨言，斗志饱满，精神充沛，他们威武不可屈，壮志不可夺，发出了“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誓言，同地质部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



二进地质部时的绝食斗争
(大家坐着、靠着，以保存体力)

暂时撤退

因为何长工、邹家尤等人的顽抗，加之“东方红”总部提出的“罢免何长工的官”、“罢免邹家尤的官”的要求过高，使“二进地质部”难有结果。从政治运动的“规矩”上说，对干部的处理，一般要到运动后期。在当时情况下，虽然党中央有罢党内官的先例，但是，应学生的要求而罢官的先例还没有。

控诉或妖魔化文革的人一再指责说，造反派想罢谁的官就罢谁的官，是不成立的。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红”听从了毛主席女儿李讷的建议，以“迎接国庆节，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为名，撤离了地质部。

据《大事记》：

“二次大闹地质部”前后十五天，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曲革命造反精神的赞歌。

何长工们一切卑劣的伎俩都使了，得到的还是失败，东方红岿然不动。东方红战士在斗争中宣传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揪住邹家尤，猛轰地质部，暴露了何长工的原形。为了迎接国庆节，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地院东方红公社于九月十九日暂时撤离地质部。何长工，后会有期，何长工跑不了！

保皇派六次“斗黑帮”

第一、二、三次斗黑帮

“斗黑帮”，成为保皇派与造反派斗争的利器。

为了阻止“地质东方红”进军地质部，保皇派红卫兵和“斗批改兵团”在学校大搞“斗批改”，为“造反派”树立“榜样”。于是，倒霉的命运又降临到学院大小当权派（“走资派”）的头上，降临到教授、副教授（“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的头上。“伪文革”——“不走的工作队”以乱批乱斗、抄家来表明自己是多么坚定地掌握运动的大方向。而“地质东方红”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不搞“斗批改”，热衷于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和国家机关（地质部），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

归纳起来，保皇派曾经在地质学院掀起过六次“斗黑帮”的高潮。

第一次“斗黑帮”发生于1966年6月中旬。是时，工作队刚进院不久，出于工作队“三把火”的需要，出于打倒高元贵的需要，一部分急于向工作队表忠心的师生（大都是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受到工作队纵容，掀起了“斗黑帮”的第一次高潮。以前与高院长有关联的教员干部，只要有把柄可抓，就都成了他们的批斗对象，比如，刘普伦、陶世龙及与高元贵有关联的右派、教授等。

第二次“斗黑帮”高潮发生于6月20日前后。此期，为了阻止革命师生对工作队提意见、揭发工作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实质，他们将“右派分子”和其它“牛鬼蛇神”随意拉到批斗台上胡乱批斗。以此，给对工作队提意见的师生加上“不斗黑帮而热衷于‘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他们乱批乱斗还有另一个用心，如果有人对他们的胡作非为不满，指责他们，他们就会以“为阶级敌人喊冤叫屈”为由，对之进行打击。

从这一次起，聂克、周守成也遭了殃。工作队为平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众怒，不得不将聂克、周守成也抛了出来。

第三次“斗黑帮”高潮发生于6月22日～25日，薄一波批示之日起至公布之日。这一次“斗黑帮”的目的是为了“引蛇出洞”，给不同意见的师生“坐实”右派罪名。

这前三次“斗黑帮”发生在“造反派”还没有成军之时。

第四次、第五次“斗黑帮”高潮

第四次“斗黑帮”发生在工作队撤而不离的7月底至8月10日前后。

据《大事记》记载：

8月11日，伪文革-斗批改兵团毫无准备地召开了斗院党委副书记聂克大会。会上，竟有人责问聂克“是不是‘6·20事件’的后台”！其挂斗黑帮之招牌，干包庇工作组之勾当暴露无遗。

第五次“斗黑帮”发生在工作队撤出前后，事涉政权最后移交和接管，因此，“斗黑帮”就显得特别残酷。文献对这次“斗黑帮”高潮的记录也较为明晰。

据《大事记》记载：

(8月13日)伪院文革组织欢送工作队，受到东方红师生的反对和揭露后，“歇斯底里大发作，指挥保皇派，捣毁了‘东方红’队部，打伤了‘东方红’战士，晚上又用暴力强占了广播室，并把被工作队定为反革命分子的革命群众王××打为‘东方红的后台’，拉出去大斗特斗，使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惯用伎俩，企图在政治上陷害东方红。

《文革十年史》：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出大中学校工作组的通知》的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在做了简短的总结或检查后，撤离了。由在工作组帮助下成立的文革小组或筹委会暂时领导运动。

在联络员的指挥下，各大专院校“立即转入斗黑帮”。不少学校还办了“劳改队”，把工作组时期被定成“反革命”的群众也赶了进去。这样，反工作组的活动又停息了。

自广播台易手后，“反干扰”、“抓右派”的噪音就不时从广播喇叭中传出。校园里的政治气氛似乎又回到了工作队“反干扰”时期，运动被拉向右转。

只因中间派师生对“斗黑帮”不感兴趣，而且，谁都知道，“斗批改兵团”的“斗黑帮”只不过是“项庄舞剑”，除过保皇派自己聒噪外，少有看客。因此，多数批斗会都是草草开始，草草结束。有那么几天，校园里冷冷清清，甚为凄凉。

曹敏久：8、9月份，有一天，在北五楼南边，机修厂东边的空地上，“斗批改兵团”将右派拉来，剃阴阳头，进行人格侮辱。右派不干，鬼哭狼嚎地。但是，也无可奈何。我们对此非常不满，但是，也不能制止。

第六次“斗黑帮”高潮。

发生于8月底～9月上旬，“地质东方红”“一进地质部”之后。由于“伪文革”一保皇派在地质部领导的支持和操纵下破坏了“8·24大辩论”，“地质东方红”再次进军地质部就箭在弦上。为了阻挠和破坏“地质东方红”再次进军地质部揪何长工和邹家尤，他们在大声斥责“地质东方红”“揪住工作队不放”，不按《十六条》办事，不搞“斗批改”，专门把矛头指向党的革命领导干部，冲击国家机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的同时，在地质学院掀起了“斗黑帮”的第六次高潮。

他们游斗高元贵，游斗聂克等，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举办抄家成果展览（在教工之家展出），展出一些国民党证、党徽、凶器，变天账等。还说，他们这才叫抓“斗争的大方向”。

他们游斗聂克时，受到“东方红”的抵制。当时，附中学生未到地质部去，石白河、王白沙等学生，带着中学生跟在“游斗”队伍后面敲锣，高喊：“斗聂克是大阴谋！”

他们还把图书馆的书拉了几大车烧掉了。

他们还办了劳改队，把所谓的“叛、特、走、反”牛鬼蛇神集中起来，每日劳动、批判。

他们要让地质学院的其它人看到，只有他们才是“忠实执行十六条”的，只有他们才是革命的！他们要把“不搞斗批改就是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屎盆子狠狠扣在“地质东方红”的头上！

不仅如此，这些“一斗二批三改”的英雄们，还追到地质部，大揭“地质东方红”不搞“斗批改”的“老底”。

第16章 “地质学院”夺权了

查封“伪文革”

查封“伪文革”，抢夺广播权

9月22日晚至23日凌晨，周总理接见三司领导成员。并对地质学院的斗争，作了具体指示。对于地院保皇派不给造反派饭吃的问题，周总理说，可以分开吃嘛。

朱成昭回校后，立即发动了校内夺权行动。

据《大事记》：

……（9月23日）“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地院东方红冲破地院文革的阻挠，奋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院广播台。伪文革保性大发，挑动工人大赤卫队、“斗批改”兵团，大打出手，武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百七十名东方红战士负了伤，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央文革陈伯达同志即派观察员赶到地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坚决支持东方红革命小将，肯定了他们揪邹家尤，炮轰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党委的革命行动，制止了这场武斗。

吴鉴：抢广播台，全是人，挤得呀……他们（保皇派）弄来食堂的大师傅在里面，这些人胖，汗多，挤的这些人都顶不住了。挤不进去，王大宾就爬到电线杆子上去摘喇叭。后来，保皇派出大字报说，王大宾这是在破坏公共财产。

关锋、戚本禹：我们支持你们“东方红”！

“地质东方红”夺权的消息很快上传到中央上层。

陈伯达立即手书条子，派关锋、戚本禹做为“地质学院观察员”，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一起，前来地质学院解决问题。



9月23日，关锋、戚本禹同志与“地质东方红”战士交谈

《首都红卫兵》报对此次行动和进程进行了报导，现全文引述如下：

北京地质学院召开大会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

全面地、认真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按十六条办事

陈伯达同志派关锋、戚本禹两同志作北京地质学院观察员，

吴德同志主持大会，关锋同志讲话

[北京地质学院二十四日讯]今日凌晨，在我院大操场由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同志主持，召开了全院师生员工大会。陈伯达同志派往我院的观察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同志出席了大会，关锋同志代表他与戚本禹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一、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讨。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当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时早已说清楚了的。

二、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当去检讨。

三、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于工作组没有意见，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持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去检讨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挠他们这样做。如果你们采取阻挠的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四、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检讨的行动，不能说是错的，是对的。

关锋同志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博得了阵阵掌声。

关锋同志讲话后邹××表示愿意听取我们的揭发，随叫随到。

吴德同志讲话，他表示完全拥护关锋和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支持我们的行动。对另一派同学，他说：我相信他们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有些问题看法不一定对，或者不对，也是认识问题。特别要求我们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号召我们在十六条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指示来办事，很好地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大会的还有航空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外地来京革命串联的革命师生。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供稿)

当时闻讯赶来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地质学院又一次成为国人的聚焦点。

关锋名义上是代表他和戚本禹，实际上是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说话。对于夺取广播台的斗争，关锋和戚本禹把“地质东方红”和“斗批改”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说学校的广播台是大家的，不能由一派掌握，可以规定时间，轮流广播嘛！

两派达成协议后，“地质东方红”才把人撤出来。

“地质东方红”开始掌控地质学院

“轮流广播”的协议一达成，表面上给了“东方红”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力，实际就意味着保皇派的失败。因为真理不在他们一边。

保皇派的退出，“高旗无畏”的第三次进驻，标志着“东方红”开始掌控地质学院。

保持派的退出，也意味着保皇派的瓦解。道义的失败是保皇派瓦解的主要原因。自1966年9月以后开始的大串连，则是“斗批改兵团”走向消亡的促进剂。保过工作队的绝大部分学生到了外地，都以“地质东方红”自誉。“东方红”对这些“站错了队”的同学没有半点歧视，对他们“站过来”的行动是欢迎的。

从此时开始，出现了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混杂”。混杂后，虽然仍然叫造反派，但，“造反派”已经变了味。

“地质东方红”的夺权行动，在北京以至全国，都是最早的。

文革由相持转入反攻

周恩来旗帜鲜明：应该支持“地质东方红”

“首都三司”从8月下旬串联、9月6日成立后，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与工作队及其支持者、拥护者英勇搏斗了近一个月，终于感动了上帝。经过我们的要求，周恩来总理要单独接见三司战士。

到了9月下旬，三司总人数没有多少增加，仍然不过三千多人，仍然不能在工人体育场那样的既可以使人大为壮观，也更能使人渺小的场所开会。于是，司令部仍然将会场选在工人体育馆。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总理才在9月26日的接见和讲话中指出“不要怕是少数，认为对的就要坚持下去！”

据《首都红卫兵》报导：

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做报告。首先给我们少数派以巨大的鼓励和热情的支持，肯定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红卫兵组织是革命的，总理说：“不管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的组织，说你们不是革命的组织或者甚至于污蔑你们是反革命组织，这样的说法没有根据的。”“你们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你们敢于坚持你们认为对的革命造反的真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我们青年人就是要敢说，敢干，敢于坚持真理，自己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坚持下去。多数和少数，究竟谁是革命的，谁是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检验出来。

周总理说，当前各校的各派红卫兵“应该一律平等”，在物质上要同样待遇。**特别指出，地质学院的少数派是革命的，应给以支持。**对不支持，甚至阻挠革命同学要求的部门的当权派，他们的问题应该交待。

总理在谈到工作队问题时明确指出，你们“是有优先发言权的！”“工作组在时，挑动学生斗学生，支持一些人压制、监视、打击、围攻斗争另一些人，这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戴在学生头上的‘反革命’‘右倾’等等帽子应统统取消。”……

总理最后说：“不要怕是少数，认为对的就要坚持下去。”我们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之中诞生的，是在斗争中得到考验的，我们是依靠毛泽东思想起家的，今后还要靠毛泽东思想干下去，胜利一定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周总理的讲话，导致了地质学院保皇派“斗批改兵团”和“地质学院红卫兵”的进一步瓦解。虽然，他们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解散，但是，从此，“地质东方红”就开始掌权了。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少数派”，大大鼓舞了其它院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师生。各校“少数派”纷纷起来造反。随即，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以及北航红旗等，也纷纷效仿地质学院，陆续夺取了学校广播台，开始掌权。

10月6日，以“地质东方红”为核心的“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出席了大会，给尚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造反派以巨大支持。

在这个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

“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张春桥还宣读了这一《紧急指示》上的中共中央批示，批示说：“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因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坚决贯彻执行。”大会通过了《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从此，文革运动由相持转入反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陷于造反派的包围和批判之中。终于揪出了何长工、邹家尤

据《大事记》：

10月8日，地院“东方红”小将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主席像为前导，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周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之流提出七项严正革命要求。深夜，东方红小将带着何长工之流凯旋而归。何长工被揪出来了，“何家店”完蛋了！

10月27日，东方红小将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



《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军的号角。“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图为：十月八日《东方红》公社全体战士第三次进军地质部途中。

三进地质部

眼见大势已去，何长工、邹家尤只能无可奈何地向群众低头认罪，表示愿意随“地质东方红”师生到地质学院接受批判。

可是，《狂飙——红卫兵童话》(P273)在述及这件事时，在引用了《大事记》有关这件事的原文之后却笔头一转：“深夜，他们绑架了当时任地质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的何长工。”

文革，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妖魔化的。

“东方红食堂”始末

二进地质部期间，何长工、邹家尤及地质学院“伪文革”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时不时就以“饿饭”相威胁。最后，竟致下令学生食堂，连续三天不给进军地质部的学生送饭，将学生们饿了三天。

“东方红”回校后，“伪文革”仍然将“饿饭”作为大棒，高举在“东方红”战士的头顶。他们任意辱骂造反派，动不动就不给“东方红”同学开饭，曾经一天不给学生吃饭。

在周总理9月22日晚的指示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东方红战士”又造反了，他们接管了学一食堂，即原物探系食堂。

接管的时间是1967年10月9日。



学一食堂中某些人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唆使下，三天不给在地质部坚持斗争的《东方红》小将送饭。十月八日又无理罢工，《东方红》战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于是在十月九日我们就造了它的反，砸烂了《学一食堂》的旧牌子，换上了《东方红》食堂的大匾。《东方红》食堂在暴风雨中诞生了。

东方红战士接管学一食堂，成立“东方红食堂”

刚开始，学生们做饭肯定不行。因此，“红眷联的家属主动来支援”。结果，馍馍蒸熟了，菜炒熟了。此后，还变着花样改善伙食。和原来的大师傅们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

支援的大字报，把整个食堂都给贴满。到东方红食堂吃饭的学生越来越多。

1967年4月3日革委会成立后，东方红食堂继续运营着。4月9日，我东方红公社举行了庆祝东方红食堂成立半年的活动。东方红战士坚决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抗大式的道路，把东方红食堂办得好上加好。

东方红总部于1967年4月26日发了一个“通告”，对东方红食堂的延续作出了规定：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在全体革命师生的共同下，食堂大改，决定五月一日正式实行，原职工食堂和学生食堂一律取消，仿照东方红食堂建立起“革命学生、大师傅、管理员”组成的有代表性的三结合权力机构，受各系分会和后勤分会的双重领导。师生下食堂，学工、学农，与大师傅同吃同劳动同革命，把所有食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防止修正主义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随着保皇派的垮台和解散，原先在食堂干活的工人没有了依靠，他们不得不可怜兮兮地寻求东方红总部：让他们回食堂工作，给一碗饭吃。在他们认识了错误之后，就陆续回到食堂，和进驻食堂的学生一起做饭。

后勤部的“通告”一出，“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就取代了原先的领导关系与管理体制。后来，学生就逐渐撤出了。

第17章 “二月整风”

“地质东方红”领导核心的形成

1966年7月底8月初，在串联成立东方红战斗大队的时候，领导班子的成员，除朱成昭外，副手等其他人，都没有认定。事实是，那时，人们刚刚接触，开始交往，彼此间的信任和默契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核心难以形成。

那时候，群众组织的领导班子是关键。领导班子成员的出身成分是纯而又纯的，人品不能有瑕疵。否则，上，领导不承认你；下，没有人跟你。其组织，不可能发展。比如清华的蒯大富，因为人品有问题，长期是“孤家寡人”。到了9月下旬，才在中央和“地质东方红”的一再支持下，组织起几十个人的队伍。

事实上，在“地质东方红”的成员中，有许多人是很优秀的，只因他们“出身不好”，而不能出头掌帅，只能默默地做些后台的工作、具体的工作。

最早期参加“东方红”核心活动成员有：朱成昭，王大宾，田春林等。随后，增加了蔡新平、陈学明、蒋良朴、杨雨中等。

二进地质部时，形成了“朱蒋杨”领导核心。核心成员中又增加了一个后勤部长朱德瑜。陈学明则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除名。

蔡新平：“地质东方红”最初的核心组成员除朱成昭外，其它成员并不很明确。朱成昭对周永璋不放心，认为周永璋是共产党员，依据前两个月运动的情景和教训，在条件发生变化时，他有可能出卖“东方红”，并将“东方红”的核心秘密汇报给党组织。周永璋对朱成昭也有看法，认为朱成昭在前段运动中整过政治辅导员，进而怀疑到他对共产党的忠诚问题。相互猜疑的这种戒备，最后都交汇到我的身上，朱成昭告诫我要防着周永璋，周永璋则要我警惕朱成昭。

因此，周永璋被排除在核心以外。

王大宾，出身于贫农家庭，工作队撤出地质学院时，他是探工系五年级“探工战斗联队”的负责人。

蒋良朴，一个贫农的儿子，原是“勘探联队”（勘探系五年级）负责人。在四进地质部中，以其组织才能，成为“地质东方红”事实上的前线总指挥。

朱德瑜，一个来自重庆的革命干部子弟，地质系（五年级）学生。他之进入“地质东方红”核心组发生在二进地质部时。“一进地质部”曾因为“斗批改兵团”和食堂工人不给“造反派”饭吃而致进军地质部的一千余名学生绝食。二进地质部时，吃饭问题就成了大问题。为了不使大家饿肚子，朱德瑜任劳任怨，跑前跑后，跑地质部，跑地质学院，不断想法将饭食送往地质部大院。朱成昭此时才感觉到后勤工作的重要。经与大家相商，任命朱德瑜为核心组成员兼后勤部长。

杨雨中，出身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探工系三年级学生。他是在二进地质部时进的核心组。经历“二进”、“三进”和“四进”地质部，他逐渐显露出灵活的头脑和组织才能，成为朱成昭、蒋良朴的得力助手，“地质东方红”也逐渐形成了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为首的领导核心，号称“朱蒋杨”。

在文革初期，我们谁都不把“造反”、“革命”视为“已有”。在打败工作队以后，人们谁都不认为自己有“打天下，坐天下”的特权和资格。无论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大队”还是“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其领导班子成员都没有“头衔”，没有“司令”、“政委”的叫法。为了表明自己的平民身份，“核心组”成员都称为“勤务员”。朱成昭自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一直是“地质东方红”的第一把手，但是，至今，他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长”、“××主任”、“××书记”、“××司令”等称呼。人们对他的称呼不是“朱头”就是“老朱”。而“朱”与“猪”同音，在人们的口头称呼中，就难以分出是“朱头”还是“猪头”，“老朱”还是“老猪”。在惯常的称呼中，其它核心组成员也多有“绰号”，但同样没有“官号”。

作为勤务员，那就意味着他得随时听命于主人的差遣，意味着他随时都可能被主人罢免。这就是我们当时理解和遵循的在《十六条》中写明的“巴黎公社选举原则”。

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

朱成昭的“五大观点”

1966年10月以后，全国进入学生大串联时期。同时，从学校到社会，也逐渐进入了夺权阶段。上海的“1月风暴”，宣示了全国性夺权阶段的到来。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当权者阶层的权益，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整走资派”，只限于“整”，权势利益还在。夺权，则意味着走资派权势的丧失。权势的丧失，则意味着利益的丧失。

继1966年“12月黑风”之后，至1967年初，攻击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的风潮又起。自1月6日始，北京外语学院“6·16兵团”（其负责人叫刘令凯）贴出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科技大学“雄狮”写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分歧在哪里？》的大字报；师大附中贴出的大字报的题目是《严重违反十六条的现象——评12月份以来的抓人现象》；高级党校“红战团”贴出了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联动”在破坏“三司中学部”和首都兵团联合发起的辩论会的同时和之后，大放“二踢脚”，高唱“鬼见愁”，狂呼“打倒三司”，“江青算老几”等口号……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论何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朱成昭的想法，还会影响“东方红”的方向，因此，他的想法尤其令人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地质东方红”需要用整风的方式，对各种想法加以“调整”，以端正前进的方向。

宫宝军（地质系学生，后来当了地质系革委会副主任）说，他1967年1月12日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当时学校整风，他被推选为学校整风领导小组组长。

1月13日，朱成昭在东方红骨干会议上，将他对前段运动的看法和忧虑说了出来。他说，如何面对这种形势，希望大家思考、讨论。

1月18日，朱成昭在全院整风大会上，就他的错误做检查。朱成昭在检查之余，也将他的忧虑说了出来。20多年后，朱成昭将之总结成五条，称为“五大政治观点”：

- (一)大串联过早了；
- (二)整风军训有害无利；
- (三)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条件不成熟；
- (四)中央文革抓人抓多了，联动不错，可能是左派；
- (五)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这“五大政治观点”因为是朱成昭20多年后“整理”的，必然有言过其实之处。

蔡新平等以为，抓到了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把柄，就立即跑到北大、清华，分头与聂元梓、蒯大富商量对策，并通过蒯大富，将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的事情报告了中央文革。因为蔡新平等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就推测说，朱成昭写了一封反对中央文革的信，还写了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等等。

向中央文革报告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的，可能还有其他人。

据生前访问过朱成昭的宋永毅的文章：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等人在梅建明家连续开“黑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不料王大宾偷偷向中央文革告密²⁶，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批示给朱，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

这里，朱成昭说的言过其实了。试想，如果他们“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又如何能将之反映给中央文革，请中央文革在工作中注意和改进？因为他说过，他几次给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要求面谈。得到的回答却是，“再等几天”，首长们在开会，忙得很！

地院传达陈伯达的批示，已经是1月24日了。

朱成昭等认为，陈伯达的批示，比薄一波的“万吨水压机”还重。

在蔡新平等人的炒作下，“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问题就越闹越大。

整风，首先是要整对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宫宝军为首的领导小组认为，朱成昭必须对此做出交代和检查。²⁷

“朱、蒋、杨”的声明

蔡新平等炒作“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导致了陈伯达批示的到来。然后，他们又以陈伯达的批示，再炒作朱成昭的“反中央文革”的问题。

朱成昭等人不想当“茅厕里的石头”，面对蔡新平等人的进逼，于是，就有了1967年1月29日“朱蒋杨”的《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

《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

朱成昭、蒋良朴、杨雨中

一、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份子，以及一切牛鬼蛇神进行决战的阶段。对此，我们开始的思想未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认识不足。后经伯达、关锋等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多次耐心的教育，和广大革命同志的热心帮助下，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某些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缺乏阶级分析，领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远见不够。我们准备向全院革命师生作检讨。欢迎东方红公社的战友们，革命的教职员同志们，来院的解放军同志们以及外校、外地的革命战友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严肃和尖锐的批评。

²⁶王大宾是否“告发”朱成昭，只有等中央文革的档案解密后，才能下结论。

²⁷宫宝军 2010 年面告。

二、中央文革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参谋部。她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困难的日子里，是她，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拯救了我们；在我们进行复杂的斗争中，是她，帮助、支持和培养了我们；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是她，对我们进行了严肃和耐心的批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教诲。我们的命运与中央文革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自与她接触之日起，就时刻准备着：永远与她同生死、共患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这是我们早已确定的信念。谁也不能指望我们与中央文革分离开来。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就坚决砸烂他的狗头！

三、朱成昭明确表示，他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反对中央文革的信，他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陈伯达同志的批示，陈伯达同志说，这是在一件材料上写的几点意见，目的是规劝。这个批示由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光宇同志传下来，并嘱咐不让公布的。

有人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朱成昭写了一封反对中央文革的信和一些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这纯属造谣，有人擅自公布伯达同志的批示，这是恶意煽动。后果由造谣者和煽动者负责。

树欲静而风不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我们犯错误之机，刮阴风、放暗箭，点鬼火、造谣言，企图离间我们与中央文革的亲密关系，搅乱左派阵营，败坏东方红公社的声誉，搞垮东方红公社，进而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以达到他们卑鄙可耻的目的，这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一些惯于投机取巧两面三刀混水摸鱼的人，他们长期以来总觉得自己不得势，大有“壮志未酬”的味道。现在也乔装打扮起来，冒充左派，兴高采烈、摇旗呐喊，只恨天下不乱，企图在混乱中捞到点便宜。他们极尽喧染夸大之能事，把一根稻草说成一根金条。我们要正告这些人：你们到头来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我们公社的基本队伍是好样的，是经得住风浪和考验的。我们，作为与他们并肩战斗过来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在这严峻的时刻，相信他们会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地院东方红公社的坚定的战士永远不会把地院东方红的大权叫那些投机成性的托派捞到手里。

我们东方红公社一向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我们将同一切投机份子，托派份子斗争到底。坚决回答他们的一切挑战。

五、东方红公社急需整顿。我们决心发动广大东方红战士加强思想和组织建设，重整队伍，把东方红公社办成一所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7年元月29日

(载于1967年1月31日《东方红报》第10期)

朱成昭“八大观点”要点

至于“社会事件”对朱成昭思想的影响，比如1966年12月下旬，彭德怀被抓到北京后，朱成昭看过彭德怀的“翻案信”；朱成昭与叶剑英之女叶向贞的接触等，是否会受其影响，都是人们的推测，不足为凭。

促使朱成昭“深入思考”的决定因素在于他的“贴身利益”。在“一月风暴”中，他的父亲被打成了“黑帮”，受到批斗！朱成昭不能“大义灭亲”。他作为一个突然掘起的风云人物，前途正无可限量！他已经有了发言权，他要将这发言权用在为自己的父亲，也为与父亲有同样遭遇的人的“不公正”对待上。这，与部分“老红卫兵”转变为“联动”的“保爹保妈派”思维模式相类或相同。因此，朱成昭对打击老干部的“面”过宽有意见，对“血统论”对联的反动性有保留……

郑文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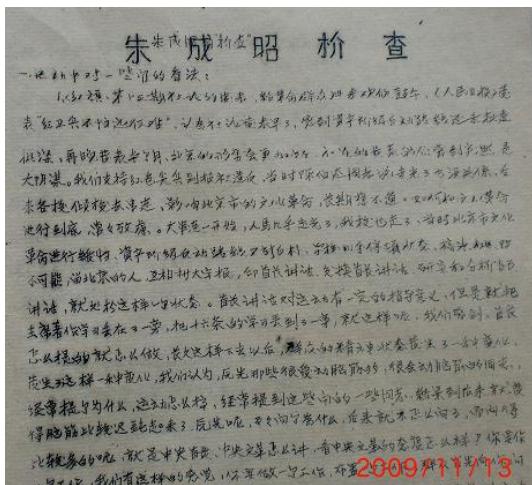
1月底2月初，开门整风的领导班子仍然是“朱、蒋、杨”。在2月4日晚以前，广大群众并不清晰、系统地知道朱成昭的真实观点。在“朱、蒋、杨的声明”中，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问题。大家只是从传言中觉得，他的观点有问题，不符合潮流，会将“地质东方红”引向邪路。

群众批评了他，中央批评了他，他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反对中央文革。

于是我就对他说：既然你不服气，认为不符合事实，那就不如借检查之名，将你的观点合盘端将出去，让大家评判。

于是，就有了1967年2月4日晚的检查。

朱成昭的检查



据录音整理的《朱成昭检查》油印件原件（开头部分）

检查要点：

一、运动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1、《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早了。

在10月份时候，我们公开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当时，我们还打算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学校的一切权力.....夺权以后怎么做，我们都做了一个初步安排。当时.....中央文革同志把我们找去了，批评了我们.....因为我们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种提法不好，不策略，另外，说我们要接管学校一切政权，这样包袱太重。并且，最后说：你们以后要提什么口号，提出什么东西，要先给中央文革商量好，因为你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一个组织，一面红旗，让你们提出口号就对整个运动有所影响.....在后来一个阶段，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中央文革，让文革小组点头我们才去做。所以.....在我们思想上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奴隶主义思想。

2、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我们感到应该两个方面，一方面召开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这是必须的.....这个十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工人体育场一排排上了半个月以后，都满了。我们认为这个大会开多了没有什么好处.....而主要的方式，应该是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扫它的社会基础，这是主要的。这个社会基础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各个基层一些刘邓路线的追随者，一些顽固的坚持者，要揪出这样一些人物，和他们进行斗争，进行批判。但是，当时在北京市的各个学校，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比如北航红旗，他们的工作队就没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们学校里面黑帮也没斗过，这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而他们老是热衷于开这个大会，开那个大会.....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工人运动，革命的农民运动相结合。

3、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感到中央文革小组过早地定了调子.....到底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中央文革这样太早的下结论，中央文革一点名，说这个是，那大家都去揪，而大家马上都倒过去了，都要去揪他了，而中央文革说不是，那么大家都不去揪他了，这样的话，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比较小。比如说：周荣鑫的问题，基本上群众没有揪，直接是点了名，然后大家一起抓出来去斗的；关于肖华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多被动，陶铸的问题也出现争执，开始有些单位揪，总理又保，保了以后，大家又都不揪了，后来文革又点了名。大家又一起去揪把他揪出来了.....比如说，李洪山的问题.....科大雄狮问题，科技大学雄狮战斗队.....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我们认为还是不抓好.....

4、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在去年10月中旬和11月初的时候，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当时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逐步实现全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而且第一步就是统一三个司令部，把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首先在学生中联合起来，本着这个想法，我们就和北航红旗、政法公社、建工八一团等三个司令部的一些学校，一些左派队伍建立了一个联络站，在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想以此逐步统一三个司令部。但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同志知道这事以后，批评了我们，当时关说：你们那样做会把三司挤垮，这样，就会影响到中央文革，我们不希望三司垮，我们不希望你们垮，你们也不需要我们垮，要是革命搞不好的话，不仅是你们要打成反革命，我们也要被打成反革命。

....大夺权必须有大联合作为前提，否则很多政权将被保皇派保皇派夺权.....第二个问题，大夺权必须利用和依靠那些好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打倒。当时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凡是当权派都要打倒.....在夺权中也不应该出现一些戴高帽子呀，游街呀，挂黑牌子呀，等等这些现象.....

第三个问题是北京的大联合不能一哈而成.....在北京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有他的先天不足性.....所以，北京市全市性的大联合要是以工人为主体的话，是必要抛开几个工人总部，从基层做起.....第三，北京市的学生运动由于出去串联的时间比较长.....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方面工作是比较差的。现在学生运动当中出现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弱点，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些现象就比较严重，所以北京市的联合有一定困难的。

第四个就是北京市没有像上海和其他地方那样，经过了一个全市的大搏斗.....

5、第五个问题，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尤其在这个对联问题上，因而对联就.....被西纠发展成了反动的血统论，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待中学生这部分力量不是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忽略了作思想工作和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后来对联动的态度尤其这样。这里可以举例子，例如清华井冈山抄人大附中红卫兵时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知道不大确切），据说把小孩赶到楼上了，赶到楼顶上，一层层追，追到楼顶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小孩给打的只剩下六七个了，在楼顶上他们升起了国旗，用瓦片砖头打下来，一面高唱国际歌。另外，在抄石油附中红卫兵家时，红卫兵他们打打，退到地下室里边，他们就把地下室里边放了水，说：“你们出来

不出来？不出来就继续放水！”还有用灭火机向小孩脸上喷，说：“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再喷！”这办法，我们认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些十多岁的小孩也被抓去，当政治犯抓去，只有十多岁，十岁刚出头，十二三岁就当作政治犯抓去，这都是群众性的组织抓去送去的，关在监狱里边，许多联动的小孩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口号，压的不服嘛，他们提出这样一些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战斗队，他战斗队的名字就叫“活着干，死了算”.....联动是反动的，但他有免疫力，并且可能成为左派队伍。

6、关于坐牢问题。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他的两个头头写了两张大字报，被抓了，我们就准备坐监狱，我们想，主席、林彪知道了才能平反。

7、聂元梓问题。新北大初期，对全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七月底为什么转而反了我院和北航红旗？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在北大辩论工作队问题时，过早地定了调子，队伍未分化好，造反派，保皇派未区分开。聂元梓有很大功劳，但批判工作队时未发挥她的作用。她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人物，如果聂带头反工作队，工作队是站不住脚的。聂元梓与王任重是未划清界线的，对王任重的反动路线未抵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有错误。群众批聂，聂应检查，但聂老虎屁股摸不得，中央文革定聂是革命左派，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另一事实是，有一派，死保工作队，后又死保聂。红旗公社，北京公社成了堂堂大左派，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人还未翻身。

8、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年青人与工人反对林杰、关锋、康生，而一些老干部保。年青人造反精神好，老年人保守，我们派人去了解过，但没有参加“调查康生问题委员会”。

以上文字，都是“朱成昭检查”的原话。删除的，都是作者认为无关紧要的部分。检查的油印原件保存在宫保军手中。

朱成昭的检查大会由宫宝军主持，在大饭厅进行。检查完了以后，全场鼓掌，予以通过。

检查完了以后，张海涛上台，对攻击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人予以批评。“二团”的人则上台，对张海涛的讲话予以反对，认为这是偏袒朱成昭。

从朱成昭的检查中，更深一步体现了朱成昭的“统帅”才能。无论他的看法正确与错误，他都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对一些问题进行独立而深入的思考。对于他所思虑的那些问题，我自己当时也碰到了，也看到了，也进行过思考。但是，我却觉得，对于北京的问题，对于全国的问题，那是中央上层要考虑的问题，我辈只要紧跟、执行就是了。显然，我的奴性比朱成昭要大许多。

从《朱成昭检查》中，我们能看到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吗？

从上文“东方红”的活动史可以看出，“东方红”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完成的。朱成昭何德何能，能在很短时间内“超越”中央文革，甚至反对起中央文革吗？

当时形成的政治氛围是，中国只允许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说了都不算！不允许独立思考！对毛主席，对中央文革，不要说反对，就是有半点异议、半点怀疑、半点不恭，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大逆不道的。朱成昭敢于对中央文革的作法有些微不同看法，就是杂音，就被“更革命的人”认为是“反对中央文革”！

“蔡派”认为，只要将朱成昭“反对中内文革”的罪名坐实了，他们就可以夺取“东方红”的大权。

广大东方红战士当时认为，朱成昭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

“蔡派”要夺“东方红”的权

据《动态报》（2月21日）报导：

以江祖如、付昭仁、吴瑞堂等人组成的红教联湘江战斗队于昨日贴出题名为“无限风光在险峰——为纪念‘六二〇’八周月而做”。摘录如下：

1)一切革命造反者歌颂6·20，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分子.....还有一种人，他们失去了6·20的感情，一听到6·20就脸色发白，心惊肉跳，妄图抹杀6·20的功勋。这种人不是革命的叛徒、蜕化变质分子，也是糊涂虫。

2)6·20革命造反派要彻底翻身，这些同志在反干扰中遭受残酷政治迫害，有一部分人至今仍未翻身，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若否定他们就是否定革命，打击他们就是打击革命。从6·20至今八个月来的斗争从正面和反面证明，大权只有掌握在这批革命造反者手里，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大联合、大夺权中必须坚定地以这些久经考验的革命闯将做为三大斗争的核心力量。

是谁“一听到6·20就脸色发白，心惊肉跳，妄图抹杀6·20的功勋”？显然指的是“东方红”的领导班子和广大东方红战士。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江祖如等人的大字报说得如此离奇，也就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不过，还是有人针对这份大字报，写出了质疑的大字报。据《动态报》（2月21日）报导：

红教联井冈山战斗队也贴出“劳驾答疑”的大字报，摘要如下：

1) 你们所说……流毒，能否请你们开出一份所知道的这种人的名单，最后，对你们未能翻身的缘由说清，你们认为怎样才算彻底平反、彻底翻身好了？

2) 请问“革命闯将”这是指的哪种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掌权？为什么必须以他们为核心力量？

这两个问题是江祖如等“蔡派”人士难以回答的。“6.20事件”的参加者人数众多，“没有彻底翻身”的“6·20革命造反派”不知该如何认定？“6.20事件”的一个带头人周永璋不是当了“三司核心组”负责人？另一个带头人蔡新平不是自称当了“东方红”的“政治部主任”？这算不算“翻身”？

令周、蔡及“蔡派”不满意的是，他们的“官”都只当了一个多月，或被朱成昭免了，或自己不当了。为何没能当得长久？那既要问朱成昭，更要问他们自己。只是，这已不是“翻身”、“不翻身”的问题了。

“蔡派”认为自己没有错。自己的下台，错在朱成昭。因此，整掉朱成昭，由自己“取而代之”，这才是“公理”！

朱成昭是不是该下台；他下台后，该不该由“蔡派”取而代之，在大多数“东方红”战士看来，另当别论。他们认为，对朱成昭的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批判，别有用心。因此，不少人贴出大字报，对之提出批评。

“蔡派”对此种批评拒不接受，反而给批评他们的人扣上“保朱派”的帽子。

“二团”的殷惟侯则认为：“我们有缺点错误，但在批判朱成昭时不能进行自我批评”。

整风的要义之一就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只要朱成昭作自我批评，只要“东方红总部”作自我批评，而其他人，包括“蔡派”，不作自我批评，这是什么逻辑？

这算什么整风！

“杀猪切菜派”说话了

221 战斗队贴出题名为“最大的分裂者是谁？”的大字报，首先提出东方红的分裂问题。被称为“朱派”的师生，在人数上，占有全院的绝大多数，他们既不能同意“蔡派”的观点，更不接受“朱派”或“保朱派”的称呼和指责。在他们看来，因为朱成昭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工作有看法，对其观点应该进行批判。但是，绝不同意“蔡派”夺权！显然，“蔡派”的所言所行已经不是在批判、否定朱成昭，而是在否定“地质东方红”，否定“地质东方红”所代表的文化革命大方向，否定“地质东方红”的大多数师生。

在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了又紧的时代，谁愿意与一个有“反中央文革”嫌疑的人联系起来，被称为“保朱派”或“朱派”？况且，朱成昭——一介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既没有伯乐手中的干部任免权，更没有枪炮的使用权，对他的错误为何要保护？！民主的理念所使，你正确就跟你走；你不正确，你就靠边站；你背叛，就抛弃你。

朱成昭是被暂时抛弃了。但是，朱成昭的错误并不能掩盖“蔡派”的错误。各有各的账！

于是，与“蔡派”、“保朱派”相对应，一个“新的词语”就出现了：“杀猪切菜派”。

单是从“杀猪（朱）”、“切菜（蔡）”这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一派人的理念和主张，就可以看出这次整风中意见分歧和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自己的命运的注重。

从根本上说，由批朱引致的开门整风，是对“地质东方红”半年来斗争方向的一次审视和端正。现在可以看得很明白，在“四进地质部”期间发生的“东方红”内部之争，原本是革命斗争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在“开门整风”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猪”是要杀的。但是，“杀猪”（朱成昭的倒台）并不意味着“蔡派”的正确，并不意味着“蔡派”就可以上台，就可以取“朱、蒋、杨”而代之。因此，也要“切菜”。

这是当时地质学院的主流思潮。虽然没有通过公民投票，这却是民主的决断。

“杀猪切菜派”是“地质东方红”的主力派。大辩论、大民主，使“地质东方红”的绝大多数统一了认识，也使“蔡派”的极少数人孤立起来，使地质学院实现了牢固的大联合。

如果考虑到当时和后来多数院校派别林立，互相争斗，以至大规模武斗，就更可以看到“地质东方红”这次整风的意义。

我给自己划的“红线”

当时，在“怀疑一切”中，有一种倾向：你怀疑中央上层的某一个人是“黑帮”，你对之贴了大字报，你要打倒他。如果这个人（如陶铸）被打倒了，你可能成为“英雄”。而如果这个人（如康生）没有倒，或不能打倒，你就可能成为“反革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蒯大富。

我的看法是，我们20多岁的学生，对中央上层的人是不了解的。因为单凭年龄说，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没有他们的经历；“道听途说”得来的“资料”是不可靠的。因此，我给自己划出“红线”：我不反对中央上层的任何人——我不想当英雄，更不想当反革命。

从1967年起，有多少人想将“反对总理”、“反对江青”之类的罪名加于我的头上；1978年，青海地质局的党委副书记石占泉想将“整周总理黑材料”、“绑架周总理”的罪名加于我的头上，甚至将我送进监狱，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权欲极强、出尽风头、罪行累累的蒯大富，最后获刑17年。单从以他为首的“清华井冈山”打死学生、工人多人这件事上说，就失去了做人的良知，就应归入坏人之列。从道义和法律上讲，就应该抵命！

中央对“地质东方红”新核心的认定

当“地质东方红”开展开门整风的时候，我正在三司进行着紧张的工作，正联合其它两个红卫兵司令部，筹建红代会。不过这时候，我是吃住在校内的，《首都红卫兵》编辑部先是设在主楼（教五楼），后是设在学12楼，我对校内的整风情况大体知道一些。

我名义上虽为“地质东方红”核心组成员，但是，没有在核心组工作过一天。

1967年2月，在老干部李贵的主持下，从个人品质、素质、能力上全面考察，觉得王大宾比较理想。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酝酿，大约于2月中旬，意见逐渐趋于一致：推选王大宾出任总部第一把手。

随即，中央文革小组也将王大宾任命为即将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此前，江青派她的秘书阎长贵同志到地质学院，确切些说，是到北医三院，让正在那里养病的王大宾出来主持工作。他对王大宾说：朱成昭不行了，但是，“地质东方红”这支队伍好，不能垮！

3月5日凌晨，谢富治、戚本禹在接见红代会工作人员（指定我继续担任红代会宣传组长）时，戚要我通知地质学院各方代表到政协礼堂开会，解决“地质东方红”领导班子的问题。

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总部办公室，要他们通知各方代表乘车前来。我在电话中，特别说明，一定要将蔡新平等通知到。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中央领导的具体安排，但是，让最大多数人，特别是使不同意见、不同派别的人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必然会有利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利于地质学院师生的团结。

不到一个小时，近百名地院师生代表就到了。后来听说，办公室是用广播喇叭通知的，大家听到广播后，很快就到车库上了车。

据《动态报》报导，在接见地院同学时：

……戚本禹同志问大家“你们‘地质东方红’的大旗倒了没有？”（同学答：没有！有的答，要垮了）杨雨中给你们传达过没有，江青同志说过，‘地质东方红’的红旗不能倒……江青同志说红旗不能倒，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嘛，在北京和全国是有影响的，你们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戚本禹还说，二进地质部的成绩是巨大的嘛。我建议你们，何长工没打倒，从前的事情，即使有缺点错误也不要讨论，这样有好处，二进、三进地质部是对的，在整风中应当多讨论当前的……阎长贵同志讲话还是好的，我希望你们是团结而不是分裂，在这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战的关头，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错误，搞大分裂犯罪。……

现在，有的人对敌人可以温情主义，敌我不分，而对曾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千方百计想把他搞臭，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

学校的运动怎么搞？

首先让整风继续下去，把整风搞好。我不赞成用很长时间来整风，你们用了这样长时间来整风还没有整好，这和整风的方法有关。在整风的方法上你们不合乎毛泽东思想，是用“宗派主义整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整小团体主义。以‘私’字整‘私’字”。我建议在整风中要学习文件，学习主席著作，学习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篇文章。……

整风中，首先应该严格检查自己的错误，整风期间首先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是今天我所不满意的……

你们要搞三结合，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全院性的领导机构，然后再搞院内的斗批改。……

你们学生不能老是放假闹革命，恐怕过三个月还要复课闹革命。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打倒，无产阶级的东西要建立。

戚说的“现在，有的人对敌人可以温情主义，敌我不分，而对曾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千方百计想把他搞臭，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所指很明显，就是蔡新平等。

这个接见会也决定了朱成昭的命运。戚本禹宣布的“中央旨意”或“判决”是：朱成昭“刚愎自用”，故应“闭门思过”。

还说，王大来应回官道公社去，不要再在大学里呆下去了。这次会开了不久，王大来就离开了地院。

在这次接见中，朱成昭没有参加，我没有看到朱成昭。

从前文可知，自1967年1月至3月，“地质东方红”处于整风中，它的领导班子处于调整中。以朱成昭的思想，他也原本无心插手校外的派性斗争。因此，“地质东方红”对校外的事，看似介入，实为应付。

第18章 革命委员会成立

“地质东方红”反击“二月逆流”

反击“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是毛泽东司令部的“命名”和定义。走资派还乡后，则称之为“二月抗争”。

“二月逆流”是“一月风暴”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对文革的一次大规模反弹；是从中央到地方，“带枪”的人，即坐天下的人，对毛泽东和其追随者的一次血惺大示威。在全国，军队向群众开枪的地方有多处。单是青海的“2.23事件”，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170多人，真是血流成河！

按照21世纪的世界标准，这算不算是一次“恐怖袭击”？

持枪的执政者就是这样对待他们治下的老百姓的。

这时，毛泽东还不以为然，将血惺的示威视为“逆流”，对“二月逆流”进行了反击。

最后，他召开了“政治生活会”，“端正了”批判（少奇）的方向。“政治生活会”的结果有三：一是，在党报党刊上，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二是，《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6、7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的发表。对此，谁都明白，对直接受控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的清华工作组的公开批判，无异于在剥刘少奇脸上的皮！

三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

“炮轰余秋里”的背景

余秋里是二月逆流的干将之一，余秋里是“地质东方红”的老对手。早在“地质东方红”进军地质部的时候，他就暗中支使“西纠”去保何长工。从感情出发，我们是要“坚决打倒”余秋里的。

毛泽东没有胆量将斗争矛头直指实际操控军权的人。“打倒”或“炮轰”余秋里，在于对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警告。

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就只能“炮轰”了。据第46期《动态报》（3.18.）报导：

“地质东方红”总部就余秋里问题发表声明：

余秋里是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是地质部镇压地院东方红革命师生的真正幕后策划者。在这场夺权斗争中，又进一步拉一派打一派，两面三刀，转移斗争矛头，打击革命派；把群众作陪衬，搞假“三结合”，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先锋人物。总部决定：

- 1、炮轰余秋里，余秋里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 2、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要是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
- 3、支持我公社战士对李先念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 4、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东方红战士必须注意各阶级的动向，提高阶级警惕性，谨防阶级敌人扰乱阵线，混水摸鱼，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其实，当时“炮轰”的，还有陈毅等多人。

地院“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各分会革委会首先成立

在新的“地质东方红”总部人选确定之后，有人提议，我们何不一步到位，在成立东方红总部的同时，成立革委会？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最先成立的是各系分会。

据《动态报》（3.27.）报导：3月2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探工分会正式成立。它是该院第一个系级的三结合成立的有代表性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总部李贵、王大宾、田春林等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

会后，公布了探工分会的第一号公告，自即日起，探工分会将行使探工系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红普联、红勘联、红水联、红物联、红干联、赤卫队联队代表到会祝贺。这是我院的大喜事。

据 1967 年 3 月 29 日出版的《东方红报》，报导：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探工、勘探、物探分会分别于三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相继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表明一个按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办事的临时权力机构在我院诞生了。标志着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将要全面在我院掌权。……

在这些临时权力机构中，东方红的革命小将占有主要的地位。他们在和我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时候，表现了勇敢、善战、艰苦奋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探工系的总支书记李一民同志、二系总支副书记李佩兰同志、物探系总支书记侯力平同志被选为革命的领导干部的代表，在过去“东方红”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岁月里，他们始终是和东方红的革命小将站在一起，始终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受到了广大东方红战士和其它革命师生的拥护。……

新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庄严宣告，立即行使各系党，政、财，文大权。

我成了“革命委员会”常委

我是在地质学院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正式介入校内事务的。

我于1967年3月下旬，离开红代会回到了地质学院。我回到学校之后，很少在公共场所露面。我仍然住在学12楼四层的一个房间中。当时，班上同学打扑克“攻猪”盛行，他们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除过大解小解外不离开桌边，吃饭是别人从食堂帮助打来，边吃边“工作”。他们记录战绩的八开纸在地上堆了厚厚一摞，上面的数字密密麻麻。

两三天后的一天上午，我并不熟识（人家却熟识我）的一位外系学生到宿舍里来找我，说李贵请我去。

我问有什么事，回答说：

“老李贵让我来请你。听说你不想在红代会干了，他想和你商量一下咱们学校成立革委会的事。”
我一听，立即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了。请你转告老李贵，谢谢他了。”

下午，李贵亲自到宿舍里来找我。这是我们长期神交后，第一次工作上的交往。在重建“地质东方红”总部和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中，老干部李贵发挥了核心和关键作用。他很有自知之明，不像聂元梓，年近半百了还要穿上一身紧纠纠的绿军装，和中学生浑在一起，争年轻人的风头。

“听说你不在红代会干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说来话长，等以后再慢慢说。”实在不愿意谈起那些烦心的事。

他邀请我到他家去长谈。

我只好跟他走。这是我第一次到李贵的家，眷属区西边一座普通的红砖楼，二楼的一套两居室，建筑面积估计也就70多平方米。那件“6·20事件”时的“旗帜”补钉床单，仍然铺在床上。

我简单地向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他当时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谈了谈红代会的情况后，他说：

“那就回来，在学校干。学校情况你也知道，正在重新组建领导班子。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你进革委会领导班子，协助王大宾把学校工作干好！”

我说：“我实在有些厌倦了，不想再干了。”

李贵的脸色立即严肃起来：

“我这个老头子还要继续革命哩，你年轻人就不干了？不行！咱们‘东方红’这面大旗不能倒！
你还要干，你必须干！”

我不得不从。

紧接着，我又和李贵一起去北医三院看望还在那里住院的王大宾，并和他商量了一些组织安排上的事宜。

“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来由

各系的新政权名称按毛泽东的规范，叫“××系革命委员会”。可经过大家酝酿，全院的新政权却被一致命名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这时候的地质学院，几乎人人都是“东方红”战士。在“革命委员会”前加上“东方红公社”，没有人表示反对。在大家看来，这也不违反毛泽东的旨意，因为这名称的主语还是“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决策下，“东方红”总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当时议定，革委会常委会就是“东方红”总部，其成员就是总部核心组的成员。但是，这只是名义上的了。为了应付社会上的事件，大家都同意还要保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名称，由常委田春林分管此项工作。

隆重的成立大会

1967年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东方红报》对此作了报导。题目是《热烈欢呼我院东方红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于四月三日宣告成立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地院的又一新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又一新的胜利。

今天，地质学院一派欢腾的节日景象，大马路上红旗招展，灯笼高挂，宽广的操场上成了沸腾的海洋，全体东方红战士和来自首都及祖国各地一百多个单位的一万多名战士济济一堂，大家畅谈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市委周景芳同志和丁国钰同志到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周景芳同志在讲话中说：“我是受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委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的，中央文革非常关心你们，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完全拥护，坚决支持。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把东方红的大旗越举越高，越举越红，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东方红革命委员会庄严宣布，自即日起，东方红革命委员会将行使地院党、政、财、文一切大权。

王大宾同志代表东方红公社革委会作了工作报告……

最后，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1967.4.4.《东方红报》）

地质学院作为北京文革的中心，革委会成立也是最早的。它所使用的名称，也就不大规范。

不久后，先期夺了权的各省市纷纷更名。4月20日成立的北京市新政权就直接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顺应全国的大潮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也更名为“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

“地院革委会”领导机构及其组成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委员有三十多人，这些人的名字我已罗列不出来了。总之，都是在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中有贡献、有影响，受到大家尊重和拥护的学生、老师、干部和工人。除革委会常委都是委员外，各系、各方面（红教联、红干联、地质附中）的革委会主任和负责人都是委员。

这些委员在工作队“反干扰”中和“四进地质部”的斗争中，都有一番出生入死、轰轰烈烈的业绩，都是人中之龙。同他们比较起来，我自己就“相形见拙”得多了。

蔡新平、周永璋以及后来成为“蔡派”骨干的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是有贡献、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他们在“二月整风”中，充分展现了“文过饰非”、权欲过重的那一面。因此，在酝酿革委会组成人选时，全院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些人。

显然，是“蔡派”自己打败了自己。

我们这些进入革委会的委员、常委虽然没有进行“公民投票”，但是，几乎全部经过了民主推选和全院师生的讨论，最大限度地征求过全院师生的意见。也就是说，新政权建立的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如果让全院师生对每一个委员进行投票公决，我不敢说每人都有很高的得票率，但是，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应该是肯定的。

从朱成昭到王大宾，在地质学院实行的这种民主体制表明，它有一个不受领导班子制约的灵活的广泛的群众监督机制，如果这机制最终能凝聚成一个独立于领导班子之外的实权机构，可随时对领导成员，特别是对第一、二把手进行监督和批评，必要时，通过全院师生投票公决，启动罢免程序，地质学院就可能会成为中国民主体制的先驱。

但是，这种机制不符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专制体制。因此，它没有“普遍意义”。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委会的第一任期成员如下：

第一任期（1967年4月3日—6月底）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常委：聂树人、黄振群、孟繁华、杨雨中、朱德瑜、贾振远、张海涛、田春林

革委会的分工是，聂、黄、孟负责政治部，杨、贾、张负责作战部和教育革命工作，朱德瑜负责后勤部，田春林负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

政治部宣传组组长：黄振群

政治部组织组组长：柴文全

作战部动态组组长：董小英

第二任期（1967年7月——9月）

（实际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的调整）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常委：聂树人、贾振远、黄振群、杨雨中、张海涛、田春林、高元贵、王焕

孟繁华因调《红旗》杂志社工作、朱德瑜因为毕业分配，不再担任常委。前领导干部高元贵、王焕，被补入常委班子。

第三任期（1967年9月——1968年底）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聂树人

常委：贾振远、侯力平、李一民、刘佛兴、任云堂、刘家齐

说明：黄振群、杨雨中、张海涛、田春林不再担任常委。高元贵在1967年“9·4事件”后，作为颠覆革委会的幕后策划人，被停止了参加革委会常委会的资格。王焕因为不与革委会合作，也停止了工作。

《东方红报》编辑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不固定。先后在《东方红报》工作的人员有黄平稳、谭海谯、王若柏、李中学、董启贤、阙延强、黄占秋（负责排版）等多人。

广播台工作人员相对较为固定，以“高旗无畏”战斗队为主，如刘万恩、黄瑞华、李铁成、钱萍、郁秀荣、卢光瑞、李智民等等。其负责人多有变动。革委会成立后，其负责人先后有黄瑞华、袁长清等。

革委会秘书：徐忠祥、陆一龙（这两个人一直是革委会会议记录者，直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院）。

对革委会的纪录，作为档案材料，我们革委会成员从来是不看的，也不过问。在后来“清查5.16”中，军宣队完全掌握这纪录。可是，他们却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革委会的一切活动都是“5.16活动”，制造了地质学院历史上空前的大冤案。后来，冤案不了了之。编写校史，又惧于文革“被全盘否定”，只能一笔略过，使这段历史成为“空白”。

五个系的革委会主任如下：

地质系主任：刘佛兴

勘探系主任：陈玉新

物探系主任：陈连成

水文系主任：任云堂

探工系主任：吴坤正



张万钧同学在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大牌前的留影

（照片由宫宝军提供，摄于1968年）

第 19 章 让干部“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是如何解放干部的？

1967 年 6 月 16 日出版的《东方红报》，对地质学院的干部政策进行了总结：

从去年（1966 年）六月二十日开始，革命群众就坚决支持李贵等革命干部起来造反，热情欢迎和帮助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到群众中来，和群众一起闹革命……

自去年十月我们夺权之后……立即解散了原《斗批改》兵团搞的“干部劳改队”，并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重要社论，同时适当参加劳动……

（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我们召开干部会，学习《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会上我公社总部正式宣布：停止干部的集中学习，号召干部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和群众一起闹革命……

在开始批判在于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多数干部只是到学生班中利用座谈的方式“亮相”，开会就来，散会就走，干部与群众之间不但在思想上有所隔阂，而且在生活上也脱离得很远。后来，在四月初，东方红公社“八·八”战斗队首先提出要与原院长高元贵同生活、同学习、同革命，在“三同”的过程中考查干部，帮助干部，解放干部。这一革命的行动立即得到广大东方红战士的热烈支持，院革命委员会也立即肯定了这种革命行动，号召广大干部到群众中去，和同学实行“三同”。广大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后，原来依靠少数人关起门来整材料，搞专案的工作就由广大革命群众通过与干部的接触和了解完成了。一般情况下，同学们都把干部做为本战斗队的一个成员，和他一起学习和战斗。他们通过和干部谈心，了解干部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了解干部的活思想，严肃、热情地帮助干部。实现了“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

在几次“原党委扩大会议上”广大干部都争先恐后起来用大量铁的事实，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罪行，使那一小撮反动家伙原形毕露……

王焕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工作队来院后，吸收王焕任副队长：工作队走后，王焕又在幕后支持我院原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由于这些原因，王焕自己则认为，“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打击了革命派，又使保守派受了蒙蔽，两派都恨我”，“同学们一定不会轻饶我，他们一定会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待干部那样，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对待我”。因此，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三月，整整五个月时间里，王焕一直十分害怕群众，不肯也不敢到群众里面去，等着挨斗。应当怎样对待王焕呢？……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王焕调来不久，以前在部队上还是一个较好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是在去年十月份以前，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十月份之后，承认了错误，没有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某些问题上还支持了革命派。因此我们认为，王焕同我们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毫不动摇地对他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处理……

干部到群众里面去后，在思想上、感情上、精神面貌上都起了显着的变化，初见硕果，这主要表现在：

- ①干部的政治觉悟大提高，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②干部的积极性大提高，主动参加工作，投入革命的大批判
- ③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

▲4月 11 日上午、下午，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有许多干部勇敢地站出来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刺刀见红的斗争，他们列出大量事实，驳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体无完肤，丑态百出。决定明天晚上将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议，对常委深入全面地揭盖子。

（《动态报》第 62 期，作者注：此处的“党委”、“常委”，均指工作队进院以前的党组织）

▲4月 28 日，《东方红报》报导：

二十五日，我院继续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围绕工作队在我院贯彻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揭发批判，并把三反分子何长工和镇压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邹家尤揪来示众。

后来，我们将高元贵、王焕结合进革委会常委会，让高负责教学改革工作，让王焕负责政治工作。

正是因为我们执行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地质学院才建立起了革命新秩序，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在风云变幻之中，引领革命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解放干部”是大局稳定之本

在“东方红总部”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地质学院，成为北京文革中最稳定、运动开展最深入的一个单位。

这一局面的形成，得益于师生思想的解放和自由辩论的结果。正如《东方红报》1967 年 5 月 16 日发表《历史不容颠倒》的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着刘少奇等人的屁股，他们感到日暮途穷，人命危浅的时候，急急忙忙地派出工作队，提出什么“领导全烂了，统统靠边站”，“猛攻十七级防线”等反动口号，蒙蔽一部分群众，把矛头指向了广大革命干部，丧心病狂地打击一大片，千方百计地保护一小撮，他们自己幻想从中趁机蒙混过关。因此，刘少奇之流才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魁祸首，他们十恶不赦，罪不容诛。

同日出版的《东方红报》社论《必须正确理解“解放一大片”》，对一些错误看法予以澄清：

实践证明，在干部问题上认识的不统一和对“解放”干部的错误理解，有可能导致左派队伍内部不同观点的对立，甚至造成组织的分裂，影响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一切革命同志，必须对此给予足够重视……

所谓政治上的解放，在当前说来，就是对那些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一律不做为打击对象去“整材料”、去斗争、去实行专政。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对待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使这些干部解除思想上的顾虑，使他们从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改变过去那种靠边站的状态，给他们以参加运动的权利和机会，与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以“四大”为武器，积极参加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积极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

通过辩论，师生认识到，文革，主要目的是“整治”干部。但是，整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能乱整；不能想整谁就整谁。最终目的，是让广大当权者接受一次深刻的教育，特别是反腐教育。“革命干部坐天下”，才是毛泽东开国的目的，才是毛泽东开展文革的目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通过文革，是要换代（换掉刘少奇），而不是改朝。

在十六条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文化大革命要“在党的领导下！”

因此，只有尊重干部，才能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局势才能稳定。工作队的失策，就在于它对干部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政策。在地质学院，它打击高元贵，实际打击的是，跟着高元贵走的一大批教员、干部。保聂克、周守成，保护的，只是少数人。

正是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干部政策，没有实大批大斗的极左政策，才使地质学院的群众没有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那样，分裂为两派，并长期争斗。

对“叛徒”的坚决批判

那时，我对叛徒的认识如下：

1、叛徒，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对革命造成极大损害，可恶至极。

对告密，我有天然的反感。也许是我自己经常“被告密”吧！向强权告密，告密者本就是小人。因此，我一直看不起这种小人。

2、以薄一波为首的“61人叛徒集团”，是签写了“自首书”后出狱的。当时，就有不愿签写“自首书”的人，如刘格平，他就没有出狱。二者相比，签写了“自首书”的人，人格不是很低下吗？

3、“61人叛徒集团”是经过共产党中央批准“自首”的？据说，具体的批准者是刘少奇。我的看法是，即使当时“中央批准”，也难以改变他们自首叛变的性质。

4、“61人叛徒集团”中的多数人是紧跟刘少奇走，并被委以重任的；“反干扰”中，这些当政者大都是整群众的。

据《动态报》第78期（4月28日）报导：

▲（4月）26日晚，地质分会斗争大叛徒周守成（原党委副书记），周曰：我对敌人是：

1、我不知道的没有说；

2、我估计敌人不知道的就没有说；

3、我给敌人当兵（叛变投敌），是为了逃跑出来（周守成的叛徒嘴脸原形毕露）。

要害在于，周守成“给敌人当兵”。

第20章 被迫的“揪刘火线”

建工学院是刘少奇的“试点”

“揪刘火线”指的是从1967年7月13日起至8月5日止，在中南海西门的府右街，数以万计的北京学生（以大学生为主，包括所有大学和部分中等学校）安营扎寨，誓将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进行批斗的25天行动。

文革初期，建工学院是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试点单位之一。1966年7月份，刘少奇派到建工学院的工作组大抓“游鱼”，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是年7月31日，迫于毛泽东司令部的压力，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不得不对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师生进行平反，并承认这六名师生是“左派”。

但是，这一宣布立即引起了受工作组扶持培养的保守派的强烈不满。此时，这些人刚接了工作组的班，正执掌着建工学院的大权。作为对立面，“游鱼”成了“左派”，岂不是意味着自己错了，自己是右派？这是万万不行的！在工作组的幕后操纵下，一百多名师生大闹新市委。

为了“自己解放自己”，为了与有组织的保守派进行斗争，8月1日，建工学院200多名革命造反派，以军干子、女贾健、张玉晋为首，串连成立了“八一战斗团”。8月2日上午，“多数派”1100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成立了“革命团”，使建工学院成为北京市高校中

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的学校。当时正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为了获得“经验”，对抗毛主席，让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供他“蹲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

于是，建工学院就成为刘少奇的首选。

据《大事记》记载：

(1966年)8月2日，8月3日连续两天，刘少奇带领刘澜涛等驾临建院。8月4日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一直蹲到8月12日，前后作了四五次讲话，“大肆放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在几次讲话中“恶毒地影射毛主席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大讲什么：“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学生揪住你们兴许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们态度不好，他们兴头就越来越高……现在问题是如何脱身，错误要讲的。”但是，他马上又说：“不得往上推。”……他还说：校党委、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统统罢掉”……

刘少奇在建院继续推销他“反干扰”的“引蛇出洞”论，说什么“蛇出洞就好打，刚出了一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这就暴露了他们。”

读者是否好好体会一下刘少奇的这个讲话？

事实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之中，工作队和“不走的工作队”对不同意见师生的镇压有恃无恐，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地质东方红”的揪刘活动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天派)联合工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8月初，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1500多个单位参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安有500多个高音喇叭，树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

“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

那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刘少奇的命运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我们“地质东方红”去不去中南海，无关紧要。总部的这一想法与广大东方红战士一致。因此，淡薄名利的我们，迟迟没有行动。要说有行动，那也不过是应付局面，开个批判会什么的。据《东方红报》：

七月十九日上午，我院召开了“坚决响应中央文革和市革委会号召，动员起来，掀起大批判高潮誓师大会”。大会是在地质分会的倡议下，由地质分会、探工分会、勘探分会、物探分会、水文分会、后勤分会、东方红广播台等七个单位联合发起并召开的。

大会得到了院革委会的坚决支持，院革委会李贵、王大宾、聂树人同志都做了发言，表示坚决支持东方红战士的这一革命行动。

7月29日下午，李思田老师和几个同学冲到正在开会的常委会上责问：外校在中南海西门揪刘少奇，搞得热火朝天，地质学院却按兵不动，不派人参加，你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何态度？

于是，常委会的会议内容就改为研究是否向中南海西门派人的问题了。

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既然群众强烈要求，那就派点人参加。我的看法是，北京其他高校都派人参加了，我们现在去是“最后的到来者”。如果“揪刘”有什么错的话，挨第一鞭的不会是我们。

故，会议当即就部署下去，由地质系负责往中南海揪刘火线派人。地质系派出以韩文彬为负责人的队伍，吃过晚饭就出发。我和杨雨中等几个常委晚上随韩文彬等去了中南海西门。当时，我们派去了十几个人，还带去了帐篷。

我们的到来，在“揪刘火线”算是一件大事，各学校都表示欢迎。当时，中南海西门外的府右街已经没有了空地，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就将他们所占地盘给我们让出了一块。因此，我们虽然来得最晚，却在最显要的地方“安营扎寨”。

刘少奇举起了《宪法》

8月4日晚，中央通知我们到中南海开会。我们到了后，进的是府佑街南侧门，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各高校的头头。会议由戚本禹、谢富治主持，商量“揪刘火线”撤销事宜。会上，戚本禹说：“揪刘火线”经过大家的艰苦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中央决定，明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

万人大会，公开批判刘少奇。在中南海，刘少奇由中南海内部的革命群众主持批判，并收听大会实况。大会开过之后，“揪刘火线”就撤销。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我们说：好，没有意见！

接见结束后，我们即将会议内容向韩文彬等进行了传达。

第二天，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50万人参加的大会，我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的都是老面孔，除周恩来外，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见到关锋、戚本禹时，我特地问他们，社会上盛传的“第三次大串联”²⁸，中央是什么态度？

此前，我已经知道中央对此是不支持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又旧话重提。

“中央不支持第三次大串联。”关锋回答，“出去的，要叫他们回来；没有出去的，不要再走了。”大会开过之后，揪刘火线立即撤销。

这充分说明，“揪刘火线”的形成和运作，完全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控制和指挥下。

后来听说，中南海内的批斗会开过以后，刘少奇举起了《宪法》！这显得很滑稽。首先，十几年来，刘少奇以至其他中央领导人，谁曾将《宪法》当一回事？除过《宪法》，他们还主持、制定过其他保护人权的法律吗？到了自己挨整的时候，才想起了《宪法》，才举起了宪法！刘少奇是否想过，在共产党人看来，《宪法》从制定之日起，就是一堆废纸。挨斗之后，拿起“废纸”，又能吓唬了谁？又怎能保护自己？

自力更生，建造毛主席塑像

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由地院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毛主席塑像修建指挥部成立了。许多东方红战士和革命同志自告奋勇地参加修建工程。

五月的一个深夜里，一声炮响炸掉了按照刘少奇给我院规划的“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的形象。

“毛主席塑像建造指挥部”的同志在群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一个最好的设计方案很快确定下来。一座底高四米，像高八点五米的目前北京市最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即将矗立在地院。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大学把北京市一些专门搞雕塑的人材，垄断起来，成立一个什么“指挥部”，谁家要塑毛主席像还得去登记，由他来“分配”人力物力。我院也较早登记了，但是由于种种缘故而未予“分配”。怎么办呢？不干吗？不能！

美工队的同学负担起雕塑的任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参观外单位的毛主席塑像，吸取经验；一次一次设计着造型，选出最好的形象。

木工组、瓦工组的工人同志们到雕塑工厂去学习做泥像的骨架，到建筑公司去学习搭架子，到正在修建毛主席像的单位去学绑钢筋，结果做出来的并不比专业单位搞的差。

翻模组的同志本着尊重科学实验的态度，一次一次地试验寻求模子的水泥和石膏的最好配方，他们做了几百次的试验，得出的配方比过去专业单位根据经验的配方要好，于是他们就采用了模子最少分段的数目，以保证像身的平滑和最少的接缝。

塑像指挥部把一切可以贡献力量的同志都请来了。测量的老师放样，磨片室的同志磨大理石板、探工系实验室的同志安装吊装机械。

美工组的同志在泥像塑完后，立刻投入浮雕的设计，但是浮雕由于人物多，又要有关主题，比起塑像来就有更多困难了。有时候他们想算了吧，别人也没有浮雕，不也一样吗？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鼓舞着他们，他们想的是：“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造出毛主席像的，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历程反映到塑像的基座上，一定要把‘东方红’光荣的斗争史反映到塑像的基座上。”塑像基座的三面浮雕描绘出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三个历程。浮雕不是一个艺术的装饰品，它是我们东方红战士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热爱的象征，它也是我们东方红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的记录。……

我们自己动手建造的毛主席像成功了！……

²⁸第二次大串联发生在1967年4~5月。只是部分学生。

自己动手，精打细算，在节约上出现了显着的成绩。我们的塑像基座带有浮雕、造型复杂，但是我们所花的全部费用只有别的单位费用的三分之一。我们一共才九千元左右，别人花了三万元，最初建像的单位甚至花费了四五万。



塑像落成后，我与地质系革委会领导同志的留影

前排左起：聂树人（地质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刘文德（地质系革委会副主任）

黄占起（地质系革委会办公室主任）

后排左起：刘佛兴（地质学院革委会常委，地质系革委会主任）

宫宝军（地质系革委会副主任）

（照片由宫宝军提供）

这座毛主席塑像至今还屹立于地质学院，即今日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里。只是塑像基座上的浮雕被用水泥覆盖了起来。

第 21 章 复课闹革命

地院最早提出复课闹革命

最早提出“复课闹革命”这一口号的是我们地质学院。

平民院校的学生鄙视、痛恨那些争权夺利的人和事，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使命，大乱之后就要大治，为着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就应该去学习、去工作、去劳动、去创造财富。

近几十年来，研究文革的作者多不关注教育革命。在他们眼里，教育革命并没有成为文革的主流，成为“文革主流”的是清华、北大等院校的派斗和武斗；搞文革的群众领袖似乎只是聂元梓、蒯大富，以至韩爱晶这些“痞子”。

但是，教育革命毕竟是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地质学院在这方面起步更早，走得更远、更深入。

早在 1967 年 4 月 11 日《东方红报》即刊登《老师必须围着学生转》，讲的就是“复课闹革命”。这时，已经有一部分学生、老师在进行和探索如何复课闹革命了。

6 月 6 日，《东方红报》发表了《复课闹革命的一面红旗——介绍东铁匠营一中东方红公社复课闹革命的经验》。

6 月 22 日出版的《东方红报》刊登报导《我院以“只争朝夕”精神做复课闹革命的准备》。

（本报讯）我院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最新的精神，根据文化革命运动发展新形势的要求，正在积极进行“复课闹革命”的准备工作。……

为了“复课闹革命”，深入地开展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复课闹革命”的机构。革命委员会召集了各系、各教研室有关的教学人员，提出问题，共同研究；革命委员会还准备召集同学代表听取意见，发动同学密切关心这一工作的进行。

在准备全院“复课闹革命”的同时，已有一些系的革命师生走在前面，开始教育革命的试点工作。煤田专业一年级组成了长征式教学队，已经出发。他们在北京西山将通过徒步长征，观察主要地质现象，学习地质工作方法，穿过几个矿区学习地质勘探，同时他们又走向社会，走向群众，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将沿途住在农村、工矿，向工人和贫下中农学习，经过驻军，向解放军学习，他们将做到既是一个教学试验队，一个向社会学习的调查队，又是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它得到了革命委员会大力支持。

我院探工系也正准备有一个班到勘探队去进行边生产边教学的试验工作……勘探系石油专业的革命师生也正在大力准备教学试验工作，他们正在研究到石油勘探区进行教育革命的试点。一个“复课闹革命”的高潮不久即将到来。

但是，地质学院的“复课闹革命”活动，并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和媒体记者的视野。7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导了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的消息。报导说：

“北航红旗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决心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奋斗最高纲领，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边学习，边搞斗批改。为北京和全国学校树立了一面复课闹革命的旗帜。”

地质学院复课后，师生们教与学的积极性很高。大家在教学改革上动了许多脑筋，下了许多功夫，要将文革中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教员认真备课讲课，学生认真听讲，认真做好作业。

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学习理论，老师还带领学生外出周口店等教学基地进行野外现场教学，从实践中求得真知。

我虽然有学校公务，但是，也尽可能按时参加班上的上课活动。记得，一次参加地质力学课堂教学时，老师还在课堂上对我进行发问，问我的问题是合力的分解。为了形象地回答好老师的问题，我还走到黑板前，具体画出力的作用方向。



王大宾等接见外国友人到地质学院参观

(左1为朱竹平，左5为王大宾，左9为聂树人，左10为高元贵)

探工系一马当先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在全面复课闹革命中，探工系一马当先，各系跟进。据《东方红报》：

探工系革命教师自今年五月份全部下班以来，一直和同学共同学习，共同战斗，师生之间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当时教师在下班的时候就考虑到为了适应今后的教学和教改，各年级配备了复课后所需的课程的教师。因此，这次当得知复课闹革命的消息之后，学生和教师立即共同研究了复课的问题，教师与学生成长时期的共同学习、共同战斗为立即复课奠定了有利的条件。

探工系提出的初步方案是：

安排：

- 一、每天上午二小时的“天天读”，学习毛主席著作；
- 二、每天上午二小时业务教学，业务课周学时暂定十二小时，
- 三、下午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学工、学农、学军，当前主要是开展“斗私，批修”的学习班学习，以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主。

措施：

- 一、以年级为单位的建立教师教学组，分片包干年级的教学工作，教师和同学共同参加活动；
- 二、严格组织纪律，实行考勤制度；
- 三、各年级师生自己讨论怎样复课，活动按院革命委员会统一安排；

暂定业务课项目：

一年级：制图，一门技术基础课未定

二年级：力学，电工

三年级：钻探，热工
四年级：钻探，热工

专业设置与学制的争论和设想

探工系有存在的必要吗？

在专业设置上，学生们放开思想，提出了各种看法和设想。这些争论和设想看似幼稚，往深里想，也可能有一定道理。

有学生认为，地质学院不应该设立探工系。有人提出两种改良的方案，一种是所谓向纯工艺方面发展，另一种是所谓向机械方面发展。这两种方案行得通吗？

有人主张，以工艺为主，应放到中专去；以机械为主，应合并到其它院校中去。总之，探工系必须从地质学院废除！

那末，勘探系又是那家的“宠儿”？要不要来一次天翻地覆的改革？还有人提出：

石油和煤田能不能欢送出地质学院？

地质系和勘探系能不能“大联合”？

稀缺和特非有没有必要“特殊化”？

教育革命要立足于科学的调查研究之上。有人呼吁革命师生，迈开你的双腿，去地质部、石油部、煤炭部、冶金部，到矿山设计院、到北京附近的勘探队……深入调查研究，对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大胆地进行革命和创造。（10月31日的《东方红报》）

还有人提出“长学制”改革的几种方案

一、四年义务教育制

二、中学五年一贯制

三、大学两年普训制

（11月7日至21日出版的《东方红报》）

“东方红地质公社”初步设想（草稿）

一、“东方红地质公社”的性质：

“东方红地质公社”将是一个以地质勘探为主的，由工（与地质勘探有关的工种）、农（附属农场和建立密切联系的农村人民公社）、商（公社所需要的交换部门）、学（包括教学、科研）、兵（主要是民兵和少数解放军）共同组成的新型的社会基本单位。它既不同于现存的学校和地质队，又不同于简单的队办校和校办队，它担负着国家的生产、教学、科研任务，实行生产、教学、科研三位一体。这个公社要促使知识分子革命化和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使公社的全体成员逐步成为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劳动者，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公社的每个成员都要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批示”以从事某项工作为主，兼学别样，其中学生以学为主，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二、体制和机构：

公社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负责制。并设政治部，公社按工种和专业实行军事编制，设生产学习班、排、连、营。基本单位是生产学习班，由工人、学生、教师、技术人员组成。其中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工为主、兼学别样，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并担负教学任务，要培养学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公社中生产、教学及科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公社整体是一个社会生产单位，生产必须保持社会性，以不失其作为三大革命实践场所的特性。既要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又要满足教学要求。学生在三大革命中完成学习任务；以现场为课堂，以活教材为主要教材。科研要面向生产，着重研究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即科研题目从生产中来，科研成果要为生产报务），并担负一定的教学任务和国家的科研任务。教学、科研中要特别突出工人的作用。

三、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东方红地质公社”要大学解放军，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要建立各项制度和有效措施，保证落实四个第一，把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放在先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强调在实际斗争中活学活用，锻炼成长，把公社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四、学制：

根据学生来源不同，分为二种，1、中学毕业生和从生产岗位上选拔出来的青年工人，据所学专业不同，以2~3年为宜，各年级学习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第一年以学军和专业生产劳动为主，后二年逐步加强专业教学。2、短期学习班，为工人、干部学习技术服务，并负责技术人员的提高。学习时间、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五、师资：

由有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技术人员及现有的部分教师担任，以后逐步过渡到教师（科研人员）、生产人员轮换制。师资要求突出政治，一专多能，与学生实行三同。

六、专业设置：

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基地的地质生产条件而定（在调查中）。

七、“东方红地质公社”实现步骤：

“东方红地质公社”分试行阶段和推广阶段：

试行阶段由我院划出部分师生（设备），一个或几个野外队及地质科研人员（设备）进行试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和推广，把它推向高级阶段。

第22章 全国造反派的最后一聚

文革失败的前奏

1967年8月17日，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一周年的日子；第二天，是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的日子。首都及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千三百多个单位，五万余人欢聚地院，热烈庆祝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和东方红公社成立一周年的祝活动。

在第二次大串联中，“地质东方红”在全国热点地区支持造反派，赢得了各地造反派的一致称赞。北京地质学院正高举文革的大旗，阔步前进。“地质东方红”成立一周年，成为三司所属院校、成为北京以至全国造反派的盛大节日。大家欢聚在一起，是庆祝，也是欢呼！

据《东方红报》报导，

连日来，地质学院校园里，红旗招展，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广大东方红战士纷纷刷标语，贴大字报，开座谈会，庆祝我东方红公社成立一周年。红色尖兵，长江怒涛，海燕，太阳升一支队，新愚公等战斗队贴出了大字报，刷出了大标语，恭整抄录出毛主席的文章……在这些战斗的篇章里，他们回顾了一年来我东方红战士在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也总结了我们的经验教训。一年来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我全体东方红战士，猛轰资产阶级司令部，捣毁了何家店，打退了各方面袭来的机会主义思想，不断清洗着东方红的叛徒，逐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无限欢欣。瞻望未来，坚定不移，永远前进。

昨天晚上，地院人群如海洋，来自首都及全国各地一千三百多个单位的五万余名革命战友们欢聚一堂，隆重庆祝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和我东方红公社成立一周年。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战友们满载着胜利的喜悦和战斗的友谊走到一起来了，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南海诸岛，到处都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大会在一片欢腾中结束，会后长影、长春公社，武汉钢二司、中央民族歌舞团等战友演出文艺节目。

这是北京以至全国造反派的最后一次大聚会。

王、关、戚倒台

文化大革命及其发动者毛泽东，招致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憎恨。然而，当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这种憎恨只能放在心里。1967年2月，稍一发泄，即遭批判，有的人则遭到灭顶。他们怕毛泽东？非也！他们真正怕的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军队。反过来说，毛泽东的必胜的信心建立在他对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强大影响力上，建立在他与直接掌握军权的林彪的结盟上。

当今世界有许多国家，宪法对军队限定的任务就是御外，或，干脆把军队称为“国防军”。总之，不准军队从属于一党一派，不允许军队为着党派、团体的利益互相残杀，不准以纳税人的钱武装起来的军队用枪口炮口对准纳税人，更不准他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开炮，把军队当成党派之争的工具，当成维护专制统治的柱石。

文化大革命靠的是军队。无论国家怎么乱，无论党怎么乱，只要军队不乱，毛泽东就能睡着觉。

“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因为怕枪指挥党，彭德怀就得下台。为了搞掉刘少奇，仍然需要与枪杆子结盟，就不得不以“接班人”相许。为了政权的稳固，就不能不看老帅们的眼色，王力、关锋，及戚本禹就得进秦城……

因此，毛泽东在“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前提下，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揪军内一小撮”这个逻辑话题。在实际操作上，他把对军队领导干部的批判，包括对他们的子女（如“联动”分子）的处置，仅限定在不反对他、不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个临界线上。

在1967年8月5日，有50万人参加的天安门大会和中南海内的批斗会上，从政治上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后，毛泽东认为，他的文革任务基本完成。因此，走狗可以随时烹食了。

“王、关、戚”不仅成为“反军”的替罪羊，还成为文革的替罪羊。毛泽东想以此向“老一辈”表明，文革初期的“乱”，都是“王、关、戚”所为；文革还得往下进行，还要收尾，“老一辈”们得忍耐着点儿！

从这时起，一直仇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可以将各种罪名公开地加在“王、关、戚”身上，借以“指桑骂槐”。从此，造反派也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反动后台和政治背景。

其实，王关戚并没有犯什么大错。文革开始以来，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猜摸毛泽东的意图，认真贯彻毛泽东对文革的指示。他们的被抛出，显然是毛泽东“舍车保帅”，以平息既得利益集团对文革怨恨的心态。因此，“王、关、戚”的倒台是走资派的胜利，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

因此，1967年8月，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失败的转折点。

地院革委会“退缩”的三个举措

“恢复革命秩序”

早在 1967 年 6 月，我们就在恢复革命秩序。它集中体现在探工分会的公告中。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探矿工程系分会
通告**

一、分会号召我系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整风运动，打倒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抵制克服一切歪风邪气，加强我们队伍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巩固和强化我们年轻的红色政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凡是从外地返校的、在市内其它单位的(总部特许的例外)、长期脱离战斗队活动而又不在总部的，我分会师生员工从即日起一律回本战斗队参加整风和其它活动。在总部的工作人员也要抽一定的时间参加本战斗队的整风活动。

三、凡没有特殊原因而离开本宿舍另居的任何人一律立即回本宿舍住宿。

四、一切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及个人必须根据中央精神立即返回本单位闹革命(个别来京反映情况经革委会许可的除外)，不得违抗中央指示，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我食堂从即日起，未经分会同意不得向外地来京的任何人出售饭票、钱票。

五、以上各条，望我分会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和各战斗队负责人互相监督，认真执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院革委会对探工分会的这个通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之作出批示：

探工分会的这个通告很好，是活学活用“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决定”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节约闹革命的规定”的样板，希望全院革命师生员工遵照执行。

目前，我院正在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革命化的整风运动，因此，对于一切不利于思想革命化，不利于整个革命利益的不合理的规定和做法，应当以边整边改的精神，坚决克服，及时纠正。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必须坚决抵制，坚决斗争。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应该以革命利益为重，顾大局，识大体，坚定不移地按最高指示办事，使我院逐步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把我院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限令学生返校

“王、关、（戚）”倒台之后，我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命令外出串联或回家的我院同学，限期半月内返校。无特殊原因逾期不返校者，将进行组织以至学籍上的严肃处理，毕业生该毕业的不让毕业，该分配工作的不给分配工作，该发工资的不发工资。

撤销作战组和动态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革命委员会与东方红公社出台“拥军公约”。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我革委会又做出“撤销作战部和动态组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做出，意味着地质学院从此不再关心校外的事情。

第 23 章 “大批判广播台”的覆灭

革委会坚持正确导向

高元贵、王焕的起落

1967 年 7、8 月，中央特别强调发挥老干部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高元贵和王焕即以老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委会常委会的工作。

从内心说，我绝不排斥他们。一方面，让他们进革委会，符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他们在管理上有经验，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但是，地院的师生对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人们的心目中，高元贵属于“蔡派”，而王焕属于可疑的革委会派，与“蔡派”没有关系。有老师和同学在私下里责问我，为什么同意高老夫子进常委会？他们担心革委会会被分裂。我对他们说，以高老夫子的精明，他哪里还看不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呢？

高元贵一进入革委会，“二团”就着力围着他转，力图使他成为“蔡派”在革委会的代言人。那时，在学 12 楼 1 层偏东有一间房子，供高元贵休息。不想，这里却成为“蔡派”活动、策划“9·4 事件”的一个据点。

王焕也绝不是“革委会派”。以他权术的精明，他不过是随了“解放干部”的大流。他是工作队的副队长，在批判资反路线中，并没有很好触及他的灵魂。他进入革委会后，还向中央写信，编造谣言，告革委会的黑状。

事实证明，当时，结合这两个人的尝试是失败的。“9.4事件”发生后，这两个人在革委会的工作即被停止。

对“蔡派”错误的批判

“蔡派”在天派支持下，策划推翻地质学院革委会，由来已久。

大约在8月17日，以蔡新平为首的“红色造反兵团”等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极力为“天派”涂脂抹粉，将“地质东方红”所干的一切事，都说成是在朱成昭的策划指挥之下完成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面对《联合声明》，我已经预见到“蔡派”的分裂阴谋。因此，必须向全院师生说明真相。这就是由我执笔写的文章《我地院东方红的对外路线不容中伤！》的由来。文章写好后，先在广播台广播。在此基础上，又加以修改，让《东方红报》以“井冈山、风景这边独好”战斗队为作者，全文刊登。

文章说：

大家知道，北京市革命阵营内部两大派是在今年四、五月间正式形成的，它是北京市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促使两派形成的主要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新北大公社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由聂元梓、孙蓬一控制的新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社会上和外地几乎到处都支持保守势力，到处与革命派组织发生摩擦。

四月上旬民族宫事件的爆发，终于使得原来各个局部性的摩擦，汇集转化为全面性的冲突……

对外，孙蓬一之流在一月革命风暴中，派出了抓权抢权队，到处伸手，到处霸权、占权！在二月逆流以来，新北大聂孙之流基本上贯彻的是支保路线，四川如此，湖南如此，在广州还是如此。在全国，新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顽固地支持保守势力，现已为各地造反派所公认，一提起新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路人无不掩鼻而过。其名声之臭，可见一斑。几乎没有几个外地造反派组织与北大孙蓬一之流站在一起了，……

孙蓬一之流的支保路线是因为他“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到处伸手，不仅要夺中央若干部的权，而且假借中央名义到华北局夺权，拉拢保守组织，保庇黑帮，打击革命干部，甚至准备夺《红旗》杂志的权……

北大校文革对外政策是它对内政策的继续。长期以来，北大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校内聂元梓违背了江青同志关于把张承先工作组批倒、批臭的指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不斗争，反而忠实地执行了陶铸、王任重的反动路线，并别有用心地提出“上揪下扫”的错误口号，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在二月逆流中，欺上瞒下，盗用中央文革名义，把井冈山-红联革等革命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在“反聂就是反革命”的舆论下，无数革命小将挨斗，甚至被逼自杀，在四月黑风中提出所谓“摘桃派”理论，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炮打谢富治同志，直至分裂中央文革。《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提出“揪新黑帮黑线”进行政治赌博。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雄辩证明：写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并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北大校园变成聂孙天下的资产阶级政客！……

第二，对待原三司的态度问题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红卫兵运动起过重要影响。但是，在北京市红代会成立时不仅没有实现中央提出的应以三司为核心的指示，某些人反而大肆对三司进行排挤，企图独揽红代会大权，《首都红卫兵》报及其它一些部门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

红代会成立后，一直无战斗力，这种先天性软骨病的根源就是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派核心。参加了红代会的不少三司基干队伍长期未能参加核心领导。红代会各部门的权力长期操纵在新北大公社一派势力手中，《首都红卫兵》报成为“拉一派打一派”的喉舌，连谢富治同志也一再批评这份“派报”……

第三，对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态度

正当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就在这关键性的时刻，谭震林首先跳了出来，陈毅、余秋里以及军内拿枪的刘、邓爪牙紧密配合，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对上，向中央文革，向以林彪副统帅为代表的中央军委施加巨大的压力，对下，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把坚持批判他们三反罪行的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逮捕，屠杀，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面对这样的形势，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中央文革，逆流而上，刀山敢登，火海敢闯，击退逆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另一种是，他们被暂时貌似强大的复辟逆流所吓倒，在刘、邓司令部高压和收买双管齐下的进攻中，不敢斗争，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他们从不敢斗争，进而为了适应刘、邓复辟逆流的需要，或则为刘、邓复辟逆流制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

“二月逆流是人为制造的，是抛出来的”，把反击逆流的斗争诬蔑为“背后有黑手操纵的”，“通过批判×××，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把敢于坚持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诬蔑为极“左”派，“靠砸、打、抢起家的”，“历史丑恶得很”，或则直接参加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当刘、邓新反扑的打手。

对二月逆流所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北京革命阵营中两大派加速形成的重要政治背景。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二月逆流中的“保”派都与孙蓬一之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在与孙蓬一之流的斗争中，我们坚决支持新北大革命造反派，敢于承担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一曰：“你们与孙蓬一之流的斗争是宗派斗争，新北大公社错了，地质东方红不见得对”。我们说：否！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在这场原则性的路线斗争中是有是非可分的。笼统地把两边都当成是宗派，看成半斤八两，各打五十大板，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虫……

二曰：“你们搞分裂，拉一派，打一派。”如果离开了两条路线来谈“拉一派，打一派”，就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对革命派，我们就是要坚决支持，对顽固派就是要坚决打击……

三曰：“你们搞山头，把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我们说，否！对你们认为我们矛头所向的那些革命左派组织，我们与他们的广大战士是有感情的，我们是共同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杀出来的，我们是患难相共的战友，我们之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正是这些头头中的某些人与孙蓬一合伙，把矛头针对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揪叛徒”，搞政治赌博等活动，受到中央文革批评后，不认真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反而以整风为名，用攻击“地质东方红”来掩饰自己的错误。最近又有一些人提出“十个为什么”，颠倒黑白，把矛头指向“地质东方红”，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不惜打击坚持革命路线进行艰苦斗争的革命战友，这才是十足的山头主义。这和印度尼赫鲁的“以外战解内困”的手法有什么区别！

四曰：“你们破坏大联合，阻碍大批判。”这顶帽子不小，可是真正破坏大联合，阻碍大批判的是谁呢？……

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出不要脸的话。孙蓬一之流说：“我们炮打谢富治是一时冲动，真正炮打谢富治的是地质东方红。”孙蓬一脸皮之厚，原子弹都炸不透！地院有几个应声虫现在也说：“革委会中×××要炮打谢富治。”问到他们到底有多少事实时，答曰：“这是猜测，如果孙××不轰，×××就要轰。”你们使用这种把莫须有的罪名嫁祸于人的手法不觉得可耻吗？……

(1967年8月25日《东方红报》)

地质东方红的两个声明

为了回击“二团”的“联合声明”，1967年8月29日出版的《东方红报》特将1967年4月16日和7月4日地院革命委员会发表的两个声明再次予以公布。

《东方红报》编者按：

目前，全市全国出现了一股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把斗争矛头对准我地质东方红，向真正革命造反派疯狂反扑的反动逆流。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对这些干扰斗争大方向的言行给以坚决的反击！本报刊登我院革委会、东方红公社四月十六日和七月四日的声明，读者从声明中不难看出，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那就是对敢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中央文革小组的家伙，不管他是谁，都要对他作坚决的、毫不妥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我们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因为我们深信，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任何生拉硬套，把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的原则斗争统统打上朱成昭的印记，都只能是徒劳！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他们！

关于目前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形势的几点声明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

自从四月一日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吹响了向刘邓黑司令部的进军号，批判刘邓的高潮在全国迅速掀起。但是，有一小撮混蛋联合了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扶植保守派，打击革命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黑风，与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相配合。对此，必须迎头痛击，彻底粉碎。

鉴于这种形势，我革命委员会和东方红公社特发表声明如下：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踢开一切绊脚石，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搏斗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二、目前在北京市，有那么一个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披着“左派”外衣，配合全国各地出现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为刘邓反动路线翻案，猖狂地向革命造反派进攻，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孙蓬一的两篇讲话，恶毒地挑拨中央文革内部的关系，否定革命小将，扶植保守派，打击革命派，拚命为刘邓反动路线歌功颂德，炮打谢副司令员。这是两篇浸透了毒液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两篇讲话的问世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宣言书，是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猖狂进攻的总动员令。这两篇讲话的抛出，使得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的气焰，一时又甚嚣尘上。

这两篇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公开消毒。孙蓬一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揪出来由全市广大革命造反派揭发、批判、斗争。并揪出孙蓬一讲话的幕后策划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这股反革命黑风。

三、在北大校文革一小撮人的操纵下，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北大畅行无阻。新北大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反聂元梓就是反革命”的大棒下，一批敢打敢拼的革命小将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不敢说话。而校文革的御用工具——新北大公社（其成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保校党委、保工作组的有功之臣）却拉大旗作虎皮，跑到社会上到处招摇撞骗，扶植保守派，镇压造反派，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新北大公社”根本不是造反派组织，而是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之所以有恃无恐的合法庇护所。

新北大公社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

北大必须大乱！必须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

我们紧急呼吁北大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要辜负了毛主席所给予的荣誉，立即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把新北大建成一个鲜艳夺目，永放光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万丈光芒的新学校。

在新北大只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只能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不是树立某个人的绝对权威。

我们强烈请求中央文革派出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了解北大运动状况。

四、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聂元梓是有功劳的，但是成绩应该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同时，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一切应该从零开始。

聂元梓有负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信任和培养。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聂元梓在领导北大运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联合、在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在主持红代会工作等许多方面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聂元梓根本没有资格代表红代会进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聂元梓必须深刻认识错误，向广大革命造反派作触及灵魂的公开检查，并全力以赴改正错误，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否则，执迷不悟，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滑下去，必将走到与党与人民对抗的地步，必将被历史所唾弃。我们还是希望聂元梓不要做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五、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四·八事件、四·一一事件以及孙蓬一的两篇黑讲话所暴露出来的北京市大联合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一个客观规律。

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与新北大公社的争端说明了北京市两种势力、两条路线、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全面决战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学校、机关、厂矿、社会团体卷入了这场全市性的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一切真、假革命派都将在这场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经受检验而决定弃取。

不把这场全市性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不把这股反革命黑风彻底打垮，消灭干净，扫清障碍，就不能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黑司令部，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

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政权问题。孙蓬一出于他反革命的阶级本能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这一点。我们也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斗争和我们所进行的一切斗争一样，都是为了政权。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的大权掌握在真正革命造反派手中，让那些大扒手投机商统统靠边站。为尽快促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现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七、我东方红公社全体战士在此严峻时刻庄严宣誓：我们——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将一如既往，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勇敢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我们呼吁，北京市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立即行动起来，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集结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军，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一唱雄鸡天下白”，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胜利的曙光。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
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1967.8.29.《东方红报》)

关于我院目前整风运动中几个问题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

一、六月二十七日，王大宾、聂树人同志代表革命委员会所作的整风报告是常委会一致讨论通过的，是我们这次整风的方针。

二、常委会所有成员对彻底批判朱成昭的反动思想问题，没有分歧，完全一致。常委会把这一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作了汇报，首长同意我们的意见。常委会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决心把这场批判斗争进行到底，希望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在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整风方针，搞好这次整风运动。当前常委会号召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作风上等各个方面把朱成昭的反动思想批倒批臭。

广大东方红战士积极起来批判朱成昭的反动思想是革命的行动，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求大同、存小异，把批判朱成昭反动思想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说明几个问题：

1. 革命委员会作战组存在着一定的缺点错误，但是根本不存在所谓“朱成昭操纵作战组”的问题。

2. 从今年四月份以来，我地质东方红和兄弟战友同北京市出现的以北大孙蓬一为代表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分裂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原则斗争，虽然方法上有缺点，错误，但是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场尖锐的斗争完全是在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会研究，根本不存在所谓“朱成昭指挥这场斗争”的问题。如果有人造谣污蔑，借此对我们、和对我们的一些亲密战友一一兄弟组织进行恶毒攻击，我们将予以迎头痛击！

3. 六月六日，《首都红卫兵》报造反是由兄弟单位发起串联，我院参加的，造反是有理的！一天一夜的战斗，完全是由几个院校在场负责人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我院由聂树人，孟繁华参加）指挥的，根本与朱成昭毫无关系。

四、我地质东方红的大方向从她诞生的一天起直到现在十一个月以来，始终是正确的。在朱成昭作为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领导人的五个月中，在朱成昭尚未走上反动道路之前或者反动面目尚未充分暴露出来之前，一些同志因工作上的关系，同他来往较密切，这些同志应该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朱成昭划清界线，积极起来揭发批判朱成昭的反动言行。这些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我东方红的好战士，对他们有意见可以提，有问题可以揭发。但是，朱成昭就是朱成昭，东方红战士就是东方红战士，不允许任何人通过否定朱成昭来否定他们，打击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压制、打击我东方红战士，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有确凿的事实证明，有人伙同朱成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或同朱成昭同流合污，那么常委会毫不犹豫地同广大东方红战士一道把他揪出来！

五、常委会号召全院革命师生员工，打倒奴隶主义，遵守无产阶级纪律。常委会决心和广大东方红战士一道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和一切危害革命事业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六、这次整风，从根本上说是一次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的群众运动，应该多作自我批评，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私”整“私”，互相乱扣帽子，挑起宗派斗争，把整风引向歧途，转移斗争大方向。

七、常委会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按毛主席教导办事，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四大”高潮，把这次整风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对革命委员会中不称职的人坚决按照广大群众的意志进行撤换。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委会

(1967. 8. 29. 《东方红报》)

“9·4事件”：“蔡派”分裂阴谋的破产

“大批判广播台”：现在开始广播

北京天、地两派形成后，“蔡派”立即投靠天派，成为其在地院的“别动队”。

1967年9月4日晚上10点多钟，我当时住地学12楼楼顶突然响起了宏大而清脆的广播喇叭声：

“北京地质学院大批判广播台，现在开始广播！”

“怎么回事？”这是我的第一发问。

“为了忠实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了彻底批判朱成昭反动观点，把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宣布，北京地质学院大批判广播台现在正式开始广播……”

我的第一反应是，“二团”，即“蔡派”，已经将“地质东方红”内部的斗争公开化，要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号了。如同上一年“斗批改兵团”的“斗批改”一样，他们把搞分裂的广播台冠以“大批判”的名目。

“二团”的广播器材显然是外校的，不是北京大学的，就是清华大学的，我判断。因为，要置办一套广播器材，“二团”几个人不会自己掏腰包，他们也不大能掏得起。

我对形势立即进行了评估。设立“大批判广播台”，显然是要制造分裂。

要制止他们广播，不让他们搞分裂，则意味着武斗，如同清华大学正在发生的事件一样。

进一步想，“二团”的谋划者们在私下里对我的性格和脾气肯定研究了一千遍。他们认为，我这个一贯主张实行大联合，坚决反对分裂的人，我这个疾恶如仇而性格又有些火爆的人，十之八九，会组织学生砸掉他们的“广播台”。在这种情况下，武斗将不可避免。武斗一起，就会引起师生对“二团”的同情，就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而这一事件的挑起责任将不可避免地会落在我的头上。

而，如果我对他们的分裂行动置之不理，那么，他们的分裂活动就会合法化。从此，不仅地质学院会有两个声音对着吵的广播台，全院将永无宁日。这形势，必然招来王大宾的怨恨：在聂树人实际主持工作时，把地质学院搞乱了。

这件事，无论如何处理，胜算的都是他们。而失败者或倒霉蛋，只是我一个人！

我的“决策”：“走为上计”

当时，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在小汤山住院疗养。他临行前留下话，由我协助李贵，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李贵是个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台前工作和校外工作的责任实际上全由我来承担。不仅“蔡派”，校内外的人也大都将我视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

“蔡派”的挑拨离间是，我想取王大宾而代之，想当第一把手！好在，我一直不存“野心”。我思想行动表现出来的，最多的是安于现状，最好的是退回到老百姓的地位上去——在权势上从不与人争多论少。因此，“蔡派”的挑拨离间始终不能凑效。

这一次，他们的算盘珠子中，肯定也有这种算计，而且，更为恶毒——弄好了，王大宾不说啥；弄坏了，我就成了替罪羊！而据他们的算计，十有八九，或者百分之百，他们是会成功的！

“二团”的谋划者们真是机关算尽。

“我得离开学校！”

这是我对自己下的第一道命令。

当时，我深知，不仅地质学院处在关键时刻，我本人也处在关键时刻。要冷静，要冷静！选择离开，是上策。离开学校，首先是离开了是非。离开学校，我将静观其变，然后，采取正确的措施。

我虽然选择离开，但是，消灭“大批判广播台”，绝不能使“蔡派”搞分裂的阴谋得逞，这一条绝不动摇。

在这个时候，与李贵商量对策是没有意义的。李贵和我的态度一样，肯定不会允许“大批判广播台”存在。但是，我与他不可能亲自去砸“广播台”，如果组织人去砸，就正好会落入“蔡派”军师们（包括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等）的圈套。

我也不想与王大宾商量此事。我相信，王大宾要的是“江山”，而不是好人的名声。如果地质学院有两个大喇叭天天唱着各自的调子，革委会就成了“半壁江山”，他的“平衡”还会有什么意义？而且，半夜里去小汤山医院找王大宾，也不现实，因为医院有医院的规矩。

至今想来，当时，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地质学院是地质学院人的地质学院，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派的地质学院。地质学院向何处去，要顺应历史的潮流，要由地质学院的大多

数人来决定。王大宾不在学校，我离开学校，正可以给地质学院多数人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人们不再选择我们而选择了“蔡派”，那正说明了我们的不称职。

即使我离开学校，我也胜算在握。“大批判广播台”将引致分裂，必然搞得全校不得安宁。地质学院的师生是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一局面的。清华、北大、北京钢铁学院因为两派武斗不断²⁹，校内许多人都到地质学院来寻找安宁之地。由人及己，地质学院的广大师生当然恨透了分裂，恨透了武斗，“大批判广播台”必为要联合、要团结、要统一的绝大多数师生所捣毁！

我打电话给车库，说我要到《前进报》社去，请他们派辆车来。

我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用意，车库往外派车有派车的详细记录。我正在阴谋和诡计的陷阱间挪步，我需要人们给我留下当时我不在学校的铁证。

学校来电：“砸了！砸了！”

《前进报》原名《经济日报》，社址在城南虎坊桥。我知道那天晚上《东方红报》出报，有三个编辑人员正在报社。半个多小时后，我到了报社，立即给《东方红报》值班工作人员打电话：

“学校现在怎么样？”

值班的刘姓女同志立即听出了我的声音：

“广播喇叭还在响，他们的‘宣言’已经广播三遍了。马路上聚集了许多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就在报社，有什么事，把电话直接打到报社来。”

随即，我又给李贵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的去向。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咱们不要急，也不要管，革委会常委谁也不要到现场去。我相信，群众会收拾他们的。”

“那就等等看。”李贵说。

在地质学院人的心目中，《东方红报》、广播台的工作人员，是我的“嫡系部队”，都听我的。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我们只是观点相同，大家以诚相待而已。我错了，人家必然反对。

到了11点半左右，电话来了：

“砸了！砸了！他们的广播台给砸掉了，喇叭声断了！”刘姓女人声音中洋溢着兴奋。

“是么？”我情不自禁地问道。

“没错！一些人正在往学12楼那边跑。”

我后来听说的情况是，砸“大批判广播台”的带头人主要是物探系的学生。他们的宿舍楼就在学12楼的旁边，距离最近，对广播内容听得最清楚。当“大批判广播台”开始广播的时候，多数人已经睡下，懒得起来。况且，在大家心目中，这时候比不得从前，革委会已经成立，不能无政府主义了，看革委会如何处置这件事。

第一遍广播过后，过了几分钟，第二遍广播又开始了。因为是高音喇叭，声音很大，吵得刚睡下的学生难以入睡。有人说：

“等明天再收拾它！”

第二遍完事后，已经快到夜半了。不几分钟后，第三遍广播又开始了。

“马上收拾掉它！”有人大声说。

于是，学生们像滚雪球似地，从学13楼、从学11楼（南五楼）中涌了出来，冲进学12楼。

但是，学12楼是个四层楼的学生宿舍，每层的中间是楼道。文革前，这座楼上住的大部分是研究生，因此，又叫研究生楼。一百多个房间，哪间房子是“大批判广播台”的所在地呢？

因为是深夜，人们看不到楼顶喇叭线，无法从其走向上判断房间。

人们跑上跑下，寻找着。

屋里有人，门都打开了。敲不开的门，大家就抓着门框，往上一跳，透过门上方的小窗往里看。四层楼上，都有人在寻找着。

“有本事搞分裂，怎么就没有本事站出来！”有人在叫阵。

“出来！谁敢在地质学院搞分裂，就砸烂谁的狗头！”有人在骂阵。

不久，人们终于在第三层楼的一个房间中找到了“大批判广播台”，门从里面反锁着，里面的几个人死命地抵在门背后。但是，他们哪里是愤怒的学生们的对手，很快，那间房门就被撞开了。冲进

²⁹2015年前后，网上有人说，清华大学1967年没有发生武斗。我想告诉他的是，拳头之斗也是武斗！而且，北京钢铁学院就在地质学院的对门，“革造公社”和“延安公社”两派的人，手持长矛，杀过来，杀过去，弄得钢铁学院“天无宁日”，该院的人都看到了。

屋子的学生在关掉广播机器的同时，立即对之拆除。其它的人则把“二团”的人揪出屋外，扭着胳膊，想把他们押送到革委会，听候处理。

然而，令押送者意想不到的是，当“二团”的人被押送到楼外时，站在学12楼外马路上的人就一涌而上，一个令人畏惧、众怒难犯的场面立即出现了，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二团”的人只有尖叫的份儿。他们根本不敢还手，好象被当场抓住的贼在当街遭打，只有抱头鼠窜的份儿。到处都有拳脚打过来，他们真是无路可逃，躲不胜躲，防不胜防。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的真实处境：自己不过是搞分裂的“一小撮”。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陷于“众怒难犯”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惟一可能保护的就只有自己的头了——用双手保护着头，手和胳膊挨打就顾不上了！惟一能帮助他们的地方只有马路两边“柏树墙”的根部。于是，他们紧抱着头，向柏树墙的根部钻。可是，那柏树的墙并不厚，根部紧密排列着，充其量只能容得下人头。情势所迫，只能当鸵鸟，顾头不顾腚。于是，屁股、腿脚就成了人们踢打的对象。

不过，反对分裂的“乌合之众”们并没有刻意去踢打，只是距离近的人顺脚顺拳而为之。否则，那七八个人早就被打残打死了。

人们在踢打中怒斥：

“叫你们搞分裂！”

“叫你们尝尝搞分裂的味道！”

凌晨，待我回到学校时，校园正处在沉睡中，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王大宾：对“二团”的慰问

9月5日上午，王大宾怒气冲冲地从小汤山回到了学校。何人向他通报了学校的情况，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一回到学校，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要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二团”挨了打的人，就可以判断，是“二团”和“蔡派”的人向他告了我的黑状。

他领我去的地方是东三楼安静中家。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殷惟侯、肖体休（毕业离校后改名为肖景东，后来娶了安静中的小姨子为妻）等，但是，没有见到安静中。

我们早就知道，前团委书记安静中是“二团”的高参。

王大宾对殷惟侯等被打表示慰问，我则一言不发。“二团”的人对我只是怒目而视，但是，没有人敢于指责我，因为他们的人肯定早已侦知，我不在学校。

在常委会开会前，到会的常委们、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笑谈师生昨晚大揍“二团”的壮举，一致谴责“二团”“颠覆革委会”、大搞分裂的罪行。王大宾才知道，当时我根本就不在学校。“二团”人之被打，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为，与我无关。

这使王大宾感到，看问题的角度应该变一变。

水文系革委会主任任云堂（学生）在会上介绍了他刚才在九楼十字路口看到的情况：

“赵国柱站在一张方桌上说：我在这里强烈控诉革委会中一小撮暴徒对我们大批判战士的残酷迫害。他们不给我们发言权，砸了我们的‘大批判广播台’，打了我们的人！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向北京的、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战友控诉……桌下有人故意问：‘哎，他们把你们打成什么样了，让我们看看！’赵国柱就把脸转向问他的人说：你们看，他们把我的脸打肿了，一片青紫……‘那一面呢？也让我们看。’赵国柱又转了180度说：这一面打得更厉害，脸肿着，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们猜怎么着？桌下响起了一叫好声：‘打得好！’‘搞分裂的人就该打！’‘这就是搞分裂的人的下场！’‘打得少了！’”

有人说，别看昨天晚上黑，大家一个都没有打错，挨打的都是“二团”那七八个人。

有人说，大家出于义愤，你一拳，我一脚。

谁打的？连“二团”的人也说不清。

当王大宾听到与会的同志说：“二团”所使用的广播器材上用红漆写着“北大广播站”字样后，他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才感到“二团”的后面站着“天派”。于是，他在会上骂聂元梓是臭婆娘。

广播器材上“北大广播站”几个红漆字没有被消除，说明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的猖狂——“蔡派”的分裂一定会成功，广播器材上的红漆字可以一直展示：他们对“二团”的大力支持！

可是，聂元梓、蒯大富，还有韩爱晶等，万万没有想到，短命的“大批判广播台”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歼灭，他们的贼手，将永远留在地质学院。

当日下午，我又知道了另一个情况，“二团”事先已经编造并印刷好了一份传单，其内容大意是：在我们大批判广播台开始广播后，成百上千的暴徒一拥而上，对我大批判战士恶语相加，拳打脚踢，残暴至极。据统计，我们有好几个战士被严重打伤。这是北京地质学院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在武斗进行过程上，革委会常委聂树人站在一旁冷笑着。这次武斗事件显然是在他的指挥下发生的……

“二团”的谋士们对情况预见的准确性十有八九，惟一没有预见到的是，我在事发时离开了学校。这一招，将他们的计划彻底打乱。原想公开散发的传单不敢散发了，原先计划好的“控诉”和告状行动不得不夭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分裂活动不得人心，彻底失败。

“聂鲁晓夫”对联在暗夜里贴出

“9·4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就北京以至全国的形势说，正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以及林杰作为替罪羊被“停职检讨”的当口。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经过一年多的奋战，终于赢得了他们的第一个大胜利。他们希望，王力、关锋的倒台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两张牌，由此穷追猛杀，就可以把文革彻底埋葬，就可以把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统统送进秦城监狱，就可以把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霾一扫而清！

毛泽东的司令部也及时地看到了这一点。据《大事记》记载，9月5日，即“9·4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其中讲到：“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是在群众基础上产生的，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这是巧合？

“9·4事件”是地质学院“二月整风”及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蔡派”与“杀猪切菜派”斗争的继续。这个“继续”，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过去是观点之争，现在是权势之争；以前是内部反对派，现在打出了分裂的旗号；过去是自己的行动，现在是在“天派”的指挥、操纵下。

不是么？你看，聂元梓给了他们广播器材（估计还有其它物质上的资助），“大批判广播台”就开始广播了……

不曾想，这一场经过校内、外精英们反复策划和论证的“万无一失”的行动，却被狡猾而可恶的聂树人轻而易举地戳穿并化解了。更可气的是，革委会的常委一个都没有露面；挨打的就是那七八个“蔡派”干将；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原先编造和印刷好的传单也因聂树人离开学校，而不敢散发……

王大宾在了解了真相之后，不仅没有保持“中立”，反而彻底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态度。高元贵因为支持“二团”、王焕因为对革委会不满（还向中央写信告我们的黑状），而停止了他们在革委会的工作。

“二团”对我更加仇恨。此后几天，他们还贴出漫画，讽刺我“独裁”，想一口吞下地院；夜半，他们偷偷在我住的学12号楼门口贴出对联，“犒封”我为地质学院的“聂鲁晓夫”。

对他们的大字报和对联，我只是笑看一番，并不公开理会。就让它们贴在那里，让大家欣赏，让校内外的人对我、对张贴它的人鉴别真伪！

“二团”分裂活动必然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向群众隐瞒任何问题，一切都是透明的。

第24章 在“整党”中“决战”

毛泽东依靠的仍然是党

我们这些“反干扰”的对象敢于对工作队提意见，敢于“四进地质部”，冒犯的是“党天下”、“一言堂”的威严，动摇的是两千年专制体制的基础。这些行为，在“坐天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这些行动的逻辑发展结果，必然是，打倒特权阶层！不仅刘少奇要被否定，最后，毛泽东也会遭到否定。

当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退缩了！

既然毛泽东的“党天下”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天下，那么，造反派当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死敌；王、关、戚当然就成了坏人。

他在将“王、关、戚”赶出中央文革之后，随即提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问题。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整党的“最新指示”：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能领导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显然，毛泽东最后依靠的是“党”，而不是“造反派”。

地院“临时党委筹备小组”的尴尬

据11月18日出版的《东方红报》报导，地质学院“临时党委筹备小组”成立。

据共产党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才能建立“临时党委”。

地院“临时党委筹备小组”的成立很容易，因为，革委会常委中，李贵、侯力平、李一民、黄振群等，都是党员。临时常委中当然不会有王大宾和我，因为我们不是党员。

临时党委成立后，经过十天的实践，以李贵为首的筹备小组的工作举步维艰。它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临时党委筹备小组是自成一个体系呢，还是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工作呢？如果“自成体系”，在地质学院就会形成两个发号施令的领导系统；如果“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就会被指责为“群众领导整党”、要搞“全民党”（这是探工系“赤二支”中的党员王振京、文正益等人的意见）。

王振京等人之所以有如此意见，可追溯到一年多以前。“党中央”派出的工作队“踢开了基层党委”，而它自己又违背了党中央主席的意旨，反干扰，最后被否定；大多数共产党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追随工作队，反干扰，成了保皇派。因此，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背景下，“党的领导”就“靠边站”了一年多。那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本应“颐指气使”他人的人们，却受到造反派的批判，“窝囊”着度过了一年多。他们等待的“秋后算账”，终于在“整党”中到了。

他们认为，只要是共产党党员，就永远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最后的局面，还得由他们来收拾！

于是，整党，要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在革委会的领导下”！

“在革委会的领导下”，那就是“痞子领导整党”，说客气点，是搞“全民党”。

因此，地质学院的整党，陷于停顿。

“整党”，必须“在革委会的领导之下”

那时，上海的《支部生活》成了我院整党工作的指导。

11月28日出版的《东方红报》发表了上海《支部生活》的社论，文章指出：

少数单位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把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中的非党员同志，统统撇在一边，由党员关起门来搞。个别地方，甚至仅仅因为非党员革命造反派头头参加会议的问题就引起了风波。这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因为这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即是否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问题还在于，“随着形势的发展将逐渐过渡到各级党组织起领导作用”，这实质上，仍然一种复辟。即使革委会中的造反派成员都入了党，都成了党委成员，从制度上说，也是复辟。因为它仍然是“一党专政”，没有建立起对党、对政府有效监督和竞争体制。

但是，对于“党领导一切”这一局面，非党的造反派无法改变。

上海《支部生活》的社论，对此，有了回答：



1967年底，我和顾焕起去东北鞍山汤岗子看望正在这里疗养的王大宾

有人指责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建立一个你们称心如意的党组织。”我们说，这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恰恰正是应当这样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军对垒，壁垒分明，一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这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在革委会里建立起新的党的领导核心，不让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称心如意，难道让那一小撮走资派称心如意吗？

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不是党组织“恢复”原状，更不是“恢复”过去党内生活中掺杂着的刘邓路线那一套。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那一套，不但不能“恢复”，而且要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既然这样，那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件事本身，就应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就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

同日，《东方红报》发表社论《整顿和改造党组织必须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明确指出：

削弱甚至摆脱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把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头头排斥在外，背着广大革命群众靠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进行冷冷清清的“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一种错误的指导路线，是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正确的路线应该是：整顿和改造党组织必须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

一切有损于革委会领导整顿和改造党组织的言论都是错误的，都要加以批判！

整顿和改造党组织，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极其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用饱满的政治热情，为建立一个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而奋斗！

据《东方红报》：

11月30日晚，院革命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我院第一次有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的辩论会。

《高旗无畏》、《八·八》战斗队的代表严正指出：整顿党的组织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依靠广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进行无情的批判。他们在发言中还对诸如“全民党”之类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接着，《新愚公》、《11652》、《东方红之鹰》、《646》、《12632》等战斗队也相继在大会上发言。

赤卫兵二支队的同志也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对革委会能否领导整顿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随着“二团”的没落，此时的“赤二支”就取代“二团”，以“一贯正确”的面目出现了。

2月21日，《东方红报》发表社论《必须重视对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批判》。文章特别摘引毛主席对卡博的谈话：“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还请读者注意下面的话：“还有一些人，对揭发批判不感兴趣，却津津有味地‘反左’，动辄就给敢于揭发、批判的同志扣上‘极左派’的大帽，这些人对群众运动很害怕，对新生事物麻木不仁，把‘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看得比‘政治原则’、‘阶级立场’都重要；为此，他们空费口舌大做文章，连篇累牍、不厌其烦。”

这其中的“还有一些人”，就包括“赤二支”。在他们看来，光着脏脚的“痞子”们怎么可以踏上“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打滚呢？“反干扰”中的“右派-反革命”怎么可以在党的圣殿上说三道四呢？但是，不能公开这样说。于是，“群众整党”、“全民党观念”，“极左派”之类的“批判的武器”就向我们盖了过来。进而，“不相信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以至“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大帽子就扣了过来，并极力阻止我们入党。

我们不是共产党党员。但是，过去不是，不等于永远不是。由此可以想到的是，昔日那些对我们不以为然的人，那些对我们这些不大会“靠拢组织”的人，对我们的入党设置高高的门坎的人，那些在“反干扰”中与我们反复较量过的人，当然会有另外的看法和想法。

同时，那些保过党委、工作队的党员，此时突然发现，在清算了工作队之后，他们也要被人“指手划脚”了。他们因为自己在“反干扰”中的恶劣表现而能不能恢复党籍，现在得在“革委会领导整党”的机制下，听命于造反派了！因此，他们极力反对“革委会领导整党”。

对一个单位来说，走资派只是几个，但是，共产党员却是一群或多群。文革之初，对特权阶层，即既得利益集团虽然进行了清算，但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却没有受到丝毫动摇。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铺就的“入党做官”之路还在，只要保住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党籍，未来就大有希望。而如果这次被暂缓登记或清理出去，个人的档案上再记上一笔，这一生就坎坷了，就完了。因此，这些人对“革委会领导整党”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仇恨。

12月2日出版的《东方红报》上，再次刊出上海《支部生活》第43期的“三论”《共产党员党性的检验——三论正确对待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继续批判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上的错误思想。

就以对待党的组织生活的恢复来说，少数党员只是想着：“我有地方好讲话了”，“一肚皮的委曲”可以“出一出”了；有的甚至想借助于党组织的力量使自己能够仍然“高人一头”。在这些想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私”字，隐藏着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而这恰恰是违背党性原则，违背毛主席对党员的基本要求的……

例如，对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建立党的领导核心，抱着从个人出发的错误想法，考虑的就不是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唱好革命的“一台戏”，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想要分庭抗礼，大唱“对台戏”，考虑的就不是如何整顿改造党组织，而自觉不自觉地总想“恢复”党组织的原状。这就在政治方向上错了。因此，我们一定要自觉地警惕自己，千万不要由于灵魂深处的私心和认识上的“老框框”，身不由己地滑到反动路线的泥坑里去。

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成立

12月1日，物探系一年级整党领导小组成立，并发了公告。公告中特别指出，“全院必须成立以李贵、王大宾、聂树人为首的整党领导小组，否则，将不于承认。”

据1967年12月5日《东方红报》)报导：

在全院革命师生职工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轰轰烈烈开展无产阶级教育大革命和整顿党组织工作的大好形势下，院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了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会议充分讨论了我院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并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宣布我院临时党委会筹备小组从十二月二日起解散。

二、决定成立以李贵同志为首的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李贵、王大宾、聂树人、柴文栓、贾振远、王焕、侯力平、李一民、刘家齐等九位同志组成，并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审批。

三、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负责我院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处理党员的工作。

四、会议建议发展王大宾、聂树人同志入党，不要预备期。

消息传来，革命师生立即组织起游行队伍，欢呼祝贺。各系派出代表，带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报喜。

我从不认为自己的道德品质一定高尚，从不认为自己真地符合党章上写明的共产党员的标准。但是，与身边的一些共产党员们相比较，我又觉得我绝不比他们低下！因此，我不认为我们这些革委会成员参与领导整党会有悖什么伦理！

事实上，在地质学院整党的实际进程中，王大宾和我及其它学生常委是自觉回避的。在毛泽东关于整党的指示发布后不久，革委会就成立了以李贵同志为首的共产党的核心小组。李贵是大家可以信得过的造反派，是大家可以信得过的党员、干部。有他及其他党员成员在前面顶着，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冲在党员的前面。

要说自己大公无私，这是天大的假话。自古有“结党营私”之说。我之要求加入共产党，在先进、奋进、光荣之外，还有“入党作官”之远计，更有入了党，可以以身作则，对党进行改造，使它永不变色。此外，还有我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入党，你就做不成官；做不成官，你的再美好的想法也实现不了；入了党，自己可以有多种“保护色”（比如，犯了错误，先有党内处理，然后，才有党外处理等）。

我终于“入了党”

我院一些同志去邮电学院取经。1968年1月9日出版的《东方红报》报导了邮电学院整党工作的经验：

现在，他们已正式发展十三个党员，六个直接入党的正式党员，两个转正，五个预备党员。已处理了四个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等坏蛋。这样，核心组发挥了其应有职权作用；同时又使其在群众中的权威进一步巩固。……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院的整党工作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太远了，不是没什么可搞的了，而是大有深入之地。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狠抓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落实，老老实实地向北邮的战友学习，把我院整党建党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在传统势力的干扰和阻挠下，我和王大宾的入党问题直到1968年7、8月才算有了结果。

以李贵为首的核心小组显得特别慎重。他们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请示北京市革委会领导之后，才做出发展我们的决定的。此后的程序和以前一样，查阅档案本在预料之中，“外调”得视情况而定。而对于我们这两个人来说，该走的过场都得走，以免给人以口实，留下难以弥补的隐患。

对我进行“外调”时，为不引起误会，李贵曾找我谈过话。他说：

“为了对你的组织问题负责，我们打算派人去你的家乡进行调查。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

我的回答是：“我服从组织的决定，没有任何意见。”

这次谈话后一个多月，有一天，外派到我家乡调查我的情况的地质系二年级党员学生刘兴安和任有福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谈话：

“我们这次到你的家乡去调查你的情况，有一个情况要向你通报一下。以前，组织上在查阅你的档案时，在你的《入团志愿书》的“组织意见栏”中发现了一句话，说你曾经反对过‘三面红旗’。

我们当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因为，一个反对过三面红旗的青年人怎么可以被发展入党呢？这显然是有人在搞政治陷害。然而，不经过调查，组织上是不能随便排除这个问题的。这就是我们这次外调的主要目的。”

“有这种事？！”

于是，我才知道了后来当了洋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李天鼎的这一丑行。

与此同时，核心小组也派人对王大宾进行了内查外调。

从1968年6月下旬开始，以革委会“政宣组”党支部为主，此前陆续恢复活动的地质学院各党支部，就我和王大宾的入党问题，分头展开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

为一两个人加入党组织而由全院各党支部分头开会讨论，这在地质学院的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绝后的。

这些意见集中反馈在1968年7月2日召开的有全院各系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政宣组党支部扩大会议”上，这个会议是为了正式发展我入党而专门召开的。会议的参加者很多，校内各派各种意见的人都有，学九楼三楼东头会议室坐满了人。

在这个“党支部会议”上，我在受到肯定和期望的同时，更多的是批评。

会议的结局是，有表决权的人庄重地举起了手，一致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反对意见。

八月九日，王大宾同志也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东方红报》的报导题目是《毛主席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探四临时党支部讨论通过王大宾同志入党》。

当时，全院发展的新党员有几十人。

不幸的是，我们的这个慎而又慎，完全按照传统和党章规定实现的“入党”过程，并不被工宣队-军宣队领导所承认。其发展结局是，即使宣传队认可了我们入党，在毛泽东死后的清查运动中，我们也会被开除出党。

第25章 旁观“清理阶级队伍”

我，旁观“清队”

1967年底，中央就部署“清理阶级队伍”。

对于清理阶级队伍，我当时的看法是，多此一举。因为早在1966年老红卫兵“破四旧”、“遣返”时，在保守派大搞“斗批改”时，就已经将“五类分子”、有历史问题的人，有海外关系的人，翻了几个过儿！

可是，身处“当权者”的漩涡，就只能跟着中央的指令走。我们将“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往后拖了两个月，实在是拖不下去了。

1968年1月15日，地质学院革委会发出“清理阶级队伍”的通告。

1968年1月16日，《东方红报》的文章说：

在前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大造工作队反的时候，混在我们队伍里的王武峰，是个什么人物？是三青团骨干分子，是国民党的少校教官。直到前不久，还在那儿写什么“请事实讲话”，拼命为自己贴金。

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掌握着我们全院的电路、地下管道、水井等要害部门的基建科长陈汝箴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个早在肃反时就已查出的中统特务，只是由于大叛徒，我院前党委副书记周守成之流的包庇才提薪晋级，钻到我们的要害部门。

那个曾在讲台上趾高气扬的化学讲师黄彭年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九四〇年就在南京加入“汪系”国民党，曾任汪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汪记国民党中央秘书厅文书科科长，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一个隐藏多年的地主分子竟还在给同学烧开水，一个早就叛变的大坏蛋竟成了我们的机要通讯员……

想想我院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再联系到前些日子某个邻校的自来水里发现剧毒药品的污染，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上述所言是真是假，都需要调查。针对一些同志以为“清队”没什么可搞的，和不知怎么深入的问题，李贵等不失时机地召开紧急会议，并立即召集全院群众大会，让李一民同志代表革委会谈成绩讲形势，指出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进一步向群众交待政策，对坦白好的就是要从宽处理……李一民同志还谈到，一定要严禁打砸抢抄抓，要更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阶级敌人，狠狠打击一小撮。

在这个时候，我和王大宾（刚从辽宁汤岗子疗养返校）对“清队”，都消极对待。主要原因是，我们都不是党员，“清队”多涉及干部——党员、党组织的事情，我们不便插手。更因为地院有李贵及其他党的干部把关，我们当然可以当个“看客”。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没有决策、隔离过任何人，没有抓过或过问过任何人的专案。

各系的情况也与院里的情况大体一致。

对聂克、周守成，工作队在时，就开始对他们的自首、叛变进行审查。革委会接手后，对之继续进行审查。

当时，聂克档案中遗留的问题，有杀人一节。杀的是叛徒还是革命者？写的不明不白。后经反复调查证实，聂克杀的是叛徒，终于澄清了问题。到1968年初夏，革委会拟解放聂克，上报请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谢富治说，这得中央审批。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

两三个月后，工-军宣队进院，解放聂克的事情就不归我们管了。

王虹夫妻之死

王虹夫妻之死，发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

王虹是我的地史课教员，我对他怀着敬意。但是，他是摘帽右派，我们也是知道的。文革中，右派一直是共产党中央铁定的“阶级敌人”，是保守派严厉打击和监督的对象。那个时候，谁要是对右派同情，斗争不狠，就很可能被追究阶级感情、阶级立场，就会出现你是站在敌人一边还是革命人民一边的问题。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王虹及其涉嫌的“右派反革命集团”被地质系的人揭发，王虹及其“右派同伙”即被隔离审查。据地质系的人说，这个“右派集团”（好像就4、5个人吧）长期活动，经常聚会，对自己被打成右派不满，对共产党有意见，以致影响到孩子。有时，孩子在玩的时候，会喊出口号“美国飞机来啦！”

批准对王虹夫妇隔离审查的，当然是地质系。王虹被隔离审查后，由看押人员押着到食堂打饭，我有时是看见的。后来，王虹曾经以头碰暖气管，企图自杀，我也是知道的，他在到食堂打饭时，头上蒙着一大块纱布。我对他虽然持同情态度，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又能作什么呢？下令，不要对他（们）隔离审查？或者安慰王虹几句？这都不可能。我当时已经知道，他们当右派冤枉，由此冤枉而致对共产党不满，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我那时只能做一个“旁观者”，我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我曾经想过，在专制制度下，我要么做帮凶，要么什么都不做。否则，我就得当朱成昭第二。

不久后，发生的事情是，王虹的妻子自杀了。随即，王虹也上吊死了。我只能在内心表示悲哀。他们是如何火化的，他们的孩子是如何安置的，我都不知道。

第26章 痛批右倾翻案风

二团的“两论”全盘否定“东方红”

在右倾翻案风中，在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等人的策划下，以“二团”名义，写出了“两论”的大字报，不仅否定了“东方红”和地院革委会，甚至否定了文革。

“二团”存在的宗旨就是与“东方红”作对，就是要寻机夺取地院的大权。夺权不成，也要搅得你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这样的宗旨岂能赢得人心？

“高、安、郑”等虽然帮助“二团”写出了“两论”，但是，他们并不跟“二团”走。在他们看来，我不能跟着你们八个人走！如果你们能闹出点气候来，能从“东方红”中分出一杯羹来，我倒是可以帮你消化一下。但是，你大半做不到。因此，我也就躲在你后面，或站在你旁边，出出主意，起起哄。这就是“看得着而摸不着”的“蔡派”。至于“赤二支”、“大喊大叫”战斗队之类，根本就瞧不起“二团”！其间也没有什么来往。

对“二团”的两论，首先迎战的是214战斗队和海燕战斗队。他们大字报的题目是《颠覆革命委员会的宣言书——评“二团”的“两论”》。大字报说：

“红二团”的两论是他们颠覆革命委员会的宣言书。配合社会上的反革命逆流，颠覆我院年轻的红色政权——革委会，这就是“两论”的要害！……

为了颠覆革委会，他们的第一步棋就是全盘否定革委会的大方向。在两论中：

(一) 明明革委会是广大东方红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和支持的红色政权，他们却恶毒诬蔑攻击我院革委会是什么“戚本禹、周景劳反革命活动的结果，是他们一手拼凑的‘御用工具’”。

(二) 明明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王大宾，李贵、聂树人等同志是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杀出来的久经运动考验的、广大东方红战士信得过的好同志，他们却恶毒地攻击这些同志都是“关王戚林的走卒”，“干尽了坏事”，说什么“革委会中的某些主要负责人在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的操纵下充当了干扰、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可悲角色”，他们的行动“背离了革命大方向”，“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是“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路线的积极追随者……”

(三) 明明革委会成立以来，在中央文革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发动和依靠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东方红战士在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复课闹革命，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然也难免有一些缺点错误)，他们却诬蔑革委会成立以来“一直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统统置之度外”，“实用主义”的“把复课闹革命引入了歧途”，“十月上旬以斗私批修为纲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开展以来，可是我院革委会在聂×(指聂树人)的把持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没有一条能够认真的贯彻执行”云云……

革委会给全盘否定了，革委会的王大宾、李×、聂××也成了关王庙的“走卒”了，广大东方红战士和全院师生员工的大方向给否定了。“红二团”又是如何呢？他们大言不惭的说：“……只有他们才是我院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他们才真正代表着革命委员会的大方向”。好一个“一贯正确”，这几个小丑把东方红光荣历史歪曲和颠倒到了何等程度？！我们广大东方红战士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目前这场斗争既然由你们挑起来了，怎么收场就由不得你们了！现在你们已经处于广大东方红战士的重重包围之中，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投降是可以的，赖是赖不掉的，逃是逃不掉的！……

(1968.3.27.《东方红报》)

1968年4月11日出版的《东方红报》上刊登“红色巨浪”战斗队的文章《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在我院的种种表现》指出：

这股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已经蔓延到我院，有以下几种表现。

由几条小爬虫拼凑集成的所谓“红二团”本身就是“二月逆流派”，但他们却把自己打扮得“一贯正确”，企图否定我院“东方红”批判余秋里、陈毅等人所犯错误的革命大方向，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第一种。

“红二团”的一小撮人追随反革命小丑聂元梓，恶毒攻击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疯狂攻击北京市革委会和谢副司令，企图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大叛徒谭震林翻案。这是第二种。

在校内，他们和革命委员会分庭抗礼，把院革委会说成是“关王戚的第二套班子”，企图颠覆院革委会，为我院走资派周、聂之流招魂。这是第三种。

“红二团”一小撮迎合右倾翻案妖风，疯狂破坏我院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说我院大检查大总结的方向是“资产阶级方向”，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院的统治。这是第四种。

“红二团”中一小撮人和朱成昭之流，明明是……一个黑根上长出来的两个黑瓜，却偏要把自己吹嘘成反朱“英雄”，唯独他们几个人才是“一贯正确的无革派”，否定东方红的革命大力向，这是第五种。

另外，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中一小撮顽固不化分子跳出来说，“斗批改不解散，你们也得承认是革命组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目，这是第六种。

有些“斗批改兵团”的铁杆分子至今不认识错误，坚持刘邓反动路线立场，说什么“我受五十天蒙蔽，你们(东方红)受一年的蒙蔽”，这是第七种。

大检查、大总结运动中，他们看不到东方红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奋战的战斗诗篇，而对那些口头上承认错误，实际上不服气的人大加吹捧，用放大镜看东方红的缺点，无视院革委会的正确领导，这是第八种。

右倾翻案妖风不管它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不管它怎样表演，其最终目的，就象江青同志说的：妄图破坏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瓦解解放军，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打倒高元贵

100个战斗队声明：打倒高元贵！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1968年5月下旬，地院贴出了有100多个战斗队签名的大字报，明确提出“打倒高元贵！”

高元贵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工作队进院之前之后，就已经被广大师生指出。他在“6.3反扑”中的表现，师生们记忆犹新。只是，那时与资反路线的斗争是第一位的任务，因此，对高元贵错误的批判就放了下来。随着复课闹革命的深入，不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革命就难以深入下去。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二，不言自明的是，高元贵支持“蔡派”，另搞一套，与革命委员会分庭抗礼。这一事实，从上一年的七八月份，已经容忍到1968年的四五月份。在这长达多半年的时间中，高元贵与“蔡派”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

地质学院里的教员干部，一直将高元贵和安静中绑在一起。早在1966年“6.20事件”前后，一些教员干部就一直与安静中保持着距离。“二团”成立后，安静中就成了其高参。安静中的家，是“二团”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比如，“二团”是否公开打出旗号，如何进行“9·4事件”等等，都是在安静中的家里定下的。

“高安郑”集团另一个重要成员是郑伯让，岩石教研室的负责人，地质系革委会副主任。

鉴于以“高、安、郑”三人为首，为“二团”密谋策划，甘当聂元梓、蒯大富在地质学院的代理人，欲推翻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院革委会也曾议论过对这三个人进行批判。但是，并没有作出决定。

要求“打倒高元贵”的一百个战斗队的声明，贴出来了！这其中，当然包括红色尖兵、高旗无畏、海燕……等著名战斗队。

二团也要“打倒高元贵”

革委会的会议都是公开的。会议内容当然会传到“二团”及“高安郑”的耳朵中。到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于是，他们指令“二团”玩花招，妄图阻碍或延缓对他们的批判。据出版于1968年5月30日的《东方红报》报导：

当着东方红战士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他们（二团）就今天贴一张“谣言万岁”，明天出几份“评尽朝辉”，使出了“围魏救赵”的故技，倒打一耙，死保“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杨、余、傅及其爪牙，死保“四右”在我院的总代表高元贵。

他们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将东方红战士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的身上。

出于无奈，“二团”也不得不发表声明：“打倒高元贵！”据出版于1968年5月30日的《东方红报》报导：

随着斗争终深入，反革命两面派高元贵的真面目日益暴露。一百个战斗队的声明给了高元贵致命一击，倒高声势汹涌澎湃。高元贵再也保不住了，“保安团”的勇士们万般无奈，只好扭扭捏捏的贴一张声明：对不起，我们过去的“三敢”干部、未来的“革委会主任”高元贵，为了我们的现在，为了你的将来，我们也要“打倒”你了。

“二团”也提出“打倒高元贵”，根本原因在高元贵本身，他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连“二团”也无法为他说话。他对“二团”出尔反尔，终于招致“二团”也高喊“打倒高元贵”了！

高元贵被揪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院革委会于二十七日召开了第一次揭发批判高元贵的大会。

据1968年5月30日《东方红报》：

在讨伐高元贵的高潮中，院革委会二十七日召开了第一次揭发批判高元贵的大会。这个阴险毒辣，藏得那么久，钻得那么深，窃据我院党政大权达十年之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隐藏在革委会中的定时炸弹，终于被广大东方红战士押上了断头台。会上，东方红战士列举大量事实，痛斥了高元贵这只披着羊皮的狼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把他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纷纷表示，坚决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不彻底捣毁高家王朝决不收兵。会上群情激昂，“打倒高元贵”的口号声响彻地院上空。

（1968.5.30.《东方红报》）

“政治投机商”安静中

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东方红战士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扬六·二〇革命造反精神，把高元贵的黑伙计、原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反革命小爬虫安静中也揪了出来，游街示众。这个红极一时的政治投机商，“黑二团”的后台老板被革命造反派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一只脚，安家铺子也彻底完了蛋。

（1968.5.30.《东方红报》）

在“打倒高元贵”的同时，“安静中也揪了出来，游街示众。”

1968年5月30日出版的《东方红报》以《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为题》发表文章，对安静中的被揪出叫好。

说起来真叫“保安团”眼泪都掉得下来，今天安家铺子的老板安静中又被广大东方红战士揪了出来。尽管“保安团”发了一个几十张纸的“大声明”，几乎集中了世界上最美好的词句，什么“反右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革命干部”呀，什么“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呀……但是，就象红药水治脑膜炎一样，这位“不幸”的安老板再也保不住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保安团”步步为营的策略丝毫不能挽救自己垮台的命运，其结果必将更清楚地暴露他们自己。

红色尖兵煤田支队在1968年5月30日出版的《东方红报》上发表红色尖兵煤田支队的文章《痛斥安静中的反革命罪行！》文章说：

安静中一到我三年级（特别是在22631班）就大肆散布他主子的反革命论调，他在底下说：“入党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正是出于这种反革命的罪恶心理，安静中一到22631班就和那个思想极端反动、灵魂特别肮脏的学生丁××打得火热，并不顾全班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学的反对，强行把他拉进党内。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静中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丁××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丁××这个王八蛋来“控制22631班”……

（他）拼命强调所谓“重在表现”，胡说什么“一个人表现好，他今天表现好，明天表现好，永远表现好就行”。在这里，这个大混蛋抽掉“表现好”的阶级内容，为那些投机分子、反革命两面派钻入党内大开方便之门，把那些专会趋炎附势，溜须拍马，能忠实为刘邓黑司令部和安静中之流的大小爪牙效犬马之劳的所谓“表现好”的人拉入党内，而把那些敢于抵制

错误路线，敢于造刘邓黑司令部和安静中之流的反的同学，说成是“表现坏”而加以无情的排斥，这就是大混蛋安静中所谓“表现好”的反动实质。……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静中强行解散了我年级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大搞“四大自由”，他叫×××到石油班专门总结该班在解散毛选学习小组后所出现的所谓“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经验。

揭批郑伯让

地质系革命师生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高元贵的黑分店、国民党少尉军官、混进系分会的郑伯让也揪了出来。物探、勘探、水文、探工的革命师生也纷纷行动，全线出击，短兵相接，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幕前的，还是幕后的高元贵分子统统逃不脱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68. 5. 30. 《东方红报》)

据1968年5月30日《东方红报》发表的文章《彻底揭开地质系阶级斗争的盖子》，郑伯让也被揪出来了。文章说：

窃据我系分会副主任的郑伯让，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反面角色。……

就是这个郑伯让，秉承其黑主子、反革命两面派高元贵的旨意，秘密召开什么“老党支部书记会议”，阴谋篡夺整党的领导权，把整党引入歧途，与中共地院核心小组大唱反调。

就是这个郑伯让，亲自出马，利用职权压制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秘密授意，千方百计排挤杀向教研室的革命小将，企图保护高家黑店的基础，扼杀革命烈火，为右倾复辟作政治上的准备。

就是这个郑伯让，身为革委会副主任，不维护革委会的权威，反而大耍资产阶级两面派手法，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公然为大毒草——十五个战斗队（十几条男女）声明叫好，标榜为“革命的大字报”，支持我院“保安团”（即死保漏网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静中的黑二团），为之打气，出谋划策，成为他们的幕后“高参”，密谋颠覆我院革委会。

在“打倒高安郑”的事件中，我和王大宾、李贵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存在谁右谁左的问题。事过多年，文革被“彻底否定”。为此，有人要洗脱自己，有人要委过他人。但是，1968年5月30日出版的《东方红报》，却是任何人也洗刷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遭世人唾弃，却是铁定的事实。

第26章 “地质东方红”寿终正寝

第二把手难当

毛泽东在“7.28接见”中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

“聂树人要夺权”！而且说得很具体：“说他右了。”

谢富治是如何知道我“要夺权”的？而且还知道我说王大宾“右了”。

分析起来，王大宾不可能告诉谢富治这个事。地院革委会的拥护者不可能向谢富治打我的“小报告”。最可能的就只能是“蔡派”了。他们不仅抓住朱成昭的问题不放，还一直在监视着我，“关心”着我。不仅关心着我的所作所为，还关心着我想要怎么怎么地所作所为！

第二把手难当！

第二把手的地位和处境是微妙的。他的能力可能低于第一把手，或者各有所长在伯仲之间，或者超过第一把手。他的地位最接近第一把手，是头把交椅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世事使然，这第二把手又不能没有，而且，他还必须协助第一把手作好工作。协助得不好，会造成第一把手不高兴；协助得好了，工作做得出色了，就可能显得第一把手无能。因此，即便是第二把手对第一把手再忠心，也难保不被第一把手警惕。这正是别有用心、心怀叵测的人们挑拨一、二把手矛盾，在一把手耳边大吹阴风，制造其间不和的先天社会条件和心理前提。如果第一把手不明就里，耳根子一软，小则引起单位内部的混乱、分裂，大则引起国家的动荡和内乱。最后吃亏的不仅是单位和国家，第一把手还可能丧失江山，或落下历史的骂名。

就地质学院的情况说，在“蔡派”拉拢我失败，转而对我变为打击之后，他们就开始在我和王大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在王大宾耳边吹阴风的人包括王大宾所在的探工系的一些老师，包括文革初期和他一起共过患难的战友，包括“不朱不蔡”而实为“蔡派”的“军师”们。这些人，有的

为革委会的巩固和前进步出谋划策，有的为第一把手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呕心沥血。这其中，不乏监视、警惕聂树人活动、动向的人们。

好在，我一直不存“野心”。比如，1967年7月，中央调我去中央工作，要我去钓鱼台报到，我没有去，也没有向中央说明原因。这件事，很可能得罪了上层领导，至少是目无领导。我的思想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最多，是安于现状；最好，是回到班上当老百姓。也就是说，在权势上，从不与人争多论少。

“蔡派”在学校内部公开挑拨我和王大宾的关系，没有人相信，也没有市场。但是，他们可以躲在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向谢富治和中央文革打“小报告”，造谣言，写些毫不负责任的推测和臆断，“供领导参考”。正好，谢富治也信以为真，在毛泽东的面前端出来了！

王大宾的回答，是对这种挑拨离间的驳斥。

由此可以想到，“小报告”的厉害。

由此可以想到，打“小报告”的人的品格低下。

工人的不解之谜

工宣队-军宣队开进地质学院，如同过去一样，我们把这视为“毛主席的又一战略部署”。在他们进校时，照例获得了全院师生敲锣打鼓和放鞭炮的最高礼遇。

进院时的情况与邹家尤工作队进院时的情况很相似，也是在东校门（是建立了毛主席像后新修了的东校门），也是在鞭炮和锣鼓声中，也是在广大师生热烈欢迎中。“宣传队员”的表情也和工作队员的表情一样，一个个严肃而紧张，对我们存在着明显的戒备心理。

当时，我们对此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学校一直是紧跟中央部署行事的，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大批判，复课闹革命，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都进行得井井有条。学校里没有武斗，风平浪静。我们何怕之有？

因此，我们才不会看他人的脸色行事，也不在乎他人如何看待我们。

“城头变换大王旗”！不知为什么，毛泽东诗词中的这一句突然冲进我的脑海中。

尚未进校就对我们心存敌对的工-军宣队领导人，后来对此的公开评价是：“糖衣炮弹”、“别有用心”，“表面欢迎，内心里恨得牙痛”！我们对此却有些莫名其妙。

第二天，似乎有了答案。水文系一同学告诉我们，在进驻地质学院的工人中，有一个工人原是水文系一个学生的初中同学，因为学习成绩不佳，早早就进工厂当了工人。现在虽然成了“领导阶级”，但是，在知根知底的老同学面前还是不敢过分做大。对他昔日的同学说：

“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我们大家进了你们学校后，许多人四处张望，生怕大楼上会掉下来一块砖头，生怕从什么角落里会飞出来一粒子弹……同时，我们大家也很想看看，大学里武斗后的凄惨景象……”

此时我才明白，他们是把地质学院当成了清华大学！他们进校之前进行的“紧急动员”，其要义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是否都写过遗书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是做好了遭遇暴徒暴打、忍饥挨饿、牺牲生命的充分思想准备的。当时，一些工宣队队员还自备有水和干粮。指派他们进大学并对他们作动员的有关领导还对他们说：高等学校武斗不断，大学生们全都是极左思想，吃饱了农民的饭，穿上了工人的衣，只知道打派仗，搞武斗。甚至还说，现在，大学里已经没有一扇窗户是好的，没有一张桌椅是完整的。

“我们工人阶级要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进驻大学去行使领导权，把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的学校的领导权夺过来，彻底掌握在我们工人阶级的手中，一定要把大学改造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可是，令这位工人，当然还有其它工人迷惑的是：

“我们感到奇怪，实际的情况与领导对我们说的情况大不一样。在你们的学校里，我们没有看到一扇破窗户，没有看到一张破桌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点，和19世纪后期发生的巴黎“公社革命”极为相似。法国的普照·利沙加勒为此写过一本书：《1871年公社史》。马克思说这本书“是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如下的话：

官方的电讯和坐在凡尔赛的被收买的新闻记者，把巴黎描绘成了欧洲一切无赖的魔窟，他们报道什么偷盗、大批逮捕和无穷的胡作非为，他们甚至还列举了统计数字和姓名。如果人们要相信他们的报道，那么正经妇女就会不敢再上街。还说什么

么受两万无赖压迫的一百五十万人仰面对天呼出对凡尔赛的最殷切的期望。但是有胆量来到巴黎的人，发现大街小巷十分安宁，完全处在正常状态。“强盗们”只不过是夺取了断头台，并且在第十一区区政府门前隆重地把它焚毁了。

或者，他们把清华大学当成了地质学院！把北京大学当成了地质学院！

随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究竟，工人和大兵们也开始对“地质东方红”有了皮毛的了解，他们虽然还不理解这些学子们追求的高远目标，至少，不再认为，“地质东方红”是一群只知打斗的没落子弟，地质学院与蒯大富治下的清华，与聂元梓治下的北大，是很不相同的！

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是，进驻勘探系的一名女“领导阶级”冒着被开除出宣传队的风险，与一名“臭知识分子”大学生谈起恋爱来。

“赤二支”的得宠

工-军宣队进驻高校的政治目的是搞阶级斗争的，是来整治人的，首先是来整治我们这些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的。我从1967年4月3日进革委会一年多，除过在校外工作和学习外，在校内工作不足一年，错误还没有来得及犯。可是，因为是“当权派”，也就名正言顺地进入挨整者行列。从此，我一生的厄运就开始了。

宣传队进入地质学院不久，作为正常人的他们，特别是工人们，可能已经意识到我和我的同事们并没有什么大问题需要他们兴师动众。可是，作为领受上级意图的宣传队领导们，他们就不能有这种认识了。严格执行上级的意图，是他们的天职；创造新的政绩，是他们的本能。

因此，发动群众大揭大批、“闻风言事”的阶级斗争模式就又在地质学院开始重复。

为此，对于揭发者，要保证“言者无罪”；对于被揭发者，则必须“闻者足戒”，不得解释，不得辩解，不得有半点抵触。否则就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

为了这大揭大批，于是，一批新的英雄就应运而生。“二团”跃跃欲试，只因为很不得人心，工-军宣队不用。于是，一直以“一贯正确”自誉的“赤卫兵二支队”（简称“赤二支”）就成了新形势下的勇敢分子，就成了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一起进驻革委会的“二鬼子”。

当时，革委会的三个正副主任王大宾、李贵和我被列为整风的重点对象，分在三个整风小组进行整治。

一年多来，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处在革委会工作的第一线，对校内外的重大问题我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此，我的“辫子”就多，“把柄”就粗。又鉴于我疾恶如仇的脾气，他们就将我作为整治的重点，集中力量对付我。经常在校内大辩论中上台的“赤二支”的辩才王震京、文正益等人就作为“群众代表”分在我这一组。此外，还有持有“蔡派”观点的师生和“宣传队员”，总共十个人左右。

因为可以“闻风言事”，于是，以前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生误会的问题，人家心里不满意的问题，存心诬陷的问题，此时就在宣传队鼓励下排炮齐发，对我进行狂轰滥炸。

为了把我及革委会其它负责人搞臭，他们力图将我与当时被认为有“叛国”罪的“朱成昭集团”挂起勾来，要求宣传队将我与之“同等对待”。

在派性斗争问题上，他们一忽儿指责我“极左”、一忽儿指责我“极右”。借此，他们还将“9·4事件”中没敢发散出去的诬陷我的传单交给宣传队领导，指责我参与指挥了对持“不同意见”的师生的镇压；

在整党建党问题上，他们不顾当时党组织尚未恢复的事实，指责我搞“群众整党”，搞“全民党”，批判我搞修正主义，向苏修看齐，向铁托投靠……

在校内工作问题上，还“揭发”我们，这，不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那，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要我交代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罪行……

于是，一个原本周身干净的人，突然被推进粪坑中呛了一肚子粪水，熏个昏迷，呛个半死，既不能自己爬上来，更不允许他人拉一把。

从内心说，我从不认自己“一贯正确”。但是，在“无中生有”面前，在“捕风捉影”面前，在恶意污蔑面前，我奋力反击，决不沉默。

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对一些无限上纲的政治问题，那是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只能倒憋气。但是对于一些有据可查的诬陷，我则寸步不让。比如，有人胡乱指责我在“9·4事件”中“指挥打人”，我不仅坚决不承认，还逼着宣传队的人去调查清楚。于是，他们到了车库，查阅了上年9月4日晚上几时几分某某号车由某某司机开车，拉着我去了何地，何时返回的派车记录；他们到了《东方红报》

编辑部，调查那晚出报时我和谁人在何地干了什么等的人证证据。他们虽然没有公布调查结果，但是，在此后的会议上不再提起这事了，对我的辩驳与反击的态度，似乎也不那么反感了！

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没有变，他们的说法是：即使什么问题都查不出来，都是假的，那也有个正确对待问题，有个态度问题；你真地没有问题，整整又有何不可，不正好能还你一个清白吗？

这话我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地听到，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事实是，实事求是的人，说实话的人，总是吃亏，而顺着领导说话的人，见风使舵的人，跟着人说人话、跟着鬼说鬼话的人，却总是吃得开，即使吃不开，也不会招来祸殃。

对此，我无可奈何。人家这么好的“好心”我虽然不敢恭维，但是，不领情行吗？况且，我向来都愿意与人为善，试想，我不服贴，地质学院的整风就整不下去。我因此而倒霉是小事，宣传队无法向上级交差是大事。于是，我不想听也得听，坚决不检查，最后还得检查……

事实表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的使命与刘少奇工作队进驻大专院校的使命，没有本质的不同。

“反对江青”成了我的罪状

那时，要把一个人打倒搞丑，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说他攻击毛泽东，攻击林彪，攻击周恩来，攻击中央文革。

宣传队和“赤二支”对此非常熟谙。

一天，有人在会上突然指责我有“反革命罪行”。我感到大惑不解，反问道：

“本人什么错误都可能犯，但是，不可能犯‘反革命’这种错误！”

“给你提示一下，你要老实交代反对中央首长的严重问题！”

“反对中央首长？真是无中生有！我这个人没有随便反对别人的嗜好，我给工作队提意见，人家却说我这是‘反对工作队’。在这次运动中，有人反对这个成了英雄，反对那个成了英雄。也有人反对这个成了反革命，反对那个，被抓进了监狱。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我不当英雄，更不想当反革命，我不反对任何人！因此，毛主席说打倒谁，我就打倒谁；毛主席说保谁，我就保谁。我从不反对任何中央首长。”

“你不老实！”

“谁不老实？你们无中生有，不老实的是你们！”

对于我的这种不恭，会议的主持者并没有表现出过分不满。显然，他们对自己的主张也没有信心。

“你反对江青！”揭发的人终于耐不住了。

“反对江青？这是诬蔑！”

几经反复，他们终于亮出了“大王”，我也终于弄明白了“反对江青”的真相。

据《大事记》：

(1967年)7月22日江青同志于凌晨对河南代表团讲话时指出：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并提出了“文攻武卫”这个革命口号。

1967年8月10日和11日，中央文革小组在红代会各组织的座谈会上，首长还说，现在阶级敌人利用“文攻武卫”到处挑起武斗，要反对。

江青究竟是在何时何种会议上讲“文攻武卫”的，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是，经他们一说，我倒是记起来了，因为我在传达江青讲话时，对她说的“谁要打我，我就打他”的“文攻武卫”的话，做了点善意的解释。我说：“首长”说到这里可能激动了，咱们学校不能这样。你打我一下，我就要还回去，再打你一下，这样你再打回来，不就升级了？不就越打越厉害了？弄不好，还会“派”与“派”打起来，规模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咱们学校不能那样，不准打人。如果打人，请不要还手，找我们解决。

因此，我对“反对江青”的“罪行”的回答是：

“我对首长讲话的这个解释没有错，更谈不上‘反对江青’。你们说，难道江青同志是主张武斗的吗？是号召我们，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大搞武斗的吗？！”

那时候，距离江青倒霉还有八年，她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谁敢对她说半个“不”字呢？在那个人人自危，以邻为壑的时代，人们在谈及江青时，都是“走钢丝”的，绝不能有半点言词上的闪失，让人抓住把柄，而追悔莫及。

估计，我的上述回击没有把柄可抓，弄得整我的人一时语塞。

“首长的话是你随便解释的吗？”

一个工人说话了。

这句话也很有力。在那个时代，在对领袖言论的解释权问题上，和 21 世纪的广告用语“解释权属本公司”没有两样，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解释权的。我敢于对江青的话做出解释，并且进行了明显的“修正”，罪莫大焉！因此，受到责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绝不示弱，因为正确在我这一边。我做“解释”前，就认为江青的那句话是不对的，有挑起武斗之嫌。还需要说明的是，传达中央首长接见会议情况，漏掉首长某一句重要讲话也是罪过，知情者会指责你有意“贪污”，有意歪曲，进而给你扣上“别有用心”的帽子也说不定。

“我这不是解释，是在正确阐释首长讲话的精神。我不认为我的这个阐释有什么错！”

“不行，你的态度有问题。你得从立场和感情上找原因。”

会议的主持者也不甘示弱。“错误”或“罪行”的皮球必须踢到我这一边来。

谁敢在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轻易给自己掘坑呢！

“就算我的阐释不对，那么请问，江青同志那句话的本意是什么呢？我很想听听你们的高见。”

“我们有我们的理解，反正你的话有重大问题。”

会议无果而散。

后来，整风会议进入检查阶段。我在检查中对“反对江青”的问题只字不提。因此，无论我怎样检查，都过不了关。

面对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这种无理，我和王大宾真是厌烦透顶，决心不再当官，决心离开地质学院，并向地质部打了调离报告。

到了 11 月底，地质部批准了我们调离的要求。为很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不得不作出让步：

“那你们说怎么检查才能过关？”

“你至少得承认对江青同志不尊重。”

“这好办！”

只要不给我扣“反对江青”的帽子就行了！

于是，我就依样划葫芦，在说明了真相，检查自己“对江青同志不尊重”之后，检查也就过关了。

“地质东方红”寿终正寝

1968 年 8 月 17 日，是“地质东方红”成立两周年纪念日。

此时，《东方红报》还在出版，但是，它的编辑已经全部是 1969、1970 届低年级的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已经毕业分配）。

此时，已经不可能召开全院性的纪念大会。《东方红报》仅发表 214 战斗队的文章《紧跟毛主席乘胜前进》，以示纪念。

工-军宣队进院后，通过整风，要削平山头，要打倒派性，要搞大联合，要搞大团结。因此，“地质东方红”的存在就成了宣传队不可容忍的事情。

当人们在诅咒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东方红”既是在不断“造神”的政治背景下开头的，也是在不断“倒神”的政治背景下发展的。更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东方红”也是在进一步造神的政治背景下“解散”的。她的解散预示着地质学院又回到比先前更可怕、更可悲的起点上。

大约是在九月份，军宣队的牛润虎对一年级的学生黄平稳说，大联合了，革委会成立一年多了，“东方红公社”也该停止活动了。

黄平稳：“‘地质东方红’的解散，是我代表革委会在大会上宣布的。工-军宣队进院后说，革委会都成立了，‘东方红’还存在，没有意义了。把宣布解散‘东方红’的任务就交给我。当时，军宣队叫我写个‘地质东方红’解散的宣言，我用了一百多行字描述东方红的历史，记得内容有从黑龙江到黄浦江畔，从……到……把我知道的‘东方红’活动和事迹都写进去了。王大宾看后说，你写那么长干什么？记得，是在北五楼北边放电影的那个广场上开会宣布的，还搭了个台子。

我在宣布“东方红”解散时，还引用了几句诗，下面人认为太“文”了。可是，后来我用了“巴黎公社的精神是永存的”之类的话，下来后，有人对我说：“你真敢说。”

第三编 “三司”与“首都红卫兵”

——校园文革：文革历程 2



第 27 章 在暴风雨中崛起

毛泽东急于发动群众

自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以后，三个月来，文革受到致命阻击，几乎夭折。

为了挽救局面，他在指出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后，又采取了许多措施，力图发动群众，有组织地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势力进攻：

1966 年 7 月 29 日，在刘少奇等人的检查大会上，毛泽东突然走到主席台前，表明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

8 月 1 日，他回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

8 月 5 日，他亲自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刘少奇直接开炮。

8 月 10 日下午 7 时，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有效发动群众，他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到处煽风点火，与刘少奇对着干……

8 月 24 日，他在中央上层打败刘少奇势力的同时，立即支持以“地质东方红”为主的造反派“炮打司令部”，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势力冲击。

在“地质东方红”的旗帜下，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学生在逐渐集聚。

为了进一步支持这些组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有了将这些组织联合起来的意愿。

高干子弟的一次不成功表演（一司）

高干子弟最为灵敏，他们首先得到信息，立即于 1966 年 8 月 27 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在互联网上，方迪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史末》为题写了“一司”的筹建、成立和活动的情况。文内用的最多的词是“开国”什么什么将军之子、之女，叙述了一群高干子弟在“一司”的活动壮举。他把“一司”的活动归之于“老红卫兵运动”的一部分。文内有许多想当然和不实之处，特别是对江青和蒯大富的有关叙述。

一司，是一个“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混杂的超级群众组织。

成立于 8 月 23 日的以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参加了这个司令部。但是，在高干子弟成堆的一司，平民女儿谭厚兰是吃不开的。

北京地质学院的保皇派“地质学院红卫兵”也参加了这个司令部。当时，掌握着地院大权的“伪文革一斗批改兵团”向这个司令部捐赠了 8000 元³⁰作为“活动经费”。这 8000 元是地质学院红卫兵

³⁰1967 年，由地质系 11651 班孙宝信（1968 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省地质局工作，至 1998 年退休。现居青海省西宁市省地质勘查开发局家属院）等人组成的“东方红查抄财物清点小组”编写的《关于原红卫兵查抄财物的处理及查账工作的总结报告》（1967 年 12 月 23 日）中，有这样的记载：“由原工人赤卫队蔡文怀等人经手曾上交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现金 8000 元整”。所谓的“原红卫兵”，指北京地质学院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原工人赤卫队”是以蔡文怀为头儿的保工作队的以地质学院印刷厂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蔡文怀因为在 1966 年 6、7 月间，在邹家尤工作队镇压师生的“反干扰”中表现积极，受到工作队重用，当了“北京地质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伪文革）的副主任。“原红卫兵”为地院“斗批改兵团”的核心，直属于

在学院内抄家所得的一部分。

“协商一致”的议事原则导致这个“造反派”和“保守派”混杂的超级群众组织，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它一成立，就意味着瘫痪。

这个司令部曾创办有小报《红卫兵》。

“保皇派”麇集的大本营（二司）

即使“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从成立之日起就争吵不休，无所作为，它还是引起“保守势力”的关注和不安。他们也很快串联，于9月5日成立了一个红卫兵司令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这个“红卫兵总部”刚成立的时候，势力强大，人数众多。因为，它是由当时各学校承接工作队权力的“执政者”组成的。

成立于8月20日的、偏于保守的“北航红旗战斗队”，加入了这个“保皇派”麇集的大本营。

这个司令部办有小报《东方红》。

“三司”的筹建原则及《宣言》

“宁少勿滥”的筹建原则及最初的成员

“三司”全名“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它是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为核心串联成立起来的。人们习惯称其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第三司令部”或“三司”。

我们不能加入一司，因为地院的保皇派加入了一司；我们不能加入二司，因为那是个保皇司令部。在“东方红公社”总部的扩大会议上，朱成昭提出，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单独串联成立一个“完全以造反派为主导”的司令部呢？这个建议得到了会议参加者的赞成。朱成昭立即指令“东方红”成立外联组，周永璋担任外联组组长，出面串联。当时，总部会议规定的筹建-串联原则是：不拘于人数多少，但必须是遭受工作队镇压、打击，而现在坚决与工作队作斗争者。

8月下旬，周永璋与邱世涛、赵国柱³¹、路瑞宗³²等学生骑着自行车到各校调查、串联。经过数天，他们在北京各高校中，共串联了15个“志同道合”者。

据陆瑞宗回忆，周永璋曾通过周总理的联络员宋皋，取得了周总理对成立三司的支持。

据《大事记》记述：“三司”是由“由地院、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东方红、北外红旗大队、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16个院校的革命少数派发起的”。

在我的记忆里，被“等”掉的发起单位还有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京广播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烽火战斗大队、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首都师范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钢校东方红公社、北京医学院“长征红卫兵”。

成立初期，所统计的红卫兵总人数只有3000多人。

3000多人，这在当时北京62所（一说59所）高校的十数万大学生中显然是个很小的数字。但是，这是一支革命方向明确、意志坚强、不畏权势、正气凛然、蓬勃向上的力量。它向专制独裁宣战，它向贵族化的权势者宣战，它向反动的“血统论”宣战，它向一切欺压人民群众的残暴行为宣战，它向社会的一切不公正宣战！

彪炳显赫的《三司宣言》

我是“三司”的主要筹建者之一，是“三司”《宣言》的起草者。

我在参与修改《地质东方红宣言》的基础上，在保留当时普遍流行的宣言俗套格式的基础上（以免因格式问题引起争议），写进了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令我高兴的是，这个宣言在“三司”

地质学院“伪文革”。在地质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与工作队负责人和地质部领导艰苦斗争期间，这个“红卫兵”组织在指责地质东方红“揪住工作队不放”、不搞“斗、批、改”的同时，在地质学院残酷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疯狂进行抄家。据“东方红查抄财物清点小组”的统计，地质学院被他们查抄的人员共104人，其中有院系党政领导、教授（副教授）、1957年划定的右派、地富反坏出身的教员干部等。“104人”其实是“104家”。

³¹二人均系地质系62级学生，与我同级同专业。邱现在南通，赵现在美国。

³²路瑞宗，勘探系稀有金属专业31641班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队址在甘肃省的地质部第三水文大队工作。曾任计算组组长。82年调到河北水文队，其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退休地在河北廊坊。

成立前的一次筹备会上（由参加“三司”的十几个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经过稍许修改（主要是加了几句当时通行的套话）即获得通过。

现将《宣言》全文引用如下：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修订）

在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正在涤荡着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北京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我们首都红卫兵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誓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司令，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每个红卫兵都要成为最高指示的努力学习者，忠实执行者，热情宣传者，勇敢捍卫者！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我们要努力学习它，熟悉它，运用它，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它！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造反者。我们生来就是要革命，要造反！我们是毛主席的最忠实的红卫兵，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统帅。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敢”字当头，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我们要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和一切旧势力的反，向整个旧世界猛烈开火。坚决地、彻底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要奋起革命的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

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这是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我们要团结，而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求得。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原则，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要革命、要造反，前面就必然有艰难，有险阻。但是，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年青一代，是毛泽东思想的最的忠实捍卫者。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我们必将在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我们红卫兵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首先是有成份论，其次是不唯成份论，而重在政治表现。我们坚决依靠革命左派，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共同战斗！

我们红卫兵要努力向解放军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解放军为榜样，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人民利益！要雷厉风行，闻风而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们认为，要取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但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斗争，善于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们坚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必将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光辉必将普照全球！

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宣言》刚一出来，立即就遭到保皇派的攻击。主要有两条：

1、指责《宣言》没有写“斗、批、改”。我及地质学院大多数同仁认为，当时，在同工作队的斗争中，“斗、批、改”还没有提到日程上；当时，“斗、批、改”成为保皇派挥向造反派的大棒：他们指责造反派揪住工作队不放，不搞“斗、批、改”！

2、指责《宣言》写入“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宣言”中所说的“阻力”无非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是指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他们认为，“高度”提得太高了。

因为《宣言》道出了造反派的心声，且只印了一万份，群众强烈要求加印。

可是，在9月中旬加印时，三司内部，却发生了《宣言》被“修订”的事件。由于我的坚持，宣言的内核没有被“修定”。

“三司”成立大会 中央的低姿态支持

参加“三司”的红卫兵组织，除“地质东方红”势力较大，此时已经形成一千多人的队伍，已能与“伪文革”对抗外，其它组织都是各院校中的“少数派”，都还势单力薄。

9月6日，“三司”召开成立大会。“三司”机关报《首都红卫兵》是这样报导成立大会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这庄严的歌声中宣告成立了。让我们热烈欢呼和祝贺她的光荣诞生！

九月六日，北京工人体育馆里显得异常庄严隆重，大会主席台上挂着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孔，千言万语一起涌上了心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您是我们最英明最伟大的导师，您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司令，我们是您最忠实的红小兵。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体育馆内通栏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遵循您的教导，我们要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旧世界的反，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整个体育馆沉浸在一片革命的欢乐之中，每个人的心啊，充满了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每个人的心啊，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方向盘，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和它拚到底！

整个会场上充满了革命的激情，革命歌声，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此起彼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震荡着体育馆，震荡着全北京，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大会在十点多钟正式开始，会场里充满了革命朝气，充满了革命的造反精神。

大会进行中，中央首长，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同志刘志坚、郑维山、戚本禹、周荣鑫、杨奇清等同志来到了我们会场。此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中央首长参加了我们的大会，这是对我们最亲切的关怀，最巨大的鼓舞，这是对我们红卫兵革命行动的最有力支持！

刘志坚同志向红卫兵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红卫兵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说：“我们是来祝贺你们的！总理派我们几个来的，我代表我们几个同志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并代表总理建议让杨奇清同志担任你们的顾问。杨成武、郑维山和我来做你们的辅导员。”这时会场里充满着欢呼、兴奋！

刘志坚同志还作了重要指示，他号召我们红五类子女要分清敌友，注意团结大多数人一起干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他还号召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彪同志的几次讲话及人民日报社论，努力贯彻执行十六条，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我们一定牢记着首长的教导，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誓做毛泽东思想的勇敢捍卫者！

大会在充满着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气氛中，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宏亮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成立大会会场



受周总理指派，刘志坚等到会祝贺

成立大会的主持者是周永璋。

大会由“地质东方红”核心组成员王大宾致开幕词。开幕词由我执笔，开幕词最后说：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力量目前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使命！

参加三司成立大会的还有丁国钰，当时是北京市的副市长。

当时三个司令部都配有“辅导员”：一司刘志坚，二司杨成武，三司郑维山。郑当时是北京军区代司令。开始时，每天早晨 8:00~9:00 郑维山同志都到三司的办公室——劳动人民文化宫最北边的几间小平房与大家一起上班。

蒯大富带读誓词的原因

依据三司成立大会前一日的“三司负责人会议”决议，大会誓词由蒯大富带领大家宣读。

为什么要让蒯大富带读誓言？

请注意，1966 年 9 月初，蒯大富还是被清华保皇派追杀、东躲西藏的一个“罪人”。中央让朱成昭给蒯大富以支持，朱成昭照办了，地院北五楼的地下室，曾是他的一个藏身之地。

9 月 5 日，在“三司负责人”会议上，给蒯大富的只是一个预支的“负责人身份”。因为和其它 16 个负责人比起来，他当时还只是一个人，不能代表任何人。

和朱成昭一样，其它 15 个组织的负责人谁也没有想过要当三司的“司令”或“副司令”。当时，这 16 个群众组织还是各校的“少数派”，它们还在同工作队支持的保皇派进行大搏斗。生死未卜，何谈当“官”？

在三司成立大会上的“露脸”，再加上两三百个“地质东方红”战士两次去清华支持蒯大富，蒯大富才勉强在清华大学站起来。

窃得“蒯司令”头衔的蒯大富，在中国招摇了几十年。与三司没有半毛关系的韩爱晶，却以许爱晶为笔名，编造出《清华蒯大富》一书，像三司的主人一样，“颐指气使”³³，把谎言编写得像真的一样。

³³详情请见《清华蒯大富》一书。

创办《首都红卫兵》报

“三司”成立大会后，周永璋与我相商，“三司”是否也应该像其它两个司令部一样，办一份红卫兵小报。我也有此同感，表示赞同。

不久。《首都红卫兵》报就办起来了，还成了北京以至全国红卫兵小报的一面旗帜，其严肃性和导向性远远超过了其它红卫兵小报。

第 28 章 文革走向胜利

铁证资反路线

在三司成立之初，我即意识到，批判工作队的错误路线，必须用事实来说话。为此，我和最初到位的几位编辑全力组织这方面的稿件。在《首都红卫兵》报上，先后发表了《地质学院的白色恐怖》、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写的《我院工作组的“两大揪”》、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写的《工作队是怎样整群众的》三篇文章，揭示了工作队整群众的铁的事实。

在这个期间，我因为忙于编辑出版《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增加到三个人），很少有时间参加中央接见。

“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

筹备 10 月 6 日大会的公开政治背景是，《红旗》杂志第 13 期社论，以及林彪在国庆节上的讲话。实际情况是，1966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全力支持地质学院和三司，使文革取得阶段性胜利。

9 月下旬，经周总理批准，三司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在京革命师生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大会。

10 月 6 日，大会召开。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周荣鑫、吴德、郑维山、雍文涛、穆欣、丁国钰等出席了大会。

江青在大会上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会上还宣读了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

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必须彻底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他们一致呼吁全国的革命师生联合起来，大串联，大舆论，大宣传，大造反，把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彻底埋藏在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坚决捍卫十六条，按十六条办事，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中讲了话。周总理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如今，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声音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于一些革命的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的，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不仅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的大中院校各级、党委各级负责的机关都要说。

接着，周总理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



周恩来总理讲话（坐在总理背后的人为作者）

10月6日的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是文化大革命从相持转向进攻的一次大会。除毛泽东、林彪外，全体中央首长出席三司大会，说明中央对造反派的坚决支持。



王大宾代表“地质东方红”发言
(坐在王大宾身后的是本书作者)

四个“通令”的发布

在《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和10月6日誓师大会的鼓舞下，三司各红卫兵组织立即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自10月8日至11月4日，三司连续发了几道通令。

第一号通令：留校闹革命

此通令十月八日发出。

10月初，保皇派学生一看形势不对，首先离开了北京，大串联去了。

看到保皇派都跑了，批判“谁”的错误路线？因此，发出了第一号通令。

事实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推行者是工作队及其派出者。受蒙蔽的学生只是执行者。他们借大串联之机离开学校，这也说明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想在学校再坚持错误了。

“留校闹革命”与中央的大串联指令明显矛盾。发出这个通令，显然是朱成昭的意思。

第二号通令：必须为“右派”平反

十月九日发出。

各单位立即召开大会，对在运动中被工作组扣上反党帽子，黑帮帽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进行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把非法整理的材料，全部退回本人。

工作组负责人应当是随叫随到，随时准备听取革命群众的批判。

不许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串联”的旗号，企图逃避本单位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号通令：解散“第二工作队”

十月十四日发出。

目前，有些学校对抗十六条的现象还非常严重。有些革委会³⁴是工作队一手炮制的，没有经过群众全面选举。它的产生就违反了十六条。现在它们仍在发号施令，压制革命群众运动。为此，我们紧急通令，凡是在工作队一手操纵下组织的革委会、筹委会等组织要立即解散，新的革委会必须由群众按巴黎公社选举民主制产生，在新的革委会没有产生之前，一切权力应当归革命的红卫兵组织，不得违抗！

第四号通令：销毁“黑材料”，彻底平反

十一月四日发出。

一、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管他是工作组也好，是“联络员”、“观察员”或其它变相工作组也好，一律必须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一律必须是随叫随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不许借故推脱。

³⁴实际指工作队撤离学校前，指令成立的“伪文革”，以承接学校的权力。不同学校叫不同的名字，如“临时筹委会”、“文化革命委员会”等。

二、平反必须认真、必须落实、必须彻底。在运动中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罪名”，必须责令工作组（或其它变相工作组）当众宣布无效，公开为这些同志恢复名誉，彻底解放这些同志。

三、必须全部、干净地索回“黑材料”，不折不扣地按中央军委指示办事，或当众销毁，或退回本人。

四、如果有一小撮顽固分子拒不承认错误，继续压制群众，就坚决造他们的反！就坚决同他们斗争，斗垮他，斗倒他，斗臭他！他们的结果只能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五、有一小撮坚持错误路线的人，他们或封闭“黑材料”，或故意把“黑材料”与档案等机密文件混藏，企图阻挠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正告这一小撮人，你们放老实点，马上把“黑材料”和机密文件分开，否则，革命群众照样有权采取行动，不受你们的束缚，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发出这个通令，并非空穴来风。在“黑材料”问题上，由于走资派的狡猾和顽固（拒不交出），造反派与他们的斗争远没有结束。

第六号通令：“三司没有司令”

1967年1月30日发出。

一小撮坚持刘邓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对“三司”恨之入骨。在他们妄图搞垮“三司”的阴谋一次又一次破产之后，又要出了最卑鄙的一招，假冒“三司”名义，到处为非作歹，招摇撞骗，破坏“三司”在革命群众中的威信，以达到保护他们自己及其主子过关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近查，在北京、青岛、乌鲁木齐、广州、天津、长沙等地都有这样的组织。它们打着“三司”××分部、“三司”××部（如已查获的三司通县分部、三司文艺部）的旗号，说什么“三司”支持我们，“我们和‘三司’挂钩了”，“三司和我们关系密切”等等，专门去干压制群众和对抗革命左派对它们批判的勾当。有的甚至伪造证件，私刻公章，到处破坏和捣乱，引起革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为此，我总司令部发出第六号通令：不许招摇撞骗！

- 1、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私自打出“三司”旗号；
- 2、任何组织或个人，未加入我司令部者都不许盗用“三司”所属单位之名义；
- 3、任何单位和组织，在“三司”没有同意或没派人参加它们所组织的会议时，不许私自写出或讲出“三司”参加或“三司”主持之字样。
- 4、本不属我司令部的单位和个人，绝对不许用“三司”名义建立什么联络站，所属单位建立联络站必须通过我司令部，私自建立者无效……

另外，我们必须声明，我司令部是北京高等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派队伍的联合组织，除“三司”中学、中专部和最初参加进来的单位和个人外，没有吸收其它单位和外地组织参加。并且司令部的一切成员都是红卫兵的勤务员，没有什么“司令”“总司令”“秘书”之类的称号。请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

“地质东方红”三进、四进地质部

10月8日，地院“东方红”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主席像为前导，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个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之流提出七项严正革命要求。深夜，东方红小将带着何长工之流凯旋而归。何长工被揪出来了，“何家店”完蛋了！

此时，无论是地质学院的保皇派，还是地质部的保皇派，都已经被打垮。因此，揪何长工等地质部的当权派，已经没有多少阻力了。

10月27日，“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他们炮轰了地质部，大造了反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地质部负责人的反，对个别性质严重的进行了批判斗争，并进行监督劳动。他们还提出了战斗口号“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公社”。目前，广播台、印刷厂等均为“东方红”公社服务。由于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恶意挑动，使食堂工人与东方红社员对立，拒绝给“东方红”公社社员做饭，“东方红”公社社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发扬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精神，接管了食堂，成立了“东方红”公社食堂，自己动手管理一切……

另据报导：爱蒙蔽的群众则纷纷觉醒，宣布造反。北京地质学院同“东方红”公社对立的“斗批改兵团”和“红卫兵临时总部”所属的宣传处宣布造反，申请加入东方红，把广播器材全部送交东方红。

这样，北京地质学院的保皇派就最后垮台。

三司其他院校批判“资反路线”

北京农机学院：工作组长被“劳动改造”

据 10 月 15 日《首都红卫兵》报导：

10月9日晚，“东方红”公社代表在第八机械工业部同陈正人部长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陈正人部长不得不答应以下三项要求：

- 1、农机学院工作组组长于 10 月 10 日 8 时准到“东方红公社指挥部”报到，去纠察队劳动改造。
- 2、10 月 12 日以前，工作组把他们整理的全部“反右”材料交到“东方红”公社指挥部。
- 3、10 月 16 日晚 8 点以前，全体工作组组员到“东方红”公社指挥部报到。

此外，“东方红”公社还控制了广播台。

北京政法学院：工作组长被罢官

据 10 月 15 日《首都红卫兵》报导：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红卫兵，近几天来接连几次开大会，揭发批判了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到最高人民法院造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注：杨秀峰）答应罢工作组组长、最高人民法院××厅厅长沈××的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红卫兵战士们还把工作组组员全部请回，启发他们和我们一起揭发批判工作组组长沈××所制定、执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工作组组员作了比较深刻的揭发，红卫兵战士们表示欢迎，并希望其它工作组组员向他们学习。工作组组员表示，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为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革命师生一起向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猛烈开火，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倒，批臭。红卫兵战士和北京政法公社社员们也表示，誓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北京石油学院：“伪文革”土崩瓦解

据 10 月 15 日《首都红卫兵》：

自《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大庆”公社继续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斗争锋芒，所向披靡，连日以来，大造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委会的反，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积极推行者——广播台的反，把长期把持在革委会手中的广播台夺了过来，并连续召开了揭发批判工作队反动路线的大会，石油学院大“乱”了。长期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被“大庆”公社的闯将冲破了。在这种形势下，革委会控制下的各种组织纷纷瓦解，院大字报组被迫解散。为对付“大庆”公社而成立的“红联军”组织迅速土崩瓦解，人员纷纷退出……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公社全体成员还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给领导干部整风，改进工作作风，促进思想革命化。

北京外语学院：工作队被迫交出黑材料

据 10 月 15 日《首都红卫兵》报导：

十月十日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等革命组织召开的批判工作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革命师生斗志昂扬，对工作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无情地揭露、批判和斗争。

为追查工作队整群众的黑材料，造反派师生与工作队负责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工作队负责人刘××态度极不老实，继续耍手腕，玩辞令。开始说什么“材料已经销毁”，但一经追问对质，他又改口说“再查查看……”支支吾吾，前言不对后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当众撒谎，企图逃脱罪责。为了彻底弄清事实真相，追回专案材料，百余名红卫兵战士于当晚到外交部政治部澄清问题，索取材料……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遭到受刘××（刘新权？）控制的一部分人的无理阻挠和百般刁难。他们诬蔑我红卫兵战士“要抢党的机密文件”，“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时候，周总理的秘书钱同志来了，他代表总理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并和大家一起查出了六麻袋尚未销毁的材料。

北京邮电学院：在邮电部的八天八夜

据《首都红卫兵》报报导：

《红旗》十五期社论的发表，掀起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我们强行解散了院文革，揪回了工作组—邮电部政治部主任朱春和及部党委第一书记王子明，连续召开大小会，控诉、揭发、批判工作组、部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到邮电部造了八天八夜的反，索回了黑材料！在这场激战中，五个革命组织肩并肩，手挽手，充分发挥了团结起来的战斗作用。

北京林学院：《“22”个问题》平反

响应党的号召，五个天真的学生小心翼翼地到上级党政机关去请教，将请教的结果写成大字报，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谁能想到，在薄一波支持的工作队领导的眼里，五个学生的向上级领导请教的行动和记录却成了他们“反党”的罪行！

1966 年 11 月 13 日《首都红卫兵》发表“本报采访”的文章《非平这个反不可》。文章说：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批判斗争中，被某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黑纲领”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叫“二十二个问题”）得以昭雪，就因为写这份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等同志得以平反。平得好，非平不可！……

……

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作了公开检讨（已印发传单），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他们，同情他们。平反取得初步胜利。

批判工作队的马前卒谭力夫

1966年8月20日，谭力夫抛出了一篇《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的大字报。其中，充满了保皇的论调。这就是后来被走资派、工作队和保工作队的干将传得如佛旨般的《谭力夫讲话》。

谢天谢地，没有见过“无产阶级”的土包子，读了谭力夫的讲话，才知道了无产阶级的样子。请看谭力夫的“讲话”：

——“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

——“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狗崽子！”

——“不准替狗崽子说话！”

——对知识分子，“我看先孤立，看可以团结再团结”。

——今天这里就有右派，“该打倒的还是要打倒”，“我就是这样做的……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

——“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³⁵！”……

“谭力夫讲话”的“迷惑”之处在于，在当时情况下，也掺杂着“正确方面”。比如，下面的这些话，他说的并没有错。

——“世界上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

——“有人习惯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首创什么？”

——“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不承认这一点便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主席在二十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怎么能行？”

被陈安民、邓兆伦打成“反动学生”的洪全，早在文革前就说过这种话。事实上，有正常心态的人，内心里也会发出类似的呼喊！

这样的话，高干子弟可以说，平民子弟不能说。如果说了，很可能就被认为“有罪”！

第29章 我见到了毛主席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八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其实，这里所指的“红卫兵”是“广义红卫兵”，它包括曾经参加接见的中国所有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谁都知道，在这学生“全民”中，既包括“红五类”，也包括“黑五类”，还包括人数众多的“不红不黑”的“麻五类”！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共有八次。接见时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直接目的只有一个，发动群众。他从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起，大概就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将基层群众发动起来，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

三司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两次接见了红卫兵。下余的六次接见，我都参与或参加了。这时，我们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主要不是参加接见，而是作为工作人员，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接见的秩序。

我曾两次在金水桥前值勤。经常看到，一些学生被挤昏了过去，被从队伍里抢救了出来。有的人，甚至被挤死。

接见完毕，广场上丢弃的鞋袜到处都是。

10月1日是国庆节，我作为三司代表，与王大宾等进中南海，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节庆祝活动。此次国庆观礼，上天安门的红卫兵共1000人，来自全国。北京上天安门的，只有几十人。观礼票是由三个红卫兵司令部分发的。地质学院分了一张上天安门的，若干张上观礼台的。朱成昭在9月15

³⁵杜万荣是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组组长。

日已经上过天安门，见过毛泽东。国庆节上天安门的票就给了王大宾。“斗批改兵团”参加的是一司，他们上天安门的票是一司发给的。

蒯大富属于三司，“井冈山红卫兵”于9月24日才刚成立。当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很臭，在三司需要支持。三司能给“井冈山红卫兵”两张上观礼台的票，就算高看蒯大富了。

“口号事件”

10月18日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10月初，三司成为红卫兵的主流派后，负责维持接见秩序的具体工作大部分就由三司红卫兵负责，司令部机关（主要是参谋部）在这方面主要起组织协调作用。

不知何年何月兴出的规矩，或者定出的制度，在举行大的群众性的活动时，都要事先拟定出一些可以反映活动中心内容的口号。这些口号写出来贴在墙上就成了标语，开会或游行时喊出来就成了口号。

此前，中央负责筹备工作的人员曾同三司人员拟定了一个口号稿，于10月17日将定稿铅印件发给了我们，以备第二天使用。

可是，在10月18日这天，三司红卫兵在长安街上和天安门广场上接到的口号变了，与前日下发的口号一比照，发现内容有较大不同。大家一看，认为这一定是“走资派”搞的鬼，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于是，就发生了查根溯源的“口号事件”。

《大事记》（P119）的描述：

十七日，大会指挥部突然宣布十六日发的“标语口号”作废，另外印发了“呼喊口号”。它将第一个口号单中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四个口号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砍掉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三司革命小将立即发现，是谁竟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八日凌晨，三司总动员，和北航“红旗”战士一起，臂挽臂，肩并肩，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并在首都第一次愤怒喊出“打倒刘少奇！”的战斗口号，冲向天安门，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

……十月十八日晨五点，在毛主席身边中央政治局一起开会议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作为正式口号被采用。被砍掉了的鼓舞人心的口号又重新出现，响彻云霄。并增添了一个新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它呼出了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声，它使那些躲在阴沟里的家伙胆颤心惊！

十八日晚，总理接见了三司革命小将，赞扬了小将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指出：这是斗争得来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

“一司”和“二司”的跌落

“一司”被整顿

从10月6日开始，随着三司的迅速发展壮大，三司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支持和加入，三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一司则相反，“协商一致”的组织原则，使它在处事时，往往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特别是保皇派作祟，无论什么事情，在司令部会议上都是议而不决。

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在1966年10月10日前后，一司将参加它的那些保皇派组织，包括“地质学院红卫兵”，统统开除。

“二司”被改组

保皇派麇集的“二司”，当然不会束手就擒，承认失败。权势利益所使，为了对抗10月6日三司主持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集会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10月9日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所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

中央首长没有出席他们的这个大会。

会上，他们不让造反派发言。北航“红旗”等组织造了大会的反，当即得到了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120个单位的支持。

从此，这个自成立以来，一直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二司开始瘫痪，瓦解。³⁶

参加二司的“北航红旗”后来采取的方针是脚踏两条船，在与保皇派周旋的同时，大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三司一起活动，想借此继续树立自己造反派的形象。

³⁶ 摘自《大事记》P117。

在与“北航红旗”联合行动这一点上，我的考虑是，我们都遭受过工作队的残暴镇压，在对工作队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我们理应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因此，三司的许多重大活动我们都事先通告他们，并请他们参加。在这些活动中，我都尽可能将他们摆在“地质东方红”之前。在《首都红卫兵》报上，也同样发表他们的发言、活动和文章。

当时，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北航红旗”是三司的核心成员呢！

1966年11月7日，“北航红旗”对二司进行“内部造反”，成立了“二司造反联络站”。

其实，所谓的“二司造反联络站”，就剩下两个组织“北航红旗”和“轻工红鹰”。

第30章 “老红卫兵”冲砸“三司”

10月31日，日本战刀向我砍来

三司的崛起，意味着造反派的胜利。看着保皇派的没落，保爹保妈的“老红卫兵”急了。他们冲入三司机关，对之进行打砸。

据《首都红卫兵》报，“从10月31日到11月25日，短短的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就连续四次发生了一小伙中学生捣乱我司令部的严重事件”。

最早的一次发生于10月31日。此后，至11月25日，又相继发生了三次。有文字记录的有两次（11月8日、11月25日）。

10月初，我们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湖边游船管理处的房子迁至宫内大殿前东侧的一座侧殿（后来知道叫“神库”）中办公。这侧殿有五大间房屋，座东朝西。我们编辑部迁驻在北间，我的办公桌放在前半间。其间有书柜纵横相隔。那时，编辑们工作较忙，组稿、编稿，联系印刷、校对、发行，一肩挑。因此我们常常要加夜班。而参谋部、办公室、后勤部、组织部等部门的同志们晚上则很少见到人。我那时担任宣传部长兼《首都红卫兵》主编，忙，难以过问司令部的其它事情。

10月31日晚10点左右，我们宣传部的几个人还在加班，突然，有多名穿军大衣的中学生闯了进来，其中一个中学生还拿着日本军刀。我一看来者不善，立即暗示两个女中学生赶快打电话给“地质东方红”总部，我则与这些人周旋。

他们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围着我，质问：

“为什么派人打解放军？”

我的回答是：

“我们从来也没有派人去打解放军！”

“你们派了！”

“如果真有这种事，我们调查清楚后会严肃处理的。请你们将具体情况告诉我，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再回答你们。”

我知道这些中学生“红卫兵”来者不善，而且他们在人数上占有明显的优势，硬来必然吃亏，只能好言相抚。

但是，他们本来就是想寻衅滋事的，哪里听得进讲道理的话。一两句话不投机就胡搅蛮缠起来，拿起桌子上的东西摔砸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书来随便一翻就往地上乱扔，并用脚乱踏。

有人拿起电话机往地上摔。

“有话好说，不要损坏东西，这都是国家的财产。”我说。

他们根本不听。

我很生气，责问他们：

“你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无法无天？”

“你说我们是什么人？我叫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一个家伙似乎与我有十代深仇，举起手中的日本战刀就要劈我。年轻气盛的我，那时真有一点赴义的气概。那一刀要是劈下来，我的脑袋不是一分为二，就是肩首分离，命是很难保得住的。但是，我一点也不惧怕，镇静自若。似乎在这时，我才最后弄明白了，这些“英雄老子”的“好汉儿子”们，和日本侵略者一样，刀口对准的是谁！

或许，那个举刀的家伙对我的凛然正气镇住了，高高举起的刀并没有立即砍下来；他的同伙又立即上前夺他的刀，事态才没有往严重的地步发展，我这条小命才保到了今天。

不过，虽然没有杀人、流血，但是，办公室却遭了一场土匪劫，被他们翻砸了个一团糟。由于寡不敌众，我当然也无法同他们抗争，只好趁机逃出办公室。

大约半个小时后，距劳动人民文化宫较近的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同学首先乘大卡车赶到。不一会，“地质东方红”同学也乘大卡车赶到了。大队人马一来，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家没收了他们的日本战刀，还把他们一个个分割包围起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三司来捣乱，受何人主使？方才还气势汹汹的他们，这时都草鸡一个，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不久，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坐着一辆吉普车来了，紧跟吉普车的是一辆大卡车，上面站着十几个解放军战士。

可能的情况是，“地质东方红”总部在得知三司司令部被打砸后，立即通知就近的北工大“东方红公社”派人救援。随之，将情况通报给中央文革小组。同时，立即派出一车“东方红”战士从西北郊赶来。因为时近夜半，路上少有车辆和行人，因此，两个学校的同学很快就赶到了。

黄作珍来了之后，到办公室里走了一圈，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就下令解放军战士将那十几个“西纠”押上车去。

我不知道黄作珍要将这些尤物带到何地。但是，总不能一出文化宫大门就放了吧？有此担心，在卡车开动以前，我特地要求黄政委“一定要严办这几个坏蛋”！

惊魂未定的我，此时似乎才有些害怕起来。我的愿望是，惟有严惩，才会“下不为例”。

那时，我很相信解放军，更相信解放军的领导干部。

这些中学生被带走后是如何处理的，我不得而知。我想，既然抓走了，就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只在后来才知道，这些小家伙被抓走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就都被释放了。由于没有认真处罚，不几天后，他们就又来捣乱。

11月8日的打砸

据《大事记》记载：

11月8日晚上，北京外语学校、101中、人大附中等100多名所谓“老红卫兵”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半夜三更闯入第三司令部，大肆进行打砸抢。

什么西纠、东纠、海纠以及那些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聚集在一起，犹如一群受到严冬威胁的苍蝇，东夺西抢，贴标语、发传单、造谣言、放暗箭，短短二十天时间，抢砸第三司令部连续发生四次。

反首都三司的妖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十一月中、下旬，重庆、长沙等地，三司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毒打、砸抄。

11月25日的打砸

11月30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导：

十一月二十五日夜，石油附中、钢院附中等一小伙中学生，自称是西城纠察队和“第三司令部”的，半夜闯入我司令部，恣意捣乱，猖狂地打人，致使当场发生流血事件，引起广大革命师生的义愤。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听到消息后当即赶到我司令部。在听了大家的反映后，周荣鑫同志说：“我注意到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气氛，有人就是要砸第三司令部。”他对那伙中学生指出：“现在，大学里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尖锐，你们中学生可能不了解，你们千万要警惕，不要上当！”

周荣鑫同志还再三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一定要按十六条办事，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文革初期，周荣鑫是我们很熟悉的“二流”领导人，大凡周总理接见我们时，他都在场，并前后张罗。他也平易近人，在接见前或休息时，他常常在主席台边盘腿一坐，与我们聊起闲天。

但是，后来揭露的事实是，周荣鑫原本是“西纠”的后台，他也因此而很快垮台了。据说，“西纠”的这类捣乱事件多是由他挑动起来的！从周荣鑫上面的讲话中（周荣鑫同志说：“我注意到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气氛，有人就是要砸第三司令部。”）似乎也可以嗅出点味道来。

周荣鑫等台后做鬼，台前装人，戏演得和真的一样。

12月初，“联动”落败钢铁学院

为了保护造反派组织，当时中央对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有令，对“三司”、“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等群众组织要进行重点保护。如发生冲砸事件，军队要立即出动进行制止。因此，“西纠—联动”等保爹保妈的“老红卫兵”对“三司”机关的几次冲砸，北京卫戍区在接到“报案”后，都是由政委黄作珍或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带军队来加以平息的。派其它人来，他们不放心，怕出了事不好向中央交代。

为了解决保护“三司”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三司机关迁出劳动人民文化宫，迁到学校去。在学校里，联动慑于造反派大学生，其行为应该会有所收敛。

最后，迁到了钢铁学院。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的担忧并不多余。钢院当时是个群众组织四分五裂的学校，“联动”分子对此一清二楚。三司机关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迁至钢院几天后，联动首恶董良翮³⁷等就带着十数个联动分子到新址捣乱，首当其冲的是《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有几个戴着红绸宽袖标的红卫兵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作为三司核心组负责人，除开会和中央首长接见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那天晚上，我恰好就在办公室。因为不认识来人，我问：

“请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不记得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有人向我介绍“这位是董良翮”。

我至今还记得，他进门后，不等让座，就径自坐在我桌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那时，我对西纠、联动的头面人物并不关心，压根儿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我的心目中，无论他们的头面人物如何变化，他们“血统论”心态不会改变，他们是我们的死对头不会改变。

因此，那时，我并不知道董良翮是何方鬼魅或神圣。即使我当时知道此人与董必武有关，我也不会对他肃然或把他当什么人物对待。

不过，他们一进屋，我已经预感到来者不善，我们在办公室值守的几个人绝不是他们的对手。在我暗示下，有人出去打电话叫人了，我则尽量与他们周旋。可是，进屋的几个人并不是真来论理的，而是来滋事的。记得，话头是这样的：

“你们有人在.....地方打了解放军！”

“是么？打解放军肯定不对。具体在哪个地方，哪个单位，请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说。

可是话不投机，没有说上三句，他们就骂骂咧咧地，不讲理了，引起随后进到办公室的其它几个三司工作人员的不满，就责问他们为什么骂人。

争执的升级，又是打砸。为了不致引起办公用品的重大破坏，我们边制止他们，边往外撤离。在院子里，我们尽可能不与他们打斗，只是围着房子和树丛打转。联动们可能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也不愿意在屋子里多停留，以免被人又逼到墙角，五花大绑起来。而在开放式的校园里，可以打了就跑。

大约十几分钟后，“地质东方红”同学赶到了。联动们一看情势不对，立即撒腿就跑。

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2月中旬向三司核心组提议，将三司机关迁出钢铁学院，迁入可以保证安全的地质学院。这一提议在核心组中曾引起不同意见，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及外语学院等院校的少数代表有异议。他们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是，怕因此而更加提高了“地质东方红”在全国的声誉。不过，他们毕竟是少数。宣传部—《首都红卫兵》编辑部首先迁至地质学院教五楼，不久又迁至学12楼。

继之，三司组织部、办公室和其它部门也随后迁至地质学院学12楼。只有参谋部和后勤部的少数人还坚持在钢院办公。

自我们在地质学院办公后，再未发生“联动”捣乱事件。

第31章 三司高举革命大旗

“干部子弟”的退缩

面对社会上“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我主持召开三司核心组工作会议，决定在12月4日，对之进行反击。

可是会后，清华大学驻三司代表唐诚（“八八”）、郭少华（“井冈山”），政法学院驻三司代表张广海、外语学院驻三司代表宋远利等核心组成员（都是干部子弟）却对我发出“极左”的指责，反对进行“12·4大反击”。

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师生的“利益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干部子弟们参加“造反派”，是为了要求工作队给自己平反。比如，清华大学“八八派”，其负责人唐伟、陈育延（干部子弟）等认为，工作队已经被批倒，他们已经得到平反，他们的“造反目的”已经完成，不愿意再前进了。他们没有说出来理由是，文革再搞下去，就要搞到他们爹妈头上了。

三司“核心组”先乱了。他们还背着我，通知三司所属院校，将先前通知的“大反击”决定取消。

³⁷董良翮，董必武之子。

在司令部，只有宣传部的人拥护“12·4大反击”的决定，其它人大都静观事态发展。

事到临头，再向下发通知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在12月4日这一天，我带领宣传部的人上了街。好在，宣传部二三十个人，占了司令部工作人员的一半还多，也算造起了声势。加之，三司下属的部分院校也上了街，“12·4大反击”还是取得了成功。

此后，《首都红卫兵》对“12·4大反击”进行了报导，题目就是“向阶级敌人开炮，向调和派开炮”。

报导怒问：

可是，这样的行动也遭到了极少数“好心的自己人”的阻拦和反对，叫嚷什么“不要群众斗群众，”“要讲究策略！”……我们不禁要问，有哪一个革命人民和革命人民的朋友会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指向了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又有哪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说，对阶级敌人进行反击是“群众斗群众”？又有那一个革命左派会放弃原则，给革命加上“温和”的色彩？

在以激愤的口气写下上面这篇报导后，编辑冯迈（冯金水）提议，《首都红卫兵》报同时将毛主席1948年12月30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也予以刊登，并加上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十七年前，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获得最后胜利。这时候革命阵营内却出现了“革命就此止步”等等极其实有害的错误思想……

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进行猖狂的反扑，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中央文革小组。革命群众大兴正义之师，奋起反击。这时，却跑来一伙“自己人”张慌失措地阻止，叫嚷什么“不要群众斗群众”呀，“不要太刺激他们”呀，“要照顾他们在感情上和中央文革合不来”呀，“要团结、要策略”呀，喋喋不休，唯恐群众运动的大火烧伤了他们自己的手指！……

“12·4大反击”的胜利，招致唐诚、宋远利、张广海等难以在三司再工作下去。他们离开了三司。

向反对“文革”的逆流开炮

党中央对大会的支持

“12·4大反击”后，社会上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三司的活动继续猖狂。在我的提议下，决定由首都三司牵头，主持召开一次十万人的全国性的反击大会。

我们对会议的召开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会议成立了秘书组、宣传组、保卫组、联络组、后勤组，并明确了任务，落实了分工。大会负责：聂树人，赵文明（农业劳动大学代表）。还联系了北航一人，参加筹备。

会前，我们照例要向中央首长发出请柬。

记得，在筹备工作进程中，记者刘景林曾向我们索取过会议发言稿。

在会议的前一天（16日）下午，王广宇（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工作人员）到三司对我说：你们送的会议请柬不够，还有一些中央首长没有送，要补上。这使我大感高兴，这不仅说明中央首长肯定会参加我们的会议，还表现出对我们这次大会的关注和重视。由于事前我们不明白中央人事安排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发出的请柬出现“遗漏”是难免的。我们立即按王广宇的要求补上。

周总理：“让大家都进来！”

周总理和其它中央首长是提前到达工人体育场的。会前十几分钟，在体育场主席台后面的会议室里，周总理和其它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一起，听取了我对大会内容和进程的汇报。周总理对我说：“很好！你们准备得很充分，我很满意，我们支持你们的工作。”

最后，周总理指示我：好了，大会可以开始了。

我立即走到台前，安排会议开始事宜。

可是，从会场外传来的消息使我改变了主意。这消息是，还有很多远道赶来的学生没有进入会场，而会场可容十万人的看台上已经人满为患。听说，有的学生为了能进会场，还与在进口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我理解这些学生的心情，他们不就是为了能近距离聆听党中央的声音？

我突然眼睛一亮，体育场中间的操场固然不是看台，我何不可以将它也变为看台呢？

时间已不容我再有半点犹豫，我立即返回主席台后的小会议室。这时，我看到，以周总理为首，陈伯达继后的中央领导人已经排好了队伍，准备走进主席台了。我立即对周总理说：

“总理，外面还有许多学生没有进场，可是看台上已经坐满了人。能不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外面的学生都进来，坐在主席台对面运动场地的跑道上？”

周总理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连说：

“可以，可以，让大家都进来！”

他好像还对排在他后面的人说：

“那我们就再等一下。”

得了周总理的首肯，我立即走到麦克风前，直接向场内外工作人员和场内外学生下达命令：

“请大家注意，因为体育场外还有许多同学没有进场，而场内看台已经坐满。为了能使大家都进场，亲耳聆听中央的声音，现在决定，主席台对面的跑道也可以坐人。请各个入口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立即敞开大门放行，并引导大家到指定的位置就座。相信同学们是遵守纪律的模范，请大家不要拥挤，都可以进来。”

在我的指挥下，场外的学生非常有序地进了场，并整齐地在指定位置就座。这使我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也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欣慰。

场外学生全部入场后，我立即走进台后小会议室，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周总理说：“好，那就开始吧！”

于是，首长们又一次排好了队，在我的引导下，走进了主席台，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很大，除前排首长席外，后面的座位很多，可以坐上百人。在这些座位上就座的，除会议的发言者外，还有三司各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等。由于“清华井冈山”郭少华等人的抵制，主席台上的空位就只能由在三司宣传部工作的人来充填。在宣传部工作的两个小学生（其中一个叫解俊正，有人叫他“肘子”）和几个中学生（其中一个叫劳树青，东铁营中学的；另两个是叶丹姐妹俩）也都上了主席台。那时，上主席台，能近距离地见到中央首长，被视为莫大的荣幸。

郭少华等人原是抵制了这次大会的。可是，会议开得很成功，随即又嫉妒起来。于是，让小学生上主席台，而“不让他们上主席台”，也就成了他们日后攻击我的话题。



我代表三司在大会上讲话（右侧坐着的人是周恩来总理）

江青：毛主席非常关心你们！

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好，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热烈鼓掌）

毛主席是非常关心你们的。（掌声雷动。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的心情，我相信你们是理解的。（热烈鼓掌）正像他理解你们一样。（长时间热烈鼓掌）

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为人民做了那么一点什么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鼓掌）如果我做错了或者做的不妥当，你们有权利批评我。（群众高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但是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热烈鼓掌）我藐视他们！他们做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鼓掌）他们只会干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鼓掌）因此，我希望革命的同学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小将们，要做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热烈鼓掌）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把组织壮大起来，（鼓掌）你们的组织如果是壮大了，那些所谓的什么“拔刀相助”啦，什么“霹雳战斗小组”，什么“梅花战斗小组”啦，这些家伙就会暴露在人民的光天化日之下。（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夺取新的胜利！”“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开火！”）毛主席从来是相信群众的，走群众路线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脱离了群众，那一小撮人就无所作为。（鼓掌。群众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那么你们就要说了，为什么他们还干出那么多坏事来？又杀人打人呢？就是因为这一小撮人，它是当权派！当权派它掌握一部分政权，因此，要摧垮它！（群众

高呼：“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请问，左派的队伍如果不能够壮大起来，能够摧垮他们吗？（群众高呼：“不能！”）能够彻底打倒它吗？（群众高呼：“不能！”）那么，这个问题，你们就应该很好地回去讨论讨论罗！对不对？（群众高呼：“对！”）我的话完了。（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群众高呼：“全国左派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敌人是纸老虎！

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一场大革命。（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在我们祖国进行的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热烈鼓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一场生死的斗争。（群众高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我们有伟大的导师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鼓掌。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不管道路是怎样的曲折，最后我们一定能够胜利。（鼓掌）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热烈鼓掌）

敌人是什么呢？就像毛主席经常说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敌人是纸老虎。（热烈鼓掌）这只纸老虎是在广大的革命群众包围之中，他们一被揭穿了，就什么也没有了。（鼓掌）

说到这里，我想，我们还是要很好地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导。

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斗争是极其复杂的，敌人是不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有一些反革命的幕后人物，一小撮，他们进行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的勾当，我们要经常保持警惕。

我们要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自己的头脑。（群众高呼：“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不断地总结我们在革命道路上的各个方面经验。这样，才能够更顺利地前进，才能够像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一步一步地团结大多数。只要我们作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把敌人完全孤立起来。（热烈鼓掌）

昨天我们在一个会上说过一句话，今天再重复一下。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

让我们大家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焰万丈的、光焰无边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前进！（热烈鼓掌）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热烈鼓掌）

无产阶级同劳动农民群众（贫农下中农，也包括中农）联合起来！（热烈鼓掌）

工农劳动群众同革命的师生、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热烈鼓掌）

同志们万岁！（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祖国的各个阵地！（热烈鼓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周总理：解散纠察队！

同学们，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大家问好。（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们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很成功，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热烈鼓掌。群众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讲的话。（鼓掌）现在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提一点意见，就是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鼓掌。群众高叫：“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彪副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因为他们经过我们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鼓掌。群众高呼：“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联系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纠察队的名字。本来，我们北京，中学和大学发起了红卫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地平线上看出了这个新生的事物，马上加以提倡、支持、鼓舞。（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月十八日接见了我们北京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展就推广到全国。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里头闹革命，也走向社会，走向全国，实行了革命大串联。八月三十一号，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又肯定红卫兵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鼓掌）从此在四个月的发展当中，红卫兵不仅鼓舞了我们革命的人民，吓坏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也震惊了全世界的反革命分子，（鼓掌）鼓舞了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我们希望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红卫兵的战士们，你们要好好地尊重。珍视这一个光荣的称号，不要辜负了我们伟大领袖对你们的支持。（鼓掌。群众高叫：“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卫兵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名字，叫做纠察队。本来，纠察队这个名字，从我们革命的历史上说，是在中国第一次人民民主大革命的时候出现的，叫做工人纠察队，他是保卫工人阶级，镇压那些工贼，那些反革命的走狗、警察、宪兵的。可是我们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以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我们红卫兵的了。所以它这个发展就不对头了，就渐渐地被一部分坏分子利用，来打击我们的红卫兵的一些革命的行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玷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鼓掌）好不好？（群众高呼：“好！”鼓掌）红卫兵是你们首创的，纠察队本来也是好意的，但是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群众高呼：“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因为那几个坏分

子，犯了法，我们把他们逮捕，用专政的方法制裁他们。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取的，你们把它取消，我们采取民主的方法，好不好？（群众高呼：“好！”）既然好，刚才大会执行主席已经宣读了我们最高指示关于民主专政的一段话，我也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一下毛主席在进北京后的头一篇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你们好好地学一学，就懂得民主跟专政的区别和相互关系。（鼓掌。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好，我就结束我的话了！

《首都红卫兵》对大会的报导

[本报讯]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第三司令部”）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谢富治同志等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了这个大会，和到会的革命派一起誓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猛烈开火。在大会上，江青，陈伯达和周恩来总理应邀先后作了即席讲话。

十七日上午十二点半，大会临开始的时候，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步入主席台……

随后，大会执行主席——首都“第三司令部”的聂树人同志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接着他谈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在他的建议下，全场肃立，在悲壮的《国际歌》乐曲中，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的胜利而殉难的革命战友致哀。

致哀后，大会执行主席说，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高举起先烈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接着，大会发言。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代表、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代表、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重庆各界革命群众代表、首都“第三司令部”的代表相继在会上发言。大家一致痛斥反对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



《首都红卫兵》报的编辑（左起：顾焕起、黄克平、张尚德，在颐和园）

聂元梓在搞鬼

1967年1月25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上，曾刊登出一则《通告》：

通告

（67）总字第一号

自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背弃了我司令部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井冈山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終是错误的。

“第三司令部”这个组织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和壮大的，为了纯洁革命队伍，本司令部决定将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开除出我司令部。

此通告自67年元月21日起生效。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7年1月21日

三司开除“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的决定，完全是出于中央文革的压力。在一次接见会上，聂元梓向江青告状，指责“地质东方红”和三司不支持她的工作，指责“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反对她。于是江青有言，“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不是个好组织，三司不应该让这样的组织留在其中（大意）。

江青的指令，我们不得不执行。于是就有了上述“通告”。

这是我在三司工作时，最违心的一次决定。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一开除“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聂元梓立即就在校展开了镇压，进行了大清洗。

蒯大富第一次“倒聂”

通过三司成立大会，蒯大富盗走了“三司司令”的头衔。

蒯大富盗得“三司司令”的头衔后，心里很不踏实，“做贼心虚”么！他做梦都在捉摸着，如何才能做个“名符其实”的“司令”。在三司，他得首先越过聂树人这道坎——得将聂树人赶出三司。为此，蒯大富及其追随者进行了精心策划。

第一次“倒聂”行动发生在1967年2月初，我把它称之为“一次不成功的宫廷政变”。

时间：1967年2月初；

地点：北京地质学院教四楼西侧阶梯教室；

参加人员：三司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地质学院和外校的其它人员（开放的会场，谁都可以参加）；

在这次大会的前两天，以清华井冈山驻三司代表郭少华为核心，联络当时在三司工作的其它一些人员（主要干将是北外红旗大队驻“三司”的代表）进行了紧张的谋划。他们先是在地质学院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指责我独霸、独裁三司，并以此罗织罪状，声言，要“将聂树人赶出三司！”

这一招，可以一箭双雕：把聂树人赶出三司；在聂树人的母校将他搞臭。

够狠毒的。

会议上辩论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他们是有备而来，而我则是单枪匹马、突遭袭击、仓卒上阵，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提什么问题，会从哪个方向进攻。

在那个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出现这些情况并不奇怪。当时，大串联正在进行中。在那个“无政府主义”时期，三司既没有可吸引大家长期、正规工作下去的“正式编制”（即给一个“铁饭碗”或哪怕是开给一个“铁饭碗”的空头支票），更不可能给大家发工资、发奖金。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没有约束，只有自觉。三司的工作人员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各人的思想方式、道德品质、工作态度都不一样。大家在三司的工作都出于自觉自愿。除《首都红卫兵》报有大致定期出版任务外，其它工作大都是干与不干无所谓，干多干少无所谓，今天干或明天干无所谓。对任何人来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去东就去东，想去西就去西，没有人能指责他们做错了。就拿我一直主管的三司宣传部和《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来说，也是人来了一茬又一茬，走了一茬又一茬。我又能对他们施以什么样的约束或独裁？

在具体交锋时，如下几件事成为了焦点：

- 1、没有按他们的右倾观点修改宣言；
- 2、“12·4大反击”未听取他们的意见，“一意孤行”；
- 3、取消了他们12月上中旬几乎被保守派利用的那次大会；
- 4、“12·17大会”没有请他们上主席台，把他们“晾”在了一边。

读者在前文中应该看到，由于我的存在，一些想在三司沽名钓誉者，除蒯大富仅盗得了个“司令”头衔外，并没有钓到誉；一些人的右倾主张则在正义的面前碰了铁壁。

从他们在地质学院贴出的蛊惑人心的大字报，再到会议刚开始时重达千吨的大帽子，不仅使不知情者和旁听者大吃一惊，以为聂树人不是蒋介石就是希特勒。

会议开始后，因为是突然袭击，只有我一个人面对着好几个人有备而来的进攻。为了捍卫我的信念，捍卫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捍卫三司的平民方向，我据理力争，将我的工作，将我工作的思想出发点，都毫不保留地摆到大家的面前。在近两个多小时的论战中，我一直是孤军奋战。阶梯教室里坐着的站着的众多的人们，特别是与我朝夕战斗在一起的三司机关的同志们，编辑部的同志们，似乎都无动于衷地听着，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我说上一句公道话。

我感到悲哀！

然而，我并不气馁，并不感到有真正意义上的无助。我相信我无私的心地可以光明地面对天下，我更相信人心自有公平在！只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摆到大庭广众面前，正确一定会战胜谬误，我一个人可以打败他们一个军团。因此，我对人们不大了解的事进行了耐心的说明和解释，对恶意的造谣和攻击，则坚决给予反击。

我的信念没有错！在郭少华等人从进攻到狡辩接近结束之时，林学院“东方红公社”驻三司代表、核心组成员朱一恕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也该我们说几句了。我们大家都听明白了！谁正确，谁不正确；谁在为三司的发展壮大日夜操劳，谁在为篡夺三司的领导权搞阴谋诡计，我们大家都听明白了！”他举起右拳在空中划了一条大弧线，嗓门也放到最大（在郭少华等人看来，这叫“声嘶力竭”）：“我在这里宣布，谁想把聂树人同志赶出三司，那是白日做梦！我们坚决不答应！”

这一声大吼，将郭少华、×××等几个人的气焰吼得一干二净。

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

坐在前排的三司机关工作人员，都对郭少华等人怒目而视。他们不得不在大庭广众之下，灰溜溜地逃出了阶梯教室。

这可视为民众的一次自由选择。

第32章 打倒“私”字，地广天阔

万里长征第一步

文革运动进展到1967年，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能不使人沉思。几经考虑，我写了《万里长征第一步——略谈目前革命队伍中的几个问题》，在《首都红卫兵》上发表。文章要点如下。

一、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二、什么是革命派

三、革命队伍简析

革命组织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不纯的成分。现在的形势是“保”字号普遍地臭了，造反派则吃香得很。人们都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因此，在这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准确地区分造反派和守旧派、“革”字号和“保”字号就比较困难。所以，不断地同革命队伍中的守旧分子和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及一切个人主义、风头主义、本位主义等作不调和的斗争，就提到日程上来。

我们现在是在两条战线上打仗。说到底，还是个权的问题。对外，我们要把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权统统夺过来，由革命派掌管；对内，我们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把一切相形见绌的分子适时地从领导骨干中消除出去，而补充以新的血液。一句话，就是一切权力要归左派！

四、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

五、北京的革命派为什么现在联合不起来

联合不起来的社会原因：

1、阶级敌人的破坏、挑拨。革命的胜利发展迫使敌人时刻都变幻着斗争的手法。文化革命以来的多次反复，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从把视线放在使群众对立的状态方面转变为打入革命营垒内部，继续制造混乱局面。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使我们的联合受到破坏。

2、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很大的程度上起着作用。这一条反动路线由来已久，波及各个方面，真有些“根深蒂固”，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经济主义的总根子！

具体原因：

1、严重的个人主义。一些同志以功臣自居，中了糖弹，他们不求再前进了。他们所想的是唯我独尊，扬名天下。某个人甚至不惜花国家一万元资金来印发他的变相“选集”！要联合吗？那好吧！只要让“我”当头，什么都好办！

2、严重的本位主义。一些同志的言行不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的工作是为了突出本单位、本组织。为此，他们不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是这里伸一把手，那里伸一只脚，到处都想捞到点资本；更可卑的是，别人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们一下车便哇哩哇啦地乱叫，什么老子是×××××（名牌货！！）³⁸的，得听我的！处处都想把他们凌驾于别的组织之上。

3、严重的山头主义。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互不通气，互相保密，互不服气！因此，造成了许多混乱的局面。北京的大会天天都开，内容上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开得很好的大会又有几个？北京有许多大的行动，可是这些行动有几个搞得比较出色呢？

4、有个别单位，搞得像个山寨，盛气凌人，谁也不放在眼里。

……例如：首都“第三司令部”驻外地联络站，本来是一些到外地串联的首都第三司令部的战士自发组织成立起来的，他们为革命，在外地干了许多好事，可是司令部所属个别单位在北京不把司令部放在眼里，许多大事，根本不通知司令部一声，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寨。它的一些战士到了外地，不是想把大家都联合起来，把首都“第三司令部”驻外地联络站办得更好，而是另起一个炉灶，也来个什么兵团驻××联络站，总是设法把自己的旗号搞得亮一点。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5、搞宗派。有些单位，有些个人，自己“不得势”，就想拉出去，另立一家。拨弄是非，挑拨离间，招摇撞骗，拉一派，打一派，结果，使一些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

6、流寇思想严重。不愿做深入细致的艰苦工作，以便巩固组织，加强战斗，而是隔岸观火，等待美好的时机从天上掉下来。

7、说到底，一句话，不突出政治，不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有的则认为，过去我能顶得住，现在也顶得住，少学点没关系。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

六、如何联合

³⁸我在这里打了五个×，并在括号里特别注明“名牌货！”从前文中读者应该可以猜中八九。现在，我可以将这五个×“翻译”出来：“清华井冈山”。下文中，“什么兵团驻××联络站”也与五个×同意。上文中，“某个人甚至不惜花国家一万元资金来印发他的变相‘选集’！”中的“某个人”当然也不言而明。

根本的是思想上的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的大联合是最可靠的大联合。假借联合的机会搞个人、本单位的突出是完全错误的。

求同存异的大联合。不可设想，条件如此复杂，系统如此之多的北京都能那么一致地统一行动。我们所谓的联合，一方面是思想上的联合，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则是指大的方面的联合。例如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致的，就可以通过协商，来采取联合一致行动。再如当前的大夺权斗争，就可以分片分系统地包干，互相支持。

七、火线整风的必要性

八、必须打倒机会主义

九、正确对待革命队伍中的各种矛盾

十、坚决夺权、全面夺权、彻底夺权

十一、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当前，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必须具备如下几条：

1、领导成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一致，大是大非能统一得起来。

2、领导骨干具有较强的洞察分析和组织能力。一般遇事能当机立断，拿得出办法来。

3、权力不宜过于集中，而应力求下放。下面战斗组以小型、灵活为宜。可以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要怕出乱子。

领导骨干是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产生出来逐步形成的。一切想凌驾于别人之上、骄傲自满、做官当老爷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载 1967 年 1 月 21 日《首都红卫兵》)



在三司工作的地院战友

(左起：陈友秋、聂树人、黄平稳、
顾焕起、王树彬、孟繁华、苏景海)



《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部分成员

前排左起：何力、聂树人、刘衍玉、韩继东

后排左起：常振家、×××、苏景海、许嘉璐、×××、黄克平、×××

《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一文的意义

我于 1966 年 12 月 20 日，最早以“红卫兵”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破私立公，做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当时就提出了向“私”字开战。

《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一文，是 1967 年 1 月 25 日《首都红卫兵》报的社论。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在两报一刊发表时，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现将发表在《首都红卫兵》报上的原文发表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大夺权。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一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是比民主革命在更大广度更大深度上的夺权。这是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非有坚强的革命组织不可，非有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不可，非有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大联合不可。

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革命的群众组织，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已初露锋芒。在白色恐怖下，他们表现了鲜明的立场、坚韧的意志、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的战斗力，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下功劳。绝大部分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已经从被压抑的少数扩大到掌权的多数，有的甚至已经“一统天下”。这标志着革命力量的壮大，标志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运动已经走向机关，走向工厂，走向农村，并在那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已经从学校的夺权转到整个社会的全面夺权。

革命在更大范围内的开展，必然导致革命队伍在更大范围的联合。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已经为我们树立了这种大联合的光辉榜样。这种大联合，就是在毛泽东思想上的大联合，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上的大联合，就是在彻底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上的大联合，就是在不断地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求得的战斗的大联合。这样的大联合，才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乌七八糟的大联合，不是调和折衷的大联合，不是机会主义的大联合。这种大联合，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正在实行全国全面的大夺权。没有这种大联合，这个大夺权就不能成功，即使暂时夺了权，也不能持久和巩固。只要看看我们的敌人在和我们斗争的每一个步骤上是怎样巧妙地实行着反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就会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多么地需要，多么地刻不容缓。

但是，目前有许多错误的倾向阻碍着这种大联合。

极端民主化、自由化，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白色恐怖下，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革命造反派的队伍曾经组织得多么严格，团结得多么紧密，表现了军事化战斗化的作风。胜利了，外部压力小了，就出现了极端民主化、自由化的倾向。不是把自己恰当地组织在革命队伍的一环上，而是游离出来，愿怎么干就怎么干，把革命组织当做“客店”，来去自由，任其所为，造成无政府状态。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组织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破坏了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使领导和群众之间发生隔离。

风头主义。东伸一条胳膊，西伸一条腿，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把触角伸到每一个“利所能及”的场合里去，为自己树碑立传，沽名钓誉，出风头的事大干特干，“隐姓埋名”的事坚决不干。

山头主义。占山为王，搞霸权主义，实力政策。我的粮草足，我的兵马壮，我的材料多，我的子弹多，求不着你们，要联合嘛，我是当然的领导，你们得听我的。否则，我领一班人马，占一个山头，杀一条“新路”，显我的威风。这就是那种流氓无产者的作风。

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这种人眼光狭小，看不到革命的整体利益，看不到七亿中国人民的利益，看不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看到的只是自己那一小帮人，那个小团体，那个小宗派。它拉一伙，打一伙，利用无原则的斗争，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是稍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都是妨碍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的腐蚀剂。这种种的坏“主义”，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坚定性和团结性。它使革命的队伍离散、动摇、丧失战斗力、不能联合，而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

这种种坏“主义”是那种小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对于名利的无穷的贪欲生出来的。它可以最终归结在一个“私”字上。这个“私”字，就是很多同志头脑里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头脑里同样进行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如果不把自己头脑的“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来，也就是说，不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我们头脑里的司令部的话，那末，即使我们把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过来，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只有在思想上彻底夺了“私”字的权，才能保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彻底胜利。头脑里的夺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必须进行这个斗争。这需要有刺刀见红的勇敢精神。而进行这个斗争的最好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投入到工厂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和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乃是克服知识分子种种弱点实行革命化的唯一途径。革命工人、革命农民的大联合，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和主力。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全面的大夺权了。

阶级敌人在拼命地寻找着我们队伍内的每一点缝隙，挑拨、离间、破坏革命派的大联合。阶级敌人说：让他们去斗吧，去混战吧！让他们去夺我们的权吧，互相去夺吧，各自为政吧。然后他们在旁边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我们将怎样回答敌人？

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钢铁般的大联合！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那里，从文化大革命几个月的实践中，真正深刻地体会到大联合的伟大意义，他们将很快组织成一支无比勇敢、无比坚实、无比忠诚的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之日，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彻底垮台之时。

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干部及一切革命群众联合起来！

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面前发抖吧！

打倒风头主义！打倒本位主义！打倒宗派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载 1967 年 1 月 25 日《首都红卫兵》)

请读者将这篇文章与上一篇文章中的“五”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二者的源缘关系。



在三司工作的战友

前排左起：×××、王桂兰、×××、孟繁华、林建×
中排左起：张尚德、袁卫东、刘衍玉、裴兆宏、黄克平
后排左起：顾焕起、×××、王树彬、韩继东、黄平稳、陈友秋、
聂树人、×××、×××

(摄于地质学院教七楼前)

《首都红卫兵》报批判清华《井冈山》报

第一次批判

第一次批判，发生在 1967 年 2 月 18 日。《首都红卫兵》报的编者按是：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最近几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已经在北京乃至全国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和个人纷纷来稿进行批评和批判。为了使《井冈山》报尽快地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为了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本报本期选登了两篇来稿，以后还将陆续发表些一这方面的文章。

《〈孙悟空四打白骨精〉是株大毒草》的主要内容是：

(1) 猪八戒=谭力夫=反革命

这个故事是以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在这当中孙悟空与白骨精的搏斗共有四次。八戒对这四个白骨精怎么样呢？

他是白骨精的热情欢迎者和顽固的维护者。孙悟空摔打第一个白骨精时，他高呼：“坚决拥护夫人领导”，大叫“最敬爱的夫人”是他学习的“榜样”，声称中国有了这样的白骨精肯定有“希望”，发誓跟着王光美，不去“东方取经了”。他疯狂地攻击孙悟空：“你这泼猴要把最敬爱的夫人打成妖精，这是他妈的什么阶级感情？”当孙悟空把第二个白骨精，刘府的薄大管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打得化阵青烟遁去的时候，八戒大怒，他骂孙悟空是“胡作非为”、“当刷万刀”、“什么出身”，狂热地鼓吹反动对联：“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当第三个白骨精“南山王员外”(指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痛遭悟空千钧棒的时候，他对八戒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他叫八戒整理悟空的“材料”，准备“秋后算账”。在悟空写大字报声讨第四个白骨精刘少奇时，八戒改口大骂：“刘善人犯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后来他把悟空写的大字报统统撕掉，神气十足地喊叫：“只许老猪造反，不许泼猴翻天，否则打断你的脊骨！”当悟空把刘善人打翻在地的时候，八戒“勇敢”地高喊这是“他妈的形更‘左’，实更‘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识，顽固地说：“撼山易，撼老猪的大方向难！”

综上，八戒在悟空与白骨精的历次搏斗中，一直站在白骨精一边，站在反动势力一边，也就是站在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刘少奇一边，始终与孙悟空为敌，毫无悔悟。他长着花岗岩的脑袋，他不恰恰是反革命分子谭力夫之流的化身吗？因此，猪八戒=谭力夫=反革命！

(2) 唐僧决非愚氓！！……

从画面的形态到文字的说明都表现出在孙悟空与白骨精的搏斗中，唐僧是头号的胆小鬼，他不是作揖就是垂首，不是张惶失措就是哎呀悲叹，他没有一点革命者的气味！唐僧的座右铭是：“革命有罪，造反无理”，他用这条约束自己，也以此来镇压别人。他是一个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的大坏蛋！他死抱着修正主义一套不放，在孙悟空把刘善人打翻在地使其现其原形的时候，他表态承认了错误，实际上却顽固地坚持其修正主义的一堆破烂，他对悟空说：“我承认你造反精神强，但我不打妖精也有道理，第一最守清规戒律，组织纪律性强，第二与人为善，第三对老干部感情最深”。他是个反对“宜将剩勇追穷寇”，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混蛋。……

(3) 作者调和了孙悟空同八戒、沙僧的矛盾！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八戒和唐僧都是地道的反革命人物。他们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革命人民实行专政，又冥顽到底死不回头。而作者笔下的孙悟空对八戒和唐僧的反动言行却听之任之，不做一点争论，不做一点斗争，并且作者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请看最后一张画页的说明：两人争吵不休，唐僧在旁发话道：“自家兄弟别伤了和气，八戒，你要知过就改！”那八戒自知理亏，却在一旁赌气，此时迷雾驱散，玉宇澄清，一轮红日，普照大地，悟空已将道路探明，高叫道：“师父快走呵！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

在看了《四打白骨精》以后，人们不能不向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你们看来，是谁使“迷雾驱散，玉宇澄清，一轮红日，普照大地”的？在这里，你们把孙悟空的形象当作革命造反派代称（更确切地说，是当作清华大学革命造反派的代称），你们说孙悟空是“革命司令部”（第十四图）是“悟空已将道路探明（第二十一图）”，孙悟空成了正确思想、正确路线的化身！这样，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到什么位置上？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清华园中的一些荒谬的提法，诸如把革命群众组织的某些负责人称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表示要“响应×××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甚至说“全国革命造反派都敬仰你”，等等，等等。联系起来看，只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四打白骨精》作者的思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过分地、极不适当当地夸大了某些个人或组织的作用，贬低党中央、毛主席的地位，说穿了：他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北京师院《红旗》大队

读了这篇文章，人们很容易想到，蒯大富不把“三司”和其它院校师生放在自己眼里的思想根源。这也是天地两派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们还很容易看到，不久后“清华4·14派”崛起，并与蒯大富进行殊死斗争的原因。

在《也谈“清除托派”》一文中，作者赤刃写道：

在首都及全国的革命造反派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大呼猛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热潮中，斜刺里杀出个《井冈山》报，不惜笔墨，连发七篇文章（七论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见《井冈山》报第十三、十四期合刊和第十五期），从头到尾，字里行间，贯串着一个精神：“清除托派！谨防他们夺权！”

发行量相当大的《井冈山》报一出，很多地方“清除托派”之风大盛.....

一，在北京市大联合、大夺权中确实存在着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这些思潮严重地阻碍了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

二，广大群众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要求并参加整风的。如果相信群众，就应大开整风之门，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而《井冈山》报是从一种什么心情出发，是“倚着”什么“势”，就根据群众要整风，“定人家罪名”呢？.....

托派是什么？是反革命.....

“七论”的作者完全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以“唯我最‘左’”的面孔，定了“虚假的多数”的死罪，并发誓要“挤垮”他们，要“粉碎”他们。其对抗群众、压制群众信心何其足，劲头何其大也！.....

（载1967年2月18日《首都红卫兵》）

这篇文章中的“托派”，指的就是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要求参加整风的群众。后来，这些人成立了“清华4·1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思想也浓浓地存在于蒯大富的头脑之中。

第二次批判

第二次批判共发表六篇文章：《打倒无政府主义！》、《告〈井冈山〉报读者书》、《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必须彻底批判！》、《清华〈井冈山〉报在大联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七论”的恶劣影响》及《来稿摘要》。

在《告〈井冈山〉报读者书》一文中指出：

在中央文革指出“反托派”的错误、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起来批判一至四论的方向错误之后，《井冈山》报编辑部仍然坚持撰写和发行有着方向错误的五至七论。这后三论，虽然已经改头换面，但本质上同前四论没有什么不同，换汤不换药。编辑部在第十七期上刊登的“检查”仍然是遮遮掩掩，敷衍搪塞，根本不像样子，他们把方向路线的原则错误说成只是用词不当的问题，并且拒绝刊登广大读者对其错误的批判文章，实际上就是继续坚持错误。

《井冈山》报编辑部的文章，公然提出“该分裂就得分裂”。他们对于一大批经历有所不同的革命派，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群众组织，横看竖看不顺眼，否定一切，排斥一切。唯我独“左”，老子天下第一。热衷于在革命派队伍中比高低，划等级，制造派别，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你是“鸡”，我是“鹰”，你是“苍蝇”，我是“战士”，等等。它们不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而是制造革命派的大分裂，不是采取团结方针，争取大多数，团结广大群众，而是排斥大多数。.....

为了谨防所谓“摘桃子的先生”把权抢去，惊慌万状地提出了“保卫红色政权”的口号。.....

以上种种错误观点，归纳到一点。就是，夺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和领导人应该怎样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

《井冈山》报的“七论”表明，革命派中有些人，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下，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和群众站在一起，十分渴望得到群众的宝贵支持。但是，当他们翻身掌权后，毛主席著作不学了，他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大大地发作起来了。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开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了。他们无限信赖自己，却不相信群众，进而发展到害怕群众，压制群众，甚至挑动群众斗群众。.....

（载1967年2月22日《首都红卫兵》）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必须彻底批判！》一文说：

自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批准发表了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告上海市人民书》以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联合、大夺权的激烈斗争。……

就在这种政治气候之下，清华《井冈山》报的“七论”应运而生了！它正好适应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政治的需要。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中了敌人破坏大联合、大夺权的奸计，以至于置中央精神于不顾，而另起炉灶。……而矢口不谈如何联合夺权，不敢碰一碰自己头脑中的那个肮脏的“私”字，把“右派”、“托派”当成斗争的主要对象。……

在清华《井冈山》编辑部的同志们看来，什么是“右派”、“折衷派”、“托派”呢？那就是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

树有根，事有因。这股歪风就是来源于他们头脑中的那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王国。来源于一个字：“私”！“私”！！“私”！！！……

然而，你们至今对此毫无认识，二月十五日的假“检讨”很不像样子。……

（载 1967 年 2 月 22 日《首都红卫兵》）

清华大学作者“井冈红旗”在《清华〈井冈山〉报在大联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文中指出：

总部及其操纵的《井冈山》报编辑部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他们掌握了权，地位变了，头脑中的“私”字发作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小团体主义等一齐出笼。他们不顾大局，不识大体，不是正确地对待革命组织内部的问题，不是正确对待自己的严重错误。……他们不惜把革命同志打成托派，妄图清除出去，从而保住自己的权。他们已经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载 1967 年 2 月 22 日《首都红卫兵》）

“七论”的恶劣影响

▲石钢（石景山钢铁厂？）将一至四论翻印成册进行学习。无轨（电车）一场将四论作为政策性材料学习。水电部勘察设计院“反托”、搞党员登记几乎与清华同时进行。其它如科学院、反帝医院、冶金设计院、北京电子管厂、内燃机总厂、五机部五院……等十八个单位都在大反“托派”。

▲科学院打“托派”很起劲，红联原有两千多人，经过这段反“托派”，有些单位退出红联，现约有一千人左右。凡红联成员较少的所，红联成员都遭围攻，要在全所大会上检查交待，并大会批判。如大气所九个红联成员，六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已平反，现又被打成“托派”。见面不敢说话，被迫宣布解散组织。由于打“托派”，造成各组织之间对立情绪很大，中间群众对此不满。自动化所一个老工人曾在会上说：批判“托派”的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北京电子管厂分“革命联络站”和“红旗造反总部”两派。前者把自己当成“左派”，用广播台、大标语宣传，并用《井冈山》报把后者打成“托派”。当与之辩论时，他们便念《井冈山》报社论。

▲北京摩托车厂北摩纵队大肆广播四论，借以打击反对派和下厂师生。辩论会上，指着鼻子骂“你们是托派”。

（载 1967 年 2 月 22 日《首都红卫兵》）

第 33 章 三司驻外联络站与对外活动

三司驻外地联络站

三司驻外地联络站，除少数外，大都是三司院校学生到了某地，自己建立起来，谋求三司认可的。也有建立起来，没有得到三司认可，即以三司名义进行活动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司机关人员并不多，参谋部就那么几个人，要管也管不过来。

据 1967 年 1 月 31 日《首都红卫兵》报记载，三司在外地设联络站的地区如下：沈阳、重庆、长沙、南京、上海、杭州、西安、南昌、鞍山、福州、合肥、南充、银川、常州、扬州、贵州、徐州、天津、南宁、齐齐哈尔、青岛、旅大、广州、太原、漳州、吉林、乌鲁木齐、成都、郑州、洛阳、通县、唐山、武汉、昆明、烟台、汕头、无锡、株洲、潍坊、邯郸、青海、哈尔滨、安新等。

这些联络站的成立，与外地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支持了外地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外地的文化大革命。它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外地保皇派的攻击。

据 1967 年 2 月 8 日《首都红卫兵》报导：

最近，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驻外地联络站屡遭一小撮暴徒的袭击。这伙暴徒，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三司”或“三司”联络站头上。“‘三司’已经解散”、“‘三司’垮台了”一类流言蜚语，一时也甚嚣尘上。这一小撮混蛋，把矛头指向革命左派队伍，把革命左派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妄图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拖垮革命左派队伍，以达到其混水摸鱼，破坏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应当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一种表现，这是严重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希望一切革命同志密切注意！在此，我们对那一小撮混蛋提出严重警告，你们不要自以为得计，别高兴得太早了。“三司”巍然不动！“三司”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与革命造反派战友实行大联合，团结大多数，向一切阶级敌人的顽固堡垒发动冲击、发动猛攻！“三司”越战越强，你们这一小撮企图搞垮“三司”的亡命之徒，终究要为革命群众所唾弃，终究要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所打倒。“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你们的结局！

驻沪联络站

据众多同学回忆：

江涛带着一捆《首都红卫兵》报到上海去卖，和张作光一块儿去的。三司上海联络站就这么慢慢搞起来了。驻上海联络站设在波兰领事馆。

“三司驻上海联络站”成立以后，普遍联系群众，广泛发动造反派，并于1966年11月初，召开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经验交流大会。随即，支持上海工人实现大联合。

当时，上海情况特殊，上海安亭事件是张春桥处理的，是毛主席、周总理责成他到上海处理的……事前，周总理交代张春桥，你到了上海找“首都三司”协助。

当时，首都三司已经接到中央文革通知，派车去了机场。“三司驻沪联络站”没有小轿车，他们开去的是一辆中吉普改装的宣传车。他们就是用这辆车送张春桥去安亭的。韩哲一没有同去。

在汽车上，江涛等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向张春桥作了全面汇报，对如何处理安亭事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下，张春桥心里有底了。

张春桥到了安亭后，坚决支持“工总司”。当时，与张春桥谈判的“工总司”首席代表是潘国平，张春桥口头答应了“工总司”提出的5项要求，并表示：只要你们回上海，明天下午我可以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5项要求。

13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签字同意“工总司”的5项要求：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去北京是革命行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在安亭，“工总司”分为两派。一派以王洪文、潘国平为首，支持张春桥，答应马上回上海；另一派则主张徒步北上，走到北京去。他们把张春桥所坐的那辆宣传车的喇叭都踏扁了。

这时，“工总司”徒步北上的一派，途经昆山时，推选出新的头目——上海中泥造纸厂（“文革”中改名为井冈山造纸厂）的副工长耿金章。耿金章率领他们抵达苏州，声称继续北上。

张春桥不得不去苏州，他要韩哲一、曹荻秋同行。

15日上午，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分头抵达苏州。

张春桥好不容易跟耿金章达成了类似于王洪文五点要求的协议，曹荻秋明确表示拒绝签字。最后，张春桥说：“你不签，我签！”

翌日，从北京传来毛泽东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最高指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就是说，毛泽东同意张春桥“先斩后奏”，跟王洪文、耿金章签订了两个五条协议（当时称“双五条”）。

驻西南联络站

温正树：西南联络站成立于1966年8月底，参加组建的人除我外，还有谭宝华、白洪生、董景深、陈银根、蒋光宇、翟玉生。西南联络站成立后的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揭开西南局阶级斗争的盖子。

成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也与北京情况差不多，工作队进驻学校后，也将不少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右派。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强烈。工作队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庇护下，就是不回校检查，不给群众平反，拒不销毁工作队整群众的黑材料。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斗争矛头就指向了西南局以李井泉书记为首的当权派。

当时“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等在锦江饭店门口静坐，要求李井泉等西南局领导人出来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接受群众批判。但是，他们静坐没有结果。李井泉等躲在锦江饭店就是不出来。

我们西南联络站成立后，针对李井泉等不见群众的情况，组织一部分人，进入锦江饭店，与李井泉进行谈话，希望他能出来与广大师生见面和对话。

李井泉从饭店出来后，保他的人不让他离开。有人还死抱着他的腰，不让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那人拨拉到一边，扶李井泉上了一辆大卡车……

后来把李井泉交给了“红成”。

后来得知，“红成”的人不是坚决批判西南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革命师生平反，而是向李井泉要钱要物，叫他在有关票据上签字。而且后来还把李井泉给放了。

不久，11月13日，李井泉还以“政委”名义被请去给“老产”（成都的保守组织“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或“老产”）作政治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组织人去冲了会场……

会后，成都的造反派立即进行了大辩论。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造反团”坚决支持地质东方红“11·13”行动，从“红卫兵成都部队”中分化出来，成为成都文革运动的中坚。在此之前成立的“成都产业工人造反团”尚未消亡。也就是说，此时的成都有存在着三股势力：红成、川大8·26、老产。

众所周知，在成都，以“川大8·26”为一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为另一派，“斗”得不亦乐乎。其实，开初，大家都算得是“造反派”。只是，“红成”为干部子弟主导。工作队批臭，他们得以平反，因此，他们不再前进了，变成了革命阻力。

“地质东方红”坚决支持“川大8·26”一派。

西南联络站干得另一件事是“保护彭德怀”。

驻渝联络总站

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与成都相似，重庆大学“八·一五”原来是造反派，后来蜕变为“红成”式队伍，而与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等争夺运动的领导权。1967年2月14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对“重大815总团一些人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痛斥：

一贯善于与重庆黑市委进行圆桌会谈的重大“八·一五”总团某些“领导”，最近更变本加厉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破坏大联合、大夺权，制造严重武斗事件，抄、查、砸、赶、抓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妄图以白色恐怖达到他们罪恶的目的。山城人民不怕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勇敢战斗，争取新的胜利。

以重大“八·一五”总团一些人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排斥革命的工农群众。他们荒谬绝伦地说：“工人的组织不纯”，“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因此，“权由我们替他们去夺。”于是，一月下旬，“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接管”了重庆党、政、财、文大权。随后，论功行赏，封官加爵，把他们看得中的人拉拢在一块，搞了个宗派小联合。他们搞的根本不是什么“大联合”，而是拉一批打一批的“小宗派”；根本不是什么“大夺权”，而是印章交接的“让权”。根本不是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而是圆桌会谈的“议会斗争”，根本不是彻底砸碎重庆黑市委，而是改良主义“和平过渡”，是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全盘照收，一仍旧章。……

广大山城革命造反派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及我司令部驻渝联络总站，川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坚决抵制了重大“八·一五”总团一些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同他们进行了斗争……

我司令部驻渝联络总站被监视起来，一些同志被他们蛮横斗打，总站与北京通讯联络甚难，就连派人回北京都有他们的人跟踪“护送”。许多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处于被斗、被打、被砸、被抓的“白色恐怖”之下。重大“八·一五”总团一些人已经堕落到充当黑市委新帮凶的地步。二月十二日大田湾发生的严重武斗事件就是一例。

八日，在排斥了重庆许多革命造反派的情况下，以重大“八·一五”总团一些人为核心的小宗派组织荒唐地宣布重庆临时最高权力机构“诞生”。企图借以压倒其它真正革命造反派。他们蒙蔽了广大群众，十二日在大田湾体育场开什么庆贺会。这样假联合，假夺权，迫害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大会不造反怎么行呢！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三司”联络总站、一司联络站³⁹，川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控制了主席台、广播室，造这个会的反。

重大“八·一五”一些人竟一手制造严重武斗事件。他们狂喊“‘三司’滚出去”，毒打工人和我司令部、首都一司、川大“八·二六”等战士。重大“八·一五”的一群流氓混蛋，竟残忍到抓着女同学的头发从广播室拖出去好远，两旁站满他们的人，边拖边拳打脚踢！那群暴徒连小红领巾都不放过。一个小女孩高喊“八·二六好得很！”他们就动手毒打，简直毫无人性！这和“12·4”工纠打人何其相似！重大“八·一五”的一小撮同“麻子兵”又有什么差别！……

发生事件的当天下午，我司令部驻渝总站战士和重庆革命造反派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斗志越战越强，队伍越来越大。他们昂首阔步地走着，他们走的是胜利的方向！

[注]麻子兵，重庆铁杆保皇派，专搞武斗。

《首都红卫兵》京外版

在北京，《首都红卫兵》还办有“中学版”，以“三司中学中专部”的名义出版。当时，编辑这份报纸的中学生叫郭险峰。

在大串联期间，为满足各地的需要，《首都红卫兵》报曾经将纸型寄往一些城市，在当地直接印刷，尽早出版发行。

我们还在邮局办了手续，读者可通过邮局，直接订阅《首都红卫兵》报。

在一些城市，还曾出版过《首都红卫兵》京外版。如上海版、长沙版、西安版、重庆版、西宁版、株洲版、长沙版、无锡版、常州版等。

³⁹此“一司联络站”非前文中的彼（李洪山等成立的，地下的）“一司联络站”。

但是，“京外版”的《首都红卫兵》，有些我知道，有些则不知道。它们都是三司外出串联的学生和《首都红卫兵》报编辑创办的。

庄一龙：我在上海主要搞了一个“《首都红卫兵》报上海版”，在《解放日报》社出版，发行量是我同解放日报社社长马达商量确定的，为5万份。后来我要求增加到10万份，马达不同意。开始第一期，整个报纸就我一个人。1967年元旦套红出版，从内容安排到排版，亲自写元旦社论。第三期以后，编辑工作就交由朱德瑜、潘人龙等负责，由他们长驻解放日报。

黄平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和《首都红卫兵》编辑部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到了湖南长沙，住在省招待所。长沙的冬天阴冷潮湿，树稍上挂着冰凌，屋里没有暖气，室内外一样冷。不久我就创办了《首都红卫兵》长沙分刊，撰写了发刊词和主要文章，交湖南日报社印刷。长沙分刊出了两期，我就返京了。尽管没出多少期，发行量也不太大，但在社会上确实产生了影响。读者来信，认为《发刊词》（主要是针对张平化）揭示了湖南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所刊文章也符合湖南的情况。1967年2月份，我回到西安，在西安又创办了《首都红卫兵》西安分刊。但是，只出了一期。

三司的对外活动

三司的对外活动，经中央安排，有多次活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1967年2月，我参与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情况。

从照片可见，参加这次接见的有康生、叶剑英。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由团长卡博、巴卢库率领。



陪同代表团步入欢迎会场（自左至右：卡博、康生、聂树人）



康生（左四）、叶剑英（左一）等陪同阿尔巴尼亚卡博（左三）、
巴卢库（左二）在人大会堂举行文化演出大会。我（左五）也陪同参加
(请注意，叶剑英左手缠着绷带)



我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右侧为翻译）

此外，三司还进行中日青年在联欢活动和其他活动。

第 34 章 三司的机构设置与活动

三司的领导机制

最高领导机构：各群众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总负责人：朱成昭。自成立后，再没有变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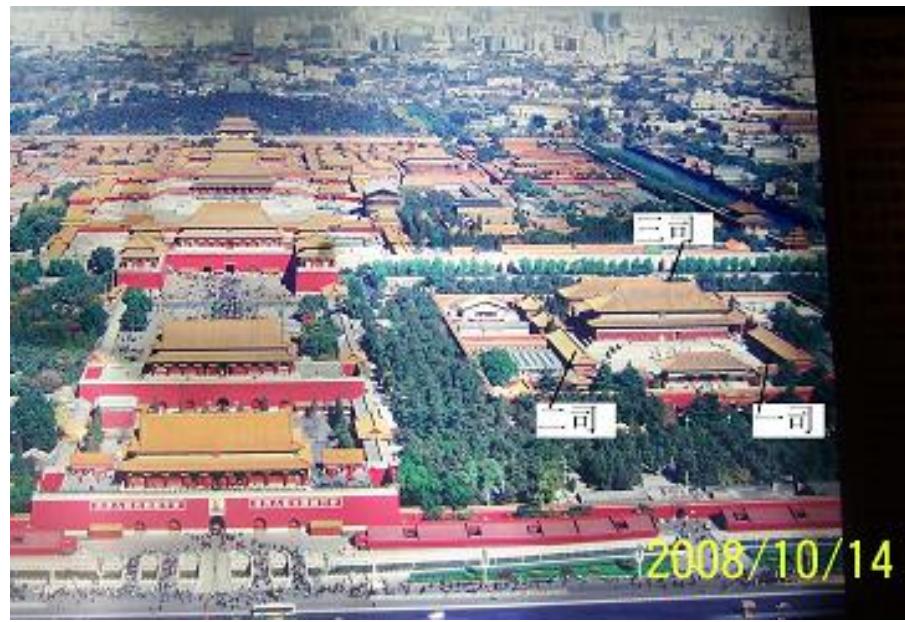
前线总指挥机构：核心组。成立时，要求由 16 个群众组织各派一名“核心组成员”组成。

核心组负责人：由“地质东方红”派驻代表担任。

上述工作人员，除我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外，其他人大都在半个月至一个月后离开，大串联去了。

三司办公地点的变迁

成立在先的一司和二司的办公地点都被安置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太庙两侧的东西殿内，一司在东，二司在西。



左为天安门，右为劳动人民文化宫

三个司令部的位置示意

（三司位于文化宫后，河边的三间游船管理室，
而一司和二司却位于太庙两侧的殿堂里）

三司自筹建及成立，就从未被传统势力正眼相看过。周总理的表态是，对待三个司令部要“一视同仁”。尽管如此，“三司”从来也没有取得过进驻正殿的资格。开始，办公地点被安排在文化宫最偏僻的后院护城河边，是三间废弃的游船管理室，外边还停着几艘游船！为了视野开阔，房子四围齐腰以上都镶嵌着玻璃。



三司最早的办公地点：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后部
(我左侧的房屋是后来修造的。当时是游船管理处)

在这里，我们一直工作到天气转冷的时候。

10月中旬~12月上旬：在劳动人民文宫内大殿东南侧的“神库”。



“神库”，三司在文化宫内的第二个办公地点（其前左侧是太庙大院）

工作人员睡觉地点，三个司令部倒都是平等的，被安排在太庙中。太庙大殿内铺满了草荐子，只要将被褥往草荐子上一铺就行了。我在这个大殿内住过三个月，直到三司迁离文化宫。



我在三司工作期间，就住在太庙中

12月上旬~12月中旬：在钢铁学院。

大约在12月初，由于“西纠”等连续打砸三司，为了安全，中央文革和北京卫戍区建议我们迁回学校，以便得到学校学生的保护。

12月中旬~1967年2月22日：在地质学院

开始时在钢铁学院。

但是，钢铁学院也不安全，几天后，董良翮等就带着十数个联动分子到钢铁学院捣乱。迫使我不得不决定，将三司机关迁入可以保证安全的地质学院。在12月17日出版的（第17号）《首都红卫兵》报第四版报脚有如下注记：本报地址：“北京地质学院教五楼314室电话：27461转485。”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后，三司即停止了活动。

第35章 红代会成立前后

中央的“大联合方针”

1967年1月26日下午3时至6时，在人民大会堂，陈伯达、江青等与首都大专院校代表进行座谈，就北京的大联合方针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要点如下：

陈伯达：今天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建议在北京搞一个红卫兵代表会议**，先搞北京的，然后搞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大联合的重要步骤，看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赞成不赞成？

轻工业学院学生：现在北航在搞，现在有些学院光注意搞大的，结果搞不起来，互相看不起。现在可以三司出头来搞，先可以把首都五十多个造反派联合起来。

矿院学生：要联合组织，不要搞几摊，三司起来搞一个组织，谁搞分裂另搞一个，就要砸。

陈伯达：不要砸，用说服的方法。

林学院（三司工作人员）：以前政法，清华各搞一摊……这样不好。（并谈了三司一些做法。）

陈伯达：代表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比较好。

江青：这是从群众中来的吗？有没有到战士中讨论过？

同学：三个司令部合起来，不要以战斗队名义，干脆来一个大联合。

(江青同志点了点头。)

林学院学生：我们呼吁戚本禹同志主持召开一个会议，主持联合问题。

戚本禹：这不成了包办代替了吗？

陈伯达：不能包办代替，现在有人诽谤我们，说我们是新的大工作组。

江青：聂元梓、蒯大富都应该表态吧！

聂元梓：(大意)我愿意大联合的，有的地方做得不够，有的作了，同学们不太了解，大联合要在思想完全一致的前提下大联合。

陈伯达：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

(接着，聂元梓谈到蒯大富的问题。)

江青：是他的错误，他应该改正。

(聂元梓谈了一下她们搞联合的情况，和准备工农兵学商联合。)

江青：商比较复杂一点，先搞工农兵学，工农兵学中先搞学生左派大联合。

陈伯达：红卫兵代表会这是第一步。

蒯大富：(讲了几句，原话没记)我有缺点，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面前把问题讲一下。

江青：大家对你意见不少了，你应该好好检查一下，大家不想把你一棒子打死，我们也是不愿意把你一棒子打死，想保你，还希望你继续战斗。

(蒯大富谈聂元梓的问题)

江青：你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蒯大富：我是有错误的，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下面准备写些东西，我对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打错了人……现在我觉得内外压力都很大……

陈伯达：我们是爱护你的，希望你成长，但要在原则的基础上，如果离开了原则，我们就成了无原则的人，中央文革就站不住脚了，原则就是最重要的了，要用原则来衡量每一个人，同时也衡量自己，离开了原则就危险……

三司在全国有很大威信，要爱护这个威信，不要随便丢掉这个威信……

江青：总之，不是为联合而联合，为夺权，为人民，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联合……目前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刚才交换意见，三个司令部在左派队伍基础上联合起来，为了斗争需要联合。三个司令部组成夺权委员会，是可以考虑的，不要使敌人觉得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不行了，而是为了更好地夺权，进行左派队伍的大联合。你们学生比较多，还有革命职工，你们不联合起来，工人，农民，士兵怎能联合起来？三司自成立以来名声很大，从成立以来大方向是对的，但组织路线很有问题，听说你们吸收了一些有名的演员，这些演员，他们是搞了一些和平演变的东西，他们是很复杂的。听说谢添也进去了……

陈伯达：自己不克服宗派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要下面克服是很困难的。刚才江青同志说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必须学习毛著，你们要站在最前面。现在要求下面的人不搞小团体主义，也要自己不搞小团体主义。

江青：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胜利了，现在能说你们是初步胜利了吗？比如“联动”，昨天你们打了一仗。“联动”，“红旗军”，还有一个“全国工农兵反帝反修造反团”也是反革命的，他们的袖标构图是“刘××万岁”，他们行动是有目标的，你们行动没有目的，他们上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反中央文革，下反三司，反你们，并且打进一些人来，而你们却联合不起来。

陈伯达：(高声讲道)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战胜敌人。

江青：有没有这个决心？

……我们对蒯大富忧虑，不要走向反面，犯错误要认识，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从认识到改正要有一个过程……

三个司令部协商的联合意见

三个司令部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通知

中央关于大联合的方针，经1月26日接见传达以后，我们立即行动。我派三司工作人员顾焕起与一司和二司造反联络站联系，首先在《首都红卫兵》报上，联合发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通知”。

重要通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革命造反派就是要夺权，为了达此目的就必须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否则夺权只能是句空话。形势迫切需要我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但是目前阻力还存在，一方面来自阶级敌人的挑拨、破坏，另一方面也来自我们革命队伍中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的存在，严重地阻碍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若不彻底纠正，则不可能担负起毛主席给予革命造反派的重大任务。

为此，我们必须彻底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高举古田会议精神的大旗，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为此，我们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特通知各所属单位务必组织红卫兵战士认真学习并讨论以下几篇毛主席著作：

- 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 二、《反对自由主义》
- 三、《整顿党的作风》
-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 五、《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见通知后，立即执行。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二司)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司)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载 1967 年 1 月 31 日《首都红卫兵》)

这是三个司令部“联合”的第一个成果。当时，那两个司令部的人表示，一切听从“三司”的意见，以“三司”的意见为他们的意见。

三个司令部协商的联合方针

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在我的主持下，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大联合方针很快就形成了。因为“二司造反联络站”主要就是“北航红旗”和“轻工红鹰”两家，势单力薄；一司因为鱼龙混杂，形不成决议，而处于瘫痪状态。所以，他们表示，大政方针听三司的。

三个司令部对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都没有意见，核心问题是报纸问题。

但是，这也不是问题。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以三司机关报《首都红卫兵》报作为“红代会”的机关报；红代会工作人员和《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成员也以三司为主，另外两家派几个人参加就行了。宣传组长和主编还是由我（聂树人）担任，不动。

“权贵任命”的无奈和后果

1967年2月初，中央决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由谢富治来抓。

据《首都红卫兵》报2月18日报导：

谢富治副总理亲自抓北京市的大联合，大夺权。预计先从大专院校中，选二十个单位充分酝酿，出五个单位形成全市红代会的筹委会，然后逐步扩大。

后来，他得知了我们的大联合筹备工作后，立即介入。他于1967年2月6日下午，接见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三个司令部联合，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指出，目前，在大联合中，学生各组织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大联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到了2月9日，他又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的大联合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他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

在2月18日前后的一天，戚本禹、谢富治接见红卫兵代表，在这次接见中，戚本禹说：即将成立的“红代会”，聂元梓为组长，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为副组长。

乍一听，我感到突然，怎么能这样任命？

——聂元梓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妈级的十二级干部，一个在既得利益上与陆平、张承先、王任重等绑在一起的“过了气”的造反派⁴⁰，正深陷在北大内斗的泥潭中，正不知如何解脱。她与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能有什么共同语言？

——蒯大富，这位到处钻营名利，盗窃三司“司令”还不满足，在1967年1~2月份和高级党校“红战团”、天津大学“八·三一”、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搞在一起，联合成立“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炮打周总理、康生，遭到中央文革严厉批评……

——韩爱晶，1966年10月初，通过“选举”才当上“北航红旗”第一把手。他历练不深，身上不免带有“保”气和“投机”气……红代会成立前，只有“轻工红鹰”跟着“北航红旗”走，两个组织构成了“二司联络站”。红代会成立后，韩爱晶不得不投靠名气比他大的蒯大富和聂元梓，和他们“同床异梦”。

——谭厚兰，一个处事比较谨慎的研究生，其主要活动在校内。去曲阜造反，遵从的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这位宁愿与地质学院的保皇派“斗批改兵团”共处于“一司”的女将，及其领导下的“师大井冈山”，在文革初期，与“地质东方红”既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明显的争斗。但是，二者之间的隔阂却是“深重”的：与“师大井冈山”大体同时成立的一个组织“师大峰火战斗大队”，早在1966年9月即加入了三司。

毛泽东的这个任命，使深陷北京市夺权泥潭、正争得面红耳赤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欣喜若狂。从此，三司这个山头他们可以踩在脚下，可以借助红代会这个舞台，发号施令。

这一任命，将几个月来形成的大好局面一扫而光。毛泽东的这个任命，打破了原有力量的均衡，导致了北京天、地两派的形成，为北京两大派的争斗埋下了祸根。

第四编 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校园文革：文革历程3

⁴⁰1966年5月25日，给陆平等贴大字报时，聂元梓是造反派。6月1日以后，当她穿上“黄马褂”后，她就成了连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都不敢得罪、都要讨好的最革命的干部。从此，她与张承先等绑在一起，并继承工作组的衣钵，成为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第 36 章 “四个山寨”对三司的践踏

北京文革的“斗争阶段”

北京的文革大联合，从时间上和内容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 年 8 月）：各群众组织成立阶段。

“地质东方红”从筹备之日起，即展开了同资反路线的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一进地质部”）。其他学校也是如此。

第二阶段（8 月下旬至 9 月底）：初步联合阶段。以北京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成立为标志的群众组织组合阶段。以造反派与保皇派为“混合组合”的，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以保皇派组织占绝对优势的组合为第二司令部；以造反派组织的联合为第三司令部。

在此阶段，造反派同资反路线展开殊死搏斗。三司以“地质东方红”为代表，与撤回各部委的工作队和“不走的工作队”（“伪文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二进地质部”最有代表性。

9 月下旬，“地质东方红”进行校内夺权斗争，开始掌控地质学院。

此时，“清华井冈山”⁴¹还没有出现；“北航红旗”才刚将工作队队长赵如璋揪回学校。韩爱晶，还只是北航的 1/30 多。

第三阶段（1966 年 10 月 6 日至 1966 年底），反攻阶段。“一司”、“二司”分化或重组，“三司”从“少数派”发展到“多数派”，进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派。

第四阶段（1967 年初到 1967 年 4 月），大联合阶段。在这个阶段，以 1967 年 2 月 22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成立为标志，三个司令部实现了表面上的大联合。

1967 年 4 月 20 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

“一个山头，四个山寨”

1967 年初，北京的人们以“一个山头，四个山寨”来形容北京高校间的争斗格局。

这里的“一个山头”是指以“地质东方红”为核心的“首都三司”这一大派——一个事实上的超级群众组织。这个“山头”内包含二三十座草根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到 1966 年底或 1967 年初，参加三司的草根组织大都成为自己院校的掌权派或者主流派。少数院校中，有两个组织“势均力敌”，却只有一派参加“三司”的，如北京钢铁学院，参加三司的是“革命造反公社”；北京医学院，参加三司的是“长征”战斗队；人民大学，参加三司的是“新人大公社”；民族学院，参加三司的是“东方红公社”等。以“地质东方红”为核心的“三司山头”，因为是“患难之交”，因此，即使三司不存在了，昔日的友情还在，凝聚力还在。

三司的影响力是巨大的。1967 年 2 月 22 日，周恩来总理在红代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是这样有区别地称呼三个司令部的：“庆贺你们北京的大专院校的三个司令部，也就是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的革命派，第三司令部的全体无

⁴¹ “井冈山红卫兵”并不是“清华井冈山”。

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在这里，周总理以“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词来称呼三司。读者不难从中辨明差别。

“四个山寨”指以“新北大公社”为主要组织的北京大学，以“清华井冈山”为主要组织的清华大学，以“北航红旗”为组织的北京航空学院，以“师大井冈山”为组织的北京师范大学。这四个院校基本上是“孤家寡人”，没有或极少有与之“合作”的院校。

三司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它“消失”三个多月后的1967年6月5日，谢富治还在与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座谈时指出：“要尊重三司，三司的旗帜举得最高。”

红代会成立，时过三个多月，谢富治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因为“四个山寨”都欲踏平三司。

蒯大富第二次“倒聂”

红代会成立后，我虽然不是红代会组长、副组长，但是，此前，我是三司核心组的负责人。以我在三司的声望，以我在北京的影响力，当时，完全可以与聂元梓、蒯大富一争高下。而我在红代会主管的《首都红卫兵》报，却有更大的影响力。

报纸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有实权。1966年11月，上海就发生过对《解放日报》的激烈争夺。1967年2月23日，为争夺《青海日报》，付出了170多人的生命代价（“2·23”事件）。

在蒯大富看来，红代会成立后，夺取并掌握《首都红卫兵》报的大权，应该很容易。作为红代会副组长的他，已经不是昔日需要“盗窃”司令头衔的窃贼了。

可是，他的老对手聂树人也今非昔比。因为，在筹备成立红代会时，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一致表示并特别决定：鉴于三司及《首都红卫兵》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红代会成立后，仍以《首都红卫兵》报作为红代会的机关报；原“三司”的编辑班子不动，一司和二司造反联络站只参加进来一两个人就行了；聂树人仍担任红代会的宣传组长兼红代会机关报《首都红卫兵》报的主编。

在《首都红卫兵》报成了红代会的机关报之后，它仍然保持着三司报纸的风格，不注重对头面人物（特别是聂元梓、蒯大富）的宣传，头版主要用于宣传党中央指示精神，其它版面大量报导的是平民百姓的活动情况。自红代会成立之日起至3月5日的十天时间里，聂元梓、蒯大富的大名还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这使名利心极强的他们很不舒服。因此，他们对我仇恨至极。

聂元梓、蒯大富等红代会的组长、副组长，可以“重组”红代会的其他各部门，但是，重组不了宣传部，更动不了《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况且，此时，红代会的五个组长之间的同床异梦、勾心斗角，导致他们既不能共同对我发号施令，也不能单独对我发号施令。

因此，聂元梓、蒯大富要“倒聂”了。这也是蒯大富的“第二次倒聂”。此时，蒯大富还秘密任命了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为未来红代会的“宣传组组长”，到宣传组工作，伺机取代聂树人。

因为从红代会内部撼不动我的宣传组长兼《首都红卫兵》报主编的职位，他们就向谢富治告我的黑状。

3月5日凌晨，在政协礼堂，经聂元梓起头：“对《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群众意见很大，希望中央领导能给予重视。”

由此，也可以看出，对我的指责，他们在此前就已经给谢富治打了招呼。

接下来的发言者是蒯大富。他没有聂元梓的含蓄，他直截了当地指责我在红代会工作中，独断专行，搞原三司的山头……此人说话带着浓厚的江苏口音，我听不大明白。但是，我立即意会到，他这是在告我的黑状。

红代会才成立十天，我就是天生坏种，也得有个犯错误的时间。这一点，我想谢富治不能不知道。

形势逼使我必须进行“自我辩解”。

“要说我独断专行，搞原三司的山头，我不能接受。我的看法是，红代会是我们大家为之奋斗好几个月的产物，是高校学生大联合的结晶。我们就是要搞大联合，不要搞小联合。可是，在我们红代会领导层中，就是有人要搞小联合，不搞大联合。我在大联合问题上的观点是，在一个学校里，不论有几派，不论有多少个群众组织，只要人家申请，都可以参加红代会，而不能由个别人说了算，说这个组织是革命的，那个组织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反动的，不让人家参加红代会。如果这样，怎能体现红代会大联合性质呢？我在宣传组的工作中坚持的就是这一原则；在《首都红卫兵》报上贯彻的就是这一观点。如果认为这是搞分裂，搞宗派，是独断专行，那么，将一些群众组织排斥在红代会之外，拉一派打一派，搞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聂元梓同志、蒯大富同志真心要搞大联合，为什么却对其它一些红卫兵组织要求加入红代会推三阻四呢？”

我指出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当时，北大、清华等院校内，都有与“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对立的群众组织。

“对于他们的这种主张和作法，我不仅不能同意，还与他们进行了斗争。在我的坚持下，红代会的《宣言》中虽然被他们强行去掉了‘群众组织不论大小，都可以参加红代会’的话，但是，也删掉了他们‘取缔、打击反动组织’这类言论。请问聂元梓、蒯大富同志，你们有什么理由要竭力阻挠你们学校其它学生组织参加红代会呢？在红代会拉一派打一派，搞宗派、搞分裂的，究竟是谁！”

我越说越激动。

戚本禹批评我：“不要乱上纲！”

我继续说：“《首都红卫兵》作为红代会的机关报，它的使命首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它不是某一个组织、某一派，甚或某一个人的小报，它不应该受个人或某个组织的指挥和左右。我在红代会办一天报，就要坚持这个方针。”

作为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当然考虑得更为深远一些。他需要北京的稳定，需要北京的秩序，不希望北京市派性加剧，更不希望派系斗争升级。在我发言之后，他一锤定音：

“不要争了！我看，红代会的宣传组长还是由聂树人来当！”

蒯大富、聂元梓与我的这次较量，终于有了结果！

因为谢富治说话的口气强硬，聂元梓、蒯大富等都不说话了。

戚本禹也没有说话。

这样，我的这个宣传组长就盖上了“御封”的大印，就有了与“老佛爷”和“蒯司令”直接抗衡的实力和资格。第一，我有“民选”（民主推荐）的资格，时髦些说，有群众基础；第二，我和他们一样，有了“钦定”的身份——不通过谢富治，即便是作为组长副组长的“老佛爷”和“蒯司令”等，也是不能免去我的“宣传组长”职务的。

我的这一地位和身份，再加上我主编《首都红卫兵》报的实权，就成了“老佛爷”和“蒯司令”等控制红代会的最大障碍，成为他们在红代会内部不可逾越的大山！只要我继续掌握宣传部和《首都红卫兵》报，他们那些五七八糟的主张就难以贯彻，他们的风头就出不成！

这次较量虽然以我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在我的心里，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聂、蒯们，为着自己的权欲，一定还会与我争斗。

别了，红代会

我在1967年3月下旬不辞而别，离开了红代会，回到了地质学院。

没有人赶我走，因为我的红代会宣传组长的地位经过了“御封”！要赶我出红代会，不容易。但是，我没有资格参加红代会最高决策层会议，在许多情况下，也没有资格参加中央对红代会最高领导层的接见。上级对下级的处置（包括刁难、穿小鞋、打击陷害之类）无论正确与否，都可以以组织的名义，都贴着名正言顺的标签；而下级对上级的任何不恭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蒯大富、聂元梓等，必然还会对我捏造出新的罪名来；我虽然有“御封”的身份，但是，也招不住他们轮番在中央首长面前告我的黑状。说不定哪一天我身上的“黄马褂”会被人脱去。

如果我想在红代会干下去，我就得学会当奴才，听聂元梓和蒯大富他们的。但是，这不是我的性格。况且，我也绝不会背叛“三司”众多朋友和战友。

与其被人赶走，还不如早日离开为上。

我3月中旬离开红代会。随我一起，从三司到红代会工作的编辑们，也先后离开了红代会。

我离开红代会，意味着北京两派的正式决裂，预示着“一个山头”与“四个”山寨战斗的开始。

聂元梓、蒯大富控制“红代会”

将红代会强行迁入北京大学

“三个”或“四个山寨”的寨主们，在自己焦头烂额之际，突然被冠以红代会组长、副组长的桂冠，真使他们欣喜若狂。

可是，我在红代会时，因为我的宣传组长的头衔他们难以拿掉，宣传组的人数又较多，他们“文革痞子”的面目还不敢过于暴露。

我离开红代会后，聂元梓、蒯大富就完全控制了红代会。1967年4月，他们没有和其他副组长（如王大宾）商量，就毫无道理地将红代会机关迁往北京大学。这样，红代会就成了聂元梓-蒯大富的“御用工具”。

他们立即爬上原三司的山头，千方百计挤走原三司的工作人员，由他们派进的人取而代之。然后，以红代会名义，胡作非为。

操控《首都红卫兵》报

我离开红代会后，《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立即大换血，报纸却从此一蹶不振。据地质学院《动态报》第50期（3月28日）报导：

红代会《首都红卫兵》报原定三月份出八期，但仅出了四期就决定三月份不出了。据说，由于出错和卖不出去，前三期共给国家浪费近一万元资金。

1967年4月25日，地院《东方红报》就发动了对《首都红卫兵》报的讨伐：

《首都红卫兵》报第十期出了一篇题为《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的社论，然而却根本没有一点反无政府主义的意思.....

请看，他们说，有些学校联合几个学校去打击另一个或几个学校，或者一个学校分成几派互相打，或者这个单位打那个单位.....难道这就叫无政府主义吗？.....

社论闭口不谈纪律的阶级性，却毫无意义地大谈什么“统一的意志”“铁的纪律”，请问，难道革命派冲破修正主义的纪律，起来造一小撮党内定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自己解放自己，这也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没有统一的意志和铁的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吗？.....

阻碍革命三结合的真正阻力是什么？《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指出：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然而，《首都红卫兵》报第十一期的编辑部文章《一场触及灵魂的大批判》却公然大唱反调，声称“在干部问题上采取‘请’出来，‘保’出来的改良主义态度是当前阻碍干部亮相的真正阻力。”真是胡说八道.....

十二、十三期合刊上《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完全是肆意歪曲历史的产物，它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它的逻辑混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文中说：各大专院校几乎都出现了几个组织，不同组织一成立，就立刻表明了他们各自的立场，各自执行的路线。这一段无疑是正确的了。但是过了一会，它又接着写到：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决心把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于是乎，“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相继成立。”

看，多么轻松啊！简直比排队还容易。在这里，他们显然否定了前面说的一段话：不同组织一成立，就表明了他们各自的立场，各自执行的路线。难道二司也是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成立的吗？.....

尽管第二司令部有两万多人，第三司令部仅四千多人。但是第二司令部是保守派的小凑合，第三司令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它很快发展到了五万多人。

首都红卫兵史，正是第三司令部及其它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各种保守势力斗争的历史，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历史。这难道不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吗？.....你们把一个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二司说成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二司，这不是公开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又是什么呢？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年，那生死搏斗的日子还记忆犹新，首都红卫兵的斗争史就被《首都红卫兵》的编辑们篡改得不成样子了，那末，几年，几十年之后，又将如何呢？.....

《首都红卫兵》报从第十一期起改换了报头，原来的仿毛主席手写体改成了等线印刷体。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微妙变化。许多人议论纷纷，苦思冥想，悟不出其中的道理，联系某些人把原三司《首都红卫兵》报编辑全部排挤出来，及一些自称“正统派”的混蛋企图否定三司的大方向，咒骂三司是“靠打、砸、抢起家的”，不是十分令人深思的吗？

为阻止本校“对立面”加入，红代会“关门”

在组织发展上，他们控制的红代会，从成立至1967年6月，没有发展一个组织入会。聂、蒯对红代会“关门”的根本用意，在于限制本校“对立面”加入了红代会。

挑起武斗，欲消灭对立面

红代会成立前后，北京高校里武斗时有发生。据地质学院《动态报》（4月28日）报导：

初步调查，（目前）北京武斗的院校：轻工业学院、经济学院、化纤学院、工艺美术学院、机械学院、工业学院、民族学院、铁道学院、外贸学院、外语学院、石油学院、人民大学、电影学院、财金学院、科技大学、气专、北二医、河北北师、清华大学、化工学院、高等军事学院、解放军总医院、钢铁学院等。

北京将近一半的院校发生或曾经发生武斗。当时，武斗的规模有大有小，但是，用的是拳头，或是冷兵器。

按说，这应该是红代会成立后，首先应关注的问题。但是，在聂、蒯的控制下，红代会对此“一点儿也不关心”。不关心的原因在于，他们自己就是武斗的罪魁。他们都想通过武斗，把对立面吃掉。

插手外地运动

在1967年4月8日以前，聂元梓、蒯大富就盗用红代会的名义，派人在全国活动。

在“地质东方红”关于四川问题的声明中指出：

据悉，最近有人盗用“红代会代表”名义在蓉城招摇撞骗，破坏红代会的名誉，破坏蓉城文化大革命，希望蓉城广大革命派提高警惕，谨防政治扒手。同时，严重警告那些打着红代会招牌干尽坏事的家伙，如果你们坚持错误，继续招摇撞骗，为非作歹，那么，一经查获，就决不轻饶。不可谓言之不预也。

（据《东方红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

所谓“红代会代表”，指的就是聂元梓等“以红代会名义”派出的人员。他们与“红成”勾勾搭搭，与老保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东方红”的声明中有此一指。

聂元梓当了红代会组长，可以不经红代会会议决定，就“以红代会名义”行事，真是荒唐！这也是“地质东方红”与“新北大公社”从4月8日始，发生大规模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聂氏红代会”还于1967年5月4日发表“红代会关于河南的声明”、“蒯大富给焦守凤的信”。1967年5月8日“红代会关于山东的声明”及“关于成都问题的声明”等，都是聂元梓、蒯大富不顾自家后院起火，背着中央文革和红代会其它副组长，插手外地运动的铁证。

制造“左派分化论”

“左派分化论”，看到了问题，却定错了方位。不是“左派分化”，而是“造反派分化”。将自己视为“左派”，而将“分化”出去的人视为“右派”，只能使斗争升级，引发武斗。

5月7日，谢富治在接见红代会各校代表时指出，当前要在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全中进行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提出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分化论”，“新保皇派论”是错误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失败，竭力反抗，当前主要是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挑起武斗。

9月16日，周总理在接见“天派”的会议上指出：“首都红代会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⁴²

由此也可以看出，任命聂元梓、蒯大富等为红代会组长、副组长，是何等错误。

第37章 天、地两派的“肉搏”

“民族宫事件”真相

“民族宫事件”真相：聂、孙的说法

1967年4月13日《新北大》报刊登《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洪涛，地院东方红等一小撮所制造的“四·八”和“四·一一”事件真相》的文章。该文为聂元梓、孙蓬一的杰作。现将文章前一部分摘要刊登如下：

以洪涛、刘郢、韩戈鲁为首的中央统战民委系统红色联络站（现改名为“中央统战民委系统联合委员会”），继四月五日破坏了我“彻底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展览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之后，四月八日至四月九日凌晨，勾结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在民族文化宫和民委机关大楼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他们阴谋孤立新北大，大肆诬蔑、诽谤新北大，**攻击聂元梓同志，把矛头指向红代会**，其用心何其毒也！……

四月八日上午九点半，经民族文化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东方红公社和警卫排商定，允许双方带自己的人进馆参观，进行批判。我方二·七兵团、民院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等革命组织约70—80人，按规定进入民族宫。但民族宫保皇组织东方红公社（夺权单位）单方面撕毁协议，拒不开门。经几次交涉无效，我们迫不得已锯断了反锁住综合馆大门的铁锁。然后，我们秩序井然，高声朗读主席语录进入展览馆。约十一点钟，他们调来了民院东方红、民族歌舞团八·八造反者和民研所千钧棒战斗兵团、地院东方红等组织约200—300人，借“保护现场”、“你们是非法进来的，我们有权保护国家财产”、“你们是‘保’字号的，无权批判、无权参观”等等荒谬透顶的“理由”，开始围攻我们……

他们人数剧增至……约三千余人。

为了自卫，我们也有一些兄弟单位的革命组织前来支持，先后有民院抗大公社、石油大庆公社、北外红旗大队、化工学院一月风暴按十六条革命战斗队、教育部北京公社等约一千余人……**聂元梓、蒯大富能“代表”红代会？**

《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洪涛，地院东方红等一小撮所制造的“四·八”和“四·一一”事件真相》的文章说：

这时恰巧听到红代会由聂元梓、蒯大富商量起草，并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两项命令，地院负责人暴跳如雷，说：“两项命令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谈判又破裂了。

附：

红代会两项命令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

（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持材料者手中。

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红代会委员会聂元梓，蒯大富
4月8日下午6点

⁴²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310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地院东方红战士大叫大嚷：“红代会两项命令是阴谋！”……“聂元梓、蒯大富能代表中央文革？他们算老几！”地院东方红一人还声称：“我们可以退出红代会！”还有人竟当场撕毁红代会命令。地院东方红当即发表声明说：“这两项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后又经修改，凑成抗拒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抗拒红代会命令的所谓“严正声明”：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严正声明

于四月八日下午六点，红代会委员会聂元梓、蒯大富发表所谓两项命令，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特发表严正声明：

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念，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

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

三、由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完全责任。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晚九点

.....
四月八日晚十点半，他们割断了我对外的电话线后，开始砸门、打窗、冲楼.....

直到凌晨五、六点，他们各组织才陆续撤出。地院东方红是七点才撤出的。民院东方红撤出时已经九点半了.....

一些组织，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红代会，指向新北大，指向聂元梓同志，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这一小撮人，充当了最大的摘桃派的可耻打手，决没有好下场！

“民族宫事件”真相：“地质东方红”的说法

民族宫事件又称为“4·8事件”。

1967年4月11日出版的《东方红报》，对“民族宫事件”的报导如下：

四月八号，我东方红战士与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统战部红色联络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政法公社、农机、林院、工大、邮电东方红等单位的亲密战友在民族文化宫共同战斗，狠狠地痛击了一小撮保皇派的猖狂挑衅，争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组织，取得了辉煌胜利。⁴³

《大事记》是这样记述这个过程的：

4月8日，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在批判民族文化宫展览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上，红代会所属的某些单位发生了冲突，导致武斗。

民族宫作为民委系统的一个独立单位，文革初期，在批判资反路线时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造反派，名叫“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公社”，势力较大，是民族文化宫的掌权单位；另一派叫“民族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是保守组织。在社会上，这两派分属于不同的派别。“民族宫东方红公社”与我“地质东方红”保持一致，在1967年2月，还参加了“地质东方红公社”成立半年大会。而“民族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却与统战、民委系统的保守势力，如民院“抗大”公社，“民委工农兵革命造反队”等打得火热。聂元梓在2月15日拼凑了个“新北大公社”后，它又立即投靠了聂元梓。

民族宫的《民族工作展览》开馆以来的七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多万人参观，其中包括数以百计的国际友人。

⁴³ 《东方红报》，1967年4月11。

1967年2月底，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从农业展览批判入手，对谭震林展开声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此后，北京掀起一股查抄展览馆之风。

“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刚刚成立的组织，依附于“北大校文革”。它没有反工作队的经历，不知道什么是造反，更不知道如何识别造反派组织。却打着造反的旗号，到处乱打乱撞。

4月初，披着黄马褂的聂元梓，不顾校内的分裂、争斗，却想仿照北京师范大学，造展览会的反，以“立新功”。她派了50多人的队伍到文化宫，与“民族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一起，说民族宫展览有问题，要进馆造反，要将部分展览材料（好像是批判李维汉修正主义民族工作路线的材料）拿走。此时，已经掌权的“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公社”请示上级，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民族宫展览”先不要动，待后处理。而且说，对“批判展览”已有统一安排。⁴⁴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拒绝他们进馆，他们就“锯断了反锁住综合馆大门的铁锁。然后……进入展览馆”，从而，挑起了事端。

“地质东方红”总部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支持“民族宫东方红公社”，并派人前往，将进入展览馆的“新北大公社”人员统统赶了出去。中间，发生了撕扯，但是，没有发生武斗。

“新北大公社”不甘示弱，立即调自己的人和“民族学院抗大公社”的人前往。随着事态的发展，双方调来的人越来越多。地质学院调来的人，主要是原三司院校的人。

痛斥聂、蒯控制红代会，是争斗焦点之一

正如孙蓬一在4月12日夜讲话中所说，“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民族宫事件”成为“地派”打击聂、蒯控制红代会的肇始。

聂元梓当了红代会的组长，蒯大富当了副组长，就摆出“痞子”的架势，以为红代会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就可以代表红代会向全国发号施令，就可以压制其它学校。可是，“地质东方红”也是红代会一员，王大宾也是副组长。正副组长共有五名，两名正副组长就可以以红代会名义发布“命令”？另外的副组长呢？

因此，“地质东方红”当众撕毁聂元梓、蒯大富的“命令”，而且立即针锋相对，发表了自己的“严正声明”。

戚本禹“同意”聂、蒯“命令”是强加于人

聂元梓、蒯大富说他们的“两项命令”“经戚本禹同志同意”，完全是拉大旗作虎皮。事实是，他们两人私下里起草了这两项“命令”，因为并没有在红代会委员会上讨论过，不免心虚。因此，充其量，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管你戚本禹同意不同意，他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在《聂元

⁴⁴1967年8月8日，《东方红报》报导：“在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民族工作展览’已冲破层层阻力，于八月日正式开馆供批判。”

梓回忆录》中，一忽儿说戚本禹是地派的后台，一忽儿又说戚本禹支持他们。戚本禹究竟是谁家的后台？

“4·11事件”

“王大宾被扣”的消息传回了地院

在“地质东方红”眼里，“4·8事件”只是一个小事件，作战部就有决策权。刚主持工作不久的王大宾，既没有决策，更不会参与。

“4·8事件”发生后，4月9日，王大宾与唐咸正、陈宝堂去北大会见聂元梓，说明真相。双方以“误会”平息了事端。

不想，聂元梓口头上答应了，但却在校园里展出“4·8事件”中被撕破的衣服，丑化、诬蔑“地质东方红暴徒”，极力扩大事态。

为澄清事实，“地质东方红”广播台“高旗无畏”战斗队开着宣传车进入北大，以翔实的事实予以反驳，并说明真相。结果，广播车被砸，人被打伤。

为不使事态扩大，4月11日下午，王大宾与陈宝堂等，再次去北大，想和聂元梓商谈平息这件事。他们不仅没有找到聂元梓，还被“新北大”学生包围了起来。陈宝堂冲出包围圈，回到学校，将“王大宾被扣”的消息传回了学校。

此事激怒了“地质东方红”和原“三司”院校。地质、农大、农机、政法、邮电、北工大、林学院等原“三司”院校派出宣传车和部分学生去北大。聂元梓自知理亏，关上大门。陈宝堂等翻院墙进入，打开东门，人们一涌而入。北大多数师生欢迎我们，而“新北大公社”的一些人却指责“地质东方红”滋事，不仅打“地质东方红”的人，还去公安部告状。

事态进一步扩大……

《大事记》是这样记述这个过程的：

4月11日，民族宫事件继续发展。

“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宣传车去北大。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煽动同学砸了宣传车，打伤了前去宣传的人员，发生了痛心的“4·11”流血事件。

《新北大》报的编造的“事件真相”的后半部分

下面，转载1967年4月13日《新北大》报上的“事件真相”的后半部分（摘要）：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在其幕后狗头军师×××、×××、洪涛、刘郢等人的精心策划和鼓动下，破天荒地在北大炮制了严重的“四·一·一”武斗事件，向我们新北大年轻的红色政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四·一·一”事件是“四·八”武斗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混蛋在“四·八”事件中干了许多坏事，不仅毫不悔悟，反而借口要与新北大公社辩论，于四月十一日下午六点半，纠集了六辆宣传车，气势汹汹地闯入我校，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攻击北大革命师生.....还利用高音喇叭大骂新北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大肆诬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说：“北大是保皇派，保彭真、保陆平、保工作组、保.....”“北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干了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有的人狂妄至极，公然煽动：“解散红代会，恢复三司”，“北大靠边站”，“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他们把我们的忠言当成耳边风，把我们的退让看成软弱，极力把事态扩大，多次动手打人，疯狂地向新北大年轻的红色政权进攻.....

实践证明：地院东方红等一小撮混蛋已经走向自己的反面，充当了“摘桃派”的可耻的打手！……

听听他们的口号：“打倒聂元梓！”“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聂元梓无权进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等，这决不是聂元梓一个人的问题，这是阶级与阶级的搏斗，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一小撮坏蛋及其幕后策划者对新北大公社进行攻击和污蔑，罪责难逃！

附带说明，“×××、×××、洪涛、刘郢等人”成了“地质东方红”的“幕后狗头军师”。这是聂元梓、孙蓬一攻击对手时，经常使用的方法。“×××、×××、洪涛、刘郢等人”为“地质东方红”出谋划策，他们够格吗？事实上，“地质东方红”的人，包括主要负责人王大宾，根本就不认识“×××、×××、洪涛、刘郢等人”。为了声讨聂元梓，进入北大的原三司学生还在北大操场召开了大会，控诉“新北大公社”毒打原三司战士的暴行。

谢富治等对事件的表态

4月12日下午七点半，传来了谢富治、傅崇碧的“紧急通知”。据《新北大》报导：

中央文革紧急通知

四月十二日晚谢富治，傅崇碧同志派代表来我校传达经中央文革批准的紧急通知如下：

革命的同志，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是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派来的，现在宣布一个经过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的，由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签署的紧急通知。全文如下：

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新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十一日夜间和十二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到自己的学校。

谢富治 傅崇碧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下午七时半

聂元梓及新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赶快借坡下驴，也发表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声明，对中央文革的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并坚决执行”。

谢富治明知聂元梓和孙蓬一的矛头是对着他的，但是，他作为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又不能不出面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他不能指责聂元梓，也不能指责“地质东方红”。他只能说：“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新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只能说：“十一日夜间和十二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

这无异于承认，地质和北大是有争论的。

“原三司”院校对聂元梓、蒯大富等独霸红代会的不满，原三司造反派对以聂元梓为首的保皇派对北京市造反成果的篡夺不满，这才是天、地两派争斗的实质。因此，地派院校学生冲入北大，向聂元梓、蒯大富，特别是向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天经地义。

地派院校唯一的错误是“冲入北大”，打到人家家里去了。

可是，不这样做，又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愿？

在“4·8事件”、“4·11事件”中，“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压根儿就没有派人参加地派的行动。谢富治出于“反聂元梓”的需要，而将师大和清华也拉进了“地派阵营”。几十年以后的作者们，依此为据，说谭厚兰是“地派女杰”，说“清华井冈山”（还有“北航红旗”）在此次事件中支持

地质东方红，这是不正确的。4月8日，“红代会两项命令”就是蒯大富和聂元梓共同搞的。

孙蓬一要“揪摘桃派”

据《大事记》：

4月12日，在北京的许多革命造反派批评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错误时刻，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恼羞成怒，当夜，他召集万人大会，大放厥词，公然把中央文革分成两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部，煽动几千人炮打谢富治，攻击谢副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并连夜贴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

孙蓬一还错误地提出了“揪摘桃派”论。同一时期，他们还提出“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十七年掌权经验不能用了”等错误理论。

下面，将孙蓬一在1967年4月12日夜的讲话摘要引述如下，请读者鉴别。

.....就是他们那一小撮头目，以朱成昭为首的支持我们北大的井冈山，北大的红联军。井冈山为什么能够加入三司，主要的责任就在他们身上。我们说，他们不仅没有支持我们的革命斗争，不仅没有帮我们的忙，而且是帮了我们敌人的忙，帮了我们对手的忙.....他们迟迟不肯把臭名远扬的一小撮反动头头所控制的井冈山开除出三司去。以至最后经过我们坚决的斗争，经过中央文革的批评，他们才不得已做出一个开除的决定。朱成昭名义上现在是下台了，朱成昭的势力还在。我们有理由怀疑地质学院东方红，你们究竟在肃清朱成昭的影响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

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所谓左派内部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鼓掌）这一场斗争的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也是象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一样，就是围绕着一个政权的问题。（对！热烈的长时间鼓掌）.....

如果说，在昨天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那么到了今天，那一小撮人的心是路人皆知的了.....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对！鼓掌）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当着党中央提出来，现在是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当着党中央提出，“小分裂犯大错误，大分裂犯罪”的时候，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就不惜来破坏大联合。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搞垮红代会，独揽红代会的大权；二、搞垮即将诞生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高呼口号）他们已公开提出口号来了，他们的矛头，已不仅仅是指向聂元梓，也不是仅仅指向我们新北大的革命同志，完全有理由可讲，他们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

他们以攻击聂元梓为借口，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新北大滚出红代会”，要“聂元梓滚出红代会”，“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的核心小组必须彻底改组”，要换所谓“老三司”，说“聂元梓凭什么当了红代会核心小组的组长”，“我们不信任你，到底是谁保你的驾，”要揪出聂元梓的后台。（全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唱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同志们，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外面造成一种虚假的现象，似乎北大很孤立，似乎很多单位在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假象！我们相信，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朋友遍天下.....目前在某个问题上，跟我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还是我们的战友，这里，我再一次表示我的看法，像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应当和他们一起战斗！（鼓掌，呼口号）我们完全相信，尽管目前存在着某些分歧，存在着某种误会，但是大家将会很快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将把我们几个单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鼓掌）.....

今天据说在地院聚集了一万多人开了所谓“誓师大会”，继续发动和挑动对新北大的进攻，我们怕不怕？（不怕！！！）对，在我们无产阶级造反派面前就没有一个“怕”字，我们可以奉告这样一些人们，的确，从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一天也不准备打，一次也不准备打，但是你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地奉陪到底！（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长时间高呼口号。）

（1967年4月13日《新北大》）

在《新北大》报上刊登的孙蓬一的讲话中，“揪摘桃派”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1967年4月13日《新北大》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揪出摘桃派》，对“摘桃派”为何人，进行了解释。摘要如下：

这场斗争决不单纯是左派内部的矛盾，也决不是把矛盾“人为地扩大”，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现在，北京市存在着一个最大的摘桃派。这个摘桃派不是学校，而是某些坐在屋子里打如意算盘的人。地院东方红等一小撮人只不过是充当了他们的打手而已。这个摘桃派专门挑拨离间，制造纠纷，拉拉扯扯，把手伸得长长的，他们处心积虑要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四月八日到十一日的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信号。……

既然存在着摘桃派，这场斗争就不可避免，斗争的结局也决不会以摘桃派的意志为转移。

谢富治不听聂元的“辩解”

4月13日，对谢富治在解决北大和地质矛盾的会议上的表现，《聂元梓回忆录》是这样说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实际在午饭后），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一些高校开会，说是要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我、孙蓬一、动态组长胡宗式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谢富治说：“你们北大和地质学院‘东方红’的话我不听，听听其它学校的意见。”这句话貌似公允，实际上一屁股就坐到地质的一边。因为来北大闹事的是六个院校，地质学院“东方红”不说话还有五家。这样会场上一边倒地批判北大，我实在忍不住了，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他大手一挥，“你不要讲，我不听。”这样在整个解决两校矛盾的会议上，我们不能发一言。我们走出会场后，地质学院的二十多名学生追上来，拦住我们，对我们谩骂。下午我在小范围讲了，谢富治是和王、关、戚一伙的。

据《大事记》：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央首长的极大关注。伯达、康生、江青、谢副总理五次召见各组织负责人进行座谈，解决分歧，端正了斗争大方向。首长严厉地批评了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的政治错误，并要聂元梓同志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地派：4万多人的大批判会

4月22日，离“4·11事件”十一天，地派4万多人在地质学院集结，召开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中的反动路线。

《东方红报》对此大会加以报导，其题目是《同仇敌忾，打倒刘、邓、陶——一百三十多个单位、四万余名代表集会，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中的反动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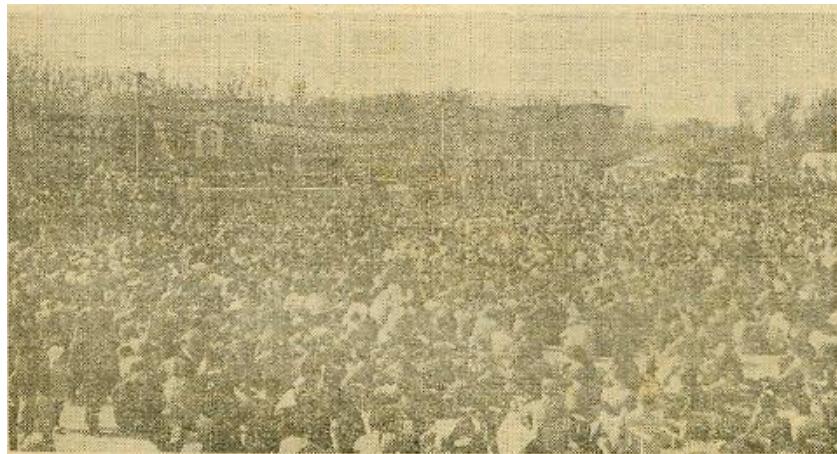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由统战、民委系统红色联络站，民院东方红以及学部红卫兵联队、地质东方红等一百三十多个单位组织的彻底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我院胜利召开！……

会议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刘春、刘述周等被揪出来示众。统战民委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在发言中以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愤怒揭发和控诉了刘少奇、邓小平及统战民委系统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民族工作中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地质东方红及其它单位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他们强调指出：民族工作展览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

参加今天大会的有邮电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林院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七机部916……等一百三十多个单位的革命战友共计四万余人。

这次大会给了那些妄图阻挠和破坏大会的小丑们一记强有力的响亮的耳光！



1967年4月22日下午，在地院大操场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图为大会一角。

在北大，是难以召开如此规模的大会的，足见天、地两派的人心所向。此后，《东方红报》对“新北大”和聂元梓的批判就转入低潮。

“4·11事件”后的北大

孙蓬一被迫“检查”

事实上，北大的问题聂元梓首先要负责任，孙蓬一只是聂元梓的一杆枪。孙蓬一在“4·8”、“4·11”事件中的表演激怒了北大师生，大家群起要孙蓬一作检查。中央文革也要求北大整三天风。

迫于师生的压力，孙蓬一作了“十分钟”的检查。他把煽动群众炮打谢富治，影射中央文革小组的严重立场问题，归结到是“误会”，“发牢骚”等，显然是“文过饰非”。

▲据地质学院《动态报》（4月19日）报导：

北大的整风——光打雷，不下雨，敦促校文革表态（03643郭××，4月19日）：

1、中央文革关于整风的指示已传达了三天，我校校文革仍无行动。究竟我校打算不打算整风？

2、是否准备向全体革命师生动员一次，明确整风重点，目的，要求？……

3、我校要整风，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孙蓬一要不要第一个带头整？

4、孙蓬一对严重的政治错误究竟需要不需要深刻检查？前两天十分钟的“检查”就算通过了吗？还打算文过饰非到什么时候？

5、孙蓬一4月12日、4月14日对形势的分析，是否代表校文革？他对形势估计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为什么还不消毒、肃清恶劣影响？

新北大形势大好，校内对孙蓬一的大毒草不再是一片喝彩声，不少新北大的同学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责成孙向北大、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做公开检查。

▲据地质学院《动态报》（4月22日）报导：

0363北京公社一同学讲，在北大必须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聂元梓不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就要抵制，就要造反。又说，孙蓬一的检查是文过饰非，而把他们煽动群众炮打谢富治，影射中央文革小组的严重立场问题，归结到是“误会”，“发牢骚”等，是根本没有触及灵魂的。

▲据地质学院《动态报》（4月28日）报导：

北大：（4月）27日晚，北大北京公社、0363等57个单位发起了整风串联辩论会。主要是围绕“在北大如何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进行辩论。一派认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北大就是树立聂元梓的权威，如果分开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以0363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如果把聂元梓和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这完全是反动的论调。并为到现在还有这种把运动初期的保皇派论调搬上台来，感到十分遗憾。会议结束时，徐运朴同志讲了话。他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检验，如果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有权威，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要坚决反对……我和孙蓬一的分歧，这不是一般的分歧，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在我们内部的反映。这次整风，必须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这个调子上来。例如，炮打谢副总理，影射中央文革，难道这不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吗？难道像孙蓬一检查的那样，是“误会”、“发牢骚”吗？在炮打谢副总理的问题上，以及在外面，我们实际上是支持了一些保字号的组织，这是在灭造反派的志气，长保皇派的威风……

事实上，孙蓬一在台前炮打谢富治，站在台后支持他这样做的却是聂元梓。两个人唱着双簧戏。

今年（1967年）3月18日聂元梓说：“制定反动路线的有一两个人或几个人，一二个人是刘邓，那几个人是谁呢？刚刚才出来一个陶铸嘛！”当时谭震林已被揪出，而聂元梓还一个劲地号召大家“往上揪”。就是在这种“新黑线论”的指导下，在四月十四日聂元梓、孙蓬一煽动群众炮打谢副总理。聂、孙的御用工具《新北大》校刊编辑吴子勇画出了臭名昭著的“四月形势图”，恶毒地攻击总理，康老、谢副总理是“新的黑线”。对于这张反革命形势图，康老在（1967年）9月16日就做了结论，他说：“半年之前，北大给我划系统表，说林杰、关锋、吴传启的后台是我，周总理是陈毅、余秋里、李先念的后台，有书为证，不是造谣。”……

聂元梓不但向中央夺权，而且还企图颠覆北京市革委会。4月14日凌晨，他们煽动了八千多群众去冲公安部，炮打谢副总理。9月16日，康生同志说：“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周总理接着说：“打得倒吗？只不过是自我暴露！”江青同志又说：“说穿了，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作市革委会主任。”真是一语道破了聂元梓们的狼子野心。⁴⁵

显然，到1967年9月，中央已经给聂元梓下了结论。
“除隐患战斗队”除的什么“隐患”？

单看“除隐患”这三个字，就知道这个战斗队很可能是文革的隐患，中国的隐患。

在北大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受“新北大公社”领导的战斗队，去开展特殊使命。搞出名堂了，是聂元梓的，是“新北大公社”领导人的；搞不出名堂，出了问题，也不要紧，可以推说这事与自己无关。这就是北大“除隐患战斗队”的来龙去脉。

在政治斗争中，制造谎言，随意给人强加罪名，花“八分钱”⁴⁶毁人前程的事时有发生。以“除隐患”为名，诬头面人物或负责人以叛徒、特务、有历史问题等，向对立面组织大泼脏水，企图置对立面于被动地位，搞垮对方，这种情况在《聂元梓回忆录》中多处见及。比如吴传启，聂元梓说他解放前是武汉

⁴⁵据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平型关纵队《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究竟是什么货色？》，1967年11月23日。

⁴⁶当时，寄一封平信的邮费是8分钱。

的国大代表，国民党员，“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我们不清楚”。只因为这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吴传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负责人，伙同民族研究所的洪涛、教育部的卢正义、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步调一致，到许多单位伸手夺权”，王力、关锋又明确“支持他们”，所以，聂元梓的“新北大”要将“火力集中在吴传启身上”。为何如此，用聂元梓的话说，就是，“一打吴传启就会引起大的震动”。

在1967年打吴传启等时，确实曾引起过“震动”，但是，引起的是陈伯达对聂元梓的批评。陈伯达在批评聂元梓时就说过：

“吴传启算什么东西？……提不到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到我们社会的位置。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所操纵的。真是活见鬼！……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⁴⁷

作为文革的参加者和某些事件的当事者，我始终不明白，将火力集中在卢正义、吴传启这类人身上，即使会引起震动，或者会引起大的震动，但是，这震动，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处？对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在《聂元梓回忆录》中，王、关、戚，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还有林彪，凡是批评过聂元梓，有碍她的夺权股份公司发展的人，或者在后来倒了台的人，都是聂元梓“早就识破”的坏家伙，都是地派的后台。按照聂元梓的逻辑，1966—1967年的中央上层领导，除毛泽东外，洪洞县里已没有好人。对毛泽东，聂元梓没有胆量反；对周恩来，聂元梓也并不满意，她的《回忆录》写道，在1967年9月初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说过“聂元梓反谢富治，只能暴露她自己”。她接着写道：“我在会上一个字都没有讲，我不能检讨，我讲什么？我做的没有错。”⁴⁸错的是谁？当然是周恩来！

按照聂元梓的这个逻辑，周恩来也一定是地派的后台。

“黑二组”继续保聂元梓

北大的“保皇派”形成于1966年，延续工作队错误路线的黑二组一直在活动着。到1967年4月，“地质东方红”及其它院校的师生到北大反了一下，是反不掉的。

据《新北大报》揭发：

在黑二组的“思想动态”第40期上，他们还攻击北京公社“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否定新北大以聂元梓、孙蓬一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是要夺权”！反之，他们对反革命“四月形势图”（该图恶毒地把谢富治、关锋、林杰、穆欣等同志和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列入所谓的“反新北大逆流”，并刻毒影射康生、周总理）的炮制者，疯狂炮打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吴子勇又是什么态度呢？……校文革和黑二组为何如此卖力地庇护这个炮制大毒草的家伙呢？原因很简单：吴是校文革的忠实追随者，保聂（元梓）的……

铁的事实已经说明：黑二组完全是北大校文革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是地地道道的狗腿子、特务机构！⁴⁹

⁴⁷ 《聂元梓回忆录》P223。

⁴⁸ 《聂元梓回忆录》P224。

⁴⁹ 红代会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新北大报》，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校文革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造反派从“黑二组”抄出大批黑材料，1967年7月26日。

“新北大公社”在全国支保

因为聂元梓具有保皇派的经历和本色，聚集在她周围的人也大都具有保皇派的特色。这些人到了外地，对群众组织性质的判断也都是从自身的保皇特点出发的。因此，“新北大公社”在外地支持的大部分是“老保”。除上文“插手外地运动”中说的内容外，据《东方红报》5月13日报导：

外地在石家庄的左派组织如，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矿院东方红等六十多个院校、部队都是支持五〇一和师大东方红等红二司的，唯有新北大公社支持阎同茂镇压石家庄革命造反派。

据北大井冈山平型关纵队的资料：

在谭震林掀起的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聂元梓在全国干了些什么呢？她在全国的很多地方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在广州，校文革的联络站主办的《新北大》校刊广州版在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篇大毒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广州市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号召书。江青同志早在四月十六日就指出：“新北大广州版在广州闯了祸。”中央文革小组在4月11日发给广州革命造反派的急电中指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是错误的，应当允许在报纸上继续进行讨论、批判。”可是聂元梓却轻描淡写，企图抵赖。在湖南，聂孙文革⁵⁰疯狂地镇压湘江风雷。他们参与了查封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的武斗，把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7月6日，中央已准备为湘江风雷翻案，但新北大公社总部还发表声明强调长高司是革命小将，湘江风雷不能翻案。在山西，聂元梓勾结刘志兰、刘贯一反党集团，大反刘格平同志。四月份刘志兰等上北京，聂元梓、聂元素⁵¹亲自登门拜访，进行秘密会议。刘贯一回山西时还给聂元梓三点指示。此外，在武汉、四川、辽宁等地也是一样残酷地镇压当地的革命造反派。⁵²

天派火烧英代办

“火烧英代办”事件发生在1967年5月。据当时的有关资料：香港人民掀起了长时间的反英抗暴运动，英国当局对他们进行了种种迫害，并停止了三家进步报刊的出版。

我新华社香港分社就港英当局停止三家进步报刊问题发表声明，警告港英当局，立即停止对香港人民的迫害。

5月4日，首都新闻界、电影界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万五千人召开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对我新闻和电影工作者的迫害，并表示同港九同胞一道同英帝斗争到底。

五月六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竟然出动二百多名全副武装警察，手持警棍、手枪、冲锋枪、催泪弹发射器等凶器血腥镇压我手无寸铁爱国工人。二十多名工人惨遭毒打，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二十一名工人被强行逮捕。

后来，聂元梓等为拔这一事件的头筹，组织了反英大游行。游行队伍行至英国驻华代办处时，有人冲进去放火，以示他们“最革命”，从而制造了“火烧英代办事件”，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火烧英代办”，完全是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学生干的。这一事件作为当时国际上重大的外交事件，受到关注，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⁵⁰聂孙文革指聂元梓、孙蓬一控制下的北大文革运动。

⁵¹聂元素是聂元梓的亲姐妹。

⁵²据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平型关纵队《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究竟是什么货色？》，1967年11月23日。

这一事件原本与“地质东方红”无关，与地派无关，更与我无关。可是，在后来“抓5·16运动”中，天派却有人“揭发”说：这次事件的组织者和罪魁祸首是聂树人！

再后来，我问整我的专案组，你们搞了这么长的时间，搞清了我的什么问题？他们说，还是搞清了一件事，“火烧英代办，与你无关”。

第38章 红代会领导班子的改组

天派-“文革痞子”的“形势声明”

不按常规或遵从“公序良俗”，打着文革旗号搞活动的人，我将之称为“文革痞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聂元梓、蒯大富不与王大宾、谭厚兰等副组长商量，即盗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首都大专院校目前形势的几点意见》，对“地质东方红”及地派院校进行了攻击。明明是他们提出了“左派分化论”等一系列谬论，在受到批评后，却将它们加在“地质东方红”头上。他们还说，“斗争的焦点在于一个‘权’字”，“更不应该把这种分裂带到红代会”去。

这是不是“痞子”的所为？

对首都大专院校目前形势的几点意见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

一、首都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阶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目前，一个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正在日益高涨，大联合正在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本单位的斗批改正在深入展开，革命的“三结合”正在形成，形势很好！

二、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夺权斗争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正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疯狂，调动他们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空前强大的形势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主要利用“打进来、拉出去”、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的办法进行反革命的反夺权活动。**最近，革命队伍内部的极左派，与保守势力结合起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这种适应资本主义复辟需要的典型的机会主义思想。**他们的所谓“左派队伍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反动的“新阶段”理论，所谓“造反不分先后，保皇不分早晚”的“左派转化”论，等等，都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谬论，必须痛加批判。

首都某些大专院校内两派斗争的加剧，归根结底，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而斗争的焦点在于一个“权”字。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三、分裂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死敌。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革命组织内部或革命组织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正常辩论来解决，而绝不能搞分裂活动，更不能诉诸武力。对于兄弟组织内部出现的分裂现象，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持革命原则，善意地提出批评或劝阻，而绝不应支持或怂恿搞分裂的一方，更不应该把这种分裂带到红代会。事实证明，阶级敌人就是企图利用革命派队伍内部的分歧，“拉一派，打一派”，扰乱革命阵线，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在两条路线、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的今天，小分裂犯大错，大分裂犯大罪！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提高警惕，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四、无政府主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破坏和消灭旧国家机器的原理，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在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肃清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的影响，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尽一切努力大树特树无产阶级革命权威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必须维护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权威，维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对权威！

五、近来不断发生武斗事件，有的是革命派内部争吵，有的是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发生武斗的主要原因，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幕后策划或操纵保守派组织，妄图进行反夺权所造成的。而革命队伍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滋长，也给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切革命同志都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及时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坚决制止武斗，

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五月五日发出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号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我们坚决响应市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大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地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把头脑中的“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我们决心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在大批判中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从而推进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巩固我们的红色政权，彻底粉碎阶级敌人任何形式的疯狂反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地派的反击声明及座谈纪要

地派的“严正声明”

针对聂元梓、蒯大富炮制的红代会的“几点意见”（五月十日），地派院校立即召开“部分大专院校”的会议，对聂元梓、蒯大富等加以驳斥。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专院校联合严正声明

最高指示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一、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对首都大专院校目前形势的几点意见》（载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首都红卫兵》），根本未经红代会核心组全体成员讨论通过，它脱离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奢谈什么“意见”，是对北京市大专院校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肆意歪曲。

二、五月十三日以前保守派组织、民院抗大根本不是红代会成员，现在我们仍然反对吸收它为红代会会员。某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无中生有地说什么“恢复”抗大公社红代会成员资格，千方百计把抗大公社拉入红代会，对此，我们表示强烈抗议。

三、我们坚决支持民院东方红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决心和民院东方红的革命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四、必须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树立谢副总理主持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任何企图破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声誉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谁企图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坚决和他斗争到底！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

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到底兵团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联合战斗兵团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
北京水电学院红卫兵
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北京外贸学院燎原公社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1967年5月19日《东方红报》)

对《首都红卫兵》报的警告

《对首都大专院校目前形势的几点意见》，是聂元梓、蒯大富等个别人背着首都红代会委员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为此，1967年5月19日出版的《东方红报》发表文章，对《首都红卫兵》刊登该文，予以揭露和警告。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着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根本没有在红代会委员会中讨论过，商量过，而是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委员会”的名义，炮制出这么一个“意见”，并通过《首都红卫兵》报发到整个首都以及全国，它起了极大的危害作用。

我们要严厉质问《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中的某些人及其它个别人，你们口口声声大叫“反对分裂主义”，难道你们这种行为不是地地道道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行为吗？你们口口声声大叫“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而你们目无最起码的革命组织纪律，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上欺骗中央文革及红代会委员会，下欺骗首都大专院校数十万红卫兵及其它革命同志，这难道不是最典型的、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吗？……

我们姑且不去批判这个“意见”是何等的错误，单是《首都红卫兵》报某些人及其它个别人的这种恶劣的、极不正当的手段已经使人难以容忍。《首都红卫兵》报某些人及其它个别人擅自盗窃“红代会委员会”名义，滥发什么“看法”，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首都红卫兵》报虽然只出二十一期，可是它由于落到某些专横跋扈的人的手中而在分裂的道路上走的够远的了。我们警告这些人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如果继续一意孤行，必将自食其果。

关于目前形势座谈纪要

在批驳了以“红代会名义”发表的“几点意见”之后，“首都部分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座谈纪要”。

“4·8事件”已经意味着红代会的分裂。而五月十五日“座谈纪要”的发表，则意味着地派与“聂—蒯红代会”的公开分裂。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

关于目前形势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

为了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首都大专院校二十多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就目前北京市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自始至终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的和团结的气氛。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发表座谈纪要如下。

(一)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目前北京市大

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派大好。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正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向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各个系统的代理人，向它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刘氏黑《修养》，向它们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顽强的总攻击。在革命的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广大革命干部积极站出来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队伍越来越壮大，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跟着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革命形势好得很！这是运动的主流。

但是，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千百万次向我们指出的那样，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高等院校中正在激烈尖锐地进行着。各院校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斗争还是曲折的，还会有反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方百计收买，拉拢、利用个别组织中的不坚定分子，纠集操纵各种保守势力，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他们把种种罪名强加到革命造反派头上，胡说革命造反派是“靠打、砸、抢起家的”，竭力否定革命造反派的大方向，拼命把革命造反派打下去。另一方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极力歪曲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利用各种保守势力，大搞翻案复辟，大搞合二而一，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队伍，妄图重新上台，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个“权”字触动了各个阶级的神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动派拼命反夺权，是当前高等院校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一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作不调和的斗争。坚决打倒刘少奇！坚决打倒邓小平！坚决打倒陶铸！坚决打倒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批倒批臭刘氏黑《修养》。同时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系统各单位的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坚决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尽快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坚决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誓将高等院校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这是把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推向新高潮的重要保证，是胜利地进行斗、批、改的重要保证，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万众一心，共同对敌，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联合从来就是阶级的联合，从来就是以共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联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唯一基础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光芒万丈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七年来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是分裂革命队伍的罪魁祸首。值得指出的是，有些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而至今又没有彻底划清界线的人也在那里大叫‘团结’，反对‘分裂’，大骂别人是‘分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是他们根本不懂得，真正大搞分裂，大闹无政府主义的正是那些企图分裂中央文革小组，攻击谢副总理的人，正是那些大树特树个别组织及其个别负责人绝对权威的人，正是那些勾结扶植保守组织，向革命造反派进攻的人，正是那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团结基础、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们的“团结”是假团结，他们的“联合”是假联合，这样的“团结”和“联合”是长久不了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向这种真正的分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们必须大树特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中央文革小组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谢副总理主持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

坚持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大联合，坚决反对和各种保守势力同流合污，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

（三）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她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导下，在伟大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力支持下，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努力下成立起来的。她的成立，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她的成立使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拥护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努力维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必须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以千倍的仇恨，万倍的疯狂，妄图搞垮这一年轻的红色政权。他们刮阴风，造谣言，利用操纵保守势力，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市革命委员会。他们制造武斗，破坏生产，大肆挥霍国家资财，给市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他们的罪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年轻的市革命委员会扼杀在摇篮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猛促工作，节约闹革命，及时揭穿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彻底粉碎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坚决捍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组织的个别负责人，深受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的影响，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他们极力扶植一些保守势力，把矛头指向市革命委员会，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谢副总理，处心积虑地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们是这样干的，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们仍然这样干。他们之所以这样一意孤行，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无政府主义的大暴露。我们诚恳地劝告这些人，必须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否则，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一定要维护和加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维护和加强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的革命团结和革命权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北京市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四)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项重大政策。最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了关于制止武斗的重要通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热烈拥护，最坚决照办！

但是，目前北京市武斗事件不断发生，这主要是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地、富、反、坏、右制造和挑起的。他们一方面纠集、操纵保守势力，对革命造反派大打出手，另一方面又利用革命派内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极力挑拨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制造和挑起武斗，而他们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扰乱革命秩序，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他们反对中央文革、颠覆市革命委员会、蒙混过关和东山再起的反革命目的。阶级敌人疯狂地制造武斗，决不表示他们的强大，恰恰说明他们面临死亡，正在垂死挣扎。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必然反映。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坚决粉碎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毫不留情地对一小撮挑动武斗的坏蛋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实行无产阶级法律制裁。我们一定要顾大局，识大体，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坚持文斗，坚决反对和制止武斗。

(五)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命根子。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我们要最积极地响应林副统帅的伟大号召，最坚决地贯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牢记林副统帅的教导，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狠抓自己世界观的改造，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坚决克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坚决打倒“私”字！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团结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一小撮，实现和巩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永远革命，永不变色，永葆革命青春，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
红代会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
红代会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红代会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京林学院东方红
红代会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
红代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
红代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方红
红代会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
红代会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
红代会北京商学院红色造反军
红代会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到底兵团
红代会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燎原公社
红代会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革命联合委员会
红代会中国音乐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
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
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
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
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
北京轻工业学院七·二九兵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红卫兵团
北京语言学院东方红兵团
北京电力学院东方红兵团
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外语专科学校革命造反军

(1967年5月19日《东方红报》)

改组红代会的策划

谢富治：三司的旗帜举得最高

5月22日，谢副总理在工代会全体委员会上讲话时首先指出：现在北京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红代会分几派，工代会不要受影响，并警惕阶级敌人。现在有人想冲破通知（指市革委会5月20日通知），挑起武斗，我看他没有好下场的。

“红代会分几派”，这是谁造成的？中央让原本就没有大联合诚意和大联合经验的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当组长、副组长，闹出问题了，这又怪谁？

1967年6月3日，谢富治受中央指示，到红代会传达两条命令：

1、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红代会的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

2、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委会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来。

“两条命令”针对的就是聂元梓、蒯大富。

6月5日，谢副总理与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同志座谈时指出，要尊重三司，三司的旗帜举得最高。但是，三司的风格也要高，否则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三司“消失”已经快4个月了，谢富治还这样说，可见三司的影响之大！也可以说，三司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

红代会是在三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是，窃居红代会领导的人，却是反三司的人，欲踏平三司山头的人。

6月6日凌晨，陈伯达、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对某些同志（主要是聂元梓、蒯大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伯达同志指出，凡是社会上把持权力的、要夺无产阶级权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的条件。

但是，中央首长的警告和规劝，都无济于事。不彻底解决领导权的问题，红代会就不能正常运转。

改组行动的策划

与基础力量不协调的上层建筑，不发生垮塌，就要被震裂！

对红代会领导层的“震裂”行动终于在1967年6月初发生了。如果使用政治术语，这次“震裂”行动也可以叫做“政变”。既然毛泽东的旨意不能改变，那就只能通过内部造反，使它改变。

“震裂”行动的发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此时红代会核心组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蒯司令”、“老佛爷”的倒行逆施和对不同意见的排斥，不仅激起众多群众组织的不满，也激起了先前属于“天派”的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的不满。当谭厚兰起而与“老佛爷”和“蒯司令”抗争时，“师大井冈山”等就倒向了地派。

这次行动仍然以“地质东方红”为核心，但是，林学院及其它学院的骨干作用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离开红代会后，并未断绝同红代会的联系，因为原“三司”在红代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原《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的同志们一直怀念在“三司”工作的时日。大家目标一致，方向正确，工作愉快。这时的我虽然不在红代会工作，但是，我仍然是地质学院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以我的工作，不仅影响着地质学院的进程，也观察着红代会的走向。

“改组行动”事先曾经过周密的谋划，朱一恕（林学院派驻红代会代表）、胡乐成（此时是地院派驻红代会的代表）等也同我进行过直接、间接（通过顾焕起）沟通。造反行动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吸纳被聂元梓、蒯大富等排斥在外的群众组织加入红代会，以表明“政变”行动的正义性；

第二步，收回《首都红卫兵》报的编辑出版权，原“三司”《首都红卫兵》报全体编辑重返岗位，出版仿毛体《首都红卫兵》，并为“造反行动”大造舆论；

第三步，改组红代会常委会，改组后的常委会立即作出改组宣传部的决定。

因为我早已离开红代会，不愿意再返回红代会进行活动，于是，就决定由我来主持实施收回《首都红卫兵》报的行动。其它事情由朱一恕、胡乐成等组织完成。

十八个组织加入红代会

《东方红报》：为革命组织参加红代会大喊大叫

“蒯司令”、“老佛爷”控制红代会的行径，最令人发指的是不让拒绝对他们喊“喳”或“嘛”的众多群众组织加入红代会。那时候的舆论导向是，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看它是不是加入了红代会。为了将校内的政治对手吃掉、消灭，作为红代会组长、副组长的“老佛爷”和“蒯司令”是绝对不允许校内的反对派组织（比如北大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 516 公社”、“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红旗飘”等；清华大学的“4·14”）加入红代会的；在校外，原先没有加入红卫兵司令部（或成立较晚）而又拒绝对他们喊“喳”或“嘛”的群众组织当然也就受到“牵连”，不能加入红代会。

反过来说，他们校内的“反动组织”要是加入红代会，他们在校内的镇压、“统一”行动就会变得更加被动，更加不得人心。“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这句话原来也适用于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斗争。

为了实现大联合，为了打破“老佛爷”和“蒯司令”等对红代会的控制，按照计划步骤，地派决定采取行动。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在红代会工作的地派核心组人员（常委）朱一恕、胡乐成等，以红代会委员会和组织组的名义，批准十八个组织加入红代会。

红代会的大门终于向全体红卫兵敞开了！

首都大专院红卫兵代表大会公告

组字 001 号

根据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及市革命委员会多次指示精神，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组织组调查讨论通过，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起，吸收下列革命组织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式成员。

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
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
北京轻工业学院“七·二九”兵团
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
北京电力学院东方红兵团
中国舞蹈学校红旗兵团
北京芭蕾舞学校毛泽东主义公社
北京师范学院井冈山公社
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
北京经济学院东方红公社
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革命委员会
中央音乐学院红岩兵团
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井冈山兵团
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红色战斗队
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革命造反军
北京化纤工学院东方红公社
中国戏曲学校红旗战斗队

特此

公告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盖章）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组织组（盖章）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

庆祝 18 个组织加入红代会

6月4日下午，首都六十多个造反派组织、一万余人齐集北京地质学院，热烈庆祝民院东方红等十八个革命组织光荣加入首都红代会。《东方红报》和《首都红卫兵》红1号，对庆祝大会进行了报导。现综合如下：

凯歌阵阵，喜讯频传，六月四日下午，首都六十多个造反派组织一万余人齐集地质学院，热烈庆祝民院东方红等十八个革命组织光荣地加入首都红代会，河南二·七公社等外地赴京战友也到会热烈祝贺.....

首都红代会代表朱一恕首先庄严宣布，民院东方红公社等十八个革命组织从今日起被批准为红代会正式成员，全场立即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民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分别代表加入红代会的十八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会上发言。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予的亲切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对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邮东方红等兄弟组织给予的积极帮助和坚决支持表示感谢。他们一致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出力，为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权威而战，永远和革命派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会上，许多代表发了言，他们异口同声，严辞痛斥了某些人几个月来，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中央文革，对下拉一批、打一批，妄图搞垮革命造反派组织，利用自己的职权，把许多革命造反派组织长期排斥在红代会大门之外。这一小撮混蛋自己搞了分裂，还贼喊捉贼，厚颜无耻地反咬一口，咒骂别人为分裂主义者.....

会上，红代会常委胡乐成同志向民院东方红等十八个革命组织颁发了通知书.....

最后，新北大红旗飘的战友，代表北大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对参加红代会的十八个兄弟革命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十八个兄弟单位的革命组织参加了红代会，这是粉碎反动逆流的胜利，是维护市革委会权威的胜利！”

会后，刚加入红代会的各革命组织以及来自其它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到清华、北大进行了庆祝游行。“十八个革命组织加入红代会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天动地，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高昂斗志和必胜信心！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来到北大，喧天的锣鼓和阵阵口号使得新北大广播台正在播送的所谓“事实真相”成为“几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大家不断振臂高呼：“新北大孙蓬一之流分裂红代会绝没有好下场！”“十八个革命组织加入红代会是对孙蓬一之流的当头一棒！”

当晚，在地院操场举行了庆祝晚会，由中学红代会演出了音乐舞蹈史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这次庆祝大会和游行预示着首都红卫兵运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还我《首都红卫兵》报革命战旗

休矣，等线体《首都红卫兵》报

“蒯司令”和“老佛爷”控制了《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之后，《首都红卫兵》报就变成了“天派”的派报！甚至，它连派报都不是，它成了“清华井冈山兵团”小报《井冈山》报的副刊，成了“新北大公社”小报《新北大》报的副刊，因此而失去了它对红卫兵运动应有的指导作用。

自1966年后半年始，《首都红卫兵》就一直是“有偿”发行的，一份报纸（4开）2分钱。

可是，自聂、蒯控制后，它的影响力就一落千丈，很少有人买了，只好开着大卡车，在大街上抛撒。

6月6日，由原三司编辑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红1号上刊登的《造反宣言》罗列了伪《首都红卫兵》的十大罪状，算是讨伐的檄文：

具有光荣历史和不朽功绩而盛誉全国的原三司《首都红卫兵》报，自从首都红代会主办以来，由于大权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操纵，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的办报方向，因而毒草丛生，谬

论百出，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连绵不断，一张好生生的报纸竟沦为恶毒攻击真正革命造反派，替保守派歌功颂德的喉舌，堕落成某些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是可忍，孰不可忍！！

翻开《首都红卫兵》报的版面，看看它的“秘史”，目睹它犯下的严重罪行，谁不能感到触目惊心，义愤填膺？！

一、客观上极不尊重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红31期上竟然偏偏把毛主席的“席”字颠倒过来，把“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弄成“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开秧。”多次出现类似的政治错误，又何其恶毒也！

二、它偷偷地强行改换报头，把深受广大革命群众喜爱欢迎的原三司《首都红卫兵》报仿毛主席字体的报头改为等线印刷体，与此同时，顽固地对抗中央文革的指示，将原三司《首都红卫兵》报的编辑人员全部排挤出来。如此蛮不讲理，不择手段，又何其卑鄙也！

三、它拼命地宣扬“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正阻力是什么“请出来”，“保出来”的改良主义，抵制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明目张胆地与《红旗》评论员文章大唱反调，又何其狂妄也！

四、它装模做样地高谈什么“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可是从不触及自己的灵魂，检查自己所犯的无政府主义错误，连无政府主义的概念也被它曲解得不伦不类，它在字面上是批判无政府主义，骨子里是含沙射影地攻击革命造反派，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又何其伪善也！

五、它歪曲事实，强奸历史，在《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一文中肆意抹杀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本质区别，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臭名昭著的第二司令部涂脂抹粉，树碑立传。又何其恶劣也！

六、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明明是民院革命造反派东方红公社揪出的叛徒，它却把功劳记在保守组织民院抗大公社的身上，灭无产阶级造反派志气，长保守派的威风，又何其狠毒也！

七、它滥用职权，假公营私，未经红代会核心组全体成员讨论通过，偷偷地把恶意歪曲北京市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所谓《对首都大专院校目的形势的几点意见》登在五月十二日《首都红卫兵》报上，打着红代会的招牌，贩卖小集团的私货，挂羊头，卖狗肉，专横跋扈，个人独裁，又何其猖狂也！

八、它毫无敌情观念，目无中央文革关于不许随便泄漏国家机密的指示，擅自刊登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所炮制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批准与支持的《二月提纲》，为国内外阶级敌人提供了情报资料，钻了空子。《首都红卫兵》报哗众取宠，因小失大，又何其愚蠢也！

九、它麻木不仁，丧失无产阶级政治敏感和革命警惕性，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股造谣惑众，炮打谢副总理，分裂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任其泛滥，置之不理。反而猪八戒倒打一耙，把挺身而出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污蔑为“拉一批，闹独立”，是和红代会“分庭抗礼”，是破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犯罪行为”，“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又何其嚣张也！

十、它从来没有刊出一篇能够正确指导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可是它还要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不许《首都红卫兵》向全国发行的指示，硬要四处推销，谬种流传，遗害全国，败坏首都红卫兵的威望，损害首都红代会的权威，又何其可憎也！

欢呼《首都红卫兵》报新生的“联合通告”

《首都红卫兵》红2号上发表的《联合通告》，在列出伪《首都红卫兵》报的十大罪状之后，还列出了一大串名单——这简直就是高举正义之旗的“地派”的一次大游行，大示威！

联合通告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正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向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深入广泛的大批判高潮中，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组织组吸收了十八个革命组织进入红代会，纠正了红代会组织路线上存在的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为大联合、大批判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决定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我们最坚决地支持这一正确决定。

《首都红卫兵》报的新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喜事，我们最坚决地支持新生的《首都红卫兵》报。

十八个组织进入红代会和《首都红又兵》的新生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原来由红代会主办的《首都红卫兵》实际上已不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机关报，而沦为资产阶级政客的喉舌和个别小集团的自留地。自它问世以来，不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大喊大叫，而是千方百计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长资产阶级保皇势力志气，大灭无产阶级革命派威风，因此必须立即停刊。

(1) 《首都红卫兵》已经沦为少数人搞宗派的工具和孙蓬一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的喉舌。个别人为了小集团的私利，从一开始就不择手段地把原三司《首都红卫兵》报编辑全部赶出编辑部，首先就为他们搞宗派扫清道路，以后又把《首都红卫兵》编辑部变成独立王国。

(2) (等线体的)《首都红卫兵》出刊以来，一再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在个别人把持下，为了本身的需要，公开反对《红旗》杂志关于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调查员文章和评论员文章，阻止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当全国刚刚开始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却叫嚣什么“三结合”的主要阻力是把干部“保”出来、“请”出来的改良主义，企图把文化革命纳入他们的错误的轨道，扭转运动大方向。

(3) 实行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呼众取宠，追求黄色新闻，如刊登彭真“二月提纲”严重失密以至在国际上造成严重的政治事件。

(4) 专横独裁，滥用职权，公然盗窃首都红代会名义，发表“对首都大专院校目前形势的几点意见”，极尽拉一派、打一派之能事，处心积虑分裂红代会。这个“意见”流毒全国，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大损失：

(5) 打着“红旗”反红旗，它根据某个人意旨，一再反对和抵制《红旗》杂志第七期评论员文章，并写好与《红旗》评论员针锋相对的同名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公然叫嚣要对《红旗》评论员文章进行批判，采取一种极端恶劣、隐蔽的手法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篇文章已打出校样，但由于他们认为写得还不够尖锐，同时在革命派的反对下，才未出笼)。

(6) 它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因而不仅对社会上孙蓬一之流分裂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破坏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反革命逆流不予反击，相反却对反对这股逆流的革命组织横加指责，把这些革命组织的革命行动诬之为分裂、宗派，是破坏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犯罪行为”，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实际上配合初纵容了社会上出现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为孙蓬一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夺无产阶级政权大作舆论准备。

(7)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首都红卫兵》却肆意破坏大联合，破坏毛主席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如对于把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作为三结合对象、让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时期大扫同学“妖风”的干将掌权、把真正革命造反“革命到底红卫兵”排斥在外的三凑合产物——某学院革委会用空前未有的大字标题和显赫的位置报导，进行宣传。

(8) 肆意歪曲历史，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在《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一文中，公然把一个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而成立的“二司”说成是誓死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成立的，为臭名昭著、以镇压打击革命派出名的二司涂脂抹粉，从而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9) 它多次在排版上发生严重的政治错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然把毛主席的“席”字颠倒过来，把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他”字弄成“它”字……

(10) 它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及红卫兵战士对他们提出的批评意见和义正词严批判置之不理，毫无悔改之意，而是变本加厉，死不回头。

仅以上列举的事实就不难看出《首都红卫兵》报已经堕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在前一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罪行。因此为某些人操纵的红代会原宣传组及编辑部必须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深刻检查，宣传组及编辑部必须彻底改组，由他们所把持的《首都红卫兵》必须立即停刊。若不立即停刊，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由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坚持错误的人及其幕后操纵者负完全责任。

红代会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农大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中央财金八八战斗队

红代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
红代会北京地质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京农机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师院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
红代会河北北京师院东方红
红代会北京二医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
红代会北京经济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北京化纤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电力东方红兵团
红代会北京外贸新东方红公社
红代会机械东方红东联兵团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东方红毛泽东思想公社联委会
红代会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革命到底红卫兵
红代会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红代会北医八一八红卫兵总部
红代会中国医大红旗公社
红代会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
红代会人大新人大公社
红代会轻工七·二九兵团
红代会北京建工八一战斗团
红代会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
红代会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
红代会北京商学院“红反军”
红代会北京化工学院红旗公社
红代会北京体院运动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红代会北外语专红色战斗队
红代会北外专革命造反军
红代会工商管理专科学校革联
红代会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东方红公社 4·15 战斗团
红代会中国舞蹈学校红旗兵团
红代会中央美院燎原战斗团
红代会北京中医学院红旗战斗兵团
红代会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团
红斗代会北京气专新气象公社
红代会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 516 战斗团
红代会北京机械学院红旗
红代会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红代会北京气象专科学校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红代会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
红代会语言学院东方红兵团
红代会北京化工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二外首都红卫兵
 北京广播学院东方红
 北京铁道学院井冈山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
 北京外贸学院东方红反修兵团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
 新北大 516 公社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
新北大红旗飘

在这串名单中，我们也看到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 516 公社、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红旗飘等“新北大公社”的对立面。为了消灭这些反对派，以“老佛爷”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对之进行了不懈的镇压，还砸断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樊立勤的腿。

向《体育报》社的工人师傅致敬

我没有想到，《首都红卫兵》红 1 号的出刊，竟是一场与“天派”的浴血奋战。

在我看来，聂元梓和蒯大富等尽可以控制等线体的《首都红卫兵》，而我们也应该有恢复仿毛体《首都红卫兵》的自由。

我们是六月六日早晨去体育报社的。工人们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到，他们就立即开始检字排版。

从工作的气氛上看，他们都很紧张，生怕中途发生意外。据他们说，到报社来捣乱的体育学院学生，大都个头高大，膀大腰圆，四肢发达，心黑手毒。他们懒得动口，只须将手一抬，将脚一举，任天下所有的大道理、小道理、歪道理、无道理，就统统表达得一清二楚了！面对两米高的大个子，面对二百多斤重的铁塔汉，只有一米六七个头、百十斤重的工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了初次交手的教训后，一听说体院的“思想兵团”来了，工人们真如小鸡之于老鹰，老鼠之于猫，只能逃跑、躲藏。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心有不忍，表达了“难为了”他们之意。可是，工人们说，为了给我们出报，他们不惜冒一次险。他们说：“其实，我们也不怕他们。还是毛主席说得好，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毕竟，我们对报社的路径熟悉。他们即使进了报社大院，冲进了车间大门，我们翻墙跳窗，都来得及躲。

排版进行得很顺利，前三个版已经拼好了，第四个版正在拼。我暗自庆幸。依据以前的经验，后面的工序有打样，校对，压纸型，浇版，上机，试机，再有两个小时，我们就能看到报纸了。

可是，这时，有人进车间报告说，对立面的人往体院打电话，情况不好。

工人们加紧了工作进度。工人们说，只要能压出纸型来，就不怕他们了。估计，时间来得及。

为防万一，我立即给地质学院和就近的北京工业大学打电话，调集学生保卫体育报社。一方面，这是为给工人们壮胆，另一方面，也希望在紧要关头能抵挡一阵子，至少不要使前功尽弃。

好不容易到了压纸型的工序。工人们对我说：

“多压一套字型，藏起来，以防万一。”

“全听你们的安排。”我说。

果然，在纸型压出不久，即将浇铸铅版的时候，体院的打手们就赶到了。于是，我指挥先期赶到报社的“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的一百多同学守卫好报社大门，层层设防，以争取时间。

为了能掌握情况，我离开车间，来到大院。因为大门紧闭，又有人守卫，“思想兵”难进大门，有人就从侧面的院墙上翻墙进院，然后，又冲过去强行打开大门。据我后来估计，冲进报社的“思想兵”大约有五六十人。从人数是说，一百多人对五六十人是有优势的，但是，在高度和力量上，却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些千人万人里挑一的彪形大汉，人人都称得上是三国的典韦，他们一冲进北工大学生的队伍，就如同老虎进了羊群，他们一只手就可以提起一个学生随意掼倒在地上，或甩出老远。

我对这些人的残忍性还没有领教过，认为他们虽然人高马大，但是，大家都是学生，推搡几下可以，但不至于兄弟相残到流血伤人的地步。可是，当他们全都冲进大门之后，我们的层层防线就形同虚设。他们冲进车间之后，残忍性大发，拳脚并用，众多学生被推倒打伤；不仅如此，车间里的工具、铁棒、铁块都成了他们的武器。在我附近的一位同学抱着机器不让路，一个“思想兵”抓起一个一尺多长的铁管就往那同学的头上打，鲜血立即从那同学的头上流了出来。环顾左右，同样的事也在发生。正如6月11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红2号《把在北京专搞武斗的祸根子揪出来示众》一文所说：他们“无论是砖头、瓦片、磁碗、铁链，抓起就打，捡来就砸，贼眼不眨，黑手不软，而且专往要害处打，向死里打”！

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在流血。

不能与他们对抗下去了！哪怕不出报，也不能酿成大祸。我立即大声喊道：“快撤！”

于是，“思想兵”就冲进了车间。他们推翻了四个铅字版，一霎时，车间里撒满了铅字。他们撕碎了正准备上机的纸型，也使熔融的铅水重又变成了铅块。

正在这时，以“地质东方红”为首的地派队伍大批赶来了。“思想兵”们或者心里胆怯；或者认为推翻了铅版，撕碎了纸型，目的已经达到，立即撤退。记得有两个跑得慢的，被我们的大队团团围住，成了俘虏（此后，是如何处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思想兵”走后，逃离车间的工人们立即返回，取出藏起来的另一套纸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浇版、上机，不到两个小时，数万份报纸就印制完成了。

改组红代会

改组红代会常委会的决议

刊登在六月十一日出版的仿毛体《首都红卫兵》上的红代会领导班子“改组决议”如下：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委员会关于改组常委会的决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通过）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在北京林学院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会议一致认为，红代会前常委缺乏革命性，代表性，不能适应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文革和市革委会指示精神，及广大红卫兵战士的强烈要求，决定改组和扩大红代会常委会。经过充分讨论协商最后决定：

- 1、红代会常委会由十五名常委组成。
- 2、常委名单如下。

红代会：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中国医大红卫兵红旗公社
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北京电影学院东方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联委会
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

以上决议报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目前责成上述单位临时办理日常工作。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

这个决议不再提红代会组长、副组长。“会议一致认为，红代会前常委缺乏革命性，代表性，不能适应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所谓的“前常委”，就是指的“组长、副组长”。会议采用“扩大成员”的方式，增加了“地派”常委的名额，使其在“常委会”中占有多数。在上述名单中，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等九个组织为地派组织。

“决议”一方面要报上级“批准”，另一方面，“责成上述单位临时办理日常工作”。这就在事实上，将聂元梓、蒯大富等对红代会的控制否定了。

改组宣传组和编辑部的决议

会议同时对宣传组和编辑部进行了改组。改组决议指定的新的宣传组和编辑部负责人仍然是地质学院。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关于改组宣传组、编辑部的决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通过)

一、红代会原宣传组、编辑部立即解散。新的宣传组、编辑部即日起主持红代会的宣传工作和《首都红卫兵》报的出刊。

二、新宣传组、编辑部核心成员：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
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
清华大学井冈山
师范大学井冈山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宣传组编辑部所需工作人员由上述核心成员负责调用。

三、等线印刷体《首都红卫兵》报所犯严重错误和罪行必须彻底批判，不得再行出刊。

四、由新编辑部出刊仿主席体刊头的《首都红卫兵》报为我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机关报。

改组决议的发表及新的常委班子运行两个月之后，8月18日，才由谢富治加以认定。他的“常委方案”是，地派8名，天派7名。编辑部组成人员也是地派占有多数。基本体现了地派“改组红代会”的原则。

显示力量，主动撤退

“改组红代会”的行动如火山爆发，震撼了北京大地。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当时都认为“三司”会重整旗鼓，红代会从此分裂。由我执笔并得到大家首肯的《永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大喊大叫——还我〈首都红卫兵〉报的革命造反战旗》一文中也这样写道：“我们原三司《首都红卫兵》报被排挤出红代会的编辑人员，向首都、向全国、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庄严宣告，我们已经回到《首都红卫兵》报这块红色阵地上，永远不下去了！”

但是，在地质学院召开完庆祝十八个红卫兵组织加入红代会，在林学院召开完改组红代会常委会，在仿毛体《首都红卫兵》红2号出版发行之后，我们的“六月行动”却戛然而止了！

我没有进驻红代会宣传组和编辑部，其它编辑人员也没有进驻。我们对“聂元梓红代会”及“蒯大富编辑部”的造反及警告，只是一个姿态，虚晃一枪而已。我对形势的分析是，“进驻”只具有“夺权”的意义，只具有“维持原三司方针”的意义，而难有建树的意义。我们对红代会“造反”，目的只在于否定保皇派聂元梓对红代会的控制，只在于否定喜欢揽权、出风头的蒯大富对红代会的控制。

在“六月行动”中，对红代会“常委会”名为改组，实为重建，建立了以地派院校为多数的红代会决策机制。钦定的红代会组长、副组长被抛进垃圾堆，使他们再也不能以红代会名义发号施令了；被排斥在红代会大门之外的众多群众组织终于冲开了红代会的大门，成为与“新北大公社”和“清华井冈山”平等的红代会的一员；仿毛体《首都红卫兵》报的重新出版宣告了等线体《首都红卫兵》的非法和没落。

我们这些地派负责人，没有独霸红代会之心，没有为个人争权谋利之好。我们决定退出校外争斗。

只是到了1967年9月6日，我们才又出了最后一期《首都红卫兵》专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第三司令部）成立一周年纪念专刊），仅仅为了纪念。

第39章 “天派”的猖狂

蒯大富、韩爱晶在“揪刘火线”的霸道

揪刘火线是1967年7月13日至8月5日，在中南海西门，发一的“揪刘少奇出中南海”的活动。

“揪刘火线”开始时人数较少。“从 7 月 19 日开始，中南海周围人数猛增，无数人群拥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 7000 多个棚子，安有 500 多个高音喇叭，树有 3000 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⁵³

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众组织在北京市的主要街道进行游行示威，尤其是在东西长安街、府右街等处更是人山人海。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全市性的组织，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一个组织由“建工八一”和“师大井冈山”牵头，于 7 月下旬成立，叫“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揪刘总站”，被视为“地派”）。因为成立早，参加单位最多，估计有千余个。另一个组织叫“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揪刘联络站”，被视为“天派”），到 8 月初，共有 700 多个单位参加。

8 月 5 日，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里召开了批判、批斗刘少奇大会。会后，揪刘火线宣告结束。

21 世纪，看到了《清华蒯大富》一书。该书的作者许爱晶说：

1967 年 6 月 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西门，要揪国家主席刘少奇去批判！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这种要求也属于异想天开！超乎寻常！……

蒯大富回忆说：当时北京建工学院也分成两派……对他们的行动我根本就不屑一顾，觉得这是个闹剧。打倒刘少奇我们清华井冈山肯定是一功嘛。你抢什么抢？

韩爱晶回忆说：当时我一听说这件事，觉得莫名其妙！想出风头，想捞政治资本，想登上政治舞台。由于这个学校规模较小，想借刘少奇出名。你说你一个普通的大学，你要去揪刘少奇，刘少奇是你揪得出来的吗？⁵⁴

霸道！！优越感，唯我独尊，不准他人革命，溢于字里行间。

实际情况是，当年揪刘，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比谁都积极。他们到“揪刘火线”比建工学院晚，可是，他们就是要另树旗帜（成立与“揪刘总站”对立的“揪刘联络站”），大唱对台戏，争斗得不亦乐乎！8 月 5 日，他们都是上了天安门的。可是，到了 21 世纪，他们却什么都不承认了……

王光美随工作组去了清华，蒯大富就有了反对工作组的理由，就有了反对刘少奇的理由，就反得名正言顺！刘少奇亲自去了建工学院，镇压了群众，建工学院的人造反了，就成了“异想天开”！就成了“闹剧”！就成了“莫名其妙”！就成了“想出风头”！就成了“想捞政治资本”！就成了“想登上政治舞台”！……

说来说去，“打倒刘少奇我们清华井冈山肯定是一功嘛。你抢什么抢？”这才是实质。而且说的理直气壮！

可是，你蒯大富是第一功，就不允许建工学院立第二功？

⁵³ 引自网络上的文章。

⁵⁴ 《清华蒯大富》第 292~293 页。

“刘少奇是你揪得出来的吗？”

你建工学院不行，还得看我蒯大富的。可是，说这话的时候，蒯大富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结论只有一个，“许爱晶”不是在写回忆录，是在写小说。因为，只有“真实的人”才写“回忆录”，而“许爱晶”只是笔名。

蒯大富提出“第三次大串连”

武汉“7·20事件”及“揪军内一小撮”《红旗》社论，最终导致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关和戚本禹的倒台。

据《大事记》记载：

(1967年)8月上旬，《红旗》第十二期社论发表之后，全国范围内到处刮起“抓军内一小撮”的妖风，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公然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挑起大规模的武斗。8月上旬连续发生了“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在这种形势下，红代会某些人提出“第三次大串联”、“武装夺取政权”，“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第八次大搏斗”等谬论。于是大学生大批外流，仅清华、北大就走了一万多人。

“军内走资派”大家早就看见了。自1967年年初“二月逆流”发生以来，随着夺权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内、军内的抵抗就越来越激烈。青海的“2·23事件”，四川的“5·6事件”，湖北武汉的“7·20事件”，以及湖南、河南、广西、江西、内蒙……发生的复辟事件，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但是，我们不能说。“揪军内一小撮”，这必然要触碰到毛泽东关于“枪杆子”的高压线。

蒯大富、聂元梓热衷于此的原因有四：

一是因为不久前对红代会领导班子的改组，实际上否定了红代会组长、副组长的任命。在改组红代会后任命的15个常委中，地派占有多数，聂、蒯再也不能控制红代会和以红代会的名义“发号施令”了。这使他们意识到“三司”山头的实际存在和强大，使他们很为失落。

二是因为，蒯大富偷盗的“蒯司令”头衔，或许可以排上用场。中国地域广阔，河南、湖北等许多地方“支左部队”对造反派的镇压，使他看到了可以“张扬”自己、“再立新功”的希望。且外地人不大了解“蒯司令”的底细，较易于获取政治资本。

三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派争斗严重，他们要通过“第三次大串联”，转移校内视线，以缓和或化解校内的矛盾。

四是，清华、北大都是名校。以“名校”名义活动，或可收“名校效应”。

于是，在1967年7、8月份，清华、北大学生大量外流。规模虽不及第一次大串连，但肯定超过“第二次大串连”。在他们的带动下，北京各高校许多学生以为这是“毛主席新的战略部署”，也争先恐后，纷纷外出，形成了新的串连之潮。

8月21日，周总理、李富春在“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时说：

我们再三跟红代会讲，我们批判了第三次大串联错误地估计形势的观点，要相信十六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各地的火已经烧起来了，不需要再去点火了，帮忙了。主观上想帮忙，实际上帮倒忙。把本校、北京的两派观点带下去不了解情况，去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甚至带着去年的观点去。例如，四川“红成”去年是解放大西南的，是造反派，今年他们支持了军区，镇压造反

派川大八·二六，犯了错误（当然他们也是反对产匪的），现在仍然是这样，还搞了几千人来北京闹，今年再带着去年的观点去支持它，就要犯错误，就会帮倒忙，他们是配合军区镇压造反派的，我们让红代会作决定，不准串联，撤回联络站.....

绝对不允许自由串联，自由串联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应该把他们都调回来，林彪同志说要加强三性，都应该做到。红代会在会上说往外地派了，但还是派去，都应回来。

周总理在这里说，支持“红成”的，主要是“北航红旗”和“新北大公社”等天派院校。

9月7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坚决把外出串联人员召回的决定。

“第三次大串联”就此收场。

王、关、（戚）被抛弃

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的就是军队。

军队介入地方后，基本上是支持地方保守势力的。武汉“7·20事件”发生后，慑于军方的压力，毛泽东退缩了。他舍去他的左膀右臂王力，关锋，还有戚本禹，而与军方和解。

此后，也开始了对造反派的整肃，朱成昭等就是在这以后被逮捕的。

王、关、戚一直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揪军内一小撮”，是“整党内一小撮”的必然。“揪军内一小撮”即使不合毛泽东的政治时宜，批评一下，检讨一下，改正了，就可以了。可是.....

当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座上宾；当不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坏人”，就成了“阶下囚”！

王、关、戚等，都进了秦城。戚本禹一进，就是18年！

这就是专制政治！

“天派”颠覆地派革委会

地院的“9·4事件”

本处略，见前文。

师大的“9·7事件”

到了1967年9月初，随着支持造反派的王力、关锋及林杰的倒台，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以为，他们独霸红代会，称雄天下的时机已到，先是在地质学院制造了“9·4事件”，三天后，在师大制造了矛头直接对准谭厚兰的“9·7事件”。

聂元梓、蒯大富等对谭厚兰愤恨的是，作为“四个山寨”之一的“师大井冈山”，竟然倒向“地质东方红”，成为地派的一员。

9月1日，“北航红旗”、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组织在师大刷出“打倒王、关”、“打倒穆欣”、“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引起很大震动。当晚，因为谭厚兰不明真相，对林杰问题作了错误的表态。

9月6日，在师大革委会常委会上决定，谭厚兰7日上午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是原革委会成员樊立跃等人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人的支持下，采取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所谓“专政委员会”，对谭厚兰同志进行了非法的抄家，限制其人身自由。

9月7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等人的大力鼓动和亲自指挥下，北京及外地来京的二百多个单位一万多人，聚集师大，利用王力、关锋、林杰被揪出的政

治形势，矛头直指谭厚兰和师大革委会。上午8时，“专政委员会”揪斗了谭厚兰：谭厚兰被一群怒气冲冲的男女押解着，登上了红砖砌的主席台。谭厚兰偏着头，一声不吭。

这一场突发性的斗争会是由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等主持的。他们声称接到重要举报，谭厚兰犯有反周总理的罪行，决定毫不迟疑地对她采取专政的革命行动。会上，由知情者、与谭厚兰有密切接触的人包括她的秘书揭发，所讲的一些细节都异常真切生动，如说林杰到来时，与谭厚兰入室密谋，“门上的钥匙都来不及拔，在那里当啷着……”揭发者甚至暗示他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当日，“井冈山造反团”拉出队伍恢复活动，召开庆祝成立大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派人参加了大会。

会上当即宣布推翻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对5·16专政委员会”。

中央支持谭厚兰

9月7日下午，中央文革派人去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晚上，谢富治副总理派李钟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去师大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的指示：

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

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

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

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北京市革委会当日对师大问题发布了通告：

一、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并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委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

二、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

三、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

黄家林逃跑后没有抓住，全校革命师生紧急动员起来追捕。

黄家林捕获后送军事指挥部（高楼317）。

此令通告全市各革命组织。

9月8日，“师大井冈山”战士在解放军和“北航红旗”战士的帮助下，将逃到北航的黄家林逮捕归案。

同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中的“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显然指的是聂元梓、蒯大富和韩爱晶。这一点，在1968年毛泽东“7·28”召见中，说得很明白。在这次会议中，陈伯达说：“六六年下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21世纪，蒯、韩还在撒谎

到了21世纪，蒯大富、韩爱晶还在撒谎。以笔名许爱晶为作者，在《清华蒯大富》⁵⁵一书中说：“令韩爱晶和蒯大富意想不到的是，会上竟发生师大革委会委员樊立跃反戈事件，他突然宣布推翻师大革委会并成立专政委员会揪斗谭厚兰。韩爱晶和蒯大富两当场不知所措，陷于被动，大为恼火。他们并不想打倒谭厚兰，只是想出出心中的窝囊气而已。”

要让樊立跃说9月7日的情况，肯定会是另一种说法。

至于韩、蒯想不想“打倒谭厚兰”，已经为北京市革委会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所证实；已经为毛泽东“7.28召见”所证实。

蒯、韩心中的“窝囊气”从何而来？

谁都知道，“二月逆流”是谭厚兰带头反起来的。这一点，得到了中央的认定和肯定。可是，许爱晶在该书中说：“韩爱晶在1967年春天积极参与反二月逆流……但却认为谭厚兰反对二月逆流就是反对周总理……”这是什么逻辑？这就能形成他们心中的“窝囊气”？

事实真相是，在红代会里，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因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浓厚的权欲和控制红代会的霸道行为有看法，“民族宫事件”之后，开始转向“地派”。这才是他们心中“窝囊气”的来由。

地院“蔡派”与天派合流

据清华大学的学生回忆，正是在这一天（9月7日），地质学院的田春林，以及已经离校的王大来，到师大，与正在颠覆师大革委会的蒯大富、韩爱晶谈了近一个小时。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谈话的时机却意味深长。

第40章 聂元梓编造的“武斗”谎言

高校“大联合学习班”

1968年春节过后，接北京市革委会通知，要北京各高校的两派头头去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大联合“学习班”。

地质学院去学习班的人，革委会这一边的人，除我和王大宾外，还有各系的革委会主任等。“对立面”的人，即“蔡派”的人，除蔡新平外，记不清还有谁参加。因为地质学院是大一统，即便“蔡派”，也是内部反对派，与北大、清华那样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不是一回事。

我院的《东方红报》虽然对北京市一些单位的“大联合”形势进行过欢呼，有些单位的大联合可能成功了，而许多单位的名义上的大联合却失败了。在失败者中，北大、清华算是最为失败者。因为自去年9月起，他们内部就已经宣布了“大联合”。但是，他们的“大联合”，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其后半年以来，内部两派并没有联合起来，革委会当然也没有成立。他们不仅没有联合起来，两派的武斗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⁵⁵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在这种情况下，谢富治以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举办了“北京高校大联合学习班”。

地质学院的“两派”坐在一起，蔡新平不能将二进地质部时他的“右倾”拿出来炫耀，因为历史已经定论，他就是“右倾”；他也不能指责“革委会有朱成昭的代理人”，因为要他明确指出“谁是代理人”，他是指不出来的。他更不能要求我们下台，让他上台，因为地质学院里没有几个人拥护他……倒是我们革委会这一边的人诚实，通过“学习”，在消除派性上下了许多功夫。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探工系的“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

况且，学习班还有一个规定：“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清华大学的两派在学习班上的“表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北京大学的情况却是“明摆着的”，因为市委党校的许多墙壁上，时常有人贴大标语：“聂园子欺上瞒下……”、“聂园子镇压……”聂园子的那个“园”字，或是被“画”成了长长的“鞋底”模样，或是在中间加了一点。

人们在私下里一谈论起“新北大公社”，并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其为“鞋社”。那意思是，聂元梓是“破鞋”，称其为“鞋社”，大有侮辱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之意。这当然很不严肃。

“大联合学习班”在“3·24事件”⁵⁶之后，不了了之。记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揪出杨、余、傅”大会，是市委派车送我们去会场的。

聂元梓编造的“武斗”大谎言

在《聂元梓回忆录》中，假话很多。其中，就编造了1968年3月25日地派七院校学生到北大大搞武斗的谎言。在该书的257页至273页，聂元梓写道：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三·二五”大武斗事件。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市革委会的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打电话给我……

接下来，描述聂元梓如何找谢富治，还有吴德等，去北大制止武斗。洋洋洒洒，写了15页，上万字。

可能是，当年聂元梓、孙蓬一“想”多了，想得入了迷，以致，几十年后，她把“想”的就变成了真的。

需要纠正，北京矿业学院不是地派院校，聂元梓却说它是地派七院校之一。以此，也可见其假。

“武斗谎言”早就被戳穿

聂元梓编造的“武斗谎言”有上万字！

并且，这谎言还载入了《北京大学记事》。

⁵⁶1968年3月24日晚9时，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驻京部队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

也许，“地质东方红”早在几十年前就想到了聂元梓会说假话，在1968年4月11日就发表声明，揭穿了聂元梓、孙蓬一编造的这个“大谎言”。声明的全文如下：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总部严正声明

最高指示

那些政治流氓们，因为要维护其违反真理和正义的私利，而自知他们主张，纲领、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所以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腕、造谣言之类，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

政治上的没落人物在做亏心事的时候，亦常常借谣言来转移视线，来隐身的。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三·二四”的英明决策，宣告了“二月逆流派”——聂孙之流的黑后台，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之流的彻底完蛋！毛主席的声音如一声春雷，威震长空！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统帅毛主席，挥手横扫反革命右倾翻案妖风，迎头痛击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形势一片大好。

想当初反革命小丑聂元梓、孙蓬一之流在其黑后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之流的操纵下，公开跳出来为“二月逆流”翻案，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毛主席身边的红色政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是多么嚣张！但是，曾几何时，刘、邓、陶、杨、余、傅之流的马前卒聂孙之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彻底破产了！他们在政治上越来越陷于孤立，越来越不得人心！

但是，阶级敌人是绝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资产阶级政客聂元梓、孙蓬一之流，为了挽救其覆灭的命运，转嫁危机，逃避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公然挑起武斗，毒打我两名到北大刷标语的东方红战士。甚至无耻的假冒新北大井冈山的名义，向我院和其它院校打电话，欺骗我们出车派人去北大，阴谋拉人下水。然而，我们识破了其阴谋，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于是他们就借助于造谣诬蔑的流氓手段，大造反革命舆论，贴标语，散传单，反诬我东方红战士到北大挑起武斗，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对此我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总部发表严正声明：

我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自去年五月以来从来没有组织过同学去北大游行！更没有派人去北大挑起武斗或参与武斗！恰恰相反，聂孙之流无理扣押、毒打我两名东方红战士罪证确凿，不容抵赖。这笔帐一定要清算，聂孙之流妄图造谣诬蔑，颠倒黑白，要弄政治流氓手腕，转嫁危机，对我们进行政治陷害是绝对办不到的，是挽救不了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的。

打倒刘、邓、陶、彭、陆、罗、杨！

打倒杨、余、傅、关、王、戚反党集团！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

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

聂元梓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东方红公社》的这个声明，刊登在1968年4月11日出版的《东方红报》上。白纸黑字，有据可查！

事实是，在纪念“4·8事件”、“4·11事件”一周年的时日里，地院两名东方红战士（均为我院12652班的学生，叫熊兴武、黄德生）到北大去看大字报。看到不顺眼处，即刷了两条大标语。这下，惹恼了北大聂元梓、孙蓬一及其拥护者。他们将这两名东方红战士抓去，用麻袋罩住头，拳打脚踢，用皮鞭木棒殴打，达两天之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两名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熊兴武的肾被打坏，生命垂危。最后，不得不送往北医三院去住院治疗。

我当时曾对三院的大夫说：

“希望你们全力进行救治。事关大局，请务必用心。”

在我看来，如果死了人，“地质东方红”的战士是不会答应的，“三司”的数以万计红卫兵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两派斗争就会升级，那将引起严重后果。

同日的《东方红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对聂、孙之流进行声讨和批判。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本报评论员

鲁迅先生曾说过：“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支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聂、孙之流就是如此，他们本想搬起一块石头来砸我广大东方红战士之脚，其结果却恰恰与其愿望相反，不过更进一步暴露了他自己的政治流氓嘴脸，使得更多的人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杨、余、傅反党集团被揪出后，聂、孙等及其御用工具“北大公社”中一小撮决策人本应扪心自问，回头猛醒；本应认识到前一段的严重问题，悬崖勒马，作一番深刻的检查。然而这些家伙没有一丝一毫悔改之意，反而对我奋起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东方红战士恨之入骨，无理扣留两名前往北大刷大标语的东方红战士达两天之久，拳打脚踢，用皮鞭木棒殴打，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不仅如此，这些政治流氓还用恶人先告状的方法，偷偷摸摸的发个什么“照会”，反诬我东方红总部派人到北大参与武斗，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捏造的谣言绝对掩盖不了铁的事实，也不可能长期遮住人们的眼睛，其唯一的作用不过是更深刻地暴露了造谣者自己而已。

靠着谣言过日子的人则是已到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的地步了，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政治上的最后垮台。聂孙之流也必然逃不脱这个下场。

（1968年4月11日《东方红报》）

由此，也可以看出，《聂元梓回忆录》假话多多！

由此，也可以看出，《北京大学记事》，记得并不真实。

2016年，北大有人依据《北京大学记事》，质疑我写的文章：地派院校1968年3月到北大武斗“不是事实”。我随即问他，《北京大学记事》出版于何时？

《东方红报》上的文章可是发表于1968年4月11日，就在当时！这可是白纸黑字！

做人做到造谣的地步，聂元梓还有脸妄称“五大领袖”？

第41章 制造天、地两派的推手是谁？

文革中，许多人热衷于“抓黑手”。工作队横行时，薄一波就说地质学院造反派后面有黑手。可是，抓了几十年，也没有抓出来。天、地两派争斗中，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说过，要抓制造两派的黑手。

聂元梓也热衷于揪洪涛、吴传奇这样的黑手。

可是，谁是制造天、地两派的真正黑手？

是谁，破坏了三个司令部的决议，而将根本没有资格领导红代会的聂元梓推上组长的位置？是谁，将毫无联合经验和经历，却满脑子权欲的蒯大富、韩爱晶推上了红代会副组长的位置？由此，形成了红代会4: 1的局面；由此，引致了天、地两派的形成和争斗……

黑手到底是谁？

第五编 “一打三反”与“抓 5.16”亲历记 ——社会文革：镇压造反派 1



第 42 章 地质学院“批清运动”一瞥

“既得利益者”对文革的“妖魔化”

自 1968 年 8 月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高校起，毛泽东还没有说他“一生只搞过两件事”的话，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要受到清算的。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公开地大规模地声讨和清除造反派得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于是，“老一辈”和军宣队结合，制造出了许多理由：

——在北京文革中，打、砸、抢、烧、杀、“破四旧”、造反，以及乱批乱斗，都是“无法无天”的高干子女“老红卫兵”所为，都是保皇派所为。时间，主要发生在 1966 年 8 月份，及其前后。其目的，是以极左的手法，破坏文革，将文革引向错误的方向。这些，却被“妖魔化文革”者说成是造反派所为，成为否定文革的主要依据之一。

——他们搬出 1957 年的逻辑，将人们在文革初期对当权派提意见同反对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将保皇派大学生的乱批乱斗，以至乱杀的行为，移花接木，一古脑儿强加在文革造反派头上。

——明明是刘、邓派出的工作队夺了各单位党委的权，是他们“踢开了党委”，却被“妖魔化文革”者说成，是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

——文革初期，既得利益者（贪腐分子）顽固坚持“资反路线”，拒不给“反干扰”对象平反，而受到造反派的声讨和批、斗（这是完全正义的行动）。到了否定文革的时候，这些贪腐分子却摇身一变，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革命老干部”。使“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屁话！

——1967 年 2 月，在京西宾馆，明明是几个“坐天下”的老帅和几个副总理（实际掌军权的人），向毛泽东发难，在全国掀起军队向造反派开抢的恶浪，铁定构成为“二月逆流”。为否定文革，它就变成了“二月抗争”。

——“揪刘火线”本为毛泽东默许和支持，仅仅在中南海西门外活动，连西门都未堵塞。但是，“妖魔化文革”者却将此说成是“围困中南海”（中南海还有北门、西北门、南门可供出入）。他们还将受毛泽东支持的“倒刘”活动变成了“向毛泽东施压”的反革命活动。

——对“造反派”泼洒的最大一盆污水是“无法无天”。其主要依据是，指责“文革运动”对当权者不恭，即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就对“走资派”进行批斗。文革初期的事实也是，只要是当权者，就都可能被认定为“走资派”，随时都可能被拉出去批斗。弄得当权者人心慌慌，朝不保夕。

我要问的是，共产党当权之后，真心实意制定过法律吗？用毛泽东、陈云等人的话，有了法律，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没有法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几十年来，掌权者对老百姓不正是这样干的？老百姓原本无法可依。他们对“掌权者”的不恭，只能从掌权者身上寻找原因。

.....

当上述谎言经过渲染终于变成“真理”时，“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老一辈”之类的粪尿，就都一鼓脑儿泼洒在造反派的头上身上！

就凭上述政治魔术，手心翻成手背，造反派就一切都错了！不仅错了，还变得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革命老干部”就变成了“还乡团”；虽然一直没有人给“保皇派”平过反，但是，有人早已公开地喊，他们当年“保对了”！

北京地质学院是这样被“消灭”的！

1970 年年中，与“批清运动”开展的同时，在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北京地质学院及北京的其他十几所院校被迫迁出北京。

对“文革”极端仇视的英雄们，对“文革”对学校教育的破坏津津乐道，却闭口不谈没有了造反派的这次大迁校对学校教育的大破坏。据地质学院的公

开资料：“在仓促搬迁中，仪器、图书、资料、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惨重，教职员失去了稳定的安身立命之所，美丽的校园被蚕食、侵占。”⁵⁷

教学设施、教学仪器、资料的丢失损坏还在其次，主要是高校及科研院所人才的大量流失，人才结构配置的失调。

如果迁校是科学决策，是正常的公事，又何必“仓促”！

我认为，所谓“仓促”，是为分散造反派的仓促，是为整造反派的仓促，才造成了北京 1/3 高校的“大迁校”。

“校园文革”只持续了两年。“校园文革”之后的“8 年文革”，才是致命的。学生被全部分配出校以后，“走资派”还乡以后，以“清查 5·16”为主旋律的“批清运动”，矛头所指，只有普通的教师和党政干部。“清查运动”才真正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革文化的命”。

对此，有人追究过吗？有人“否定”过吗？

我至今仍然没有改变的看法是，作出迁校决策的上层人物与“清查 5·16 运动”的决策者是同一批人——他们恨的是以“地质东方红”为首的北京高校的“东方红”派，即“三司”派。

《地大校史》是这样描述地质学院的“清查 5·16 运动”的：

1970 年夏，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他们心怀叵测地在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了所谓的“批清运动”（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时间，校园中，“批清”成为工作的中心，军宣队领导紧跟“部署”，以办各种“学习班”的名目，采取“政策攻心”、“忆苦思甜”、“启发诱导”等逼供、诱供、串供的手法，“五·一六”帽子满天飞，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这一运动中，有的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有的被点名批判，不少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有相当一批“文革”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校友受到株连。⁵⁸

上述这段话引自官方出版物，实际的情况比这要严酷得多，血腥得多。

请问，1950 年代初期决策在北京建立“八大学院”的英明领袖们，在十多年来，又“仓促”决定将这些院校外迁，是不是变得不那么英明了呢？显然，首先是“还乡团”，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一切都是“从政治出发”的。中国高校的建设，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在他们优先考虑的思绪里。为专制制度的延续而呕心沥血的政治家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权势利益，是千年帝国的江山永固。如果民众的温饱，国家的富强与此发生矛盾，都会被搁置一边。

地质学院的“5·16”是这样“突破”的

北京地质学院是在迁校过程中，开始并进行“清查 5·16 运动”的。这中间，因为辖区的转变，军宣队也发生了变换，改由湖北岳阳军分区派驻。这个军分区的政委李庆芳顺理成章，就成了新的军宣队的头儿。军宣队的领导机构叫“指挥部”，李庆芳也不叫政委了，改叫“指挥长”了！

北京地质学院的“5·16 反革命集团”就是由军宣队采用军事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与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一脉相承：将人随意长期关押起来，不准回家，不准与他人联系，不准看书看报，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却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造反派不时被拉到批斗台上拳打脚踢、低头哈腰，

⁵⁷中国地质大学校史编撰委员会. 励精图治五十秋.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2. 10.

⁵⁸《地大校史》，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2. 10.

不承认反革命罪行就不准吃饭，不准喝水、不准睡觉，还要用各种酷刑……逼迫其背叛，逼迫其说出他们想要的话，写出他们想要的材料。

在不停地叫喊“不要搞逼供信”，但事事处处又都在逼供信的森严的环境中，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而走上了绝路。⁵⁹

在肉体的精神的严重折磨下，有的人“揭发交代”了，又牵扯出一批人进了隔离室。这一批人进了隔离室，又牵扯出一大批人进了隔离室……于是，主政者的成绩就越来越大，他们深挖“5·16”的劲头也就越来越大。

“突破点之一”陆炎德

北京地质学院“清查5·16运动”最先的“突破点”是陆炎德。此人文革前曾当过探工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初期成为探工系的造反派。此人家庭出身不好，军宣队又抓住他的其他一些弱点，首先要他交代参加“5·16”的问题。军宣队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始获得了一份由军宣队执笔，陆炎德招认，共同编造出的地质学院“5·16反革命集团”的第一份黑名单和资料。陆炎德为了能免除“狗洞之灾”，按照军宣队的口径，在全院“宽严大会上”宣读了这份“揭发批判”稿。在人们惊愕未定之际，包括李贵、贾振远在内的第一批“5·16上层骨干分子”就已经宣布，并被送进了隔离室。

由陆炎德而其他人，一层层地咬下去，咬得越多越好。咬到最后，凡是参加东方红的师生，几乎都成了“5·16”分子。

“突破点之二”刘佛兴

地质学院“冲击中南海”，“整周恩来黑材料”、“绑架周恩来”的“始作俑者”，是由另一个“制造中心”编造出来的。这个制造中心的中心人物是刘佛兴。

刘佛兴，地质系1962届毕业生，我的同年级15621班学生。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任“红普联”负责人。革委会成立后，先后任地质系革委会主任，院革委会委员，常委。如此一个“地质东方红”的“骨干”，谁曾想毕业分配到安徽一个地质队后，在军宣队的逼供下，不仅承认自己是“5·16”，还肆意糟践他人。结果，在他的咬索下，许多以前跟他一起战斗的东方红战士都被牵扯进来，成了“5·16分子”。

据徐冰和袁静宜说，他对郁秀荣⁶⁰等同学的“揭发材料”是这样写的：依据郁秀荣等在学校的表现，他们“应该是5·16分子”。

刘佛兴交代：“地质学院有人整过周恩来的黑材料，绑架过周恩来”。这罪名后来就被青海省地质局的党委副书记石占泉、保卫干事张树忠加到了我的头上，成为青海省地质局上报青海省公安局将我“逮捕法办”的主要“根据”。

刘佛兴在清查中，是否如陆炎德一样，以“揭发”换得了自己暂时的自由，我不大清楚。但是，“抓5·16运动”之后，几十年来，他一直躲着地质学院的学生、老师。据说，他更名为刘文兴——这意味着刘佛兴已经死了。

2010年前后，因心脏骤停，淹死于他垂钓的鱼塘中。

⁵⁹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⁶⁰时任地质学院广播台播音员，“高旗无畏”战斗队成员。

贾振远老师与刘佛兴相类，在经历了各种残酷的压力之后，终于屈服。最后，变得孤独，也不大与友人交往。

“突破点之三”李佩兰

地质学院“5·16”的第三个制造中心是勘探系“108将”的制造者李佩兰。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共有一百二十多个教职员。但“5·16分子”就抓出了108个，凑了个梁山好汉数。全系的教职工几乎都成了“反革命”。原先的“依靠对象”一个又一个地进了隔离室，全系关的人比看押的人多得多。

看管的人不够，就起用当时不受信用的“右派”，让他们来看管党团员。军宣队把这叫“以毒攻毒”。

即是这样，因看管者有限，有许多人仍然进不了“学习班”，只能“走读”。林彪摔死之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有所收敛。

勘探系之所以整了108人，主要“归功”于李佩兰。李佩兰原是勘探系的党总支副书记，文革初期就站在造反派的一边。他被打成“5·16”后，很想不通，与军宣队斗争了好长时间。后来，她看到那些原先不怎么样的人，通过抓“5·16”，都风光了起来，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她很气不过！于是，她也“揭发”起来。这一揭，就凑足了108数。

在这场“误会”结束后，我曾问过李佩兰：为什么要这样干？

她说：“这样作的理由有二，一是，看到那些专门整人的家伙借抓‘5·16’之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气人得很！他们不是一再要我揭发交代么？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专门揭发他们。谁整人积极，就揭发谁。有一次，一个从1957年‘反右斗争’中起家、保工作队有功的教员整我很起劲，可是我一下记不起他的名字，不好‘揭发’他。有一天在饭厅里我看见了他，就对‘陪同’我买饭的专案人员说：‘他也是！他也是！’第二天这个教员就被隔离了起来。他不服气，要跟我对质。我对他说，你急什么？你有啥不服气的？你不是说我们发展了许多‘5·16’么？你也是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发展的。我现在‘觉悟’了，把你揭发出来！他这才明白自己‘罪孽深重’，不吭一声了。二是，‘5·16’越多越好。大家都是，大家就都不是。”

由于有了上述的突破，军宣队及已经复辟的“原党委”的领导们（如王焕、高元贵等），1966年6、7月保党委、保工作队的保皇派们，如陈安民、朱思贵之类，不仅乐于看到这些材料，还将这些编造的材料，寄发到全国，招致由地质学院分配出去的五届学生，大部分受到清查、迫害。

王大宾的“清查”遭遇

听贾振远等人的录音

王大宾是从四川被押送回北京的。为了逼使王大宾交代，1971年3月9日下午、10日，连着两天，军宣队给他放录音。

贾振远老师是革委会常委，被逼无奈，只好承认自己是“5·16”。后又觉得太冤，又翻案。再逼，又承认……他就是这么反复着。军宣队为他写好了稿子，将他从不承认是“5·16”到“承认”，后又“翻案”，又“承认”的转变过程，搞成了录音。其实，那录音是军宣队的大作。

他们给王大宾放的，还有大会批斗、逮捕中央财金学院头头敖本立和卫生部一个副部长的录音，师大批斗谭厚兰的录音。

朱思贵、李凡茂给王大宾训话说：“除了聂元梓不是‘5.16’外，文革所有的大小头头都是‘5.16’”。

朱思贵（原张海涛专案组组长）说：“这间房子，原是张海涛住的，他出身也很好，你是知道的，一个贫农孤儿，14岁参军入关的解放军小战士，临到逮捕他之前的一天，他还说，他不是‘5.16’，说以他的党籍担保，地质学院不存在5.16兵团，不要搞无辜的师生们呢！现在好了，关在牢里，头发长得很长，后悔了！你别走他的老路。逮捕张海涛那天，李贵跳楼断腿了；唐咸正也当场吓得站不住了，后来承认是‘5.16’了。陆炎德识时务，他承认了，学习班也没进。地院‘5.16’的盖子就是这样揭开的，已一年多了。你现在顽固，没有好下场的。”

王大宾说：“外校的情况我不知道，地院的情况，我知道。贾振远录音中讲的全是假话，地院根本不存在‘5.16’，我不是‘5.16’，李贵、王焕、高元贵也不是，各级革委会都不是。你们千万别上当，把问题搞错了。”

李凡茂说：“你不交待，我们不怕，这里饭有你吃的，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你会面对现实的。”

宋翔雁是这样承认“5.16”的

当时，学12楼4层几十间房子都关着人，真是人满为患。江西干校等地也办了“5.16学习班”。

张海涛被捕前，报送公安局的逮捕材料，公安局不收，因为没有事实根据。宣传队即由朱思贵等人连夜重新组织人马，罗织罪名，编写材料，公安局才收下。直到“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北京地质学院才将张海涛接回学校，却什么材料也没有。连逮捕证，公安局也说没有。

王大宾说：1971年10月和1972年春节，两次押我去江西干校批斗。我的老师宋翔雁已被关押460天，是“死顽固”。春节前夕，押他上台和我陪斗。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又拉他陪斗。他的爱人刘照明老师上台发言，劝他承认了吧。并说：“小牛牛（他们四岁的儿子）很想念你回家过年，牛牛说，爸爸你就承认是5.16吧，你就会回家过年的。你承认了吧，为了小牛牛”。刘老师声泪俱下，撕心裂肺，刺痛了我的心啊！四岁的小牛牛，叫爸爸投降，承认是5.16。小牛牛的话，也许最后太刺痛了宋老师的心，这个“臭狗屎”（朱思贵们对我这样称呼宋老师）终于投降，承认自己是“5.16”了。

“王大宾学习班”

据王大宾回忆：

“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抓“5.16”抓到我老家德昌县去了。他们将县、公社、大队、小队的一些干部也当成“5.16”来整。德昌县办了一个名叫“王大宾学习班”，将40多位干部抓来办“五不准学习班”。我在县里当领导干部的舅父，首当其冲被关押。我的小学、中学的同学，甚至我少年时代光屁股时的小放羊娃，放牛娃伙伴们也受到了迫害，要他们交待“5.16”问题。我妈妈无文化，山沟里的妇女，懂什么“5.16”？他们追问、审问她时，可怜的妈妈说：“我虚岁刚过五十，还没有五十六”。真是天大的政治笑话。

我是上大学后，一直因家贫无路费，不能回家。直到 1968 年底毕业时才回家看望了阔别多年的亲友。

想不到，却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残渣余孽”成了看守

据王大宾回忆：

到 1973 年底，专案组的老师也造反不干了。宣传队叫湖北转业在地院工作的张家贵等人看押我。这些转业的战士们，已初步了解冤情，他们坚决不干。宣传队的李庆方指挥长和小李子亲自看押我几天。我和他们讲理，李指挥长也理屈词穷，表示他也没办法，因为是上面江青他们叫搞的。

除了“5.16”，地院剩下的“好人”太少了。他们就派以前当过国民党的伪警察、工人贾洪宾，国民党将军的副官安顺通看管我。这些人必须听宣传队的话。但他们的家属、小孩骂他们，对他们施加压力：“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去看押毛主席的红卫兵？”

这些人也不听话了，只好让从天津来的没有工作干的原资本家何汉（他爱人是地院绘图员，随爱人到江陵谋生）当临时工，看守我。他们还将李鹤忠这样的摘帽右派分子也重用搞专案。

这在当时，是政策不允许的，忌讳的。

“批清运动”进行到“洪洞县里没好人”的地步，进展到不得不用“国民党残渣余孽”来看管“批清”对象的地步，这本就是莫大的讽刺！这本就是执政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死与死犹未死者

死，也未换得清白归

在“抓 5.16”中，北京以至全国，有许多人被整死，有许多人自杀，有许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据我所知，北京地质学院，被整死的人有好几位。

李中学，探工系“71641 打狗队”队长，文革中的活跃分子。毕业后，分配于甘肃省第一地质大队。1970 年下半年，在陆炎德揭发的影响下，在甘肃省第一地质大队受到隔离审查。李中学想不通，即将电线缠绕于左右两手，一合电闸，结束了生命。

温小平，原为物探系教员。后来，调动去了河南三门峡市。清查“5.16 运动”中，因为是从北京地质学院来的，被打成“5.16 分子”，在三门峡市召开的几十万人批斗大会上受到批斗。他想不通，跳进涛涛黄河，成为永远也洗不清的黄河冤魂。同时，一句“死有余辜”，也注定他永远洗不清自己。

李明哲，地质系岩石教研室教员。1966 年，因与李贵一起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邹家尤工作队的问题，而获罪于工作队，成为挨工作队批斗打击的十三名教员干部之一。1968 年，工人-军宣队进校后，却成为军宣队的依靠力量。自 1970 年下半年开始，积极参与军宣队的“批清运动”，并随学校迁至江西峡江“五七干校”，继续清查工作。在军宣队的利诱下，成了“清查办”的骨干要员。因为不满于他的“积极”，他的一位被关起来同事指着他的鼻子赌咒发誓：“某年某月某日，是我亲自发展你加入‘5·16’，你还敢抵赖吗？”于是，李明哲就从“清查办”被请到了“学习班”（隔离室）。到这时，他才知道“5·16”究竟是什么人，他才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

他逃出了干校的学习班，走进了大森林。最后，将自己高吊在赣江边大森林中的一株大树下。

军宣队给他的结论是“畏罪潜逃”。

几个月后，他的尸体才被当地民众发现……

王海洪，被迫害，自杀身亡。

李自治（工厂党的书记），病得很重，直到被整死。临死时，他还高呼：“我不是‘5·16’分子！”

死犹未死者

李贵，原地质学院党委常委，教辅处处长，地质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年中，由于陆炎德的“揭发”，而成了地质学院“5·16上层骨干分子”，遭受隔离审查。因不堪忍受隔离审查、车轮战和批斗会的折磨，决定以死洗雪自己的清白，从四楼上跳下。不幸的是，只是摔断了腿，人却还活着。

胡乐成，文革初期，跟着朱成昭，活跃于“地质东方红”舞台。在“批清运动”中，因为受不了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的逼供折磨，神经受到很大刺激，就开始为军宣队编造瞎话。始，今天咬这个，明天咬那个；后，又加以推翻，什么也不承认。更有甚者，说他与某某曾从某某地弄回了枪枝，玩了一阵后，埋于某某地。军宣队如获至宝，立即让胡乐成带着去查抄。可是，在山沟里瞎转了若干圈后，却找不到地方。后来，“勉强”找到了地方，却怎么挖也挖不出来，只好放弃。

绵延的“清查”没有止期，胡乐成的神经就一直崩着。后来，不提起“5·16”，他神经还正常，一旦提起“清查 5·16 运动”，就会滔滔不绝地向人说起自己的冤屈，说起军宣队逼供的残暴……

“老五”郑文卿，国家地震总局的许多人都知道，兰州地震研究所有个大名鼎鼎的“老五”。这个“老五”就是文革初期，曾经与朱成昭一起造反，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地震研究所的郑文卿。因为抓“5·16”没有穷期，郑文卿的名字也逐渐被人遗忘，人们只知道兰州研究所有个“老五”（“老 5·16”），而不知郑文卿为谁。

郑文卿：20世纪末那一年的某一天，我单位召开评功大会，我在会上讲：“在兰州地震研究所，论功劳，我的功劳最大。”

听了我这句话，有些人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们看什么？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问你们，踩着我的肩膀爬入共产党内的党员有多少？爬到副所长、所长、书记或更高岗位上的官员有多少？”不信，咱们可以掰着指头算！

大家听了，谁都没有放一个屁！

李思田老师，在“批清运动”中，因为不堪忍受逼供，将电线缠在手臂上，按动了电源。是电压不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电流只烧烂了他的手臂，却并没有要他的命。这位幸运活下来的老师，后来成了煤田系著名教授，国内知名的学者、博导，还想竞争科学院院士。

我，聂树人，曾经自杀过。在北京的传言是：聂树人死在冷湖。

胡轩魁，北京地质学院 1964 届毕业生，来自于河南三门峡市，其父为该市市委书记。到校后，被选入院学生会，两年后留校，成为边上学边工作的学生。

文革中，加入红干联。革委会成立后，在院办公室工作，曾担任过王大宾的秘书。“批清运动”中被打成“5.16分子”。军宣队逼其承认“5.16”。他们威胁说，如不承认，其弟的飞行员资格将被取消——将立即被开除回家。

据胡轩魁说，为了能保住其弟的飞行员资格，他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是“5.16分子”，不得不编造假材料！

第 43 章 最初的隔离生涯

被隔离的那一天

1970 年 4 月中下旬，地质五队野外分队的职工陆续去野外工作。在 4 月初公布的组队方案中，我被安排在队部伙房，与 11 级地质技术员刘殿柱一起，当炊事员。

1970 年 10 月 22 日，一位名叫石俊清的军人千里迢迢从西宁来到了地质五队。这天的下午，地质五队办公室前的篮球场上，从野外收队回来的几十个人排好了队，队上一位领导向大家介绍站在其侧的一位军人，说这是地质局派驻队上的军代表，名石俊清。

这个人中等个头，脸红红的，有四十多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人的嘴里镶着一颗闪光的金牙，给我以“人品不良”的印象。

1970 年 10 月 23 日 19 点 30 分，晚饭后，我按照队上的开会通知，到达队部北面的一排土房子里。

到会的人以队革委会副主任侯桂瑞为首，除“组织干事”黄在忠外，还有希望从地质分队党支部委员往上升迁的转业兵井耕喜，有希望早日入党的外号叫“胡老狗”的技术员胡晓武，有在文革初期将“吴守成”改为“吴红兵”的一个四川籍中专技术员。

据说，侯桂瑞在文革前，是一个转业兵，汽车司机。文革初期，如何成为造反派头头，及队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得而知。

他们招呼我在里间的床沿坐定后，侯桂瑞突然冲着我说出了令我极度吃惊和大感意外的话：

“聂树人，因为你有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什么，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我有什么问题？！”

“你有没有政治问题，你自己清楚。”

“你们这是政治迫害！我抗议！”

“隔离审查！”那就是说，我已经入了“另册”，进入了“运动员”行列。

这件事其所以令我极度吃惊和大感意外，那是因为，一直以最忠于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居的我，怎么可能在一霎那间就变成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敌人？！在那个时候，所谓重大政治问题，与“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同义语。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最忠实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热血青年，是绝不应该遭到共产党的毒杀的！

羊落狼口，虎处平阳，只能任人宰割。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苦难历程。

1973年7月，当我从西宁探矿厂的5·16大院中走出来后，地质局里的一个知情者告诉我，1970年，我之成为“‘5·16’上层骨干分子”，源于中央最上层的决策。当时，按照部署，王大宾应从四川押回北京，我应从青海押回北京。但是，这指示到了青海，就打了“折扣”。青海省的上层人物及地质局的军代表认为，这是他们立功露脸的一次大好机会：对一个“钦定要犯”进行政治审查和打击，真是荣耀无比。因此，它们一再向北京打报告，要求“就地审查”。他们表示：“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不折不扣地办！”结果，吴法宪乘飞机到四川，将王大宾押回了北京，被关在学12楼4层⁶¹。我却被留在青海。

我的命运和遭遇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必须“挖出”我的“重大罪行”，方能建功立业，方能向他们的上级，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同仁交代。

可是，如何挖出我的“重大政治问题”，却是半年以后的事情。

隔离室被钉上了木板

显然，进了隔离室，从此，我就进入了被革命绞杀的程序。以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的地质五队的隔离室，如同砧板，放上去就意味着得任人锤打；如同菜板，放上去就意味着得任人宰割。

三天后的上午，三间房子的三扇后窗外突然热闹了起来，板条落地，脚步杂沓，人声嚷嚷。我无心立窗外望，依旧看我的书。可是，很快，有人就在窗框上叮叮咣咣钉了起来。不一会，原本透亮的后窗就被钉得严严实实，一点光亮也没有了，我只能移师前窗。我烦极了，愤怒极了，似乎那钉钉子的锤头一锤锤都钉在我的心上，似乎失去了从后窗透进的光亮，就失去了希望！

然而，我不能发作，只能忍耐。我知道，发作也没有用。对此，最好的回答是什么也装作没有看到，没有听到。用我在隔离室门背后板报栏中写的一句自嘲话，就是：且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对自杀的否定

我曾经自学过针灸。在隔离室里，我曾经以针灸用针轻生过。

我曾托人买过一套针灸用针和有关的书。在我被隔离以后，我曾将书和针都拿到了隔离室研究，以转移我烦乱的心情。

我对照书本，先在自己的手上练习，后来，逐渐转移到胳膊上腿上。再后来，将针扎到头上，从头前扎到头后。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感觉和体验，掌握这种简单而较为有效的医道，并探索个中的科学道理。

一次，在后脑部位扎针的时候，不知何因，我突然有了将针往深部扎进的想法。在书本里学过，那里是生命中枢。一针下去，很可能使我的生命走向终点。在那一霎那，我好像没有犹豫，没有迟疑，继续往深里扎。我希望死的到来。那样，一切就结束了。

⁶¹2004年底朱德瑜面告。
蓋由是物探系的教員告。

但是，针扎进去了许多，我却并没有死。是针扎得不到位，还是针对生命中枢原本就不起作用？

至今，我也说不清我当时为何突然冒出强烈轻生的冲动。对自杀，我当时或许认为，死亡是对生活压迫的最终解脱。

但不管是因恐惧而死亡，还是把死亡浪漫化，我都是把它当做儿戏。在我看来，死亡既不会令人沮丧，也不会令人兴奋，它不过是生命的事。自杀者可能对死亡一点也不恐惧。许多身处逆境的人，或许就是在具备轻生的特定环境里，在冲动出现的一霎那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

不幸的是，死者没有了事后，我却有事后。

事后，我问自己：“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想，我是清白的，我要等到还我清白的一天。我要亲眼看到那些制造黑暗的人倒霉，看到他们向我赔礼道歉。此外，我还想到，我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中有妻子，我这一死，将给他们带来多大灾难！

想到这些，我认为，自杀是一种逃避。

我对自己的绝望感到可耻！

我活下来了，却没有看到那些黑白颠倒的人的倒霉。他们不仅没有倒霉，还活得比任何一个中国平民百姓要好，直到 21 世纪！

屋门背后的“小字报专栏”

或许是虚荣心所使，刚进隔离室时，为了说明真相，希望“看守”们了解真相，也希望通过他们让全队的职工知道，我聂树人没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我曾经自办过几期“小字报专栏”。

小字报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洗刷自己，还自己以清白；二是揭发和声讨韩忠民，让人们认识他打击报复的无耻嘴脸。

洗刷自己，是因为有人往我身上泼污水。那时候，毛泽东还健在，中央文革小组还在挂牌营业，对造反派的大规模的声讨，还没有明火执仗地进行。但是，已经将造反派头头称为“坏头头”了。

我出“小字报专栏”，直接目的当然是在为自己辩解。客观上，却是在与毛泽东及其指令的执行者进行对抗。

屋内的其他平面都是土墙，贴不上去。由四页 16K 纸组成的“小字报专栏”只能张贴在屋门的背后。

我知道，此举肯定为韩忠民和军代表所不容。因此，我在晚间 10 点以后方贴上去。并且，贴得很紧，让他们难以撕掉。我预先就想到，为了收集并保存我的“新反革命罪证”，他们肯定要完整地撕下来，这“专栏”是绝不会长期存在的。只要能存在一个小时，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只要有人看了，就会一传十，十传百。

值夜班的工人对我这种不法之举无动于衷。此时，他们往往是一个人坐着，其他人睡觉。夜半时刻，那坐着的人也迷迷糊糊地，并没有制止我。

韩忠民和军代表事先肯定想不到我会这么干，因此，也没有交代这些看守者该如何做。而且，出于好奇，看守们也想看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

此时他们也无法向领导报告，只有等到第二天上班了。

第二天，隔离室的“前线负责人”井耕喜，在得知我贴出了小字报专栏第一期后，就立即和政治处的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局下派干部来到了隔离室。

大柴旦地处柴达木盆地北缘，气候十分干燥。我以稀饭糊或馒头糊粘贴在门板上的纸很快就干了，并牢固地与木板连接在一起。他们在浏览了内容后，试图撕揭下来，但是，没有成功。

“干脆，换门扇算了，这门扇可以抬到西宁去。”我站在里间的门洞边，对他们说。

井耕喜等人不理会我的话，走了。于是，专栏又经过了第二拨值班者的过目。看此情景，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会儿，他们又来了。不知何人想出了个损招儿，端来了一盆水，用手向专栏的纸上小心地撩洒。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轻轻地往下揭，还真地完整地揭下来了。此时，井耕喜看了我一眼，显示出成功后的洋洋得意。

第二次出专栏是在几天之后。这次，值班的一个工人说话了：

“不要这样嘛！这样不好。”

“怎么样才好呢？”我边贴边说。

因为我事先就在纸上抹好了浆糊，不要一分钟就贴上了。

“咱们前世无仇，今世无冤。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是个什么人，没有其他意思，连累不到你们的。放心吧！”

这一次，我虽然将纸故意选得薄一点，但是，还是让他们弄湿揭下来了。

这样也好，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它。如果他们能将这些写满愤怒和辩解的文字送到西宁，送到北京，送到毛泽东的桌前，那就好了！

记得小字报专栏办了四期。以后没有再办下去的原因是，我该说的话说完了。不想跟他们玩了。

但是，我太天真了。毛泽东要整肃造反派，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要讨好周恩来，周恩来要借机贯彻他的意图，哪里还在乎事实真相！而且，真相，或者真理，就在毛泽东的手中，他说你对你就对，他说你错你就错。凭着几期“小字报专栏”，就能改变？

心随大力到北京

看守我的工人来了走，走了来。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大约10点多钟，只有看守张连奇一个人。

时交11月，职工们大部分都要回故乡探亲。要探亲了，看守们大都思想不稳定。可能的情况是，韩忠民虽然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信誓旦旦地发了誓，但是，入党、提官，并不能立即兑现。况且，在许多人心目中，吃政治饭的人说话大都如放屁，信不过。全家团聚，夫妻亲热，这才是最现实的。百姓也有百姓的法定利益——探亲假是国家规定的，不能随便推后，更不能取消！

出于无奈，韩忠民和军代表只能不断调整看守人员，后来，不得不减少看守人员。

即使如此，部分人，人在隔离室，心却早就飞向了几千公里之外。况且，临走前，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办，还得思前想后地准备这，准备那。这样，对我的看押就放松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很“老实”。在经历了最初的愤怒、不安和不习惯之后，我经过深思熟虑，就只能等待了。我自知抗不过打着党和国家旗号的英雄们的胡作非为，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等待政局的变化。

我自信我的清白无辜。他们可以打倒我，但是，绝不能打败我。

张连奇走进了里间。我看到他似乎有话要说。

“请坐。”我指了指床沿。

他朝外看了看，没有坐。

“不少人私下里说，你没有问题。但是，大家谁也没有办法。现在，到处都在抓‘5·16’，我妹妹也成了‘5·16’。”

这话像冰天里的一股热气吹进了我的心窝，我的周身立刻感到温暖。

这句话，也使我了解了全国的形势。

“中国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我回答了他一句。

或者，用不着我再回答什么。

两句话将我们距离拉近了。在这个国度里，傻子也知道，一句话说的不合适就要倒霉。“沉默如金”始终是中国政坛成功人士的秘诀之一。这位以前我只知其名，从没有打过一次交道的工人，却冒着风险，与我说了句心里话。是同情？是关切？是不平？是呐喊？是愤怒？是抗议？可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道出了政治理论家研究了几十年、写了几十年、堆砌了几十亿词汇都没有说清的世间现实。

我曾经很迷信书本上的话，报纸文章中的话。因此，我在前几年办报时，不仅很卖力气，还对重要文章中的重要的话常常进行过反复斟酌。因为，我认为，人们是会按报纸上说的去行动的。现在，我却不这么认为了。我现在的看法是，不仅我们当年出版的小报狗屁不顶，就连出了几十年的正规大报，上面也是屁话连篇，虚假得很。

在我的隔离室里“上班”的工人也不一样。为了不使我受冷，有的人将火炉烧得旺旺的。有的工人给我打饭，要问一句想吃什么。有的工人则什么也不问，想打什么就打什么。

我对张连奇的判断是，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大写的人。我对他说：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们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哪能干反革命的事呢！他们这样搞，长不了！”

因为外面有脚步声，张连奇立即退到外屋。

又过了两天，张连奇趁屋里没有其他人，又对我说：

“再过几天，我就要探亲回家了。”

“你家在哪里？”

“山东泰安。”

“你回家路过北京吗？”

“一般不路过。”

他立即明白了我问这话的意思。

“有事吗？”

“如果你路过北京，能去我家看看，把我的情况告诉我爱人。也顺便到中南海西门一趟，给周总理送一封信。”

“可以！你把到你家的路线和地址都写清楚，另外，给我一张你老婆的照片，以免认错人，上当。”

为了安全，一切都在少言中，不言中。

我生不逢时，没有做过地下工作。我想，我们两人现在偷偷摸摸所进行的“工作”——如果这也叫工作的话——是不是“反革命的地下工作”？

“好，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我老婆的照片得明天回宿舍去取。我准备好了，会大声咳嗽两声。信就放在这里，你自己拿。”

我指了指靠近门框的床头。

我立即开始了“工作”。

我给妻子写了封信，并详细画好了一张从北京站到北沙滩的公共汽车线路图。也画了一张进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大门后，到家的线路图。我希望他拿着这两张图，不用问人，就可以直接找到我的家。

接着，我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我现在的境遇。我之所以给周总理写信，而不给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信，主要是考虑安全——既有张连奇的安全，也有我的安全。毛泽东可能知道我，但是不熟悉我。只有周恩来既知道我，也熟悉我。我认为，“5·16”早就抓光了，1970年以后抓“5·16”，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乱来，都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在胡作非为。地质五队抓我的“5·16”，则完全是政治迫害。

那时，我还在用老眼光看周恩来。

为送这封信，我也画了去中南海西门的一张图。在图边，写着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电话（开头的数字是39）及一个叫王文正的联络员名字。这个人，文革中与我熟识，上年（1969年）底我到北京时，还和他通过电话。他对我很客气，说，如果我有事，可以找他。

现在，我真地有事了，有了大事。希望他能把我救出火坑。

两个小时之后，我就把这一切都完成了。

我走到里间门口中，观察了一下动向。张连奇坐在火炉旁边，另外两个工人正和衣睡觉，一个人还打着鼾，只是声音不很大。我咳嗽了两声，张连奇回头看了看，却无动于衷。我又回到床上睡觉。

我相信张连奇在得了我的暗示后，迟早会来取走信的。

事实上，我是作好了失败的准备的。我也曾想过，我的“臭硬”，使韩忠民及地质局的英雄们极端头痛。韩忠民等以空前的疯狂，对我进行逼供，但是，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反间计也有可能。

张连奇是不是韩忠民派到我身边的暗探？就我的直觉说，我是相信张连奇的诚实的，正直的。无论如何，这世界好人多，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发几句牢骚；对社会不公实在看不惯时，也会说几句或痒或痛的公道话。这是我判断的“一万”。“万一”呢？我还不能完全排除“万一”的可能。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原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更不是什么“5·16”，原本就不存在“通风报信”、“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之类的前提，我何怕之有？！我希望张连奇到北京去，一是为了向妻子说明情况，使她不至于过分担心；二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为我申冤，让中央领导知道“清查5·16运动”是不对的，应尽快纠正。这样的行动策划，这样内容的信件，即使张连奇交到韩忠民们的手里，他们又能把我怎样？送到中南海的信件就更不怕了，我在信中还能去反对周总理？

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在没有百之二百的证据证明张连奇是暗探之前，我是不能暴露张连奇的。

第 44 章 在地质五队的“噩梦”

我被扭断了胳膊

1971 年 4 月，是地质五队准备出野外工作的月份，也是我的噩梦升级的日子。

每当召开批斗会的时候，许多人的眼神告诉我：我们帮不了你。有一点点正义感的人，都被赶尽杀绝了；还没杀绝的人都自身难保。

每次批斗会开始的时候，除两三个精心编造的批判发言外，逼供就进入既定模式。这种既定模式除了谎言、帽子和口号、拳脚之外，没有其他。

“聂树人，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我没有罪！”

“老实交代你是怎样组织和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

“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这是造谣！”

“你反对江青同志！”

“没有，这是造谣！”

“你狗胆包天！公然在全校大会上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现在还不承认！”

“我那是在解释她的讲话，这与反对是两回事情！”

“你反对周总理！”

“这是造谣，我从来都不反对周总理。”

“你们‘5·16’就是反对周总理的。”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5·16’，我不反对周总理！”

“你狡辩！”

“不讲事实，不讲道理的人才狡辩！”

我义愤的反驳招来的只有拳脚和暴打。

批斗会开多了，石俊清、韩忠民之流的无耻也暴露得更多。石俊清和韩忠民从地质学院军宣队和陈安民那里批发来的假货经不住我的辩驳，一个个露出了原形。在批斗会上发言的就那么几个人，对我逼供的也就是那么几个问题，对我动手动脚的也就那么几个好汉。

孔学全，一个山东籍的老转业兵，40 多岁。没有到过朝鲜，其当兵的资历要短于李德森。1969 年在 501 工区时，此人主动接近我，星期天或雨雪天休息时，常邀请我到他住的帐篷下棋、聊天，和我关系颇好。他曾对我说过，他家虽然离海较近，但是，他不吃鱼。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鱼刺扎了喉管……

此人大字不识几个，却官欲熏心。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在批斗我时，不再是棋友了，不再认识我了，他惨无人道地扭断了我的左臂，使我的左臂肘关节脱臼。

我绝食，以示抗议。

绝食三天后，井耕喜来和我谈判。

估计，我在大柴旦的遭遇会很快反映到地质局，反映到地质学院。井耕喜之来，是否受到上面的干预，不得而知，但是，在我强烈的责问和抗议下，他答应以后的批斗会不再会有武斗发生。

我不能死！死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死了真不如一条狗。况且，我自认为我的命比石俊清、韩忠民要值钱得多——他们算什么东西！

事实上，在以后的批斗中，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未再发生拳打脚踢的事情，也不敢用力扭我的胳膊了。

虐待，逼、供、信，武斗，体罚，“坐飞机”，无所不用其极，就差没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除过大小便被人押解着去露天厕所外，这里没有放风一说。除过高墙和电网，除过枪炮和哨兵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地质五队的干打垒隔离室完全可以同白公馆、渣滓洞媲美。而高墙和电网，枪炮和哨兵，在这里是不必要的。如果没有车接应，在这高山环抱的戈壁荒漠里，就是让我出逃，不出两三天，不是饥渴而死，就是被狼吃掉。

同窗同类遭劫

张玉锁与我同命运

1968年下半年，一块儿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地质五队的同学有十几位，可以分成三类：

一类是积极整我的，有东俊明、孙宝信、王惺之；

二类是基本保持中立者，有杨国翰、虞家珍、刘安保、李延鸿、徐仲玉；

三类是我的同党或死党，有陈宝堂、崔清禾、张玉锁、朱筱丽、胡正煌。

自我被“隔离审查”以后，我在地质五队就再也没有第三类同学的声音。直到1971年，被押送西宁探矿厂“5·16大院”时，才见到了张玉锁，此时，他“身份”也与我一样，是被押送者。而且，押送我们两人的车辆都拉开一段距离，中途吃饭，也不在一个饭馆里，实行着“路途隔离”。我们只能在远距离上相互看上一眼，以目传情。

我的其他同学呢？



地质五队的“5·16”同窗（部分）

前排左起：崔清禾，胡正煌

后排左起：张玉锁，陈宝堂，聂树人

（1969年摄于青海省大柴旦）

张玉锁后来告诉我，他是在1971年4月下旬吃忆苦饭后的第二天即被隔离的。而他的妻子朱筱丽已先期被押送出地质五队，到了队部在共和县的地质十队。

陈宝堂成了“救人英雄”

1973年7月，我从“5·16大院”中出来后，才相继知道，陈宝堂在我被隔离后，即被“分散”调到队部在青海省东部乐都县的地质四队，胡正煌被“分散”到队部在青海省北部祁连县的地质二队，崔清禾被“分散”到队部在青海省中部共和县的地质十五队。

陈宝堂，一位河南（许昌）籍的68届同学。出身贫家，为人正直忠厚诚实，不平则鸣，爱说大实话，不注重名利。这种性格先天注定，文革前，他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还会被视为思想落后的“准右派”；文革初期，必与邹家尤工作队“打‘高’保‘周、聂’”的既定方针相对抗，成为工作队“反干扰”的对象。

1966年8月，他成了勘探系三年级“红色尖兵”的负责人。这个战斗队是“地质东方红”早期人数最多、最有战斗力的跨班级战斗队。

1967年4月3日，地质学院革委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院革命委员会委员。

我被隔离之后，他虽然没有被关，但是，也处于半自由状态。韩忠民对他要求回家探亲的申请不予批准。到了12月份，探亲申请方得批准，谁想，这却是一个圈套。他刚到西宁，就被地质局的“清查大员”扣留，被用“大枪”（陈宝堂语）押送到地质四队“隔离审查”。

地质四队的党委书记名贾宝林，一个为人正直，性格爽朗，敢说实话，人格高尚，不畏权贵的基层党的领导人。在性格上，与高元贵有些相似。

陈宝堂被押送地质四队后，即被隔离。用陈宝堂话说，是“被大枪看着”。

1971年的4月底，陈宝堂被贾宝林安排到野外从事地质工作。这种安排，显然有违地质学院军宣队的旨意，也有违青海省地质局军代表的意愿。

贾宝林不认为我们这些人会是阶级敌人，他的同情在我们一边。然而，他作为党委书记，又不能不听从上级的指令。因此，他在“隔离审查”的大前提下，对“隔离审查”的方式进行了“变通”：以地质四队技术人员紧张为由，让陈宝堂到野外地质分队去，“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

由此，在贾书记的庇护下，陈宝堂就免除了“牢狱之灾”。

谁又曾想到，一个清查对象会成为救人的英雄。是年夏季的一天，陈宝堂所在分队一同志不慎掉入冰凉的黄河水中，在一个大旋窝中随水流旋转，眼看就要沉没。分队里的共产党员们，和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们，都站在岸边给落水者大声出主意，却没有一个人下水相救。陈宝堂水性也不大好，但是，想到人命要紧，立即拿来一条绳子，拴在腰间，让人拉住另一头，即跳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经过几番努力，终于抓住了落水者……

这种事，要是别人，早就上了《青海日报》，至少会成为当年的局级先进分子。陈宝堂不行，他是清查对象，是政治上不受信任的人。

分队里的人则进一步认识了陈宝堂，没有人将他视为“异类”。

是年底，分队收队经过西宁。陈宝堂没有依照规定回到队部，而是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河南老家“探亲”。

1972年4月，陈宝堂回到西宁，到地质局的“5·16学习班”“报到”。他说，他不想让地质四队的人，特别是贾宝林书记为他承担责任。

可是，这时，“5·16学习班”不收他。

同窗异类的疯狂

“假马列”大喊大叫

在专制制度下，权力成为推动镇压的唯一手段。没有人再敢说真话了。

1969、1970年，在地质五队，曾经以造反派自居并将我捧上天；几个月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认为洪全是“反革命分子”并向地质五队领导“揭发”或“告密”的东俊明、王惺之、孙宝信等，在“清查5·16运动”中，成了“揭发”、“批斗”我的急先锋，成了“新造反派”。

查这些人的“造反”史，都不是邹家尤工作队“反干扰”时的被压迫者，而是“地质东方红”胜利后的跟随者。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为讨好领导，他无中生有或无限上纲地向自己的校友洪全捅刀子。

在“抓5·16运动”中，地质五队的职工都不了解北京地质学院的运动情况。于是，凡是社会上加于“校园文革”时期造反派头上的罪名，如北京天、地两派的“派性斗争”问题，地质学院里“蔡派”与“朱派”的斗争问题，批斗走资派问题，“揪刘火线”问题，“揪军内一小撮”问题，“革委会领导整党”问题，还有眼前叫得最响的“聂树人是5·16上层骨干分子”问题……东俊明等都以“知情者”的身份向韩忠民“告密”，在大小会上对我进行“揭发”。

在对我的斗争中，他在“坚持革命原则”、“政治态度鲜明”、“不徇私情”和“六亲不认”这些成文的不成文的行动准则诸方面，可谓做得尽善尽美。

令我不解的是，在批斗洪全时赤膊上阵，对洪全大动手脚的东俊明，在批斗我时，却没有直接上阵。是羞于面对我，还是另有顾忌？

韩忠民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除王惺之外，他们都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都进步了。在这一点上，韩忠民算得是一个讲信誉的君子。

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在用我的血洗他们的手的同时，双手却沾满了我的血。

令东俊明伤感的是，他在得了共产党员称号的同时，也得了“假马列”的称号。这口号不胫而走，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不惟地质五队，在青海地质局二十多个单位里，未见其人而却知道地质五队有个“假马列”的人，为数不少。

当时，我还不知道“假马列”指的是谁，说者却大感意外：

“这，你还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

“东俊明！”

初听到东俊明的这个外号，总觉得与他对不上号。若与我有关，则岂止是一个“假马列”所能宣示的。

地质五队平民百姓的心里都很清楚，“5·16”是假的，与“5·16”有关的一切都是假的。这就如同一只狗，主子叫它咬谁它就得咬谁。为了咬人，他总得用毛泽东，用马、恩、列、斯这些革命宗主们的话来狐假虎威。这，也离不开一个“假”字。

东俊明因此而被终生钉死在“假马列”这根耻辱柱上，不得解脱！

“王九蛋”上窜下跳

王惺之与东俊明一样，在地质五队以能说会道著称。他好像与东俊明有过分工，一个要在广播喇叭上用党报党刊党的文件及由此派生出的大批判文章杀灭我；一个要在批斗大会的发言中对我进行“十字军征讨”。地质五队的人对我的过去并不了解。在地质五队，我的同学-校友有多位，而上台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的，除徐仲玉外，就是王惺之！他的批判发言被地质五队的领导视为重磅炸弹。

王惺之的批判发言，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北京地质学院“老五届”在地质五队的所有同学和校友，他没有说。可是，在不明真相的人的眼里，他当然是一个代表。在人们心目中，非北京地质学院人的发言都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只有王惺之的发言才能“切中要害”。于是，他对我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的“揭发、批判”发言，就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

但是，地质五队的“好事者”还是从我在批斗会上的态度，从我的其他同学的口中，知道了真相。于是，王惺之也就有了一个“王九蛋”的大号——比王八蛋还坏一筹。

王惺之没有被发展入党，并非其跳得不高，杀人嗜血不多，对组织不忠诚。主要原因一是，不注意策略，在批判会上胡编乱造得过于离谱，连韩忠民及其追随者都觉得有损党的形象。原因之二是，此人“群众印象不好”，这里的“群众”，包括队核心组成员在内的其他党员干部。这些人不举他的手，韩忠民也不好办，故在发展东俊明、孙宝信入党时，他被“暂缓”。随即，他接到了调离青海回山东老家工作的调令。在“调离青海”和“入党”这两件人生大事上，他选择了前者。因为，后者虽有承诺，却还不是现实。

孙宝信拳脚相加

批斗我最积极的我的另一位同学，名叫孙宝信。此人与我同时入大学，同系同年级，住在同一层楼，我在二班，他在五班。虽然专业不同，但是，地质基础课程却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曾经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过大课，同时师从过几个老师。有此机遇，他对我在“校园文革”中的表现，应当比其他人更了解。离开地质学院不到两年，我是他的同学-同志还是“5·16”、“反革命”敌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虽然没有在批斗我的大会上当着我的面胡说八道，但是，为了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在伯乐——地质五队的领导面前有良好的表现，在我坚决不承认有什么“罪行”或是什么“分子”时，他实行了另一路“进步措施”，赤膊上阵，“义愤填膺”地揪住我的头发，对我拳打脚踢。

此后，孙宝信也入了党。

在因整我（也包括整洪全）而得了实惠的同窗中，爬得最高也跌得最响的当属孙宝信——此人后来被调到地质局，当了局办公室主任。后来，却因贪腐有据，被撤销一切职务，成了庶民。

“‘5.16’通讯员”的遭遇

张连奇从北京回到地质五队后，头上就有了一顶新桂冠：“5·16通讯员”。

对于张连奇，他拿着我的信件和爱人的照片走后，我才疑神疑鬼地有了另一种设定，他会不会是韩忠民的暗探？

张连奇走后，一直没有消息。

我在等待的焦虑中度日如年。我不知道我在等待什么。等待妻子的回应？这原本就不可能。不仅不可能，她还会因为我而受到牵连。如果她能见到张连奇，她也只能知道我在戈壁荒漠中的遭难情况，减少几份猜测。对于我的未来，却又会产生出新的焦虑。我在等待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上层的另眼相看？这更不可能！“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想他，他想我吗？当年他解放造反派，是因为他需要造反派。现在呢？即便“抓5·16”不出自他的决策，也出自他的默许。这一点，我心中很清楚。我请张连奇向周总理送信，也只是无奈的“捞稻草”之举，原本就不存什么希望。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忠臣，他绝不会逆毛泽东之意而行事。况且，我们在文革之初，原本就有趋毛泽东之炎附毛泽东之势的狗意，刘少奇死了，走狗该杀了，屠夫哪会同情砧板上的狗！

没有消息，就是消息。如果张连奇是暗探，石俊清和韩忠民就不会不有所“表现”。他们没有表现，就说明，张连奇不是他们的暗探，而是我的朋友。

1971年4月中旬，一天，石俊清突然对我说：

“你很不老实！”

“我不是‘5·16’，你们却说我是‘5·16’，究竟谁不老实？”

“你很狡猾，你竟敢在我们的队伍中，寻找你的代理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的是，事情该有个结果了。

“你还不明白？张大力你认识吗？”

我一直不明白，张连奇为什么又叫张大力。以前，大家都这么叫他。

“认识。”我已经听出了弦外之音。

“你是怎么收买他，叫他给你当通讯员的？”

“我一无权，二无钱，现在还被你们打成‘5·16’，我拿什么收买他？”

我想在周旋中弄明白张连奇的真实身份和事情的进展。

“这正说明你们‘5·16’狡猾，手段高明。”

“……”

我不能多说话，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言多必失。无论如何，张连奇可以背叛我，我却不能背叛他！即便他是暗探，那也很快就能得到证实，用不着我的口供。

就张连奇说，如果他是我的朋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他是暗探，石俊清、韩忠民们也得不到什么。如果他真是我的朋友，我唯一的希望是，他不要为我吃眼前苦。从远处着眼，人们会从此事件中真正认识张连奇，一个人格正直、高大的张连奇！

一个人的好名声，大都是这样得来的。

对于我说来，无论是哪种情况，哪种结果，我都不在乎。横竖，承认不承认，结果都一样——不老实！无论是死猪还是活猪，人家不正在用开水烫你？

“你以为你很高明。高明什么？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告诉你，到处都是我们的天下，不是你们‘5·16’的天下！张大力，一个叛徒，一到北京，就落入了我们的法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他把什么都说了！”

“叛徒？”

我心里为之一振：他们的叛徒，当然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

然而，他怎么会出事呢？

石俊清可能知道，从我嘴里他什么都得不到，不再追问下去。

此后，他们也从未在我面前提起此事。因为这种事于他们并不光彩。

再后来，1973年底及此后，当我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不是“5·16”，不是阶级敌人后，从张连奇本人的口中，我得知的情况是，他在北京站下车后，就按照我画的乘车路线图，直奔北沙滩。问题出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传达室里，人家一听他从青海来，又找我的妻子李若珍，立即引起警惕。此时，李若珍也被打成‘5·16分子’，和我一样，成了“隔离审查对象”。在这种时候，张连奇找李若珍，必然受到怀疑。

人家叫他稍等一下，马上去给他“传达”。他信以为真，又不明真相，就真地在传达室里坐等起来。

不过，他等来的不是我的妻子，而是警察。

后来知道的情况是，李若珍从陕西老家回北京后，并没有立即去“五七干校”，和我一样，也进了“学习班”。据说，她被隔离在她先前住过的红楼上。不久后，农机院的“学习班”办到了湖南常德，她也就以“5·16分子”的身份“随迁”至湖南继续“隔离”。

去中南海西门给周恩来送信，肯定是去不成了。张连奇被搜遍全身，受到详细盘问，并被关了看守所。因为从他身上搜出的信和其他东西都不能证明他有什么问题，他又是转业兵，工人。电话打到青海后，他的身份得以证实，就被释放了。

当张连奇重新踏上回家的征程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被文人们称道的最具广泛民主的社会里，他因为给人报个“平安”，给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送一封信，就遭此大难。这时候，他和我一样，不知人权为何物。

他迟至4月中旬才回到大柴旦。

他一回到队上，立即遭到批判斗争。

从此，张连奇又有了一个新名字：“‘5·16’通讯员”。

可能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考虑吧，批斗会规模不大，张连奇只是站着，没有让他坐“喷气式”。与其说是批斗会，还不如说是审讯会，交代会。

事实上，对“过程”的审问和交代大体走了形式。可以想得到，张连奇当“通讯员”的过程也就是军代表和韩忠民出丑的过程——他们所信任的人却背叛了他们。这“叛变”的意义，既意味着权势的失败，也意味着事实和道义的胜利。

但是，有好事者还想追问出点什么：

“你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听聂树人的？”

“也不为什么。我不就是感觉这个人刚出学校门，在队上挺好的，他怎么能是‘5·16’？”

“你的觉悟到哪儿去了？感觉，你怎么不感觉他是个反革命？”

“这话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相信了他。”

“他给你说了什么话，给你了什么好处？”

看来，英雄们都是以“好处”论是非的。

“他能给我什么好处！”张连奇说。

“那你为什么听他的话？”

“我就感到他不会是坏人。”

“你不老实！他究竟给你说过什么话？”

“他也没说什么话……噢，记起来了！他叫我相信他，他不是‘5·16’！”

“你还在给他放毒！”

“这话哪有毒！他在批斗会上，不是也给你们这样说过？”

据说，在审问和批斗过程中，因张连奇的回答机智诙谐，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张连奇对此并不在乎。他是工人，处在社会最底层。只要没有向上爬的欲望，对他好也罢，坏也罢，都不会使他失去什么。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后悔和害怕都无济于事。更何况，他说的是真话，干的是正义之事，何怕之有！

第 45 章 在“5·16 大院”的经历

“5.16 分子”是这样定的

1971 年 5 月 16 日，我与张玉锁被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隔离着”押送至西宁探矿机械厂的“5·16 大院”，继续“隔离审查”。

“‘5·16’专案组”的大员有多人，因为没有向我宣布，我始终不知道其详情。我推知的情况是：组长高峰奎，副组长刘新宽。组员，即办公室成员，估计有二三十人。

刘新宽，1970 年夏天刚调到地质五队的一个陕西人。据说，毕业于西安地质学校，韩忠民的同学。因为娘胎里带来嘴巴大，更加之对什么事都要大发一通议论，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就有了“刘大嘴”的称呼。

我记的很清楚，此人在“审问”我时，曾向我谈及他们定“5·16”的四条标准，诱我承认自己是“5·16”。刘新宽对我说：“不要认为你出身好，没干过坏事，就没有问题。‘5·16’反革命集团看中的就是你们这号人。你要问

‘5·16’是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你，当‘5·16’得有几个条件：

这一，要出身好；

这二，要是党团员；

这三，要是造反派；

第四，主要是青年学生。

你自己衡量一下你自己，够不够条件。”

刘新宽还说，地质学院“5·16 反革命集团”的图谋是：打入军队，准备政变；联络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也就是“5·16”，准备进行反革命暴乱，以夺取政权；同勃列日涅夫联系，投靠苏修，当卖国贼；画好了中南海的地图，准备绑架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这真是骇人听闻！

接着刘新宽说自己也是“造反派”。

我反问他：“这么说，你不也是‘5·16’了？”

他的回答是：我早已不是学生，也不年青了。

我说：如果我有权，就先把你隔离起来。然后，我也可以再制造出一条标准，将年龄放大，将你弄成个“5·16”！

此人脸皮厚，对我的反击并不觉得难为情。

后来我知道的情况是，刘新宽并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他冒充造反派，说明他内心里也知道，造反派比他人格高尚。

就是要听王大宾的“交代录音”！

刘新宽和高峰奎们的另一个逼供诱供的“杀手锏”是“同伙出卖论”：

“你的同伙都把你出卖了，你还保他们。”

在我的逼问下，刘新宽开始造谣：

“李贵、王大宾不仅承认自己是‘5·16’，也把你揭发出来了！你还蒙在鼓里，死不交代，包着他们。”

我的回答是：

“如果他们要糟蹋自己，承认自己是‘5·16’，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没有参加‘5·16’，他们的口供与我无关……我相信他们的人格，不相信他们会那样说！”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信，我们可以把他们交代的录音放给你听！”

“我倒很想听听，见见棺材！”

“你等着！”

我知道他们是在搞讹诈：

“那我就等着！”

十多天过去了，不见动静。

但是，不放录音，他们的逼供也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一审讯我，我就要他们放录音：

“我想听听，他们是如何交代我的。”

在我多次逼迫下，刘新宽们不得不搬来录音机，煞有介事地放了起来。然而，我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底气——录音只放了一两分钟，我只听清了王大宾说的一句话：

“我没有想到，把我弄回学校，你们会这样对待我……”

后面的话被一拨又一拨的口号声盖住了，听不清楚。或者，是刘新宽他们有意弄得模糊不清？

“你听，王大宾是不是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刘新宽故作镇静。

“没听见！他哪一句交代了他自己的问题？他哪一句揭发了我是‘5·16’？”

“我们大家都听见了，你怎么就没有听见？”

“不要睁着眼说瞎话！倒回去再放，就放他揭发我的话！”

“好，好，再给你放。”

可是，放的人摆弄了几下机器，说录音机坏了。

“等修好了再给你放。你是‘5·16’，跑不了！”

“别再打肿脸充胖子了！”

后来，地质局的军代表亲自出面，对我逼供。结果，仍然是失败。

“林彪”成了“‘5·16’的黑后台”

我从不曾想到林彪会叛逃。

1971年9月中旬以后，我从探矿厂的广播喇叭和能给我看的《青海日报》上，发现了宣传内容和宣传口径有了较大变化。逐渐加深的感觉是，在开初的一星期里只是隐隐地觉得宣传口径有了些许变化。但是，对变化的具体内容却说不上来。此后，我开始注意到，新闻广播中不提林副统帅了，报纸第一版上林彪许久不见了。

对于林彪的久违，开初我并不以为然。作为副统帅，日理万机，不一定天天都要上镜头，上报纸，上广播。虽有国人天天祝福“永远健康”，但是，如同被称为“万岁”的皇帝最后难免一死一样，祝福归祝福，林彪也是肉胎凡体，就是医生时时跟在屁股后面，围着打转，也难保他就不得病，就永远不头痛脑热。即使肉体上没有病，为着某种政治需要，住上几天医院，装上几天病，也算是政治家们的通病。

同往年大不相同，1971年的国庆节是静悄悄的。听看守们说，中央指示，今后国庆节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了。由此，我无法从政治宣传中观察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巨大变动。

国庆节以后，前述情况继续。报纸上不仅见不到林副主席的影子和只言片语，再也见不到“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字样了。

这很反常，与当时的中国特色严重矛盾。

“林副主席”怎么了？

我的判断：肯定出问题了！

但是，在“5·16大院”里，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出，一切照旧。清查运动的方向并没有任何动摇和改变。

但是，林彪升腾起伏的影子却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我并不认为“清查5·16”与林彪有何关联。但是，中国上层大神的起落是与中国的政治动向直接相关的，当然也就与我有关。

林彪肯定出事了！

一想到林彪，一看到洋洋自得于我眼前的那些清查英雄，我就直感恶心，如骨在喉。觉得不和他们玩玩，心里就极不平衡。

此后，当专案组对我进行逼供的时候，我一如既往，不仅什么都不说，还张口闭口“林副主席如何说，如何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专案组的英雄们终于坐不住了。

有一天，我被召到专案组办公室，专案组的人都在。高峰奎煞有介事地翻开事先放在他桌子上的一个文件对我说：

“我现在郑重向你宣布，我们又揪出了5·16’的一个黑后台，林彪！”

判断终于得到证实，我冷笑了一声。

“你冷笑什么？”高峰奎不解地问。

“我冷笑什么，你们还不知道？”

他们不说话。我又继续说：

“以前，你们不是说我反林彪？现在看来，反林彪有功啊！可是，什么时候，林彪又有了新职务，成了‘5·16’的黑后台？”

高峰奎不回答我，刘新宽却向我宣读有关林彪叛逃摔死的中央文件。

文件宣读完后，高峰奎对我说：

“现在把中央文件向你传达了，也算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关怀。你要知道，连林彪这样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我们都挖出来了，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你要老实交代自己‘5·16’的罪行，更要老实交代林彪这个‘5·16’黑后台的罪行，不要再顽固不化。”

我又冷笑了一声。以我的脾气，我真想上去，对这些政治流氓扇上一万个耳光：

“这也叫组织对我的信任？这也叫关怀？把人关起来，无中生有地给人强加罪名，这就是信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5·16’的黑后台可真多！以前，被打倒的中央上层人物都是‘5·16’的黑后台；现在，林彪也成了‘5·16’的黑后台；明天，不知道什么人又会成为‘5·16’的黑后台！”

“……”

“林彪是不是‘5·16’的黑后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林彪应该是你们的黑后台！”

“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愚蠢的刘新宽反问我。

“从大柴旦到探矿厂，你们不是经常给我传达林彪对抓‘5·16’的指示，你们不是按照林彪‘不吃饭，不睡觉’的指示在工作吗？现在怎么就不认帐了？”

“你这是在狡辩！”刘新宽说。

“我说的是事实！”

“你不要认为林彪出了事，你就没有事了。这是第一，”高峰奎语无伦次地狡辩着，“第二，林彪有林彪问题，你有你的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第三，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他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要老实揭发交代他的罪行……”

“这也算是第一第二的推理？真是狗屁不通！”我气得骂了起来。

“你敢骂我？”

高峰奎将手中正在摆弄着的铁质炉勾狠劲地敲击在火炉上，发出“嘣”的一声。

“这是骂你吗？不，这不是骂你，这叫说出事实！”我说。

“你再骂一句？你看我敢不敢揍你！”高峰奎站了起来，用炉勾指着我。

我也站了起来：

“我要说，林彪是你们的黑后台才最合适！你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给我强加罪名，还不容许我说出真相？！天底下能有这样的逻辑推理？什么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胡说八道，这样的逻辑推理，就是狗屁不通！”

高峰奎想打肿脸充胖子，我却寸步不让，气得直翻白眼，终于没敢将举起的炉勾挥下来。

会是开不下去了。在刘新宽等人的圆场下，我被送回了隔离室。

林彪的死并没有使青海省地质局的“清查5·16运动”马上刹车。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青海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

张运钧的“宽严大会”

在长期隔离的逼迫下，一些忍受力差的人，不得不背叛初衷。

关在“5·16 大院”的地质学院的学生中，张运钧应该是我认识最早的学生。

我与张运钧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厕所时。厕所位于第二排、第三排平房之间的西部，北端为女厕所，南端为男厕所。男厕所有三个蹲位。我们上厕所得先向看守请示，得到同意后，由看守陪同，再去上厕所。我们在厕所里面，看守在外面等着。上完厕所后，再一起回到隔离室。那次上厕所，是我们到达“5·16 大院”不到半个月时。我解大手，看押我的人照例在外面等着。过了一会儿，意想不到的是，张运钧却进来了。突然见面，我们都一愣。张运钧脑子快，立即告诉我：“外面搞得很紧，在一个个抓……”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外面的人可能已经意会到了，立即走到厕所门口，张运钧还没有说完的话就被“憋”回去了。

我解完手要离开时，握紧右手对他小声说：“坚持！”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年后。此前，虽然都关在一个大院里，有时，也能远远地看见，但是，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972 年 6 月的某一天，我被看守押送到探矿厂的会议室里。会议室主席台位的后方，还贴着“宽严大会”四个大字，以宣示会议的主题。作为“清查对象”，我们一直是“被动者”。被动惯了，也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对什么都不问，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的行为观念是，逆来可顺受，也可以不顺受，能顺则顺，不能顺则斗。

“宽严会”的主题是张运钧交代自己参加“5·16 集团”的经过及罪行。

匕首一现，我就知道这又是一个“骗局”。

长期关押、逼供及引诱，一部分人不堪折磨，只好说假话，编造谎言。与其被关押受苦，不如“顺杆子爬”，只要你能答应放我，我就承认。那些军人及陈安民们也巴不得有那么几个人出来现身说法——你们不是说没有“5·16”吗？你们不是不承认自己是“5·16”吗？你们看，这里就有一个，而且是他自己红口白牙，自己承认的！

为了诱使更多的人编造假话，“宽”上一个或几个，放他们回到单位又有何妨！他还能跑到外国去？即如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帽子还不是牢牢拿在“我”的手里？想给你戴，随时都会给你戴上。

在张运钧“交代”自己如何如何“参加 5·16”的情况和过程时，我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好在，他只说自己某年某月某日经某人（我不认识）介绍，参加了“5·16”，绝不涉及当时“在座”的其他人，更没有半个字牵涉到我。到他“交代”完最后一个字，我也就“逆来顺受”，承认那现实。

两年后，张玉锁在谈到这天的情形时对我说：“当张运钧交代他参加了‘5·16’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你的表情。我看到你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冷笑着，对他的‘交代’显得不以为然。这样一来，我的心里也就有底了。”

为了体现清查者事先的承诺和会前说的“宽严”原则，在张运钧交代完后，高峰奎立即宣布“解除隔离，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但是，对我们这些没有“交代”的人，却没有宣布如何“严”。因此，散会后，我们还是回隔离室。

下午，刘新宽来了，问我有什么感想。

我告诉他：“没有什么感想。张运钧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他应该交代。这是他自己的事。你们不是一直说我是学校的大头头、‘5·16’上层骨干分子嘛？如果我真的是，张运钧应该知道。可是，他在会上没有揭发我。看来，我不是。现在，你们当然不会放我，因为你们还没有想出该怎么收场下台的办法哩！”

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可怕。

我的冷静使刘大嘴愕然。他自然不会承认我的这种说法，狡辩几句就开溜了。

这大概是林彪死后，“5.16 大院”里的一个大变化吧？

后来才知道，林彪摔死后，全国的“清查运动”刹车。在地质学院，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后，“清查 5·16 运动”有所降温。降温的主要标志是，逼供有所收敛，隆隆行驶的欲将全院师生家属打成“5·16 分子”的战车嘎然而止。后来，我听到的小道消息是，空军政治学院作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黑据点”，它的领导也受到了“清查”，牛润虎作为林彪干将之一，在“清查”中自杀。我听到的大道消息是，地质学院随后迁移到了湖北江陵，军宣队也由岳阳军分区派出。地质学院的“清查运动”因副统帅的突然叛逃而失去了信心；军人因自己也面临着“清查”而对原先隔离看守极严的清查对象放松了看管。终于招致“学习班”成员造反，他们相互间串门了。“隔离审查”也就名存实亡。但是，与军人不同，通过“清查 5·16 运动”而受到重用的陈安民等，此时，却绝不愿意放下他们手中的“清查”大旗。陈安民说，叫“隔离审查”也罢，叫“开放审查”也罢，都还是“审查”。叫嚣着，一定要将地质学院的“批清运动”进行到底。

一年多后，1973 年 7 月，我也获得了自由。

我再见到张运钧时，问他：“你自己不是‘5·16’，为什么还要说自己是？”

他说：“‘5·16’显然是个假案。但是，我们是不是‘5·16’，这不能由我们说了算。在社会上，我们不是看到了许多类似的情况吗？许多人不是反革命，不是右派，可人家偏要说你是，给你戴帽子，把你抓起来，你又能怎么样？与其被关在囚室里受罪，还不如‘承认’了出去，得点自由，少受些罪。反正，这事迟早都会平反的。到那时，真的假的，就都清楚了。”

人各有志，我又能说什么呢！

第 46 章 “抓 5·16” 将变沉冤

不给“台阶”

我拒绝“写检查”

1972 年 8 月，刘新宽亲自到我的隔离室，煞有介事地对我说：

“聂树人，你能不能写个检查？”

当了两三年反革命，听惯了“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之类的词语的我，突然听到“检查”而不是“交代”，这无异于是一个“新气象”。我知道，“清查”的末日到了。然而，我不动声色，反问刘新宽：

“你弄错了吧？我可是‘5·16’、‘反革命’！要‘5·16’、‘反革命’写‘检查’，这不合适吧？”

脸皮可以当抹布用的刘新宽碰了个软钉子，二话没说，走了。

我已觉察出了形势的变化。他们要找台阶下了。

又过了两三天，高峰奎来了：

“上次老刘叫你写个检查，你怎么不写？”

“你们先得回答我，我是不是‘5·16分子’？或者说，‘5·16’问题你们弄清楚了没有？”

“还没有。问题总归是会搞清楚的。”

“你们搞了那么多调查，还没有搞清楚？没搞清，那你们就继续搞。这两三年，我不能白白被关。我既然已经被关了两三年了，你们还可以再关我十年八年，直到把问题搞清，我有这个耐心。你们不是在我进这学习班时就说过，

‘不搞清你们的问题你们绝不收兵’嘛！这两年中，为了搞清我们的问题，你们花了人民多少血汗钱？不少于5万元吧？5万元！白面1角3分钱1斤，大肉几毛钱1斤，萝卜白菜几分钱1斤，这些钱可以养活多少个平民百姓？反正，花的不是你们家的钱！不把我搞成反革命，你们就永远活得不塌实！”

高峰奎现在的耐心真好，他在听我说。

“这样吧！你不想写检查，写个总结也可以吧？”

我一听立即悟出，这又是新花招。

“这总结怎么写？”

“总结么，有成绩就肯定成绩，有错误就承认错误。”

“可是，反革命分子好象没有成绩可言！你又弄错了吧？”

“那些问题以后再说，写个检查或总结，认识深刻了，赶快回队上抓革命促生产，老待在这里总不是事儿！”

“没关系，都待了两三年了，再待几年有什么关系？等弄清楚了再说。”

碰了一鼻子灰的高峰奎此后再也没有找过我。

过了半个多月，关在“5·16大院”里的“囚徒”一个又一个释放走了。

他们是否都写了“检查”或“认识”？我不知道。

最后，“5·16大院”就剩下我一个，我却一点也不着急，日子似乎过得“有滋有味”。

这时，他们又叫看押我的转业兵吴仲虎试探我：

“咱们还是走吧！你不走，我们也走不了！”

“你这话就不对了，你想走就走，我又没看着你们！”

我还是无动于衷。

这样，我就一直从冬天被关到1973年的春天。看押我的是四个转业兵。

看押我的人都走了

1973年4月3日，看押我的转业兵对我说：

“你不走，我们可走了。”

“是你们看押我，不是我看押你们。你们要走，与我有什么关系？”

为了表示他们是来真格的，四个看守都捆好了自己的行李。

对此，我仍然无动于衷。你不看我了，我就得行使原本属于我的自由权利：我决定进城。

傍晚时，我从城里回来，他们还没有走。晚上，他们又很没有面子地打开了行李，似乎一切照旧。

到了4月5日上午，地质五队的一辆大卡车停在“5·16大院”门外。看守们又动员我一次：

“还是回去吧！这回，我们真走了！”

“好，你们走吧！这叫请爷容易送爷难。韩忠民不是本事大吗？你们告诉他，我等着他用枪把我再押送回去！”

看守们的骄气早已没有一丝一毫了。看着他们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也心存“凄凉”。铁饭碗很好！端铁饭碗的人，却必须得听命于他们的“主人”！饭虽好吃，人却难做！有的人认为这是美差，如秦凤荣等，争着干；有的人却认为，只有缺八辈子德的人才干这种事。

我从他们的眼神中也看出了他们的可怜、可悲。

做为“隔离对象”，我并不在乎他们的“看押”，并不在乎他们说我是“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通过数不清的批斗会，经过关押的日日夜夜，我不仅没有被他们打倒，现在，似乎比他们还要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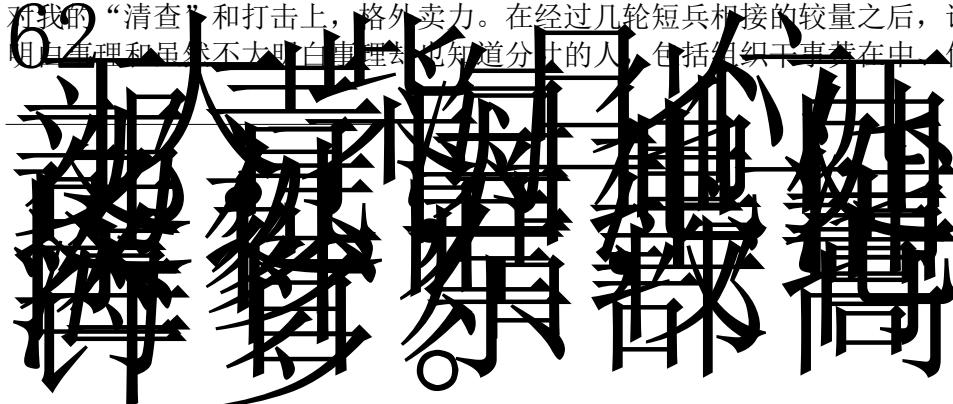
但愿他们回到地质五队后，都可以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都可以官升三级。但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大书或高声回顾自己的这段光辉的历史！如后文所述的东俊明一样，如张长琪一样，耻辱将伴随他们一辈子。

“斗士们”都进步了

杨松龄当了科长

杨松龄，一个在我成了“5·16上层骨干分子”之后，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保卫干事，四十岁左右。一张嘴说话，不用问，河南人。后来听说，此人原在青海东部的一个地质队工作，早年的转业兵，识得几个字，嘴也能说。同期的转业兵有好几个进步了，当了科级干部，可他，就是爬不上去。进步不成。托关系，走门子，调到大柴旦地质五队。虽然在保卫科只能跑跑腿，却也挣得一份高工资⁶²。

他调到地质五队后，并不了解情况。可是，在对韩忠民上，投桃报李；在对我的“清查”和打击上，格外卖力。在经过几轮短兵相接的较量之后，许多明白事理和虽然不明白事理却也知道分寸的人，包括组织干事黄在中、保卫



干事周长春、分队指导员井耕喜（以上都是工人出身）、副分队长胡晓武这类人都在往后缩。但是，杨松龄却很不知趣，一张嘴就喷粪，而且，一点脸皮都不要。在与我正面碰撞中吃了败仗的韩忠民和石俊清，正是看中了杨松龄脸皮厚这一点，提拔他当了保卫科科长，让他具体负责“对敌斗争”。

杨松龄在对我的批斗上，事事冲锋在前。据我的观察和感觉，此人心狠手毒，在批斗我时，出了不少坏点子。石俊清、韩忠民们不敢说的话，他敢说；不敢干的事，他敢干。反过来说，站在韩忠民的立场考虑问题，政治斗争错综复杂，让杨松龄冲锋在前，万一弄错了，上面追究责任，也好让他给自己顶缸。

“非党斗士”纷纷入党

吴红兵，原名吴守成，一个中专毕业生。毕业于何校，不明。为了表示自己不断进取，不断革命，文革中更名“红兵”。我初到队上时，人们都称他为“鬼儿子”。他个子瘦小，当他一个人押送我走向批斗台时，我自认为可以一拳打他三个跟头。

我初到队上时，此人还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技术人员。即使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时，此人也没有突出的表现。在“清查5·16运动”中，韩忠民给他及其他许人许了愿，他才突然“觉悟”，在对我的斗争中表现得异常积极。可能因为文笔上写不出一篇短文，嘴巴又说不出连贯的句子，因此，他在大会上很少发言。小型揭发批判会，才是他的用武之地，批斗我时，对我拳打脚踢，算是他的特长。除此之外，此人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我为他树碑立传。

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从其他人嘴里听到的情况是，我被押送西宁“5·16大院”后不久，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2年，地质五队子弟学校，韩忠民任命他当了校长，算是“科级干部”。

曲章富，一个河南籍转业兵，后勤仓库的保管员。为了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能保住这个既不出野外，又有物资发放大权（当然会有“近水楼台”之利）的职位，最好是再晋升一步，弄个后勤科长当当。因此，在得了韩忠民“只要在运动中表现积极，运动后期一定发展入党”的许诺后，立即行动起来，成为“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打手之一。“清查5·16运动”开始后，曲章富就成了批斗我的主要打手之一。记得，每次批斗我的会，大都是他和其他人按着我的头，将我押送到批斗台上去的，也是在台上让我摆“喷气式”姿势的打手之一。

我离开地质五队后得到的消息是，韩忠民果然守信，不久，即发展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玉宸，1968年下半年毕业分配到地质五队的张家口探矿技工学校的技工。我刚到地质五队时，他很崇拜我。据说，此人会点拳脚，扬言，他一掌可以把人打死。一天晚上，他与他的同学刘玉祥突然到隔离室来发威撒野，要试试他的拳术，二话不说，揪住我，对着我的脖子就砍了一掌。由于我知道他不怀好意，也看到他扬起的手掌。既然躲不开，脖子上的肌肉条件反射似地一硬，迎他一掌。虽然眼冒金星，但是，并没有失去知觉。因为有看守人员的阻止，他才没有打第二掌。1974年，“5·16”虽然没有公开平反，但是，“弄错了”却已成定论。在西宁地质局招待所碰到了此人。当时，我正从里面往外走。他一看到我，立即上前欲与我握手，口里不停地写着“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甩手，没有看他一眼，就径直走了。

从年龄和常识上说，我可以原谅他，毕竟我没有死在他的手中。但是，对于这种“政治畸形儿”，我不屑一顾。

后来听说，这样的人也入了党。

.....

历时数年的“清查 5·16 运动”也没有清查出一个“5·16 分子”！可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入了党，有的提了干，有的得到了晋升。直到 21 世纪，他们一直毫发未损，一直进步着，一直弹冠相庆，前途远大！

由此我发出疑问，什么叫共产党员？什么人才配称共产党员？

“抓 5·16”将变为沉冤

近代史上，发生在德国的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曾经使共产党人恨得咬牙切齿。而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焚书坑儒、莫须有之类的政治故事和冤假错案更为世人所不齿。但是，世世代代，却总有市场，酷吏的子孙世代不绝。

自 1949 年以来，谁曾听说过在政治运动中整错了人，把人整死了，被追究过责任？谁曾听说过，在争相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入了共产党、提了干的人，被开除党籍、削职为民？在这个问题上，牛润虎-李庆芳-陈安民-韩叫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顾忌。他们只为能否抓出更多的“5·16”而费心。

“清查 5·16 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或者是中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涉及人数最多、旗号最为冠冕堂皇、手段最为残忍、出发点最为卑鄙的一次政治大清洗运动。这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一次最为可耻的政治出卖，是封建专制制度弊端的又一次凶残暴露。

“清查 5·16 运动”的结果，是多败俱伤：造反派都成了“5·16”；林彪集团覆灭；周恩来在批“极左”中积劳成痼疾，江青和张春桥等成了“四人帮”.....

现在看得很清楚，“清查 5·16 运动”是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治运动，是经过精心策划、处心积虑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国会纵火案”：以抓“5·16”为名，制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然后把造反派统统打成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一个不漏”地加以清洗。

“清查 5·16 运动”的制造者们深知这场运动罪孽深重，因此，在公开的媒体上对此讳莫如深。在对他们当年打成的无数“5·16 分子”的“处理”上，一拖再拖，拖了 40 年，还没有一个略有诚信度的结论。而当年的那些“5·16 分子”中，有少数人因不堪逼迫和凌辱，或自杀身亡，或被残害致死；捱到“学习班”结束活下来的，到了 21 世纪，不少人已经做古，活着的已经老迈。一两个世代，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英杰，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被当政者清除或湮没。

那些制造“5·16 冤案”和其他冤案的大小恶棍们，真是罪比天高，恶比海深，地地道道，是中华民族的公敌！

第六编 “逮捕审查”与看守所记事 ——社会文革：镇压造反派 2



第 47 章 逮捕与释放

石占泉还乡

自 1970 年 10 月 23 日我被打成“5·16 上層骨幹分子”，至 1973 年 7 月止，第一次被隔離的時間為兩年零九個多月。

為了不被“棍子”、“棒子”們整死在柴達木西部大柴旦鎮那“天高皇帝遠”的戈壁荒原上，我于 1974 年 9 月調到位于西寧附近的青海省地質科學研究所工作。

毛澤東于 1976 年 9 月 9 日過世，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幫”被抓。文革中，原地質局副局長石占泉從省畜牧局“還鄉”了，又當上了地質局的副書記、副局長（沒有正書記、正局長）。1978 年 4 月，“五大領袖”因為鄧小平的“一句話”被逮捕，王大賓被抓到武漢，我的厄運也就到來了。

我對石占泉並不熟悉，以前也不認識。據說，此人 1949 年前就參加革命，陝北人。1950 年以後，轉業到青海省地質系統工作。在工作中獨斷專行，誰不聽他的，誰對他有意見，他就變著法兒整誰，直整到鬧出笑話，還要把笑話當作真話去做。比如，1960 年，他當上青海省地質局副局長不久，接上級指示，地質局要“選派”40 名“勞教對象”，限期送去祁連縣天朋農場“勞動教養”。石占泉將此任務布置了下去，各地質隊的下屬不折不扣地照辦。可是，挑來挑去，挑出的“刺兒頭”只有 39 名。無奈之下，石占泉只得讓兩名保衛幹部將這 39 名“勞教對象”送往農場。送的途中，跑了一名。到了勞改農場後，農場負責人不依不饒，非要地質局湊齊 40 個名額不可。當勞改農場負責人給石占泉打電話要求補齊時，他說：“送人的那兩個也是！”

於是，石占泉的一句話，就葬送了他兩名親信的錦繡前程，成了農場裏的“勞教分子”。

送到天朋農場去的“勞教分子”下場都不好，有許多人就死在那裏。

1996 年，我住的西寧楊家寨（虎臺西巷 14 號）那棟住宅樓一單元三層，遷來了一位新住戶，房主的名字叫詹錄明，年齡比我大十多歲。我在與他交談中，無意中提及了石占泉的名字，詹錄明一聽，立即大罵起來：“那是個瞎熊⁶³，光整人！”原來，上世紀 50 年代，詹錄明在一個地質隊當管理員，管職工的伙食。因為經驗不足，賬未算明白，賬面上差了 300 元錢。石占泉硬說詹錄明貪污了，不容分辯，即刻上報公安局，將詹錄明抓了起來，並判刑 8 年。在詹錄明的一再申訴下，直到 1996 年，案子才查明。賬算錯了，得以平反。

文革初期，被石占泉整得妻離子散者，家破人亡者，前途被斷送者……終於等到了一個和石占泉算帳的機會。但是，這些人絕對沒有石占泉的殘暴無忌，沒有打斷他的胳膊和腿，更沒有把他置之于死地。在革命委員會成立時

⁶³陝西方言讀 hasong。

的“三結合”中，他因在地質局民憤太大，而被上級指派，作為老幹部“結合”到當時的省畜牧局。但是，對地質局一些人對他的清算，他念念不忘，發誓要回來報仇。

這一機會，在1977年被他“爭取”到了。但是此時，曾主持清算過他罪行的頭面人物（當時被稱之為“造反派頭頭”，如地質八隊的苗曉等）在得知他的意圖後，早已調離青海。局中心實驗室的造反派頭頭樊星橋因為娶了個在324部隊（駐地在西寧市）工作的妻子，而沒有調走，就成了石占泉的主要報復對象。

我這個“5·16清查對象”，因為對清查不服，也成了他打擊的對象。

1978年4月，“五大領袖”因為鄧小平的“一句話”而遭逮捕後，我這個當年北京地派的“二把手”、地質學院革委會副主任立即就被石占泉“選中”。他指令，青海省地質研究所黨委派人去武漢⁶⁴外調。地質研究所派出的外調者一名李從輝，一名王煥。這兩個人都是共產黨的忠實黨員，是當權者的馴服工具，很會理解上級當權者的意圖。正是這兩個人，加上地質學院的陳安民，使石占泉的整人意圖得以實施。

我曾天真地相信，李從輝、王煥的外調不會有什麼結果。從1970年開始的長達數年的抓“5·16”運動，不僅把造反派的家底翻了幾個過兒，甚至還捏造了許多假材料。即使這樣，也沒有查出造反派的什麼“十惡不赦”的問題。“5·16”們先後都被釋放出了“學習班”——隔離室，恢復了自由。但是，政治鬥爭就是政治鬥爭，它主要不是依據事實，而主要依據政治鬥爭需要。在當時情況下，無論是什麼罪名，“莫須有”也行，“天方夜譚”也罷，只要能加于造反派的頭上，將他們搞臭，將他們從政治舞臺上清洗出去，最好是將他們肉體消滅，這就是大局，這就是路線鬥爭，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李從輝、王煥，這兩個人原本是以青海省地質研究所黨委的名義去湖北外調的，但是，回到青海省後，違背組織原則，並沒有先向研究所黨委彙報此行的情況，却直接到了地質局，將地質學院“運動惡棍”陳安民的“聾樹人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矛盾”的個人意見，當作尚方寶劍，彙報給石占泉主持的地質局黨委會議。于是，他們又帶著地質局黨委的“對聾樹人隔離審查”的尚方寶劍回到大通城關。

於是，5月5日上午，地質研究所召開職工大會，宣布局黨委對我“隔離審查”的決定。我在聽到這決定之後，就被趕出了會場，由李從輝看押著進了事先已經安排好了的隔離室。李從輝也因此而在地研所裏趾高氣揚起來。

編造“逮捕”理由

石占泉將樊星橋和我的“罪行材料”以地質局黨委的名義，報到青海省公安局，要求逮捕法辦。却一次次被退了回來，理由是“罪行材料”不行。

令石占泉大為不快的是，基層黨委——青海省地質科學研究所黨委（黨委書記是賈寶林）“不能理解”上級的意圖或緊跟形勢，上報抓人的材料雖然很“上綱上線”，但大帽子低下却沒有“鋼鞭材料”。地質局黨委在加了“逮捕”的批示之後，上報到青海省公安局。不想，連一向“聽黨委話”的省公安局也認為“材料不行”，不能抓人，三次將上報的材料退回了地質局。

⁶⁴此時，北京地質學院已遷址武漢，改稱湖北地質學院。

由于地研所黨委的“無能”，石占泉暴怒異常。他不得不違反組織原則，由他和其追隨者張樹忠合謀，編造了一份說我“整理周總理黑材料、綁架周總理”的材料。然後，責令地質研究所新任黨委秘書李仕琪將“中國共產黨青海省地質科學研究所委員會”的公章“背”到西寧，加蓋在他們寫的材料上。又，再由石占泉加上逮捕我的“批示”，蓋上“中國共產黨青海省計委地質局委員會”的公章，報到省公安局。在那個“寧左勿右”，先下“政治結論”，再去找證據的時代，省公安局（當時就叫公安局，而不叫公安廳）不得不接下這份材料，并做出逮捕我的決定。

賈寶林書記怒斥張樹忠

賈寶林怒斥張樹忠，是我被釋放後，我才聽人說的。在這裏寫出來，是為了故事的連貫。

1978年7月27日下午，剛一看到逮捕我的文件，賈寶林真地有點“傻”了。按照程序，逮捕地質研究所的人，應該是地質研究所黨委上報材料。可是，那上報材料上雖然蓋著地質研究所黨委的章子，可是，那上報材料却不是地質研究所上報的。這是怎麼一回事？章子是誰蓋上的？

于是，賈寶林就與張樹忠進了一番沒有結果的較量。

“你說，這材料是誰整的？這章子是誰蓋的？”

“……”對此質問，張樹忠當然是無言以對。但是，想了想，說：“聶樹人是反革命，對反革命，就是要進行逮捕。”

“就算聶樹人是反革命，要逮捕他，也得我們地質研究所黨委上報材料！”

“我們上報材料，不對麼？”

“你們上報材料，為什麼要蓋我們黨委的章子？”

“……”

“你們抓我們的人，却不通過我們！你們搞的什麼名堂？”

在逮捕我的問題上，木已成舟，石占泉和張樹忠給賈寶林製造了一個很大的陷阱。

不久後，賈寶林就被調離了青海省地質科學研究所，到新疆鄯善地質部第六地質大隊任黨委副書記。又過了兩年，他又調回黑龍江地質局工作，直到退休。

我“高昂著頭”走向監獄

1978年10月28日，在西寧建工俱樂部召開“寬嚴大會”，宣布對我進行逮捕。

當時，在會上講話的是局黨委副書記李定前，此人是不久前，剛從省民政局調到地質局工作的。與石占泉一樣，也屬“還鄉團”之類的人物，但是，他以前不在地質系統工作。石占泉樂得將出面整人的事兒交給他來辦。

他宣布我的罪狀很為簡單，說我“整周總理的黑材料”，“綁架周總理”，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交由公安機關依法予以嚴懲。

接著，省公安局的人講話。他在宣布逮捕我的決定時說：“根據地質局黨委的決定……”

公安局抓人，不是“依法抓人”，而是根據地質局黨委決定抓人，豈不滑稽？

既然宣布我是“反革命”，我也就豁出去了！我將頭高高地昂起。我本來想大聲喊“我不是反革命！”，可是，這有什麼用？當公安人員要給我戴手銬時，我將雙手高高舉起。

接著，我就被押走了。在離開會場的道路上，我的頭一直都是高昂著的。

释放那一天，我怒斥張樹忠

我在青海省看守所里，整整待了十四个月，直到1979年12月18日，才获得释放。

在看守所的14个月，我都写在由香港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逮捕审查与看守所记事》一书中。

直等到下午，才由被犯人们称为“狼”的李廣新开门放人。

在預審處顧倫的辦公室，坐著從地質研究所來接我的政治處主任石俊生，司機陳守仁。同來的還有當年上竄下跳、送我进监狱的局保衛處幹部張樹忠。

估計，張樹忠是在石俊生或地質研究所黨委的堅持下，不得不來的一—抓我的罪責需要地質局來承担。當省公安局將釋放我的決定通知地質局時，這時的石占泉們溜得一個比一個快。這些整人成性的共产党黨委領導只學會了將職工往監獄裏送，從來沒有學會將監獄裏釋放出來的職工往回接。于是，他們就將接回我的任務推給了地質研究所。地質研究所的領導當然不會接受這樣一項倒霉的任務——人是你們一再上報叫抓的，現在釋放了，却叫我們去頂缸。這不公平！因此，在接我出來的問題上，地質局與地研所肯定有一番“爭論”。這就是他們遲遲不來接我的原因。

在最後的例行公事中，顧倫問我：

“你還有什麼意見？”

“地質局黨委中的一些王八蛋捏造事實，誣陷我綁架周恩來，整周恩來的黑材料，製造了一起天方夜譚式的傳奇故事。現在經省公安局查證，終於有了結果。我感謝省公安局的同志。但是，欲將我置之于死地的惡棍們，絕不能饒恕！我要求省公安局以誣陷罪，對製造這起冤案的惡棍們進行法律追究！”

在座的人都在悉心聽著，却没有人回答。

我以憤怒的目光盯視著張樹忠。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張樹忠。”

“我知道你叫張樹忠！你這個惡棍，王八蛋，睜開你的狗眼睛，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不是反革命！”

“你怎麼罵人？”

“我還想揍你呢！”

我说着，举起了拳头。

“聶樹人同志，不要發火。”顧倫勸解我，“抓你的責任完全在我們公安局，與他無關。”

“不，沒有地質局這些烏龜王八蛋一次又一次誣陷我，向你們報那些無中生有的黑材料，你們公安局哪裏會知道我聶樹人！張樹忠，你當年到處煽陰風點鬼火，將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將好人打成壞人。你可能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公正，還有良知。你肯定沒有想到，我聶樹人還有直面於你這個豬狗不如的丑類的時候！”

咒罵歸咒罵，走，還得走。

永別了，看守所！

第 48 章 家破人亡

“老聶，都報應了！”

1979 年 12 月 18 日晚上 8 點多鐘，我回到位於大通縣城關鎮的青海省地質科學研究所。我的東西被卸在一個臨時宿舍裏後，老朋友們就領我進了食堂。當天，所裏一個課題報告驗收完畢，晚上招待評審員。我正好借了這個光。來到食堂時，炊事員還正在工作，相互打招呼過後，他們在大案板上一下子就擺上了好幾大碟菜肴，大魚大肉都有。因為我不喝酒，只給我端來了一大碗米飯。大家肯定認為，我是從連窩窩頭都吃不飽的地方來的，忍饑挨餓一年多，今天讓你吃個飽。

對於一個遭受極大冤枉的人，這大概是他們對我表達同情的一種方式。不論怎樣，我之被抓而又被釋放，肯定有人歡喜有人恨。今晚，在這個近百人的研究所裏，我將是人們的議論中心。

自我被送進監牢之後，我的那些沒有什麼經濟意義的私人物什，也如我一樣被人胡亂地清理到研究所的庫房中，被放置在帶有“永久棄置意義”的角落裏。

令我非常惋惜不已的是，我自 1966 年起即精心收集下來的兩大箱子歷史見證資料，被迫付之一炬。這些資料經歷了從北京到西寧、從西寧到大柴旦、從大柴旦到西寧、又從西寧到大通縣城關鎮的萬里大轉移和無數次的小轉移。1977 年，為防意外，我曾將它們存放在一個叫崇承鼎的同事那裏。

在 1978 年 8 月，我預感到危險將臨，暗示保管者將它們付之一炬。我唯怕牽累了他人。

什麼時候，中國人才能追訴和清算政治殺手們的刑事責任？難道我們中國人總得在人死後，才談論他們該不該死或評價他們死的價值？

晚飯過後，回到臨時宿舍，朋友們就陸續來看望了。首先來到的是胡尚志，他一見我就說：“老聶，報了！報了！都報應了！”

我被他說得莫名其妙。但很快就明白這“報了”的含義：

第一件大事——李從輝被大通縣公安局以流氓罪拘役一個月。

這事的起因在我被抓前就知道。想不到我被抓以後，有了結果：

“在你被抓之後，所裏的大多數人都不服氣。”胡尚志說，“人們認為地研所的罪魁禍首是李從輝，推波助瀾的是肖志明、淡培新、莊和董等。姑娘們見了李從輝，氣憤地或指桑罵槐，或直接罵‘大魚蝦’不是好東西！李從輝也漸漸地覺察到了人們對他的反感。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在井邊洗衣服。李從輝也來洗，姑娘們就又含沙射影地罵起他來。他覺得不該罵他，就與姑娘們吵了起來。姑娘們的嘴利，他說不過，更罵不過，他就拿起搓衣板與姑娘們打了起來。這一下，激起了群憤。大家聯名向黨委和縣公安局告李從輝耍流氓。大約在一個月後，縣公安局就來人把李從輝綁走了，在縣公安局強制勞動了一個半月。

“強勞期滿，公安局通知地研所要放他，要單位來人把他接回。可地研所沒有人去接他。是他自己扛著鋪蓋捲坐公共汽車悄然回來的。回來後，黨委秘書是當不成了，只好再去當地質員。”

第二件大事——肖志明的獨生兒子淹死了。

肖志明只有一個獨生兒子，寶貝得要命。自你被抓後才被局招了工，今年夏天，在過那陵格勒河時，被河水沖走淹死了——肖志明絕後了。

2004年7月22日補記：此日，當時在地質研究所工作的伊家衡、王旭、劉嵐岩、李清奇、李穎、張運鈞及我，在北京頤和園聚會，談及當年以肖志明為首的英雄整我而得惡報時，伊家衡說，肖志明現在慘極了，神志雖然還算清醒，但已經癱瘓在床，生活難以自理。其夫人姚珍則天天打扮入時，風流在外，想起了管管他，想不起了就一任他窩囊著，肖志明的吃、喝、拉、撒沒法說！我念及老朋友的份上去看過他，一進屋，一股騷臭氣立即撲面而來……

第三件大事——淡培新老婆上吊死了

淡培新老婆原是個中專畢業生，婚後與淡培信生了五個孩子。為了顧家，她很早就辭去了工作，當家屬，侍候淡培新和照顧孩子。她雖有文化，但因為是個極為本分的婦人，家務繁重，再加淡培新大丈夫主義嚴重，因此，一年難得出戶幾次。又由於其貌不揚，很令淡培新失意。淡培新在外拈花惹草的風流韵事就時有所聞。

在地研所，因為淡培新與莊和董兩個人是資料員，一男一女成天處在一個辦公室。又因為莊寡居多年，所裏就不時有他們的一些傳聞。不過，地研所裏的風氣不同于一些野外隊。對男女間的事情都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但，淡有了外遇，他的妻子大概是最清楚不過的。他妻子常對鄰居說，淡經常夜不歸家，住在莊處。有幾次，是她半夜把淡從莊的家裏叫回家的。她與淡講道理，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淡的耳光、拳頭就上來了。他與淡吵架打架的事，鄰居們都知道。但是，令鄰居們想不到的是，在一天的中午，她摞下正在擀的麵團，吊死在了門上。

“莊和董雖然對此不負直接責任，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她與淡培新一樣，也是一個殺人凶手。可惜，法律不能追究這對狗男女的刑事責任。”胡尚志說。

“咱們所裏整你跳得最高的四個丑類都倒了霉。這也是你走後一年多中，地研究發生的三件大事。所裏的人們都說，這是他們因為昧了良心而得到的報應。”其他來看我的老朋友們說。

真是上蒼有眼！

可是，眼前的丑類都遭了“報應”，遠處的丑類也遭“報應”了嗎？！

與無賴的對話：何謂“逮捕審查”？

12月19日，早晨上班後，石俊生即找我談話。談話內容很簡單：“你的工資怎麼補？”

“你們是怎麼打算的？”

“我們打算，按你在研究所正常上班時的工資全額補發，包括野外津貼。在看守所的伙食費不繳。工齡連續計算。”

對此，我能說什麼呢？60年代初，祁連縣天朋農場或者其他類似單位的勞教對象——無論是活著的或死了的，好像沒有人給補過工資。給被錯整的人補上全工資，算得是日從西出。此後不久，那些被“改正”了的右派們，也沒有人能領上他們二十年間應該得到的工資。

可惜，那時中國還沒有國家賠償法。

下午，地質局黨委副書記李定前到了地質研究所。找我談話時，我要求他們必須為我公開平反，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他的回答却是：“送你進監獄，這只是審查。我們並沒有對你定性、下結論，談不上平反的問題。”

“這叫‘逮捕審查’。”

“逮捕審查！”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名詞！

這個“名詞”在詞典中是否查得到，不知道。但是，“不承認罪行就長期關押”，“關死”，以至“槍毙審查”，都應該是它同義詞。

這也算是一種回答。把“強詞奪理”、“強盜邏輯”、“政治流氓”、“潑皮無賴”這類言詞“潑灑”到這位黨的負責人的頭上，適宜不過。因為，青海省看守所裏的過去和現在，成為“逮捕審查”的犧牲品的人究竟有多少，大概沒有人去統計過。據業內人士說，從1976年底起，在這個省看守所（還有市看守所）先後關過的“四人幫”犯就有600多人。我不過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與潑皮無賴、政治流氓能辯出理來？

無論是三次五次十次八次想讓我死的人，還是十次百次欲置我于死地的青海省地質局的石占泉們，在抓我“5·16”不成之後，在不得不將我釋放出獄之後，還于1986年定我為“幫派思想嚴重性的人”，非欲置于死地不可。但是他們却都衆口一詞地對我說，他們之所以要如此對待我，是出于不得已，是尊奉上級的指令。還說，組織對你審查，出發點是對你負責，愛護你。還說，問題審查清楚了，有了結論了，你就可以一心一意抓革命促生產了，這對你、對國家都有好處……于是，我就應該立即跪下來給他們三跪九叩，以示感恩。

於是，我還能有什麼說的呢？

我只能以離開表示我的極大憤怒和嚴重抗議！

我于1979年底出獄後不久，曾在電視上看到過一個專題節目，在黃金時段連續報導東北一個被整得九死一生、家破人亡的右派分子，在得到“改正”以後，在大會上對衆多的聽衆言，他對自己的挨整沒有半點冤言，他認為這只不過是如“母親打孩子”一樣的事情。

但是，一個多年來，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兒子”往死裏整、往死裏打、往火坑裏推的“母親”，能是一個母親？能是一個好母親？用普通的眼光，用最低的法律尺度，她是一位應該被人倫否定的母親，一位嚴重觸犯刑律的母親。

父親因我“被抓”而去世

我回到地質研究所的第三天，心態尚未平息，就接到了繼祥堂弟從老家發來的電報：父親病重，速回。

1980年元月2日，我千里迢迢趕回老家。一進門，自然先進寢室去探望父親的病情。父親洪亮的聲音變得微弱沙啞，昔日那紅潤的面容現在顯得消瘦憔悴，硬朗的身軀變得佝僂。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我的可以被生活重擔壓彎腰，但對人世艱難絕不屈服的父親，在67歲的年齡上就要告別他為之付出難以數計辛勞的這片土地和眷戀他的親人，匆匆離我們而去。

父親是因我而死的。自1978年10月28日我被關入監牢後，我就失去了給親人們寫信報平安的可能。自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之後，我每月都會按時寄給父母親10元至30元不等的零用錢⁶⁵，算是盡我作兒子的一點心意，報答他們對我的養育之恩。我的父母親並不在乎我每月能給他們寄回多少錢，苦日子他們是過慣了的。他們大半生的經歷說明，生活的艱難是打不倒他們的。進入花甲之年，他們的一切就是我這個不孝之子的一切。

可是，這一次不同于“抓5·16運動”。1978年10月至1979年初，他們在長時間中，既沒有收到我的信，也沒有收到我寄回的錢。這就使他們對我特別惦念起來。從未出過遠門的父母親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完全無助的。他們曾不止一次對親人說過，如果我離得近，他們就是爬，也要爬到我的身邊，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一些勢利的村人在得知了這情況後，此時不僅沒有表示出半點同情，從他們的臭嘴裏噴出來的則只有令父母親心碎的惡言穢語。每當在生產隊裏集體幹活時，父母親就盡可能遠離人群，低頭幹自己的事。

對他們最大的打擊沒過于收到“幾十元幾角幾分”的一張匯款單。這張署著他們並不認識的一個叫李仕琪的人寄給他們的匯款單，使他們醒悟到，我出了大事。父親及母親的判斷很準確，幾角幾分都給寄回，而且是外人給代寄的，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信息：他們心愛的兒子已完全失去自由。這一次進的不再是民辦的監獄——隔離室，而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的監牢。

父親抵抗致命打擊的能力似乎比母親要弱。一九七九年初的春正月，作為生產隊幹部的父親與其他人一道去公社（在距家七八里路的東韓村）開會。在吃米飯時，突然發現吞咽有些困難。作為食道癌多發區的家鄉的人們，都知道這種病的原因、症兆和後果。郁氣于胸，不得發泄，十有九個要得這種因“氣”而致的“噎食病”。一旦得了這種病，十有九個的情況是，上半年得病過不了夏天，下半年得病過不了冬天。但是，性格倔強的父親却不願承認這個現實。他頑強地與病魔抗爭，仍然像以前一樣在田間勞作。為了耳根子清靜，他選擇了他最拿手的勞作——犁地，一個人與牛為伴，握著犁把，在田地裏經織著兒子平安的夢。1980年初，在父親故去後不幾天，生產隊對1979年各戶的收支情況進行決算時，因為我家勞動工分多，仍然是生產隊為數不多的“餘糧戶”⁶⁶之一。

石占泉們雖然給我的身心留下了累累創傷，却沒能將我殺死。但是，他們却殺死了我的父親——一個誠實忠厚的農民，一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的父親。

妻子離婚

⁶⁵那時，一個二級工的工資是42元。

⁶⁶生產隊每年決算中，勞動工分所值在扣除所分糧食和柴草後，仍然有餘錢可分的人家，村人們習稱為“餘糧戶”。

安葬了父親之後，我告別母親，立即到北京與妻子女兒團聚。

1979至1980年，右派分子“改正”，“地、富、反、壞”分子摘帽，改革開放，鄧小平開始主政中國。

當時，影響我家的“天下大事”是，我調不進北京。

試想，妻子與我長期分離兩地，她一人帶著兩個孩子（我被“逮捕審查”時，小孩子才一歲），還得上班，生活上的困難如泰山一樣壓著她。我如能調回北京，當然可以大大減輕她的負擔。

那時，國家要成立黃金部隊，報名地點設在和平里。妻子李若珍滿懷信心地去了，一說我的年齡、學歷，都沒有問題。可是，一說起我的政治經歷，人家就臉露難色了。雖然沒有當面拒絕，說要研究研究，但是，拒絕是肯定的。妻子後來查了什麼文件，類似我這樣的人，是調不進北京的。

由此我想到，1968年，我可以不調離北京；1968年，我調離北京時，可以不遷移戶口。但是，按規矩辦事的老實人終是吃虧的。

調不進北京，妻子鬼迷心竅，就要與我離婚。經過一年多的折騰，法院竟然聽了她的，判決離婚，兩個孩子也歸她撫養。我等於被掃地出門，一個人孤零零地被扔在了青海。

薄一波定我爲“三種人”



我的母親與我的兒子聶鑫（1984年攝于西寧）

令我不解的是，我在文革中從未與薄一波、李井泉打過交道。我也從未叫人去整過他們。但是，不知道他們出于什麼“義憤”，却總是不放過我。1968年畢業分配時，我被留校。在學校拿了幾個月工資後，出于“自我保護”，

我要求不再擔任學院革委會副主任，離開學校，來到了極為偏遠的世界最大最高高原的山溝裏。至 1985 年，我一直遠離北京，躲得遠遠地——這裏所謂的“躲”，並無“躲”在陰暗角落裏“煽陰風，點鬼火”之意，也無“等待時機，以圖東山再起”之心。我只是希望，從此能隱姓埋名，遠離政治，以自己所學回報祖國和人民。但是，我太天真了，我“躲”在了青海的山溝裏，也仍然沒有“躲”過還鄉團的魔爪。

在我遭受長期審查、隔離、牢獄之災之後，1985 年，薄一波親自批示，李井泉親臨西安，把青海省地質局黨委書記劉玉泉召到西安，當面訓示，必須把聶樹人定為“三種人”。

在“定”我為“三種人”時，我所在單位，青海省區調綜合地質大隊黨委的負責人與我有一次“例行談話”。這談話就是給我宣布他們的“組織結論”。我在瞟了一眼那“結論”後說：

“對於一個按照毛主席、共產黨中央的指示，積極參加了兩年多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學生，被內查外調了十多年，被當作‘5·16’隔離審查了兩三年，被當作‘反革命分子’坐牢一年多的人說來，給定個什麼‘三種人’，不過是‘大巫見小巫’。在你們將我置于死地、送進監獄後，你們的省公安局却將我‘無罪釋放’，這說明我無罪，而且，十分清白。在這種前提下，我只想問你們兩個問題：第一，從 1968 年至 1985 年，經過 18 年的內查外調，你們能指出我在文革中一條違法亂紀的事實嗎？請回答！”

在一兩分鐘的沉默之後，我說：

“我知道你們是指不出一條來的。那麼，能不能得出結論，在文革中，我的所作所為，是按照共產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去說的？”

又經過一兩分鐘的沉默之後，我說：

“既然你們不回答，這就意味著，我在文革中是清白的。因為，文化大革命是在共產黨中央的號召下開展的。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是：文革中，我既沒有犯罪，也沒有違法亂紀，你們却一定要把我當敵人對待，這是不是意味著我聽共產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錯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請告訴我，今後，對共產黨中央，對共產黨領袖的話，我還聽不聽？”

仍然沒有人回答我的問題。我在離開的時候說：

“我不能強迫你們回答我的問題，更不可能指令你們該怎麼做。定不定‘三種人’，那是你們的事。我的話說完了，我該走了。”

在此後的十餘年中，我一直從事技術工作。

永遠釘死在耻辱柱上的石占泉

二十世紀末期，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殺。此後不久，蘇共倒臺，蘇聯解體。對這些國際間的大事，人們大都是關心的，我也不例外。但是，對這類大事的深層意義我並未多加考慮。因為，經過許多變故，我已遠離政治。不料，1992 年的一天，一個早已退休，連路都有點走不動的叫張子貴的老幹部到了我的辦公室。當時，我在青海省地質礦產局資料處工作。

他問：“你對石占泉有什麼看法？”

張子貴，在石占泉當政的時日，任行政處處長。石占泉整人，他是幫手之一。我自 1979 年底出獄以後，從未與石占泉、張子貴等打過交道，我連看都不想看他們一眼。路上，不幸碰了面，我只能仰頭而過，他們則低頭而行。

對張子貴的問話，開初，我有點懵。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張子貴找上門來，絕對不是爲了自責。他們的人生辭典裏從來就沒有“自責”這個詞。懵了三秒鐘之後，就不懵了：這當與國際形勢有關。石占泉與張子貴等對國際上的風雲變幻比我敏感得多，我自愧不如。以前被石占泉整過的人，有的已經歸天，有的已至耄耋之年，有的早已回歸故里。我是他整得最慘者中的最後一個，相對於他說來，又恰當盛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個以整人爲樂爲業的人，大概也把他人（自然我也應算入其列）都當成像他那樣的整人狂、報復狂。在他想來，中國如發生了歐洲那樣的事件，我也會把他送進監獄，或者取他的人頭。

反過來說，如果能提前殺了我的頭，他們也就沒有被“報復”的心病了。

由此，我又想起了一句名言：“樹欲靜而風不止。”

俗語說，“不做虧心事，何怕半夜鬼叫門”。一個年近 80 歲、離火葬場已近在咫尺的人，還如此關心“國內外大事”，還如此“器重”我這個被他送進監牢的人，實在有點“難能可貴”。我常常想，如果這些在位的人能將用在整人、算計人上的精力的百分之幾用于運籌工作和生產，中國的人均經濟地位在世界上就不是“倒著數”的排位了。

我對張子貴說：你告訴石占泉：我沒有忘記他！即使他死了，我也不會忘記他！

（2001/9/20 草稿）

（2008/10 修改稿）

（2017 年 6 月一稿）

第二大部分 文革研究

第一章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11622 班没有党员

我 1962 年 9 月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普查系（地质系）。我们全年级 150 个新生，分为五个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学校指派的政治辅导员刘和林是党员。

当时，学院团委书记安静中（四川人）到我们班蹲点，与我班（11622 班）打得火热，因为我班有四个同学是四川人。

在评定我班同学张正万（工人家庭出身）的助学金时（我当时是副班长，主管评定工作），由于刘和林的干预，后来，发生了张正万没饭吃的问题。我向刘和林反映，他说，他知道了。可是，到了第二个月，仍然没有解决。我向系里反映，刘和林认为，我这是在告他的状⁶⁷。这样一来，就得罪了刘和林。随即，从如何正确对待工、农子弟上学问题，逐渐发展到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最后，我（们）虽然胜利了，却得罪了刘和林。由此出现的情况是，到了 1966 年初，全年级五个班中，其他四个班发展的党员从 2 人至 7 人不等⁶⁸，可我们班却没有发展一个党员。

我班有同学说：“只要刘老师在，我的入党问题就解决不了”。⁶⁹

或许，这应怪我，怎么能得罪政治辅导员呢？！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得罪了政治辅导员，其他同学不一定得罪他啊？我并不认为我就达到了入党条件。但是，除我以外，其他三十个人，也一个都不够吗？从“政治”需要出发，在三、四年时间里，我班至少也应该发展一个、两个呀！

刘和林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经历，和我们这些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的经历，是不同的，他很难理解我们的心境。因此，很难有同情我们之心。当时，他就一再指责我（们）“生活在‘红色保险箱’中”。直到他 1965 年下半年离开学校，他都没有“强迫”自己，在 11622 班发展一名共产党员！

当时，我也曾将我的忧郁向团委书记安静中说起过，冀望他能主持公道，为我们的入党，向刘和林说句话。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据勘探系“红色尖兵煤田支队”揭发：

“安静中一到我三年级(特别是在 22631 班)就.....在底下说：“入党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企图.....把青年引入“为入党而入党”歧途.....安静中一到 22631 班就和那个思想极端反动、灵魂特别肮脏的学生丁××打得火热，并不顾全班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学的反对，强行把他拉进党内。

⁶⁷ 张正万家五口人，只有他父亲 40 几元（月）收入，人均不足 10 元。当时，张正万的母亲是临时工，每月有 15 元收入。我主张给张正万评定 12.5 元（刚够买饭票钱），刘和林主张给 8 元。几个月后，张正万母亲失去工作，家里给他的钱难以买回全月的饭票。

⁶⁸ 前政治辅导员刘文德老师（2016 年）根据文革中“东方红革委会社员登记表”的登记统计。

⁶⁹ 聂树人，《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第 327 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 年。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静中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丁××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丁××来“控制 22631 班”……他的所谓“目的是没有的”,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那些乌龟王八蛋统统拉入党内,改变党的颜色,一旦时机成熟,好搞资本主义复辟!

“安静中……拚命强调所谓“重在表现”,胡说什么“一个人表现好,他今天表现好,明天表现好,永远表现好就行”。在这里,这个大混蛋抽掉“表现好”的阶级内容,为那些投机分子、反革命两面派钻入党内大开方便之门,把那些专会趋炎附势,溜须拍马,能忠实为刘邓黑司令部和安静中之流的大小爪牙效犬马之劳的所谓“表现好”的人拉入党内,而把那些敢于抵制错误路线,敢于造刘邓黑司令部和安静中之流的反的同学,说成是“表现坏”而加以无情的排斥……”⁷⁰

几十年来,我一直纳闷的是,我们班 31 个同学(后来增加一个留级生),就没有一个人够得上刘和林的“党员标准”?而 11623 班,就有七个人够他的标准?

同情之心是有阶级性的

2015 年底,安静中的弟弟安义中在纪念安静中逝世 20 周年时写道:解放前,“父亲任南充商会会长,家道殷实,宅心仁厚,广有善缘,哥哥聪慧出众,时常穿一套白色华达呢学生装,经常陪家族亲人和父亲商界大佬们下象棋,棋下得十分地好,学习十分地好。1950 年(四川解放的时间)解放时哥哥正上高中,他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想把青春和热血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故他选择了刚建校的北京地质学院,离川远赴京都,去追求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建设的游击队员,成了安家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走出家门的人。”⁷¹

这又使我回想起了我们班发展党员的事儿……

原来,安静中在 1950 年前,是一个济身于“商界大佬”中间的公子哥儿;1952 年后,却用短短几年时间,不仅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还在 1957 年之后,当上了地质学院的团委书记,济身于特权阶层。

追索安静中“进步”的历程可以想得到,在“富人”主政、“富人”当教师的大学里(后文叙述理由),即在学校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出身于富裕家庭的背景下,在富人子弟为主(后文叙述理由)的学生海洋里,创造这样的“奇迹”,并不奇怪。可是,这位团委书记,对几年前,“时常穿一套白色华达呢学生装,经常陪家族亲人和父亲商界大佬们下象棋”的情景,就很快忘得一干二净吗?在几年时间中,在思想感情上,就能从一个“公子哥们”质变成为用“特殊材料”⁷²制成的战士?如果用老红卫兵的“血统论”观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久经考验”是个伪命题

⁷⁰红色尖兵煤田支队<痛斥安静中的反革命罪行!>1968 年 5 月 30 日《东方红报》.

⁷¹安义中网文,《长兄如父血浓于水——怀念兄长安静中》。

⁷²我们上大学时,学校教育的一个“通用语”是,“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将“时常穿一套白色华达呢学生装，经常陪家族亲人和父亲商界大佬们下象棋”的哥们，与一个光着脚丫子，提着一个大笼筐拾柴禾的野孩子（这是我小时候的形象）放在一起，对照会是很明显的。而要让后者讨前者喜欢，让前者决定后者的命运（比如发展入党），其结局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血统论”。可是，从人的成长上讲，只要没有“健忘症”，人的幼年、童年，人的过去的主要经历是不会被忘记的。60多年后，安义中还记着哥哥安静中的衣着，还记着安静中陪“商界大佬们下象棋”的事情，还记着“安家”的“家道中落”，不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由此想开去，那些“背叛”了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幼年、童年、少年经历，就一点儿留恋都没有了？前几年还穿着“华达呢学生装”，陪“商界大佬们下象棋”的安静中，近几年，因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立马“背叛”了家庭，就一下子有了“光着脚丫子，提着一个大笼筐拾柴禾的野孩子”那样的经历和感情？不可能！

北京地质学院1162级150个人的命运早在60年前就已经注定。到2016年，有的学生已经逝世，刘和林、安静中也已经过世二、三十年。我现在提起这类事情，只是“就事论事”。有人说，1962年，全国招收大学生比率最低，只有12万，都是人中之精华。可是，我班的30个人（大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却与“精华”无关，四、五年间，受到共产党员刘和林（地主出身）、安静中（资本家出身）⁷³等人的漠视或冷遇。

问题在于，当时，共产党宣扬他们的宗旨是代表穷人的。刘和林、安静中等如此“漠视或冷遇”工农子弟，是与这个宗旨背道而驰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

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漠视或冷遇”就一定故意。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面对新政权，面对新事物，是有思想斗争的。只因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贫穷，因此，在思想感情上，与“穷人大学生”是不一样的。

早就有人说，“打天下，坐天下”的那些“老一辈”，都是背叛了剥削家庭出身的、“久经考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60多年，特别是后（近）30年“当政”的事实证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并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当政之后，如饿狼一样地草菅百姓，后来又将权力传给他们的后代，将国家和劳动人民的资源和财富据为已有。“久经考验”，显然还是个“伪命题”。

相反，打击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他们却是很积极的。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1964年，我的书包就被人“偷走”，三天后，它又被挂在教四楼一个教室的门上——这只能认为，是受刘和林主使，是在尽力寻找我的“反革命证据”的一种行动；1966年6月2日，刘和林的继任者林秀伦（富农出

⁷³将商会会长的家庭视为资本家，认定安静中出身资本家家庭，应该没有错。

身)就指示由他们发展的四个学生党员,分段抄下了我和沙丁茂、孟繁华共同署名(聂沙华)的给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全文,以图“秋后算账”,将我们打成右派。⁷⁴

17年,是“共产党统治学校”吗?

毛泽东有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⁷⁵

1966年6月初,他把北京大学称为“反动堡垒”。

毛泽东的话,成为大部分中学生(甚至包括小学生)、一部分大学生(主要是后来的保守派学生)讨伐学校当权者和老师(文化人)的“圣旨”,也成为文革的“紧箍咒”之一。

文革被“彻底否定”以后,“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论断,成为毛泽东的又一宗“罪状”。

北京地质学院是1952年,在共产党人何长工的具体主导下创办的。它的第一任领导人是共产党人刘型;1958年以后,是“老革命”高元贵。因为地质部第一把手何长工有高元贵“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的“嫌弃”,1965年,高元贵当不成党委书记了,换成了刚脱下军装的“装甲兵”大校王焕,高元贵只当院长。

中国其他学校的当权者也同北京地质学院类似,受其上级管辖者制约。当时,派到高校工作的党的负责干部,都是共产党员。自1949年起到文革前夕,17年,统治学校的,决定学校大事的,也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统治学校,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可悲的是,富人可以打倒,旧政权可以取而代之,共产党人可以当政,“人事”可以变动,但是,知识分子却难以“取而代之”。1957年,将全国知识分子的1/10多打成右派,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人数上就少了1/10多;在学术上,就失去了大半。那原因没有别的,在中国,原本就没有可以取代知识分子的队伍。

1966年,“斗”倒了“反动学术权威”。有谁能“取而代之”吗?不能!因为没有。

那么,毛泽东“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论断,对吗?也对。

自古,读书人都为富人

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主宰了中国。但是,有一样东西它主宰不了——文化权。这里所谓的“文化权”,是指与读书、识字、上学有关的文化权。无论共产党如何强势,无论毛泽东如何自誉“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倍”,1949年及以后一大段时间的“文化权”仍然不属于他(们)。事实理由如下:

1、1949年以前,中国的读书识字者,即文化、科技、社会人文知识的掌握者,基本上都为有钱人。即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层,也几乎全为有钱人。无论在什么社会,穷人的这一端都是大多数,他们首先要为生存而斗争。他们没有或很少有余力供孩子上学。另一端,是有钱人、富人,他们是少数,他们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他们要追

⁷⁴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25-2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⁷⁵ 《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

求更好的生活，那就是供子女上学，掌握知识。如果其子女又智商较高或很高，可以上到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出国留学，他们都能保证供给。

2、学习文化知识，是必须要“按部就班”的。一个不识字的人，一下子要他去上三年级，去上中学，显然不行！因此，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

——自 1949 年起，穷人翻身了，能上学了。从一年级起，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一起上学。此前，穷人、准穷人，也上过学，但是，上学的历程大都不长。

——1949 年后，小学二年级至以上年级的学生，穷人的孩子逐渐或很快减少（主要是经济原因），富人的孩子很快增多；中学以至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或全部，为富人的孩子⁷⁶。

——自 1949 年起，6 年之后，才会有较多穷人的孩子小学毕业；9 年之后，才会有较多穷人的孩子初中毕业；12 年之后，才会有较多穷人的孩子高中毕业；十六、七年之后，才会有较多穷人的孩子大学毕业。

——刚大学毕业的穷人的孩子还得磨练若干年，才能挑得起重担。这至少已经耗去 20 多年。

20 多年！这已经是一代人的时间或代价。

3、1949 年之时、之后，学校里教书的先生（教员）绝大部分或几乎全为富人或富家子弟。

4、1949 年之后，派到学校的掌权者，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有文化的共产党人——他们都出身于富人之家。

5、1949 年以后的十多年里，上中学、上大学的，大部分是富家子女，包括刘和林、安静中、林秀伦在内。在学校这个以富人为主的圈子中，刘和林、安静中、林秀伦这类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不仅入了党，而且，还当上了学院的政治辅导员或团委书记。穷大学生的入党，主要由这些富人（子弟）来把关。从 11622 班的事实，从 22631 班的事实，可以看出，在这些人的“把关”下，正直的出身穷家的学生是很难入党的。

6、在 1949 年以后的若干年中，少数穷人的孩子与多数富人的孩子同处，既培养出了富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占多数），也培养出了穷人的知识分子（占少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穷人的孩子，既受“富人”的歧视，也受“富人”的熏染。他们在富人的教育与熏陶之下，更多地遭到了“同化”⁷⁷。况且，在 10 多年后，这两类知识分子在时间上，已经相当于“第二代”人了。而且，大学毕业后，“穷人的孩子”已经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富人”了，却不再是“为活着”而奔波的“穷人”了。

据此，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文化属于富人！

⁷⁶我无处去查这方面的资料，仅据我手头保存的一本出版于 1957 年的残破的“反右斗争材料”，第 36 页，驳所谓“阶级歧视”方针：“1955 年航空学院招收的新生中，工、农出身的占 26.8%，地主家庭资产阶级等家庭出身的占 27%；去年我院（注：北京地质学院，1956 年）石油等三个系的（外派）留学生共 18 人，其中资产阶级地主等家庭出身的 11 人，工人及贫农出身的 2 人（本文作者注：航空学院为军事院校，学生的家庭出身要求高，因此，工、农出身的占比比较高，但是，也没有超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而且，“工、农”中的农，也不一定是贫下中农）。

⁷⁷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 301 页，1960 年代初进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把来北京看望他的亲生父亲说成是“这个江苏老乡是村里人。”

毛泽东对这个事实看得尤为清楚。在 1966 年 3 月 17 日至 20 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指出的“资产阶级统治学校”，完全是事实。

但是，毛泽东想通过再一次革命（即文革）来改变这种局面，却是不可能的了。经过 17 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及科研部门、报纸、出版社等部门的统治已经“盘根错节”，从学校走入社会的“富人学子”和受富人熏陶的部分“穷人学子”，事实上，已经成为党政部门的中坚。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跟毛泽东一起干革命的“老一辈”，经过十几年的“掌权运作”，已经成为大大小小的主宰（不同级别的皇帝），已经成为称霸各自主管的那一方面。所以，毛泽东在 1966 年 4 月 22 至 24 日的（杭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出，党、政、军也出，主要是党、政、军。

单靠毛泽东的威望和在总人数上只占少数的造反派，就能改变十七年间形成的局面？

知识分子应划属社会进步力量

从社会发展史的意义上说，文化知识的积累，导致了社会的进步。

“文化人”（或知识分子）这称谓，不似职业，却高于职业；不指人品，又对其人品有较高的要求。书本-知识，使人耳聪目明，使其能“继往开来”，能比常人看得更远。因此，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能臣，大都是文化人。20 世纪之前，特别是之初，为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奔走呼号的，主要是“文化人”——不容争辩，是富人的知识分子。清末的有识之士，民国的“大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是这样的文化人。

因此，文化知识应属于先进生产力之列；掌握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大体上，应属于先进的社会阶层。无论知识分子是何出身，从事实上说，他们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是为全社会所有，为全社会所用的。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

当然，“文化人”中，也有“异类”，比如他们高傲，自负，瞧不起穷人，可能有一大堆毛病；“文化人”中，也有败类，异国入侵时，他们是“汉奸”；专制者横行时，他们既是“马屁精”，也是横行者-贪腐分子。

“焚书坑儒”与“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以革命的方法改变“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状况，是不正确的。

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都是“万能”的，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他们在“文化属于富有者”这个事实面前的先天不足。知识分子，“开国”以前，都生活在旧政权的统治之下，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新政权”当政后，对新政权必然有所议论和批评，这很正常。但是，这为万能的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所不容。

因此，开国皇帝在夺取政权之后，大都将革命的矛头对准了文化人。秦始皇是“无所不能”的大帝，他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 可是，他不能使有文化的“儒生”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因此，他要“焚书坑儒”。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他无法使知识分子完全臣服在他的专制制度之下。他在忍让和不得不利用知识分子几年后，1957年，对敢于“说三道四”的文化人开展了“反右斗争”，“打掉”了他们中坚，所定“右派”占比高达知识分子总数的1/10多。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则将“反右斗争”中残留下来的有造诣的文化人，基本上，都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或不受信任的人。知识分子被列为“不似敌人”的敌人，称为“臭老九”。他们人人都得向自称“大老粗”的工、农学习，都得进行“思想改造”。

秦始皇和毛泽东在对“文化权”的争夺中必然失败。因为，他们像唐·吉诃德一样，都是在专制体制内跳舞，都是在同社会的“先进力量”进行较量。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中国的教育状况很不满意。我想说的是，“文化大家”是开放于自由、民主环境中的花朵。他们首先得“有骨气”地生活，然后，才能有创造性地思考。专制制度，只能培养奴才，重用奴才。“有骨气”的“文化大家”（如屠呦呦等）是不受重用的，甚至是备受迫害的（如束星北之类）。

第二章 剁大富是个“痞子”

1、一个“不认生父”的家伙

几十年来，孤陋寡闻的我，对剁大富在工作队被否定之后，还东躲西藏的艰难处境，对他一直拉不起自己的队伍，很不理解。

1966年9月初，剁大富自己说，他是被工作组“批臭了”。

我纳闷，地质学院的“反工作队者”怎么就没有被工作队批臭？薄一波的“万吨水压机”不谓不强大！中央文革在北大主持的辩论会一结束，朱成昭等人就回校贴出声讨工作队的大字报，地质学院的学生（反工作队者）随即纷纷爬起，谁也没有被批臭！

可是，剁大富反对工作队，却怎么被工作队一批，就批臭了？剁大富在“反干扰”中的表现是人所共知的，他同薄一波的对话，也传得沸沸扬扬！这样一个年青学生，能有多大问题，会被工作组批臭？

况且，周总理还一再扶持剁大富。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了我几十年。

2014年4月，我收到孙怒涛先生寄来的大作《良知的拷问》；2015年，我在书中看到了唐伟先生写的“关于剁大富”，以及孙怒涛先生有关剁大富的评述，才算是找到了答案。唐伟与剁大富不是“一路人”，这我知道。所以，对于他关于剁大富个人品质的说法，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但是，唐伟说的有鼻子有眼，且有旁证，使我不得不信。

唐伟设问：“蒯大富有政治追求，又受到校党委的重视，为什么到大三还没入党呢？”

唐伟说：“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中讲：一次老蒯的父亲来校看他，他却对同学介绍，这个苏北老乡是村里人。”⁷⁸

唐伟接着说：“我们大一辅导员上党课时讲，有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⁷⁹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句话，我（聂树人）上大学后，也听到过。它的“发源时间”是否更早？说的不一定就是蒯大富？但是，蒯大富因为上了大学而不认亲爹，根据唐伟引用的、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应该是真的！

一个人，因为成了大学生，而不认“含辛茹苦”、供自己上学的亲爹的家伙，至少，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家伙。对于这样的人，清华大学的共产党组织没有要他，是完全正确的。

这样的人，高喊“毛主席万岁！”有何底气？是何用心？

这样的人，高喊“誓死保卫党中央！”能有几份真诚？

这样的人，即使工作组不整他，只要揭出这一件事情，按照公序良俗，学生也不会与他同行！

这样的人，在人性“完全解放”的文革初期，岂能有人瞧得起他？

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感恩之心的人，行事没有“根本”或“基准”。“有奶便是娘”，谁能给他好处，他就跟谁走。

如此人格，工作组一批，蒯大富当然就臭。

中央的话，重如千钧。1966年6月初，宋硕、陆平、彭佩云一点就倒；随即，人民日报一点匡亚明，匡亚明就倒；一点翦伯赞，翦伯赞就倒。奇怪的是，1966年7月底8月初，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一再扶持蒯大富，却就是扶持不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蒯大富“人格”的低下和“臭”！

2、“蒯氏权经”体现的低下人格

唐伟讲：“让我特别反感并心生警惕的是不断传来的‘蒯氏权经’：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谎话越大相信的人越多，谎话的作用在于它被戳穿之前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后来陈育延对我说，‘蒯氏权经’有二十多条。”⁸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蒯氏权经”最推崇的可能就是“无诚实可言”。

⁷⁸孙怒涛，《良知的拷问》，30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⁷⁹唐伟入大学时间比蒯大富晚几年。

⁸⁰同上。

孙怒涛说：“蒯大富在‘权’字上不断地下功夫，不断地创造‘奇迹’：他把他对权的感性认识，经过提炼升华，上升到‘权经’的高度。广为流传的蒯大富三十六条权经，不一定全部都是蒯大富自己成文的。但是，我确实听他讲过不少与权经相类似的言论。什么‘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只要目的是革命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左的错误是方法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政治斗争一定要有后台’等等……我当时听了，感觉特别的刺耳，很不中听。”⁸¹

“蒯司令”头衔的窃取，是这个“无诚实可言”的盗贼的最得意的“成果”。

“智擒王光美”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真实写照。

不认亲爹，在“蒯氏权经”中，肯定也可以找到根据。

文革初期，蒯大富两次与我交锋（两次“倒聂”）⁸²，使用的可能就是“蒯氏权经”中的“经典”。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看来，“蒯氏权经”也不一定都灵。

蒯大富掌权之后，自我膨胀，立即以公款印出了自我吹嘘的《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同学戏称之为《蒯选》。

“有权有钱的老蒯下令，一下子就印了50万册”⁸³。

以公款印制私人作品，此前此后，均被视为“贪腐”。“蒯选”的出版，应该是“造反派”的贪腐之始。

3、没有人收留的“落拓者”

1966年8月初及其以后，周总理、中央首长一再抬举蒯大富，希望将蒯大富树为“反刘少奇”的英雄；受中央指示，朱成昭和“地质东方红”让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以“负责人”身份宣读誓词，又两次各派几百人的队伍到清华大学刷大字报和大标语，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以提高他在清华大学的声望。

孙怒涛说：8月4日，周总理来清华讲话后，“蒯大富被平反了，不是反革命了，但还是很臭”。

刘泉说：“周总理8月4日大会上为蒯大富点名平反，蒯大富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但是仍被许多人不看好，认为他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人。”⁸⁴

刘泉也是8月4日大会上周总理平反的二人（另一人是蒯大富）之一。

按照地质学院和其他院校运动的进展，1966年8月，是各大学造反派与保皇派分化，阵线最为分明的时期。在这期间，各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建立、成型。出身好、人品好、造反性强的造反派核心人物，已经通过“自荐”或群众拥戴⁸⁵，“各就各位”。

唐伟是当年清华大学造反派“八八”的负责人。

⁸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46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⁸² 见本书正文。

⁸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30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⁸⁴ 刘泉：酝酿红卫兵首次大联合亲历二三事

⁸⁵ 指“拉”队伍。

唐伟说：“老孙（孙怒涛）曾咨询我，蒯大富未能加入‘八八’的原因和经过。我将经过告诉了他，还说，蒯大富不诚实有目共睹，他宣扬的‘权经’遭人反感。”

蒯大富未能被批准加入“八八”，这也反映了，当时对加入造反派组织的“资格审查”是比较严格的。从“八八”负责人的角度讲，唐伟也有难处，如果让蒯大富这种人加入了“八八”，谁还愿意再加入“八八”，与这样的人为伍呢？

可见，在当时的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人格如狗屎。正直的人见到他，都掩鼻而过。纵使中央多次发话，也没人愿意收留他。

4、偷窃“司令”头衔的盗贼

现在，已经可以说得很清楚，所谓的“蒯司令”，完全是子虚乌有。这一点，连蒯大富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可是，“蒯司令”这个称呼却在中国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有许多人仍然认为他是三司的“司令”。

三司的实际负责人是朱成昭，这是没有疑问的。

1966年11月，北京政法学院的刘富元等抢走了三司大印。当时，朱成昭带人去政法学院声讨，并在主席台上讲话。刘富元那一派的学生跳上台来抢夺话筒，企图阻止朱成昭讲话。于是，在主席台上发生了争抢和推搡。

抢话筒的人责问朱成昭：“你是什么人？”

当时，朱成昭在公开场合不大出面，人们不仅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

朱成昭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负责人！”

朱成昭是三司的真实司令。限于当时造反派的平民思想，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是没有“官”的称谓的。因此，朱成昭也就没有了“朱司令”的头衔。司令部的其他负责人也同样没有副司令之类的称谓⁸⁶。更没有什么“三人核心小组”这类称谓（见《清华蒯大富》一书的编造⁸⁷。这本以笔名出版的作品，是不需要对事实负责的）。

朱成昭本来是按照中央文革指示，让蒯大富以某种身份，在三司成立的大会上亮个相，帮蒯大富一把。朱成昭也这么作了。这一帮，却“帮助”蒯大富“盗”走了三司“司令”的头衔。⁸⁸

蒯大富没有在三司工作过一天。他离开三司后，即以“蒯司令”自诩。在广大不明真相的国人心中，因为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以负责人的身份”（这个“负责人身份”，当时在三司有16位。而且，蒯大富的“负责人”身份还是“预支的”，别人都有队伍，他却是光杆一个）领读过誓词，三司也没有其他人称“司令”的，就误以为蒯大富是三司的司令。

⁸⁶ 在“地质东方红”中，朱成昭同样没有“官”的称谓，只被当作“总勤务员”，但是，没有人这样叫过。

⁸⁷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35—13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⁸⁸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第58—6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1966年10月6日，完全由三司独立主持、召开的大会，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三司从此成为中央支持的一面造反派组织的旗帜。看到这个“风光”，21世纪，一个叫许爱晶的编著者，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胡扯什么，这个大会是“北航红旗与三司联合召开的”。还胡说，蒯大富念的誓词是韩爱晶给（写）的。⁸⁹

许爱晶在2011年出版的《清华蒯大富》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我说的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却又编造谎言，说蒯大富是什么“副司令”或“三人核心组”成员。

文革中和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辟谣”的原因在于，随着三司名声的大起，社会上攻击三司的黑浪也随之掀起。此时，蒯大富作为造反派，也承受着压力。为了不“自相残杀”，我们就保持沉默。

这一沉默，就是四十年。

这一沉默，蒯大富就“心安理得”地当了四十年的“蒯司令”。

在四十年间，蒯大富从来没有主动“厘定”过这个问题。如果朱成昭不“厘定”，如果不“厘定”，他就真成了三司的“蒯司令”。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然欺蒙了几千、几万个三司战士，欺蒙了全国的人们。这样的人品，与“大盗”没有两样，是“蒯氏权经”的具体体现。

肯定有人会指责我这个人浅薄，不厚道——怎么能将“大盗”的名头加于亲爱的蒯大富头上呢？

肯定有人会指责我这个人浅薄，不厚道。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文革都被“彻底否定”了几十年了，都被歪曲得不成样子了，还要“自相残杀”，追求真实，还要去“厘定”！

我的回答是：

（1）我已经沉默了几十年，几十年后才说出真相，给“大盗”一个定性，浅薄吗？不厚道吗？

（2）蒯大富除在“五十天”里，与以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背后站着刘少奇）进行坚决斗争外，其他乏善可陈。他不正是顶着“蒯司令”这顶头衔，到处活动？不明真相的人们，不正因为他是“三司司令”，才“认”他的？而他干得大量事情，不是都强加于造反派头上么？

（3）无论历史被如何改写，追求真实，总是没有错的！

（4）“蒯司令”这个谎言，还要不断“厘定”。因为，不明真相的人太多，自觉不自觉相信谎言的人太多。就拿当年的当事者唐伟来说，几十年后，也对“蒯司令”信以为真。⁹⁰

相比于蒯大富，朱成昭不会自吹自擂，更不懂得什么“权经”！对出头露面的事情，当时看得很淡，大都回避。因此，许爱晶说他“影响不大”。

⁸⁹同上。

⁹⁰同上，302-303页。在这里，唐伟有关“蒯司令”和三司的描述，依据的都是当年蒯大富制造的谎言，明显受到“蒯氏权经”中的“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影响。

“蒯司令”这个谎言被戳穿后，蒯大富当不成“司令”了，他很不甘心。他伙同“许爱晶”，又在2011年出版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制造出他是三司“副司令”、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的谎言⁹¹。到21世纪了，还这么“炒作”，就很有点“没有脸面”了！

5、一个恩将仇报的“负义者”

朱成昭帮了蒯大富，“地质东方红”的众多战士帮了蒯大富，可是，几十年间，谁人听到蒯大富说过一句感谢朱成昭的话？谁人听到蒯大富说过一句感谢“地质东方红”的话？

反过来想想，他连自己的生父都不认，都没有感恩之心，还能再感激谁？

1967年1月下旬，蒯大富曾为“地质东方红”的反对派“蔡派”转过一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告密信，反映的是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的问题。因为这封信，招致了陈伯达对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坑里去”的批示，招致了朱成昭被迫作检查，招致了朱成昭最后下台，招致了他及其同伴下狱十年的恶果。

朱成昭是否真地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蒯大富是否预见到这封信将导致的结果，自当别论。但是，从蒯大富愿意向上转交这封信，可反映出他嫉妒朱成昭，嫉妒“地质东方红”，欲讨上级（中央文革）欢心的心态。他恩将仇报，也可看出，他绝无感恩之心。

不久前（2015年），微博上传蒯大富说，回忆文革历史“其实很难”。一些人认为，这是“名星”或“名人”说的话，甚为相信，还加以传播。我对此的回答是，回忆文革历史，说真话易，编造文革史难。蒯大富盗得三司“司令”很容易；要他将“司令”的头衔“吐”出来，很难！“蒯氏权经”实践起来很容易，要分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就很不容易了。蒯大富以“蒯司令”的名义招摇撞骗了几十年，要将几十年间形成的观念扭转过来，更不容易——难！要掩盖这一个谎言，就得编造出另一个谎言（如他与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编造的，他是三司副司令或“三人核心组”成员等）；要人们相信另一个谎言，就更难。

我想问，一个连自己生父都不认的人，一个将“权经”玩的呼鲁鲁转的人，在感恩与不感恩上，在“回忆”的真、假上，有没有资格谈论“难”与“不难”？

6、一个“主动造反”的典型

有“蒯氏权经”的指引，蒯大富成为一个“主动造反”的典型。

正如唐伟所说：“老蒯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很快转变为权欲野心……很快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走过了一段疯狂的夺权道路。”⁹²

在专制制度下，一切都得听中央的，得听最高领导人的。下级永远是“被动型”的。

⁹¹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36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⁹²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见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301页。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

当对工作队错误路线的批判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没有了政治压力的造反派，就会发生另一种分化，分化为“主动型”和“被动型”。这一分化，主要源自社会制度，也源自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性格或品质特点。

这里，所谓的“主动型”，就是在自己已经得以平反的情况下，还“主动”进攻，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或影响力。在“主动”中，有自己根据大局，捉摸、寻找到的任务；有积极从上级那里争取来的任务。所谓“被动型”，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胜利之后，即停止进攻，等待上级部署，再“消极行动”的那部分造反派。

蒯大富是一个“主动型”造反派的典型。当“清华井冈山”成立的时候，已经是9月下旬。此时，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东方红”为领头羊的造反派，通过“一进”和“二进”地质部，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已经否定了工作队的“反干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相当深入。这时，大批判之花在中国大地盛开，而“地质东方红”则隐藏于众花丛中，和大家一起前进。“地质东方红”已经誉满天下，早已成为北京文革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权欲熏心的蒯大富，及以他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只有“创造”出更大的业绩，才能与“地质东方红”比肩。当时，“右”，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左或极左，才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因此，他（们）对干部（走资派），对“反动学术权威”，表现得特别凶残。他极力向中央文革表忠心，要将反刘少奇的声势造得更大；“12.25.打倒刘少奇”的行动、“1.6.智擒王光美”的行动，就是他“主动”的“杰作”。

在这个期间，朱成昭和“地质东方红”就没有什么新动作。他们在笑看蒯大富的演技。

7、甘当“街头混混”

在《良知的拷问》一书中，有唐伟写的“抓‘联动’等，参与对中学生的迫害”一节。唐伟写道：“清华‘井冈山捉鬼队’充当了打人抓人抄家的重要打手，北京体育学院成了临时看守所，那帮四肢发达的体育尖子成了最趁手的帮凶，谢富治把持的公安系统给予了全力配合。”⁹³

在1967年2月4日，朱成昭对北京中学生的文革表现作了一番评述后说：“一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待中学生这部分力量不是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忽略了作思想工作和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后来对联动的态度尤其这样。这里可以举例子，例如清华井冈山抄人大附中红卫兵时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知道不大确切），据说把小孩赶到楼上去，赶到楼顶上，一层层追，追到楼顶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小孩给打的只剩下六七个了，在楼顶上他们升起了国旗，用瓦片砖头打下来，一面高唱国际歌。另外，在抄石油附中红卫兵家时，红卫兵他们打打，退到地下室里边，他们就把地下室里边放了水，说：‘你们不出来？不出来就继续放水！’还有用灭火机向小孩脸上喷，说：‘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再喷！’这办法，我们认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原来西纠是采取这个办法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办法又对付他们。”⁹⁴

显然，以蒯大富为负责人的“井冈山兵团”如此对付中学生，已经和街头混混没有什么区别了。

⁹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30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⁹⁴ 见《朱成昭检查》，1966.2.4.

我的看法是，“老红卫兵”是民族的罪人。他们在文革初期，打着“造反”的旗号，行保爹保妈之实；打着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旗号，行“打、砸、抢、烧、杀”之实。他们破坏文革，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对他们应该清算。

“地质东方红”受“老红卫兵”－“联动”迫害最深。在打压联动的行动中，却没有出手。毛泽东支持了（最先是写信）这帮小娃娃，又是毛泽东抛弃了这帮小娃娃，最后，又释放了这帮小娃娃。对于这样的事，“地质东方红”原本就有看法。

1966年12月底（？），“联动”几次冲击公安部。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三司”关注“联动”冲击公安部的事情。他并让其他人专门给我详细谈了联动的冲击情况。最后我问：

“是不是要我们派人将这帮小崽子给抓起来？”

“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制止他们冲击公安部的这种行为。你们自己去理解。”

显然，他们要我们动手，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还不落下任何嫌疑。况且，我们抓了人，要送到哪儿去？还不是再送公安部？

那么，由他们派出公安干警，直接抓了，送进监狱，不就行了？

可是，他们却不抓。

几经思考，我没有下令派人，只是写了篇“声讨”的文章，发表在《首都红卫兵》报上，就算完事。

对于同样的事，蒯大富愿意干，抢着干！于是“清华井冈山”就动手了……

8、“清华井冈山”要与“三司”并肩

在许爱晶写的《清华蒯大富》⁹⁵一书中说，1966年9月，蒯大富提出“三大口号”：“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批判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这就有点偏差了。许还说：

批工作组错误路线，矛头向上，符合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清华大学红卫兵”矛头指向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组织，已有政策偏左的倾向；为“蒯式人物”平反，是应该做的，但突出一个“蒯”字，已有突出个人和小宗派的苗头。

这是早期的张扬。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大都记得“一月风暴”，记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个历史性文件。

在前者的文末，署名的有11个组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⁹⁵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3，香港。许爱晶即韩爱晶。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在这 11 个组织中，除上海地区的外，其余四个，除“北航红旗”、哈军工、西军电外，就是“三司”，即“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航红旗”属于“二司”，它为何不打“二司”的旗号？

当时，从北京到上海去串联的学生组织很多，除北京地质学院外，如政法、农大、林学、农机、邮电、清华等等的造反派，都齐集在“三司”的大旗下。

但是，五天后的《紧急通告》中，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文末的署名为：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沪外名单增加了一个：“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当时，参加三司的院校到外地串联，打的大都是三司的旗号。只有“清华井冈山”，它要独树一帜。

于是，我把这些现象和其它现象加以归纳，写成《万里长征第一步——略谈目前革命队伍中的几个问题》，刊登在 1966 年 1 月 21 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上。读者读了下边这些文字，应该明显看出其针对性：

1、严重的个人主义。一些同志以功臣自居，中了糖弹，他们不求再前进了。他们所想的是唯我独尊，扬名天下。**某个人甚至不惜花国家一万元资金来印发他的变相“选集”⁹⁶！要联合吗？那好吧！只要让“我”当头，什么都好办！**

2、严重的本位主义。一些同志的言行不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的工作是为了突出本单位、本组织。为此，他们不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是这里伸一把手，那里伸一只脚，到处都想捞到点资本；更可卑的是，别人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们一下车便哇哩哇啦地乱叫，**什么老子是“×××××的”⁹⁷（名牌货！！），得听我的！处处都想把他们凌驾于别的组织之上。**

3、严重的山头主义。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互不通气，互相保密，互不服气！因此，造成了许多混乱的局面。北京的大会天天都开，内容上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开得很好的大会又有几个？北京有许多大的行动，可是这些行动有几个搞得比较出色呢？

有个别单位，**搞得像个山寨**，盛气凌人，谁也不放在眼里。

我们有许多革命的好同志为革命做了许多好事，成为大家的学习榜样。可是问他姓名，单位，他却说“我是‘三司’的一个战士！”。首都“第三司令部”之所以发展壮大得这样快，一方面与毛主席、党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我司令部千万个革命成员闯出来的！可是个别司令部所属单位却不是这样，例如：**首都“第三司令部”驻外地联络站，本来是一些到外地串联的首都第三司**

⁹⁶指蒯大富。我没有看到这本“选集”（“蒯司令”是不会送给我的），是当时在司令部工作的同志告诉我的。

⁹⁷×××××，五个×，暗示的就是“清华井冈山”。

令部的战士发组织成立起来的，他们为革命，在外地干了许多好事，可是司令部所属个别单位在北京不把司令部放在眼里，许多大事，根本不通知司令部一声，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寨，它的一些战士到了外地，不是想把大家都联合起来，把首都“第三司令部”驻外地联络站办得更好，而是另起一个炉灶，也来个什么兵团驻××联络站，总是设法把自己的旗号搞得亮一点。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9、“清华井冈山”与“三司”对抗一例

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以其特殊的地位，以其高干子弟的众多，师生们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因此，他们到了哪里，无论自己正确不正确，都有一种要高人一头的心理定势。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中，如果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有幸汇聚在一起，北大、清华的一些学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会表现出“特权阶层”的色彩。中央高层和新闻媒体对这几所学校的“另眼相看”，也助长了这种色彩的张扬。

但是，在那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年代，众多其它高校的师生并不买他们的账。因此，时不时，这里那里，自觉不自觉，就发生了冲突。“清华井冈山”学生在《工人日报》同其它院校的学生发生的尖锐的对立就是一例。

1967年2月8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发表以“不平”为笔名写的《不许从〈人民日报〉革命造反派手中夺权》的文章，对这件事的真相有所披露，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元月9日，《人民日报》社革命造反派学习了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经验，起来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夺了权。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好得很！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本单位革命群众起来造反，起来夺权，只能大力支持，不能有任何的指责！

但是，“清华井冈山”驻《人民日报》联络站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偏见，企图来一个第二次夺权，但是在造反派的抵制下谋图几次都失败了。

元月29日，《人民日报》出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原稿为“清华井冈山”驻天津同学写的），《人民日报》社造反派同志已经表示作检查。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不是因为这篇社论是株“大毒草”来批判的，而是想借机搞垮《人民日报》造反派，把《人民日报》的权夺过去，据为一个或两、三个小单位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决定，进驻《人民日报》社，全力支持工人日报的造反派。

首都“三司”的革命行动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山西夺权总指挥部还派专人从太原赶到北京，以示支持。大家一致决定，立即成立联合办报委员会，由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共同管理和监督《人民日报》，依靠《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热情宣传、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有力阵地！

我们相信，无论阻力多么大，《人民日报》社的革命造反派一定能在全国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克服缺点，修正错误，把《人民日报》真正办成工人阶级的喉舌！

他们当然很不痛快，但是也无可奈何。“三司”的介入使《人民日报》社的局面很快有了好转，报纸也能正常出版了。

我清楚地记得，去《人民日报》社调查情况的许嘉璐回来说，有人在《人民日报》社贴出一幅漫画：一个戴着眼镜的“清华井冈山”学生高举拳头，大喊“臭知识分子靠边站！”，他还说，“清华井冈山”的学生先是不让报纸出报；报纸出来后，又挡在拉运报纸的卡车前面，不让将报纸运出去。工人推他们，他们不走。驾驶员发火了，猛轰汽车油门，鸣着大喇叭，撞了过来（当然不是真撞）。结果，那几个色厉内荏的学生，立即往后退去，让开了道……

2月5日，毛泽东对《工人日报》社的指示如下：“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在这种情况下，“三司”派去的人员也撤了出来。

“清华井冈山”在北京和全国许多地方，经常与“三司”及三司院校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据2月14日《首都红卫兵》载：

西安革命造反派正在批判西安地区革命派大联合的障碍——以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近，“清华井冈山”驻西安联络站在《革命造反报》上发出长达万言的“紧急呼吁”，反对反右倾，引起革命造反派的极大愤慨。当晚，革命造反派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封闭了《革命造反报》。

10、“北京市大权”的争抢者

在许爱晶写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引述的“蒯大富回忆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韩爱晶那里我只派个人去参与而已。”

事情果真如此吗？

出版于1967年2月12日的北京地质学院《红教工动态报》第29期的“联合动态”中，是这样描述“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一月底，酝酿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二月一日，革命造反公社某些人提出“工人总部不纯”，不愿联合。而多数代表，特别是工人代表迫切要求联合。当即由蒯大富同志代表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提出一个方案，经过大家讨论、补充、修改，通过。北大代表也未表示反对。由此形成北京人民公社第一次会议决议。

……次日，公社的主要单位北大提出需要“统一思想”云云，无奈，会议只好推迟举行。

三日下午继续开会。造反公社某些人老调重弹，其本质在于否认第一次会议决议，不想大联合……

四日会上，北航红旗提出了表示双方均有联合的诚意，建议取消“夺权斗争委员会”和“革命造反公社”的称号，统一安排工作，统一使用“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的名称。北大不同意，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

九日，新北大红旗兵团驻市委支队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中指出，不存在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筹委会的第一次决议没有经过民主讨论。

十一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出动宣传车发表公告说：由“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组成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诞生了。还说，到目前为止，“北京人民公社”的筹备委员会并没有正式产生过，正式的“北京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不存在。因此，所谓的“北京市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是无效的，等等。⁹⁸

上述文字形成于1967年2月，货真价实。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聂元梓和蒯大富、韩爱晶在“公社梦”上，争抢得不亦乐乎！而对谢富治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恨得牙痒。他们都想当张春桥第二。可是，到了2011年，蒯大富却双肩一纵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

⁹⁸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第253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蒯大富、韩爱晶的“北京人民公社”梦，有据可查。我在《“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一书的第260-263页，不仅刊登了“北航红旗”1967年2月10日出版的《红旗》报“社论”照片，还刊出该“社论”全文。该书指出：

“到了1967年2月18日，‘北航红旗’还在坚持‘北京人民公社’的立场。它的机关报《红旗》报刊登的文章《全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迅速联合起来》中，就有‘一个崭新的北京人民公社就要展现在我们眼前……’文后，还在高喊：‘毛泽东的北京人民公社万岁！’”

由此可以看出，蒯大富、韩爱晶等，是何等的不诚实。

11、“第三次大串联”的制造者

文革中，学生的“第一次大串联”是中央号召的，发生在1966年9月至1967年2月。第二次大串联发生在1967年1967年4、5月份，鉴于“二月逆流”，特别是四川的开枪打死人的严重事件，中央有限同意一小部分北京学生到“热点”地区，宣扬落实中央的政策。

蒯大富早就嗅出毛泽东对“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整肃味道。唐伟说：“1966年12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蒯大富曾将刘志坚抓到清华，关押在1号楼506房间……鲍长康曾持关锋指令窜到北海舰队……蒯大富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下，锋芒直至军中德高望众的老帅、老将……1967年7月蒯大富在他召集的‘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上发言：‘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

“第三次大串联”的直接倡导者是蒯大富，而且，他派出去了许多学生⁹⁹。

自1966年9月，我在三司任职后，就有中央文革小组和总理联络员的电话。但是，没有迫切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打过。在“清查5.16”时，清查人员要我“老实交代”我同“林彪、四人帮”的密切联系，我还真地回忆了一下。在近两年时间里，我只向上面打过一两次电话（好像是请示什么问题），从来没有给中央写过一封信。

清查人员说，那叫“效忠信”。

我没有向中央文革写过一封信，清查人员大为不解。

我估计，朱成昭和地院其他头头也是如此。因此，“地质东方红”也就少了许多“麻烦事”。就我个人说，文革前，我不知道如何“靠拢组织”；文革中，从来也没有想过，如何投上级之所好，讨上级的欢心。我，及“地质东方红”的其他负责人，都只是凭自己的良知，凭自己的直觉，在“例行公事”。

这就是我们与蒯大富的主要区别。

12、“7.28召见”，蒯大富还在演戏

《历史拒绝遗忘》一书的“序言”为秦晖所写。秦晖，1953年生人，“1966—69年一直当中‘新生’。”因此，他在“序言”中所写的许多事情，特别是“清华、北航黑会”前后发生的事情，都不难说是他的亲历。

⁹⁹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第222-22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几十年后，秦晖写的“序言”，当然也不应该是他的亲历。而且他完全肯定蒯大富的说法。

清华大学的武斗，起始于1967年（此时，主要是拳斗）。到了1968年，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以冷兵器为主的武斗）。

毛泽东早就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难道蒯大富不知道武斗错误？

无论周恩来还是中央文革，无论北京市负责人谢富治还是卫戍区负责人，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都进行过多次制止。

据王大宾说，在1968年7月28日之前，仅北京市革委会就开过几次制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斗的会议。有一次，团派打死了“4.14”的人，“4.14”抬尸到市革委会门前游行。王大宾说，他还和韩爱晶陪同谢富治去清华制止武斗。聂元梓、蒯大富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会议肯定是参加了的。但是，他们可曾执行过会议的决定？

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热衷于自己的权势地位，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视为自己的私产，“老子天下第一”。他们认为，除过毛泽东，谁也管束不了他们，或者，连毛泽东也不一定能管得了他们。

自“清华井冈山”成立一年多来，蒯大富及其“智囊团”一直在研究“文革动向”。他们一会儿要打倒这个，一会儿要打倒那个，一会儿将手伸到上海，一会儿将手伸到四川、河南……他们自认为非常了解天下大事，唯独没有研究出进清华大学的几万工人宣传队是谁派来的？

难道这些“老子天下第一”的英雄，对自己一直“坚持武斗”，没有半点忏悔？没有半点畏惧？对工人进学校，冲着“武斗”来、冲着蒯大富来这件大事，就没有研究过？就没有探讨过？这可能吗？

近年，有人在追查1968年7月27日及其前后，蒯大富在干什么？那原因就在于，大家不相信蒯大富的话：“不知道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

针对几万工人进校，蒯大富他们肯定进行过“谁派来的”议论和探讨。据蒯大富自己说，他们还“向各方面打电话求证”。无论真假，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有“这是不是毛泽东的决策”这个判断。

我，一个局外人。当时，听到几万工人进清华，立即就想到，这是毛泽东的“又一重大决策”。因为清华大学长期武斗，北京市、中央文革小组，谁也解决不了。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有权力一下子调动几万工人进清华大学？

几万工人，是北京的工人，不是外星人！

据蒯大富自己说，7月27日“上午10:30我从市里回到静斋。对于这个时间我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工人已大批涌进清华园，但还未得及包围静斋，我得以顺利地进了静斋。当我走到静斋楼顶往下看时，见到人群中有鲁文阁、徐凯（也是北京市革委常委，工厂的代表）在指挥工人包围静斋，不得进出，但他们没有攻楼。”¹⁰⁰

¹⁰⁰ 据电子刊物《记忆》164期，2016.7.

用脚后跟思考都可以想到，其调动者已经不会是蒯大富这类人！

虽然有此“判断”，满脑子“老子天下第一”的蒯大富还是要试试看。于是，他们下令向工人动手，结果好几个工人被打死，好多个工人被打伤。

打死打伤工人这种事，几分钟内毛泽东就会知道。

毛泽东决定，亲自解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问题。

由此也可以想到，毛泽东对蒯大富的愤怒。

很快，蒯大富就接到中央要他去大会堂开会的通知。这时，他才意识到，“铧是铁铸的”，自己已经酿下大祸。他迟迟未到会。

我们完全可以排除他“出不了清华大学”这一选项。蒯大富要到大会堂参加会议，谁能阻拦？

事实是，他与他的智囊团在研究形势和对策。焦点是，谁要接见？

可能性之一，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这是最可能的。因为自文革开始以来，这是最高规格的接见，历来如此。

可能性之二，毛泽东要接见。事先不打招呼，一下子就派了几万工人进清华大学。这种罕见的举动，只有毛泽东有这个权力。

果真如此，蒯大富的祸就闯大了。

对这两种可能性及其应对措施，特别是后一种，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蒯大富因此迟到了好几个小时。

当蒯大富到大会堂时，一幅很狼狈的样子，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腰间系着一根绳子。他见了毛泽东就大哭，要毛泽东“救命”，要替他“揪黑手”。

似乎，他蒯大富什么都不知道自己、非常地无奈。

以上，是王大宾在1968年7月28日传达毛泽东召见时，描述的召见时的情景。

对于这一情景，几十年间，我都记忆犹新。

在2016年8月23日，当我修改文本到这里时，我又打电话给王大宾，想再次核实，以免搞错，冤枉了好人。

王大宾对我写的这一情景表示认可。当我说到当时蒯大富是不是显得“很狼狈”时，王大宾纠正说：“他当时显得非常狼狈！”

我又问：“蒯大富不可能直接参加武斗，不可能有人打他，更不可能有人摧残他。有谁能把他搞成那么个狼狈相呢？”

骤然间发问，王大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的看法是，将他搞成“那么个狼狈相”的，是他们自己。

可能的情况是，蒯大富在进大会堂前，进行了“特意装扮”；对他可能见到毛泽东的应对，进行了较充分的预演。

蒯大富的这个戏演了几十年，现在，绝大多数人还认为，他演的戏是“真的”。

是真是假，要蒯大富自己来“自圆其说”。

特别是他的装扮——别人不可能硬给他穿上那身破衣服吧？不可能硬给他身上系一根绳子吧？即使人家给“系上了”，在进大会堂时，为什么不解下来？

毛泽东原本对蒯大富、聂元梓等人是寄托着深切的希望的，先是将他们封为红代会组长、副组长，后是将他们封为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可是，他们在两年之中，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胡作非为，使中央和毛泽东一次次失望。对之一再规劝、警告，他们就是不听。由对他们的失望，转而对整个“造反派”发生失望。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抛弃“造反派”的主要原因。

“7.28 召见”结束后，毛泽东“走而复回”，嘱咐不要整蒯大富。很可能的情况是，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自己“重用”、“纵容”蒯大富的责任。

但是，这显然是毛泽东的一时之想。

13、21世纪，仍张扬不停

说理不行，就来武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百日武斗，彻底暴露了蒯大富及其同伙人性中凶残的一面。

清华两派的武斗，召致了毛泽东的“7.28 召见”。

17年的牢狱，蒯大富好像没有领悟到什么。21世纪，我听说的情况和间接看到的情况是，他仍然顶着盗来的“蒯司令”头衔，沽名钓誉。他很喜欢与“名人”见面，且往往要合个影。他很喜欢与人共享自己的相册，回首当年“蒯司令”的“光辉”。据说，由此，蒯大富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痛斥。

好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昔日“造反司令”聚首深圳》。文章的作者叫安文江，文革初期，此人是上海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文章的“文摘”如下：

2005年2月28日，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安文江吗？我是蒯大富。”我又惊又喜，老蒯说，他来佛山谈业务，让我选个地方见面。

蒯大富，现在的年轻人多数不知其为何许人也，但“文革”过来人对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在那个癫狂的年代，他成了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在清华，在北京上演过好几出震撼全国的“造反”活剧，“炮轰”刘少奇、揪斗王光美、武斗工宣队等，都是蒯司令主唱的大戏。康生背后点火，江青当面煽风，张春桥、姚文元出谋划策，毛泽东深夜召见……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首都高校红卫兵成了多少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的主角。“四人帮”垮台后，在全国电视直播的公审中，蒯大富出庭作证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之后，他被判了刑坐牢发配西北劳教，直至刑满释放于十年前到深圳经商。

“文革”中，在复旦，在上海我也是“司令”级的红卫兵头头，也因此与蒯大富有多次接触。

老蒯来了。37年没见，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老了，发福了，当年的“小将”已年过花甲，61岁了……

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蒯大富”。我笑了，多有意思的转型啊！红卫兵司令——“四人帮”走卒—私营企业总经理。告别昨天的他，走上了与市场经济合拍的发财致富新路。老蒯说：“许多老红卫兵都读过你的《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感动于你真实地描绘了红卫兵的心灵轨迹，还红卫兵以历史真面目”。然而，我觉得老蒯的经历，他所有红卫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成为“文革博物馆”中不可或缺的一版，他可以也应该通过自我解剖以解剖“文革”，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沉默着。“五一”长假，我应老蒯之邀去深圳，迎接我的还有当年北京“四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北京航空学院的“司令”韩爱晶。他在深圳某国营企业当老总，已经退休了。他对反

思“文革”抱有很执着很清醒的认识，他不希望“文革”成为一笔糊涂账，所以，他说老蒯不必花心思赚钱了，应该做点更有价值的事。趁活着的时候，把“文革”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

37年后，“安司令”重逢“蒯司令”，不堪回首亦回首，为了民族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都可以且应该直面昨天走向明天。¹⁰¹

浮燥、短视的李自成、洪秀全打着为天下穷人谋福利的旗号，曾雄起于一时。几百、几十年来，文人们在不断研究他们失败的原因，一个满脑子封建的文人还写过一篇什么《祭》的文章，认为，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乃在于不愿意“缓称王”……可是，在我看来，“缓称王”和“急称王”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其非本质的区别之一是，“缓称王”更具有欺骗性；“缓称王”才是真正的“王”者。历史上，唯有“打天下，坐天下”思维的文人才有言论权、出版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成堆、成屋、成楼、成楼群的以赞颂盛世为前提的书堆中，能找到“反思”中国近、现代始终弱于列强的真正原因？！我当然不否认，在一些出版物的字里行间，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是，这种见识有谁能真正当真履践，力行？显然，“打天下，坐天下”的悲剧原因，并不是人人都能意会到的。

被长期“审查”、关押而“不堪回首”的“造反司令”们，在走出长长徒刑的噩梦后，仍然没有忘记“张扬”，至今还在作着“司令梦”。他们没有意会到，长于张扬，长于争权夺利，长于文斗和武斗，一门心思往权贵层中挤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这样的人，能“沉甸甸”地“回首文革”，“反思文革”，“直面昨天走向明天”吗？

未必！

近几年，张扬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许爱晶”为笔名，编造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书中写的事情，常常无时间，无地点，无背景，或真真假假，或胡拉八扯，胡乱编造、变造……他们仍然在张扬！

不明真相的人们，还以为《清华蒯大富》写的都是事实。

一个《记忆》¹⁰²文章的作者说：

“在两年多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蒯大富早已从理论上到实践中炼成了一个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在清华初期文革的全过程，蒯大富的说谎不计其数。”

第三章 “造反派”的分化

1、“穷革命”阶段的社会等级

¹⁰¹ 网文的作者叫安文江。载于《张家口电视报》，06/1/31《生活文摘报》。

¹⁰² 可能是161期《记忆》。

2、“地质东方红”的分化(待发表)

3、清华“造反派”的联合与分化(待发表)

4、北京大学的分化(待发表)

6、偏保的“北航红旗”没有分化

②“北航红旗”偏保的原因

据韩爱晶自己说，他是1966年10月4日才当上“北航红旗”第一把手的，“但决定重大事情都要召开大会、小会，全体战士会，凡事少数服从多数。”¹⁰³

北航红旗偏于保守，有两个原因：

- 1、领导班子由下而上的推选机制，造成被推选上去的人，往往棱角不分明；
- 2、协商一致的议事规程，一些该办的事，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难以形成决议。

这两个原因造成北航红旗的“策略性”、“偏保性”和投机性。

1、策略性

之一，“北航红旗”于1966年8月下旬起，一直是跟着“地质东方红”走的。但是，绝不“同流”。比如，“地质东方红”1966年8月23日“一进地质部”，才有了“8·24大辩论”。有此榜样，“北航红旗”随即于8月25日进军国防科委，要求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回北航作检查。

之二，9月23日，“地质东方红”查封“伪文革”，夺取广播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取得胜利。这一夺权局面的打开，也给“北航红旗”校立了榜样。此后，他们也在校内展开夺权斗争，并取得胜利。

2、偏保性

之一，导致它不听“地质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等“成立造反派红卫兵司令部”的游说，而一头扎进“二司”保皇派的怀抱。可能的情况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机制使它不愿意与“地质东方红”这类“少数派”为伍。

之二，导致它在大串联中支持的多为保守派组织，比如四川的“红成”、重大“8.15”。

据地院《动态报》第50期（1967年3月28日出版）记载，“地质东方红”曾经与北航驻渝联络站辩论重庆问题：

（1967年）3月26日，下午，在北航体育馆，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三司驻渝联络站及北航红旗“红岩纵队”与北航驻渝联络站辩论重庆问题：“革联会”是革命的“三结合”夺权，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辩论中，三司同学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非法的“革联会”是搞假夺权、三凑合，并控诉了“革联会”的法西斯暴行。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辩论不敢正视本质的东西，却大肆污蔑我三司战士“矛头指向解放军”，并为“革联会”的法西斯暴行叫好。

北航红旗“红岩纵队”要上去与他们辩论，他们就夺走话筒，使辩论大会无法进行下去。

3、投机性

¹⁰³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41页，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

之一，制造“红海洋”，是其一例¹⁰⁴：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突发奇想：倘若能把全国变成“红色的海洋”，岂不是“革命化”的又一战绩吗？

他们要再一次以别出心裁的举措震动全国……北航“红旗战斗队”总部下令给“红旗”驻各地的联络站，要求迅速地行动起来，开展“红海洋”活动。在各地群众和红卫兵组织还没有明白怎么一回事时，几天之内，北航“红旗”战斗队便在全国组织人力、物力将大街小巷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都涂上了红油漆，写上了各种“革命”的大标语相毛泽东语录……

由此，全国卷入了新一轮“革命”浪潮之中。

……几天以后，返回北京的朱红在大街上看到“北航红旗”的严正声明：声明大造“红海洋”的反，矛头直指走资派。朱红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了，怀疑他们的头头是不是发高烧说胡话呢。才几天的功夫啊，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再说，要骂“红海洋”，当初不干比什么不好呀，自己也不至于差点把小命扔在黄土高坡上。

上文中，“他们的头头”是不久前（10月4日）当了第一把手的韩爱晶等。该书接着写道：

又过了些日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下达。通知说：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壁涂成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动。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

之二，据戴维堤回忆：他去大连串联时说，因为错误判断，支持了保皇派，而致造反派受到军队镇压。回到学校后：

“韩爱晶等人早已收到了大连造反派的控告，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大连的情况如实相告，认为造反派不该反军，反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不应该支持。这时许多头头都指责我不该支保，不该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这有损于北航红旗的形象。有的红旗战士甚至贴大字报要开除我，说我是北航红旗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气。不料韩爱晶却说：‘戴维堤干了件大好事。我们的人在外都冲锋军区，反对驻军，中央首长天天骂我。戴维堤在大连支持解放军，了不起，帮了我的大忙，这是大好事。谁说我们北航红旗反军乱军？戴维堤是好样的。’”

之三，经过1966年9月份的“历练”和10月份的“进击”，参加二司的保皇派组织纷纷瓦解，消失。除“北航红旗”和“轻工红鹰”外，二司仅剩一个空壳。但是，北航红旗“宁当蛇头，不当龙尾”，它和“轻工红鹰”，又打出“二司造反联络站”的旗号。

之四，在中央批评了北京“天派”、“地派”之后，在北航的提议下，北航与地质立即就进行了“联合”。你看，韩爱晶跟中央部署有多紧！人家“提议”了，我们能不响应吗？

“联合”发生于1967年9月20日，只不过是作个响应中央号召的样子。1967年9月23日出版的《东方红报》对地质与北航的“大联合”进行了报导。报导写出来了，“大联合”也就“实现了”。

之五，“北航红旗”插手校外“夺权”是人所共知的。例如，据《大事记》：

¹⁰⁴见《红卫兵童话》一书。

1967年6月1日上午，“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二十多个单位，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举行了揪斗潘梓年大会。

潘梓年何许人也？还有，吴传启何许人也？这些人与“北航红旗”何干？学部的事情让学部的人自己去解决，外单位人为何要去插手？

这种事情较多，不再多说。

1966年10月初“三司”成为北京文化大革命主流派之后，为了团结大多数，我们在各种重大活动中，都特意邀请“北航红旗”参加三司的活动，并因为他们是客人，要尽可能提高他们的身价，无论是在会议发言的顺序上，还是在有关会议的报导中，我们总是把他们摆在“地质东方红”之前、之上，使“北航红旗”占尽了先机，出尽了风头。当时，许多不明真相的师生还以为“北航红旗”才是“三司”的核心呢！“北航红旗”也就在这种“器重”中，捞足了资本。

③韩爱晶是“选举”出的负责人

在朱成昭叱咤风云期间（1966年7月底—10月初），“北航红旗”在跟着“地质东方红”的屁股走。

据许爱晶写的《清华蒯大富》：“8月20日，我们对工作队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¹⁰⁵这就是说，“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成立，比“东方红战斗大队”晚12天；比“东方红公社”晚3天。在“地质东方红”一进地质部（8月23—24日）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北航红旗”才于8月25日，步着“地质东方红”的后尘，进军北航工作队的派出单位国防科委。这只能说明，“北航红旗”是跟着“地质东方红”走的，或者说，它是学着“地质东方红”干的。

偏于保守的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一些人，对“地质东方红”从来不服气，认为，“北航红旗”才是北京文革的“老大”。

据韩爱晶自己说，他是8月25日到国防科委“请愿”的那部分人的负责人之一，不在学校。直到9月下旬，他才和工作队负责人一起，回到学校。**1966年10月4日，通过选举，他才成为“北航红旗”的主要负责人¹⁰⁶。**

我想说的是，1966年7月底至8月下旬出现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是不畏风险“干”出来的。他们是最优秀的“少数”。因此，孙怒涛的《少数赞》，在当时很受青睐。

选举，实际就是“协商一致”。在当时情况下，“协商一致”出来的头头，至少，既代表着造反派，也代表着中间派。发展到后来，就明显带有“保”的色彩。

这些情况，“北航红旗”与四川的“红成”很一致。

¹⁰⁵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40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¹⁰⁶ 同上.

在韩爱晶“主政”（而不是“主导”）“北航红旗”时，文革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他的“主政”，实际就是个会议主持人的角色。由此，同朱成昭相比，韩爱晶能提到桌面上吗？韩爱晶主政（1966年10月4日）以后，正如朱成昭所说：北京航空学院对工作队，“就没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们学校里面黑帮也没斗过，这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而他们老是热衷于开这个大会，开那个大会”¹⁰⁷。他们还大搞“红海洋”、“揪、打彭德怀”等等。

④许爱晶的“编造”

21世纪，一个叫许爱晶的人（此人的真名，据四川的彭伟面告，叫韩爱晶）写了一本书，叫《清华蒯大富》。鉴于书中写的许多事，大部分是歪曲和编造，韩爱晶不得不隐去真名，改用笔名。

之一，其中写到，韩爱晶要“厘定”1966年10月6日由三司主持召开的大会，将这大会改由“北航红旗”和三司共同主持。

之二，书中还硬说，是韩爱晶让蒯大富在这个大会上宣读由“北航红旗”起草的“誓词”的。

之三……

这已经不是记忆错误，而是编造。

热衷于编造历史的人，你怎么评价他的人品？

⑤北航在揪斗彭德怀问题上的霸道

在揪斗彭德怀这类问题上，韩爱晶看得很重。在成都时，北航派去的人，因为在“坐飞机还是坐火车”问题上，与“地质东方红”发生意见分歧（为安全计，地质学院学生主张坐火车“押送”，北航学生坚持坐飞机“押送”），“揪彭”很快易手。1967年7、8月份，中央让地质学院与航空学院“联合批斗彭德怀”，韩爱晶及“北航红旗”背着地质学院，先是连续提审彭德怀，残暴殴打彭德怀，后是在北航操场，名义上联合批斗，实为独霸批斗大会。主席台上至少坐了十几个人，北航只给地院两张上主席台的票，其中一张还是给大会“发言者”的。

根据中央指示，此后，还应再开一次“联合批斗会”。可是，由于韩爱晶的霸道，双方达不成协议，“联合批斗会”没有开成。

7、分化的实质(待发表)

第四章 消灭造反派

毕业分配去了青海省地质局

大学毕业了。

1968年8月，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后，1967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已经结束，我被决定留校。

¹⁰⁷引自《朱成昭检查》。

工-军宣队于1968年8月进校，从我们手中“夺权”后，黑白颠倒，人鬼不分，使我对官场的险恶和黑暗更感到厌恶。1968年9月，已经留校的我和王大宾共同向地质部打报告，要求调离地质学院。

我选择了去青海省地质局。最后，落脚到位于青海省大柴旦的地质五队，彻底躲进了山沟。

1970年初，地质五队曾进行过“一打三反运动”。因为我对被打成贪污犯的食堂（只有几十个人吃饭）卖饭票的一个女同志鸣不平（一个卖饭菜票的人，怎么能成贪污犯？），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引起了地质五队领导人（王文达、韩忠民）的不满¹⁰⁸，从而招致了他们在接踵而来的“抓5.16运动”中，对我的惨酷打击。

制造“国会纵火案”

毛泽东一再强调“抓 5.16”不能“一风吹”

第一次文革的结果很不理想。走资派的拼命抵抗，使毛泽东退缩。他先是抛弃了“王、关、戚”，后是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对“造反派”实行镇压。他想以此妥协，换取他“坐天下”的同类对他搞文革的承认和理解。

1968 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具体领导全国“清查 5·16 运动”。

但是，“清查 5·16 运动”并没有立即在全国大规模开展起来。其原因是，打倒刘少奇的善后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作为文革先锋的大学生还没有分配完毕，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不理想，文革的战场还需要打扫。

刘少奇于 1969 年 11 月陨命开封之后，已无后顾之忧的毛泽东加快了“走狗烹”的步伐。

于是，毛泽东主导的“国会纵火案”终于出炉。

1970 年 1 月 24 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5. 16”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也在会上说，她三天没睡觉了，大声呼叫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也在会上摇旗呐喊。¹⁰⁹

周恩来也说：“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5.16”。

此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就此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5·16”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举办专案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场深挖“5·16”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

1970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此运动当时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很快就变了味，变成了在全国大规模地清查“5·16”的前奏。

1970 年 2 月 8 日和 3 月 27 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二. 八决定》和《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5·16’

¹⁰⁸请看我的原著。

¹⁰⁹高皋 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P292。

反革命集团，对清查‘5·16’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5·16’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谈到了打击“5·16”的原因。他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5·16’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毛泽东不能不知道，他在这里所说的“5·16兵团”，早在1967年就覆灭了。虽然有“左的”、“右的”两方面人的大力推动，但是，“抓5·16”仍然提不起底气来。即使捕风捉影，也总得有个影子！

没有影子，如何搞？

可是，整肃造反派，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他于1970年10月作出批示：“‘5·16’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动“抓5·16”，更进一步表明他是“有意为之”。

毛泽东的这次批示，成为我于1970年10月23日被“隔离审查”的导火索。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5·16’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联合专案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有组员13人。《决定》特别强调：在清查过程中“不要一风吹”。

又一次“不要一风吹”！

197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就此向全国发出通知。

从此，全国性的清查“5·16”运动便按照《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再加上规模与手法空前的文斗加武斗，终于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会纵火案”。

当毛泽东意识到文革被否定，他才想起了“造反派”，他才发出了“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哀号。可是，为时已晚，“造反派”早已被他和他的战友当作“5·16”打翻在地。这时，他只能哀叹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

周恩来暗暗高兴

“抓5·16运动”的开展，实质上加剧了中央上层大权的争夺。

毛泽东关于“抓5·16”的决定，正中周恩来的下怀。他不动声色，但是，他知道毛泽东整肃造反派的用意。他更知道，为打击造反派而发动的“清查5·16运动”，不仅非常顺适“走资派”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意，也非常符合周恩来的想法。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宰相”，周恩来是忍辱负重的，是委曲求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而毛泽东是秩序的破坏者。现在，毛泽东正在推动文革走上“秩序”的轨道，正好可以以“抓5·16”的名义，出出他心中的鸟气。在整治造反派上，他的杀气毕露。¹¹⁰

¹¹⁰【故纸堆】按：作为文革中一个最疯狂的整人运动，清查“五一六”之所以会打击、伤害那么多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恩来提出的“重罪行”而不重形式（是否填表参加组织）的清查方针。他在这篇讲话中就明确提出：“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这一方针的提出，为清查者滥打无辜大开了方便之门。

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1970.11.01

〔周恩来总理 11月 1日、9 日、18 日、20 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 1970 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 24 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 3月 27 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注：指中央文革小组）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走资派”和保皇派们，也终于等来了“秋后算账”的一天。刘少奇的倒台和死亡，意味着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轮权势之争——“窝里斗”的结束。在文革中-后期攫取了权势的新贵们（以军人居多），曾短暂失去权势的旧贵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窝里斗”。

林彪要借此讨好周恩来

这个时候的大政是，刘少奇陨落之后，在老迈的道路上走了若干年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也到了风烛残年。无论此前此后，无论公开还是暗地，人们都在谈论或思谋毛泽东之后的接班问题。

记得此前曾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政治流言”¹¹¹：1966年末，叶剑英在工人体育场接见部队院校的代表时，曾“告诉过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那大意是说，毛泽东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医生说可以活140~150岁；林彪的身体也非常非常健康，医生说可以活130岁。可是到了后来，有好事者给二人算了一笔账：林彪生于1907年，小毛泽东14岁。到2033~2043年毛泽东140~150岁时，林彪已到死亡或到垂死之年，如何接班？

但是，林彪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在中国无产阶级大神中，他是进步最快最成功的人之一。穷其进步的秘密有二：一，他将毛泽东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吓人的地位；二，这也就意味着，和其他人一样，他自己得屈身成为奴才！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注：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哲学研究》杂志代理主编，学部文革负责人），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红旗造反团负责人）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¹¹¹当时，那份传单我看到过。

在中央上层的派系之争中蛰伏多年的林彪，在中共“九大”上成了法定接班人后，他不仅深知“毛林同盟”的政治渊源，更知道“毛周同盟”的奥谛。“毛林同盟”只为打倒刘少奇而“盟”。刘少奇陨灭之后，同盟建立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林彪之成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完全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事实上，毛泽东对林彪自始至终都有防备，文革中，林彪一直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实际控制之下。他身为接班人，“太子”，当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他身为军委副主席，身为国防部长，却以副总理的身份，屈身在总理周恩来之下。文革中，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江青和其他“中央首长”讲过，军队不能随便调动，即使调动一个连，“必须得有总理的签字”。

对此，聪明一世的林彪当然明白个中的奥秘。这个时候，他的视力得变得模糊，他得韬光养晦，把一切都寄托在接班之后。可是，实权没有，虚权总得给点吧？能不能像刘少奇生前那样，在党内是“副主席”，在国家职务上也担任“国家主席”？

权衡轻重，林彪一定认为，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惟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包括林彪在内谁都可以想得到，甘居相位的周恩来早已位极人臣，不可能以封官许愿的办法讨好之。取得周恩来支持的最大交换条件就是向反对周恩来的人开炮。

不管“抓 5·16 运动”的结果如何，我林彪是一贯紧跟你毛泽东的；不管这场运动的结果如何，我林彪都是站在你周恩来一边的，为你申张正义！

于是，林彪赤膊上阵，要“大抓 5·16”。

江青、张春桥等要接周恩来的班

对于周恩来之后的“周恩来”，似乎历史地落在了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这一边。

无论在林彪死前死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最有资格问鼎总理的人选是张春桥。

三十多年来形成的舆论定势是，“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并取而代之。

我的看法是，否！

文革期间及文革后几十年，“反对周恩来”之类的调门时而高时而低，“打倒周恩来”之类的言论和行动时而真时而假，却总是不绝于耳。1970 年开始的、没有终期的“清查 5·16 运动”正是以“反对周恩来”、“打倒周恩来”为主要罪名，对造反派进行清算和打击的。可是，在几十年铺天盖地的控诉文革的文章中，从来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谈及“四人帮”与周恩来在“清查 5·16”问题上有什么分歧，搞过什么勾心斗角。

“四人帮”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只能放在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大前提下加以探讨。事实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与“四人帮”，从来都不是政治对手。在文革的大局上，他们从来都是“同谋”、“共犯”。

根本的问题是，周恩来不是毛泽东，不是刘少奇，从来都不居于皇帝和儿皇帝的地位，因此，他从来都不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成为毛泽东要着力打击的对象。

张春桥或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人，对总理职位有觊觎之心，这一点不容怀疑。但是，他们采取的方针不是“取而代之”，而是“等而待之”。我的理由是：

1、周恩来 20 多年的总理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2、1967年，周恩来是“中央碰头会”的召集人，位在毛、林之下，中央文革小组之上。中国的政治经济民生大事，是要周恩来去主持和完成的，“四人帮”自知，他们不具备这种资历和条件。

3、早在1972年5月，就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癌症，他的生命已来日不多¹¹²。对此，“四人帮”是心知肚明的。况且，已经是副总理的张春桥距总理之位仅一步之遥。但是，要跨过这一步，周恩来生前的首肯也很重要。为了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们就得有取悦于周恩来的行动。¹¹³

¹¹²况且，周恩来癌症病情很快恶化，1973年每日便血，有时多达上百毫升。从1974年4月底开始，病情进一步恶化，曾四次缺氧，不得不于6月1日入院作手术。据说，周恩来共做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¹¹²。1975年10月中旬之后，他只能整天静静躺在病榻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1975年12月6日，周恩来接受最后一次手术后，体质更加虚弱，中旬后完全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癌症产生的剧痛不时造成晕厥。月底，病情进一步恶化，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心脏停止跳动。

¹¹³按：文革中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一祸及千万人的大冤案，十分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法无天和草菅人命。仅仅其中一个谁是“五一六后台”的问题，他们就可以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讲，翻云覆雨，随意构陷。

周恩来1969年6月28日接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中说：

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周恩来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次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1969.06.28）

江青1969年8月14日接见文艺口同志谈话中说：

“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发〔1970〕20号）中称：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

《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几次谈话（摘录）》中，1970年11月4日的讲话里说：

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傅。

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中批判陈伯达说：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中共中央转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概要〕，1971.01.26）

1971年6月30日中央专案小组联合办公室陈伟在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中说：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看，“五一六”上层成员情况多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班底。他们的勾结由来已久。

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1972.07.01）中说：

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1972.07.02；中发〔1972〕25号）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一九八〇年九月二日）中说：

在追查所谓“五一六”后台时，谢富治宣称，“五一六”的黑后台“是刘、邓留下来的，军队就是杨（成武）、肖（华）、还有叶（剑英）、徐（向前）”。一九六八年二月，赵登程和“五一六”专案组长陈伟，按照谢富治的这一授意，在绘制的《反革命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组织系统图》后台栏里，填写上了“叶、徐、杨、肖”。（《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1980.10.16）

以上资料均摘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同时，通过大抓“5·16”，对造反派加以坚决镇压，还可取悦于昔日的走资派。从而，在未来的权力之争中，有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或默许。

“清查5·16运动”的实践表明，“四人帮”早已沦为打杀造反派的政治恶棍！

“保皇派”要立新功

文革初期的保皇派，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洪流中被淹没。但是，就中国的政体说来，就文革的改良本质说来，他们的宝并没有押错。他们只是隐忍于一时。况且，曾经倍受磨难的善良的造反派在被肯定的时期和在当权的时期，对他们大都“既往不究”，他们并没有失去一根毫发。至今四十多年间，在控诉“校园文革”的文学作品中，极少听说保皇派干将因镇压造反派而像“抓5·16”一样，受到隔离审查。更没有听说被关押，被打成“反革命”！但是，当造反派被当作“5·16”扔进炉火中时，保皇派中的一部分人却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春天。他们以“一贯正确”的面目出现，公开自己的“保皇派”身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那时是保皇派！”），打起“秋后算账”的大旗，向已经关进或即将关进隔离室或囚室的造反派们杀来。

在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前将洪全打成“反动学生”，文革初期将地质系一、二年级许多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政治辅导员陈安民等，这时，跳出来，成为好汉。他们先为军宣队政委牛润虎出谋划策，后为接替牛润虎的李庆芳“指挥长”鞍前马后奔走，将他们逼供出来的“5·16口供”传布到全国各地。凡是有北京地质学院“老五届”毕业生的地方和单位，都能接到军宣队和陈安民等寄来的黑材料。不仅如此，与北京地质学院联系较多的外校学生也很受陈安民等的“关心”，他也不会忘记给这些人所在的单位寄送“5·16”材料。

陈安民当然忘不了我。他“关心和爱护”我的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但是，从韩忠民、石俊清及其他人对我的“期待”中，从他们逼供的内容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他们急切地希望能撬开我的嘴，通过我的揭发和交代，在地质学院和全国抓出更多的“5·16分子”。

第五章 朱成昭是文革第一英雄

朱成昭是文革第一英雄

1、北京“五大院校”的文革进展

文革阶段	工作队“反干扰”	讨伐工作队	分化与大联合	成立革委会	复课闹革命	整党建党	清理阶级队伍
------	----------	-------	--------	-------	-------	------	--------

地质学院 负责人：朱成昭、王大宾	++	++	++	++	++	++	++
航空学院 负责人：石兴国、韩爱晶	++	++	++	++	++	++	++
北京大学 负责人：聂元梓	++	+					
清华大学 负责人：唐伟、蒯大富	++	++	+				
师范大学 谭厚兰	++	++	++	++	++	++	++

北京“五大院校”文革进展阶段不同(见下表)。

北京大学最落后，连批判工作队都没有完成。

清华大学的运动只进行到分化阶段，没有实现大联合，因此，也难以成立革委会。

五大院校的上述情况，主要与各校负责人的人品和作为有关。

2、英雄年谱

1966.6.~10.6.,朱成昭和“五大领袖”的“年谱”。

1966.6~10.文革英雄年谱

时间	6.1.20: 00 以 后	6.3.-7.26.	7.27.	8.初	8.8.	8.17.	8.23. ~ 24.	8.25.	9.5.	9.6.	9.23.	9.24.	10.4.	10.6.
聂 元 梓	成为御封英 雄	成为工作队 大员			工作队移权给以聂元梓为主任的“校文革”，实为保皇派									
朱 成 昭	遭受院党委及工作队镇压	给工作队 贴大字报	工作队移 权“伪文 革”	“东方红 战斗	“东方红 公社”成 立	“一进地 质部”批 露反路线		“二进地 质部”揪 工作队	组建并参 加“三司”	校 内 夺 权，打 垮 保皇派			周 总 理 等 出席 10 万 人“批资” 大会	
蒯 大 富	遭受校党委及工作队镇压		工作队移 权“伪临 筹”	(在此期间，蒯大富“无人问津”)						以蒯大富 为首的“ 井冈山红 卫兵”成 立				

韩爱晶	遭受院党委及工作队镇压		工作队移权保皇派			8.20.“北航红旗”成立	进军国防科委揪工作组	参加保皇司令部“二司”	(在此前和此期，韩爱晶是30多人的总部成员之一)	韩爱晶被“选举”为第一把手	
谭厚兰	遭受校党委及工作队镇压		工作队移权保皇派			8.23.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成立	8.27. 参加“一司”				
王大宾											1967.3.5.取代朱成昭

由本“年谱”可以看出：

聂元梓在1966年6月以后，是“保”字号英雄；

蒯大富，造反派，直到1966年9月下旬，才在周总理及中央的支持下，才在朱成昭、“三司”及“地质东方红”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有二三十个人参加的“井冈山红卫兵”；

韩爱晶，文革初期，只是一般成员。1966年10月4日，通过选举，才成为“北航红旗”的第一把手；

谭厚兰，1966年8月23日，带头成立“师大井冈山”；后来，受中央文革指派，去山东曲阜造反。造反业绩一般。

3、没有毛泽东支持，“五大领袖”什么都不是

北京文革运动“五大领袖”，还有排在“五大领袖”之前的朱成昭，都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下，才从地下爬起，才出了名的。

聂元梓，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她只能成为彭真、陆平的刀下鬼。

聂元梓、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没有毛泽东在1967年2月中旬“出乎预料”的任命，怎能成为“五大领袖”？“五大领袖”，说穿了，不过是毛泽东手中的玩物。叫你光荣，你就光荣着；让你成“5.16”，你就得被关起来；毛泽东死了，文革被“彻底否定”了，你们也就成了阶下囚。

蒯大富啊，有什么值得张狂呢？

4、我在文革中的主要经历

时间	朱成昭	聂树人	蒯大富	韩爱晶	文革阶段
7月27日	第一张大字报（凌晨）	第一张大字报（午后）			
8月8日	东方红战斗大队				批判资
8月17日	东方红公社				
8月23日	一进地部				

8月下旬		三司筹建			反路线 向夺权和斗批改方向发展
9月5日	二进地质部	起草宣言			
9月6日		三言成立，任宣传部长			
9月初		创办《首都红卫兵》报，任主编			
9月23日	校内夺权		9月24日，任“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		
11月		任三司核心组负责人		10月4日，被选举为负责人	
12月17日		主持周总理及中央首长参加的10万人大会		12月，任“清华井冈山”负责人	
2月4日	检查，下台	红代会成立，任宣传组长			
2月22日					
3月5日	王大宾上台				
4月5日	革委会成立 任常委				
10月	任副主任				

5、朱成昭才是文革第一英雄

朱成昭的造反历程

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东方红”在朱成昭的带领下，一直走在文革队伍的前列，是北京文革的领头羊。

1966年7月18日之前的文革局面，属于刘、邓——“既得利益集团”控制、镇压的局面。

文革的转折发生在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公开的转折，则发生在1966年7月26日晚，发生在北大操场上的“大辩论”会上。

可是，1966年7月26日晚，在北大操场的“辩论会”之后，聂元梓在哪儿？蒯大富在哪儿？韩爱晶在哪儿？没有见他们的影儿。只有朱成昭等回到地质学院，于7月27日凌晨写出了向工作队开炮的大字报。此后，

——8月8日，“东方红战斗大队”成立；

——8月17日“东方红公社”成立。

——8月23日，朱成昭率领“地质东方红”进军地质部（一进地质部），向工作队的派出者“请愿”，要求工作队给自己平反。这一“反潮流”行动，震动北京和全国——自1949年以来，还没有如此众多的人（1000多人）敢于到国家部委级机关去“请愿”，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经过绝食斗争，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等被迫同意到地质学院听取意见。

——8月24日晚，在地质学院大操场，进行了震动北京、震动全国的大辩论。大辩论以“地质东方红”的“道义胜利”而告终。

——9月5日，“地质东方红”二次进军地质部，要求地质部党组和工作队给自己平反；

——9月6日，在“地质东方红”不能参加“一司”，又不愿意参加“二司”（保皇派）的情况下，朱成昭主导的“地质东方红”总部于8月下旬决策，成立“东方红公社”外联组，任命周永璋为外联组组长，由周永璋负责串联，于9月6日成立了平民的“三司”；

——9月23日，“地质东方红”进行了学院广播台夺权和校内夺权。由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夺权成功。此举掀起了北京高校夺权斗争的风潮。

——9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工人体育馆单独接见三司全体战士，初步表明中央支持三司的态度。

——10月6日，由三司主持，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掀起了批判工作队错误路线的高潮。周总理及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对大会表示强烈支持。文革运动从此进入新阶段。

从此，造反派才站立了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从北京燃向全国(10-12月)。

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生死大搏斗的时期。10月之前，是文革要不要搞的时期，是文革“依靠力量”（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时期。10月之后，是文革如何搞的时期，是文革依靠力量发展壮大的时期。

同10月之前相比，10月之后的文革之路，已经是“一马平川”。

北京地质学院是北京文革运动中心的最有力的依据是：

1、毛泽东女儿的具体介入；

2、“地质东方红”一进、二进地质部及9月下旬的夺权斗争；

3、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在关键时候的及时支持；
4、一直被视为二、三流院校的北京地质学院，从1966年10月起至1968年，成为与清华、北大、师大、北航并列的五大院校：它的旗帜与其他四个院校一并飘扬；在中央媒体的宣传上，也与清华、北大平齐；“地质东方红”的代表王大宾被称为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之一。显然，如果北京地质学院没有做出比清华、北大更多、更突出的贡献，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2000年以来的文革研究者，多数人无视这一事实，将“派斗、武斗祸首”聂元梓、蒯大富吹上了天，以为他们才是北京文革的群体主将，实在是大错特错。

朱成昭及“地质东方红”的夺权理念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都曾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在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夺权中，大显过身手。聂元梓、蒯大富等为着个人的名利地位，不顾本单位四分五裂的烂摊子，挟着一屁股屎，却“跑着”去外单位夺权、抢权。仅聂元梓等，一个晚上就“抢”了十个部的权！

在他们看来，抢的权越多（即公章抢的越多），自己的功劳就越大，谈判的筹码就越多，自己的地位就越高。与之相比，朱成昭和“地质东方红”就显得“土气”多了。除“地质东方红”的名称不时出现在一些单位的“夺权名单”中外，它并没有任何夺权行动，连地质部的权也无意于夺取。“地质东方红”的夺权理念很简单：

- 1、实现了本单位的大联合后，才谈得上夺权；
- 2、要由本单位群众自己去夺权。

聂、蒯夺权闹剧的“热闹”与朱成昭和“地质东方红”对夺权的淡静和不屑，显示的差别不是“一星半点”。 “地质东方红”这一夺权理念的形成，可能也与学业定位有关。清华、北大学生（可能，不是全部）的未来“定位”是国家机关（当官），是科研单位，而地质学院学生的未来定位是山野。因此，清华、北大学生，如蒯大富，就很注重自己的出身（为此，不愿意认亲生父亲），就很注重“权经”。他们追寻和发挥的是“权欲”，是如何“驾驭”人；驾驭不了就消灭！因此，文革运动中的武斗，并不发生在地质学院。

朱成昭的自律

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还说，蒯大富的“个人影响比朱成昭大”¹¹⁴。根据何在？文革之初，造反派都受到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队的镇压，这一点，蒯大富与朱成昭处于同一等级。只不过蒯大富的“对手”是王光美，朱成昭的“对手”是邹家尤。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婆，妻以夫贵，她的“对手”蒯大富也就“贵”起来了。而邹家尤虽为副部级干部，官可能比王光美大一点，只因“背后”没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因此，邹家尤的对手也就“贵”不起来。但是，以政治对手的“贵”而贵，只是个表面现象，而且，那是“不

¹¹⁴ 许爱晶. 清华蒯大富. 第136页.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1.

自觉”的，被迫的。真正的“贵”，在于自己怎么干。从7月27日至9月底，朱成昭就干出了样子。不仅“地质东方红”干得有声有色，还伸出手来，拉了蒯大富几把。

依据这些事实，能得出蒯大富的“个人影响比朱成昭大”的判断吗？

朱成昭与蒯大富的最大区别在于，朱成昭的“人格”比蒯大富高大，因此，能拉得起队伍；在“打倒刘少奇”、夺权等重大问题上，不贪求个人权势地位，有独立思考精神，即，对中央上层的指示，有自己的看法，有保留，有“自律”，不胡来。而蒯大富不仅人格低下，在“小人得志”之后，即个人膨胀，“老子天下第一”，干出了许多“痞子”性质的事情。

许爱晶是否明白，毛泽东的“7.28召见”，就因蒯大富的“痞子”而起？

朱成昭与聂、蒯、韩是“不同文革阶段”的人物

21世纪中国的大多数人，一谈起文革，首先就想起了聂元梓、蒯大富，似乎文革是他们搞起来的。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文革。

这是离事实很远很远的错误观念。

朱成昭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是“不同文革阶段”的人物。聂元梓到了文革正式开始，已经穿上了“黄马褂”，已经成了文革的对立面；朱成昭是在“文革要不要搞”的阶段，叱咤风云的；蒯大富、韩爱晶，则是在“文革怎么搞”的阶段才逐渐“出名”的。因此，他们没有“横向”对比性。

在怎么搞的阶段，蒯、韩，还包括聂元梓，搞的大都是“极左”活动，即“痞子活动”，或沽名钓誉的“出风头”活动。

与朱成昭相比，谭厚兰也只是“平常头头”一个。

4、朱成昭的“八大观点”

朱成昭检查（全文）

1966年10-12月，当“东方红”在地质学院一统天下之后，朱成昭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

这种思考是点滴积累的，且有个过程。有时，朱成昭也会将自己的思考说出来，同他的战友探讨或交流。

不过，他的战友中，可能有“异类”，或者有“不经易”的泄露者。很快，他的思考被他的“冤家对头”蔡新平等知道了，就被上纲为“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详见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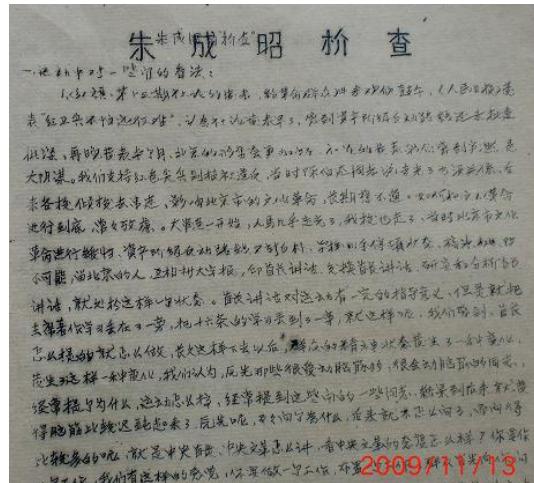
“反对中央文革”，这在当时，是一种足可坐牢的大罪。

由于蔡新平等人的“二团”大肆炒作，还给中央文革写告密信，从而招致了陈伯达对朱成昭的警告。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不得不于2月4日，以检查的名义，将自己的观点全盘端了出来。¹¹⁵

¹¹⁵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370—383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

现在，我将《朱成昭检查》的全文登载如下。资料来源：1967年2月4日《朱成昭检查》的录音，由当时“红教联”的一个战斗队录音并整理。原件保存和提供：宫保军。宫宝军是地质系一年级学生，是《朱成昭检查》大会的主持者。

朱成昭检查



《朱成昭检查》录音稿的复印件（开头部分片断）

一、运动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1、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给革命群众带来欢欣鼓舞，《人民日报》发表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认为社论发表早了，感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未批透批深，再晚发表半个月，北京的形势会更加好。社论的发表我们感到突然，是大阴谋。我们支持红色尖兵到报社造反，当陈伯达同志说走光了也没关系，后来各校倾校去串联，影响北京市的文化革命，长期想不通。如何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常常考虑。大串联一开始，人马几乎走光了，我校也走了，当时北京市文化革命进行缓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新反扑，学校几乎停顿状态，搞斗、批、改不可能，留北京的人，互相抄大字报，印首长讲话，研究和分析首长讲话，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首长讲话对运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就把主席著作学习丢在了一旁，把十六条学习丢在了一旁。就这样呢，我们感到，首长怎么提的就怎么做，长久这样下去以后，群众的精神状态发生了一种变化，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我们认为，原先那些很爱动脑筋的，很会动脑筋的同志，经常提个为什么，运动怎么搞，经常提到这问题的一些同志，结果到后来就变得脑筋比较迟钝起来了，原先呢，事事问个为什么，后来就不怎么问了，而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中央首长怎么讲，看中央文革的态度怎么样？你要作一个工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你要做一个工作，布置一个工作，群众首先向你问的，往往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文革同意不同意这样做？你要是讲这次工作中央文革不知道，那要布置下去呀，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一阶段，在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当中，逐渐产生了奴隶主义思想，不爱动脑筋的思想，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就很难发挥。因此，那一阶段普遍出现了群众感到没有事可作，要等待总部的布置，而自己就很少主动地去找工作，主动去寻找事情去做。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革命的创造性就发挥的很不够，等着总部的通知，等着总部的布置。总部呢，也等着中央文革布置。一层层下来，有很多同志不愿在北京干，东方

红的一部分同志都不愿在北京干，希望到外地去，有刚从外地回来，看到学校里边没什么工作或没什么事，也就跑到外地去了。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在我们思想当中，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我们东方红中间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10月份时候，我们公开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了一个社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当时，我们还打算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学校的一切权力，并且对我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做了一个布局，想夺权，夺权以后怎么做，我们都做了一个初步安排。当时，我们的想法提交中央文革后，接着东方红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以后，中央文革同志把我们找去了，找去了批评了我们，批评里有那个方面，一个是我们那阶段作法有些过火，比如，抄红卫兵的家¹¹⁶，有些过火，因为我们抄红卫兵家过火，就这点批评是正确的，第二点，就因为我们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种提法不好，不策略，另外，说我们要接管学校一切政权，这样包袱太重，并且，最后说：你们以后要提什么口号，提出什么东西，要先给中央文革商量好，因为你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一个组织，一面红旗，让你们提出口号就对整个运动有所影响，就在这种形势下，在以后，我们在作工作当中就感到有所压力，我们感到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工作上头犯了错误，而影响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呢，在后来一个阶段，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中央文革，让文革小组点头我们才去做。所以，从我们来说，从我们总部几个人来说，依赖性上也是大增强了。而自己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想办法和我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实际上，在我们思想上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奴隶主义思想。

2、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揪出刘邓路线的执行者和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的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掉刘邓路线的根子，这点是本质的根本的东西。因此，在怎么样批判刘邓路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感到应该两个方面，一方面召开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召开的，但是呢，这样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不应过多，当时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这个十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排得很满，工人体育场一排排上了半个月以后，都满了。我们认为这个大会开多了没有什么好处。开这种大会，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每个筹备这样的大会的人，是很紧张的，忙得要死。而参加大会的人呢？这些群众大部分的都闲着，处于很空闲地位。他们参加这个大会听听发言，呼呼口号，有的呢，为了去看看首长，有的是为了去看看黑帮，这样大会对广大群众教育意义并不十分大的。我们认为这种大会是造声势的一种方式，是批判刘邓路线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不是重要的方式，应该是次要的方式，而主要的方式，应该是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扫它的社会基础，这是主要的。这个社会基础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各个基层一些刘邓路线的追随者，一些顽固的坚持者，要揪出这样一些人物，和他们进行斗争，进行批判。但是，当时在北京市的各个学校，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比如北航红旗，他们的工作队就没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们学校里面黑帮也没斗过，这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而他们老是热衷于开这个大会，开那个大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挖掉我们每个人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而这一点应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当时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往前推进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工人运动，革命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当时提倡大批下工厂、下农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另外我们当时发现了工厂形势很紧张，斗争很激烈，需要革命知识分子打先锋，可是，我们发现了在知识分子里边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倾向，就感到必须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比较坚持这个方法，就是大批的下工厂下农村，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挖掉刘邓路线，挖掉修正主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子，才能把我们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在批判刘邓路线上我们的看法。

3、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在红旗13期社论发表以后，揪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一个黑帮分子，揪出一个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比红旗13期社论发表以前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红旗13期社论的发表说明了以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揪这些人比较轻松，大家觉悟都高了，比较轻松，比较容易察觉，保守派力量小了，这是

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感到中央文革小组过早地定了调子，对某些人物过早地定了调调，有些人刚刚被揪，刚刚出现了几张大标语，要揪他出来，而另一派正是处在死保的时候，两派一个是保一个是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让群众在斗争中分辨那一方面是正确的，那一方面是错误的。应该让群众充分辩论透，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到底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中央文革这样太早的下结论，中央文革一点名，说这个是，那大家都去揪，而大家马上都倒过去了，都要去揪他了，而中央文革说不是，那么大家都不去揪他了，这样的话，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比较小。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咱们揪出何长工揪出邹花了多大的斗争代价，多少人流汗流血，甚至有个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我们很多参加过斗争的同志都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深深体会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群众有好处，使我们在斗争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在 13 期社论发表以后，这个形势就基本上没有，而是一揪基本上一揪，中央文革就说，这个人是或者不是，是么，大家就一起来斗，不是大家就放掉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过早地定了调调，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后来呢，有作法，有人，那基本上群众就没揪，文革小组就点名点出来了，这样更加不利于教育群众。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达到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使群众在斗争当中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要群众真正来掌握毛泽东思想，要毛泽东思想在我们每个人头脑里扎下根子，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要这样将来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有人能起来造反，中国就不会改变颜色，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目的，假如这一点达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揪出那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刘邓路线的推行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部分，比较本质的一部分就是我前边说的东西，而我们认为文革小组在那阶段的作法是偏重于把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把刘邓路线的推行者和顽固执行者揪出来，而对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让群众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支鉴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让群众通过斗争来掌握马列主义，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真正在群众的头脑中扎下根子，彻底挖掉每一个人头脑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文革小组注意的不够，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注意不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所以在以后揪一些人中出现了一些很被动的局面，今天文革说保的，过了一天又说把他揪出来了，造成了很多被动场面，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在去年 12 月份刮起了一股黑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黑风，这股黑风当时留在北京的人大家都知道，都能回忆得起来。这场风，这股黑风的来势是相当猛烈的。关于揪和保的问题，同志们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周荣鑫的问题，基本上群众没有揪，直接是点了名，然后大家一起抓出来去斗的；关于肖华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多被动，陶铸的问题也出现争执，开始有些单位揪，总理又保，保了以后，大家又都不揪了，后来文革又点了名。大家又一起去揪把他揪出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何必去保，我记得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报告，在报告里讲了这样一句话，（老农妇）有个农村的老太太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是马列主义者，你还要保什么呢？我感到这句话讲的很有道理，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去年 12 月份就刮起了这股黑风，在反击这股黑风过程当中，有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根据 16 条（我说这些看法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想法）的规定，凡是杀人、放毒、放火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这种人要加以逮捕法办，对这种人必须逮捕法办，非如此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当时对于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这样的一些人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中间有人讲问题）是弊大于利，好处少，坏处多。我们当时是这样的看法。比如说，李洪山的问题，我们认为李洪山是现行反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认为像李洪山，不要把李送到监狱去，要把李洪山放在群众当中，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当个反面教员，这样就教育了群众，将有很大好处。相反，当时李洪山在学校斗争了一次以后，就送到公安部，在公安部以后基本上没有人再把他弄回来斗争他，所以，李洪山的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并没有批倒批臭。这样是不利于教育广大群众的。对于谭立夫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主席也说过一个学校出几个蒋介石分子没关系嘛，做反面教员嘛！何必先把他抓起来，可以摆在身边，也可以跟他辩论，叫他摆摆蒋介石到底有什么好处，蒋介石到底怎么好，把他批倒批臭，这个好嘛！另外，对科大雄狮问题，科技大学雄狮战斗队的文章不知同志们看过没有，他在那里边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也确实他的立场是站错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但是，对科大雄狮这些头头是抓了好还是不好？我们认为还是不抓好，因为他们反革命理论在科技大学并没有被批判，相反还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看法。另外像对待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方面，哈军工造反团是全国有名的左派队伍，他们几个头头给中央文革贴了两张大字报，后来两个头头被抓起来了，送到监狱去了。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也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认为这种作法压制了群众，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方式不对，应该

批评的，但是抓到监狱去，对群众当中发表不同意见是没有妨碍的，实际上他们这种思想，哈军工写了大字报的思想，在很多左派队伍中有所反映，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感到文革小组在一定的程度上或者说各更准确一些就是在运动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压制群众的现象。文革小组呢？在这个问题上作法我们是有不同看法，因为我们认为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方面文革小组没有能够坚决的贯彻以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当时的观点。

4、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在去年10月中旬和11月初的时候，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当时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逐步实现全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而且第一步就是统一三个司令部，把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首先在学生中联合起来，本着这个想法，我们就和北航红旗、政法公社、建工八一团等三个司令部的一些学校，一些左派队伍建立了一个联络站，在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想以此逐步统一三个司令部。但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同志知道这事以后，批评了我们，当时关说：你们那样做会把三司挤垮，这样，就会影响到中央文革，我们不希望三司垮，我们不希望你们垮，你们也不需要我们垮，要是革命搞不好的话，不仅是你们要打成反革命，我们也要被打成反革命。当时，他很严肃，这个造反联络站我们搞了一半就没搞下去，后来就散伙了，而在三司里面有学校，在三司一部分组织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当时就给我加上了分裂主义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想不通的，实际当时的三司，13期社论发表以后，经过一个很快的大发展，由于组织发展工作上面的问题，不严密，由于原来的二十几个学校一下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实际上三司里边也有组织已经不是革命派的组织，混进来的，当时必须重新整顿左派队伍，重新纠集左派队员，重新组织左派队伍，当时我们对这一作法我们是想不通的，说过关锋同志在处理三司这个问题上面，在对待三司这个问题上面采取了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关于这次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我们讨论过它的深远意义，我们完全赞成大联合大夺权，当时在一些具体作法上面，我们是有一定的看法：第一关于大夺权，大夺权必须有大联合作为前提，否则很多政权将被保皇派保守派夺权，同时还可能引起革命派队伍内的互相冲突，这样来搞乱革命派的阵营。第二个问题，大夺权必须利用和依靠那些好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打倒。当时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凡是当权派都要打倒，在夺权过程中，我们认为黑帮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犯有路线性错误这里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已认识到错误的人要加以区别，不应该一样夺他们的权，在夺权中也不应该出现一些戴高帽子呀！游街呀，挂黑牌子呀，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当时是有意见的。第三个问题是北京的大联合不能一哈而成，必须有个过程，为什么道理呢？有这样几个原因：1、因联合的主体以工人、农民，而这个主体在北京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有他的先天不足性，这个先天不足性一方面北京市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就是比较差，北京的产业工人很少，2、由于北京长期以来受了彭真黑帮的统治，受压迫、受压制得很厉害，一般的运动有多次的反复，所以工人一定不敢说话，所以北京市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起来比较晚的，而北京市的工人运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北京的工人运动，他的几个总部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有工人造反总部，还有个造反联络站。这几个总部是怎么成立的呢？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这一批人搞总部的这一批人在工人运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他们最先跳了出来，这些人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人，另外一批人有些人确确实实是彭真黑帮的小爪牙，被打成反革命的，而这些人呢？他们趁着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站了出来，而跳了起来，跳起来以后，他们首先就弄了一个大印，什么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或者革命造反总部，搞一个大印，然后呢，到市委、总工会或到市里去要它几间房子，就打起了招牌。然后，他们分头到各个工厂去发展他们的实力，招兵买马，也不管那些工人是什么态度，反正他们下去就发展实力，招兵买马。这样使北京市工人运动大联合本身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致命的弱点。所以，北京市全市性的大联合要是以工人为主体的话，是必要抛开几个工人总部，从基层做起。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另外，北京农民运动起来是比较缓慢的，也有个别的几个地方起来了。第三，北京市的学生运动由于出去串联的时间比较长，北京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方面工作是比较差的。现在学生运动当中出现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弱点，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些现象就比较严重，所以北京市的联合有一定困难的。第四个就是北京市没有像上海和其他地方那样，经过了一个全市的大搏斗，北京没有，你比如说，上海有两派势力，就是一派要攻市委，一派要保市委，在这个斗争过程自然形成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和保守派的大联合，在斗争中本身就形成了这样的联合，其他城市也有这种情况，攻击这个省委或攻击这个市委，一个保这个省委，一个保这个市委，自然而然形成了两派力量的大联合。在北京没有这个斗争，没有这个全市性的大搏斗，也没有一个全市性的共同目标。所以，北京市的大联合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这个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联合过程中，决不能搞合二而一，决不能搞调和主义，折衷主义和抹稀泥。这就是我们当时对大联合的态度和大夺权的态度。

5、第五个问题，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北京中学生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初期起到一个闯将的作用，尤其在破四旧当中的的确确是一个闯将，但是，后来北京市的中学运动冷落下去了呢？为什么这些小闯将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联动的成员呢？而其中有些很著名的闯将为什么进了监狱呢？这个问题我是考虑了一番，我经过了一些调查研究，跟一些中学生，很多类型的中学生进行了一些接触，我们认为在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关于对联问题，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对联问题，这就是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关键问题，一个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这一点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这个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就好，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没有解决好，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处理好，这是矛盾的焦点。我们认为这个对联在初期出现的时候，是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尤其对北京这具体地点来说，北京长期在彭真修正主义统治下，他搞了一套资产阶级路线，修正主义阶级路线，歪曲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的强调重在表现。所以，当时中学里出现这副对联，在初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就可横扫一下这条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这个初期就必须大讲阶级分析、阶级出身，非如此就不足以打倒修正主义阶级路线，非如此，就不能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所以这一段是需要的，但是这一段不能太长，到了一定时期就必须扭转，必须指出这副对联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初期对这个对联的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在此以后，对中学生，从中央文革小组来看，对中学生的引导教育是不够的，尤其在这个对联问题上，因而对联就逐渐被敌人利用，这就是被西纠发展成了反动的血统论，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待中学生这部分力量不是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忽略了作思想工作和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后来对联动的态度尤其这样。这里可以举例子，例如清华井冈山抄人大附中红卫兵时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知道不大确切），据说把小孩赶到楼上去了，赶到楼顶上，一层层追，追到楼顶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小孩被打的只剩下六七个了，在楼顶上他们升起了国旗，用瓦片砖头打下来，一面高唱国际歌。另外，在抄石油附中红卫兵家时，红卫兵他们打打，退到地下室里边，他们就把地下室里边放了水，说：“你们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就继续放水！”还有用灭火机向小孩脸上喷，说：“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再喷！”这办法，我们认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原来西纠是采取这个办法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办法又对付他们。这些小孩嘛！才十几岁嘛！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嘛！在这些群众组织对这些小孩、中学生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所以有小孩，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第一个红卫兵嘛，毛主席不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吗？他们一看到那封信就抱头痛哭，对着毛主席那封信大哭。另外，我个人有这样看法，江青同志在对待这些中学红卫兵里面，有些做法是不够妥当的，在初期的时候，比较爱得过火了一点，宠得过火了一点，就称他们“小太阳！中国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啊！在后期关心教育不够。联动的小孩在监狱中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没记清楚，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过去江青阿姨最爱我，我给阿姨送沙果，现在若问送果人，身穿囚衣当俘虏。”现在在一些中学里面，在一些窗子上和门上都写了“小太阳坐牢房”这种标语。在监狱里，一般晚上就唱那个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有十多岁的有些十岁多的小孩也被抓去，当政治犯抓去，只有十多岁，十岁刚出头，十二三岁就当作政治犯抓去，这都是群众性的组织抓去送去的，关在监狱里边，许多联动的小孩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口号，压的不服嘛，他们提出这样一些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战斗队，他战斗队的名字就叫“活着干，死了算”，还有人呢，很多和家庭断绝关系，自己单独干。（以上根据录音记录稿，以下根据笔记记录稿——刻印者按）联动已认识大方向错了，对三司有意见，希望文革（小组）谈一谈，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争取了一些西纠派。现在联动有三万多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小孩写红卫兵日夜想念毛主席，应关心他们，联动是反动的，但他有免疫力，并且可能成为左派队伍。

6、关于坐牢问题。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他的两个头头写了两张大字报，被抓了，我们就准备坐监狱，我们想，主席、林彪知道了才能平反。

7、聂元梓问题。新北大初期，对全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七月底为什么转而反了我院和**北航红旗**？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在北大辩论工作队问题时，过早地定了调子，队伍未分化好，造反派，保守派未区分开。聂元梓有很大功劳，但批判工作队时未发挥她的作用。她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人物，如果聂带头反工作队，工作队是站不住脚的。聂元梓与王任重是未划清界线的，对王任重的反动路线未抵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有错误。群众批聂，聂应检查，但聂老虎屁股摸不得，中央文革定聂是革命左派，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另一事实是，有一派，死保工作队，后又死保聂。红旗公社，北京公社成了堂堂大左派，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人还未翻身。

8、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年青人与工人反对林杰、关锋、康生，而一些老干部保。年青人造反精神好，老年人保守，我们派人去了解过，但没有参加“调查康生问题委员会”。

二、我的思想过程

从大串联后逐渐形成，到12月黑风，大联合、大夺权，我认为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有赶快结束运动的想法，准备打大战。我们不想出大字报，如果不是要打仗，我们就有如下打算，就打了一些电话，要求中央文革单独接见。第二，打算印传单，写大字报，但王大宾不同意。我认为，这是根本办法，当前许多群众不动脑筋，要更深入发动群众，大家都能起来造反，影响大，可能要将运动推迟五个月。因为主席说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我们想法请求军委谈谈国际形势，因为没谈，也未写成。大字报只起了个头，开始题目叫：“我们要造反了”。第二次题目改成“东方红总部造反声明”。并没有写完，是表态性质的。内容主要是我们要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

我们没有给中央文革写过信，当时想，这个大字报出了以后，影响会很大，“保字号”会乘机造中央文革的反，我们还要保中央文革。

伯达批示下来后，我认为比薄一波的批示还厉害，什么也没干，糊里糊涂打成反革命。晚上开会也没去，发展到与中央文革对抗的地步。思想上产生抵触情绪。蒋良朴说：“这个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重。”

三、我的错误实质与危害性

1、我把自己仅作为革命动力，而未作为革命对象。没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阶段，错误认识了大民主与无产阶级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2、大字报、传单问题，虽然有好愿望，但客观上帮助了错误路线和敌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没出来，影响还小，否则，影响更大。

3、长期以来脱离群众，由不相信群众到害怕群众，不能把思想露给群众，而两次避开群众。放弃了总部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当前工作。

4、我的错误影响了“东方红”的威望，使我们的战士遭到保守派的围攻，遭受毒打、游街。使受东方红支持的左派组织遭到保守派的反扑。

5、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6、在整风中，我们强调抓一小撮，抓托派，提法不恰当，是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压制了群众。把一些同志当成托派，感情上与同志们对立。在此，向“东方红”战士承认错误。

7、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对错误认识是缓慢的，态度是很不好的。欢迎战友们提出诚恳批评。

——完——

朱成昭检查完以后的情景是，全场鼓掌。这就表示，检查可以通过。张海涛（后来的革委会常委）上台即席讲话，对攻击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人予以批评，因为朱成昭并没有“炮打中央文革”。

此后，绝大多数东方红战士坚持：朱成昭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依据的正是《朱成昭检查》。

1966年5月，江青还叫朱成昭“归队”，更说明，朱成昭没有反对中央文革。

这就是事实真相。

朱成昭受彭、叶等人的影响？

《朱成昭检查》以后，发生的事另当别论。详见我的回忆录《地质东方红兴亡史》¹¹⁷。

朱成昭死后，有人在肯定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这个定论之后，还进一步推测出他反对中央文革的背景：看了彭德怀的“万言书”；通过叶向贞，受到叶剑英的影响，等等。

¹¹⁷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386—39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

无论是 1967 年，还是 21 世纪的今天，朱成昭是否“反对中央文革”，既不能以“蔡派”的观点为据，也不能以朱成昭后来的说法为凭。唯一可以作为根据的，是他 1967 年 2 月 4 日晚的“检查”。

从《朱成昭检查》中，能看出朱成昭受彭德怀“万言书”的影响？能看出朱成昭受叶剑英的影响？

朱成昭是否会受他人影响，人们尽可以猜测和分析。但是，就我对朱成昭的了解，朱成昭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用戚本禹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

朱成昭最可能受到影响的，是他的父亲（上海建工局副局长）在 1967 年初“一月风暴”中受到冲击。

依据《朱成昭检查》，他连中央文革的话（他当然知道，中央文革的背后站着毛泽东），都要通过自己的脑子思考一番，掂量一通，当时不在台上的彭德怀、叶剑英，就对他有那么大的影响？

5、朱成昭失去权势

是朱成昭打倒了朱成昭

朱成昭的失落，开始于 1967 年 2 月中旬～4 月上旬。

朱成昭于 2 月 4 日检查完之后，自己躺倒不干。致命的是，紧接着，中央接见，他也不参加。出于无奈，李贵不得不带上几个人前去。那次接见，事涉地质学院。当李贵不得不站起来回答问题时——

一，他对情况不很了解；

二，他是个 50 多岁的老头子。

这点，引起江青的注意。问他：

“你多大年龄了？你怎么参加学生的会议。”（大意）

江青的这一问，弄得李贵很尴尬。

我当时虽在三司工作，但是，对学校情况还是了解的。我不得不站起来，给李贵“圆场”。

朱成昭要求公平。既然有人（朱成昭认为，是王大宾）告他的“刁状”，说他“反对中央文革”，中央文革也是相信了的，陈伯达还作了批示，那就应该有事实、有证据。在朱成昭心目中，自己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因此，中央文革对他应该有个说法。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向他人“道歉”的习惯。反而认为，既然你朱成昭不想干了，那就另换他人。

“二进地质部”时，形成了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中”为核心的“地质东方红”核心。朱成昭的观点，是得到其他两人同意的。当时普遍认为，“朱蒋杨”是抱成一团的。“朱蒋杨”躺倒，大家将目光投向了老干部李贵。李贵在参加中央接见“受气”之后，决意举荐第四把手王大宾出面主持工作。

这一举荐立即得到中央文革的同意。2 月中旬，中央确定“大学红代会”正副组长人选时，王大宾就被任命为“副组长”。

3 月 5 日凌晨，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让王大宾主持“地质东方红”领导班子。从而，完成了“地质东方红”领导班子的转换。

1967 年 4 月 3 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的成立。领导班子中，没有朱成昭的名字。

“二团”的极左是朱成昭下台的原因之一

朱成昭的政敌有四。一是地质部的当权派，二是地质学院的保皇派（“斗批改兵团”一红卫兵及其所属地质学院“文革委员会”），三是“东方红公社”内部的反对派，四是其他人。

到1967年初，前两类人都被以朱成昭为首的“地质东方红”打垮，“反对派”成了他的主要政敌。

反对派主要由“二团”构成，参加的八个人都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积极分子。因为种种原因，或与朱成昭有不同意见（蔡新平），或在“东方红”中失意（周永璋等），而于1966年10月，成立了各有四个人参加的“二团”。

蔡新平、周永璋等人将自己估计较高。他们一个是曾经的“政治部主任”（当了一个月多），一个是曾经的“三司”负责人（也当了一个月多），名头“大得很”！可是，这时，却没有一点号召力；不仅刚成立时，没有人参加“二团”，经历近两年，直到“校园文革”结束，仍然只是开初成立时的8个人。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原因是，“二团”的成立宗旨不对，它的矛头是对着朱成昭的，是对着“东方红”的，而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大家可能都记得，在1966年10月，地质学院曾贴出过一张由二团的人（殷惟侯）写的著名的大字报《搬开东方红，地院才能大乱》。将东方红搞垮了（搬开了），朱成昭不就垮了吗？那个时候，地质学院的绝大多数人对“东方红”是有感情的，因为有了“东方红”，大家才能团结在一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夺回由保守派掌握的地院大权，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个时刻，反对朱成昭，“搬开东方红”，是不是“别有心机”？至少，这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

进一步想，两个“团”既然目标一致，却为何各打各的旗号？八个人都联合不起来，怎么能使人相信，跟着他们走就方向正确？

面对“孤立”的形势，蔡新平、周永璋等只好悄悄收起与“东方红”分庭抗礼的念头，等待另外的时机。

1967年1、2月，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工作有不同意见。“二团”，立即抓住，上纲上线为“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必欲打倒，以便取代。朱成昭公开他的八大观点之后，广大东方红战士认为是“人民内部问题”，鼓掌通过。这不仅使“二团”失去人心，连支持他们，为他们出谋划策的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等人，也陷于孤立。1967年2月至4月，“东方红公社总部”重组，“地质学院革委会”成立，全院没有一个人推举他们进入“革委会”，这能怪谁？

6、朱成昭成立“新东方红公社”的失败

1967年5月初，王大宾得了江青让朱成昭“归队”的指示，和我一起，找朱成昭谈话。¹¹⁸

朱成昭说：“我往哪儿归？！”

至于“归队”还是“不归队”，这是朱成昭的问题；“往哪儿归”，这是中央文革的问题。

¹¹⁸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46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朱成昭说出“往哪儿归”，说明他并不拒绝“归队”。

我的看法是，如果朱成昭愿意“归队”，他就得向中央文革写个检查。检查得深刻不深刻并不重要，关键是向中央文革表示“忠诚”。他已经在全国大会上作了检查，如果再写个向中央表示“忠诚”的检查，中央是会对他做出恰当安排的。可是，他没有写。

显然，朱成昭的心胸狭窄了些。在朱成昭的眼里，半年多来，他是地院的第一把手。地院革委会的成立，王大宾当了第一把手，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一句“我往哪儿归”，说出了他的绝望。更重要的是，他瞧不起王大宾：一是，王大宾以前是他的部下；二是，王大宾是告密者（见宋永毅对朱成昭的采访）。在他看来，是王大宾将他的“八大观点”，告诉了中央文革，才招致了他的下台。他的这个看法的直接根据可能是：中央抛开他，而起用王大宾。

就王大宾来说，交出地质学院第一把手的位置，而让朱成昭上台也有困难，因为他上台不过一个多月，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或者，他会不会认为，让朱成昭“归队”，就是取代他的“另一种说法”？由此，引致的结果是，王大宾的耐心有限，说出了“你愿意归就归，不愿意归就不归”的话。

江青听到的结果只能是，朱成昭“不归队”。

朱成昭认为，中央既然要他“归队”，这就意味着中央没有忘记他，还要起用他。可是，从5月等到7月中旬，两个多月没有动静，他等不及了，他要行动了。他的判断可能是，中央起用他的前提是，得靠他自己。他的自信，这时，害了他，驱赶着他走向灭亡。他在密切观察、分析社会动向后，决定成立“新东方红公社”。行动的日期就定在1967年7月20日。

不容怀疑，他从“东方红”第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才不过几个月。他的人脉还在，影响力还有许多。已经有了一批紧跟他走的人，如蒋良朴、刘万恩、黄瑞华、郑文卿、陈广智、胡乐成、梅建明、万惠祥、张华府、张华清等。曾经的“东方红”核心组成员，现革委会常委朱德瑜，他也可以叫去问话。

朱成昭可能想到了一年前他起家的“顺利”。一张大字报，就奠定了他成为“东方红”第一把手的基础。这一次，也应该胜算在握。

可是，这一次，他错误估计了形势。即使紧跟他走的人中，如黄瑞华，也会有保留。黄瑞华当时负责广播台。胡乐成要黄瑞华开广播机，黄不开。胡自己开了，《新东方红公社宣言》还没有广播完，广播机就被关了。胡乐成也被其他人“扭送”到革委会问话。¹¹⁹

“新东方红公社”胎死腹中。朱成昭没有从中总结出应有的教训，而是错误地认识到，他不可能在地质学院“归队”，甚至也不可能在中国“归队”。

这时，他绝望了。

¹¹⁹ 聂树人. 地质东方红兴亡史. 第467-468页.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1.

他与“二团”的蔡新平、周永璋一样，方向错了一一他们都陷入了为个人的权势利益而奋斗的“机会主义泥坑”！他们与广大“地质东方红”战士“为文革的胜利而奋斗”的大方向不一致。因此，“失道无助”。

7、朱成昭的“不归路”

雄心勃勃的朱成昭没有“归队”，他当然也耐不得寂寞。在他看来，在校内的路堵绝之后，要想有作为，或许只有出国。当时，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缅甸）的“革命事业”搞得很红火。一些红卫兵就去那边发展了。朱成昭想出国，是不是想到越南去“抗美”，到缅甸搞革命？

他与叶向贞和其他一些同学于1967年7月下旬到了广州，住在军区。他的出走，随即被公安部发现。于桑副部长与我院宫宝军一起，从广州将他带回北京，交给地质学院。

此后，朱成昭被批斗，并主要受到公安部的调查。

两个多月后，朱成昭被逮捕了。

我的看法是，朱成昭的被捕，与文革的大形势直接有关。朱成昭等人被逮捕的时间，是1967年9月前后，正好发生在王力、关锋倒台的时候。此时，文革“转向”，毛泽东开始抛弃造反派，朱成昭首当其冲。

在1980年前后，朱成昭被平反，被分配去了江苏省地质局水文队。后来，他受单位派遣，到上海搞基础工程项目。搞了一阵之后，他独立出来，自己建立公司¹²⁰。可是，主要因为他与多个女性交往，被骗被坑，到1997年前后，他的公司破产。他重又回到北京，想对文革进行“回忆”。宋永毅、牛小涵等曾经采访过他。他也带着他们采访过其他人。不久，死于昌平十三陵。

8、朱成昭的最后炒作：“反对中央文革”

朱成昭等在1980年代出狱后，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背景下，也大肆炒作他们当初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还说中央曾有人提议，要将他们树为“反对中央文革”的典型，被叶剑英抹掉了。因此，朱成昭在谈及自己的“五大观点”和“八大观点”时，就不惜“加油添醋”，改变1967年初他的言论和看法。这时，朱成昭等连他的“八大观点”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了。

而且，这都只是他们自己的说法，既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旁证。因此，不足为凭。

朱成昭没有反对过中央文革，这是铁打的事实。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 1、《朱成昭检查》（即“八大观点”）全文；
- 2、广大东方红战士对朱成昭的评价（大家都认为，属“人民内部问题”）；
- 3、1967年5月，江青让朱成昭“归队”的指示。

¹²⁰好像挂靠在“四海公司”，为其第四公司。朱任处长，朱聘用的陈玉新（原地质学院革委会勘探系革委会主任）为副处长。据说，四海公司是军队系统的大公司。

至于他“私下里”（包括“想”）干了什么，外人并不知道；1967年5月以后又干了什么，则与本文的结论无关。

第六章 朱成昭“八大观点”要点解析

1980年以后，朱成昭回忆出的“八大观点”与《朱成昭检查》的“八大观点”明显不同。我们只能以1967年2月4日《朱成昭检查》为准。

《朱成昭检查》中，虽然列出了“八条观点”，实际有十九条观点。我仍然以“八条观点”为序，对朱成昭的十九条观点进行“解析”。

1、大串联搞早了

朱成昭观点1：红旗第十三期社论¹²¹的发表，给革命群众带来欢欣鼓舞，《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¹²²，认为社论发表早了，感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未批透批深，再晚发表半个月，北京的形势会更好……长期想不通。

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处高潮，保守派正受到批判。保守派一见《人民日报》社论，都跑了，串联去了。

这个观点，能是“反革命”观点吗？

朱成昭观点2：在10月份时候，我们公开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当时，我们还打算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学校的一切权力，并且对我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做了一个布局，想夺权，夺权以后怎么做，我们都做了一个初步安排。

这是朱成昭的超前看法。联合起来，夺权，成立革委会，后来的文革运动不就是这样发展的？何错之有？

朱成昭观点3：我们在那阶段作法有些过火，比如，抄红卫兵的家……批评是正确的。

朱成昭在这里所说的“红卫兵”，是指地质学院里的保守派红卫兵。1966年8月，保守派红卫兵曾经残暴地抄过当时受压的部分东方红战士的家。到了1966年9月底，在批判工作队的资反路线中，有的东方红战士出于义愤，又去查抄了个别保守派红卫兵的家。

冤冤相报何时了！朱成昭认为这不对，承认错误。

2、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

朱成昭观点4：召开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这是必须的……但是呢，这样大型的……十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工人体育场一排排上了半个月以后，都满了……开这种大会，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每个筹备这样的大会的人，是很紧张的，忙得要死。而参加大会的人呢？这些群众大部分的都闲着……这样大会对广大群众教育意义并不十分大的。

反对大轰大嗡，主张务实。朱成昭的观点是正确的，建设性的。

¹²¹发表时间：1966年10月1日。

¹²²发表时间：1966年10月22日。

朱成昭观点 5：批判刘邓路线的……主要的方式，应该是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扫它的社会基础，这是主要的……但是，当时在北京市的各个学校，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比如北航红旗，他们对工作队就没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们学校里面黑帮也没斗过，这是在 13 期社论发表以后，而他们老是热衷于开这个大会，开那个大会……

朱成昭看到了“北航红旗”偏于保守的事实，却没有指出它偏于保守的本质。

几十年来，国人都认为“北航红旗”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不对！从朱成昭在他的检查中列举的事实，足以说明，“北航红旗”是偏于保守的造反派。“北航红旗”对保守的二司最感兴趣，它一头栽进了二司；在大串联中，它主要与“地质东方红”和三司院校对着干，支持保守派，特别卖力地支持成都的“红成”和重庆的“8.15”，就是明证。因为，“北航红旗”就是北京的“红成”。

朱成昭观点 6：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挖掉我们每个人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

这个观点不对吗？

朱成昭观点 7：要把当时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往前推进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工人运动，革命的农民运动相结合……

提倡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这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3、关于揪与保的问题

朱成昭观点 8：揪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感到中央文革小组过早地定了调子……说这个是，那大家都去揪……而中央文革说不是，那么大家都不去揪他了，这样的话，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比较小。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咱们揪出何长工揪出邹花了多大的斗争代价，多少人流汗流血，甚至有个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我们很多参加过斗争的同志都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深深体会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群众有好处，使我们在斗争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在 13 期社论发表以后，这个形势就基本上没有……中央文革过早地定了调调……

这个观点是朱成昭的真知灼见。但是，这是站在地质学院的立场上说的。中央文革要站在全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各省、各单位运动参差不齐，具体问题就无法照顾了。但是，它并不构成“反对中央文革”。

朱成昭观点 9：……凡是杀人、放毒、放火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这样的一些人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是弊大于利，好处少，坏处多……不要把李送到监狱去，要把李洪山放在群众当中，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当个反面教员，这样就教育了群众……对于谭立夫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另外，对科大雄狮问题，科技大学雄狮战斗队的文章……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但是，对科大雄狮这些头头是抓了好还是不好？我们认为还是不抓好，因为他们反革命理论在科技大学并没有被批判，相反还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看法。另外像对待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方面，哈军工造反团是全国有名的左派队伍，他们几个头头给中央文革贴了两张大字报，后来两个头头被抓起来了，送到监狱去了。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也是不好的……实际上他们这种思想……在很多左派队伍中有所反映，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感到文革小组在一定的程度上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在运动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压制群众的现象……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方面文革小组没有能够坚决的贯彻以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不要抓进监狱。可是，当时，有谁能听得进去呢？有谁能这样作呢？文革前，领导一句话，管你正确不正确，送你进监狱，你不进不行。文革开始后，群众说了算，群众“扭送”，监狱就得接收。

这原因就在于，当时，并没有思想犯、政治犯、刑事犯的区分。这能上纲为“反对中央文革”吗？

4、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

朱成昭观点 10: 在去年 10 月中旬和 11 月初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逐步实现全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统一三个司令部……本着这个想法，我们就和北航红旗、政法公社、建工八一团等三个司令部的一些学校，一些左派队伍建立了一个联络站……但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同志知道这事以后，批评了我们……当时，他很严肃，这个造反联络站我们搞了一半就没搞下去，后来就散伙了……当时我们对这一作法是想不通的，说过关锋同志在处理三司这个问题上面，在对待三司这个问题上面采取了宗派主义组织路线。

朱成昭的这个看法和做法是正确的、很超前的，以致中央文革小组也跟不上。

朱成昭观点 11: 夺权必须利用和依靠那些好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打倒。当时……凡是当权派都要打倒……在夺权中也不应该出现一些戴高帽子呀，游街呀，挂黑牌子呀，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当时是有意见的。

无论在文革之中还是文革被否定之后，朱成昭和“地质东方红”的师生大都持这个看法。因为按照“四清运动”的观点和做法，我们并不认为干部都是“走资派”，都要打倒。“戴高帽子呀，游街呀，挂黑牌子呀”，不仅朱成昭反对，我也反对。这也构成罪状？

朱成昭观点 12: 北京的大联合不能一哈而成，必须有个过程……北京市没有像上海和其他地方那样，经过了一个全市的大搏斗，北京没有……这就是我们当时对大联合的态度和大夺权的态度。

这个看法正确，可是，并不适合北京。北京是学生运动为主，农民运动起来的慢，工人则主要是少数“勇敢分子”在动，成不了气候。“必须有个过程”？运动发展到 1967 年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北京还有时间进行这个“过程”吗？

北京也有人在搞大夺权，这就是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可是，他们却是同床异梦，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5、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

朱成昭观点 13: 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关于对联问题……我们认为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初期对这个对联的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在此以后……从中央文革小组来看，对中学生的引导教育是不够的……因而对联就逐渐被敌人利用，这就是被西纠发展成了反动的血统论。

对“血统论”对联，以及如何对待，朱成昭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与“反对中央文革”挂不上勾。

朱成昭观点 14: 一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待中学生这部分力量不是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忽略了作思想工作和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后来对联动的态度尤其这样。这里可以举例子，例如清华井冈山抄人大附中红卫兵时的这种情况（这个情况我知道不大确切），据说把小孩赶到楼上去了，赶到楼顶上，一层层追，追到楼顶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小孩给打的只剩下六七个了，在楼顶上他们升起了国旗，用瓦片砖头打下来，一面高唱国际歌。另外，在抄石油附中红卫兵家时，红卫兵他们打打，退到地下室里边，他们就把地下室里边放了水，说：“你们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就继续放水！”还有用灭火机向小孩脸上喷，说：“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再喷！”这办法，我们认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原来西纠是采取这个办法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办法又对付他们。这些小孩嘛！才十几岁嘛！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嘛！在这些群众组织对这些小孩、中学生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所以有小孩，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第一个红卫兵嘛，毛主席不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吗？他们一看到那封信就抱头痛哭，对着毛主席那封信大哭。

“不是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这是谁干的呢？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

朱成昭观点 15: 江青同志在对待这些中学红卫兵里面，有些做法是不够妥当的，在初期的时候，比较爱得过火了一点，宠得过火了一点，就称他们“小太阳！中国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啊！在后期关心教育不够。联动的小孩在监狱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过去江青阿姨最爱我，我给阿姨选沙果，现在若问送果人，身穿囚衣当俘虏。”……有些……十二三岁就当作政治犯抓去，这都是群众性的组织抓去送去的，关在监狱里边……他们提出这样一些口号：“活着干，死了算。”

首先，朱成昭在这里说的是事实。在如何对待“中学红卫兵”这个问题上，朱成昭对江青有意见，但是，能上纲到“反中央文革”吗？

6、关于坐牢问题

朱成昭观点 16：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他的两个头头写了两张大字报，被抓了。我们就准备坐监狱，我们想，主席、林彪知道了才能平反。

朱成昭“准备”得很正确。朱成昭等正是在毛泽东“舍车保帅”的时候（1967 年 8 月底），被逮捕的。直到毛泽东死了好几年后，才被释放。

7、聂元梓问题

朱成昭观点 17：新北大初期，对全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七月底为什么转而反了我院和北航红旗？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在北大辩论工作队问题时，过早地定了调子，队伍未分化好，造反派，保守派未区分开。聂元梓有很大功劳，但批判工作队时未发挥她的作用。她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人物，如果聂带头反工作队，工作队是站不住脚的。聂元梓与王任重是未划清界线的，对王任重的反动路线未抵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有错误。群众批聂，聂应检查，但聂老虎屁股摸不得，中央文革定聂是革命左派，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另一事实是，有一派，死保工作队，后又死保聂。

“新北大初期”，确切些说，应为文革初期。“七月底¹²³为什么转而反了我院和北航红旗”？那原因没有别的，就因为张承先工作组移权给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筹备组。聂元梓是保皇派！而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才刚刚从地下爬起来，反对的是工作队，与聂元梓当时的所行所持，正好相反。

“群众批聂，聂应检查，但聂老虎屁股摸不得，中央文革定聂是革命左派，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这一点，朱成昭也看对了。难道朱成昭对聂元梓有所“不恭”，也成了“反革命”？

朱成昭观点 18：红旗公社，北京公社成了堂堂大左派，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人还未翻身。

在北大，有聂元梓的保皇派“校文革”压着，被工作队打成的“右派”还能平反？

8、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

朱成昭观点 19：年青人与工人反对林杰、关锋、康生，而一些老干部保。年青人造反精神好，老年人保守，我们派人去了解过，但没有参加“调查康生问题委员会”。

朱成昭以上 19 个观点，没有一条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充其量，是对中央文革的工作有意见。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朱成昭的独立思考精神。

第七章 文革的肯定与否定

¹²³指 1966 年 7 月底。

4、文革的“恶”大都是“保皇派”所为

阶段一：1966年6月初至7月底

在此阶段，国人可分为五大群：

- 1、“当权派-走资派”群（或直称为“统治者群”）；
- 2、保皇-左派群——以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为主；
- 3、造反-右派（原始造反派）群；
- 4、观潮派群；
- 5、“贱人”类群。

在此阶段，“保皇-左派群”听党的话，大斗“黑帮”、“五类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而最热衷、最卖力的是，大斗“造反-右派群”。

在此阶段，因为给工作队提了点极为善意的意见的师生，被打成“右派”，被反爬在地。我将他们称为“造反-右派（原始造反派）群”；

我将第五类群称为“贱人”类群，并不是说，我也视他们为“贱人”，而是指他们被“社会”抛弃，成为异类。

阶段二：1966年7月底至9月底

在此阶段，“保皇-左派”群因刘少奇、邓小平失势，而从顽抗走上退缩、湮灭之路。

红卫兵或“老红卫兵”却因毛泽东的一封信而起，成为一股极恶势力。他们“破四旧”、“造反”、打、砸、杀，无恶不作！特别是在大兴县。他们打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旗帜，力图破坏文革，让文革成为人人憎恨的恶魔。

因此，此阶段的国人可分为如下六大群：

- 1、“当权派-走资派”群；
- 2、“老红卫兵”群；
- 3、保皇-左派群；
- 4、造反-右派群；
- 5、观潮派群。
- 6、“贱人”类群。

在此阶段，“造反-右派群”正忙于向工作队的派出者请愿，请他们给自己平反。而“保皇-左派群”则以对“黑帮”（“当权派-走资派”群）、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来抵制“造反-右派群”的请愿活动。

阶段三：1966年10月初至1967年

在此阶段，“老红卫兵”的图谋被识破，恶行受到严重打击，队伍覆灭。保皇-左派群瓦解。瓦解出的人大部分加入了造反-右派群，少部分加入了“观潮派群”。保皇派的加入而使“造反-右派群”发生了“质变”，鱼龙混杂，改称为“造反派群”。

在这个期间，随着刘、邓的垮台，资反路线被批臭，“造反派”群发生了分化，部分干部子弟开始“分化”出去。

因此，此阶段的国人可分为五类：

- 1、“当权派-走资派”群；
- 2、造反派群；
- 3、“分化派”群
- 4、观潮派群。
- 5、“贱人”类群。

在这个阶段，“造反派群”中的“主动型”人群，如蒯大富、聂元梓之类，大搞“痞子”一类的极左活动，对干部、对“对立面”大批、大斗。如清华大学，一个斗争会就跪倒了三百多个“走资派”。

5、“造反派”永远都是贪官污吏的死对头

在文革的各阶段中，发生的批、斗、打、杀、砸等坏事，哪一条都与造反派没有直接关系。

工作队镇压“造反派”，铁证如山；“造反派”奋起与工作队作斗争，夺走资派的权，理所当然！

走资派“还乡”以后，造反派遭到镇压，失去发言权，文革被“彻底否定”。

文革后“还乡”的走资派，惧于文革对他们利益的剥夺，为了否定文革，而将他们的子女干的、保皇派干的坏事，一古脑儿都加于造反派头上。

这就是事实真相。

我还想说的是：造反派永远都是走资派-贪官污吏的死对头。

6、文革运动不是“红卫兵运动”

“老红卫兵”因毛泽东的一封信而雄起于1966年8-9月，他们穿着准军装，操着宽皮带，批、斗、打、杀，不可一世，谁都不敢招惹他们。

同“老红卫兵”对抗的唯一办法就是，你也得穿上旧军装，戴上红袖标。

于是，你也成了红卫兵。但是，造反派“成为”红卫兵，是不得已的，是被迫的。

由此，老红卫兵说，文革运动也是红卫兵运动。

我想说的是，文革运动不是“红卫兵运动”；造反派戴上“红卫兵”袖标，那是被迫的。

7、文革“肯定与否定”的制度前提

民主制度不需要文革

当今世界的社会制度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民主制度，一类是专制制度。

民主制度国家的领导人为民选，几年一选。如有专制或贪腐，领导人随时都可能被被赶下台或选下台。

因此，在民主制国家，文革根本没有必要。

专制制度必须肯定文革

专制制度不靠选票，靠的是“一党专政”。“一党专政”的背面，是枪杆子，即监狱或杀场。

专制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会失去民心。为了使专制制度“千秋万代”，就必须不断“整”党内的“走资派”，即贪腐分子。因此，文革运动是必要的，是不能被否定的。

第一次文革，因为“走资派”的强大，失败了。

第一次文革的失败——走资派还乡，招致了更严重的腐败。迫使习近平上台后，立即开始“反腐”。这次反腐，叫不叫第二次文革，无关紧要。但是，它所造成的“官不聊生”，却远超第一次文革。

8、专制制度下文革的必要性

“结党营私”的新阶段

中国古人早就有言：“结党营私”。

因为“势单力薄”而要“结党”。用时髦的说法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结党”时，结党者大都怀着理想，其中不乏崇高理想。

当“党”打下一片天地、有“利”可图时，“营私”的那一面，就开始暴露。当“党”打下几大片天地，以至夺取了天下时，“营私”的那一面就会名正言顺地暴露或展现。共产党自1921年结党后，在江西根据地即发生贪腐，此后一直延续到延安根据地……

共产党正式开始“营私”，是在打下天下之后。名义上是“均贫富”，“当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论功行赏”，“坐享天下”。

因此，“打天下，坐天下”，是“正道”。“清华4.14”周泉缨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理论，顺了“倒蒯”的“清华道”，却逆了共产党的“当权道”，毛泽东当然不喜欢。

现在（2017年），“结党营私”早已发展到新阶段……

“党内有派”的无奈

古人也有言：“党内有派”。

执政党，可以将其他政党或政敌消灭净尽，搞成“党外无党”。但是，无法将党内的不同意见者、不同政见者消灭净尽。

尽管7届2中全会一再警告，1949年掌权后，仍然滋生腐败。“六陵渡现象”¹²⁴就是明证。

¹²⁴ 见聂树人，《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2012，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专制制度下的“反腐”，必然带有“派系斗争”的色彩。毛泽东的文革首要反的是刘少奇“司令部”。为了“团结大多数”，邓小平等被剔了出来；为与林彪结盟，红一方面军干部的“文革待遇”往往高于其他方面军的干部。尽管如此，枪杆子的倒戈还是招致了第一次文革的失败。习近平的反腐，为了“团结大多数”，避开了红二代。因为没有群众基础，中纪委及各级纪委的反腐，就不免流于“扬汤止沸”。到了连枪杆子都“靠不住”时，“新中国”操弄者的末路也就到头了。

在早期的“坐天下”者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坚持清廉，坚持公正。但是，“改革开放”以前，他们或是少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会因为是“异类”，而被贪腐分子踢出“圈子”。

9、第一次文革失败的必然性

1、文革运动只有两年

第一次文革发生于1966年6月，历经十年。

我认为，文革只有两年，或可称之为“校园文革”。此后八年的文革，主要是中央上层的权力争夺，与“文革运动”没有多大关系。

1976年，“四人帮”遭逮捕，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2、文革运动的“痞子运动”特征

文革运动一开始，就陷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旋窝，使文革运动明显地显示出“痞子运动”的特征。

①“继续革命理论”的“阶级前提”早已不复存在。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到1956年，国人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后，被全部驱赶到“公有制”的轨道中。没有了“私有制”，也就没有了“阶级”。没有了阶级，自然就失去了出现阶级矛盾的前提。因此，就不应该出现阶级斗争。可是，直到文革，包括地、富在内的“五类分子”，却仍然无端被称为阶级敌人，被斗死或斗爬在地上。甚至，他们的子女也被贬称为“黑五类”（后来，又改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②自1949年之后，主要是1956-58年之后，主导中国老百姓命运的是党的各级干部，小到生产队队长。中央是“党的主席”说了算，各部、各省、各县、各单位也是“一把手”说了算。这就造成了对“走资派”认定的“常规”是：官不论大小，“一把手”首当其冲。上自刘少奇、邓小平，下至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大都受到“走资派”的审查或“礼遇”。干部的等级不同，“走资派”的“认定规格”却有相同之处，“待遇”却有相同之处。下层或底层的“走资派”可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是“上级指示”的执行者。文革运动一来，受到同等“对待”的下级“走资派”当然心有不服。

③、“继续革命理论”的前提是“党的领导”。“党”是谁？党既可是领导者集体，也可以是领导者个人，也可以是党员。文革中，毛泽东认为“我就是党”，刘少奇认为“我就是党”，薄一波认为“我就是党”，学校党委认为“我就是党”，工作队认为，“反我即反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党员，也可以认为“我就是党”！封建皇帝只有一个，“党”却有多个！“天无二日”！中国的现实却是，“天有多日”！“日头”多了，就乱套了。

“我就是党”虽然受到 1966 年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批判，但是，除毛泽东外，谁能代表“党”？

④、谁有资格认定“走资派”？毛泽东（党中央）有认定资格。可是，他也只能认定极少数。由“群众”认定？可是，群众分为各种派别，难有统一意见。事实是，毛泽东、党中央，从来都没有赋予群众认定走资派的资格。而且，毛泽东认为，“走资派”只是执政党内贪腐的“极端者”。即使这个“极端者”，经过七斗八斗，绝大多数也可以变好。其他的非极端者，都包括在“95%以上”之中，且很快就成了“三结合”对象。最后，这些人都成了“还乡团”，成为“彻底否定文革”的主导者。

⑤、共产党内的路线之争，中国前进的“道路”之争，本来是肉食者的事，却被弄成全民之事，要让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参与解决，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于是，一些利欲之徒，如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之类，就自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就上窜下跳，成为文革乱局的制造者。¹²⁵

⑥、“斗私批修”，在文革中被喊得天响。当时的苏共是不是“修”，中国人只能听毛泽东们说，自己并没有亲历。上级（包括中央）的、外单位的当权派是不是“修”，“本单位”的群众也只能“听人家说”。到了 1980 年代，被文革清算的“走资派”都被说成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后，人们对“修”似乎有了新认知，“修”出自“私”。而这“私”，或者还是人的“本能”（小孩子刚生下来，嘴巴就会四处“吞”，他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吃”）！显然，不能一概否定“私”。对于贪腐，许多问题上的“私”，小“私”，似可“自律”，大“私”就只能“动手术”，只能以“制度”加以制约。可是，中国何时才能有这种制度？

⑦、文革运动没有民主性。文革运动是毛泽东主导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对于他及由他主导的“中央”，中国人要绝对服从，不能有半点怀疑。体现文革“民主性”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在毛泽东（党）的领导下！我的一贯观点是，“造反派”是跪着造反的；要想有半点“独立思考”并付诸行动，你就得准备当“反革命”或“朱成昭第二”。

⑧、毛泽东死后，由谁来决定“七八年再来一次”？同样不会是老百姓。华国锋成为“核心”后，与叶剑英等人搞政变，抓了“四人帮”；邓小平成为“核心”后，名义上不搞阶级斗争了，却制造了“6.4”大血案。此后，他们交权于自己的子女，让自己的子女先富起来……

文革运动的“痞子”特征，是毛泽东文革的需要。

3、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

1、1966 年，当毛泽东要“整”走资派的时候，走资派的势力已经稳固到盘根错节，难以撼动的地步。

¹²⁵ 聂元梓原本是高级干部，是既得利益者；朱成昭是在毛泽东（通过其女儿李讷）的直接指挥下行事的。

2、毛泽东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尤其错误估计了他对枪杆子的控制力。事实是，“混进党里”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腐败同样，或更为严重。当“枪杆子”向他说话（始则“二月逆流”，终则“7.20兵变”）时，他就只能退缩。

3、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只为整治“走资派”，并无从根本上打倒“走资派”之意，更无废除“打天下，坐天下”制度的半点意思。因此，当“走资派”被“三结合”、重新当权之后，以他们对“造反派”的仇恨，以毛泽东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形成的不良印象，两方面联手，以“抓5.16之名”，就彻底镇压了造反派。从而，也彻底否定了文革。

4、当毛泽东临死之时，却突然发现，他发动的文革被否定了¹²⁶。否定的根本原因是“造反派”被否定。此时，他也后悔莫及。当他希望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时，造反派早已被他和“走资派”打爬在地下。因此，他哀叹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是无奈的。

4、文革失败的间接原因

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弊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弊端，发展到文革阶段，已经发展到极致。主要是：

1、将“无产”发展到“极致”¹²⁷

共产党曾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1949年当权之后，着力消灭“有产者”。在农村，通过合作化，通过人民公社化，将农民手中的土地全部没收（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农民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在城市，则通过公私合营，将资本家及其他人的财产全部化为“公有”，市民也就成了“无产阶级”。从此，除过老祖宗传下来的房屋未明确没收外，人民大众已经一无所有。或者，除了一条命外，什么都没有了。

当全民变成“无产者”之后，掌权的共产党人就自然成了中国的“有产者”。

在三年困难时期，当全国成百万、成千万人饿死的时候，中南海里的舞会照样举行；省委书记的生活照样有保障¹²⁸。即便是中国的“最底层”当权者，也流传着“二两三两，饿不死队长”¹²⁹的话。

到文革时，共产党最推崇的理念仍然是“斗私批修”。

2、将“无知”发展到高峰

对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是“利用”；1957年，对其中的“异议”者，是打翻在地；文革中，则统统视为“反动学术权威”，杀戮迫害，无所不用其极。结果，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字不识几个的“工农兵”被推进了大学。似乎八亿人只要一本“小语录本”就行了。

¹²⁶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与实际运行的文革，在方向性上，是矛盾的，文革失败是必然的。

¹²⁷ 2016年8月21日，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篇短文，对文革的“功过”进行了总结。我加上自己的理解，对之进一步论述。

¹²⁸ 比如，有人揭示的“三年困难时期”任河南省委书记的何伟家的生活。

¹²⁹ 当时是“人民公社化”，最低层的当权者是生产队长。

3、将“无情”发展到高峰

1949年以后，共产党推崇的是“大义灭亲”、“六亲不认”。流行的说法是：对被认为的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难道革命者还讲什么亲情？还讲什么儿女私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大义灭亲”，“六亲不认”之类，多与告密有关。到了文革时期，狠批人性论、人情论。对地富反坏右、对封资修，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你看红灯记，祖孙三代都是鳏寡孤独。据说，这是最纯洁的无产阶级感情。

山东一个叫张红兵的红卫兵，将揭发自己母亲的告密信与自己的“红卫兵证”一同交到了公安局，由此，将自己的母亲送上刑场¹³⁰。

4、将“无法”发展到高峰

中国几千来都是人治，皇帝就是法，当权者就是法。在地方事务上，如果事涉“法治”，则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如果是两股势力相撞，比的就是，看哪个关系硬，看那个拳头硬，看那个更黑。

到了“新中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包括刘少奇、陈云，都认为：没有法比有法好。这样，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

到了文革，“老红卫兵”无法无天，想斗谁就斗谁，想杀谁就杀谁，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有毛泽东支持，谁敢管？

到了文革，有工作队的支持，保皇派批斗“五类分子”、批斗“黑帮”，也包括“老干部”，很为积极。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自1966年6月至9月，地质学院的保皇派就掀起了六次“斗黑帮”的高潮。而在此期间，先是“造反派”被院党委、工作队打爬在地下，后是，造反派坚持找工作队算账，无暇“斗黑帮”。

到了文革，刘少奇挨批挨斗，他才想起了法制；找来找去，才找到了一本《宪法》。可是，在没有法制观念的社会里，《宪法》只是废纸一张。

当彭真等被关进监狱，这才感到“法制”的重要。被放出监狱后，才匆匆制订了《刑事诉讼法》、《刑法》等等。可是，在人治社会里，《法》，不过是有人手中的玩物。

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惯了的“老一辈”，对文革运动的“暴风骤雨”很不适应——他们只惯于草菅百姓，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也有遭“报应”的那一天。因此，他们对文革恨之入骨。他们“还乡”后，不大敢对毛泽东上火，却将仇恨全加于“四人帮”和造反派头上，对文革来个“彻底否定”。

10、“老一辈”的真面目

¹³⁰就是这样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到了21世纪，却要为他的母亲“申遗”。我的看法是，这不是为他的母亲“申遗”，而是为他的告密“申遗”。

毛泽东死去，文革整治“走资派”失败。以不光彩手段上台的邓小平和陈云，既要维护专制制度，又不想遭到整治，就只能用枪炮说话（1989年）。枪炮响过以后，因怕遭到清算，就主使红二代接班。红二代接班后，总揽全国资源，大贪特贪，造成难以置信的贫富悬殊，直至2010年代。

不仅邓小平的“永不翻案”靠不住，赌了多少次咒，发了多少次誓，说自己早已“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老一辈”，也终于显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们“出生入死”搞革命的目的，不过如此——他们做了一桩把天下据为己有的大买卖。

这赤裸裸地暴露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

不贪不腐者反而成为异类，被排斥出“贪腐的圈子”。

如今，“老一辈”的子女大都有了“绿卡”，或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子民。

如今，还有人敢挺直腰板说，文革“整走资派”是整“无产阶级革命家”吗？

我从不否认，有相当多虔诚的、一心为民的“革命家”曾投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中。但是，最终，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一辈”将他们带进了泥沟里。

11、文革被“彻底否定”了吗？

“彻底否定文革”，似乎早已成为俗语。可是，被文革整死的刘少奇，被平反，被歌颂；发动文革、整死刘少奇的人，却仍然伟大；

“四人帮”被否定了，“四人帮”的主导者却被歌颂；

有人说，“两派”都要“否定”！可是，谁曾听说，“保皇派”真正被否定过？与之“混为一谈”的“老红卫兵”、红卫兵，被“彻底否定”了吗……

“彻底否定文革”的人，可能开初也想厘清这些问题。只是，越厘越乱，不能自圆其说。干脆，来他个“彻底否定”，来他个“不争论”，来他个“闷声发大财”！这一“烟”，就是五六十年，就过去了三、四代人的时光。

现在，文革的经历者都快要死光了，没有死的，“文革记忆”早已淡漠。有的人，如韩爱晶，文革经历本来不多（与朱成昭相比，与早期的“地质东方红”战士相比），本来是“文革如何搞”阶段的人，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往“文革搞不搞”阶段里挤；才主政“北航红旗”两天，就要去“厘定”十万人大会！或者，只有把文革之水搅得混混的，他才能“不愧于‘五大领袖之一’的头衔”！

“彻底否定”是“走资派-还乡团”将造反派彻底打爬在地之后，在肆无忌惮地妖魔化文革之后，出现的“一家之见”。另一家（被打者）则不让发言。他们中，有的人写出了点回忆录，却只允许在香港出版，还不允许在大陆发行。

我只想告诉后代子孙，千万不要相信“彻底否定”的邪说，也不要相信一些人写的“回忆录”，包括“五大领袖”的。前者，基本都是假的；后者，真真假假。即使我写的，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或挂一漏万。但是，我力求事实真实，有根有据，绝不编造。

你们如果想知道文革，就要通过艰苦、全面的挖掘（寻找文革资料），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12、这次反腐能成功吗？

1945年，国民党对日本战区的接收，滋长的贪腐，导致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1949年以后，共产党对中国的接收，滋长的腐败，导致文革的发生。

“打老虎”失败了。

第一次文革失败了。

面对全面贪腐，以习近平为首的共产党中央下大决心反贪腐。2013年以后，我们看到，不论大官小官，有的被免职降职，有的被送进监牢，有的罹患“抑郁症”，有的服毒，有的跳楼，有的溺亡……大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形成了第二次“官不聊生”。

辽宁省委塌陷了，天津市委塌陷了¹³¹……贪腐的“精英”（也可称为“走资派”）一片片、一串串地被揪出来了……

有人说，当官，成了最危险的行业。

近年的反腐，为了“团结大多数”，避开了红二代。因为没有群众基础，中纪委、纪委等少数人的反腐就不免流于“扬汤止沸”。

目前的反腐，给社会带来了一丝清气，但愿能够成功。但是，因为是自上而下的“选择性反腐”，是捂在钱袋里的反腐，很可能的结局是，要么，反腐者被贪腐的臭气熏死或熏死；要么，被同化。

13、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2017年，列宁的“百年雕像”被俄罗斯人放倒了。放倒原因不明。

文革的肯定与否定，都离不开对毛泽东的评价。

无疑，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开国皇帝”。

毛泽东的政治手腕比蒋介石高明，他利用抗日战争集聚起来的力量，利用反独裁、反专制、反“四大家族”¹³²的政治宣传，赢得了民心，打败了蒋介石，在大陆建立了“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权。

可是，不屈的蒋氏父子却在台湾实行了民主制，还政于民。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无论谁好谁坏，执政者的更替，都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

这，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

附带说一句，台湾的民主转型宣告：“中国的国情不适于民主制度”的论调，早已破产！

¹³¹好像都发生在2016年9月。

¹³²蒋介石统治下的“四大家族”是不是真地存在？近年，互联网上提出质疑，还举出了他们在海外的资产。

在这一大点上，毛泽东能与蒋氏父子相比吗？

纵观中国历史，秦皇汉武虽然“略输文采”，但是，他们不仅能与毛泽东比肩，甚或高于毛泽东。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其功大焉！

新中国刚一成立，毛泽东不顾国力疲劳，甘愿充当斯大林的附庸，“抗美援朝”！他抗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多数国家（联合国军），援的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侵略者（金日成）。无论打了个“平手”还是战胜了美国，几十年间，中国都为世界所不齿。

1949年以后开展的多项政治运动，其合理性值得怀疑。他将农民手中的土地全部没收（实际是收归公有），希冀建立他理想的“乌托邦”，导致中国大多数人的生存权操控在少数“干部”的手中，造成中国政治运动不断，造成1960年代初几千万人饿死……

毛泽东时刻不忘选择他的接班人。接班人，是专制制度的延续人。